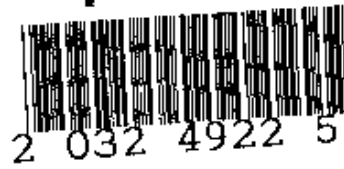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编

李大钊史事综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1721152

李大钊史事综录 12

(1889—1927)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大钊史事综录

(1889年—1927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625印张 72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册

ISBN 7-301-00886-4/K·066

定价：12.50元

前 言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为了推动李大钊研究与宣传，我们决定组织编写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和翔实反映李大钊生平活动的资料性与学术性兼备的工具书，以供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参考。自1985年10月以来，编者先后查阅了国内以及苏联、日本迄今发现与李大钊史事有关的报刊书籍，从中搜集了1000多篇文献资料，经过筛选，分类和考订，整理编辑为现在的这本书。这是一本史料书，对于研究了解李大钊生平活动的背景，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所以，应该说，这是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全书收录关系李大钊生平活动的文献资料800多篇。在内容编排上，分十二个专题，大体上按时间的先后为序。收录的文献中，有一部分是李大钊本人的著述，为节省篇幅，仅在书中列出题目，未录原文，请翻检《李大钊文集》。

本书的编者有：韩一德、王世儒、姜庆明、杨树升、李善雨、金淑琴等，刘多田、董宝瑞等也参加了部分编译工作。最后由王世儒、杨树升、姜庆明补充、整理。在编写过程中，北京大学的陈秉才、李鼎霞，日本的后藤延子、富田昇等先生，曾提供宝贵资料，给予协助；书稿编成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慨然支持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和资料来源所限，本书的缺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1989年4月

李大钊烈士碑文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1911年到1919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1920年3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1922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4月28日，凶

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劫、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不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1933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編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1959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1933）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3年9月

目 录

李大钊烈士碑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注)

一、家世和少年时代

述 要..... (甲)

(一) 故居和家世

1. 乐亭县..... (3)
2. 故居..... (6)
3. 家世..... (12)

(二) 少年时代的学习

1. 私塾..... (18)
2. 永平府中学..... (22)

二、天津求学

述 要..... (26)

(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略史..... (29)
2.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入学通知..... (32)

(二) 天津学界请开国会运动

1. 李大钊《十八年来之回顾》..... (36)

2. 李矩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纪念会上的演说词 (36)
3. 天津请开国会风潮追忆 (41)

(三) 北洋法政学会与《言治》月刊.....

1. 北洋法政学会 (45)
2. 《言治》月刊 (49)

(四) 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

1. 中国社会党规章、宣言 (53)
2. 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 (56)
3.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 (60)

(五) 五峰山和昌黎车站惨案

1. 五峰山和韩文公祠 (62)
2. 昌黎车站惨案 (63)
3. 李大钊《游碣石山杂记》 (65)

(六) 师友记

1. 白雅雨 (66)
2. 郁崑 (69)
3. 白坚武 (74)
4. 陈翼龙 (78)
5. 吉野作造 (84)
6. 今井嘉幸 (84)

三、留 学 日 本

- 述 要 (86)

（一）留学初期

1. 中国留学生会馆..... (90)
2. 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和欧美教师的大批东来..... (95)
3. 投稿《甲寅》杂志..... (96)
4. 其他活动..... (98)

（二）在早稻田大学学习

1. 李大钊学籍表..... (99)
2. 受课课程表..... (100)
3. 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教师及所任课程..... (102)
4. 李大钊大正四年度进级成绩表..... (104)
5.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 (104)

（三）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

1. 中日交涉之留日学生大会..... (109)
2. 留日学生《泣告全国同胞书》..... (110)
3.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务纪要..... (112)
4. 李大钊的有关活动..... (122)

（四）编辑《民彝》杂志

1. 民彝杂志简章..... (123)
2. 民彝杂志征文启..... (123)
3. 黄种歌及序..... (125)

（五）神州学会和中国财政经济学会

1. 神州学会简章..... (126)

2. 神州学会规则.....(128)
3. 神州学丛刊旨.....(130)
4. 神州学丛启事.....(131)
5. 题神州学会中华留日同志合影序及李墨卿读
神州学会月麓同志之合影序.....(132)
6. 中国经济财政学会.....(133)

四、北京办报

述 要.....(137)

(一) 创办《晨钟报》

1. 《晨钟》立言之标旨.....(140)
2. 《晨钟》之使命.....(142)
3.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142)
4. 李守常启事.....(142)

(二) 在《宪法公言》编辑部

1. 《宪法公言》章程和序列.....(143)
2. 《宪法公言》出版露布.....(145)
3. 李大钊《国庆纪念》.....(145)

(三) 编辑《言治》季刊

1. 《言治》季刊宣言.....(146)
2. 《言治》季刊启事、广告.....(147)

(四) 编辑《甲寅日刊》

1. 《甲寅》日刊之发端.....(149)
2. 《甲寅》之新生命.....(152)

〈五〉 回乡纪实

1. 旅行日记.....(153)
2. 乐亭通讯.....(153)

〈六〉 李大钊与白坚武、孙洪伊、汤化龙

1. 白坚武日记.....(154)
2. 孙公洪伊行状.....(159)
3. 汤化龙.....(166)
4. 宪法商榷会.....(170)
5. 宪法研究会.....(171)

五、任职北京大学

- 述 要.....(172)

〈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 任职.....(174)
2. 图书馆管理研究与工作实践.....(176)
3. 图书委员会.....(189)
4. 捐赠北大图书馆书刊.....(191)
5. 北京图书馆协会.....(193)
6. 辞职启事.....(194)

〈二〉 教学与校务管理

1. 受聘教授.....(195)
2. 任课讲学.....(200)
3. 校务管理.....(210)

(三) 校外兼课与讲演

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课.....(269)
2. 在北京的学术讲演.....(271)
3. 在武汉的学术讲演.....(272)
4. 在上海的学术讲演.....(275)

(四) 社会活动

1. 进德会.....(277)
2. 学余俱乐部.....(281)
3. 新知书社.....(283)
4. 非宗教大同盟.....(286)
5. 其他活动.....(291)

(五) 索薪斗争

1. 李大钊就北京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的谈话.....(309)
2. 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停职宣言.....(310)
3. 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311)
4. 索薪斗争.....(312)

六、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

述 要.....(354)

(一) 参加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1. 《新青年》编辑工作.....(358)
2. 《每周评论》编辑工作.....(370)

〈二〉新旧思潮的激战

1.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373)
2.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374)
3.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374)

〈三〉指导社团活动

1. 国民杂志社……(375)
2. 新潮社……(381)
3.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384)
4. 觉悟社……(391)
5. 少年中国学会……(397)
6. 北京工读互助团……(415)

〈四〉在五四运动中

1. 《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418)
2.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423)
3.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428)
4. “挽蔡”……(429)
5. 李大钊谈五四运动……(429)
6. 促进中日人民的交往……(430)

七、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述 要……(442)

〈一〉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

1. 李大钊的五篇文章……(446)
2. 《新青年》和《晨报副刊》“马克思主义研

- 究”专号目录.....(446)
3. 林伯渠谈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447)
4.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448)
5.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初期与河上肇、堺立
彦的关系.....(459)

(二)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465)
2.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通告.....(466)
3.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77)
4. “亢慕义斋”及其活动.....(481)

(三)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1.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通告.....(486)
2. 劳动节之北大讲演会.....(487)
3.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487)

(四)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489)
2. 《劳动音》发刊词.....(496)
3. 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与长辛店工会
.....(498)
4.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504)
5.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散发的宣传品.....(512)
6. 其他活动.....(512)

(五) 创建中国共产党

1. 公开提出建立劳动界的政党.....(529)
2. 关于建党活动的回忆.....(529)

3. 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543)
4. 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关系.....(548)

(六)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 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551)
2.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554)
3. 北方路矿工人的斗争.....(554)
4. 二七大罢工.....(587)

八、对吴佩孚的工作

述 要.....(604)

(一)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方针

1.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节录).....(606)
2. 对吴佩孚的态度.....(606)
3. 包惠僧的回忆(节录).....(606)
4. 马林的回忆(节录).....(607)

(二) 李大钊对吴佩孚的工作

1. 李、吴会谈.....(608)
2. 中国统一的方策及孙吴两氏的意见.....(612)
3. 有关的回忆.....(615)

(三) 蔡元培等《我们的政治主张》

1. 我们的政治主张.....(619)
2. 胡适日记.....(620)
3. 白坚武日记.....(621)
4. 张国焘的回忆(节录).....(621)

九、第一次国共合作

述 要.....(622)

(一) 国共合作的酝酿

1. 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625)
2. 北京同人提案.....(627)
3. 关于西湖会议.....(632)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634)
5.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635)
6. 中共三届一中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636)
7. 李大钊谈与孙中山的会见.....(637)
8. 马林与孙中山的会见.....(638)
9. 孙中山的有关函电.....(639)
10.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639)
11.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641)
12.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节录).....(642)

(二) 出席国民党“一大”

1. 李大钊赴粤及返京报道.....(645)
2. 国民党“一大”有关文件.....(646)
3. 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668)

(三)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1.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建立.....(671)

2. 迎接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促成会.....(679)
3. 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708)

十、主持中共北方区委

述 要.....(722)

(一) 北方区委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 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725)
2. 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727)
3. 北方区委的工作.....(729)
4. 回忆《响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743)
5. 《政治生活》与读者.....(747)

(二) 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1. 在共产国际五大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749)
2. 在苏联的讲话和文章.....(749)
3. 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中国代表团名单.....(758)
4. 李大钊在哈尔滨.....(759)

(三) 北方群众运动

1. 关于中俄复交.....(762)
2. 关税自主运动和首都革命.....(766)

十一、策应北伐

述 要.....(774)

(一) 关于北方区军事工作的方针策略

1.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776)

2.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779)
3.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780)
4. 中共北方区对于三特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781)
5. 守常政治报告……………(782)
6. 守同志来信……………(782)

〈二〉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及策应北伐的经过

1. 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783)
2. 忆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工作……………(790)
3. 李大钊建议苏联政府援助国民军……………(816)
4. 李大钊重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821)
5. 政治会议北京分会报告书……………(824)

十二、坚持斗争 英勇献身

述 要……………(838)

〈一〉“三一八”运动

1. 关于日舰炮击大沽事件之报导……………(842)
2. 反对八国通牒(附“八国通牒”原文)……………(843)
3. “三一八”惨案经过……………(848)
4.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
……………(858)

〈二〉坚持斗争

1. 北方区委文件目录(节录)……………(862)
2. 坚守革命岗位……………(863)

（三）被捕

1. 被捕经过……………(868)
2. 各方面的营救活动……………(871)
3. 秘密审讯……………(873)

（四）从容就义

1. 蒋介石密电主张杀害……………(877)
2. 张作霖决处绞刑……………(877)
3. 遇难详情……………(878)

（五）各地悼念

1. 悼李大钊同志……………(883)
2. 悼守常同志……………(884)
3. 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885)
4. 苏浙沪三党部追悼李大钊……………(886)
5. 西安追悼李大钊同志……………(887)
6. 冯玉祥追悼李大钊……………(889)

附：（一）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892)

（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893)

一 家世和少年时代

述 要

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李大钊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乳名憨头，初入学时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

李大钊是遗腹子，在他未出生前，父亲李任荣（1867—1889）即因肺病久治不愈，加之1888年乐亭一带大地震的刺激，于次年4月病故。母亲周氏（1865—1891）因丈夫早逝，哀伤过度，在生下他一年多后也病逝。李大钊“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狱中自述》）

这一“垂老之祖父”即李如珍（1827—1907）。李如珍无子，过继姪儿李任荣为嗣。李任荣少时会取童生，但未及参加府试，不幸夭亡，李如珍便把希望寄托在孙儿李大钊身上，一心期望李大钊能够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因此，他对孙儿在生活上慈爱有加，在读书上要求严格。李大钊自三岁起就开始学认字，四五岁时，学读《百家姓》、《千字文》和《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七岁时，入谷家私塾读书，十岁时，入张家专馆就读，十二岁时，转入宋家学馆学习，到十七岁时，考入永平府中学。

李家在大黑坨村，为农户。其家境情况，在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之前，目前尚无从查考。现在仅知，李如珍考取过秀才，曾被授予“从九品”官衔，后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做过行商，家境好转，陆续置买了房屋、土地，至李大钊出生时，李家已有土地90多亩、砖房20余间，在当村属富庶之家。

李如珍富于正义感，急公好义，深受乡民尊敬。同时，他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

表示极大的忧虑和不满。无疑，这些都对李大钊产生了影响。

十一岁时，按当地早婚的习俗，与本村赵纫兰结婚。

赵纫兰（1882—1933），长李大钊七岁。她正直朴实，为人贤慧热诚。在李大钊求学时期，独自操持家务，典当挪借，支持丈夫上学。后随李大钊迁北京，共同生活至1927年。生有葆华、星华、炎华、钟华、光华、欣华等六个子女。李大钊牺牲后，又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1933年参加李大钊葬礼后不久，含恨病故，并葬于李大钊墓。

1905年李大钊到卢龙县永平府考秀才，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变动，李大钊未能考取秀才，而考入了一所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他开始学习启蒙科学和英语，接触新学，阅读康、梁文章，思想面貌发生变化。

在李大钊童年、少年时代，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日俄战争等。国家的颓势日甚一日。此时，李大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慨然起研究政治，以长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狱中自述》）

1907年上半年，李如珍去世，家境困难。在妻子赵纫兰支持下，李大钊决然赴天津求学。

(一) 故居和家世

1. 乐亭县

乐亭县，位居华北大平原东北隅，地处清河之东，滦水之西，横山之南，渤海之北，东西宽55华里，南北长75华里，面积4125平方里。海岸线长110华里。东北隔滦河与昌黎县相望，北面与滦县接壤，西北与滦南县为邻。

乐亭县城当东经 $118^{\circ}53'32''$ ，北纬 $39^{\circ}25'39''$ 。乐亭县位于北温带中部，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580毫米，其中60%集中在7、8两月。一月平均气温 -3.3°C ，七月平均气温 22°C ，年平均气温 11°C 。立春后多西南风，立夏后多东南风，立秋后多东北风，立冬后多西北风。

乐亭县无峪谷丘陵长林，一马平川，内地土壤肥沃。本世纪初，沿海十数里，尚大卤广垠，南望皑皑，状如积雪。滦河好似植物的叶脉分布贯穿乐亭县全境，向南注入渤海。在旧社会，滦河狂澜肆虐，三年两头发大水，一方面冲积形成这百里平原沃野，另一方面也给劳动人民带来深深的灾难。乐亭县志滦河词云：

环水者七邑，乐素称沃壤。
阡陌沿滦河，百里势平敞。
穗粒大于指，穗穗阔过掌。
杂粮名更多，比户庆丰穰。
连岁苦污涝，此事成梦想。
蒿目盼今秋，碗粥天或赏。
那意六月中，急雨郁莽苍。
横流遂四出，迅疑马绝鞅。

赴海海不受，惊涛一夜长。
可怜数十村，似蚁撞盆盎。
心逐橈影乱，耳骇浪声响。
泥涂得性命，田庐付漂荡。
水退已三旬，余浸犹洋洋。
载理滦河楫，河波深且广。
洒酒酹河伯，民情亦堪悯。
相与约明年，安澜神是仰。

乐亭县在古代属冀州、幽州境界。由于濒临渤海，荒陬斤卤，王命难及，所以乐亭县的兴废沿革，很少见于正史。至商、汤“至东郊立圣贤古有功者之后，封孤竹等国各有差”（《史记》）。孤竹国即今卢龙县地。乐亭县这个地方隶属孤竹国治辖。到了春秋时代，“景王十五年，晋灭肥如，肥子奔燕，燕封之于辽西”（《汉书韦注》）。乐亭县地又归之于肥如国。秦入辽西郡。据《晋书》记载，到了东晋武帝泰始十五年，赵石虎伐燕，自河达海运穀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到这时，县名始见诸史册。魏时为乐安亭。至金天会年间，始建置乐亭县。据县志记载，金时乐亭人李杭以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登金进士。李等“追述古风，取文明之地特建宣圣庙于城之东南隅。”说明此时已有乐亭县城，距今已八百余年。元初曾在县置滨州，很快就废止，仍为乐亭县，以至于今。

由于乐亭县偏居海隅，非通衢要隘和战略重地，所以自上古直至清末民初，数千年极少遭刀兵战乱之祸。古称乐安亭，乐亭县，安居乐业之地也。

乐亭县向有“冀东粮仓”之称。但是，在清代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境内土地被清朝统治者用“跑马行圈”的办法，分给满蒙八旗兵，谓之旗地。农民主要靠租种旗地为生。乐亭县志载：“邑东南近海，西北临河膏腴之地可屈指，计入国（清）朝顺治年间，尽归旗圈地之属，民者不过十分之二，率者皆水洼沙

滩。农以勤力胜之，亩获不过斗余，所赖以养生者惟在旗地。丰年偿租外，聊以糊口；凶年则所入不供所偿。又有压租借租等名，租已先交而所收不给，坐以赔累者甚多。邑中非无水利，而不种水田，不讲蓄泄之利，耘耕之外一斥之天。麦田甚少，梁、谷，棉花为最。三、四月得雨麦乃熟，六、七月雨甚下地，率多淹没。早年或有蝗灾……。自滦河东徙，水患始除，然高上之田，每虞干旱，卑湿之地，仍苦淫雨。……若年谷难望顺成，且地隘人稠，粮食难以自给。穷苦农民只有逃荒要饭，流落关外谋生”。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无力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长期停滞，日趋萎缩。

在清末民初，乐亭县尚无现代工业，只有一些传统手工业，即泥、木两作和铁匠炉，供给当地人民所需。如造车、船、建筑房舍，制农具及日用家俱等。农暇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女纺于家，是指妇女在家里纺线织布；男织于穴，是指男子为防冬寒在地穴中编织日用家具，如筐箩、簸箕、席子、笤帚等。当年乐亭的笤帚，不仅销售国内各大城镇，而且远销外国。

乐亭人也精于经商。清代以后，乐亭人到东北经商的人很多。据乐亭县志载：“邑地近边关，经商者多，出口贸易挟货营运谓之财主，代人指筹谓之伙计，固谋生之道也。”因为乐亭在东北三省经商的人很多，所以在东北商界有“乐亭帮”之称。有的还成了东北有名的大财阀、大商阀。如刘石各庄号称京东第一家的刘家，在东北办有“益发银行”和“益发合”、“泰发合”、“东发合”等发字号的商号。还有一个武百祥，由做货郎到开小厂，进而创办同记大罗新（同记商场、同记工厂），成为百万富翁，派人到德、日留学，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经营方式，后来成为东北很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东北工商界的“乐亭帮”需要大批工人、店员，就到乐亭招收。乐亭地少人稠，生计艰难，多将子弟送往东北当店员、伙计，藉以谋生。在清末民国初年的时代，几乎家家都有去东北当伙计的人。全县到东北经商

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每年汇回现金不下数百万元。

乐亭县自古雅重读书，以文明之乡素著。县志云：“乐邑人情，急公好义，士守廉隅，民勤操作，而闺门之风尤为谨飭诚有。”“县民悲歌慷慨，犹存燕赵遗风；儒立顽廉，幸近夷齐故里。自唐以迄民国，数千年不识刀兵，遵海而傍滦河，七十里惟安耕读。营商关外，实开一县富源；习艺津门，藉助百工心思之巧。”又说：县民“雅重读书”，“举凡衣食稍足之家，无不令其子弟就学，或延名师，或从外傅。科举时代，春闱一榜五人，秋闱至一榜七人，廩增五员，特余事耳。”乐亭县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自唐、宋以上名人哲士不乏，金、元以来科举班班可考，明、清两代科第不绝。明自洪武十八年至万历三十五年，乐亭县考中进士6名，举人29名，贡生214名。清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光绪二年，乐亭县考中进士16名，举人142名，贡生226名，都较他郡为多。科举废后十余年，乐亭县考入大学者一百数十人，到外国留学数十人。

2. 故 居

大黑坨村

大黑坨村是李大钊的诞生地和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

大黑坨村在乐亭县城东南三十华里，二滦河从村旁缓缓流过。南二里是小黑坨村，西南四里是翠坨村，向西四里是港东村，向北二里是黄瓜口村，向东六华里是董庄村，向南距渤海约二十华里。

大黑坨建村是在明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距今已有五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李大钊祖坟墓的墓碑碑文《大黑坨村李氏祖谱引》记载：“始祖于明永乐二年奉昭移此，小筑此乡，即小建此莹。”这不仅说明大黑坨村始建于永乐二年，也说明李家是参与建筑该村和最早的居民户之一。乐亭县志记载：“成祖永乐二

年，编社、屯。靖难时，县民为辽军残破。至是土民复业，江、淮迁民亦至，始以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社一十有八，屯九云。”大黑坨村是当时外来移民所筑九屯之一。

大黑坨村之称为坨，是由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坨者，即沙土高丘。乐亭县处渤海之滨，滦河及其支流贯穿全县，经常泛滥改道。所以：“河淤风聚均可成坨，风散水冲胥可去坨，邑境多沙，大抵皆沙阜聚散无恒。”正是由于这种自然现象，若有草木丛生之地，日久年深，沙随风积，就形成大小不均的沙土之坨，高出一般地表。人们为了防范滦河洪水为害，都选择岗阜之地建屋筑屯。故此，乐亭县许多村庄都以坨命名。据大黑坨村口碑：相传先民来到大黑坨附近，遥望一大沙上坨，上边灌木杂草生长茂盛，一片黑绿，因此将此大沙坨称为大黑坨，并选择这个沙坨定居下来。

至清末民初，大黑坨村已发展为乐亭县东部沿海地区数一数二的大村，东西街足有三华里长。大黑坨村是冀东典型的封建农村村落。全村共有土地5700亩，居民250户，人口1200人。谷家和赵家是大黑坨村的望族。村里的土地十之六七集中在几个富户。关于大黑坨村当时的景况，李星华曾做过具体描绘：

说起大黑坨来，也有它的来历。传说，有一天夜晚，村里呼呼地刮了一晚上黑风，刮得山摇地动，不知从哪里刮来了墨黑墨黑的一座大沙坨。这座沙坨，就落在了我们村庄以外的东北角上，当地人后来就管它叫“大黑坨”，我们的村庄，从此也就命名为大黑坨庄了。后来，不知从什么年代起，这个大沙坨子变成了埋葬我们祖先的墓地。所以人们也把大沙坨子叫李家老坟。从远处望去，这座大沙坨，又好象是一只蹲在那里的大老虎。因此，当地乡亲们又有这样一个说法：这只大老虎卧在我们村庄的前面，日日夜夜保护着我们这里的人民。年陈日久，老虎的形象模糊了，墨黑的大沙坨也慢慢地变成了米黄色，又由米黄色变成了银白色。每年一到春夏两季，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就要到李家老

坟的小树丛里串来串去，捉拿金牛、铜壳螂、老哇哇。端午节一到，那些大闺女、小媳妇们都打扮得水花花的，从老远的地方来到李家老坟滚沙坨。有一天，我也随着姑姑、姐姐们到坟上滚沙坨去了。我们都用花手帕把头裹起来，躺在细白的柔沙上，从沙坨的顶端一直滚到脚下。为什么一到端午节，年轻的姑娘、媳妇们就要到这里来滚沙坨呢？老人们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相传到了这个时节来滚滚沙坨，就会把全身的灾难滚得一干二净。可是我们这群孩子们，那些姑娘媳妇们，很多人却只是把这看成一桩很好玩的事，趁着端午节这一天，大家凑到一块儿，快活地玩一通罢了。

苍蓝色的大海，灰蹒蹒插入云层的高大的碣石山峰，银白色的大沙坨，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神往的。可是，在旧社会里，一切并不都是这样的让人愉快。那时候，每到六、七月间，我和五奶、二姑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耳中常常听见从远处传来呜呜的海啸声，凝神仔细听去，那声音好象是受了重伤的野兽在深山里怒吼似的。海啸声传来的时候，我每每感到有些恐怖，五奶在这时挤着她那双快要瞎了的干枯的复眼，愁眉苦脸地拉着嗓子低声哼唧着：

“海一啸，就该发大水了！老天爷呀！这都是咋咯的好呀？”

在过去那许多的年月里，因为我们家乡的地势是包围在“海袖子”里，又靠近滦河，常常遭到洪水的冲淹。一到夏季，说不定哪一天，洪水就会闯进我们的家门。要是洪水在深夜里袭来，乡亲们就点起灯笼火把，“嘿呀呼哟”地在各自的门前打土堰子，水要是拦不住一下冲进家来，那就会把水缸、锅碗、板柜、衣物、牲畜和房屋一扫而光，甚至有时连人也会被洪水卷走的，田野里的庄稼，那就更不用提了。

因为我们的家乡靠近大海，早年间也经常闹海盗。海盗常常闯进村庄绑票。遭到海盗绑劫的人家，要是不赶紧设法用钱去赎

票，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让海盗们带走，或被用洋枪崩死。那时候，海边的居民们居然生活在那片荒凉的盐滩附近，盐滩全是官家的，黎民百姓不准动一粒盐土，谁要是私熬一点盐土，那可得蹲牢坐狱。那时候，缉私队完全随土匪一样，他们骑着大马打村庄里一过，全村的人都关门闭户，不敢出来。那些缉私队看谁不顺眼，就用枪把子打，绳索子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薄赤烂碱的海滩地，沿海的居民是指望不上的，因为那些土地不长一棵青苗，人们只有成年累月地下海捞鱼过活。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落潮，乡里人是掌握得十分准确的。他们可以捞到很多的鱼。可是，一旦捞到活蹦乱跳的大鱼的时候，他们又必定先要把上好的鲜鱼献给老财、乡长去吃新鲜，不然，那些恶霸们就要来找麻烦。

此外，那时候还有一件使人最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乐亭普遍流行各种赌博，尤其害人的是开设“花会”。这种赌博引诱了一部分善良的农民，他们眼睁睁地上了那些坏蛋们的圈套。开设花会赌博是地主和流氓勾结起来剥削、坑害老百姓的一种很毒辣的手段。

水灾、土匪、恶霸、地主、流氓、欺骗老百姓的花会，还有凶恶胜过豺狼的缉私队，他们把重重的灾难压在老百姓的头上，使得我们家乡的人们在旧时代陷入了难以生存的悲惨境遇。他们装满一肚子苦水没处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人只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泥菩萨和神灵的身上。在我们庄里，庄东头有个元神庙，庄中间有个老母庙，老母庙座落在我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过去，一闹水灾，农民们便祈求元神保佑；遭到其他灾难，就去求老母菩萨保佑。据说，旧历六月十三日，是元神的生日，为了祈求元神不要降水灾于这个地方，人们到这一天就在元神庙前搭台子唱影戏。旧历二月十五日，是老母菩萨的生日，为了祈求神灵降福于这一方的人民，人们也同样赶庙会，唱影戏，为老母菩萨庆祝生日。我们的乡亲们，是最喜欢听赵老祥的影戏的。

赵老祥因为在我们家乡一带唱了一辈子影戏，他成了这里老乡们最好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安慰者。我还记得大家由于喜爱他，给他编了这样一首有趣的歌谣：

赵老祥的影，
不用请；
台子搭得高，
家什打得猛；
把人家的孩子吵醒了，
还得给人家哄。

我们的先人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令人神往的海边风光里，而又不断地遭受着水灾、匪灾和地主流氓的迫害。他们没有诉苦求福的地方，只有向神灵祈祷，向民间艺术人赵老祥求得一些安慰。他们是在不断的劳动、斗争和向神灵祷告中生活过来的。后来，他们遭遇的苦难越来越深重了，神灵菩萨和赵老祥也不能安慰和拯救他们了。

这就是在那苦难年代里我们的乡土，也就是我的父亲出生和度过他的童年的地方。

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故居，位于大黑坨村的东部路北，座北朝南，高阶台、黑大车门。在大门的两侧与厢房、正房之间，是一丈高的十字花墙眼封顶的青砖院墙，将二十一间灰顶平房毗连成一个平面布局成长方形的院落。房屋均为砖木结构。主房配房高矮匀称，层次清晰，古朴淡雅，系乐亭县农村典型的穿堂院。这所宅院是1881年经李如珍置建。南北长55.5米，东西宽18.2米，面积1010.1平方米。

故院分前院、中院和后院。大门和二门三间为前院，有东厢房三间，是李大钊伯父李任元教私塾的学馆。靠南有一猪圈，西边有两间一明的碾棚，内有石碾一盘。靠南也有一猪圈。

二门往北至正房为中院，有东厢房三间。1889年10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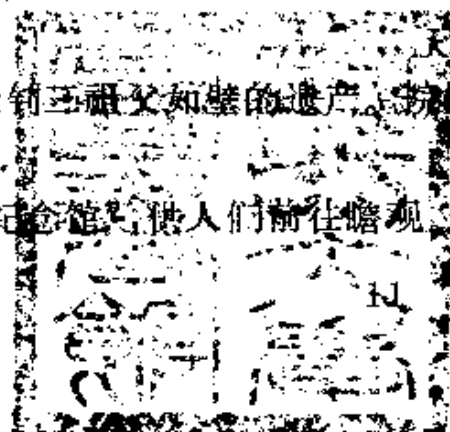
李大钊诞生在此房北间，屋内的椿木板柜，上摆梳妆座镜，兰色花纹双喜字掸瓶，都是李大钊母亲周氏的遗物。南边两间一明没有界山，靠北间有一炊事锅灶，中间靠东墙有一架古老的织布机。是当年李大钊祖母、母亲日常劳动的工具。南间有一祖先龕，里边供有李大钊祖先和他父母的牌位。

东厢房以北是三间东正房。东正房的西间是南北通行的过道屋。在这间里，靠东边有一锅灶，西边有一古老的饭厨。进脚门便是东边的住室，也是两间一明。南边靠窗戶的炕上，有隔山界为两间。左间有一炕箱，右间有一炕寝，炕寝上边放着两个樟木书箱。这对书箱是1924年1月李大钊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买回来的，后来做为他随手使用的书箱。炕中央有一小方桌，李大钊幼年与其祖父在桌上吃饭，祖父教他在上面读书写字。炕下边两间通连，非常宽敞，放有顶箱、立柜、凉床、坐柜，炕八仙桌、地八仙桌、两把木椅，一把藤椅，还有李大钊祖母和夫人的两个红漆板柜。在他夫人的板柜上摆着掸瓶、座镜，这些都是赵纫兰夫人与李大钊结婚时陪送的嫁妆。柜上还有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使用的两个红漆茶盘和一个茶叶筒。这间房子是李大钊生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幼年与祖父母居住，祖父去世后与夫人居住。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时，每逢寒暑假回家，也住在此屋。

正房以北为后院，有一道花墙为界，把六间宽的宅院分为东边三间西边三间的两个小院，每个小院各有一个向北开的后门。明显看出，后院是一宅两院的样式。东院有两间厢房和两间棚子。厢房是粮房，李大钊童年为了安静经常在此屋读书、写字、作文章。因此，人们也把此屋称作李大钊童年的书房。棚子是家中放置农具的地方。

故居的西半院，由南通北，是李大钊三祖父知璧的遗产。院内之间西厢房北面有三间正西房。

李大钊故居现已辟为“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供人们前往瞻观。



3. 家 世

李大钊家世初考

李大钊故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东北附近有一个长300余米、宽100余米，高出地面10余米的沙丘，上埋百数个坟墓。这就是李大钊的祖茔——李家老坟。在李家祖先李文翠的墓前，有石供桌一个，碑亭两座，亭内矗立两通石碑。李家老坟地处滦河冲积平原的沿海之乡，气势雄伟，规模宏大。

旧社会，迷信所谓“风水”，立坟墓时，都找人占卜“风水”。由于李家的家族大、人口多，乡人都赞扬李家老坟的“风水”好，所以流传着：“北倚碣石山，东临滦河水，坟地从南往北形长似龙，可称一条沙龙，必出功名人”的说法。

由于几经沧桑，过去的景象却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文革”期间，坟里的碑亭被拆毁，石碑被打碎，更令人遗憾的是，还被人运走而失踪。为了考察研究李家的族谱，经过反复地调查、访问，耗费了好长时间，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块残碑。此碑的正面额部镌刻“千古不朽”四字；碑文的标题是《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的背面镌刻李家三代世系谱。此碑虽被打碎，幸存的碑身局部文字对查考李家的家世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今将重要部分摘录如下：

“……始祖以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即卜建此茔。彼时以草昧初开……赖有祭扫食使合集一族，未失行辈。乃又于嘉庆十六年岁甚凶荒，坟树……涣散，如使永为涣散，合集无时，将虽系一族，虽属同祖，亦不知谁之为……诸祖之灵。赖有族弟为模者，以青年而笃祖谊，顾兹荒冢实觉神伤，乃……植后以稍余之资，再兴茔祭，年新日盛，又以其添置祭田。今树已……老……钱，又创益看茔房屋三间。又栽植果品诸树，此树

若好，后人之利……”。

这段碑文虽因碑残文断，不够详尽，但能看出，李家祖先于明永乐二年即公元一四〇四年迁移到大黑坨村，至今已有五百八十年的历史。据李家老辈人递传，是从山东迁徙而来，又能看出经李为模倡议序列族谱，再兴祭冢的措施。这与传言，基本符合。碑文落款的时间为“同治二年清和月”，即公元一八六三年农历四月。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农历四月，李如珠（李大钊祖父）病故。因老茔狭隘，难以埋葬，由其长兄李如珍主办，在老茔北相距数十丈建立新茔。另立其埋在老茔的父亲李为模为祖，因坟墓不便迁移，遂立虚祖（写名讳牌埋在墓中，俗称招魂）。墓前立石碑一通。该墓碑呈竖长方形，其额为半园形。碑高132厘米，宽50厘米，青石，碑文为楷书。其文为：

“先君生珍兄弟三人，珍居长，三弟如璧于光绪十五年七月病故，埋葬老茔先君墓下。今正二弟如珠又寿终。因老茔狭隘难以埋葬，遂立新茔于此，距老茔不过十数武。又因先君坟墓不便拔迁，遂立虚祖奉祀焉。本拟兄弟三人同归此茔，而胞侄任魁母子酌议谓：三弟已埋葬老茔既不便迁徙，珍与二弟同归新茔，三弟一支独在老茔亦不觉隘，且不忍先君墓下无一子承祧，因不欲同归此处。珍以其言合理，亦不便相强，第恐后人认为源木本，支派迁移之故，用镌数语，昭示来兹之尔，是为证。”

考 讳为模字广训

皇清例赠登仕佐郎显 李公 之茔墓

妣 孺人檀太君

男如珍年七十一率侄孙 奉祀

大清光绪二十三年清和月 谷旦

李为模是李大钊的直系曾祖，以后李大钊的祖父母、父母都是相继埋葬在这个坟里，后来人们都称此坟是李大钊家的坟，亦叫李家新坟。

十年浩劫，“四人帮”诬陷李大钊先烈。可是故乡人民深知大钊先烈一生为革命不怕“断头流血”而壮烈牺牲，对先烈满怀无限崇敬的心情。“破四旧”时，对李家新坟都积极进行保护，不仅坟墓未平，立莹石碑，仍挺立在李为模的墓前。打倒“四人帮”后，大黑坨村的青年在坟墓的四周，栽植了数十棵柏树，表示对李大钊先烈诚挚的怀念。这块完整的石碑，对考证李家的家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通过碑文与李大钊故居内现存的祖先牌位查证，李家的祖先有文书可考的从李文翠开始立祖。李文翠是李为模的父亲。李为模兄弟三人，两个哥哥，叫李为梁、李为枢都是农民。李为模字广训，生于嘉庆六年（一八〇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卒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农历六月初五日，享寿七十二岁（虚岁）。

李为模生三子，即，李如珍、李如珠、李如璧。李如珍无儿只生二女，就过继侄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就是李大钊的生身父亲。

李任荣字华亭，生于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自幼奋发读书，知文达理，字写得好，李如珍非常喜爱他，才过继他为子。在大黑坨小学校门外西侧，有一块光绪十三年立的石碑（“文革”时被砸碎，后运到大钊故居保存）。碑上镌刻《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文》是李任荣书写的。碑文的下款为：

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

昌黎县增生：赵辉斗撰文

童生：李任荣书丹

碑文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在华严寺前为酬神演戏置买香火地、上布施的情由。碑文的落款，却提供了研究李大钊三代的文字资料，补充了传说的不足。过去传说，李如珍一生好学，青年时代到关东学买卖，曾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杂货铺，是一个买卖人。实际是不全面的，他还有从九品的官衔。他的官职虽低，但

表明是个读书的人，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后代求学。李任荣的知文达理、李大钊刻苦求学，都与李如珍对子、孙的培育分不开的。

李如珍生于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享寿八十一岁（虚岁）。他的一生正处于清朝末年，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之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侵略与反抗、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的时代。他抱尝了洋人的暴行及清王朝的残酷统治等外患内忧的苦头。他经常把这些丧权辱国的历史讲给后人听。这对少年时代的孙孙李大钊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李如珍的夫人崔氏（李大钊的祖母），生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卒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四日，享年八十一岁。死后亦埋在李家新坟。

碑文，还见证了李任荣的为人。据传说他是个读书好的学生。他写得一手好字，是大黑坨附近屈指可数的人才。碑文是楷书，笔画均匀、苍劲挺拔。如今目睹碑文的人都赞不绝口。

碑文表明李任荣是个尚未考取秀才的“童生”，写碑文时年二十一岁（虚岁）。由于他患病体弱，是铺着毯子在碑上趴着写的。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农历五月初四日，乐亭一带发生大地震，震得房倒屋塌，平地翻黑水。李任荣因地震受惊病情日益严重，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农历三月病故了。时年仅二十三岁（虚岁）。

在李任荣去世的当年农历十月六日，（公历十月二十九日）他的夫人周氏生下李大钊，故李大钊系“遗腹子”。

李大钊的母亲周氏，是乐亭县西走马浮村人，生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于丈夫的早逝，悲伤过度而忧虑成疾，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也去世了。终年仅二十七岁（虚岁）。

李大钊幼年丧失父母，全靠过继他父亲的老爷爷李如珍教养成人。

附：李大钊五代世系表

李文举—李为梁

李为枢

李为模—李如珍—李任荣—李耆年—（李大钊）

李如珠—李任元—李鸿年

李如璧—李任魁—李祐年

（刘荆山文《乐亭文史》第2辑）

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文

盖闻佛法无边，即信从者，真传愿受，人心皆善，欲崇祀者义举乐襄，或昔无而今创其规模，或旧有□竟破慳囊泐名碑版，俾瞻拜者咸晓然于是举也，非某地某人将莫由成厥功，人知慕义，缘佛无私□。古刹华严寺一所，创自前明天顺年间，地基宏厂，迥然超出东方庙貌，庄严宛尔，遥临南海，是本頼□，筏金绳往来开渡，即彼道涂行旅瞻□，亦说灵山，凡兹里开□民启处，咸依福地矣。第寺之东西北□面，自来未有，酬神演杂剧大会难作，夫龙华购地需资财，重修□艰于鳌戴，良以地属拾亩之多费□。本乡李公如珍好善人也，积愿弥诚，仔肩独弼，布施取诸自己，未能集腋成裘，募化转托多人，奚啻□成海卷石之积渐而为山，前后共得布施钱一千二百八十六吊，因于光绪八年购谷某寺前之地□二亩半，价钱五百吊。迨至去岁，又将所募之项购谷朝柱之地五亩半，价钱八百四十吊，在寺前西南之心，犹为未足也。李公之愿终觉未遂也，及今春又烦中人将此五亩半，换寺前谷某之地四亩半，且始成，外又买东邻杨姓之地三亩，价钱三百一十吊，共计地十亩整，共地价钱一千七百五十吊。开创迄今六七年来，终归有济。语云有志者事竟成。又云谋事在人成事在

天。然则此事之成也，又安知□。庄中父老恐事久湮没不彰，爰勒贞珉，用昭盛德，从此□功之水清澈充池，五衍之车驰驱有地，选佛内顿成满地光明，当事者即种福田，旁观者亦培□，果将见无人无我，世皆愿奉如来，凡彼信女信男。

督办人从九品	李如珍
昌黎县增广生	赵辉斗撰文
童 生	李任荣书丹

换地中人	选用府即	宋志贤
	选清军府	

大清光绪十三年 岁次乙亥□ 阳月

(二) 少年时代的学习

1. 私塾

李大钊与私塾老师

(一) 大钊的蒙师单子鳌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李大钊七岁时，李如珍老爷爷送他到本村谷宗海家的私塾里去读书。教师单子鳌是大黑坨北庄黄瓜口村人。李大钊上学时的名字叫“李耆年”，就是单老师给他起的。

李大钊幼年由于李如珍老爷爷的培育，在家就有识字基础。迈进校门后，有了专职老师教，私塾里又有严格的校规，对他来说就有了一个专心学习的好环境。

旧私塾的教育学生的手段，唯一的办法就是体罚。学生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或犯了校规，轻者罚站，重者罚跪或打手板。有的贪玩的孩子，对求学存有厌倦情绪。而李大钊幼年接受了严格的家教，对私塾的校规，他能认真遵守。他刻苦求学，成绩优良；不骄不躁，对同学互相友爱，对老师热爱尊敬。他常常帮助同学背书破讲。同学都佩服他，老师也非常喜欢他。

他念书很用功。放学了，同学们都回家去吃饭，往往剩他一个人还坐在位子上背书或默写。单老师经常催促他：“耆年！回家吃饭去吧。”他总是把当日讲的书按老师的要求，会背、会讲、会默写生字，才肯罢休。

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三年后，单老师便向他爷爷说：“耆年这孩子学业良好，进步很快，我教不了他啦！另请高明吧！”因

此他转了学。

单老师一生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塾师生涯。他经常对后来的学生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你们知道是谁吗？”不容学生们回答，他便说出口：“就是李大钊！他当初上学的名字是我给他起的。”他在黑板上边写边讲着，“上边一个‘老’字，下边一个‘日’字，念‘耆’。‘耆年’就是长寿，因为我喜欢他，才给他起‘李耆年’这个名字，希望他长寿，所以他的字叫‘寿昌’；后来他改名‘大钊’，改字‘守常’。这个名字改得好，‘钊者刀也，大钊者乃大刀也，他立志要用大刀铲除人间不平之事，你们要努力读书，好好学习他！”

（二）在小黑坨张家专馆读书

李大钊把单老师能教的课本都学了，自然就得转学。李如珍到处奔走，为孙孙择选良师。爷爷听说南庄小黑坨村张老攻家给儿子设了专馆，聘请赵辉斗先生为教师。赵老师在人们心中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就打算把孙子送到张家专馆里去读书。

到老张家去读书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小黑坨老张家是乐亭数一数二的财主，深宅大院，房子都是前出廊，后出厦，还有一幢楼房。庄户人家的子弟，怎能高攀到张家专馆里去读书呢？这主要靠赵辉斗老师的引荐。赵辉斗，原籍是昌黎县大滩村人，李大钊的岳父曾经资助他到北京“国子监”去读书，学位是“增广生员。”由于这种关系，赵辉斗不能不出力把李大钊引进到张家专馆去读书。一八九九年，李大钊十一岁那年跟着赵辉斗老师去读书。赵辉斗教了他二年多，他又成为赵辉斗最得意的门生。

（三）到井家坨宋举人家读书

一九〇一年，李大钊十三岁那年，转到乐亭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那里去读书。

宋举人系宋家的老三，名宋森荫。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壬戌年）举人。他在山东任过候补知县，又做过山东乡试同考官。宋家专设了学馆，请黄宝林（字玉堂）为教师。黄老师是乐

亭城北小圣庙村人，他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是个“优贡”。从学位、知识和对学生严格教管方面，在众人的心目中颇有些威望，经李大钊岳祖父赵良佐的干女儿把李大钊介绍到宋举人家读书。

李大钊又投了黄玉堂这位名师。由于他刻苦求学的精神，谦虚、朴实的品德，深受黄老师的赞赏。

黄玉堂老师经常夸奖李大钊说：“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

这时的李大钊，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不断丰富，对祖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非常忧心。

在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傍年，宋家的专馆年终考试已经结束，同学们没事等待放寒假。大家谈论起清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引起了黄玉堂老师讲“太平天国”洪秀全造反的故事。

黄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主张：妇女和男子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担任各种官职，废除了束缚妇女的旧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由于李大钊从小爱思考，有见解，善于发现问题，他立即向黄老师发问：

“老师！洪秀全的很多主张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

黄老师猛然一听，就愣住了。摇摇头说：“这个么……你可把我考住了。”略停一会儿说：“以我之见，好行新法者，违俗而招祸。”

李大钊又问：“太平天国已备百万大军，占领十七省，为何失败了呢？”

黄老师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因内讧而失败。不过……一切尽气数哉！”

李大钊很激动地说：“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

事业……”

黄老师对李大钊要学洪秀全的事，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他以后经常向人们谈及此事。

后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任教授，成为当时教育界的名流。但他仍不忘唐蒙老师单子鳌先生。单老师是个老学究，思想守旧。五四时期李大钊在北京领导新文化运动，很关心单老师的进步，定期给单老师寄书报。每逢寒暑假回家，必定去拜望单老师。

一九二七年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的噩耗传到了故乡。单子鳌老师闻讯，忆念当年，老泪纵横。昼夜怀念，寝食不安。大黑坨全村男女老幼举行“望空”仪式，遥祭李大钊同志。单老师等撰写了悼念大钊同志的歌词。

据单老师后来的学生赵希义、赵希信、徐树梁、罗国维等人回忆了两段当年歌词的内容。但遗憾的是，这两段歌词都没回忆全。大体的内容是：

……

守常宁死决不降。

满眼泪汪汪，

哭君丧无常。

众青年痛师亡，

忆万失主张……

守常宁死节不伤，

日久共天长，

共和终不忘，

恶称帝、恶称皇，

专制不同行……

单老师撰写的悼念大钊同志的歌词距今已相隔六十年之久，

大家虽都记忆不清了，但尚能表明故乡人民和单老师对李大钊同志沉痛怀念的心情。

（刘荆山文《承亭文苑》第2辑）

二、永平府中学

永平府中学所在地——卢龙

在民国初年废府设道以前，卢龙城为永平府治所在地，因而那时人们也将卢龙城直称为“永平府”。

永平府在沒有废置时，辖一州（滦州）六县（卢龙、迁安、昌黎、乐亭、抚宁、临榆）。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所在县乐亭，为金朝时所置，原来一直为滦州领县，到清朝雍正末年，才直接归属永平府管辖。

卢龙县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与抚宁县交界，北靠长城与青龙县毗邻。西北和西部隔青龙河、滦河与迁安、滦县相望，南与昌黎县接壤。县政府驻城关。

卢龙县地处华北平原边缘地带，境内大部为山地、丘陵。全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高南低。北部属燕山山脉，较高的山峰为尖山槐（海拔626.6米）。较大的常年河有青龙河、滦河、饮马河等。境内有著名的桃园大断裂层，沿滦河、青龙河自南向北延伸，断层纵横交错，地质构造复杂，是地震较多的县份之一。卢龙全境处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境内土质多为沙土和粘土，地下水较贫乏。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农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白薯、小麦等。境内山林遍布，并为驰名中外的“石门核桃”产地。

卢龙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名胜之地。早在春秋时，这里就建有孤竹国。著名的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卢龙城里城外，有着许多孤竹国的

古迹，如卢龙城中的夷齐井、夷齐里，卢龙城西南的孤竹城、夷齐庙，以及县境内外的孤竹长君墓、孤竹少君墓、夷齐读书处等。卢龙城西还有一个地名叫“迷沟”，传为“老马识途”的故事发生之地；城南六里有虎头石，传为西汉北平郡守飞将军李广射虎处。卢龙还是个军事要镇，是一个有着斗争传统的地方。隋、唐时，这里为平州（有时又称“北平郡”）治所，是通往辽东的军事要镇，特别是当契丹人占据营州反唐时，这一带成了防守契丹内犯的前线。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唐朝政府在这里置有卢龙军。辽末，平州人民以卢龙为中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元、明、清，这里一直为首都的东大门。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荷兰的天主教神父潜入永平府境内，以迁安县建昌营为中心，向卢龙、抚宁、昌黎、临榆等地发展教会势力。后来，英国、美国的基督教势力也扩展到这里。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这一带也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烈火，卢龙境内起事的义和团把城里的天主堂一把火烧了。义和团被镇压下去后，八国联军侵占了这里。就在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这一年，卢龙城中的平山顶上修起了可俯视全城的天主教堂。教堂里面筑有地窖、地道，配备有武器，名义上讲为京东主教区所在地，实际是帝国主义分子进行特务活动的大本营。抗日战争中，这里建有卢、抚、昌，迁、卢、青、迁、卢、抚等抗日边区政府，涌现了不少抗日英雄。

卢龙县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县份之一。从秦朝起，这里被置为肥如县，属辽西郡。到北魏时，肥如为平州州治，并为辽西的郡治；今卢龙县城所在地新建有新昌县，为北平郡治。北齐省去辽西郡，肥如为平州治所，新昌仍为北平郡治。到隋朝，北平郡废除，肥如、新昌县隶平州；后肥如县入新昌；新昌又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县名“卢龙”。从此，“卢龙”成为这一地区的定称。据考证“卢龙”这一县名因其西北部依傍古之漆水（又曰卢水，即今之青龙河）而得名。《卢龙县记》记载了明朝文学家李攀龙的注释：“卢者黑也，龙者水也，北人谓黑水为卢

龙，以其城郭邻于滦河之义也。”到唐朝，卢龙仍为平州治所（有时称北平郡），辽、金因之，元朝改称平州为兴平府，后升为平滦路，大德四年（1300年）元成宗以这一带水患成灾，改平滦路为永平路。明、清时，永平路改称永平府。民国初年，曾裁卢龙县留永平府之称，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永平县，次年又恢复卢龙县之称。解放后，卢龙县属唐山专区管辖，1959年至1961年曾划归昌黎县。如今，卢龙与青龙、抚宁、昌黎同归秦皇岛市管辖。

卢龙县境内名胜古迹很多。城内有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幢（又名经幢），石幢始建年代失考，现存石幢为金大定年间重修。卢龙县境北部还有着重建于明朝的万里长城，境内段长达二十二公里。此外，近些年在滦河沿岸的阚各庄村发现了一处商代晚期文化遗址，出土了铜殷、铜鼎弓形器（车饰）等青铜器和金臂镯等，很有考古价值。

永平府中学

直隶省永平府中学堂（唐山市第一中学的前身）建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清朝永平府府治在直隶省卢龙县。

“永平府镇”建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统辖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等七州县。这里的“督学院行署”，乃是明清两代举行科举考试之处。另有“敬胜书院”，为聚徒讲学之所。永平府中学堂就设在这个书院内。1903年初，永平府中学堂开始招生，开设两个班，有学生八十多人，学制四年，不分初高中。一年后，又增招两个班，学生增至一百六七十人。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规定，中等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也可以不设）、图画、体操十二门课程，还强调中学堂必须开设读经讲经课程。

《经学》每周要上课九课时，占总授课时数的四分之一。学堂经费以督学院行署的地产、息金和学费来维持。学生入学时应交学

费、书费、宿费、饭费、杂费、实验费等，共计十余种。由于学费昂贵，所以学生来源多是官绅子弟，贫家子弟上不起学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通令各中学经费，由各县房税契项下拨充”。从此，永平府把所属七州县的部分税契解交于永平府中学堂。于是，这所学堂正式成为官办学堂。学生的学杂费从此有所减少，较之私立中学少交三分之一。民国元年（1912年）永平府中学堂改称直隶永平府中学校，堂长改称校长；在校班级改称初中班，每年仍招两班学生，学制虽仍为四年，但毕业生可报考大学预科班。民国三年（1914年）直隶永平府中学校改称直隶省立第四中学校。民国十五年（1926年）省立四中在唐山设立分校。民国十七年（1928年），军阀白崇禧率领“北伐军”进入卢龙县城内，进驻学校，把学校改作兵营。学校被迫停课。为了继续办学，校长石冠英便来唐山，托亲靠友，从马家屯一家烧锅那里借得十几间做曲子的草房当教室；又从司姓人家租了两个院子当宿舍，7月，学校全部迁来唐山，因陋就简，草草开学上课。

（《唐山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二、天津求学

述 要

1907年7月，“急思深研政理”的李大钊，与二、三同学，赴天津报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报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狱中自述》）9月2日，李大钊开始了在这里长达6年之久的学习生活。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民国后学堂改称学校），是由袁世凯创办的一所培养法律及行政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设有简易、专门两科。专门科仿日本法律学校学制，6年毕业。前3年为预备科，主要进行外语和中学知识学习，第三学年开设法学通论及经济学原理等基础课，为进入正科作准备。进入正科后又分为法律、政治两门，学制仍为3年，全部采用日语教学，课程几乎完全是参照国外设置。该校聘请留日学生和外国人为教习，如日本著名学者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人，先后在校任教。因而李大钊在这里受到严格而系统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教育。

在校期间，李大钊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10年12月，在国内声势浩大的请开国会运动相继失败的情况下，直隶省立宪派又开始组织第四次请愿活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学生最为活跃，他们和天津各学堂三千余名学生一起，举行了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正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正科学习的李大钊积极参加并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之一。这次请愿运动以清政府将为首者温世霖放逐新疆而告失败。“这次风潮，算立宪派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李大钊文集》

(下)第700页)武昌首义爆发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地理教员白雅雨领导天津共和会进行反清秘密活动,并联络新军第二十镇举行起义,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白雅雨壮烈牺牲。李大钊平时对白极为钦佩,白的壮举使他多年悼念不已。

1912年秋,北洋法政学会成立(《言治》第2期登载的会员名单有第一年与第二年加入之区别,可断定学会当成立于1912年秋冬之际)。10月,日本人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出版。11月至12月,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会同人,忧于亡国之痛,亟取而译之,并附驳议,字字皆薪胆之血泪,旋于是年12月出版,风行全国。”(《李大钊文集》(上)第127页)

同年冬,为筹办北洋法政学会的刊物《言治》杂志,李大钊曾去北京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之一孙洪伊接触。在京期间,李大钊会见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并由曹百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2月,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李大钊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正式出版,先后共发行了6期。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是《言治》的主要撰稿人。李大钊能诗善文,“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冠”,(《于树德1956年11月谈话记录》)被誉为“北洋二杰”之一。他早期的论文及诗作约三十多篇发表在《言治》月刊上。这些文章反映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政治主张及政治倾向。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言治》第6期虽标明的出版日期是1913年11月,实际上是脱期出版,因在这一期上有李大钊在日本写的《〈自然律与衡平律〉识》等文。

1913年6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几年的学习使他“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狱中自述》)7月,李大钊去北京,经孙洪伊介绍,结交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另一举办人汤化龙,并办《法言报》。8月6日,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孙洪伊、汤化龙二人对李大钊很器重、

愿共同资助他赴日留学。此时报纸停办，李大钊遂离京回乐亭，筹划出国留学事宜。

9月，李大钊在出国前，与同学子默等游昌黎五峰山，五峰山是李大钊自幼就神往之地，以后也多次前往。在这次十余日的旅游中，遇上了日军在昌黎车站惨杀中国五名路警事件。“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李大钊文集》（上）第87页）

(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略史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袁，委任黎渊为监督。三十三年四月，报告建筑落成。七月初十日，行开学礼。二十五日开课。初招讲习科，分职绅两班：职班名额百十五名，为司法科；绅班百五十名，为行政科，并仿日本维新初年司法省法律学校之制，设立专门一科，期以六年毕业。分前三年为预备科，后三年为正科。预备科额二百名，升正科时，分为法律政治两科。光绪三十四年年终，职绅两班毕业。施监督黎渊卸事。宣统元年正月监督熊范舆奉杨宫保札委到差。招人老班别科，名额百人，期以三年毕业。宣统元年二月。熊监督去职，张鸣珂监督同时到差。八月添招中学第一班，名额八十人，期以五年毕业。张监督在职未久，胡钧监督继位。宣统二年二月，直隶总监陈札委李矩监督是校。暑假后招入中学第二班。时因满清专制，人民多唱改革政体。彼时法校学生，可分两派：一为立宪派，一为革命派。立宪派加入请开国会的运动。正科学生胡宪为副会长，秦广礼、孙可诸人断指血书，激扬民气。革命派更组织秘密团体，联络各校。凡福建之《民心报》、香港之《中国报》，上海之《克复学报》，以及其他各种发展种族革命思想的记载，莫不充量介绍，以冀革命成功。宣统三年正月，又招别科第一班。五月李监督辞职，胡源汇代理。暑假后招中学第三、四班，别科第二班。是年八月，张恩绶来长斯校，自是更监督之名为校长。十月革命军起，本校地理教员白雅雨先生，学生于树德、凌钺从事革命，奔走滦州第二十师军队间。后白先生以身殉，于凌两君幸免。民国元年除招生毕业外，无甚事迹。民国二年三月张校长辞职，高静涛

代理。民国三年六月当道因财政支绌，合并保定法政学校、直隶高等商业学校暨本校（前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一校，改称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八月经直隶巡抚使朱，委前高等商业学校校长梁志宸为校长。民国四年八月张云阁奉直隶省长朱委任来长是校。民国六年三月，张校长辞职。李镜湖奉委继任。是年十二月派法科三班毕业生于树德、安体诚赴日留学，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民国十年五月毕业归国，任本校教授。民国十年九月李镜湖知事万全，直求省长曹，委任李志敏为本校校长。民国十一年十月，规定本校徽章为一盾形。取防御恶社会之潮流之意。中间为淡青色，外纯白，表示中心淡泊外体纯洁之意。上边嵌罗马字头C.L.C.者表示为直隶法专之名。其色红者取盛大之意也。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为扩充图书馆计，将坐落六马路北头之校地七亩在教育厅投标售卖，充作购买图书专款。得标者为丰润陈君书良，出价每亩1600元。四月三日本校大门内斋舍南院面积得十二亩，辟作校园，兴工一月，园落成。四月十日定每年十二月三十号为本校周年纪念日，其详载当时公布文。十一月廿六日法科各班组织法学会，本日通过章程，选举职员。十二月一日，本校东楼不戒于火，楼上下被焚。公私损失甚钜。二十日政治经济学会开成立会。商科另有商学会，于民国四年成立，并刊行商学杂志，至今继续。三十日开第十八周年纪念会。本校成立以来，所有毕业生人数，班别，及毕业之年月日，并现在肄业学生人数班别另表详载。

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历届毕业生人数一览

科 别 班 次	各 班 人 数	毕 业 年 月
职班司法科	144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绅班行政科	120	同上
专门预科英文班	70	宣统二年七月
专门预科法文班	44	同上
专门预科德文班	55	同上
中学第一班	20	民国二年十二月
中学第二班	20	民国三年六月
中学第三、四班	100	民国三年十二月奉令 截止合并归入南开毕业
别 科	108	民国元年十二月
别科第一班	83	民国三年十二月
别科第二班	34	民国四年六月
别科第三班	56	民国四年十二月
别科第四班	150	民国五年六月
法律本科	50	民国二年六月
政治本科	70	同 上
法律本科一班	51	民国五年十二月
法律本科二班	46	民国六年六月
法律本科三班	37	民国六年十二月
法律本科四班	22	民国八年六月
法律本科五班	13	民国八年十二月

续表：

法律本科六班	34	民國九年六月
法律本科七班	66	民國十年六月
法律本科八班	60	民國十一年六月
法律本科九班	53	民國十二年六月
政治经济本科一班	27	民國五年十二月
政治经济本科二班	24	民國九年六月
政治经济本科三班	16	民國十年六月
政治经济本科四班	12	民國十一年六月
政治经济本科五班	13	民國十二年六月
商业本科一班	20	民國五年六月
商业本科二班	11	民國六年六月
商业本科三班	25	民國七年六月
商业本科四班	15	民國九年六月
商业本科五班	30	民國十年六月
商业本科六班	16	民國十一年六月
商业本科七班	5	民國十二年六月
合 计	1720	

(《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2.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招生、入学通知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广告

本学堂蒙北洋大臣袁立案创办，分专门、简易两科。简易科又分绅、职两班。现在学堂业经落成，除绅班经藩台按属考定，现正谕请札飭考取各绅赴津报到外，所有专门科学额二百名，简

易科职班一百名，亟应先期招考。为此，今将本堂章程撮要广告，凡有志入学者，务于六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先行遵章报名，听候定期招考，过期不收，切勿观望为幸。

撮录本堂章程如下：

一、宗旨

本学堂专门科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简易科以养成审判人员及律师与地方自治人员为主。

二、分科

本学堂分专门科、简易科。入专门科者先习预科三年，毕业后升入正科。正科分法律、政治两门，由学生随意选学。简易科分司法、行政两科。职班习司法，绅班习行政。

三、年限

专门科中预科、正科各三年，计六年卒業，拟请照分科大学或高等学堂奖给出身，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简易科一年零六个月卒業，发给凭照，稟请北洋大臣分别奖励。

四、学额

专门科定额二百名，无论何省人皆准投考。简易科绅班一百五十名，限于直隶人士。职班招募外籍有职人员。

五、学费

专门科每月收学费三元，膳费五元。简易科职班亦同，均须先缴三个月。绅班免收膳费。然无论何项学生，凡堂中一切操衣、纸笔、零用等费概归自备。

六、资格

投考专门科学生资格，须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中国文理通顺，曾读经史，略具普通知识，不染嗜好者。职班年龄以四十五岁以前为限。

七、考试

专门科招考时试以经义史论各一道。此外，有笔算及日、英、德、法各国浅近文法，或翻译等题目。但不能作者，听简易科职班

招考则止，试以经义史论各一道。

八、报名

本学堂在天津河北新车站旁，北洋师范学堂之右。报名者各具照片一纸，在本堂学务课亲填履历书，录收后再具誓约书及保证状。

此外一切详细规则载在本学堂章程，有志入学者可来堂取阅。

(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27日—7月23日)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紧急广告

本堂定于七月初五、初七两日考试专门，初六考试职班。业经登报广告。凡报名投考诸君，望各按定期于是日午前七点钟，各穿常服，携带笔墨，并自带食物，齐集本堂，听候点明，领卷入场，限于午后五点钟交卷。倘有夹带书籍、怀挟抄本者被查出，扣卷不录。各场试卷概由本堂预备。其报名未缴像片者，均于考期来本堂学务课补缴，慎勿自误、可也。

此告

(天津《大公报》1907年8月7日—8月16日)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催录取各生入堂广告

本堂考定职班、预科学生，前有请假措资者，均经批准限于本月二十九日一体入堂。预科已开课五日，职班亦准初二日开课，而到堂销假者，尚属寥寥。兹限至八月初十日止，过期不来，即传预取生预补，幸勿自误，切切。

此告

(天津《大公报》1907年9月6日)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定期考试广告

本堂前因报告截止，两经展期，最后限至六月三十日，截止

业经登报广告。茲定于七月初五日（考试）专门科国文，初六日（考试）简易科职班国文，初七日（考试）专门科外国文及算学，为此广告。务望已报名诸君届期，勿误为幸。再凡已报名而未缴像片者，亦希于考试当日补呈。无像片者扣考。至报名职班诸君，领有执照者并须携带呈验，特告。

（天津《大公报》1907年8月2日—7日）

(二) 天津学界请开国会运动

1. 李大钊《十八年来之回顾》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2. 李矩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

纪念会上的纪念词

岁癸亥，十二月十六日，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李君志敏来访，云本校开第十八周年纪念会，囑为纪念词。余抱病数载，每思为文，輒头晕而止。辞不获已，谨就为监督时可纪念之事实详述之。

是校原名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经始于黎君渊。黎君去职，未及一年，数易监督。当是时，余为保定直隶法律学堂监督，某学使电召至津，命继胡君钧之任。余以保校谋扩大甫就绪，（保校原名幕僚法政学堂，官费生四十九人，请于当道，改名直隶法律学堂，添招自费生至八百余人。）不欲再任繁剧。学使不允，籍、邓旧友，（籍君忠寅长教务，邓君毓怡长斋务，）交相劝勉。就职伊始，学使以催缴学膳费相责，（学生欠学膳费达八千余元），当告以此非急务，宜先整饬校风，为学生谋利益。是时余一肩行李，食宿于学堂，学生异之，询监学刘某。刘曰，监督乃本省仕绅，为整顿学务而来，非道府之谋差使者比。诸生宜从此严守规则也。逾数月，诸事就理。召各班长开会，讨论学膳费问题。余宣言自余到校之日起，学膳费不许再欠，已往者俟毕业时缴清。

（学生家中均将学膳费如数兑到，学生随手用尽，势难再缴，毕

业时不缴清学膳费，不发给毕业文凭，为各学堂通例，) 学生请宽时限，允一月。次日有鼓励罢课者。复召各班长告之曰，学堂为诸生母校。前此罢课者数矣。校风坏有损诸君名誉。可暂停课研究之。诸生谓因时限太短，请再展一月。允之。诸生颇知感，守规矩。乃与籍邓二君改定校章。策励教职员，矢勤矢慎，冀免貽差。未几而请愿国会之风起，天津各学堂学生秘密结合，立同志会，津绅某隐主其事。学生习法政学，受刺激深，遂有吴生割臂之惨。流血满盂，学生血书请愿国会十数字，大如斗，贴讲堂四壁。血盂置讲案。血迹淋漓满地。余登讲台，欲有所劝慰，哽咽不能言，乃相率痛哭。移时谓诸生曰，北京各省国民代表，请愿开国会，露宿某王府门首，数昼夜，政府置之不问。余在资政院发言，赞成开国会，为诸生所素知。政府聋聩，吾辈自残肢体无益。宜共筹善策进行，切勿再有此举。言罢复相率痛哭。声震屋瓦。先一日各学堂已罢课，学生同志会，复相约齐集广东会馆。持请愿书，到督署请见某督，求以即日电奏。余黎明到学堂，学生已整队出发，遇于途，诫以守秩序。乃折回到督署。高等工业学堂监督邢君端，北洋师范学堂监督李君士伟，与某学使相继至，共谒某督，据实以闻。某督顾某学使曰，此汝职责，速往广州会馆劝止之，勿令来署，吾在假中，来亦不能见。有请愿书，允即电奏。某督言之者再，某学使面有难色。某督乃令余与邢李二君同到广州会馆。代表引至剧台，某学使传某督语。学生不允，曰不得见督帅，必至督轅，立候回电。余曰，君等既欲往，宜沿途守秩序，以保全吾学界名誉。余等先往，候诸君于督轅。学生齐拍掌。学生整队至督轅，环立求见。某督令人传语劝慰。至日夕始各归校。某学使以授课相督责甚急。中学班学生孙生奋然曰，欲上课者请视吾臂。以刀割臂，深寸许，晕倒于地，送至医院。复召学生劝解之，上课与否，宜共讨论。万不可再有此残伤肢体之行为。翌日学使在三马路私宅召集会议。某臬司，某巡警道，某督办亦派幕府与议。至深夜，决定翌早由某督，派道司

数员，各带巡警二十人，邀同各监督到学堂门首，将学生分别传唤，问上课否。允上课者回学堂。不允者由巡警拘去，递解回籍。余约邢李二君至他室，密商速到督署辞职，不与其事。某顾余曰，汝辈为监督，即若此乎。余曰，拘禁学生，决非敢与闻。能改议则留，否则吾辈行矣。乃复议定官厅诸人先集学使署，各监督召集学生会议，劝上课。至午时无效，即报告学使，监督辞职去，一切听官厅所为。天拂晓，到学堂。先召代表胡、凤二生至，痛陈利害，宜先上课，保存学堂，再议请愿之进行。否则有不忍言者，吾从此去，不知何时晤面矣。二生始尤坚持罢课，继允开会时不发言。二生甫去，忽有学生二人至，问故，余以实告。某生曰，彼等以为上课有负孙生。余今日主张上课，亦割吾臂以偿之。余方劝止，而利刃由其怀中坠地。语未竟，拾刃竟去。余乃嘱某两生勿离其左右，监视之。两生唯唯亦去。乃在大礼堂开会，职教员皆往。余主席，提出上课罢课两问题。说明上课，则学堂存在，吾辈有根据地，可以谋请愿之进行，以达目的；否则有不忍为诸生言者。此事既易急进渐进两派，请诸君平心静气讨论，勿再有激烈之举动。怀刃某生，首先发言，主张上课甚力。某生反对之。两派讨论历数小时之久。余仍申前言，请诸生主张上课者签名。过半数即照常授课。否则余与诸生从此别矣。签名上课者逾至半数。命庶务长王某报告学使。职教员皆至余室休息，金云结果尚好。语未毕，而某监学来。云大讲堂学生开会，反对上课。余驰往，秦生方在讲台演说，见余突至，肃立。余曰，请君下讲台，听余数言可乎。秦生唯唯。余曰，此次上课，绝为保存学堂计，上课与否，余决无歧视。诸生请将签名名单焚毁，余曰可。诸生相率跪于地。余速令起立，推代表至余室，取签名单立焚之。代表去，未数分钟，某监学至，云宿舍大哗，不能遏止，请监督往。余至宿舍，某生方跳跃大呼，同人速出学堂。余止之曰，胡为若此。某监学亦曰，监督来，监督来。某学生曰，吾等不能上课，唯速出学堂。余曰，上课与否。决无

歧视，汝等欲出学堂，亦不强留。但官厅此时，反学生恶感甚深。汝等出学堂一步，有何危险，不克保护。如在学堂，由余一人负责，先速捕余，方及汝等，某生等默然。继而曰，吾辈暂不上课。余曰，暂不上课，须在舍休息，不得再扰乱秩序，某生等唯唯。时已过午，辘铃授课。学使派人至学堂查看情形，查看者回报，云学生非全体授课。越数日来一公文，以管理之疏相责难。余约邓君毓怡往见，以为公文所责难者，皆不达事理，请收回成命。并告以法政学堂学生，所学皆关于政治，受刺激深。是以风潮最烈，收束亦难。辩论至数小时。回校后，据实在情形，逐一驳复之。学使本通家至好，亦互相谅解也。请求开国会未有效果，诸生多从事于革命运动。董生，王生，为最著。学使履以此相诤，并指某两教员为革命党，以督师注意为言。余皆一笑置之。未几而革命事起。民国纪元，余应临时参议院之选，辞职去，今已十二年于兹矣。李校长志敏，能自振励，为本校宏造人材。其成就诚不可量。唯第一届国会，两遭解散，迄今已十二年。时势变迁，令人兴沧桑之感。余滥竽平政院逾九载。今年夏，复补充众议院议员。值省宪非省宪两派竞争至烈。奔走调停，而宪法幸底于成，以谢国人。回忆往昔，学生流血请愿而不能者。今已厕身其间，冀谋有所建白，以遂初志。乃延期之议甫定，又以议长问题，纷纷扰攘，不可究诘。余以僂弱之躯，从事劝解，谋所以息争，而卒不可得。国会已奄奄一息，不知所届，吁，可慨也。然无国会，则无以监督政府。而政府得为所欲为，增国民之负担，而无所顾忌。前此种种借款，已至数亿万，不得谓非前车也。国会倘不至自杀，愿与吾同人合群策群力，以救危亡，区区此心，不惟当日学界请愿诸生牺牲性命而不恤者所乐闻，当亦今日学校诸君子所赞许也。

末鹿李矩谨记

本校最大之纪念，前已详述之。然犹有关于革命之历史漏未

叙入者。当革命军起，独立省皆创立保安会。吾直以密迹京畿，不克独立。而士绅亦为保安会之组织。余被举为保安会副会长。一日保安会开会未毕。本校地理教员白君雅雨已在他室久候。甫就坐，出凌生铄电报相示，云在滦州联络军队，谋独立就绪。已推余与籍君忠寅、吴君柄枞为各部长。请即日到滦就职。籍君以病辞。余以保安会每日开会万难脱身为言。并劝白君亦勿轻往，须加慎重。白君面有不豫之色。向余求经济上之援助。余曰昨胡生宪以本校学生奔走革命。（学校已停课）困于衣食，予以二百元，令其救济。今敝寓所存，约不过数十元。又无时间可以向他处通融。白君曰，有数十元足矣。忽忽去。晚九时许，白君来敝寓，以三十元予之。白君取白纸条一组，属书捐，曰，吾不道谢，革命成功，令四万万同胞谢汝。握手别，仍劝以多加慎重。越二日，胡生宪来见。曰，雅雨先生与一某校学生熊某，在某车站被捕，请师速谒督帅，设法营救。余即刻至督署，约李君士伟（李君时为某督幕府其为师范监督时白君曾充教员）谒督帅。伪称白君系地理教员，因停课出京游历，某军以其剪发，指为革命党，逮捕之。即有革命党嫌疑，亦解津归法庭审判。请速电某军遵照。督帅即命李君士伟拟稿速发，以为不至遇害矣。次早某学使来访，云奉督帅面谕，昨日所说之白熊两人，已有复电，白供认为参谋长，熊供认为炸弹队长，俱已枪毙。督帅颇滋不悦。令吾传语，不另作复矣。余曰，孰为革命党，孰非革命党，此时即父子兄弟亦不能尽知，况属朋友；即为革命党，亦不应立于枪毙。南方亦革命党，何以不尽枪毙，而与议和。请转告督帅，似不必以此为介意也。是时津埠谣言甚盛，有独立之风说。适某镇守使自京归津，在车站遇炸弹，受惊恐。翌日督署召司道军警会议。某镇守使提议，须杀士绅一二人以镇压之。督帅问杀何人，答曰，如李矩其人者。督帅曰，不要乱语，李矩为吾所素知，决不至妄有动作。散议后，某警道，某学使，洩其语，并嘱余友刘君春霖相告诫。余曰，某镇守使如捕余、君能往救乎。刘君

曰，舍命往救，尚堪自信，唯不如谨慎之为愈耳，乃相对大笑。一日籍君忠寅与众友人在敝寓聚谈。突有军装者推门入，称老师，行立正礼。视之，则凌钺也。群相惊愕。凌生笑曰，老师以为凌钺已死，今日见鬼乎。凌钺未死，乃坐室隅，历述至滦州运动军队谋独立之经过，与白君雅雨遇害之惨状，自己逃命狼狈之情形，逾数小时。语毕而出。民国纪元，本校为白君雅雨发起追悼会。（白君沉默寡言笑，在各校授历史地理、为学生所钦仰，）极一之盛。凌钺现在沪，为政党之竞争。久已不通音问，白君死矣，求仁得仁。夫复何憾。事虽未成，而其志可嘉也。民国以来，社会之腐败，政治之污浊，有识者督焉忧之。然欲图社会之改良，政治之刷新，端赖人材。人材之养成，首重教育。教育能养成多数之人材，起而与腐败之社会，污浊之政治相奋斗。履蹶履振，百折不回，终有成功以救国家危亡之一日。而本校实负此莫大之责任。诸君子读吾纪念词而奋然兴起乎。余虽不敏，不惟馨香祝之，窃愿执鞭以从。

李炬再志

（《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3. 天津请开国会风潮追忆

前清宣统二年冬，爱国人士见朝政日非，列强瓜分中国之声甚嚣尘上，忧于神州沦丧，皆为隐忧。先由天津大、中学生秘密会议，寻找途径，认为立宪开国会，可以监督政府改善政治，以救沦亡，遂于12月间，天津各校学生均在本堂大讲堂开会，议定办法，推举代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推定白见五（后改名坚武）李钊（后改名大钊）、胡宪、徐铮、蓝鸿翥等八人为代表，笔者与李青峰等四人为记录，并由发起人讲解请愿之意义及目的，慷慨激昂，同学均受莫大感动。踊跃签名。当时只有几个官僚子弟及胆小畏葸之徒，不肯署名，遭同学唾骂，赶出会场。

首先孙可上台讲话，在激烈时抽出短刀，割臂流血不止，立刻晕倒。继又有刺血者十儿人，遂在大幅白布上用鲜血大书“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大幅横的竖的标语，用竹竿挑挂，准备游行示威。议定翌日清晨，亦河北各学堂，均到天津公园会齐，整队游行。路线由天津公园出发，经过大胡同、东马路至南马路广东会馆，与天津全市学生会齐，开会商定办法。经学堂当局竭力劝阻无效。次日黎明，全体学生整队出发，计有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天津师范学堂、北洋大学堂，行至黄纬路，已有陆军军医学堂、芦氏中学等整队等待。遂由陆军军医学堂在前，向公园进发。詎意行至公园门内，花圃园环马路时，有一候补袁姓道台坐玻璃马车对面直冲过来。游行队伍系四人一排，马路并不甚宽。车夫只得将车停下。而袁道在车内大声喝叫：“什么人大胆，不与我躲道！”学生们停步而待，袁道在车内喝叫：“与我打！”车夫挥鞭向学生头上乱抽，激怒学生，一部分将车夫拖下马车，挥拳殴打；一部分将袁道由车内拖出，饱以老拳；一部分用砖头石块将马车砸毁。袁道已被打得翎顶飘零，补服破碎，叫喊声嘶。后面学生拥挤而至，问明情由，好歹的劝令释手，由两个躲避的听差、扶掖而去。各堂学生整饬队伍，即刻出发，各堂均有血书写的横、竖布幅，迎风招展，路旁观众，切切低语，哀叹声声。在途中东马路，有三位老人，佇立旁观，其中一人忽而放声大哭，其同伴将之扶掖而去。及至广东会馆。天津南部学生已到，计有海军军医学堂，铃铛阁中学。共计约二千人。当时还有几位爱国士绅参加会议，全体公推天津邑绅温世霖（举人）为总代表，议定办法数条：（1）誓死请愿，立宪救国，不达目的不止；（2）先向当地最高长官钦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衙门（以下简称总督署）请愿，如无结果，即再以函电呼吁全国学生力争，以罢课为后盾，如再无效；（3）即四出运动工商界，以罢市或效法外国罢工。由温世霖朗读请愿书，征求意见通过后，仍由温世霖率领，向河北总督衙门进发（当时总督是陈夔

龙)，沿途高呼口号：“立宪救国！速开国会！”抵督署时已下午两点多钟。由东辕门排队而进。督署大门紧闭，代表们上前叫门，迄无人应，学生等席地而坐，同声高喊口号，呼声震天。约经过两小时大门开了，一军官领数十名卫兵，站在门前，让代表说话。当由温君上前说明来意，该军官说：“请诸位安静略等，本人即刻回禀大帅，听候指示。”仍将大门关闭。约一小时大门又开，有一蓝顶文官，并十余名卫兵站立门前，向代表说：“大帅吩咐，代表人见，每学堂学生代表只许一人。由总代表率领入内，诸位先生安静听候，勿得喧哗。”由温君率领各学堂学生代表入内，见督署大门内甬道两旁，多由军队持枪带刀排成一条兵巷，大门未关。又约一小时，见各代表满面春风，仍由该文官送出，站在大门台阶，向学生宣布说：“晋见大帅颇表同情，并夸奖全体学生爱国热忱，又嘱向刺血学生慰问，允许及时代为电奏。我们可以先行回学堂，听候上谕。”各学生遂整队回堂。途中纷纷议论，陈夔龙怎么忽然变成好人，他若支持此次请愿，可能达到目的。独李钊先是默然不语，继而愤然说：“他们哪有好心，还能办出人的事吗？准备上当吧！”有人反驳说：“你就是过激派。”学生们整天未吃未喝，饥疲交迫，只得回校静候。过了三日，突然来了重兵，将学堂包围，围墙外，密布岗哨，在堂学生不准出学门一步。至九点钟左右监督李矩召集在大礼堂集会，宣布上谕已下，大致是“国家行政，中枢自有权衡，庶民干政，最干例禁。此次暴动，例应重处，姑念无知，责成各堂监督，严加管束，专心读书。如不悛改，定行重处不贷。在籍举人温世霖，煽动学生妄行干政，有负皇恩，罪有应得，着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即日起解。钦此！”等语。又对学生严加训诫，说：“此次妄动，十分危险，幸皇恩浩荡，未加究治，嗣后应专心向学，安分守己，倘再有妄动，甘蹈罪犯，本人力薄，爱莫能助。”等语。学生等因大兵包围学堂，不得出外，失去联络，迨十余日后，大兵撤去，各堂学生始得相晤，方知温世霖即于谕下

之日，押解出津，到车站走送者数百人，因学堂被兵包围，并无学生去送。在清廷高压欺骗之下，一番风浪平静下去。温世霖君直到清廷逊位始得释还。

1964年元月10日

(刘寿山文《辛亥革命回忆录》(八))

(三)北洋法政学会与《言治》月刊

1. 北洋法政学会

北洋法政学会会员名单

丁宗峰	丁桂年	弓 铃	于树棋	王 宣	王 惕
王 恺	王允中	王成章	王汝湘	王佐廷	王作霖
王明华	文含瑛	王春山	王柄存	王德钧	王联仕
王宝桂	王宝雄	田 解	白见五	史步麟	尼鼎云
朱 霈	朱秉颐	朱应柱	吴 杰	李 钊	汪 瀛
李之藩	李心恒	何守经	李茂桐	李春荣	李振甲
李振忠	李纯树	李培真	李培藩	李逢玺	沈奠澜
李华春	李瑞锡	何福赐	李维祺	李维翰	李 晋
吴树森	吴煥民	李应龙	宗士立	周国衡	宗景镛
周稚圭	林滋勤	周维城	郁 崑	纪文潞	洪希肾
纪钜纹	苗寿昌	马绪熙	马灿禔	祖兴贤	马魁章
夏 勤	徐士芳	袁士铭	孙文煥	荆可恒	夏光奎
徐国瑞	莫 御	张 滨	张士骏	侯德增	张四维
张永德	陈世仪	冯次安	染廷俊	张宗和	陈其武
崔亮辰	常述明	陈洪范	陈柏龄	张振峰	张思绶
张恩寿	张书翰	崔绍曾	梁国宾	张景扬	郭须静
梁士权	许福奎	张润之	张寿田	陈荣枏	陈际沅
张锡昌	张济之	张竞存	张继曾	陈绳祖	张彝诚
隆 中	黄 旭	云 贞	彭心衡	程克明	傅振纲
童启颜	黄端辅	温庆涇	杨 奇	贾元章	杨玉璠
贾孝通	万宗乾	杨衍瑞	董荷恩	贾斌瑞	杨贻纶
路宝树	福 洪	凤文祺	管守谦	赵壮怀	赵凤桐

赵瑞麟	宁与龄	刘之桢	刘仁伟	刘世奇	刘仲深
鲁同恩	蒋尚永	刘梅塘	潘智远	刘瑞芝	刘夺元
刘毓俊	刘德藩	刘贤书	刘钟藻	庐山	韩国士
檀遇辰	钟举鹏	韩体乾	苏笃智	饶富	刘祀明
马仲援	庞作屏	刘吟臬	牛钟汉	王化行	马宗援
韩荣绅	李浩然	王丕基	侯立志	徐润之	陈思祖
王廷兰					

以上第一年入会者。

杨树兰	靳树芬	庄树荣	赵珍卿	韩原道	董在身
刘志邦	董振铎	张如芳	刘锡恩	王千臣	郝镜波
白钟琨	许寿图	阎鸿宾	吴耀奎	张国襄	戴锡九
张凤翥	张 崐	王鸿儒	封荣简	魏濬源	刘安明
李清梅	张炳星	耿韵槐	孙鸿志	李雨春	董 云
彭阴阶	邓毓芝	王玉振	李怀玉	荣鑑轩	霍毓奇
李承瑞	翟润生	鲍树荣	廉 绅	陈奎廉	王一仁
刘 照	傅圣严	刘锦章	穆贵泉	杨春运	宋毓章
魏元辅	刘培东	康树泽	魏秉德	闻 治	熊晖策
季 铨	张学良	刘家桂	胡源潜	纪矩统	李鼎铭
王文泽	陈锡珪	谭奎和	叶宗远	齐耀璿	张祖诰
刘国英	王文煊	周行藩	李敬宗	宋毓琨	李士俊
刘应恩	纪清俊	周行范	周行范	高俊彤	胡纪勋
陆鸿述	陈毓珍	刘锡龄	臧徽典	胡景云	马韵清
萧英俊	孔宪熙	张春瀛	马汝廉	刘 渤	张希德
马维周	张殿玺	郑世麒			

以上第二年入会者。

（《言治》月刊第2期）

北洋法政学会第二期职员名册

会长：张恩绶 田 解 张竞存
 评议部

部长：王 惕 李 晋
 部员：白见五 朱炳颐 荆可恒 张景扬 彭心衡
 凤文琪 刘世奇 刘祀明 刘毓俊

调查部
 部长：凤文祺 朱秉颐
 部员：孔宪熙 朱 霈 陈际法 沈奠澜 陈绳祖
 李瑞锡 李维祺 宗士立 宗景辅 周稚圭
 林滋勤 张永德 张宗和 张书翰 张润之
 陆鸿述 梁钧衡 云 贞 黄端辅 杨 奇
 叶宗远 刘之禎 刘夺元 蒋尚永 刘德藩
 潘智远 檀遇辰 钟举鹏 谭奎和 庞作屏

编辑部
 部长：郁 巖 李 钊
 部员：于树棋 王 宣 王 惕 王化行 王春山
 王柄存 王庭兰 白见五 史步麟 朱秉颐
 朱应柱 吴 杰 李 晋 李纯树 李瑞锡
 周国衡 夏 勤 袁士铭 孙文煥 荆可恒
 马仲援 莫 御 陈毓珍 冯次安 崔亮辰
 崔绍曾 郭须静 许福奎 张济之 张彝诚
 黄 旭 彭心衡 程克明 黄端辅 温庆涇
 杨玉璠 杨衍瑞 万宗乾 叶宗远 贾斌瑞
 路宝树 凤文祺 赵壮怀 宁与龄 刘仁伟
 刘世奇 刘仲深 刘祀明 刘毓俊 庐 山

庶务部
 部长：朱应柱 纪文潞
 部员：李培藩 李华春 纪鉅纹 夏光奎
 书记：王 惕 吴煥民 杨麋纶 张彝诚
 会计 王 宣 崔绍曾

(《言治》月刊第1期)

北洋法政学会特别捐名单

名誉赞成员：

今井嘉幸先生捐洋贰拾元，大石定吉先生捐洋拾伍元，刘同彬先生捐洋拾元，韩殿琦先生捐洋拾元，高俊彤先生捐洋拾元，贺肇培先生捐洋拾元，贺德深先生捐洋拾元，燕世奇先生捐洋拾元，张务本先生捐洋拾元，齐绍曾先生捐洋拾元，李赞隆先生捐洋捌元，张福年先生捐洋陆元，刘之栋先生捐洋陆元，贾睿熙先生捐洋伍元，李广濂先生捐洋伍元，郭增祿先生捐洋伍元，胡庚西先生捐洋伍元，陈兆英先生捐洋伍元，杜之堂先生捐洋伍元，冯英俊先生捐洋伍元，童世铭先生捐洋伍元，赵荣誉先生捐洋叁元，汪鸾翔先生捐洋贰元。

会员：

张恩绶先生捐洋贰拾元。

以上第一年捐入者。

名誉赞成员：

张恩绶先生代募洋壹千元，籍忠寅先生捐洋贰拾元。

会员：

梁均衡先生捐洋伍拾元，郁凝先生捐洋拾元，吴杰先生捐洋伍元，谭奎和先生捐洋伍元，张竟存先生捐洋伍元，陈绳祖先生捐洋叁元，李培藩先生捐洋叁元，陈际沅先生捐洋叁元，刘德藩先生捐洋贰元，彭心衡先生捐洋贰元，李钊先生捐洋贰元，白见五先生捐洋贰元，凤文祺先生捐洋贰元，崔绍曾先生捐洋贰元，张永德先生捐洋贰元，袁士铭先生捐洋贰元，张书翰先生捐洋贰元，李维祺先生捐洋贰元，杨玉璠先生捐洋贰元，陈毓珍先生捐洋贰元，钟举鹏先生捐洋贰元，纪文潞先生捐洋壹元，朱秉颐先生捐洋壹元，刘祀明先生捐洋壹元，黄旭先生捐洋壹元。

以上第二年捐入者。

（《育治》月刊 第2期）

2. 《言治》月刊

言治宣言书

周失其道，列国崩析。强弱毗壤，诟谩交起。俊魁伟异之士，籍便乘利，竞本所学，游说世君，支词之契，立跻显要。借非耽纵自放，甘老布褐，如楚狂接舆晨门丈。人之徒者，鲜不覃思罢虑，撰玄钩幽。蔚为至论，宏博浩瀚。侈然而号于众，嚶嚶以召其类。居今稽古，读班孟坚所以论叙当世诸子，上自孔老玄冥精一之大道，下逮稗官房中巷谈微伎之琐论。度越八荒，凌震后祺，而神州学术，于焉盖基盛矣。虽李斯残虐，横恣禽弥。而征于司马谈六家要指之论，则遗风余韵迄汉文之世尚未斩也。武帝嗣世，既惊心域外，以匡靡其民，而董江都之臣，不重探其故。辄张儒术，卑斥诸子。一尊既定，众流斯屏。后之学者，益歆于功令，惑于咫尺，规规然竺守儒家一小天地。耻闻异说。而诸子寝微，儒亦安于简陋。本真全湮矣。由汉而来，岁更千百，嘤嘤姝姝，名世巨学，占毕所攻。犹一仍高曾貽孺，不其唏与。

夫神州学术，汉以前以不统一而大倡，汉以后以统一而日亡。此其故，盖与欧陆中世纪教权盛行，怀绮思者，矜束于势，卷舌举唇，不敢有歧说者无以异，默稽厥机，东西一辙，其世运有以格之与。独念彼自培根、笛卡尔诸哲以来，崭然一更。从学之士，各抒天禀，交攻互证，言愈庞而理愈精。别至今日，声明文物，灿然大备。舍生之伦，日则心师。而吾国犹囿故蹻，僥焉无以自存。其故何与，世之论者，颇以螻居专制之域，思想摄于威权，言论不敢自恣。学术之发达固不易，而政术之昌明为尤难也。扶桑三岛，四十年来，其学术之辉弘，亚东未有伦敌。若夫政术，则天皇万世一系，总揽庶政，议会等诸附施，人民比于皂隶。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为世界学者所愤目而视者。彼且矜为瑰宝，徧国中绩学硕才，群帖然据为典要，不敢倡异辞，彼其

民非智于一切而独愚于比也。君权高拱，民之意志，有与戾者，辄不能以自伸。呜呼，此谈政治者，不敢放言高论于君权之国也与。

自鄂渚首义，政尚共和，则庸之所以阂焉抑塞。郁而不彰，暗而不明者，宜若腾达辑熙于今世。然而一年以来，政不加进，真理日晦者，则又政党之流毒也。夫政党之为物，悬乎的所号召天下。彼其持论甚坚，视己甚崇。由其道则国可强，民可富，否则萎焉而已矣。世之标的有与吾异致者，其持论虽若足以折吾衷，而国之强弱，民之富贫，亦未始不资乎此。惟其非吾党也，宁一切以菲弃之。即在贤达，苛其挂名党籍，则感情真理二者之胜负，常与超然者异。彼其意固以吾揭策斯义，以奔走举国之士，籍吾冕是而莫非之。视异党攻击之强弱，而辄为进止，则其欲困人之俯仰吾说，由舆论而演为政治也。其道大窳，盖党人之于其主义也，言其利而讳其弊往往有利焉不胜其弊者，不惜强聒而诡护之。而真理之在天壤于是焉尽矣。由是以言，则昔者政权之握于上也，真理固无自见。即在今世共和之邦，所谓舆论政治者，党人类挟其自私，簧鼓天下，而真理之汨凭，尤倍蓰焉。将欲拯之，其惟不党乎。

本会之设，固以群居研学为帜志，而无所于党，其于兹刊也亦然。今日以为是者，明日复有说焉，足以相胜，则今日之说可立废。吾所持论，深自信者，他人能举吾失而吾告，则复移而赞同他人之说焉。而无所容其心，盖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但取决于真理，去感情之缚，绝意气之私，当仁不让，视敌如友。凡所论列，一以同人自由研究之所得，为独立之发表。苟其说，持之有故而言成理，则兼收并包，无所于排。循是以往，虽不敢希纵周秦诸子，具体大思精之伟著润泽百世，而视彼作党人之机关，持一致之言论，惟鋤异己，不审理真者，固可告无罪于国人矣。当兹出版之始，爰布斯旨，谨揭册首，非敢于当世各党名论有所讥晒也。堪所同人智谏识鲁，学之未充，党于何存。并世贤

哲、幸假辱教，不胜厚冀。

(《言治》月刊第1期)

释言治

治之义有四。训理《荀子·修学篇》“少而理曰治”；训校《战国策》“皆无敢与赵治”；训简《周礼·春官》“大宗伯治其大体”；训监《周礼·地官》“乡师用役则师其民而至，遂治之”。言者言其应理、应校、应简习、应监督者也。民国新造，政类乱丝，千纬万经，莫寻其绪。不得其道而理之，将益焚也。法制政策，国有其宜弃短擷长，裨益来祀，不会其通而校之。将何从也？乍脱专制，聿兴民政，因革损益，辄异前规，不循其途而简习之，转以滋纷扰矣。服从民意，共和所胎，执政散法，亦孔之灾，不探其本而监督之，罔其无宁日矣。此言治之所为著也。他日由是而理者理之，校者校之，简习者简习之，监督者监督之，斯同人之愿偿矣。虑读者疑名有所偏至或有所未尽也，为绎其义如右（上）。

(《言治》月刊第1期)

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

韩昌黎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而平居读太史公《游侠列传》览所称述，低徊向往，庶几今尚有其人者。丁未春，北来京师与当代贤豪游处，越时半载，间辄欲识一二慷慨尚气节，肝胆磊落行谊卓然之士，相与煮酒谈平生。而士方踟促功利之途，奸谄诈诡，猎取显荣，阒然无有应者。颓然自失，甚以叹权势之蔽，所以销黯而绝之者深矣。其秋留学北洋，四方俊士，萃然聚首一室。而辈侪中籍出燕赵者，尤不乏人。余于是时始识李子守常，朴素其貌，崑崙其德。而学之充，文之豪放，感慨淋漓，明可薄汉霄，幽可泣鬼神，坚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盖其侠义之气，卓拔之识，所以撼于无形，流连以

往，神与俱化者，为忆退之所称，君岂其选与。余与君虽聚处六载，而相与为文字密交，则自今春始。盖往者日斂心力于校课，无暇及是。属毕业伊迩，同人组织之北洋法政学会成，金议创《言治》月刊，发抒蕴蓄，且征进德。君翩然起众人中，偕余朝暮经画，首期出版，海内日报杂志，转录殆遍，尤以君文为最。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君则振翰莘莘，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胎德为念，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又以杂志月出一册，为效绝缓，迺徇夙予袭明之约，联襟京华，主持《法言报》。君意气慷慨，不逊曩时，而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汨汨，所以箴砭曠蒙鼓舞群伦者。方期宽以岁月，薰渍渐被，人心庸有来复之机，世道或少颓下之虞。而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余于君之行又何克尼也。顾以数年聚处之雅，意气感召，相得益深，怆然骤别，踽踽块居，畴复可语。而民生之患，不得君文以为呼吁者，又且数稔，愈不能毋倦倦也。既惘然不能已，辄为叙以道其思。世之曾读君文者，余览斯作，或不啻为阿于朋好之私乎。

（作者：郁樂載《言治》月刊第4期）

(四) 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

1. 中国社会党党章、宣言

中国社会党规章

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一日第二次联合大会订定

名义 中国社会党为社会党在中国所组织之团体。

宗旨 本党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采定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所外之竞争。

事务 一、发行杂志、新闻、传单、小册；一、常时或临时开讲演会；一、开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传习所；一、流动鼓吹；一、交通各国社会党加入世界社会党大会；一、联络中外宗旨相近之各团体。他如教养、经济、慈善及农工各事业，皆须筹设模范的公共机关。党员得在本党宗旨范围内，以特别目的或同一职业组成各种小团体。党员得在本党宗旨范围内，以个人意志自由行动。党员为实行本党宗旨之便宜，得以团体或个人从事政治之活动。凡交涉、请愿、联络、鼓吹等事，经全党或一部党员公认以全党或该部名义执行者，其事权、经济由本部或该部事务所任之；其余事务均由办理者自任之，但与本党为声援。

党员 凡了解且信从本党宗旨者，皆得为党员。入党时须亲到各该部填写誓书、履历书，每三个月须换领证书。党员不分国界、种界、宗教界，无论男女，对于本党义务权利平等。党员任在何部义务权利平等。党员违背本党宗旨，经党员弹劾，各该部

调查属实，由本部宣布除籍。党员已除籍而能悔改自新仍愿入党者，须亲具悔改愿书。经党员五人介绍，得各该部认许，由本部宣布复籍，但以一次为限。

经费 党员入党，纳特费无定数。党员逐月纳月费无定数，约按所收入百分之五。党中各部经费，由干事收管度支，由全体党员监督稽查。本党每年募集基本金一次，党员自由认捐，汇存本部，非得多数各部之同意不得动用。

任职 本党各部事务所置主任干事一人。本部主任干事由联合会各部代表选举，有代表全党维持各部之责，任期一年。各支部主任干事由各该部党员普通选举，各部主任干事得委托书记、会计、交际、庶务各干事及编辑讲演专员。各部对内外有特别事件，主任干事得委托临时干事代表办理。各部干事之人数、权限、任期、薪水或公费，各该部公决规定之。本部主任干事不职经十分之一以上各部弹劾。各部主任干事不职经各该十分之一以上党员弹劾，公开临时联合会或临时党员会，调查属实，另行选举。各部干事不职经十分之一以上党员弹劾，主任干事调查属实，另行委托。

机关 上海设本部为总机关。凡党员经原入党部介绍，得本部认许或直接得本部认许，皆可发起支部，俟有党员五十人以上得本部发给图记，即为该支部成立。支部事权经济独立，但其特别并通常事件须随时或逐月报告本部，又须逐月津贴本部经费按所收入百分之五。支部不论地域广狭，人数多寡，一律直接本部。

会期 联合大会每年一次，各部均委托代表来本部举行。各部党员会每月一次，干事会无定期，在各该部举行。有特别事件由本部或各该部主任干事召集临时联合会或临时党员会。惟关系弹劾主任干事者，得由提出弹劾之各部或党员连名召集之。

附则 本规章除名义、宗旨条外，如须修改，于联合大会时提议公决之。

附本党征求同志浅言广告

启者：本党主持人道，排斥强权，伸张公理，破除男女贫富贵贱各阶级，以谋人类自由平等之幸福。凡赞同本党宗旨者，无论何人均可随时签名入党。北京机关部设宣武门外南横街东头路北。电话南局三百二十三号。天津部事务所设在

电话 号。特此布告

中国社会党宣告 辛亥九月十五日

民军起义，假种族革命，演政治革命。惟政治由社会造成，故社会革命尤为万事根本。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实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迭经公议，组织完成。凡有志入党者，不论男女，不分国界、种界、宗教界，均请随时亲临上海本部或各地支部，检阅规章，签名宣誓，共图进行。采定党纲，条述如左：

一、赞同共和 世界政体进化，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共和虽非邦治之极轨，而在今日实较善之制度，亦必经之阶梯也。民军既定为国是，本党亦极表同情，切望吾人顾名思义，实力推行耳。

一、融化种界 人道主义，四海兄弟。社会党本无国界，尤不应于国内更分种界，务期融化，互泯猜疑，血统混合，文明溥遍，将无识别之可寻矣。

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 旧法律恒以国家或家族为主位，而于个人自由，多所牺牲，宜彻底改良。认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认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凡为保障国家或家族而妨害个人之条件，悉革除之。

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 贵贱贫富各阶级，皆由世袭遗产制度而生，此实人间世一切罪恶之源泉也。凡完全个人，准自由营业，惟其财产支配权，当以有生为断，死则悉数充公，有均产共产之利，而无其弊，家庭制度予以破除焉。

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普通教育宜设公共机关执行，人自为谋，断非善法。自初生至成年，无论何人，教育平等，而能力平等，即经济亦平等矣。至其费用，则取之遗产而已有余。以公共之资财，造公共之人才，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

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 奖励劳动家、劳动者，神圣也。农工各业，生命攸关，虽世不能无间接生利之人，而人必勉为直接生利之事。资本公诸社会，而劳动普及。个人有分业，无等差，通功易事，各尽其能，此善之善者。

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 凡人力所生者，皆不应征税以困之。宜专征惟一之实地价税，每年按时估计，约当二十而一，以杀富豪兼并之势，而开游惰归农之途。公共用费，即取资焉。至于人畜、建筑物、种植物、制造品，所有就地关津一切税，除对外者暂缓，余宜概予罢免。

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 军备之糜[糜]耗，战事之惨毒，各国所同苦也。废兵当即在指顾间，为目下维持均势计，必不得已，亦宜严重限制，而并其资力，专注教育、实业诸端。军备虽减，谁敢悔之。所谓不战而屈人，况志不在屈人者乎？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 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成立

陈翼龙要求政府不得干涉中国社会党
天津部开成立大会呈及内务部批

（1913年1月）

（1）陈翼龙呈（1月26日）

中国社会党北京部主任陈翼龙，谨上书于内务总长阁下。敬

肅者：竊維本黨之成立，远在客秋九月间，虽为期间仅祇年余，近则支部已五百余处，党员约五十万人，而党务之发达，党员之增加，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惟始初风气之开，南省最盛，北方虽不乏社会学家，能以社会主义飡我国人者，则无闻。自上年七月，本党代表江亢虎北来，面谒贵总长，卒得仰承热心赞同，北京部亦遂赖以成立焉。凡属本党党员，莫不同声歌颂，钦佩莫名。惟现因天津部成立，设事务所于东马路中之崇仁宫，拟于元月二十六号即开成立大会于李公祠，适翼龙又以代表赴津，诇闻警道横加干涉，籍口于前者曾经由道呈请都督咨部立案，曾奉部咨复，略谓社会党党纲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条，与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三项相抵牾，应不能任其自由开会云云。翼龙闻之，殊深骇异。伏查临时约法规定集会结社自由，亦具载明文，苟非离经畔道，根据法律，行政官厅应无干涉之权，而本党成立亦无立案必要，更何须该道为之呈请。即云人民有保有财产自由，殊不知保有者，亦即自有支配主权之谓也。社会党党纲虽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条，亦系出自实在了解社会主义，自行愿意以遗产归公，实践社会制度，思有以福利社会，谋创种种生利公益事业者而定。是其财产支配之权，仍属之保有财产自由者，并非一定的强制行为，一入社会党，遂夺其保有财产之自由，且失其财产支配之权，或籍党以侵犯他人保有财产之自由也。界限既甚清白，规定亦颇明了，揆之约法党纲，实无丝毫窒碍与冲突不合之处。果如所谓，是不但误解本党党纲，名誉损失将及于全体，且误解临时约法，并先自破坏矣。以贵总长贤明若此，京部既可允认，断无独于天津即生误解，靳而不与。警道之词，安可尽信，当经翼龙仍根据约法，与之一再严重交涉。据云：非奉部令，碍难允准。因之改定二月二号，再开成立大会，但会期伊迳，诚恐该道再肆摧残，事出临时，激成公愤，用特为此返京，敢陈颠末，应请贵总长迅赐电飭天津巡警道，届时不得籍口横加干涉，以维约法，实为公便。肃此谨陈。虔请勋祺。诸希鉴察。

陈龙翼谨肃

中华民国二年元月念陆号呈

(2) 内务批复稿(1月30日)

内务部批第 号

原具呈人陈翼龙

呈悉：查集会自由，载在约法，苟无违犯法律行为，官厅自无干涉之理，惟该党会纲，本部未经承认，并解释理由，刊登公报，通行在案，所请电飭天津巡警道之处，碍难照准。此批。

一月三十日拟稿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

冯国璋关于应否准许中国社会党

设立天津都事务所咨

(1913年1月29日)

直隶都督冯为咨询事。据巡警道杨以德呈称：案据中国社会党函称，迳启者：二十世纪为社会主义勃兴之时代，地球各国无一国无社会党。良以社会主义宿具人心，遇机即发，如春气之生万物，有不能抑窒之势。本党成立，远在辛亥九月，至今周年间，全国风从，舆论赞美，支部将近五百处，党徒已逾五十万人，发达之速，一日千里。自今年八月间，本党代表江亢虎、陈翼龙二君入都，创设北京部。黄河以北，风从云涌，支部之相继成立者，月必数起。惟天津为通商大埠，且为北方文明荟萃之区。前有党员某君发起，以办理不善，遂由本党代表到津取消。惟本党以天津为重要区域，不可久缺机关，故特委任北京部主任陈翼龙君代表到津，重行组织，以期早日完全成立，而符众望。今已择定东马路六吉里新春秋报馆为临时事务所，不日即开成立大会。谨附呈党章、传单及本党致各都督公函各一纸，特此知会

等情。据此。查该函所称北京部业已成立，是否属实，本公所无凭查考。顷据东四区区官崔凤舞禀称：窃闻职区界内东马路崇仁宫内，有附设社会党事务所之说，当派巡长前往调查去后。兹据该巡长回区报称：该党事务所实系在内附设，门外尚未悬挂社会党字样。当将该党宣告、传单，并创办平民学校简章，带区前来。区官据此，除飭该巡长仍行调查，随时报告外，理合将该党宣告、传单及创办平民学校简章，一并呈请鉴核施行等情。据此。应否准其开会，拟请都督函询内务部见复示遵。等情到本都督。据此。查核社会党现已在津设立事务所，至应否准其开会，相应咨贵部，希即示复，以凭仿遵，望速施行。此咨

内务部

计咨送社会党宣告传单各一纸，并创办平民学校简章一本。
[略，见附录]。

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附录一：中国社会党天津部成立大会传单

中国社会党传单

本党宗旨在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鼓吹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所以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也。辛亥九月，本部成立以来，全国风从，至今周年间，支部至四百九十余处，党员至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足征社会主义之有触即发，如响斯应，有沛然莫御之况。民国元年八月，江亢虎、陈翼龙两君北上，设立北京支部。江君旋渡河而南，陈君被举为北方主任，苦心经营，党势日盛。济南、烟台等部刻已成立，奉天、张家口、太原、保定各地刻正组织，不日即可成立，进行之速，一日千里。惟天津部从开始组织未善，致生窒碍，前曾登报取消机关，声明党务暂由北京部兼理。惟天津为燕地通区，北方文化此实荟

率，宜为社会主义发育昌明之地，不当令其湮没无彰，致诚心信服之人，因以自阻。同人有慨于此，特促北京部主任陈翼龙至天津重行组织。现已择定东马路中崇仁宫内为事务所。凡本党党员，旧日由津入籍者，乞迅到该所换领证书。其愿闻本党宗旨，有志入党者，不分种界、国界、教界、党界，无论男女，均可随时到所签名入党。今订期阳历二月二日在河北李公祠一时开成立大会，届时并请社会主义大家诸君莅场演说，如承驾临，不胜盼感。

中国社会党敬启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

3. 李大钊与社会党天津支部

1912年，陈翼龙先生在北京创立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时，为了实践党的主张，曾办了一所平民学校，男女兼收，在刚刚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不久，即提倡男女平等，这是第一声；尤其在封建堡垒的北京，也只有陈翼龙不怕人的指责，才敢于这样独开风气的事，那时在学校任职的有曹嘉荫先生和杨宝峰女士——邓文淑（今名邓颖超）的母亲等。杨宝峰任学校教员，曹嘉荫担任会计。当时党中极穷，人称穷党，曹嘉荫家中景况富裕，曹的祖母对于社会事业颇肯帮助，所以曹嘉荫在学校除尽义务外，在经济上也常有些帮助。

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是1912年秋冬之间成立的。第二年春在天津成立支部，推李大钊、郭须静主持。陈翼龙旋即出京南下，北京总部即由曹嘉荫和杨宝峰等主持，兼办平民学校。此外还办有世界语学会，地点是在北京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

李大钊先生加入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是在1912年的冬天。他从天津来找我，说是应孙洪伊之约，要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当时经我介绍与陈翼龙先生相见，畅谈以后，意见极洽，

遂入党。当1913年春天津成立支部时，不料天津警察厅忽来阻止，说是奉冯国璋的命令。李大钊先生急返京，商量对策，托吴敬恒去向赵秉钧去说明，而后才得成立。

陈翼龙先生对于江亢虎的为人，极所鄙视，颇以与他为伍为耻，遂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改组为“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

陈翼龙先生惨死后，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我也走了，李大钊先生也避到乐亭县的祥云岛。当他出走时，约郭须静随后也到祥云岛去暂住一时，郭须静路上遇着武向晨，怀疑武向晨是侦察他的行踪的，连忙在滦县的渡口上了船，武向晨也上了这只船，郭须静更害怕。在船中武向晨提起曹百善的名字，郭须静才放下心。后来李大钊和郭须静两位先生，都设法到了日本。

当陈翼龙先生被解赴刑场时，曹嘉荫也杂在观看的人群里随行。陈翼龙先生一眼望到，怕他遭受不测，用眼睛示意来阻止他，曹才离开众人，不敢再暗中随行了。

（张次溪：《陈翼龙先生事迹汇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五) 五峰山和昌黎车站惨案

1. 五峰山和韩文公祠

西 五 峰 山

西五峰山，别名“五峰山”，位于昌黎县城北5.3公里处，由五座巅连的山峰组成，环列如椅，座北面南，其东峰名“望海”，东北峰名“锦绣”，北峰名“平斗”，西北峰名“飞来”，西峰名“挂月”，飞来峰最高，海拔507米；平斗峰半山腰建有韩文公祠，为李大钊同志多次游览、山居并作过政治避难的地方。此山风光为古碣石十景之一，名“西嶂排青”。

因此山由五座巅连山峰组成，并位于东五峰之西，故名“西五峰山”；又因西五峰山比较出名，一般人把此山称为“五峰山”。

韩 文 公 祠

五峰山韩文公祠位于昌黎县城北五公里处，庙址处在群峰环抱的西五峰山中峰——平斗峰前的半山腰上，东南可望渤海。

五峰山韩文公祠所在地原为圆通寺庙址，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石道范志完（次年升任山海督师）从昌黎城里拜谒韩文公祠（建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后来此游览，认为其地“天生文笔峰”，提出在此再建一座韩文公祠，当年施工修成正殿三间，并在近前挂月峰半山腰凿修一座“范公洞”（原洞名“刘九洞”，有谣云：“若要洞门开，还得刘九来。”范志完自称小名“刘九”，县丞蒋三捷遂为其修成此洞）。韩文公祠正殿正中为韩文公泥像，两旁为朱公（即明巡抚山、永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国栋）和范公（即范志完）泥像，香案

上供有朱国栋、范志完等人的四个牌位。实际上，这座为纪念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所建的祠宇，同为范志完等人自己建的生祠。当时，范志完还在庙后峭壁高处令人刻下“泰山北斗”、“五峰环翠”八个大字。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地人又在正殿东扩建三间客厅，并加修院墙、院门，使韩文公祠显得更加清秀、静宜。

五峰山韩文公祠，是李大钊同志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纪念地，可惜建筑物在1947年前后拆毁，现只剩房基。

（《昌黎县地名资料汇编》）

2. 昌黎车站惨案

就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秋天，昌黎车站发生了一起日本驻屯军枪杀五名中国警察的惨案。事情是这样的：那年9月11日晚上九点半钟，中国铁路巡警杨桐秋正在值勤，忽然发现驻扎在昌黎车站的日本兵正在卖果人的筐内抢食鲜果。卖果人往回抢夺，杨桐秋怕日本兵殴打卖果人，便令卖果人不要夺了。而日本兵因此竟怀疑杨桐秋袒护卖果人，随即用枪把殴打杨桐秋，另一日本兵也来帮凶。杨桐秋急忙吹笛求援，并跑回了警察局。他同迎接他的巡长刘长忠等人回到局里，日本驻屯军就在其队长佐野哲太郎率领下把警察局包围了。佐野哲太郎用战刀刺杀刘长忠后，令日本兵向里面连开排枪。当场，又杀死了巡警王学儒、刘金铭，杨桐秋和另外一名巡警刘秉俊身负重伤，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医院。日本侵略者杀死五名中国铁路警察后，又胁迫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在歪曲事实真象的文稿上签字，“种种强暴挟制情形不堪言状，枪逼至四小时之久”（《昌黎县志》语）。

日本侵略者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昌黎各界人民为死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为死难者家属募捐抚恤。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纷纷抵制日货，表示抗议。全国商会联合在天津召

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声援昌黎人民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却抱着亲日媚外的态度，密电各省军阀制止群众运动。事件的处理拖至第二年春天，以日本驻华公使答应惩凶谢罪，赔款二万六千元告终。事件虽然平息下来，但昌黎人民永远也忘不了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这笔血债！

（《昌黎县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昌黎县知事王芝田给交通、外交两部并直隶 都督及民政长的呈文

民国二年九月十一号夜十点钟，知事在署办公，忽闻南关外枪声数排，当即带同警务长唐万清、区官马名驃等，徒步出城查巡。甫出城外，即遇铁路巡长刘玉兴前来报告。据称，今夜九点半钟，巡警杨桐秋值岗，正值日兵在卖鲜果人筐内抢食鲜果，卖鲜果人往要夺回。杨桐秋恐日兵变怒，卖果人被其殴打，即令卖果人不必夺回。日兵疑杨桐秋回护卖鲜果人，即用枪把将杨桐秋殴打一下，从旁又有一日兵将杨桐秋揪住殴打，杨桐秋吹笛求救。巡长刘长忠同刘玉兴、刘煥文出局查看，杨桐秋已经由南站台跑回，一同进局。不多一时，日兵队官佐野哲太郎带领全队将路局围住。该队官进局用战刀刺巡长，并该日兵等连开排枪，放伤巡长、巡警多名。局内已被蹂躏。闻该队官电调滦县、山海关日兵前来协助，请速往和解等语，知事跣步急行。至路局门首，见局门外日兵排队用枪威逼，勒令知事赴该住在所。知事百方央求，始准知事赴局，然该军队仍用枪逼。进院见巡长刘长忠身在院中，刀、枪伤多处，仰臥身死。进屋见巡警王学儒受枪伤，横臥身死，东、西两屋，有巡警杨桐秋、刘秉俊身受枪伤甚重，问之不能言语，即派人延医救治。局东同和永棧房院中又见一巡警刘金铭受枪伤身死。勘毕，询诸街坊邻人，据称该日兵排队开枪围攻路局，枪毙巡警情形及起衅根由，与巡长刘玉兴报告相同。知事走向日兵，前见该兵官，要求将军队撤回，不允。知事再三

悬说，该兵官始悻悻带队而回，是时已一点钟余矣。知事即进城将大概情形电禀都督、民政长。十二号上午八钟，路局报告受伤之巡警二名，七钟前后均因伤身死。知事闻信，出城往验，未至路局、被日本兵官多人将知事枪逼至该兵队住在所内，围坐内外，兵队密布。该兵官等即出一稿，具系回护掩饰、彼直我曲之词，威逼知事书写签名盖章，知事不允，该兵官用枪威逼。知事起座欲回，该兵官等按住知事膊臂，又一兵官向知事枪逼，不令出营。种种强暴挟制情形，不堪言状。枪逼至四小时之久，该兵官等亦无可如何，遂于该单上拟明以上具系日本军队之词，另外概不知情字样，仍逼知事签名盖章。知事查核拟词，既有以上具系日本军队之词字样，此种一方面之语，于将来交涉上并无妨碍，如再抵察，该兵队必用野蛮对待，知事一人身任地方，死不足惜，恐紊乱地面秩序，惹起大宗交涉，不得已要索回署作延时之计。至下午二点钟，该兵官二名带同步兵一名排押，随知事进城入署，该军队枪逼署名盖章。知事即将以上情形电禀都督、民政长查核。十三号早四点钟出城赴车站路局，至五点半会同北京路局总巡官丁君嵩、京奉铁路第一段总巡官谭君定瀛、山海关路局长李君兆年、宪兵营第一连长颜君斌、铁路局英国医士苟密司翻译官、昌黎站长詹君天佐，验明各尸伤，委系被日本兵用枪放伤身死，填格录供附卷，验毕回署。现在车站巡警照常出岗，地方平静。此昌邑车站日兵枪毙路局巡警，后经知事排解劝慰，维持现状之实在情形也。除分呈外，理合呈明核办严重交涉，以重人命，而张国权，实为公便。再查各国法律，凡胁迫所立之字据均应作为无效，此次知事并警务长、保卫队长等受日本兵官威逼签之字据，当然作为无效。合再呈明，谨呈。

(《昌黎县志》1938年刊本)

3. 李大钊《游碣石山杂记》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六) 师友记

1. 白雅雨

白毓崑(1869—1912)字雅雨,号铕玉,江苏通州人。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地理教员。1912年1月在滦州起义中牺牲,李大钊对白雅雨极为敬佩。这篇传记选自白雅雨牺牲后不久出版的《言治》月刊第1期,充分表达了北洋法政学会同人对烈士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白雅雨传

白烈士毓崑,字雅雨,号铕玉,江苏通州人。祖平之,父晴斋,皆世通儒。烈士生而颖异,髫龄能文,倜傥有大志。家素贫,尝躬操井臼以代母氏劳。暇则溺苦于学,往往中宵披读至晓不休。岁丙戌,学使长沙王益吾得烈士文奇之,举冠其曹。旋肄业南菁学院,治古学有声。于时愤国势阽危,尝慨然有澄清中原之志。越数岁,前清政益不纲,烈士绝意仕途,以教育后进为己任。曾主南洋公学及沪上澄衷学堂讲席者数年。尝谓学问之道无穷,非专精一诣不足以自树立,惟地理为百科之根本,历史为进化之媒介,且吾国固有之精粹,尤能兴起学者爱国之心。于是本其所素蕴,手自编定教科书数种,学者珍之。继复北游天津,历任北洋女师范及法政客籍各校教习,课余恒讲演天下大势以励士志,所至生徒翕服。庚戌,天津学界请开国会商于烈士,烈士曰:“与虎谋皮,庸何有济。诸君曷留热血以供后日用乎?”后果被斥。于是烈士目击时艰,谋革命之心益急。旋即创设地学会于津,刊行地学杂志以饷学者。复于各校设立分会,藉寓革命机关。备发地理调查券,遣人游行各省,鼓吹革命。除会员外鲜知

者，洵足见烈士之深于谋也。武汉事起，东南响应；独河北各省慑于积年压制，寂寂无所动闻。烈士乃邀同志相议曰：“京津为根本重地，京津不动摇，则南军恐不易收效。且战期延长，生民涂炭，予不忍视也。吾辈曷速图大举以解决此事乎？”众以人少力薄也难之，烈士毅然曰：“拿破仑谓《英雄字典》中无难字，凡事贵有提倡，吾人不可不起任北方之责。”于是乃藉组织红十字会，先立团体。众既集，烈士登坛演说，反覆数千言，一以从速解决战事，维持人道为主旨。会既散，众有悟其旨者，夜访之，则武昌之特派员某君也。烈士大喜，遂决意与某君组织共和会于津，谋图举义。会既成，乃促其妻子治装南归。濒行诫其子曰：“而益善持家善事母，而自立自奋，勿我虞。而勉读文书，吾日夜望而竟吾之志以慰吾也。”闻者咸潜然泣。盖烈士致死之念已决于此日矣。时汉阳战事方亟，烈士乃披甲警携短铳，与女生数人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又屡输送炸弹至新保安，并遣同志赴西北联络以资臂助。顾事机洩漏，张家口之同志被捕者五人，杀者一人，大同诸君亦相继失败。烈士闻之痛甚，尽第一幕之计划已付逝水矣。然则烈士志愈坚，气愈奋，继又遣同志汤君至曹州招集绿林健者数百人，惟以餉糈无着，烈士多方劝募，三日醴贲一千余元。复遣汤段二君往曹州，烈士犹恐兵力不厚也，乃与同志八人赴滦州，联合军队。先是滦州第二十镇兵士，数谋举事，卒不果。是时仅余步队三营。烈士欲得之，拟合曹州绿林健者暨静海民团占领天津。又电南军速由海道北上袭据山海关，绝京奉路线，则旬日之间，北京可举也。滦州军得烈士策大忻，遂群推烈士为参谋部长。烈士归谓同人曰：“今事机已熟，俟曹州兵至，即约同滦军直取天津，静海民团则由马厂直接攻疙疸洼以牵制官军，则天津可不血刃而下，再攻北京，势如破竹矣。”部署既定，滦军忽电招烈士，约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期举事。烈士曰：“事败矣，内备未完，滦军遽动，清兵新破娘子关，其锋甚锐，若乘汽车一昼夜即可飞至，我兵单弱，胡能御

之？然溱既举事，吾义必往，若能止固善，否则誓死一战，再观结局如何。吾决不忍独置溱军于死地也。”既至溱，见溱军志不可夺，烈士相乃与议曰：“先期举事亦佳，惟兵贵神速，若再稍迟延，则恐机洩大事覆矣。”乃于十六日夜二钟乘车直攻天津。诩意汤段二君行至济南被逮，静海民团复怀观望。且清军乘新胜之气，已由娘子关调回一协，驻扎雷庄。又古冶、开平间旧屯有清淮军千余人。溱军既至，剧战四小时之久，歼敌二百余人，卒以众寡不敌，遂不支，被捕者四十余人。烈士知事不济，脱身走，思回津再谋大举。伏匿竟日，转徙古庙中，以木偶自障，饥寒困苦，虽状夫不能堪。烈士固文弱，益萎顿不支。后易服潜行至古冶被捕。前统领王怀庆严讯之。烈士自念功虽未成，然为共和流血死亦何憾，乃瞑目叱曰：“吾既为我主义而来，吾自当为我主义而死。今被逮吾何讳，吾乃北方革命军参谋长也。”又笑向诸军士演说曰：“我死不足痛，惟诸君倘不反正，今为满奴，异日且将为外人牛马，此则余之所大痛者也。”王氏又驱之跪，烈士毅然斥之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遂遇害，时年四十有四。卒后露尸于野，今其首尚未得。呜呼惨哉！烈士性纯孝，重义侠。为文有奇气，著有《中国猎夷争竞史》，拟异日蒐集刊行于世。目短视，能作迳尺书。气骨苍挺，迥异俗流，又慷慨好宾客，胸情所入，尽以资谈讌之欢。尝谓孔北海为能实行社会主义之人，其抱负亦可见矣。烈士殉义后三十余日，清帝退位，共和民国成立。吾人追其行谊，爰为之叙述于此，以俟后之有史职者观览焉。

按：先生节义文章冠绝于世，往者主吾校地理学讲席，循循善诱，每规画天下大势，尤盹挚感人，而天乎不谅，抗节溱州。同人既钦其义悲其志，开会以追悼之，复谋有以不死先生者，迺促某君著为是传，谨登于此，供众览焉。

郁崑识

（《言治》月刊第1期）

2. 郁 巍

郁巍（1890—？）又名祖述，字宪章，湖南桑植人，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郁巍曾有《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一文，记述他们之间的友谊。这里选用的《郁府君墓志铭》，记述了郁巍的家世和求学北洋法政时的情景。黄旭（北洋法政学会会员）作《郁巍文集序》，也对郁巍作了介绍。

郁 府 君 墓 志 铭

郁氏远祖居浙，唐时有刺史讳方公者，宦江西吉安府安福县，慕其山水遂家焉。嗣胤滋衍部别十三团。共居县之西乡二十部，洋溪樟树湾者，府君之本所自出也。清乾隆时，府君曾祖鼎存公，以服贾来湖南，定居永顺府桑植县之大村。郁氏居湘，盖自此始。鼎公配杨孺人，生子六。长体撑是为府君之祖。体撑公配蔡孺人，生子五。长贻聪是为府君之父。贻聪君配卢孺人，生男女子八，府君其弟四子也。贻聪公晚年喜佛，杜门茹素，产日衰落。府君年十四，即令学贾常德，岁用才二百文。补缀泔浆，胥自为之。偶感寒疾，无貲延医，偃仆床褥，听其自愈。二十二岁就贾津市，岁奉黍粟，悉以贍家。凡弟妹婚嫁，父姊丧葬，累债营画，不以怨愠。结纳戚友，尤敦诚信，数贷巨貲，不立券字。自以失学早，锐意宾接儒雅，间辄执卷，亲承讲说，默识潜究，饶具慧解。故府君虽久贾市尘，操其量赢，靡然一谐于俗。而洞彻国故，精研文字，老师耆学不逮也。津市地滨澧水，商贾辐凑，谣俗逐货导利，无志于学用儒素自奋者。府君既自悼不学，遂欲陶绳诸子为世间人。丁未，巍年才十七，以府君命留学北洋。是时，岁数不登，家又益窘。府君尽括夙储，资巍学问。戚党交游，窃谓面说谓：“君家累世业贾，秉素循分，宜式先撙，何可妄觊非誉，远揆释息，以重家屯。将名未立而先自殒

耳。”府君屹然不之省顾。月谕三、四至，督望弥厉。乌乎，疑不孝不才，虚靡岁月。学不足以副其志，奉不足以贍其家，而府君终竟于斯，曾不少待俾疑稍有就立，以庶几一日之养，宁不悲夫。府君讳纯岳，字振岡，歿于民国乙卯阴历冬月初七日，春秋五十有八，配孺人周氏，子二，长祖耀，次祖述，更名疑。前江宁地方审判厅长女祖兰周孺人，禀性柔慈，矜煦宗亲，卵翼孤嫠，匪懈益竺。自貽聪公歿后，府君债累日甚，家用恒不给。孺人则勤鍼黹，以侑餽饌。疑兄弟少时，童头始萌，孺人辄手自薙剃，不令诣市工也。衣裘敝毁恒剪裁，府君所遗，补结烂然。人或窃笑，迺曰：“袂穿襪裂此足笑耳，緼纳完好，何可笑耶？且曷观道路，彼然昂者，严冻尚单衾，举肘辄露，吾弱女子耳，不犹踰彼耶？”疑自丁未外游，每旋里及出，孺人恒泣。去春北上独不泣，疑窃喜，以为习久安之。乌乎，孰意孺人不泣者，正所以深泣耶。自今以往，欲求孺人泣如曩时，何可得耶。夫生死离别之倾，自圣哲不能愬，然以无忧。而孺人坦然处之，安恬大胜平昔，岂所谓知道者耶。孺人之歿以乙卯七月三日，盖家人云然。而疑则谓孺人之歿自乙卯之春也。乌乎痛哉。孺人歿时年四十九。歿后四月，府君继亡。遂以其年冬月二十四日，买地太平山于家棚合葬焉。疑骋走尘垢，邱莹不亲，恫念先德，征徂中宵操管，缀铭感怆无厓矣。

去岁今晨予正北上，二大人撰杖相送，词仪驩健，无几微不自得者。长途默念，窃自慰幸，未尝黯然忧别离也。孰意今岁此日，孺毫构铭，属稿适竟耶。追遡往事，停笔泣然，涕承颐矣，吾母音容自是，遂不复亲，恻夫此憾，更安穷耶。丙辰阴历正月十六日日记

（《宪法公言》，第3册）

《郁疑文集》序

澧阳郁子宪章，禀性狷介，著作尤富。其已印行者，有《中

国法制史》、《比较宪法》、《政治学史》、《政治学》、《世界经济史》、《商业政策》、《农业政策》、《殖民政策》、《货币纲要》、《法学通论》十种。大郁子尝欲撑柱天下之重，不屑以文人自处。观其所撰《慕逢先生传》，亦足以窥其意之所寄。更谛审其专门著述，及政法经济各论文，均能缜幽凿深。往往直抉东西硕学之藪，而蘄所以致用于中土，信乎其谋国之臧者，非但文人已也。顷者自京师以书至，谓将汇印其三十岁以前所为碑铭、传记，书叙之文以为集，其余论文，则别辑为论稿，以俟异日。且曰：“此次印集，即生平研究文学之见端也。子夙有同著者，其为我序之。”余闻自古文人，鲜达而多穷，穷之者，所以工其文也。以郁子之怀负如彼，而十年以来，长刑讼于南京，总财政于长沙，艰屯错午，皆不得行其志以去。比者主京师中国朝阳两大学讲席，一志学术避远政潮。岂天将困阨之使颀力于文之一途而工之耶？吁是可叹也。夫流俗聳遂虚望而不审办其实。昔左思初成三都赋，时人互有讥誉，自皇甫谧为之叙而向之非貳者，乃转志其钦慕焉。思赋城奇构，而谧尤当时知名之士也，故相得而信彰其美。若余之名与位均不显，其言奚足以转移一世之心若口。然郁子每撰就一篇，必以见遗，读之恒觉峭折邈逸，能自得古而不染近代袭蹈摹拟之习。固将倾量一言之，至于世人之重不重，在所不论也。譬如连城荆璞，历久自有定其价者，亦何必求知者于日暮间哉？虽然，此犹郁子蚤岁之所为耳，若更充其力以究极之，则其益跻于古人邃绝之境者，将可崖量也耶。

民国十年十月十六日黄旭序于云南高等审判厅。

郁崑为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一文所加的接语

按李君此文，因太息民权之旁落，欲提倡国民教育以药之，所见极是。夫共和为政，非徒以其名也。若以其名，则自武汉起义以还不踰两载，南北统一矣，各国有承认者矣，正式国会已开院

矣。中华民国宪法及正式大总统，亦将此次制定选举矣。过斯以往千秋万岁，吾国民所以熙熙于共和幸福之天者，将长此不替，乌鳃鳃于民权旁落之足惧，而李君此论不且等于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矣乎。设其不尔，则吾国民固将求所以承受此幸福之实力者，而此实力之有待乎教育，又恣睢暴戾之俦所不能吾斥也。试征之日本，彼非君主立宪国耶，然其人民以教育完备，政治能力优实之故，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不敢毫末违民意以自便。是彼之民权，自法律上求之，削弱褊狭尚不得与于旁落之数也，而一自政治上考索之，则日民之各挾其天赋之禀能，以实际主持国政，而赫然圣神之天皇，翻若退处客位，其民权之威，駸駸然拟于共和国之实状焉，削弱褊狭云乎哉，旁落云乎哉。吾尝以为国于天地，名固不可不求其胜，名胜而实不至，则毋宁实胜而名劣焉，日本实胜于名者，吾国则适得其反。呜呼，此吾所为兢兢然欲吾国革新诸伟人，各本其争政权逐功名之热忱，以谋国民教育之发达，与李君同深致其无涯之愿望也。顾摧专制之淫威，而更以共和之美名，其事较易而使吾民所以具备承受此美名之实力。为道则大难，盖绝非可以一、二伟人，填腔热血，怀手枪掷炸弹，所能摧枯拉朽，而集事俄顷者。譬之败庐焉，将欲破坏之也，引火爆发，寻归煨烬，将欲更就原址构新庐焉，固非广萃技工，溥集棟木，蚤莫将事，而限之以年日，不能告厥成功也。审此则破坏虽唯激烈骤进是赖，而建设之工，非假以岁月，期以久渐微，第中土民智至不齐一，未可以骤进而速化，即凡百设施集材鸠工，耗日销时，亦不能不出之以稳健，由徐进而浸观其后者，所得收全功也。然自民国成立后，彼一、二桀骜者，藉口于政府之腐败，民权之不伸，犹日倡言革命，不悟政府之腐败，根于民智之未充，民智之不充，病在教养之未至。果其存心在民，则以其倡革命、诟政府之毅力，勉谋国民教育之发达，而异日所以掊政府之淫威，易腐败为文明者，固自有在二次革命也，激进图功也，举非吾所望于当世之士夫焉。再鄙人对于兹事，所怀尚

多，他日当专构一文，以摅挥之，兹因诵李君文，聊发其端，未能详也，郁疑附识。

(《言治》月刊第8期)

郁疑为李大钊《弹劾用语之解纷》一文所加的按语

按李君以弹劾一语，宜专用于法律问题，与鄙见极合。惟此制度、实创自英伦，而考英人之用意，则不仅限于法律问题。如千六百七十八年弹劾之例，乃以扰害公益为理由，与吾国临时约法于违法之外，复赘以失职之文者，同一失之广徧也。故当去岁张方案起，参议院中弹劾之声，震屋发木。时独立周报记者秋桐君，方司笔政上海民立报馆，颇著论非之，以为此乃行政过失，无施行弹劾之理。自法理上言，秋桐君所论固自不刊，若自法律上言，则约法上既有失职之文，参议院诸君实无可议也。原夫英人设立此制度之意，盖恐行政部大权在握，流专制，故予立法部以裁制之之道，使行政部常负法律上之责任，有所顾忌，不敢自恣耳。不知法律上之责任，乃形式的，其外观固未尝不美，实则虚文耳。昌以言之，盖在行总统之国如美利坚者，其行政部政治上对于国会不负何等责任，国会亦无得而摇动之，是行政部之流于专横也，为势甚易，故法律上特设弹劾制度以为裁抑之道，即国会除依宪法上弹劾制度推测行政部外，别无他途以动行政部之微末也。若是则弹劾制度之有造于美国也綦巨，然吾既言之矣，法律上之虚文不过形式的，藉议会无实力以举之，彼弹劾条文固无如行政部之专制何也。兹弗远征，前清资政院弹劾庆内閣之章凡数上，彼固未因此放免也。即退一步言，议会能有实力以举此矣，然而弹劾后行政部非必即因此解职也。尚有待于裁判，而此裁判之能否保其公允，即属一难问，以居行政要冲之人物，忽使匍匐法庭受有罪无罪之审问，则人心惶动，必且引起举国之骚乱，而国政因以被其丛胜者又不知凡几。以美国实例言之，美自

立国以来，其大总统因议会之弹劾而退职者仅一乔恩生。然按其裁判之程序，则极不合法。盖美制大总统为下议院所弹劾，而上议院即具法院之资格，以国中最高法院之大审院长为审判长而讯问之，决为有罪须得三分之二之多数投票，罪既定，即不得再受官职，而使彼依法律受告诉审问判决处刑等事。乔恩生之被弹劾，经上议院裁判有罪而退职也。其与彼素立于反对地位之上议院中，且有议员数名主张无罪放免，即当时主张有罪者，其数亦未及三分之二，则甚矣弹劾权议会虽有实力以举之，其施行之公平又至不易也。若夫不课行政部以法律上之责任，而施行弹劾制度，但以政治上之手段，实制其死命而有余。如日本者，其宪法上固无弹劾国务员之条文也，然而内阁屡以议会之不信任而迭更，既无组织裁判所审问判决之繁缚，复无不足以撼动内阁之实力，所以然者，则政党内阁之制有以致之也。呜呼，今之兢兢然防政府之专制者，不务于政治上求所以防之之实力而徒齟齬于法律上弹劾之虚文何其值与。因读李君文，心有所触，遂不觉累幅，若其详则请参观本报拙著《解散议会权与弹劾权》之文可耳，三月十六日郁巖附志。

（《言治季刊》第1期）

3. 白 坚 武

白坚武（1886——1937年）原名见五，字馨亚，亦作惺亚，河北交河人，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北洋法政学会评议部部员。在请开国会运动中，与李大钊同被推为学生代表，也是《言治》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白坚武毕业后历任教员、江苏督署参议、巡阅使署政务处处长等职。李大钊早期与白坚武关系十分密切，并通过白坚武做直系军阀的争取工作，“二七”惨案后断绝来往。1937年底，白坚武被冯玉祥以通敌叛国罪处决。

白坚武自述小传

白君坚武，直隶之交河县人也，现年三十八岁，前清拔贡，毕业法政大学（即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编者注），长文学，精研法理。民国二、三年，尝膺教授，笔政等职于京津。时新旧抵峙，创制施政，朝野恒各有所趋。公秉公抒议，时论多翕服。帝制将作，屏绝论政四年。项城闻公名，托某参议示意赞扬帝制，愿重酬。公避上海，间参冯河间戎务，帝制倾覆之速，公隐与有力焉。五年任内务部部曹。后辟作，膺赣督李纯敦聘南下。频岁李领袖长江，公恒有建白。然李迟慎不能尽用也。七年，蓬莱吴公佩孚，以师长统三混成旅，驻节衡阳。海内骚然，京枢议和，战久未决，公受李督囑，再往商国是，与蓬莱识自斯始。京保之战也，群督多儒为壁上观，顾公谓李督曰：“公谋国数年，言恒无效，今宜合师，有以自见勿失。”时江宁齐镇守使燮元，亦魁斯说，迭进争之，李改容称谢，意终犹豫，公遂因病归里。十一年，梁士诒挟关外力组阁，物议沸腾，蓬莱电约莅洛，咨询应付。奉军既败，集议统一善后方策。有为国民会议说者。公言海内涵之，定策应速而易行，国民会议名虽美，僻阂弗易集缓。且债事复法统转移闻事耳。名既定，反侧者纵不一附然，亦无资矣。蓬莱毅然主之，议乃定。公奔驰国事久，周知各方情伪，至斯乃尽瘁筹计，一切函牍，亲自草定，晨五时兴，二、三时息，口讲手披，几无停晷。方事之亟，交契环视公日在危疑震憾中，数以书劝缀公，夷然弗之。顾及秩序大定，表功者载途，公独缄默，隐退遗外。世俗凡君子，殚精毕力于一事业之成，顾其外被于国内返于中者，何如耳区区一日之名，盖有以知公之不屑计也。自法统之复，西南群帅渐渐来附，蓬莱亦坦诚相示，无夙昔畛域之见。公复左右循掖之接晤者，乃群为悦服矣。蓬莱果断刚明，主持国家大计，辄疆毅弗屈。公酌剂献替，悉处以中，蓬莱倚为左右手，俾总持政务，公亦周详勤恳，裁决当世之务，如列

掌无遗。顾公恒与人言，世变之剧，逾前古攻守，因应纵横之略，此犹标节之需，若夫国家百年大计，镜往测来，希所谓政治清明者，尚须有待，犹非今日所可语。然则公所抒发，或犹未尽，公百之一欤。公性沈毅，简远弱冠，慨然具澄清志，待人接物，坦和易久而弥笃，平生无急言遽色，遇大计勇于负责，不为非礼所动，尤爱奖掖士类。蓬莱在军中久治事简易，开府后赖公时为招掖材俊，草创规制，东都多材，遂为中外所称。公清介不苟取，刻励自持，然施与从无吝惜，闻名者金期为平民政治家云。

（《白坚武日记》1924年9月2日）

余之过去回忆

（过后追忆，年月不免讹误，志梗概耳）

（前面原文残）

九岁别母去常家庄故里，随父亲赴豫读书，侍祖于陈州府之径（后原文残），为本州陈姓先生。同读者系锦波四叔、履中二兄、惕之三兄、萼辰四兄、芷（原文残）。十岁课读者为蒋姓先生，豫随州人也，教法甚恶劣。时余读书微有进（原文残）。十一岁课读者为定兴李竺斋先生，启蒙辈中最爱余颇得法，学作诗文。斯岁母亲偕二姊南来。自九岁以来抵兹，三纪始与母见。十二月冬雪寒酷，母姊随父赴开封，家庭痛苦甚深。

十二岁以祖母病不能照顾，随姑母赴开封，依母以居，同行者有芷生表弟。时父亲幕于洛、荒嬉半载，废业以居，非祖重召返陈，结果殆不可问。

十三岁春二月返陈，重侍祖于府。经新课读者为韩孚思先生，进境甚速，□读颇自奋。

十四岁日□攻苦，尤嗜史籍，人以书痴相目，轮作策论、古诗、试帖、词等，五日一课。

十五岁清政府变法，废八股。祖为捐监，首乡试。

十六岁四字号乡试，房荐批甚美、房主系满人，景姓，觅落卷犯某主考先讳，此亦野顽时代可笑事也。十七岁再乡试、房荐系湖北张姓。

十八岁回里应童试。县试为刘光初先生所知列首。府试亦列首，府系丁春农。院试列首，院考主陆宝忠。斯岁九月赴保定，住三、二月，拟考入武备，得祖谕促回陈，此行徒为亲友捉刀。冬月抵陈，始悉二姊逝世，悲痛累月。十九岁欲赴湖北张南皮处习陆军，南皮复祖书报可，未策行。二十岁（原文残）祖危病幸愈，无事习诗词甚多。二十一岁由陈赴孟津，省文来京师。八月至津，优试初（原文残）

二十二岁孟左丞庆荣介绍，充求实中学校教习。六月赴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辞教（原文残）先生介绍与崔维培女士订婚约。斯年七月入法校。十一月酱油风潮起，回豫省亲（原文残）

二十三岁正月回校就学。廿四岁迫于亲命，复为冯妇考投，攻者四起，卒得督学会考列之，事后阅总阅卷，此为丁春农先生自十八岁以来，固未通问讯也。

廿五岁伏期来京期考，落二等。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回故里省祖父母，闭门十日作小说二本。

廿六岁过保定与崔洁芬女士结婚，未度蜜月，仅团圆十日，先后赴津校。六月赴许昌省母，间中作小说一本、卖之《国民公报》，以为校中零用，竟为所欺，权利失。约八月武汉首义，偕洁芬夫人返故里，余再返津，奔走于秘密团体者再，品德杂甚不足语。十一月，召洁芬夫人来津同往许昌。

廿七岁民国开幕，七月洁芬毕业，充本堂教习。斯年老姨太太病死于豫，祖母亦先二年终。民国二年六月毕业本科，充冯上将秘书，南行、与揽权二、三同事不合。八月归津，五月波参政，约来京，在《黄钟日报》充任笔政。

民国三年以高静涛约，充法校宪法讲习。六月后来京常住

社。斯年小女静兰生，父母回故里。

民国四年某会起，辞记者席。沪中国公学电约未果行，以孙念生、周国屏两君介绍来京，任自治筹办所第二课长。

（《白坚武日记》第1册）

4. 陈翼龙

陈翼龙先生奋斗史路

陈翼龙先生，一字意农，湖北罗田县人，生于1886年（前清光绪十二年）。幼聪颖，有大志，年十五有澄清天下之愿，嗣奔走于湘、鄂、苏、赣各地，意在纠合同志，以图起义。其时民气未开，聆先生言论者，率目为狂悖，弛驱数年，迄无所遇合。1909年赴沪，任《神州日报》记者，以文字鼓吹革命，得与宋教仁相识，宋为介绍赴日本，与孙中山、黄兴相识，遂投身于革命事业。

武昌起义，南北和议告成，先生深恨袁逆巧夺政权，人民痛苦更日深一日。于是先生抱定非倒袁无以言革命，非团结广大群众实行社会主义，不能使革命彻底，遂于1912年来京，创立中国社会党，宣传社会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以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实施方针。佐先生办理党务者，有李志云、程家桧、吴鹵弢、王劲闻、吴天民、曹福荫、曹百善、李念农、钱培业、曹嘉荫等，进行筹备，征集党员，参加者日众。复由钱培业与曹嘉荫等分赴各报社、工厂、各手工业作坊，宣传社会党党义，征取工人学徒入党。不数月，已有党员七百余，而内部亦已筹备就绪，乃于8月18日假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党纲，选举各部干事。先生当选为总干事，卢信公、李志云、程家桧、王劲闻、吴鹵弢、曹福荫、曹百善、钱培业诸同志当选为文牍、交际、庶务等干事，曹嘉荫亦被选为会计干事，与先生常川驻党办事。是日在会场上临时要求入党者

约二百余人。每届开会，先生对于袁政府之专横，痛加指摘，闻者动容，因此大触当道之忌。

旋复创立法律书报社，发行《生计杂志》，由李念农、曹福荫等任编辑，以文字宣传社会党义；又由温雄飞在京创刊《公论杂志》，先生即借该刊为本党宣传工具。

此外，先生又于是年10月复至天津组织中国社会党支部，留曹嘉荫在京创办平民学校。

1913年2月，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推选李大钊先生为总务干事。先生旋即返京，而平民学校亦筹备稍有眉目，并已约请张星华女士为校长，郭雪岩、朱雪岚等任教员，复由张星华介绍杨宝峰、田××至京任教。

中国社会党先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湘阴会馆内，因学校需房较多，不敷应用，乃于左邻圆通观内租得旁院一所，将党部迁入该处，而以原址专供学校之用，党校比邻，呼应颇便。

平民学校招考学生四班，共一百二十余名，完全免费受读。所有教职员均系党员兼任，不受任何报酬。惟是学生书籍纸笔，以及房租、伙食等，所需不貲，校中既无基金，党中又无此款，全赖先生设法措垫，计自开学至暑假，已亏欠逾千金。先生思欲南下为学校筹募基金，俾得添设中学，以维久远。适二次革命已将爆发，先生亟亟赴沪，与当地各民党联络，经推先生返京相机活动。先生正以党校两方亟待支持，乃不顾艰险，毅然于7月18日乘轮北上，22日抵天津，当晚乘火车来京，同行者尚有中国社会党扬州部主任干事、扬州女子公学校长郭坚忍女士及其女公子。抵津后，郭等因事少留（因张星华女士即将赴法国游学，故约郭来代之），先生一人独返，至京已夜10时余。

次日（7月23日）下午2时，京师警察所侦辑队多人将党校包围，时先生外出未归，即执曹嘉荫以根究先生踪迹。旋由监守校方警探于车夫口中讯得线索，在宣武门外烂漫胡同朱永刚同志寓中将先生逮捕，当即解往警察所，至7月28日，复转解至军

政执法总处，以毒刑讯审。

8月6日上午6时，先生被枪杀于宣外老墙根玻璃公司荒野空地上。次日，袁逆世凯以大总统令飭各省主管将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一律查禁。未几，京师警察所会同学务局，亦将平民学校勒令解散。（曹嘉荫（祥之））

陈翼龙烈士事略

陈君，湘籍，世居江苏，或言苏人也（按：这与曹嘉荫先生所说及报中所载不同，更无其他资料可证，姑存其说）。生而颖特，慨然有大志，辛亥革命，多所尽力。

迨清室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乃注意于社会事业。陈君固抱社会主义者也，至是始奋然欲致力于此途，旷观东西各国，凡欲实行其主义者，必先有党，而后可以图成，非可骤然收效也。

无何，爰于北京组织社会党北京总部，该党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宗旨，国家主权，仍在于国，于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吏之设施无害。本此宗旨，纠合同人，矢志进行，往来京津间，凡阅月，成效卓著，志士景从者日不绝，然而官吏忌之特甚，尤以天津警道杨逆以德为最，时加干涉，陈君之志不稍阻。

党既成，不能空立名目，而无实事，因思创立平民学校，附设于南横街社会党内，招集贫家子女入学，开通社会风气。学校虽已成立，苦无资金，延请教师、亦属困难，兼以贫家子女，其父母素乏家庭教育。此校既以开通社会为宗旨，从根本上设想，固宜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并施，当以女师为宜，且须热心社会事业而能尽义务者。

适有张星华女士，是时辞天津高等学校教授，到京入留法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陈君急敦请女士为校长，尽此义务，且恃女士联络众女师。女士念自身在学校，无暇及此，固辞不获，不得已，允兼之。吾是时住国子监南学地学会旧址，与留法预备学校比邻，女士以乡谊故，常聚谈，陈君因亦莅吾住所，与女士筹划

平民学校事宜，吾之识陈君自此始。

每与陈君谈，辄论世界大势，贫富不均，智慧不齐，必须提倡社会主义，大多数幸福庶乎有企及之日，慷慨淋漓，闻者莫不钦佩。

自后陈君专任筹款，学校赖以支持。张女士于6月上旬束装赴法，学校事陈君一人揽其成，熬费苦心。至暑假，经费无着，下学期用费不能不预为筹划，典当衣服，得洋数十元，半留住校教员膳费，半作南行川资之用。陈君之南往也，虽值宁赣兵兴之时，然吾知确为社会党及平民学校谋进行方法，与他事固无关。孰意祸变莫测，遽殒哲人，此行即为杀身之媒。

君甫自沪北返，暗探已随其后，疑君为北来谋害政府之人，尾至京华，即于到京之次日被捕。平民学校教员等，固早盼陈君之来，以支持学校也，闻此恶耗，众咸愕然。且学校以陈君之存在为存在，皆欲营救，希图解免。吾为具保状，署名者二十余人，请释无效，闻系杨以德借邀功以诬君，袁世凯素视民党如仇，亦利此以害之。君就义为癸丑（1913年，即民国2年8月6日事，社会党亦受伪令解散。君临刑时，其家属不知，同志亦不知，暴尸于市，次日犹有注观者。呜呼烈矣！君年二十有八，无子女，昆仲不知其详。

陶秋士曰，陈君之待人也诚而笃，盖一本其博爱之心，亦社会主义之原旨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情世界，固不容哲人久矣，夫复何言。吾生也如处五里雾中，转转大地，无处光明，陈君为主义而死，死又何憾。然而吾闻法兰西昔年有社会党员巴褒福者，固抱极端共产主义者也，壮志未酬，赍志殒地。自是而后，广陵绝调无复嗣音，法兰西全境二十年，无有齿及共产主义四字者。陈君之主义，亦将有此状态。继起无人，吾知陈君之死难瞑目矣。（陶秋士）

（《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回忆陈翼龙先生

我和陈翼龙先生虽然肝胆相照，但他写信或写文章，往往都是在夜间一个人关上房门去写。他是1911年来的。相传他一度出过家，大约如苏曼殊一流人物，当时我未便问他，至今还是一个谜。

自李大钊先生和他见过面之后，甚同道同志合。因为李大钊先生常居天津，为便于推行党务，遂决定在天津成立支部，请李大钊先生去负责；李先生又介绍一位郭须静先生，共同工作。天津支部成立，是在1913年1月，支部地点在天津东马路崇仁宫。

平民学校是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为推行党的工作而设立的，地址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圆通观西隔壁湘阴会馆内。后来党和学校都有发展，房子不够用，又租到了圆通观，遂把党部迁到圆通观内。

陈翼龙先生注意女子教育，妇女界先进分子有很多人参加了社会党。经张星华女士介绍，杨宝峰女士也加入了，还参加了平民学校的工作。杨宝峰并担任着推行党的工作，她来天津，携带着女儿邓文淑（即邓颖超）。那时邓文淑年不满十岁，也在平民学校读书。平民学校课程中，规定有讲话一门，是由陈翼龙先生亲自担任的。先生喜欢讲些以古证今的故事和先哲格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理论，也是他所爱讲的。

1952年，邓颖超同志知道我在北京，特来访我。她追想起陈翼龙先生常向学生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道理，至今还能记得。我保存着的一张学校开恳亲会时的摄影，其中有陈翼龙先生，杨宝峰女士带着邓文淑，以及当时一部分同志。这张照片，曾给邓颖超同志看过，是颇可贵的资料。

陈翼龙先生所首创的中国社会党总部（后来改称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能在四十年前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出现，并且首先创办了平民学校和世界语学会，总算是一件奇迹。他后来终于被袁

世凯杀害了，也可以说是为争取自由、平等、博爱而牺牲的，今后研究近代史者如能予以记载，使陈先生得以不朽，那是我最盼望的。

当社会党总部和平民学校被禁封的时候，我事先把一些文件、党章及党员名簿集了一大包，由我自己保存，同时又把党章及陈翼龙先生的文字和党徽包了一小包，交给杨宝峰女士，请她保存，留作纪念，并对她说，将来或有复党的一日，可以作为根据，所惜经年太久，杨女士的一包已不知去向，而我的那一包，因怕被反动势力发现，放在房子顶棚上，有一年裱糊顶棚，取下来一看，已湿成一块，揭不开页了，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事。

我曾经把陈翼龙先生的事，凭记忆所及，写了一些给邓颖超同志。关于陈先生的一些进步思想行动，有人认为在那时是不可能有的，其实未免过于主观。我是曾经参加实际工作的人。我觉得陈先生一生为理想奋斗牺牲，社会党中同志，也有很多人遭受颠连困苦。这些先进创始的功绩还是不应使其泯没的。

一切文件已然没有了，现在所存的，还有陈翼龙先生被捕前一夕写来的一封信和他随身防卫用的刺刀，中国社会党章、中国社会党和平民学校纪念日的照片，以及所剪存的当时记载陈翼龙先生被难经过的报纸。

陈翼龙先生被枪杀，是在宣武门外老墙根旧玻璃公司遗址前，被枪杀后，便就地埋葬。早年该地一片荒凉，七七事变前，每逢清明，我尚去凭吊，后来标识已找不到，近年兴建房舍，更找不到陈先生坟墓的痕迹了。对于中国社会党历史有关系的，现在南横街东口内路南的圆通观，尚依然存在。

回忆1913年的冬天，我在京参加办平民学校。有一天，我在先农坛举行的南北统一纪念会上，会到张星华、郭雪岩、朱雪岚诸女士，她们都表示要来参加办学办党。又由张星华女士介绍杨宝峰、田××两女士参加了中国社会党。1913年正月，陈翼龙先生由天津回京，又请来朱永刚、朱永柔、冯绍贞、郑璧、王振亚、

劳相，王惠、沙幕新、陈心、吴勿秋、吴织文诸女士来京参加平民学校教学工作，办事人则为李志云、钱宝亨、曹百善、谈永年、曹绥之。大家都是义务职，为主义而努力，不料仅及年余，便烟消云散。（曹嘉荫）

（《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5. 吉野作造

吉野作造（1878—1933年）政治学者、思想家。宫城县人。东京大学毕业。1906年（明治39年）应袁世凯聘请任教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9年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欧美留学后任教授。大正初期登上论坛，他的许多论文，包括1916年（大正5年）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论宪政本义及其贯彻之途径》为大正民主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吉野主张民本主义，提倡实现建立在言论自由和普选基础上的政党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此，主张改革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机构。1924年进朝日新闻社积极发表政治评论，因笔祸而退社。后创立明治文化研究会，研究明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编辑出版《明治文化全集》。在这期间，还致力于成立东京大学新人会、社会民众党。

6. 今井嘉幸

今井嘉幸（1878—1951）爱媛县人，法学博士，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普选运动的闯将。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与吉野作造关系亲密。1908年2月，经吉野作造推荐，到天津北洋法政学校任教。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交往，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回日本。回日本后，在大阪从事律师职业，并从事著述，研究中国问题。1916年春，应蔡锷之聘再次到中国，曾为广东军务院法

律顾问。1917年回日本，为日本“日中国民协会”成员，同情中国革命党，主张以大亚细亚主义为基础，建立日中亲善联盟。后为日本政府“中国通”议员。有《支那国际法论》第1卷、《建国后策》等著述。

三 留学日本

述 要

留学日本在李大钊一生经历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立世之始”。（《晨报》1927年4月30日）据李大钊自己说，他到达日本的时间是1913年“残冬风雪”之时，（《李大钊文集》（上）第88、95页）换成阳历应是1914年1月。到日本后他住进东京牛込区下戸塚町五二〇基督教青年会内，即早稻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内。该处现在的准确地址是：西早稻田2—5—2，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信爱校舍处。”从早稻田大学向南步行约500米，登上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坡道，一幢欧洲风格的教堂式三层建筑立即映入人们的眼帘……当年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就居住在这里。”

（《北京日报》1982年6月28日）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现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1914年1月至9月8日。这一时期主要是他为进入早稻田大学作准备的时期。

由于刚到日本不久，他基本上是“问难无地，索居寡欢”，活动自然不多，目前收集到他一些点滴史实：2、3月间，在东京拍了一张身穿日本和服的全身照。这是迄今发现的李大钊在日本出现的最早活动纪录；春，到东京旅舍会见今井嘉幸先生（《李大钊文集》（上）第125页）；春，参观位于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的“游就馆”（《李大钊文集》（上）第122页）；春夏季，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内学习英、日语。当年的英文教师美国人瓦卡阿瑟·鲁宾逊保存了李大钊学习时用英文写的《我的自传》；春夏季，在东京小石川林町会见章士钊，“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

之礼意而开始”；在《甲寅》杂志发表《风俗》等多篇文章；6月以后，关照汤化龙之子汤佩松的学习等。

第二时期：1914年9月8日至1916年2月2日。这一时期是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期，同时积极参加反对“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未经预科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第一年级学习。从9月8日至1915年7月5日为第一学年。这一学年，李大钊完成了学业的全过程。该学年于5月27日停课，5月28日至6月4日复习，6月5日至15日考试，而这时，李大钊一方面以极大精力从事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一方面必须接受学校规定的十二门课程的考试，而且一门也不缺考，确属难能可贵。

1915年9月，李大钊开始了第二学年的学习。因讨袁事，他于1916年1月底回国到上海，两周后返回东京。2月2日，学校当局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所以，第二学年的实际学习时间大概只有四个多月。

在早稻田大学，给李大钊上过课的教师多是日本著名人物。如：大山郁夫、安部矶雄、美浓部达吉、天野为之等等。

这一时期除上课外，在课下他也是抓紧时间，精读每天的报章新闻，阅读各种书籍杂志。如1920年6月，李大钊捐赠给北大图书馆的大量而种目繁多的日文杂志，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其中，1914年至1916年上半年的部分，显然是他在留学日本期间订阅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在课下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大量知识。

1915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进入高潮。2月11日下午，留日学生两千余人（一说三千余人）在神田美士代町青年会馆冒雨举行大会，号召朝鲜举国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大约在这前后，成立了留日学生会总会。但到2月底3月初，留日学生会总会在袁世凯政府摧残下被迫解散而停止了活动。

李大钊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的全过程。2月11日后，他受留日学生总社之托，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认为，现选入本书的《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有很大可能也是李大钊写作的。“因为，第一，李大钊任留日学生会文书，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从而他可能写该传单；第二，关于中国免瓜分的原因，李大钊重视‘均势’，与该传单重视‘均势’一样。”（《后藤延子1984年12月6日致杨树升函》）

留日学生总会解散后，李大钊仍然坚持斗争。3月，再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书。4月，与同学张润之合译今井嘉幸博士的《中国国际法论》一书，由健行社出版发行。直到6月，他不顾已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

8月23日，筹安会的正式成立，表明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公开化。留日学生“奔走呼号，谋所以挽救之方法”，酝酿恢复留日学生总会的活动。但由于这次对袁的认识、斗争目的极不统一，到年底也未能建立起留日学生的统一组织。

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起而讨袁，这推动了留日学生的斗争，1916年1月16日，全体留日学生召开紧急大会，恢复了留日学生总会。2月2日，总会正式成立评议、执行两部，李大钊被推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机关刊物《民彝》。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曾先后组织了两个留日学生总会：第一个于1915年2月为反对“二十一条”而组织，第二个于1916年1月为讨袁而组织。若把前后两个混同于一个，自然会把有关史实搞错了。

第三时期：1916年2月2日至5月上中旬。这一时期他离开了早稻田大学，积极从事留日学生总会的工作，进行讨袁斗争。

李大钊于1916年1月底因讨袁事回上海，在上海滞留两周回到东京后，得知他已于2月2日被学校当局以“长期欠席”为由而“除名”。这样，他从此离开了早稻田大学，全力进行讨袁斗

爭。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有：筹备编辑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创刊号；与李墨卿等组织的爱国团体——神州学会正式成立，该学会成员多为留日学生总会骨干，定期举行讲演，讨论祖国政治与世界大势；组织中国经济财政学会，为责任会员。该学会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同学为骨干，“以研究东西学者所述原理，调查国内现行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之时，写作了《青春》一文；在樱花节中脱稿《民彝与政治》一文，该文表明李大钊形成了他特有的民彝思想。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据考证，他主要受到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6年“四五月顷”，（《李大钊文集》（上）第311页）李大钊离日本回国，于5月3日至19日之间到达上海，（《白坚武日记》第一册）结束了他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他“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狱中自述》）

(一) 留学初期

1. 中国留学生会馆

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可是当留学生到了日本后，由于彼此有着共同的利害，便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也就感到有团结起来的必要。既然需要团结，就要有大家聚集的场所。在清末时期，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民国以后，有中国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简称中华青年会，又称青年会）。

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2年建成。在这个会馆出现以前，初期的留学生有所谓“励志会”的组织。该会会员有范源廉、曹汝霖、蔡锷、章宗祥等，都是留学生的领袖。其后，以这些人为首脑，并得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的协助，留学生会馆遂告产生。馆址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现在的骏河台2丁目3番地）。沿着从水道桥车站向御茶之水车站的沟渠的内侧山坡（皂荚坂）的顶部，隔着沟渠可望见本乡一带的人家。在皂荚坂的那边，又可见到小石川，牛込方面的人家，正对着的是九段台地。日语教师松本龟次郎描述如次：那座建筑物有两层高，正面至少有五间（三十尺）之宽。纵深我想是在8至10间之间。正中有走廊通过。楼下设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多种房间，二楼则是教室。“在这座建筑物之旁，另有一户门牌细小的家。住着一个姓细川的男人^①兼做传达工作，又推销这里出版的书籍，生活过得颇为写意”。^②

这里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它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

① 细川，即细川小三郎。

② 鲁迅：《朝花夕拾》第61页。

等，更是留学生书刊的翻译和出版的总部。

松本龟次郎在《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指出：

在今日的中国青年会会馆设立之前，留学生用这里作为集会的唯一的场所。

关于留学生的公共事物，常在这里商议决定。譬如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以及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运动的有关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来自中国的视察人员抗日时，也会循例会晤这里的干事。

会馆的干事除了协商处理在日本发生的问题外，对新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加以照拂。《清国留学生会馆招待规则》有如下的规定：

- 一、东渡留学之士，因人地生疏之故，本馆特设专门部门，代为招呼，凡致函本馆者，本馆即尽招待之义务。
- 一 招待之地方有二，一在横滨，一在新桥。凡由神户上岸者，本馆之干事当至新桥招呼。由横滨上岸者，本馆之干事，当在横滨招呼。其于神户、上海、天津三处一律有本馆之赞成员，代为经理。即：
神户 冯悦甫君 神户市山下町清国领事馆
神户 孙实甫君 神户海岸仲通清商盛源号
上海 王培孙君 上海大东门内育材学堂
天津 张亦湘君 天津玉皇阁前日日新闻社
- 一 各省之东渡留学者，固可至本馆赞成员所在之处就询，并购买船票。一切情形，可于动身前七日先行致函本馆，以便于该日前往招呼。
- 一 取天津航路至神户登岸者，船抵长崎后，发函致冯君或孙君。言明乘坐何船，何日何时可至神户也。至时，二君代为照料，于神户易车之后，可托二君代为电知本馆（电费约二一三角）并车于何时抵京，本馆干事即至新桥招呼。

- 一 取长崎航路至横滨登岸者，可由长崎或马关致函本馆，谓船于何日何时至横滨也。届时，本馆干事即至横滨招呼。
- 一 东渡之士，行李物件，极力以少带为便。其烟、酒、绸缎各项入港时应课税者，决不可携带，以免多生枝节。
- 一 到京之后，或入预定之学校寄宿，或暂寓旅馆，一律听本人自便。
- 一 本馆招待干事之一切费用，一律由本馆公款供给，至其本人之一切费用，则由本人自理。
- 一 本馆各处之招待人员，若有更动，当随时登报申明。

这些工作，一直都进行着。

会馆的二楼是教室。时常有日语讲习会的开设。泰兴、葛梦朴合编的《东语简要》的封面就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出版”的字样。

会馆有时也有跳舞的练习，试看鲁迅《藤野先生》的记载：

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①

鲁迅对此事，虽然不大高兴，但他显然也同意这是留学生的出版本部。

建此会馆的励志会会员，本来已创设了译书汇编社。此社既编印杂志《译书汇编》，又出版了很多书。开始时，是以东京牛込区喜久井町20番地和东京本乡区丸山新町19番地两处作为发行所的；但《译书汇编》第2年第三期（封面是3月号，封底内是明治35年6月发行）的“代派所”（即经销处），则是清国留学生会馆。（到了1903年的旧历正月初一日，留学美国的严一所著《进化要论》出版时，就由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此可知这个社已迁到留学生会馆去）。

^① 鲁迅：《朝花夕拾》第61页。

继《译书汇编》后有《游学译编》，其发行所是湖南人组织的湖南编译社。《游学译编》第六册（1903年3月）封面里有特别广告，说：

本社编辑部现移置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凡有意惠函请迳寄此处为禱。

在这册的通告中刊出了《劝同乡父老送子弟航洋求学书》一文，长达25页。可说是较会馆的《招待规则》更为亲切周到。

在这杂志中所见的会馆名称并不一致，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支那留学生会馆、中国留学生会馆等三种称呼；而其他刊物亦有类似的称呼，但以称清国留学生会馆者为最多，大概这是当时正式的名称吧。

自始即以留学生会馆为发行所的有福建留学生组织的闽学会。此会亦有发行单行本。

湖北法政编辑社亦设在会馆中。出版讲义式的《法政丛编》24册，及其他刊物。

早稻田大学学生卢弼等于会馆中设政治经济社，翻译出版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书。

留学生会馆不仅是这些团体的根据地。个人刊行书籍时，亦多以此会馆为发刊所或经销处，不能一一尽录。

留学生办的杂志《江苏》和《湖北学生界》（后改题为《汉声》）的出版部都是留学生会馆。这虽是地方性的杂志，但事实上它们的水准却比中国国内的杂志还要高，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大量购买这些书和杂志后，兴冲冲地走下皂荚坂的留学生中，鲁迅也是其中一人。这些书刊藏在他们的归国行李中，流传到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将新文化的气息传遍中国。

清国留学生会馆就是这样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05年，当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发生之时，各省代表曾于12月3日在这会馆中商议对策。由于日本政府当局拒绝了留学生的要求，

留学生决议集体归国。在12月24日发出的“总会公布”中声明：因为一齐归国，已将留学生会馆移交屋主。但翌年又因很多留学生重返日本，会馆得以仍旧继续维持下去。不过，会馆的结束的原因，却已蕴藏在这次事件中。

日本既然独占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西洋诸国自感不快。在那时候发生了这事件，各国当然拍手称庆。在事件初起之时，美国政府已通过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进行活动了。该协会派出赖安博士及张佩之前赴东京，在美国驻日大使协助下，对清国驻日使馆及日本各学校的留学生人数、学习情况及生活情况等展开详细调查。1906年春，在神田的日本青年会馆中有华人青年会的组织，此即后来之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

该会因教授英语，吸收了很多会员。1907年，在早稻田设分会。1910年，更脱离日本青年会馆而独立，设本部于北神保町，从此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本营。

另一方面，从出版的书籍刊物来看，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最盛时期是1906年。到了1907年，会馆出版的书籍却只有《最近统合外国地理》（山上万次郎著，谷钟秀译）和《东语简要》第四版两种，似乎都是无关重要的书。约在这一年的前后，皂荚坂上的清国留学生会馆似亦由衰微而至关闭。以后，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成为留学生聚会的新场所。

在大正时代，北神保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中华青年会馆），成为中国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款，反对西伯利亚出兵和反对日本其他的对华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参谋总部。

会馆虽毁于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但不久即行重建。原有的会馆似是三层，重建的却是两层和木造的。楼上是宿舍，楼下则有讲堂，食堂及留日书店、洋服店等。讲堂还时有留学生的戏剧表演。又根据食堂的规定，除了特定的菜肴外，馒头、米饭都可无限制地取食。留日书店中有许多中国的新刊书和杂志发售。

这个青年会在1935年1月8日失火焚毁，在来不及修复的期

间内，中日两国已卷入了那场不幸的战争之中。

(实藤惠秀：《增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67—173页)

2. 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 和欧美教师的大批东来

自1905（明治38）年日俄战争之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起来，很快达到一万余人，当时日本人对他们都很冷淡。这年冬季，张佩之等人，依靠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到日本进行调查并决定于1906（明治39）年春，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一角，筹建留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库林敦（J.M. Clinton）被派到东京出任总干，王正廷任副总干事指导会务。次年在早稻田成立寄宿舍。1910（明治43）年在神田区北神保町购置土地建成青年会馆，由马伯援任主任干事，孔祥熙曾任干事。至1921（大正10）年，有主事七名，会员达一千余人。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住在这里。

× × ×

基督教青年会“海外教师派遣委员会”，自1887至1895年继续进行活动，这期间从美国和加拿大的九所大学有十五名教师被派到日本。1890（明治23）年后，日益激化的反动思想曾要求减少这些人，因此到1898（明治31）年欧美教师只剩下了六人，其中三人作为大使馆的教师，另两人即梅勒·费克（Frank Muller）教授和贝得·鲍勒（C.M. Bradbury）教授，成为政府的御佣教师，再一人就是斯维特本人。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委托北美的基督教同盟友好团体向日本派遣大批英语教师，他们被称为青年会英语教师，至1912（大正元）年已达到一百一十一人。他们在日本基督教同盟名誉主事的指导下，在妙义山、轻井泽等地开办协议会，发行英语教育刊物。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了正规的教师和基督教青年会的

主事。

(韩一德摘译自《日本Y M C A史》第42、146页)

3. 投稿《甲寅》杂志

《李大钊先传传》序（节录）

张生次溪撰李守常先生传既成，求序于余。以守常为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人物，余私交虽深，而余谊殊薄，自审未必能得守常之真，因而不敢轻率下笔，退回久之。顾次溪迫切不已，固辞不获，姑以所知于守常者，补苴一二，如柳州之傅段太尉逸事也，庶乎其可？

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在东京，余曾戏问焉，曰：“守常者为君名乎字乎？”曰：“字耳。”“然则文稿中君何不署名？”君恍然为问曰：“投文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吾因知守常之本名为大钊，执手绳其过迂，一笑而罢。次溪传中谓守常入北大后始改名钊，殆误。

据吾所知，守常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及与余交，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高谓皖士高一涵也。实则守常之文，纡徐为妍，卓犖为杰，彼自有其特长，初不因与余同游，骤尔豹变。当时吾徒之所标榜，为补实说理四字。

以谓理之所在，即性命所在；至所谓理者，固不局限于一时之所见闻，彼此相约，随时开发、随地开发。往往一理为平时之所尸祝，一见为误，不难立时吐弃，唯恐不及。特吾有一戒约，凡理性之攻守正负，不许徒托空言。其时吾笃信墨子非而易之学说，非之云者，批评一理，以为不足守之谓；易之云者，新据一理，以代替前所非者之谓。倘已无所易而徒非人，此处士纯盗虚声，应为吾徒之所鄙视。盖吾好治墨学，尤好以吾墨学与欧洲名哲诸理联成一片，黑格尔之辩证法，亦其连锁之一端，时吾与守常见面不断讨论此项问题。但吾今日所须慙然自白者，吾以素性疏懒，不能摆脱社会枷锁，因之讲学与治事打成两橛；而守常却不然，彼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于当时环境，及己是否能实行以为断。1917年，吾发行甲寅日刊于北京，约守常共事，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但此刊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未几，彼此都觉厌倦，因将日刊停止。……

章士钊 1951年8月于北京

（《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 1951年版）

《甲寅》宣言

（一）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日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

（二）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所列论文一体待遇，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分，任何意见，若无背于本志主旨，皆得发表。惟所主张，作者各自负其责任，真名别号随意用之。

（三）本志现由有志者担任财务，文字除声明不索报酬者外，另有酬率，多寡因稿而定，拟登即行付款。

(四) 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其量以发表之。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理，或于政治学术有所怀疑，不以同人为不肖，交相质证，俱一律欢待尽先登录。若夫问题过大，持理过精，非同人之力所及，同人当设法代请于东西洋学者以解答之。

(五) 本志每页十七行，行三十九字，稿纸能与相合最妙，字须明了，不可写两面。

(六) 稿如不登，悉不退还，声明必还亦当照办，邮费由本社担任。

(七) 本社募集小说，或为自撰，或为欧文译本均可，名手为之，酬格从渥。

(《甲寅》杂志第1号)

4. 其它活动

撰写《我的自传》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关心汤佩松的学习

为了使我们能受到良好教育，1914年下半年，我父亲汤化龙把我和我的姐姐送到东京上学，当时我只有十二岁。临行父亲交待，让我去找已在东京的李大钊，他已托付李大钊关照我。可以肯定，李大钊留学日本是得到我父亲帮助的。

我到东京后，经常去找李大钊，并于每星期六下午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去学英语。每到这一天，李大钊总是站在操场等着我，远远便可以望到他。我每次去找他，都要检查我的学习，当他发现我学习不认真时，对我批评很严厉。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李大钊弃学归国。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跃跃欲试，希望在未来的民国重建中有所作为，不久为我父亲素所器重的李大钊出任他的秘书，并主编《晨钟报》。

(《汤佩松先生访问记》1987年8月21日(记录稿))

(三) 在早稻田大学学习

1. 李大钊学籍表

氏名 李大钊 生年月日 光绪十七年十月六日
族籍 原籍 支那直隶省乐亭县
现住所 牛込区下戸塚町五二〇号基督教青年会内
入学 大正三年(1914年)九月八日,大政一科。
入学前学历 永平府中学毕业、北洋法政学校政治经济本科毕业。

学科 政学

保证人住所氏名 麴町区永田町二丁目支那公使馆内 言微

修业 大正四年七月五日第一学年

退学 大正五年二月二日 事由 长期欠席除名

备考 二种资格。三、九无试验铨衡之上大政一年,二编入。

(据日本早稻田大学档案)

2. 受课课程表

第一学年（大正3年度）

学 科	课 目	时数	讲师
政治学	国家学原理	3	浮田
	帝国宪法	3	美浓部
经济学	经济学原理	2	天野
财政学	经济学原理	2	盐泽
史 学	近代政治史	4	浮田
哲 学			
法 学	民法要论	3	牧野
	刑法要论	3	井上
统计学			
原著研究	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	2	吉田
	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	2	伊藤
	英文练习	2	宫井
论 文	论 文	2	牧野
选修课	哲 学	1	波多野
	明治史	2	吉田
	第二外国语(任选一门) 实用英语、德语 法语、汉语		

第二学年（大正4年度）

学 科	课 目	时数	讲 师
政治学	国法学	2	有賀
	行政法总论	2	副島
	政治学史	2	大山
经济学	财政学	2	田中
财政学	货币及信用论	3	服部
	工业政策	2	盐泽
	农业政策	2	松崎
	社会政策	2	永井
	经济史	2	平沼
史学	最近政治史	2	畑山
	文明史	2	内个崎
哲学			
法学	民法要论	3	牧野
统计学	统计学	2	官島
原著研究	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	2	梅若
	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	2	服部
	格廷库斯：社会学基础	2	浮田
选修课	经济学原理（补讲）	2	盐泽
	经济财政	1	田尻
	都市问题	1	安部
	保险政策	1	今泉
	特别讲义	2	
	第二外国语（任选一门） 实用英语、德语 法语、汉语		

3. 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 教师及所任课程

学科长	法学博士	盐泽昌贞
课程	教师姓名	
交通政策、名著研究	教授、哲学博士	伊藤重次郎
刑法要论、德语	教授、早稻田大学 法学士	井上忻治
货币及信用论、名著研究	教授、哲学博士	服部文四郎
哲学	教授、文学博士	波多野精一
英语	教授	胜俣铨吉郎
明治史	教授、文学博士	吉田东伍
名著研究	教授	吉田已之助
财政学、经济财政实习	教授、法学博士	田中穗积
英语	教授、农学士	武信由太郎
英语	教授、哲学博士	高杉泷藏
帝国宪法、行政法、政治学史、国法行政法实习	教授、法学博士	副岛义一
国际公法、国际法及国法实习	教授、法学博士	中村进午
社会政策、殖民政策、名著研究	教授、早稻田大学政学士	永井柳太郎
国家学原理、近代政治史、名著研究	教授、法学博士	浮田和民
名著研究	教授、文学士	梅若诚太郎
商法要论	教授、法学士	柳川胜二
国际私法	教授、法学博士	山田三良
社会学、文明史、法语	教授、文学士	山崎直三
德语	教授、文学士	山岸光宣

民法要论	教授、法学士	秋野菊之助
论文	教授	秋野谦太郎
德语	教授	藤山治一
经济学原理、商业政策	教授、法学博士	天野为之
国法学、近时外交史、最近时政治史、外交文书	教授、 法 学 博 士	有贺长雄
都市问题	教授	安部矶雄
法学	教授	安藤忠义
汉语	教授、早稻田大学 政 学 士	青柳笃恒
英语	教授 修士	岸本能武太
英语	教授	宫井安吉
统计学	教授、早稻田大学 商 学 士	宫岛钢男
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工业政策、经济财政实习	教授、法学博士	盐泽昌贞
经济史	教授、文学士	平沼淑郎
自治政策	讲师、法学博士	井上友一
民法要论	讲师、法学士	饭岛乔平
保险政策	讲师、早稻田大学 法 学 士	今泉丈吉
汉语	讲师	渡俊治
经济财政	讲师、法学博士 子 爵	田尻稻次郎
农业政策	讲师、法学博士	松崎藏之助
英语	讲师、埃切、考库斯	
	(エツチーエコツクス)	
帝国宪法	讲师、法学博士	美浓部达吉
行政法	讲师、法学博士	清水澄

(《早稻田大学一覽》第十八章职员及讲师大正2年12月版)

4. 李大钊大正四年度进级成绩表

早稻田大学大正四年度

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第一二学年进级成绩

姓名：李大钊

学号：84

课程成绩：

国家学原理 77分

帝国宪法 75分

经济学原理（财政） 65分

近代政治史 70分

民法要论 60分

刑法要论 55分

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 40分

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 87分

英文练习 66分

论文 56分

总分 766分 各种平均 66.90分 名次第40，成绩丙等

5.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

1914（大正三）年度的9月8日，早稻田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科开学了，李大钊作为一名新生进入了这个学科的一年级。严格地说，他是作为此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学科的毕业生，经审查承认其资格才未经予科而直接进入本科的。

准备在日本攻读社会科学的李大钊，从入学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给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严酷现实。日本占领山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和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等等。为了能够把

握这种现实，他就不能仅仅坐在教室里听先生的讲课，还必须精心阅读每天的报刊新闻，留览各种书籍，参加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的运动，总之他需要学习的课题很多很多。

李大钊生前从不讲个人的经历，因此关于他在日本学习、研究活动的详细情节已难以捕捉；但是，从他那些以留日时代为中心的论文的章节中，仍不难看出他那广博而旺盛的学习精神，祖国的现实唤起的责任感，驱使他在有限的的时间里，不仅要埋头阅读日文和英文的文献，而且还必须读包括古文在内的本国的著作。这种情况从考察当时早稻田大学的授课科目中，可以得到充分地说明。由于李大钊在第二学年的中途、即1916年2月2日，因长期缺席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这样他只能有一次进级考试的机会，我们从他当时的课程设置表和第一学年考试成绩表可以看到，在1915年7月初，也即是在写了《国民之薪胆》、又编辑了作为前几个月反对“二十一条”运动总结的《国耻纪念录》一书之后不久，他必须接受校方规定的十一门课程的考试，这些课程的成绩如下：

教授姓名	课程内容	考试成绩
浮田和民	国家学原理	77分
美浓部达吉	帝国宪法（政治学）	75分
天野为之	应用经济学（经济学）	85分
盐泽昌贞	经济学原理（财政学） （伊里著·经济学概论）	65分
浮田和民	近代政治史（史学）	70分
秋野菊之助	民法要论	60分
井上忻治	刑法要论（法学）	55分
吉田巳之助（讲师）	政治评论	40分
伊藤重治郎	经济评论（原著研究）	87分
宫井安吉	英文练习	66分
秋野谦次郎	论文（日语作文）	56分

包括两科不及格，平均为66.9分，评定为丙，名次在一百零六人中排行第四十。这虽不能说是很好的成绩，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这一百零六名考生中，尚有六人不及格，三十七人未考足全部科目需要补考的这一事实，就不难想象他在百忙之中是怎样努力地去做学习了。

根据1915年9月开始的第二学年课程表，他所必修的课程有：有贺长雄的国法学；副岛义一的行政泛论；大山郁夫的政治学史；永井柳太郎的社会政策；浮田和民的英文练习（社会学文献讲读）等，二次革命爆发后，他于同年12月短期回国，第二学年的实际学习时间可能只有四个月。

那么，他究竟从当时这些先生们的讲义中明吸收了一些什么呢？早稻田大学自1905年至1910年的六年间，设立了中国留学生部并先后有四千名学生从这里毕业。

当时的早大校长大隈重信，1913年2月25日在他的寓所举行欢迎孙中山的招待会上说：“中日是同文同种相联结的民族，让我们在吸收欧洲文明的同时，以其强大的王道思想去支配世界！”但是这种“早大”的亲善政策，不过是在肯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前提之下，主张更圆滑地去推进这种政策而已。同年，受袁世凯的委托，大隈派遣有贺长雄和翻译青柳笃恒到中国。有贺极力推进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为强化袁世凯的权限而到处兜售取消共和制度的主张。浮田、盐泽与有贺、永井柳太郎等，作为大隈的助手频繁活动，使大隈于1914年4月当上了首相，“二十一条”就是大隈主持的内阁提出的。

李大钊不仅接受当时的舆论界的讲坛上那种对中华民族的观点，而且还以他们为“反面教员”，去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在论文《国情》中，批判了有贺的观点，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中，批判了浮田的观点，这不能不说与他亲身感受到当时早稻田学派的空气有关。然而李大钊留学时代的日本，也还有他的另外一面，即大正初年揭幕的主张打破豪族统治，拥护宪

政运动的民主主义风潮，这时，曾经是李大钊老师的吉野作造，几乎在每期的《中央公论》上，都有他关于民本主义思想的论文。

与把政治学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学风不同，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是使政治学与国家权力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学问、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注重实证研究的学风，是以英国式立宪政治为理想的学风。在法学方面，有日本“天皇机关说”的创始者、自由民法学派的代表小野梓，他的影响，在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讲义中仍然保留着。处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都是限定在肯定天皇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框框之中。

李大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以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在早稻田，还有一个人是不可忽视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治经济学科选修科目“都市问题”和特别讲义“社会政策”的安部矶雄。关于这位先生，李大钊曾经对清水安三（北京半工半读学校崇贞学园的经营管理者，日本人教会牧师）说过：“在东京我从安部矶雄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并没有受到那种程度的影响。”清水安三于1918年来到中国，他深切同情中国的民众运动，经常出入李大钊的寓所，他们有很深的交情。

曾经给予李大钊很大影响的安部矶雄，与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于1901年创立了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党领导人之一。1899年以来，他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同时对有关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研究，他的社会主义和教过李大钊的天野为之的自由主义、盐泽昌贞的社会政策主义一道，成为早稻田的经济、社会思想的代表。安部矶雄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一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他曾经说过“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

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

李大钊是在班级必修课程之外，通过选修科目接受安部的思想影响的，从这里他发现了寻找人民生活困境原因的线索。自《言治》时代以来，李大钊一直未能摆脱托尔斯泰的思想影响，这时又与安部的思想相呼应保留在他的头脑中，他大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与李大钊同时代、共同留日的朋友高一涵和少年中国学会时期交往甚密的周太玄，却回忆到李大钊在东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了研究。高一涵例举李大钊学习了河上肇译的《资本论》，但这里不仅河上肇译的《资本论》到1927年才出版，而且河上肇本人之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此两、三年之后的事情，可见这些回忆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并且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确实资料能说明李大钊在东京究竟学了些什么。但是自高一涵和周太玄之后，当代中国的研究者屡屡述说李大钊在东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我想也没有必要一定去否定它。从安部的社会主义开始，某种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思想发生影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章士钊就说过，李大钊是属于那种经常注意理论是否适合于当时的环境以及有无实现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人。

许多关于李大钊的研究都表明，他是把别人的思想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消化才接受的，他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

（韩一德、刘多田译自〔日〕森正夫，《李大钊》人物往来出版社1967年版）

(三) 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的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

1. 中日交涉中之留日学生大会

自日本对我提出要求二十一条件以来，留学生中因多有所闻，然莫测其真相，顷见京沪各报露载十余条，莫不引为亡国大痛。昨十一日，日本纪元节放假，神田美土代町青年会开留日全体学生大会，蒞会者约三千余人。为醴金备用临时募集捐款，定自一钱起，有捐一元至数元者，有捐一角至数角者，皆踊跃输将，自非囊中无有者必不肯吝不予，总计约三、四百元。开会时间，本定一时起至五时闭会，日本警察从中干涉，限自三时起至五时止，大众不得已俛首听之然无敢喧哗乱行者。已而始由临时主席陈君报告开会原因，略谓本会之开其详不待赘述，大概人人心目中皆已明之，惟今日开会时间，又遭警察短缩，所有一切进行方法不能详细讨论，而本会又不能时时召集，势不能不求有效果，本会由筹备会发生之时，已经累次磋商，得办法大纲五条

(一) 电政府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件内容；(二) 发布印刷物警告父老；(三) 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之态度；(四) 派遣代表回沪组织暂时机关，联海内外爱国之士，合筹对外方法；(五) 筹备全体学生回国之事，以备有事时不致临时张皇，以外尚有种种细目兹不详述。如得大众赞成以上各条，再付筹备会继续进行其细目亦自陆续刊出。随即逐条表决，一一举手赞成。嗣后有多人演说，其姓名今已不能记，兹惟举其大略约谓，吾人当以死力拒绝日人要求，不可放松一步。有覃振者自谓，吾国民党也，吾人向以反对政府者，今日何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但愿袁世凯努力为之，何患举国不一致，全场无一唱。

异议之人，或谓现陆公使电致政府允允日人要求，如此不忠吾人当先以老拳饬之云云，是亦惑于浮说激于热忱而出者，终无一人起而和之。五时散会，计自开会至闭会，察各家论事秩序井然不紊，有亲爱无诟詈，有鼓舞无嫌忌，其间虽有号哭者，有击案者，有捶胸顿足者，忧痛之余自然发露究无妨于大体。乃日本各报故意谬载其事意存挑拨，诚恐以讹传讹所关匪浅故特记其实以正之。

（《时报》1915（民国4）年2月21日）

2. 留日学生《泣告全国同胞书》

自中日交涉发生，吾国留学日本全体学生举代表萧君等来沪筹对待之策，并谒当道处声明凡事均候中央政策稳健进行，昨由全体学生名义发出泣告全国同胞书云：

泣启者，吾国自甲午战败，瓜分之祸迫于眉睫，嗣得美国提议中国门户开放主义各国先后赞成，吾国形势一变各国以相互之利益为相互之约束，吾国得以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者皆此均势之局为之。去年欧战事起，日本借口日英同盟出师攻取青岛。要求假道进兵，吾国鉴于比利时之惨状，不得已委屈以应日本之求划出交战区域，退而为局部之中立，此实吾国承前清积弱军储未充，经济未裕而无可如何者也。青岛陷落事告终（中略），日本突命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氏提出最严重之条件多款，并不经吾国外交总长直接向大总统交涉并要求对于第三国及中国国民均严守秘密，且须以最速之时间承诺，否则尚有更加严酷之条件等语。嗟乎！彼日本尚以吾国为独立国乎，日公使此次要求与当年伊藤博文自定朝鲜死命之条件，强迫朝鲜元首签押称为日韩协约者相去几何，盖直以吾国为第二之朝鲜矣。其要求之条件，两方虽守秘密，然据中外各报及日本朝日新闻所载，其大致则可无疑，今仅就其最重要者分录之：

(一) 关于满蒙者，延长旅顺大连湾租界期为九十九年，满洲铁路同此并许日本人在满蒙有居住自由权及置产业之权；

(二) 关于山东者，中国须将德国从前在山东省内所有一切权利转移日本；

(三) 关于全国者，日本人得在中国各地经营工商业并敷设铁路及航行河川之权；

(四) 关于福建山东两省之行政者，日本得在山东福建两省委任官吏、整顿警察及税务实业之权；

(五) 关于矿业者，日本对于中国各省之矿业均有投资之权，又凡日本所设铁路经过之矿山均有采掘权；

(六) 关于军事者，中国全国陆军均须用日本将校教练，凡陆军计划均须商榷于日本；

(七) 关于内乱外患者，日本得代中国镇压内乱，抵御外侮。

嗟乎！吾国人思之以上所列诸条件即有其一既足亡吾国而有余，况为种种之条件耶。即一日本既足亡吾中国而有余，况英俄法德及诸列强当然步日本之后尘乎耶。（中略）况世界之竞争日烈，亡国之惨祸日酷，缅甸、印度、安南，鲜鲜之往事吾国人虽未目见亦当耳闻，亡国之后种族随之，吾四万万之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国民皆墜于十八层黑暗冤惨地狱而万劫不迴，牛马奴隶永为吾人及身与子孙之后来生活，吾新建之中华民国将成为历史上之一种名词矣。嗟乎！吾国人思之与其亡国后而受此种无穷之痛苦何如未亡国前而极力抵御之之为愈乎。吾国政府之软弱久既暴露于世界矣，然政府之强弱全视国民之强弱以为准，吾国民置诸不问一任政府少数人独当其冲，吾国历来之对外失败皆由于此，在政府固有罪，在国民焉得为无罪？此吾国民不能不善自为谋者也。（中略）嗟乎，祸迫矣！事急矣！吾国人毋暴动、毋骄懦、毋内哄、毋党争，共本此爱国宗旨，以为现政府之后盾。对于日本此次之要求，无论一部全部皆在拒绝之列，即吾现政府承认

之，吾国民亦绝对不能承认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亡国前之雄鬼，不为亡国后之遗民，有国家然后有个人之生命财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理甚明人所共晓。学生等万里重洋求学海外，本宜潜心功课何庸国事侈谈，然国已不国学何所学，故敢以吾最诚恳之语告吾最亲爱之国人，西望宗邦死无葬地，惟国人其急图之。

（《时报》1915年3月2日）

3.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

总会会务纪要（节录）

甲总会之组织及进行缘起

留学生之有总会，由来久矣。惟以时事变迁，或不免时有断续，去岁中日交涉起，我留东同人应时势之要求，于2月11日开大会于美土代町日本青年会，重行组织。其后派遣代表于沪上，促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使其输入我国者，每月减二三百万元。战争之击浪，我留学诸君倡之甚高，何其盛也。不图事及中道，而袁政府抑压备至，于上海则怂恿英人以干涉我代表；于东京则命令陆使以解散我总会，终至欲寻一开会地点而不得，至今思之，犹有余痛焉。其交涉及会务经过详见《国耻之一》，谅为同人所公见，兹不多及。今者袁氏背叛约法，帝制自为，而惊天动地之护国军起于西南各省者，已三月余矣。我留东学界愤独夫之无状，惧祸乱之将至，归国从戎者若干人，筹助饷糈者若干人，奔走呼号以发表吾真正民意者又若干人。惟团体分而易杂，意见歧而易混，不有我最清洁最热心之多数留学诸君子，出之以毅力，持之以久远，构成以有价值之大团体，以表示全体留学界之真正意思，而树风声于吾国民之上，其能再造此新中华民国者儿希矣。抑更有进者，吾侪远适异国，眷怀宗邦，凡知识之交

换，感情之结合，对内负提倡劝导之责，对外则表示吾人真正之态度，以转移邻邦之视听，虽祖国承平之秋，此种团结，亦吾留学诸君所当有而不可一日缺者。彼外人之居留吾国者，即三数人之侨商贩夫必有一小团体以集合，况留学生为国民优秀分子，而人数之多为三四千以上者乎。此吾留学同人所以有总会继续之组织，而于1月16日则开全体大会以选举干事长，于1月31日则评议执行两部与经费委员会、文事委员会等皆先后正式成立。兹当略述各项会务进行以前，谨弁数言，以识其缘起如此。

文牒主任蔚城李墨舞序并编

总会章程叙

人生好群，天赋之性也。本此好群之性，发挥而光大之，保种爱类，团结不解，而家族而社会而国家。蕃衍昌殖，以成今日之人类世界焉。从兹益进厥德，益宏厥能，大同之运，将亦胚孕于此好群之一念，群之时义大矣哉。炎黄之后，宅国中土者，亘数千祀，其间文化之休光于史乘，遐想中天，典章彙备方之欧美今日，绝无逊色。苟吾之祖若宗，好群之性，不逮白哲之族，果奚由以致此也。群德之陵夷，至于今而极矣。外力之来，恬然受之，不思集群力以为抵抗，一己之视国家社会休戚无与，利害无关，世人每以散沙相讥诮，蔑辱之来，因而愈急，呜呼，此真吾族之奇羞也。盖尝考之，民而好群，国家之所尚，君主之所患也。君权之下，一夫专政之既久，结群之自由，举为法制之所禁，以图便于残贼之一人。此好群之能，所由久废，处群之德，所由不昌欤。今也民国肇造，国民悉托命于民政之下，其责任之担诸仔肩者，固有以大异于畴昔，吾辈仰承父老之命，旅学他邦，固殷望以其所成，归而贡献于祖国，任重道远，尤有以大异于一般之国民，其逃来兹土也。不啻携吾国民之晶影，以呈示于人，而人之靦国者，且以吾辈之云为，为国民全体之表征矣。尝见日人之对于吾国，其居者则创社著书，研求吾国之真象孜孜不

倦，以为谋我之贵。共行者侨商于吾之通都大邑，足迹所至，无不会团林立，综其调查，月为报告，以贡献于其国，此其谋国之虑何其深，好群之德何其勇也。吾以数千之青年学子，莘莘济济于斯邦，专志于研学、考事、问俗、采风之业，犹无群策群力之结合，无论一人之所就，视众力之所成，相去甚悬，即其不善合群之一端，将由吾辈以辱其短于人国，不亦厚辱宗邦而羞全体国民耶。况夫旷瞻欧土，大战方酣，反顾夏区，内忧未去。1916年而后，世界将为若何之世界，中国将为若何之中国，吾辈对于今后之世界与中国，宜具若何之觉悟，负若何之责任，外冲大势，内省觉心，其当亟振国民的精神，取一致之行动，以创造国民新运命，以自任者，舍吾辈固莫可旁贷者乎。

乙丙之际，国事日棘，众议重兴留日学生总会，询谋僉同，乃更选职员，择定会所、会章部则，井然就绪，兹特汇录记载，以公诸世，所以为群之形者备矣。顾群之合而能久，非以其形而以其神也，必其一群之人，各知缔群相结之为要，尽其一己之力赞助其群之成，和衷共济，始终以之，期于达其所志，中途勿懈，而后其群之神乃定。若徒存其形，或仅备其形，遂为毕其能事，而无全神以贯注之，则形之为用，不全荒乎。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是纪以群之形，托群之神。宜于初终之际，求其全功，是不独本会久暂之所关，国家之荣辱，族性之优劣，将于是乎征之矣，可不慎哉，可不勸哉，是为序。

总 会 章 程

第一章 总则

-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
- 第二条 本会以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组织之。
- 第三条 本会以办理留学界公益事件宣明留学界公意为目的。

第二章 评 议 部

第四条 本会设评议部由留日各省同乡会各选评议员二人组织之，任期一年，选举法由各省同乡会自定之。

第五条 评议部之职权如下：

一、议决关于本会经费及基金事宜。

二、议决召集全体大会事宜。

三、议决修改章程事宜。

四、提议及议决本会一切应办事宜。

第六条 评议员互选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书记二人。

第七条 评议员不得兼任执行部职员。

第八条 干事长及执行部各主任得出席评议部陈述意见。

第九条 干事长及执行部各主任须出席评议部之定期会议报告会务。

第十条 评议部细则由评议部议决另定之。

第三章 执 行 部

第十一条 本会设执行部其职员及职务如下：

正干事长一人，总理本会一切事务，对外代表本会，列席职员会议为主席并出席于文事及经费各委员会。

副干事长二人，勤助正干事长处理一切会务，遇正干事长缺席时得代理之。

庶务主任一人 办理本会一切庶务事宜。

庶务干事二人 勤助庶务主任办理一切庶务事宜。

文牍主任一人 办理保存本会一切记录及往来文件并得出席文事委员会。

文牍干事二人 勤助文牍主任办理一切文牍事宜。

会计主任二人 办理本会一切收支，编制预算决算，管理款项存据折薄等事宜并得出席于经费委员会。

会计干事二人 勤助会计主任办理一切会计事宜。

交际主任一人 办理本会一切交际兼调查事宜。

交际干事五人 勸助交际主任办理一切交际兼调查事宜。

第十二条 执行部职员之选任及任期如下：

正干事长、副干事长由全体大会选举之，任期一年，各主任各干事由评议部选举之，任期一年。

第十三条 执行部设职员会议，凡关于应执行一切会务由职员会议议决后交由各主任各干事分任办理。

第十四条 职员会议之权限如下：

- 一、议定评议部决议事项之实行办法，
- 二、议定二十元以内之临时费支出但事后须即通告评议部，
- 三、有紧急事件发生不及召集评议会时得由职员会议负完全责任执行之，但事后须经评议部承诺，
- 四、提出议案于评议部。

第十五条 执行部细则由职员会议议决另定之。

第四章 文事委员会

第十六条 本会设文事委员会其会员无定额由评议部及干事长推荐、由本会函请之。

第十七条 文事委员会司本会撰著及刊行书报等事，依评议部之议决宣明本会全体会员之公意。

第十八条 文事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编辑主任一人，编辑委员六人。

第十九条 评议长干事长文牍主任得出席文事委员会陈述意见。

第二十条 文事委员会细则由文事委员会另定之。

第五章 经费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本会设经费委员会其会员以各省同乡会会长充之。

第二十二条 经费委员会办理筹捐事宜及监查本会收支。

第二十三条 经费委员互选委员长一人。

第二十四条 评议长干事长会计主任得出席经费委员会陈述

意见。

第二十五条 经费委员会细则由经费委员会另定之。

第六章 经 费

第二十六条 本会经费分基金、经常费、临时费三种。

第二十七条 本会基金之募集及经常费之分担由评议部议决后交经费委员会筹办之。

第二十八条 本会遇有临时事件发生需经费时，由执行部编成预算，经评议部通过后，先由经常费余款中支用，如有不足由评议部议定各省同乡会分担之。

第二十九条 临时费如为额过大，评议部认为各省同乡会不能分担者，得议定举行临时特别捐或由基金中开支。

第三十条 本会收支帐目每月须清结一次，由会计主任誉印清册报告评议部经费委员会及各省同乡会。

第三十一条 本会基金及各项余款须存储妥当银行，其折据由会计主任保管之，印章由经费委员长保管之。

第三十二条 本会每年刊发会计报告一次，于开全体大会前交由各省同乡会遍发各会员。

第七章 会 期

第三十三条 本会于每年1月开全体大会例会一次，其应办之事如下：

- 一、报告会务，
- 二、改选正干事长及副干事长，
- 三、讨论应办事宜。

第三十四条 例会期日经评议部议决由干事长于开会一周前通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并遍发传单通告全体会员。

第三十五条 例会期日决定后即由执行评议两部全员联合开筹备会，以评议长为主席，议定大会之会场秩序并指定临时职员担任事项。

第三十六条 干事长改选后旧干事长须俟新执行部组织成立

交卸后乃得解职。

第三十七条 遇有必要时由评议部议决或执行部之提议经评议部议决得开临时全体大会，其筹备通告与例会同，惟遇紧要时得于开会三日前发布通告。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会设事务所于东京。

第三十九条 本章程遇有必须修改时得由评议部议决修改之。

总会职员一览表

执行部

职务	姓名	籍贯
干事长	殷汝耕	浙江
副干事长	朱世鸿	湖南
副干事长	何飞雄	湖南
庶务主任	赵世英	甘肃
干事	邓 雄	江西
干事	元润田	山东
文牍主任	李乾章	山西
干事	李培藩	直隶
干事	申文龙	湖南
会计主任	黄祖培	广东
干事	张思严	广东
干事	刘懋昌	贵州
实际主任	艾 华	贵州
干事	苏象乾	山西
干事	胡希璠	陕西
干事	李铭心	湖北
干事	潘炳华	江苏

干事 祝与众 江西

评 议 部

职务	姓名	籍贯
评议长	何基鸿	直隶
副评议长	苏理平	广东
评议员	王维藩	直隶
评议员	容宝薰	广东
评议员	俞 钰	江西
评议员	曾 震	江西
评议员	高一涵	安徽
评议员	吴 桓	安徽
评议员	丘仰飞	福建
评议员	李贻燕	福建
评议员	曾昭星	河南
评议员	张国威	河南
评议员	喻培申	贵州
评议员	艾 华	贵州
评议员	侯桂林	山西
评议员	马鸣鸾	山西
评议员	王照青	山东
评议员	陈德良	山东
评议员	周佑启	湖北
评议员	熊尚父	湖北
评议员	李华英	云南
评议员	王九龄	云南
评议员	林万焯	浙江
评议员	范寿康	浙江
评议员	潘培敏	湖南

评议员	李复聘	湖南
评议员	张锡侯	吉林
评议员	邓居文	吉林
评议员	何益谦	陕西
评议员	杨逢盛	陕西
评议员	苏景三	甘肃
评议员	杨清汉	甘肃
评议员	董福成	黑龙江
评议员	乔芝轩	黑龙江
评议员	颜如愚	四川
评议员	张梓芳	四川
评议员	邓乾周	广西
评议员	黄家植	广西

文事委员会

委员长	高一涵	安徽
编辑主任	李大钊	直隶
编辑委员	张梓芳	四川
编辑委员	陈溥贤	福建
编辑委员	黄觉	江西
编辑委员	刘明敏	贵州
编辑委员	申欧龙	湖南
文事委员	阳魁	江西
文事委员	苏理平	广东
文事委员	王九龄	云南
文事委员	张定	湖南
文事委员	李元伯	四川
文事委员	李石岑	湖南
文事委员	程时焯	江西

文事委员	邓希禹	湖北
文事委员	张嘉禾	江西
文事委员	周惺甫	
文事委员	梁任先	吉林
文事委员	张永修	甘肃
文事委员	容宝壖	广东
文事委员	吕复	直隶
文事委员	谢作民	
文事委员	张介石	山东
文事委员	杜国庠	广东
文事委员	阮湘	湖南

经费委员会

委员长	苏理平	广东
副委员长	李世煊	湖南
经费委员	李铭心	湖北
经费委员	李长春	云南
经费委员	李翰章	山西
经费委员	徐树人	山东
经费委员	林鯤翹	浙江
经费委员	余汉	四川
经费委员	曾钝少	河南
经费委员	谢式南	江西
经费委员	张永修	甘肃
经费委员	王廣颺	奉天
经费委员	高一涵	安徽
经费委员	王觀辰	陕西
经费委员	张时钦	贵州
经费委员	潘炳华	江苏

经费委员	刘泽时	黑龙江
经费委员	徐廷瑾	直隶
经费委员	唐文佐	广西
经费委员	姚赓廷	吉林
经费委员	李贻燕	福建

(《民彝》第1号)

4. 李大钊的有关活动

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翻译《中国国际法论》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再版《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撰写《国民之薪胆》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编辑《国耻纪念录》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四) 编辑《民彝》杂志

1. 民彝杂志简章

一、本志定名曰民彝杂志。

一、本志以主持正义，昌明学术，灌输近世文明，增进民国福利为宗旨。

一、本志内容：撰著、评论、通讯、论坛、译述、杂俎、会务、余录。

一、本志设编辑部于日本东京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

(《民彝杂志》第1号)

2. 民彝征文启

迺者，阴阳错行，天地大骇，邪说淫词，多刊吾民思辨力之薄弱，樊然百出以迷之，政本不立，国是漠然，而士大夫之练达人情者，方貌为咍喔委蛇之态，虽尽举其心思言议之自由，曲徇乎势力淫威而不惜，而洁身自好之士，又不甘与时俯仰，故怀瑾抱玉，深隐其读书观也之所得，默然自守，不欲出以亦人，而言论消沉，遂至于此极矣。夫言者心之声也，不言则心何由显，今之伪造民意，固二三柔媚无骨逢迎独夫者之所为。然，高尚之士澄观默处矜慎自持，遂令吾民灭真莫由表白于天下，而桀者乘其弊而利用之，致酿成歧议，庞言横溢，九隅之大祸，物腐虫生，咎由自取，推原祸始，高尚者或亦不得辞其咎欤。夫淫威四逼关其口而夺其气，国内同胞身受之，棲身异域者不得以是自诿也，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此亦庸众之习，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今者义声遍于东南，震东启明曙光再见，此正吾人雷厉风飞纵横坐论之

会，况改革之业，经纬万端，欲建远谟必慎厥始，故凡丁变乱之顷，必赖有博学闳识之儒，经以国情，纬以学理，旁参默审。夫世界思潮之趋势极深，研几创为完健精纯之议论，以诱掖齐民，振兴舆论，引政治之轨循常道而前之，不然以国家根本之大谟，一任曲学阿世与夫浅谄剽疾之徒之指挥操纵，而所谓优秀纯白之国民不与焉，是岂爱国忧时之士之所忍出此者哉。本会成立适当国门风雨漂摇震荡之秋，深痛异说庞兴乱吾国纪，久思创一机关，广咨众议，俾我同学诸英之思想言论得以如量发抒，昭然暴白于天下。遂议定刊发民彝杂志，专以主持正义，昌明学术，灌输近世文明，增进民国福利为宗旨。内列八门：曰撰著，曰评论，曰通讯，曰论坛，曰译述，曰杂俎，曰会务，曰余录。要以博采兼收足客吾人所有之言议思维为主。凡吾大雅宏达平昔读书观政之所得，感时忧国之所书，学校之所研求，师友之所讲肄，以及联吟独唱之辞，抒性感怀之什，苟不悖乎本志宗旨，罔不尽先刊载，公播同人，集众思者舍门户，务兼容者尚丰繁驳杂之机所不辞也。夫文者兴会灵奇之构影，有所感而后发，有所激而后舒，今者淆言杂出国论纷如，内患外忧同时并集，其所以感激吾人者盖备至矣。郁弥久者发弥昌，志同道合之士，痛肖小之弄国耻，异族之横肆侵袭，仰以观祖国文化之销沉，俯以悼夫未来之隐患，本雄奇伟大之志蕴，为瑰玮闳达之文章，吾知必轮囷馥郁浩乎沛乎而汨汨然来矣。本志为我同学之公共言论机关，凡议论不违宗旨者，固靡不兼蓄并包也。然有关系国本问题而首待吾人讨论者应特表而出之，以为本志论究之所主。时事有缓急，学业有专攻，非敢偏鹜取足应时致用而已。兹当本志所特别注重者略举如下，国亡之声震怖孩提，处禔之虱安识机宜，群惊伯有自扰其神，不审大势宁慰国魂是曰时局问题；国本之固固于人心，因爱生敬乃尊如神，共和精义须阐其几，一线疑窦每兆危机是曰国体问题；政力向背理乱之枢，调匀质力厥害斯除，统一联邦群议沸腾，利害得失须准国情是曰宪法问题；中原风教昔尚大同，朋党

后起同室操戈，调和群意以建一中，俱收并蓄万派朝宗是曰党派问题；民为邦本财则国脉，开源节流二者奚择，司农仰屋国债如山，补疮剜肉适以自残是曰财政问题；群化演进脱旧谋新，相摩相荡乃底于平，竺故之极生机斯穷，盍张挞伐振贖启聳是曰思想问题；学术万殊各有因果，旁推互勘其道乃通，扬中抑西动成我执，文化衰頹国何与主是曰学术问题。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启

（《民彝》杂志 1916年 第1号）

3. 黄种歌及序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同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相处甚契，在早稻田中华青年会同居者年来。时余与李君及高一涵（安徽）、马鹤天（山西）、邓初民（湖北）、曾天宇（四川）等在留日学生总会任文事委员会委员，编辑民彝杂志，李君黄种歌披露，同人无不举节，赞其气概之雄伟。

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要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狂澜，方不负石笔铁砚，后哲先贤。

（李墨卿《墨园随第》第497页）

(五) 神州学会和中国财政经济学会

1. 神州学会简章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神州学会。

第二条，本会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

第三条，本会暂设于日本东京。

第二章 会务

第四条，本会会务为常务学务二种。

第五条，学务大别为三如下，

(1)分科研究，(2)举行演讲，(3)编撰书报。

第六条，本会应分科目如下，

(A)教育科，(B)军事科，(C)政治科，(D)经济科，(E)法律科，(F)文科，(G)理科，(H)农科，(I)工科，(J)商科，(K)医科。

第七条，本会会员各就所学分隶各科或隶兼数科，科员在二人以上者得设科会讨论该科学术上问题，如有关联二科或数科者得由该科开联合会议或通知有关联之科派员出席科会，规则另定。

第八条，各科应推定一人主任，代表该科并主持科会事务，但一科中仅有一人者即以其人代表该科。

第九条，凡关于学术上实用问题或国家重要问题，会员五人以上得提议会讨论，如认为有召集全体会员之必要时应开临时大会。

第十条，各科会研究之成绩及讲演会重要之文稿，应交由文事科保管，随时印刷分送各会员。

第十一条，关于第五条第三项应设立编辑部办理，编辑部规则另定。

在第十二条，每月开讲演会一次以例会之期日行之，讲演规则另定。

第十三条，关于常务别设干事部，分科办理。

第三章 会员

第十四条，凡具下列诸款经会员五人介绍评议部认可者，始得为本会会员。

(1)宗旨相同精神相契者，

(2)研究专门学术者，

(3)能遵守本会会章者。

第十五条，会员如有违反会章及玷辱本会名誉者，经大会公决即行除名。

第十六条，会员不得任意退会，如有特别事由时，应具缄声明由评议部决之。

第四章 职员

第十七条，本会设评议部议决会务，设干事部执行常务。

第十八条，评议部评议员额，定二十一人由大会选举。

第十五条，评议部设评议长、副评议长各一人，由评议员互选，规定另定。

第二十条，干事部置干事长一人，分庶务、会计、文事三科，每科置主任干事一人，干事一人，由全体会员选举，办事规则另定。

第二十一条，本会职员均以六个月为任期，但得连选连任。

第二十二条，职员缺额应行补选，但以补足前任职员之任期为限。

第五章 会费

第二十三条，本会会员应担负之会费如下，

(1)入会费一元入会时缴纳，

(2)常年费每年二元四角，分四季缴纳之，临时费金额由评议部议决，

(4)自由捐款无定额。

第二十四条，凡会款满二十元以上须存贮银行。

第二十五条，本会会计出纳数目应由会计干事造具清册，于改选时报告。

第六章 会期

第二十六条，本会集会分三种如下，

(1)例会：每月一次，以第一星期日下午一时开之，講演会亦同日举行；

(2)选举会：以干事满任期举行补缺选举，以例会行之；

(3)临时会：有必要时由职员提议或会员十人以上连名请求，经评议部议决均得举行。

第二十七条，开会召集由干事部以本会名义行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本章程经全体会员通过后施行。

第二十九条，本章程如有会员十人以上提议修改时，应开大会议决。

(《神州学丛》第1号)

2、神州学会规则

评议部规则

一，本部一切会议事项由评议长整理之。

二，本部于每月第二星期晚7时开例会一次有必要时得照会章临时召集之。

三，本部议事出席者逾全员之半数即行开议，得出席人数三分之二可决即行通过，但出席人数不足全员之半数时得行假决议，并将假决事项通告全体评议员定期开会，倘出席人数仍不足全员之半数时即认该假决议为有效。

四，本部议决事项应于二日内评议长函知干事长。

五，介绍入会应先由介绍人具介绍书交由本部审查通过，即由评议长具函并介绍书缴纳执行部存记图。

- 六，本部执行会章第十四条时应严守一定之惯例。
- 七，本部备有图章册簿由评议长收存之，所发函件应钐本部图章否则无效。
- 八，本部开会应由评议长先期通告文事科，请其函知各员故无常置书记，但开会时主席得由部员中指定临时书记一人。
- 九，本部会议事项涉及他部或各科时，得函邀他部部长或各科主任与议。
- 十，本部各员如不具函请假连续三次缺席者，应即函询理由如无回答即认为辞职照章补选。
- 十一，本规则得于不背会章之范围内随时修正之。

（《神州学丛》第1号）

编辑部规则

- 一，本部根据本会简章第十一条组织之。
- 二，本部所编撰之书报定名为神州学丛，每季刊行，以阐明学术条陈时政为宗旨。
- 三，本部编辑员额二十人以各科主任十名，及大会互选十名充当之。
- 四，本部设编辑长副编辑长各一名由编辑员互选之。
- 五，编辑长对于文稿有修饰舍饰之权，副编辑长佐理之，上列权限编辑员亦得行使，但须得编辑长之同意。
- 六，每期刊行之前一月必须开编辑部会一次，讨论刊行手续，编辑部会由编辑长召集之，发信事件由本会文事科兼任。
- 七，本会职员均以六个月为任期。
- 八，职员缺额时需另选补充，但以补足前任职员之任期为限。
- 九，本规则有部员二人以上之提议，出席过半数之同意得修改之。

（《神州学丛》第1号）

讲演会规则

- 一、讲演员次序以抽签定之。

- 二、讲演员轮流出席周而复始。
- 三、每次出席讲演以六人为限。
- 四、讲演时间每人以三十分钟为度。
- 五、演题须先一周间，函报干事部。
- 六、演后一周间须将演稿缮交文事科。
- 七、凡值演请假者归次轮出演。
- 八、每二人出演后休息十分。
- 九、延请会外名士讲演时，会员出演时间得随时酌改。

神州学会设立支会议决案

- 一、国内或海外各都会及商埠有本会会员十人以上者得设立支会，不足十人时得暂设通信处。
- 二、凡设立支会必须同时具函报告本会。
- 三、支会章程得斟酌该地情形自订，惟不得与本会章程相违。
- 四、凡支会成立后应将办理情形及会员名册陆续函告本会以资联络。

（《神州学丛》第1号）

3. 神州学丛刊旨

神州文学发扬光大，极于战国，暴秦以降，猜主任术，曲统承旨，而隘而伪，害乃中于国家，有清承之，应敌辄败，创钜痛深，剥极而复，比及今日，国人知幡然屈首言学尚矣。顾犹讳言政，言政则瞋目却走，骇汗相告，訾为不祥，一倡百和酿而成习，黠者伏处其间，避其名举其实，攘其功不任其咎，天下多事，政亦息焉。呜乎，学与政岂真离绝不属，截然而分歧者。盈天地间，万事万物，精也研之，皆可成学，若大学之始于格物致知，至于治国平天下者，则政与学尤息息相通，昭然具在。此神州学丛之作，言学而亦不讳言政也。吾闻我国政与学之关系凡三变，古者事出于创，非

学不足以为政，故作之君者即作之师；次之则君师并立，政与学离，自其独到者攻之而成学，自其因习者演之而为政；次之则师隶于君，学隶于政，君日尊而师日卑，政日恣而学日媚，媚愈工而政愈失，政愈失而学愈亡，其枉但状其堂构署数字悬诸门，荷枪佩剑者环伺之，有人车服丽都，日麇集而出入其间，斯政之所自出，即学之所自出焉，安在其不兢兢于当世之禁，及今犹仅知言学而讳言政乎。夫政之得失，民所倚为生死者也，其发也无形，屏息而默征之，久乃冥合无间，今有歧路于此，左坦途而右大泽，蚩蚩之民，不造其极，将挥之左斯左，挥之右斯右，能决择者，曾无几人。使牧民者而不知所指导，在闭关之世，则亦幕僚食客起为官牧已耳。今则国之左右前后，纵金设间，掉三寸舌愿越俎牧吾官者，肩摩于道，几何其不舍坦途而陷于大泽耶。惟欲期政之一出于学，则亦不欲离，学以言政而已，谨揭斯旨，弁诸卷首，愿与国人共见之，亦即告吾人所以自勉者也。

（梅园《神州学丛》第1号）

4. 神州学丛启事

一、本志主旨在阐明学术、条陈时政，不涉偏激不陷空疏，尤以不存党同伐异之见为惟一信条。

一、本志纂述社员，皆现驻日京优秀纯洁之学子，及国内名贤，文责各自负之，社外投稿但期不与本志大旨相戾亦一律欢迎。

一、本志讲演一门最所置重，每期礼聘海内外名贤主讲、编定演稿刊入本志，会诸国人。

一、本志初期即承邦人君子与本会会员辱赐论文鸿篇钜制，美不胜收，本限于篇幅，后当以次刊出，但因主张不同，或议论后时碍难登录者，尚乞谅之。

（《神州学丛》第1号）

5. 题神州学会中华留日同志合影序及 李墨卿读神州学会月麓同志之合影序言

晚近吾华士子，竟航海外，即在江户一隅，已达数千人，亦云夥矣。余居东五六年，愧无以尽职，识其魁奇特起，卓然有以自立者，前后殆数十人。则以国家多故，自客夏相继内渡者，又十之七八矣。时用抚然，荆南邓君初民、江右张君慧疚，即吾所谓数十人中之二也。二子既去，皆豪于文，浩浩乎不窃，而任事勇迈，热诚横溢，尤为吾侪所心佩，乃者两君将于暑假返国，诸同志约饯于日比谷公园之松本楼，集者七人（荆南邓初民，江右张慧疚，赣江姚子材，三晋李墨卿、马鹤天，湘江邓子冰、申月麓）酒半各有演说，佳言名论、得未曾有，既乃共撮一影并嘱余缀数言于其上，以志不忘，余因两君之归，益感在东故识之日渺也，是为之序。

大中华民国六年岁次丁巳夏五月湘江月麓申文龙序于江户

墨子曰、民国四五年之交，山西马鹤天、李墨卿，湖南易梅僧、仇亦山、申月麓、荆嗣佑、易家钺，湖北邓初民、孙戴人、蔡天民，广东苏理平、林砺儒、黄霖生，贵州艾一情，江西黄界民、张慧疚，安徽姚子材、高一涵，陕西黄天行、蔡□藩，甘肃赵世英、苏景三、直隶李大钊、张润之，河南王杰、张国威，浙江殷汝耕，山东陈玉五、李益三、井雨岑，福建柯肩宇，四川曾天宇及其他各省同志组织神州学会，每于星期六讲演一次，并讨论祖国政治及世界大势，汇集讲演录与撰述，刊于神州学会杂志。时余年仅二十六七岁，正值血气方刚，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总会任文牍科主任，从事案牍。神州学会诸同志，又嘱托于讲演时特为记录，余于课余之暇，在杂志上又作长篇论文。抚今思昔，须用歉然！归国而后，担任山西大学及山西法政专门学校讲座，而同志

散居各地，久不通音讯。易梅僧因湖南赵恒惕之役而及于难，李大钊加入共产，为张作霖绞死，仇一山于十七年北伐，任战地委员会副委员长，马鹤天前在甘肃任教育厅长，今则在考试院铨叙部任司长之职，黄天行漫游欧洲之德意志，高一涵教授于北大，邓初民、申月麓、蔡天民等，于民国十年至十五年之间，寄迹山西，或则担任军署编辑，或则在中等以上各校教书。厥后邓初民返归湖北，十七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申君月麓、学问人格，俱臻高超，去晋而后，教授于北京师范大学。人事沧桑，回想东京一堂讲学有如隔世，读神州学会月麓同志之合影序言，检吾所知消息之同志，拉杂叙之于篇，海涯天角同学少年，黄土青塚，人寿几何，不禁感慨涕零云耳。

（《墨园随笔》第553—555页）

6. 中国经济财政学会

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叙言

经济之著为方术也，其始于国际竞争之世乎。文化初启，土旷人稀，，养欲给求之事，取之封内而已足。虽建为国邑，有所受治，而政事极简，财取胜残去害而已。故吾国先哲，如孔子先富后教之说，孟子恒产恒心之论，止就欲兴民行先厚民生立言。至于君公论从政，则皆以务财用为戒。唯管仲李悝商君之伦，官山海，尽地力，务农战，颇收富疆之效。而所遭乃属诸侯争霸之会，汉以后儒者祖述孔孟，最重言利，故太史公著平准书、货殖列传，意在讥刺当世。后世史家之褒贬往事者，用意亦同。凡以民族统一自为消长，无国民生计竞争之事故耳。欧洲古代希腊诸大哲于各学科咸极深研，几为近世学者先河之导。而言经济者独不少概见。降及中世，声响闾如。盖尔时旧都中衰，新起之民族代兴，文化尚稚，其人群之情状，犹未能脱部落之余习，亦无能促国民生计之争。

迄乎近世之初，国家主义大行，西葡日法荷英诸国，迭为雄长，如是发扬蹈厉，以求国际地位之优胜，国家之职务日繁，经费之长益剧，而财政问题，遂为国命之所由决。顾第言理财，而不以浚源为先务，将不免竭泽为渔之弊。于是振兴国内产业，奖励对外贸易，而重商政策肇焉。自时厥后，言经济者学派朋兴，云蒸霞蔚，最近百余年间，欧美各国所以能纵横海上，斡旋宇宙者，良由其民生之厚，物力之丰，得以维持其政府，使从事于富疆之业，至其阜民殖产之功效，则由学术大兴而经济财政研究之进步，实司其键也。吾国自开海禁，已加入国际竞争之局。然国人不能将时势，以图生计之竞争，顾犹拘墟自足，暗于外情，图讥外人之专事牟利，不知民生之荣悴，实与国运兴替为缘，凡一切利用厚生之事，悉听蚩蚩者之自谋，士大夫不一过问。其营农业工商业者，类皆蹈常习故，墨守成法，未尝有观摩益善之为，故通商数十年，国民生事日益凋疲，实业利权次第陵夺，情见势绌，莫能枝梧，而国人仍熟视若无睹，至于国用匱竭，司农仰屋。自前清已然当局者不能准理财之原则为根柢之改革，徒知头会箕敛，以取办于一时，故财政凌乱淆杂，末由端倪，唯持厘金盐税等项，简捷易行多取之而民不能抗者，为增加岁入之计，而负担是否平均，产业曾否蒙害，即不暇问。革命以还，稍改观矣，然法令徒具，而有司之分职任事者，鲜具有财政之常识。呜呼，持是以与列疆角立于国际竞争之场，如侏儒与乌获较举鼎，其终至绝膜而毙也，必无幸矣。

日本开国视吾较后，而彼中治兰学者，夙洞察及此，教育家福泽论吉氏当藩幕交争、兵革倥偬之际，犹聚讨生徒讲习经济学不辍。风声所被，群彦景从，卒使学理昭明，政策顺轨，而经济发展、财政扩张之实，迺挟一泻千里之势，今且以我为尾闾焉。吾国自侯官严氏译斯密氏原富，人始知有计学。数十年来，从事研求者稍有其人，而国人咸以轻心掉之，未肯策群力以底于成。呜呼，国计民生之所以愈久而愈敝，其不以此与。同人等每

惟国家经济前途，怒焉忧虑，窃思有所尽力，以贡献于国人。爰不揣固陋，征集同志，立为斯会，研究东西学者所述原理，兼调查国内现行事实，斟酌损益期于可行。庶以微力效山海填流之助，邦人君子，其或有取于斯。

(《民彝》第1号)

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简章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中国经济财政学会。

第二条，本会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

第三条，本会以两种会员组成之如下

甲、责任会员：以能委身研究图达本会之目的者充之。

乙、名誉会员：凡不为甲种会员而对于本会能负调查责任或以财力及其他方法赞助者充之。

第四条，凡为本会责任会员者，须先由本会会员介绍得责任会员全体之承认。为本会名誉会员者，须先由本会会员介绍，得责任会员半数以上之承认方得入会。

第五条，本会会所暂设于日本东京。

第六条，本会设会务干事一人，经理本会一切会务；会计干事一人，经理本会收入；图书干事一人，管理本会图书。此外遇必须添设职员时，得临时议决行之，皆由本会责任会员选举，以半年为期。

第七条，本会每二星期开会讨论一次，责任会员非有重故不得缺席，名誉会员愿莅会者随意。

第八条，本会俟研究稍有成绩，应随时编辑印行以供国人参考。

第九条，本会购买图书存于会所以供会员阅览。

第十条，本会责任会员须纳例捐如下，例捐之外能任特别捐

者随意。

甲入会金，每人二元，

乙常捐，每人每月五十钱。

第十一条，本会关于图书会计及研究方法各细则均别定之。

第十二条，本简章经责任会员三分之二以上决议得修改之。

附民国五年现在责任会员姓名籍贯：

张声煥	字秉文	湖南，	张 定	字叔丹	湖南，
周子肾	字伦笙	湖南，	彭 蠡	字一湖	湖南，
李大钊	字守常	直隶，	钟 恺	字元卿	湖南，
殷汝耕	字亦农	浙江，	刘作柱	字	湖南，
张润之	字泽民	直隶，	陈溥贤	字博生	福建，
刘聘业	字	福建。			

(《民彝》第1号)

四、北京办报

述要

李大钊于1916年5月回国。从他回国直到1917年11月中旬进入北京大学为止，这一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他的生活、事业的变动也较为频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先是主编了《晨钟报》，后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等的创办编辑工作。因此，办报编杂志便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这个时期李大钊勤于著作，发表文章约九十多篇。从这些文章中，可了解他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线索。

李大钊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与白坚武等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不久，出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之邀，在北京主编《晨钟报》，参加编辑的有白坚武、郁寔等人。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出版。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说明：“《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二十多天后，由于与研究系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他在《晨钟报》第26号（1916年9月9日）上发表《李守常启事》，声明辞职，对以后“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

《晨钟报》于1918年9月因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消息而遭封闭，同年12月改组为《晨报》继续出版，1928年6月5日停刊。

离开《晨钟报》后，李大钊参加了《宪法公言》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与郁寔，高一涵等为主要撰稿人。该刊主要支持者为孙洪伊，经理为秦广礼。该刊以“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法律思潮以荡涤专制邪秽，为涌现一尽善尽美之宪法”为宗旨。在1916年

10月1日《宪法公言》第一期上，李大钊发表了《国庆纪念》一文，此后又在其上发表了《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矛盾生活之二重负担》等文。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该报是章士钊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办的，它是《甲寅》杂志的继续，同年6月在张勋复辟中终止，共出一百五十期。

章士钊回忆说：“1917年吾发行甲寅日刊于北京，约守常共事。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

（《回忆李大钊》第144页）高一涵也回忆：“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刊》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刊》。”

（《回忆李大钊》第164—165页）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发表文章共六十九篇，其中分析世界大战的原因，介绍欧洲和俄国革命运动的文章占相当比重。

与此同时，李大钊又参加编辑《言治季刊》。该刊是《言治月刊》（1913年4月至11月）的继续，同为北洋法政学会的机关刊物，主要编辑成员仍为李大钊、郁嶷、白坚武等。该刊是北洋法政学会同人发表政治见解的园地，也是用以维系分散各地会员感情的纽带。后因政治思想的分化，经费不交等因素，只出版三期，即告停刊，北洋法政学会也从此解体。

1917年5月5日，李大钊离京回乡，在乐亭住一个半月，于6月22日回京。《旅行日记》和《乐亭通信》，就是写他这段时间的见闻和感受。

7月初，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李大钊文集》（下）第917页）在上海，协

助孙洪伊工作。这时，他与李剑农在沪主持的《太平洋》杂志建立联系，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

1917年1月4日，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式到校视事，开始了他对北大的整顿、改革工作。1月13日，陈独秀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后，北大不断出现新面貌。李大钊此时对北大甚为向往，“志在得北大一席”。（《回忆李大钊》第145页）后经章士钊等介绍，终得如愿。同年11月11日，李大钊离南京北上，于11月16日前，到北京大学就职。

(一) 创办《晨钟报》

1. 《晨钟》立言之标旨*

天祚中夏，民国再建，海内谭士弹冠相庆。记者椎愚，窃饶深忧，夫共和福利非巍形貌，精察神祖，百愚斯丛。墨西哥中南美与吾国有类焉者，而变乱踵属抚往推来。神宇前途何可乐观，然众论欢嚣，积羽沉舟，贸进诤词转斥狂吠，横流狡獪，允堪陨涕。惟春雷旬发，不以万籁潜蛰而辍响，晨钟铿锵，岂因群昏梦酣而销声。厄言日出，强镗不舍，苟有用我者，期年而可语于治矣。出版伊始，谨揭二义，昭念国人。

(一) 平息党争，立宪国家，类有政党，国人想企宪政如饥赴食。兹揭斯义，岂非不词。然环瞻国情，斯义有当谨者，夫政党政治肇自英伦，而英伦之政党政治，则自阶级政治蜕化而成者也。一国之内民众杂糅，利害各歧，同明相照，聊合为团而党生焉。就英国言，贵族资本家以帝国主义为标帜，中等阶级以自由贸易为标帜，劳动阶级以社会主义为标帜，而保守自由社会三党鼎立焉。吾国国情无一于此，此不可有党者一。

政党所代表者为一阶级的利益，抑即一部分人之利益也。民国肇创，经纬万端，当萃全国心力，共谋全国福利，而一部分人之利益非所急也。日儒长鸟氏曰，今日当制造以国民之心为心，以国民之血为血之政党，而他政党无存立余地也。夫国民之心无二，国民之血亦无二，而由兹制造之政党即国民全体之幻影。今既举国一体同谋建设，根论未歧，党亦何必，此不可有党者二。

政党政治必两党对峙，一尚保守以固执政治上向心力，一尚

* 标题为编者所加。

自由以固执政治上背心力，相激相成循环起伏，始措国运于正轨，此近世政家公言也。然征诸历史，一国中如贵族富豪，大抵保守党也。中产阶级以下，大抵自由党也。两党对峙之说似可成立，然顾劳动阶级始以排斥贵族富豪为中产阶级效奔走，终以利害之冲突决裂分崩别树徽帜而组织第三党者，盖又比比也。近顷三党鼎立论，既为学者所唱导，而考之英法各国先例，更彰彰然也。英国前此保守自由两党，本属对立，政治运用颇循常轨，今则社会党发生，已滋纷扰。而欧洲大陆，除比利时外，皆小党分立。德之政党，岐为十五六，法、意之党亦不下八九，而奥匈尤共，匈虽不逾十数而奥则有六十以上之小党，是故政党政治，非两党对峙厥效难覩，而考之实状小党林立各国通患，吾苟立党更复何幸，此不可有党者三。

政党者公党也。以政见决从舍，抢独标之特帜，其国民苟非具政治常识，饶政治兴味者不足以运用之。吾国国情，何有于此。元年之交，党派蜂出，各党所标政纲模棱游移，有类似之雷同，无根本之差异。村究谀墓，盛词褒美，人胥圣贤使复名号，不知为谁氏子也。且民智塞鄙不解政象，二三党魁播弄其间，人欲横流，逐沈弥彰，斯其党入党也，亦私党也。迁流所及豪暴专制，末世滓垢猎奸乘殆，摧陷残毁，牛骥同瘁。国柄以移，怆怀往躅宜痛警策，倘犹浮慕虚饰，载糶实糶，贤达谋国或不忍出。此不可有党者四。

抑记者谓中国不宜有党者就今日言耳，人类为政治动物，缘接政情其途百端，政见之歧自尔不免。他日国基渐定，政潮平静，去小歧而联大同，蔚成两大相辅有成。记者不敏窃遥祝之，然非所论于今日风雨飘摇之中国也。

(二) 不诋阴私，荣古虐今国人特性，古人长往渺无恩怨，推崇褒美，慨异世而不见，今人比肩，阿私挟嫌，横起门墙如同恶异，不本理真。同者盗路而圣贤，异者圣贤亦盗路。韩子有言，今之君子，其责人也重，以周賈其然矣。夫懿才亮节，德已洽于

叛隶，稟赋既有偏毗，损其令誉。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越舍虽殊，均不失圣也。贵小害而彰大善，仁人用心固宜若此矣。自袁氏擅国，诈诡交作，正论榛芜，言论机关或威服于白刃，或软化于黄金，报纸尽称元勋，毁誉无所依凭，歌功颂德一道同风子云，美新无其溢量。李斯督责逊厥谄谀灾口，黎枣兹亦甚矣。而异己之杰，大谊昭然，索痛词假遂及阴私，假逆贼之词恣其恫喝，扇床第之私，鬪彼清修，桀犬吠尧自溢忠贞，社会风纪耗灭殆尽，夫一人之是非理曲，自有其人之身乘其应得之果。报纸职责在于商榷时政得失，宣究民群疾苦耳。个人行检晓晓置喙，既伤忠厚且侵天彝。本报同人，揭此孤诣永失弗谖，海隅名宿幸昭鉴之。

呜呼，环宇至广也，而中国处之奚翅培壤，中国至大也。而本报虱其间，奚翅涓芥，发愿宏大，力或不举然□冠不云乎。中流失舟一壺千金，众论纷咻，本报挺生，言论曙光，果自是而崔嵬灿烂也。中国之福亦本报□□，记者款启，谨执笔以从。

（见《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2. 《〈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3.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4. 李守常启事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二) 在《宪法公言》编辑部

1. 《宪法公言》章程和序列

宪法公言章程

第一章宗旨及命名

第一条：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政之精微，助长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涌现一尽美尽善之民国宪法。

第二条：本杂志朴实说理，称心而出不骛空谈，不尚偏激必期诸心安理得，凡中外人士关于宪法之言论著述，无不极力欢迎，故定名为宪法公言。

第二章体例及办法

第三条：本杂志除首冠图画外分门撰述体例如下：

一著译、二选载、三专件、四纪事、五会议录、六文告、七宪法史、八附录。

第四条：本杂志月出三册逢十刊行，每册不下六门，约三四万言，定价六洋二角，邮费三分。

第五条：本杂志准各处批发代售，其办法另行订定。

第三章撰述及经费

第六条：本杂志撰述除由同人发稿付刊外，凡博硕之士崇论闳议均可自由投稿，一经登载即以本期杂志奉赠，聊申谢悃。

第七条：投稿者真名别号随意用之，但须书明住址以便通讯兼寄赠品。

第八条：本杂志言论自由为公共商榷而设，非一人或一部分人所能左右，凡不背本杂志之宗旨者，皆得发表惟所主张，作者自负责任。

第九条：投稿不为登载亦不退还，但声明必还者，亦当照办。

第十条。本杂志经费除由同人自行筹集外，其有中外贤者资助，则以本杂志若干奉酬，不负其他义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本杂志发行所设于北京虎坊桥二十二号门牌电话南局二一〇七号

(《宪法公言》第4册)

宪法公言序例

大乱初夷，边氛日炽，二三贤哲，驰骤其间，纷拏喧囂，而国之根本大法阙焉未讲，此同人所为深忧也。夫良骥日驰千程，必资銜勒范民正轨，导国隆治，壹赖于法，苟荡澶国命，何寄矧宪法为万法源泉，国之大纲，由兹而产，释此不讲更复何幸。顾各国宪典悉准国情，谛义精旨，未可袭取，纂擷菁英邃究理蕴，资造法者以考镜，召国人而共喻将必有物焉。伺其载布宪法公言之刊，意在斯矣。并世弘达幸助勳焉。

理悬天比厥有真谛，噩噩潜思，著其闾曠，东海西海人共此心，异国方闻，译其菁英列著译第一。

众论庞淆、虜丹帝素、刚甄柔坯、失厥中道、说言诤词、足药其颇、别而载之、以广流布列，选载第二。

海宇名宿、撰著斐然，不我遐弃，俯贶珠琅，敬谨掣发淪益智神列专件第三。

世潮湍激，变纷万千，缙理撝论必资考验著彼谗闻，辟此大道列纪事第四。

制法立极道德齐礼坏治，一陶群生得理列会议录第五。

府院布说胪载条悉典章法制因革粲然列文告第六。

国性结晶宪之谓乎质文损益夫鲁有初列宪法史第七。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爬英栉华各以类从其不属者，迺殿于兹列附录第八。

(田解《宪法公言》第1册)

2. 《宪法公言》出版露布

人治法治，竞标厥旨，当国者得其人则治，此人治之说也，根本制得良法则治，此法治之说也。故根本制之于法治，亦犹当国者之于人治，世人愤当国者非其人，则粪除君主易置总统，若扰踵恶亦粪除之，当是时牺牲亿兆流血，百万锋镝有腥甲冑有虺皆不恤也。宪法为国家制度之根本，法治之于宪法，人治之于君长，比类而观，有同然者。民国肇造，初有鄂州约法，继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临时约法，属在草创，不无可议，二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拟有天坛草案，尽美尽善，亦难言之，大盗伺隙，作新约法，国几不国。今国会既复，宪法问题为当务之急，则人各出其全力，钩心斗角从事于斯役，竭智尽虑期诸美善，岂犹理有，固然且足以示人，以宪法之重，同符君长抑又过之，岂不懿欤。同人不揣绵薄，辄树一帜，从诸国人之后，邦人诸友阅议说论，有笔如刀，顶礼欢迎引与同袍，东西士大夫言有可取，象寄鞞译断乃锋刃然，高挹群言力戒偏颇而又与世人共斯役也，故名之为宪法公言，埋根首进弗得弗措愿共勉之。

(田解《宪法公言》第1册)

3. 李大钊《国庆纪念》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三) 编辑《言治》季刊

1. 《言治》季刊宣言

世界文明之邦，其首都不第为政治之中心，尤学术之渊藪，文人学士群集讲习，会社林立，巨制宏编，流衍里巷，涤瑕荡秽，庶汇昭苏，国运日隆，治化蒸蒸，有自来也。吾国不然，文明肇原虽古，輓近陵迟，日益千里，以北京观之，士夫趋走利录，学子困于生计，无礼无学，贱民日滋，罔聪塞明，人灵樁亡。夫首都如此，他埠可知，举国昏愤，沦胥立俟。同人忧愤，所由独绝等夷也。

癸丑之春，同人研学析津，斯时举国党争方棘，日攘月刊，鱗毛蠹虫，丹素互攻，类有所主，正论销匿，讹说横流，同人忧之，曾以言治月刊，就正当世。复行之始，作搦管宣言，即以不党之义、痛陈筒端，岁月奄忽，今更四稔矣。微响中缀，政变鼎沸，党争蝉联，几殆国命，言念往蜀，尽然不知涕之横落也。夫立宪之国，固不可无党，然党争焦点，宜在政见，政见臧否，判于学术。故党人能事，在就学术，幽缊遽搜，欣然有会，参以国俗，抒为政见，揭示斯氓，群众和之，乃观厥成；若不学之民，徒党私意，谬相号召，鼓扇曲词，浸为政蠹，国日寃隳，不其宜乎。

比自欧战飙兴，坤輿倏扰，求日世度，莫可究诘，国人际此，宜深警惕，而求所以应世济变之方，则于学术之研讨，尤倍急于平时。盖战后世界之政治、经济、社会诸问题，为前此宏哲耆宿殚虑困思所不能解决者，必兼程疾驰而图其解决，为前此见象拘囿，宛转聘驷所不能蜕嬗者，必刮垢刷尘而图其蜕嬗，其学术弥进者，而解决蜕嬗也弥速。而学术榛芜，文酣武嬉，玩日愒时者，必不足以自存也。呜呼！兴亡之机、所关綦巨，同人菲陋，岂足任

此，聊奋绵薄，冀为国论之先导耳，忧世君子，将必有感于斯。

(郁崑《言治季刊》第1册)

2.《言治》季刊启事、广告

本志白事

- (一)本志对于现代文化、思潮、政治、社会、法律、经济乃至教育、产业或绎一理为湛深之探索，或陈一事为痛透之批评，力避偏执，广尚商榷，海内通达，有以一理一事相质证者，无任欢迎。即或其理其事，非同人识力之所能胜，亦当代请名家为之解答。
- (二)本志虑同人闻见之狭隘，不敢以此编自私，特辟名家讲坛一栏，每期延请专家，就一问题，畅为发挥，以饷学者。
- (三)本志门类，以撰著论丛译述为主，其余应视编辑印刷之机会，略有变通，阅者谅之。
- (四)本志为北洋法政学会之机关杂志，对于会员消息，特别注意，现在本会会员，散在殊方，或从公于内地，或向学于他邦，或养志于田园，或营生于都市，顾各常以函讯赐寄本志，或述职务之经验，或写生活之状况，或纪山川之景物，或陈近日之感想，应心应手，均所弗拘，一鳞一爪，皆为本志所重视。
- (五)本会会员最近住址，不能一一尽悉，有愿阅本志者，一经函示，必当照寄。
- (六)凡从前订阅言治月刊或季刊，缴价尚有余裕者，一将最近明确住址见示，即为邮寄不误。

(《言治季刊》第3册)

北洋法政学会言治季刊出版广告

本会同人在民国元年刊行言治杂志，力崇学理不尚偏激，颇蒙

读者赐以称许。旋因事停刊同人深以为歉，兹属共和再造，同人等亟欲与海内宏达为政学上之商榷，因决定重行发刊。将从前门类略予变通，分为撰著、论丛、译论、纪事、文苑、小说、附录七项，并改为季刊，每期约六万言，已于四月一号出版。遇有重要问题急待解决时，另发行临时增刊，宗旨不背。曩时内容益求精审，爰读诸君知必以先睹为快也。

北京米市胡同十七号北洋法政学会谨启

(《神州学丛》第1号)

(四) 编辑《甲寅日刊》

1. 《甲寅》日刊之发端

(一)

愚不获以文字与邦人诸友见者年余。窃以为更事多、积理富，大可资商榷者存也。相知者亦谬以相期，及料事选言、搦管自奋，前之所自信足资商榷者，乃俱乌有。愚知斯文出世，前之相期者，必且动色相告曰：若某者所言亦不过如是，又焉用彼言为也。嘻，是何故欤，是何故欤。

愚常澄心思之，若是者有本有原，本原非一二语所能尽也。今请也标一义曰薄今。

人与境相对者也，惟非常之人能胜境焉，否则为境所制所恼所拘挛所戏弄，夫境者现在之谓也。以是人每不能熟察现象与以相当应有之处置，惟觉当前之百无一可，人至为当前之境所制所恼所拘挛所戏弄，则其心思恒游于境外，而不禁生其怀旧思古之情。当袁氏执政之时，每闻人言曰何者何者举未若前清也。当今之时，亦闻人言曰，袁氏之所不应出者帝制耳，何者何者其举措俱有愈于今之为也。噫嘻，心理之偏至，抑何至于此极欤。无论新旧代谢，时序莫复，假若复之，而谓今之讴歌过去者，将择而安于其所讴歌者焉，虽五尺之童亦不能信。盖过去者即当时之现在也，苟非当时至不满于其所谓现在而谋革命，焉有今日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稍稍平情以思，当知所经苦痛之去人未远，而感情用事之无益于人治也。夫政弊俗偷在今已甚，为愚言者，决非于现在有所曲庇，特以既见其弊与偷之所在，当汲汲求所以药之，而不当废然为歧想悲观所误。吾乡有名士之女，嫁夫不文，愤而语其父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此特与愚所谓薄今者同其情

致耳，非真能为娼者也。愚之转语则曰，不能为娼即当为妇，不娼不妇是为自绝，今之人岂有真欲自绝者乎。胡为一念之差，使其流弊乃至于斯也。

医社会之病者，恒苦东扶而西倒，国家经一度剧急之改革，其症候之新发见，为前此所未有者岂得言无，不过新生者二三，革去者或为五六，以二三为五六元偿价岂犹有亏。驳者曰二三五六未有的标，在予思之或得其反，愚谓改革者本非能骤见光明之事，即如驳者亦舍尊今别无良法。譬为途道，乘光入洞，入之愈远，黑暗愈增，斯时也果频频回首恋余光而辍功乎，抑奋力前进以求大通乎。

凡愚所言在说明所谓今者，为吾人不可逃之一限，而又决非理想之域。其中情感利害意见希望新旧相冲，错综百出，欲爬梳而条理之，所须调和质剂之功至无涯量，而此者又断非不可能之业。国家之事，逻辑中恒有境焉，纳所有情感利害意见希望于其中各各到其好处，吾儒之所谓位育即斯境也。谓治国者其功能将与斯境合体，诚为欺人之言。然悬为的标息息而意之期于不中不远焉，则立宪之精义也。当今立宪各国，其政绩足与于不中不远者且难言之，何有于吾国，故吾者不可因其难能而废阻，尤不可不知难能之处，即在爬梳条理所有情感利害意见希望之中，爬梳所有情感利害意见希望，又俱为准情酌理平易近人之事而欲为准情酌理平易近人之事，则以今日吾辈生斯长斯之社会为之基础已恢恢乎其有余。毋妄忆过去而流于悲观，毋预计将来而蹈乎空想，脚踏实地，从所踏处做去，则今之国家庶有豸矣。此本报之大愿也，读者若以卑之无甚高论相请让，则敬谢不敏。

(二)

愚昨推论举世悲观之原曰薄今，兹请更著一义曰忘我。

人之恒言曰无办法无办法；又曰举国滔滔我奚能为；又曰天下之大，成事者何必在我。嘻，此真忘本之言也。盖物与我为对

待，舍我而言物，物于何有，实属不可思议之事，故无我即无国家，独奈何舍我而与人家国事。

忘我者有二蔽，一曰我为善，无利于而国也，我可不为；一曰我为恶，无害于而国也，我不妨为。为此言者，大抵以治国之责，推之于人或以国无可治，宁相与倒行而逆施之。不知人之能作是想，谁不如我，计我之于全国，固若稊米之在太仓，然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吾累是土环吾而立者，又举见其同累是土也，而九层之台成乃至全国无一人矣，今之现象毋乃类是。

愚尝推原其弊，盖中于未明我义，凡人自始生以至终老，盖有必尽之义务焉。所谓义务，范围之广狭、实行之难易，尽各不同，而逻辑上必有其相当之域，恰与若人身分智识境迁相称，冥冥中促之不得不准，是而行者则无疑也。是之谓本体，本体者乃真我也。真我为玄名精理，非附于人无由表见，由是以分界张甲李乙而张甲李乙群得我名焉，夫张甲李乙固各自有其我境，而要能以能举本体为归，不然者即不得谓之有我。于时，张甲自称曰我，未敢许之为我也；李乙自称曰我，亦未敢许之为我也。必欲我之此亦张甲李乙，久假未归之我非真我也，真我者律之人人，而准非张甲李乙所得而私也。往者读公孙龙子，有白马非马、黄马非马之义以为难解，由今思之有何不明。盖亦谓马者逻辑上有其本体，初不待黄白诸色而立黄之白之，意存乎黄白非能举马之实耳，与愚顷所谈我义盖相通也。

读者果不以斯文为谬，则凡自命为我者，宜时时不忘其义务，以求合乎逻辑上之本体焉。此其义务效用初不出乎一己，盖如是始成为我，不如是则不成为我，我者人也。故易而言之，如是始成为人，不如是则不成为人也。由是我完我职与否为已身，人禽舜跖问题至其及于国家之影响乃第二步事。人曰我为善，于国为何如也，我为恶于国为何如也，似犹未免早计。虽然一国之内张甲李乙何止万千，果张甲李乙群居如沙点之相聚也，则一沙点之为善为恶，诚无所关系，乃甲乙有其公我焉。张甲为善固无益于公

我，而公我可得藉此以自见其本体；李乙为恶固无损于公我，而公我不幸以此不见其本体。公我之一见一隐所关于世道人心者至巨，盖公我者光明也，其见也有若光明之发于黑暗，群欲得光者举至此而接焉。语曰己立立人、已达达人。所谓己，公我也，光明也。立云达云传光明之谓也。斯则盖其在我之为效于国家果何若哉。故人葆其真我为国家之所利赖，反之其害中于国家无待言也。

真我何在，亦易辨之乎。欲易辨，葆之亦易为功乎？曰易为功。大学有曰，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当其厌然之时即能辨其真我之所在矣，此小人且能之何论于中人以上乎。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是在能充其类而已矣，充其类者即葆之之道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仁者人也，人者我也。故不啻曰我欲我斯我至矣，是第恐不为耳，何不能之。有哉！

我义既明，则其中明明有逻辑之境，途不可不遵之而往。愚曰忘我非恐张甲自忘其为张甲，李乙自忘其为李乙，乃恐甲乙忘其逻辑之境途也。故张甲李乙亦惟有周察四围境遇，认明一己正当之地位，本大无畏之精神行其良知能之所觉验而已。一切悲观之谈，自暴自弃之事，举无地足以自容之也。方今人欲横行，民彝墜地，世之君子不以愚说为迂远而存之，于言治或不无小补也。

（李士钊《甲寅日刊》1917年1月28、29日）

2. 《甲寅》之新生命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五) 回乡纪实

1. 旅行日记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2. 乐亭通讯

(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六) 李大钊与白坚武、

孙洪伊、汤化龙

1. 白坚武日记（节录）

一九一六年

5月1日 “张泽民来，同访耿荷生未遇，到孙伯兰处与崔叔和谈，又同小酌，候寿昌久不至，念极。”

5月2日 “李寿昌致泽民书，阅之始悉不日来沪。”

5月19日 “十九日，收拾行具，夜车来沪，晤孙伯兰、汤济武报告宁状。与李守常叙谈。”

5月21日 “研究会开会。到会者有孙伯兰、李大钊、王法勤、彭介石、易白沙、张润之、李培藩、李步青、谢寅、梁家义诸人，此为第一次集会。

晚阅《民彝》杂志，《国本》、《民彝与政治》二篇甚佳，多见到之言，《民彝与政治》系守常撰。”

5月23日 “午后崔淑和来谈，晚同守常谈甚适快，修书一封托叔和转达。”

5月26日 “午后，赴泰安里访守常，责敏继到，同凝修、守常到尚贤堂参观华品陈列所。”

5月28日 “开第二次研究会，议论纷纷，结果惟省之地位存在，可亭同吴允之来。”

5月31日 “研究会开第三次会，未到会。时局日非，迁延终无望。”

6月4日 “二时开研究会，无甚结果，撤销府议案。”

6月6日 “晚刻同李凝修、张责敏、守常小酌宴宾楼，赴

丹桂观剧。”

6月8日 “午后，访何海秋未遇。同守常、责敏访王宗周。”

6月21日 “同守常、责敏议北归。晚买达仁堂益州救苦金丹十五丸，用洋三元，……”

6月29日 “仲彬病未愈，未能赴杭。同守常、例白谈文学。”

7月5日 “守常介绍与章行严晤谈，章君聪慧明秀，时正卧病白克路宝隆医院。”

7月11日 “守常、仲彬乘通州轮船北上，同行者有霍例白、容伯挺。”

8月1日 “偕守常、责敏访王笠哉。”

8月3日 “偕守常、责敏往访张溥泉，路迂王笠哉同往。”

8月13日 “晚偕守常、泽民访孙伯兰，谈某项教育。”

9月3日 “晚，有数问题同守常、泽民、叔和商之。”

9月6日 “偕守常访秦立庵。”

9月7日 “守常在老便宜坊请宴一涵高君及秦立庵、田克苏，议宪法公言主旨。伯兰出访之未迂，再与守常访何海秋，未得其住寓。晚，偕立斋、守常访伯兰略谈。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

9月10日 “昨晚秦立庵、田克苏请宴，高肖良因病未到，守常归里，单自赴请。”

9月26日 “偕叔和赴华园沐浴，归来展仲彬片，知守常今日可到京。”

10月1日 “晚到日日新报，摊赵南野丧份。赴皮库胡同看守常，同赴羊肉胡同。”

10月10日 “午前同守常到羊肉胡同，与伯兰略谈某会议员接洽事。”

10月27日 “早守常来，同访张溥泉，迂耿荷生，同至醉翁

寓，迁袁不同、夏述唐。”

11月2日 “与守常谈，吾人生活问题最难解决，休养前途固不能以此止，然终有碍。”

11月21日 “晚，偕守常访王从周。”

11月24日 “午后，同刘毅公、守常晤伯兰。”

12月1日 “国人为黄蔡开追悼会于中央公园，同守常、泽民赴会。”

12月6日 “同守常访周国屏、齐隐斋、郁宪章，至林质生家小饮。”

12月10日 “秦立庵、田克苏约《宪法公言》编辑同人摄影于同生照相馆。”

12月11日 “同守常、二泽、子超赴津，开法校毕业同学欢迎会，留六日。”

12月25日 “是日为云南首义纪念日。偕守常访刘任夫于恒发店，又同至中央公园看纪念会，斯会为政学会所包办。”

一九一七年

1月10日 “早车来京，晤守常，知伯公已南下。”

1月17日 “偕守常同访张璧堂、张新吾。”

1月18日 “……修正北洋法政学会章程。”

1月23日 “阴历一月元旦。早九时起，午后同守常至厂甸。守常买油画猫四张。赠余二张，又至俱乐部。”

1月27日 “秦立庵请《宪法公言》编辑同人晚宴。”

1月28日 “午后，开北洋法政学会《言治》季刊编辑同人预商会。”

2月11日 “神州学会开会未到，北洋法政学会开会未到。”

2月21日 “晚，偕泽民、守常访张新吾。”

2月23日 “偕克苏、守常、质生、子超赴陶然亭散步，共

以外套铺地，狼藉仰臥，斯时觉万念皆空，其乐陶陶，诚南面不易也。”

3月4日 “驻京神州学会开会于中央公园，选举职员，被选为评议员，《神州学丛》将出版于东京，捐洋一元。”

3月11日 “神州学会开评议会。”

3月25日 “午后同守常、泽民游公园。守常云，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余其以为然。惟其动也，故进取，惟其静也，故保守。……”

4月1日 “守常来快信一件，即复。”

4月14日 “早收守常快信一件，内附卓廷函，晚复。拟明日代表东公至宁。”

4月26日 “北洋法政学会同人组织《言治》季刊第一期已出。细稽内容尚可，在现见杂志中居上乘，惟财力恐不能久也。”

5月4日 “守常明日回里看细君病，约代为《甲寅》日刊作文，意绪纷冗，恐不能如愿也。”

5月30日 “守常久不来，殊形寂寞。”

6月15日 “寄守常信，促其快来。”

6月22日 “守常自里来。”

6月23日 “与刘祖尧晤谈，渠欲办报于天津，特介绍守常，嘱刘往访。”

6月25日 “暑气甚热，未出门。守常、泽民来京。”

7月23日 “……附守常一件，告以易梅僧在沪地址。”

7月29日 “早收守常，酒寓各一件。”

8月4日 “收守常来信一件。”

8月5日 “复宋仲彬一件，并寄其原函于守常处。”

8月6日 “守常、采言各来函一件。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免之。录有诗如下，客居纠纷，未克答和，敬俟异日。”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

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南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8月9日 “……寄沪二件并寄呈守常诗一首，系舟行自津过烟台所作。”

9月7日 “寄守常一件，嘱订《太平洋》杂志并嘱转告成希武速寄宁恒报纸。”

9月11日 “接守常一函，介绍姚君祖义。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请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寐兴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到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9月30日 “中秋。接张树之、守常、韩挹山、杜扶东来信各一件。”

10月4日 “……即复守常一件。”

10月13日 “寄守常一函，林质生一函。”

10月19日 “早刻，赴华洋旅馆看守常。”

10月21日 “在陈雪轩处晚饭，偕守常、雪轩、叔和赴金陵大学观游艺会。

偕守常见督军，接洽赴日事件。午后，同温佩珊、徐襄平、谢晋卿合照一影。游明孝陵，缘坂扶茅登高陵而上，体力颇疲，席地憩片时，下陵饮茶。……孝陵工程较长陵远所不如，开国之君尚朴也。返过古物保管所，稍周览。赴金陵春，代表督军请彭静仁、李守常二君，同任共事为温佩珊，陪者为杜扶东、施鹤初、程菲斋、徐襄平。今日共游者余及李、彭、温、杜、陆绍文、徐、谢晋卿计八人。”

10月22日 “午刻，留守常、新吾、何君饭。督军约何君明

早十一时会谈。督军请守常先回沪候行，送路仪百元。”

10月23日 “督军游莫愁湖并观奥军纪念碑。归途游胡园，同游者何民岩、张新吾、李守常、朱叔程。”

10月29日 “在华洋旅馆晤谈耿鹤生，还田克苏店张五元三角。收守常一函并东公转梁俊峰一函，即复守常一函、复夏润生一信。”

11月6日 “守常寄来《太平洋》杂志一册。”

11月9日 “守常来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武问泉来谈。晚，督军召集会议。”

11月10日 “午刻，留施鹤鹑、襄平、守常饭。约施及襄平赴三新池沐浴。襄平竟作主，浴罢至太平巷访守常，遂同至督署晚饭，督军约九时接谈。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才，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吾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夜十二时，匆匆作。”

11月11日 “早赴华洋旅馆访守常，又同赴文德里访崔叔和、高质青。留送守常北行到下关，路迂徐襄平，小聚运河州旅馆。在宝记照相馆同撮一影。”

11月14日 “……守常前次来给洋二十元。”

11月16日 “……寄守常一信。”

11月25日 “……接易梅僧来电转守常。”

2. 孙公洪伊行状

公讳洪伊，字伯兰，河北天津之北仓村人。清康熙间，有实授京畿南路厅讳雋亭者，先讳潮，自浙绍兴山阴之陡门来居，于公为始迁祖。世有潜德。第四世讳辅臣，以商业起家，产业饶裕，第宅甲一方，救灾振贫，精国术，乡里称武善人，即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讳景前，诰授中议大夫，能继承父志。父讳孝曾，附贡

生，忠厚仁慈，有孝行，娶武清王鹿坨邨刘氏女，生三子，公其长也。公生而资禀颇钝，幼从同邑孝廉刘瀛士先生学，读书不易上口，然学愈苦，每倦极时，引水湿面，用作兴奋，手不释卷，恒至夜分，久之豁然开朗，能为文章，气象弘强沉毅，见者咸以大器目之。年二十一，入学后，延蒋香农先生馆其家。蒋先生故滦州硕儒，为学宗旨在朱陆之间，不立门户，而一归于孔孟，于孟子知言养气之功，尤娓娓乐道不倦。论道之余，又辄讲说国政民生之利弊，阐发经世有用之学，而章句训诂之学不屑屑也。公日相亲炙，学问益精进，一生之气节事业基础皆植于此。时值乡试，遇病不能赴，旋亦弃去，壹意究心于经世有用之学。庚子夏，拳匪肇事，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清直隶提督马玉昆御之，败退北仓，驻屯公家以为抵抗，俄又败退，外兵入踞，纵火焚烧，公家先世所遗动产不动产，被其毁灭者十之八九，其残留者，坏瓦颓砖而外，破屋十余间而已。公于此时，奉太夫人避难，弟仲华与法军忤被创，以忧愤歿。寇至而流离转徙，寇退而补苴收拾，既痛陟岵，又伤毁室，复悲折翼，苍凉凄苦，备历艰辛，当因外族蹂躏，身受所感，盖至是具有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而入服务国家及社会时代矣。公谓改革国家，必自培植人才始，培植人才，尤必自振兴教育始，遂于光绪二十八年，自动捐资于北仓，创设蒙养小学，又捐资创兴北仓集市，意期贸易集中，厘定斗称牙用，为常经费。又创立北仓私立第十高级小学校，成绩卓著，为全县冠。又于三十年，联合其戚罗东朝者，各捐资壹万五千元，在天津城内户部街，创设电报学堂。又于三十二年，卖祖遗田产四千亩，得价四万二千元，全数充作创立明新中学堂之需，津邑教育之振起，公实为之先导。其年又联络地方绅耆，创立自治研究所，提倡宪政，上书清廷。时清廷试行地方自治，采纳颇多。当清廷创筑津浦铁路时，总裁吕海寰，总办李德顺，购置路基地亩，浮开冒报，弊端百出，輿情愤然，公为民意之驱使，起而联络王法勤，谷钟秀，温世霖，刘孟扬四公，号称五代表，上书邮传部，

烛发其孜，嗣宪政编查馆准状，派员澈查属实，李德顺旋被革职，吕海寰亦交部处议，政途犁植，称快一时。自后路政蒸蒸日上，公与有力焉。三十三年，被选为天津试办县议会议员，继选为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公揽辔就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是遂专为政治生活矣。曾条列省之宜兴革命者数十事，发抒伟论，直督袁世凯闻而赧之。当是时，清廷颁九年立宪诏，舆论哗然，谓为稽延糜众，各省谘议局，乃开联合会于上海，公与张謇、雷奋、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陈炯明、莫伯伊、吴赐龄诸公咸集，发起请愿速开国会，推公领衔，公奋不顾身，独当其冲，觐触公卿，评量执政，以与专制政治作殊死战。海外华侨，亦举代表响应。世界列国立宪之成，无不一铁血而争得者，至为壮烈光荣之伟绩，吾国宪政史上，当以公此次之力争为第一页。公痛哭流涕，再接再厉，书五六上，卒不生效，乃协各省谘议局，再于故京开联合会，与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梁善济、高登鲤、刘崇佑、王法勤诸公等，组代表团，遂成宪友会，是中国有正式政党之始。至知清廷之不可有为，乃与诸同志计划改造，各相默契，分手而别，时辛亥五月也。代表团与宪友会并而为一所，公驻京总任其劳，为南北联合宣传枢纽，日与清廷相抗争。又创立国民公报，鼓吹宪政，发表宣言，领导舆论，清廷侧目，国人赖为耳目喉舌。甫阅三月，而鄂议长汤公化龙协黄陂黎公武汉首义，谘议局为对方目标，尤注重公，公处境至危，日以秘密电函与各省通声气，约托同志，四出运动，并为吴公禄贞密谋光复，迨吴公石家庄被戕，知不可居，乃微服而行，孑然至沪。川议长蒲公殿俊，湘议长谭公延闿，已先后独立，晋粤谘议局梁善济、陈炯明两公，亦同举义旗，百日用兵，清社遂亡。肇建共和，谘议局诸公号召联络之功甚伟，而公尤劳苦，乃与汤化龙、胡瑞霖、刘崇佑、林长民、梁善济、谢远涵、陈介石、萧湘诸公等，组共和建设讨论会，后移京，改为民主党，复改为进步党。方公之南下也，不及与家人话别，太夫人忧甚，虽得公倚虹园家书，仍不信

公之犹在也，积忧成疾而卒，时清室尚未解决，不克奔丧，南北和议告成，始归营葬。公为国事而不得事母，所引为终身之痛者以此。既归，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其所提议案，如关于宪法、教育、征兵制度、地方自治、财政者种种，汤公化龙见之，曰：

“伯兰足迹未出国门，而所持之理论，比之游学海外者，尤博大而精切，洵奇杰也。”其钦佩若此。次又曰“集各方青年志士，讲学论政，每研究一问题，必作成具体方案，以备实施，时或发布说论警袁，如对肃政史条陈之意见等政论，一时推为杰作焉。”

“洪宪萌芽，筹安会出，劝进之盛，同夫操莽；袁氏故与公有旧，谋使附己，不为动，慑之以威，亦不屈，鹰犬爪牙，道路相望，公乃微服而行，孑然至沪如昔。无何，萧晋荣、彭介石、牟琳、王乃昌、李素诸公亦来会，因彭公介石，与何公成濬深相结纳，相与策划，奔走联络以倒袁，各方忠义之流，以及民党英隽，咸来计议，遂以公寓邸为东南讨逆总机关。袁拥北洋数十万雄师，举国人士，劫于淫威之下，虽心怀痛愤，犹蜷伏待时，莫敢为剧烈之反对，逮公通告北方诸将帅书一布，声其罪而致讨，晴天霹雳，海内外咸晓然于正义之所在，而知伪造民意者之不可苛延。当袁系势力弥漫南北之时，民党于湖北一役新挫后，实力损失殆尽，唯滇纯粹国军，公乃就商康南海先生，联电催蔡公锷发难，以蔡公与康南海先生交谊素笃，必应，即以电稿付彭公介石携宁，交冯督用印拍发，以示北洋军界，亦具同情。蔡公锷起义云南，护国军兴，与公呼应，以成犄角。公遣萧公晋荣，王公乃昌回桂，运动牟公琳回黔，协戴公戡，王公文华出师。义军与袁师遇，方撑柱于蜀滇，势甚危，公亟与谢公远涵如宁，说冯公国璋以成败利害，冯公心感动，召集南京会议，以贰于袁，各省翕然应之，袁氏众叛亲离，忧恚以毙，公复发表宣言，复约法，开国会，以定国是。方公之讨袁也，克强黄公远游美洲，贻公两书，一曰：

“远在海外，读屡次宣言，披沥血诚，忠义奋发，廉顽立懦，可风当世，为之起敬。”一曰：“袁逆自毙、乱机稍遏，然欲趋于

法治正轨，不知在于何日，足下主张，公明正大，极为钦佩。”其推重若此。中山孙公，亦在海外，民党钜子，均随出亡，在沪主持者仅陈公英士，何公成濬两人。公因何公成濬，见陈公英士，密商大计，电促孙黄两公，及诸要人归国。杨公虎肇和举义，又为之策动浦东陆军。比黄公归，相见恨晚，时相过从，上下议论，抵掌轩眉，交至欢也。故于公北行之日，黄公亲至北站相送，握手致拳拳之意而别。帝制迹熄，黄陂继统，段公总揆，公被任为内务部总长。公在南既与民党分子多接近，民党中一部分子，亦敬仰公之德望器识，而亲之者众，遂成南北新旧过程中之唯一政治活跃中心人物。公以此时正式加入国民党，亦即以调和国民党北洋派共负建国责任自任。就职之日，清厘积弊，综敷名实，各省奉约束惟谨，而废省存道之论，持之尤坚，乃未及实行，总揆引附责任以自居，挟督军团以自重，府院之争，齟齬不已，而藩阀私人，窃弄阁权，乃集矢于公，尽力挤之，逼黄陂免公职，公乃微服而行，孑然至沪又如昔。未几，黄陂亦免段职，而督军团之祸遂作，府院皆空，复辟随之而起。复辟既平，而国宪变更，公首主兴护法之师，各省响应，撑柱二年，无日不与军阀抗，北方之赞护法者，亦日众，北洋团体，遂见崩裂之痕。未几，和议起，公发表南北和议条件宣言，且谋于总理曰：“法之不存，乱且无已，南与北峙，南未开府，非立对等地位，中外观瞻不系，无以定内乱，而利外交，欲统一国家，宜组织政府，欲组织政府，宜召集国会”。孙公大悦，约之俱南，世称两孙携手者也。九年冬，公随总理如粤，初拟命公长交通，公辞。护法政府成立于广州，命公长内政，复辞不就。是时北政府以军法为根据，戴一魁以自惠，南政府以护法为标帜，存纪纲于一线，而亦有军阀乱于其间，依违假论，裂地以自雄。中山孙公开府南方，尚感掣肘，公益无事，流连山水，揽白云，度狗，珠花，花埭之胜，盘桓数月，总理任公宣抚长江，谋南北妥协，而定统一之计，公曰：“负责则可，就职请待也。”遂委公为驻沪全权代表。还沪，日

与北方诸将讯使往来，络绎不绝，诸将皆甚倾倒，亟欲一亲颜色，计议妥协，亟以车迓公，公于是乎首途赴金陵，渡江，过蚌，绕徐，趋开封，历郑，达洛阳，返徐，游微山湖，遇大风，篙师穷半日之力不能至彼岸，颠簸中流，舟中人相顾失色，公屹然不动，谈笑自若，其坚定若此。然后知公之于津沪也，刺客狙击于门，奸徒呼噪于室，独能无惧，镇定处之，其所修养得力于幼学时者深矣。及泰安，陟泰山，诣斗姥宫，抚摩大夫松，登十八盘，上日观峰，宿山上观日出，下山之曲阜，谒孔林，适邹，入孟庙，至济南，酌趵突泉，还津，公阔别北方久，下车之日，不期而来欢迎者万人，居民空巷，学校辍课，知与不知，皆争得一识而为幸。公与父老亲旧握手，问桑梓疾苦，亟诣蒋先生家，皤然一老，与白头弟子相对问安，执礼如童子时，又恂恂然儒者气象，而人几不知为在军旅风尘中来也者，一时传为佳话。抵故京，居松筠庵，车水马龙，冠盖盈望，酒食酬酢，昕夕频繁，虚与委蛇，公颇苦之，乃适定州，游龙藏寺，瞻古佛之容，剔藓披苔，寻碑读记，与老僧谈玄观化。公此行也，虽予游览寄其感慨，而军界后起之秀，既日相演谈，将所负使命，与中心思想，及实际政治活动者，一一灌输于其脑中，使有深切认识，厥后南北新旧势力之分合消长，中国之政治演变，其消息倚伏，实种因于此。归而息影津门，间言国事，十三年中山孙公蒞津，谓公曰：“吾欲求友北方久矣，先生北方之强，其介绍焉。”昔谭公延闾之见孙公，盖公之介也，会北伐告成，公谓十年前举义护法，固以求统一也，统一成而割据灭，兵以渐灭国用稍舒，由之军权缩而政权张，庶政或可渐施，今之统一其始基也，吾何愁焉。庚午夏，蒋总司令任公为河北宣慰使，津市长崔廷献以宴会相邀，酒半，引而留公，闭居于热河兴业银行楼上最高处，时值天暑，炎气薰蒸，人事隔绝，崔犹假保护之言相慰藉，公怒斥之，声色俱厉，以杖击其首，血海被面，崔虽恨之，以公负一国重望，亦不敢加害，蒙难六阅月，始得脱险。未一旬而至沪，无何咯血疾作，病莫能兴，其友陆乃

翔，唐继尧为之治疗而愈，自是体格稍不及昔。犹复与江天铎、罗家衡、李烈钧、谢远涵、王有兰、汤漪、诸翔、王造时、陈堃、胡祖舜、范鸿均、陈定远诸公等商讨国是，求内乱之速平，宪政之实施。九一八国难，四省沦亡，公致书蒋公，反对依赖国联，主张直接交涉。一二八国难，沪北尽成焦土，公发表忠告日本全国国民书，旋被任为国难会议议员。华北形势新发展，又告揭幕，公先人邱墓蟹稻之乡，竟沦于混乱，其感痛何如。公晚耽禅悦，功课特勤，供佛楼中，撒米撮花，满地狼籍。每当疾苦，起坐臥榻，习静观心，神游诸天，与维摩相会，证先生之乐，洒然忘其病之在体也，其能摆脱一切也又如此。以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亥时卒，春秋六十有五，初娶夫人，同邑清甘肃提督曹萃臣之子绍文女。续娶夫人曹氏皆前卒。后娶夫人李氏。又夫人李氏，子二，长抱存，南开大学商学士，曾任招商局秘书，现服务银行。次玉枢。女二，玉瑞，玉椿皆幼，孙女二，梅生莫生。公所为文，如反对叛国、毁法、卖国，二十一条条件，不平等均条，金佛郎案、对德宣战者甚多，不可更仆数。大抵国有问题，公必有所发表，无不切中时弊，规画久远。每一文出，天下争读之，倚为导师，变故频更，藁佚秦斗，方事网罗，勒为文集行世。公持论严正，立志坚决，遇事刚勇，不识者以峻嶒兀突不可近，一与接纳，温温恳恳，其臭如兰，磊落光明，出肺腑相示，故人乐与之交，客坐恒满，而同志遍天下。余归国，与公促开国会，组宪友会，后公于沪凡四至，释舟下车，皆先见余，又皆余为东道主。初至，住余家三德里，于是相与于革命，组会改党之役。再至，住余同仁里两间一廂旧屋，于是相与倒袁之役。三至，住余武昌路小楼上，于是相与历游南北诸省之役。四至，住余园竹篱茆舍中。三年，余如燕京，则住公油坊胡同邸宅，余与公相交最夙，故于其行事知之尤详，卒之日往哭，公子抱存，玉枢跪请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遗文字，参以所见闻，稍加论次如右，谨状。

（陆乃翔：《河北月刊》第4版，第11期，）

3. 汤化龙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1874年11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生。其祖上数代经商，家境一直十分富裕。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才由于战乱的影响而衰落下来。他父亲本为诸生，为了恢复祖业，弃儒经商，常年奔走于长江沿岸的九江、安庆等地。汤化龙出生之年，正是其家境恢复小康之时。

汤与他父亲不同，走的是科举做官的道路。他幼年从族父习章句，十三岁时，入塾苦攻八股文，积极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1892年，以县试第一，补县学附生。1897年，补廪膳生，并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黄州经古书院。1902年秋，汤考中举人。逾二年，参加清朝最后一次会试，得中进士，并授法部主事。之后，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

这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为了寻求“新知”，汤化龙自请资送留学日本。1906年，赴日入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在此期间，他联合孟森、孟昭常等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并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

1908年秋，汤毕业回国，由鄂督陈夔龙奏调还鄂筹备地方自治，任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在第一屆谘议局常会后，又被举为议长。他目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坚信“速开国会为救时要略”。1910年8月，汤去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会议主席。会后他参与各界代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第三次请愿。11月4日，清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同意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令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以此为满足，相继出京，但汤化龙不以为然。他联合谭延闿、蒲殿俊等人仍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原议，并继续留在北京，谋第四次请愿，

直到清政府将天津请愿代表温世霖逮捕发戍新疆，才失望而去。

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6月，汤化龙再次赶往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对“皇族内阁”进行猛烈抨击。与此同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决议成立“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汤为其重要成员，并任湖北支部发起人。这时，汤化龙已成为全国立宪派中有数的头面人物之一。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夜，汤化龙“潜匿私室”，次日晨，经起义士兵数次强迫，始出任事。他初任都督府秘书，负责民政，但却“垂头丧气，毫不事事”，偶然有所表示，就是要革命党人“严守秩序”。蔡济民、牟鸿勋、梅宝玘等革命党人无计可施，只好利用他的名义发表通电，力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脱离清政府。

至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汤意识到革命有成功的可能，于是，他立即转而附和革命，以便窃取革命果实。他一方面主动告诉革命党人，清朝官员柯逢时家中有密码本，可用与各省通讯联络，借此争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又施展种种阴谋“图揽政权”。他先和胡瑞霖等私下拟好一个都督府组织条例，然后于17日通过都督府正式公布实行，集军政民政大权和战时总司令于黎元洪一身，从而夺了由革命党人蔡济民等控制的参谋部的权。接着，他又“串通宵小，由运动而得政事部长”，并“集旧日朋好”，将政事部下属内务、外交等七个局全部抓在自己手里。

汤化龙这样明目张胆的争权夺势，引起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25日，都督府再次召开会议，宣布废除原先通过的都督府组织条例，重新调整人事安排，只给汤一个编制部长的闲差。此后，他极力讨好当时正在武昌的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汉阳失陷后，他随黄兴离开武昌前往上海，从事新的政治投机。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汤化龙为法制局副总

裁。他辞不就职，而与林长民、张嘉森、刘崇佑、孙洪伊等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13日正式成立），拥尚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为领袖。汤化龙等曾积极运动袁世凯、黎元洪、蔡锷这些所谓“有力者”电梁归国。4月，他由上海入京，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同年5月，汤加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并被选为干事。他曾一度打算使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旋因不见信于共和党的民社派，遂于10月27日，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六政团合并，另组民主党，汤被举为干事长。他在成立会上说：民主党“不争政权，而注意于普及政治教育”。但它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刘崇佑私下密谈时则说：“内阁新组，无论何人为总理，皆短命者也。彼一短命，此一短命，待人人视组阁为畏途，或知其难时，吾党再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可见，汤化龙等并非“不争政权”，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1913年1月，汤化龙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在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长。这时，他的政治利益与袁世凯政权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对巩固袁的专制统治格外卖力。4月5日，汤为民主党议员规定三条：一、对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孰先孰后问题，应主张先定宪法中“总统”一章，然后即选举总统；二、关于大总统有无解散议院权力的问题，应主张有解散权；三、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需要国会同意问题，应持否定意见。汤化龙这些主张，不禁使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大自由报》为之发出“卓哉！汤氏之见识”的赞叹。

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后，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汤化龙为了给袁解围，联合原临时参议院议员四十八人发表通电，硬说“善后借款”并不“违法”。为了与国民党对抗，在袁暗中支持下，汤与梁启超等人于5月间，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汤出任理事。7月，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汤认为：“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

他一方面联合孟森等进步党议员发表所谓“护国讨乱”的通电，另一方面，又于26日致电黄兴，要他“及早觉悟，欽兵效顺”。1914年5月，袁世凯于相继解散国民党和国会之后，任汤为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

1915年8月，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丑剧敲响了开台锣鼓，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制斗争更加高涨。汤化龙见袁已靠不住，遂于9月称病告假赴津。10月，辞职遂准。12月，他密行赴沪，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其间，他曾与旧立宪派要人蒲殿俊、谭延闿以及旧官僚唐绍仪等，致力于策动江苏督军冯国璋独立，但始终没有结果。1916年3月19日，他电劝袁世凯退位。随后，又发表答帝制派王印川书，表示袁不退位，即不罢兵。他指使其弟湖南将军汤芑铭宣布独立，对袁进一步施加压力。

袁世凯死后，汤化龙认为收拾时局，非段（祺瑞）莫属。从此，他就积极投靠段祺瑞。8月，国会重开，汤复任众议院议长。9月，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组织的“宪法商榷会”，他在梁启超支持下组织“宪法研究会”。这时，国会内部为制宪问题展开省制订入与否的激烈争论，汤及其“宪法研究会”适应段祺瑞集权中央的需要，坚决反对省制订入宪法。10月20日，众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讨论省制问题，他攻击“宪法商榷会”主张将省制订入宪法是“不忠于民国”。

1917年春，段祺瑞为了取得日本更多借款，以加强自己的实力，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汤化龙认为这是“正当办法”，并呼吁国会停止一切政争，“予政府以后援”。当段与黎元洪为此争执得不可开交，段内阁动摇不稳时，他又在国会内竭力支持段内阁，并为段祺瑞支持下的“督军团”出谋画策破坏国会。汤希望在新的国会选举中，依靠段的支持，获得多数党地位。5月23日，段被黎免职，汤也具呈辞职。

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登基”。汤化龙一面通电各省，宣布与张勋誓不两立，一面随段祺瑞赴天津马厂誓师，并任

讨逆军总部参赞。12日，张勋复辟失败，由段祺瑞续组新阁。汤因拥段有功，被任命为内务总长。为了抵制国民党议员，他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尽速召集临时参议院，以便实现其取得议会多数党地位的宿愿。汤的反动行径，引起国民党议员的极大愤慨。10月，他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明令通缉。11月，汤随段祺瑞去职。

之后，段内阁虽然复活，但因为段所用的安福系政客集团已经崛起，汤不再受到重视。1918年3月24日，他与林长民、蓝公武等怀着失意政客的嫉恨心情出国，前往日本游历。6月，又赴美考察。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籍华侨理发师王昌枪击毙命。（曾业英）

（《民国人物传》第2卷）

4. 宪法商榷会

两院议员中之旧国民党系及孙洪伊系与新共和党之一部分，因半年以来政见主张多属一致，目下所急者宪法问题，故会合各派拟组织一共同讨论宪法机关，特于本月九日集会各该派两院议员开一园游会，于北海是日到会者三百八十余人之多，午后四时在团城集会演说，众推张继主席说明开会理由，次由孙君演说谓宪法问题之紧要及集会研究之不可缓，宜结合同志多数议员设一讨论宪法机关，众均赞成，当场推定褚辅成、彭见彝、汪彭年起草组织大纲。定名，宪法商榷会。宗旨：以融洽意见促成宪法为宗旨。组织以两院议员表同意于本会，及院外赞成本会宗旨，经大会承认者组织之；设办事员若干人。会议：每星期开常会两次，如有十人以上之提议得开临时会讨论之，结果以多数为指归，但不生拘束力。

以上数件均经众当场表决赞同，并由众决议推定临时筹备员十二名，其所推定者为牟琳、张大昕、王家襄、褚辅成、赵世钰、

彭允彝、马君武、王乃昌、林森、陈鸿钧、于均生、曹振懋。

筹备竣事即在宣武门外江西会馆，由是订定简章及办事通则并定每遇星期二六两日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开会期间，而连在是处开会四次，今其会所已移在西城南栅栏内饽饽房胡同西口转马台，即蒙藏学堂原址也。十月一日在此处开第五次商榷会云。

《宪法公言第1册》

5. 宪法研究会

汤化龙派之宪法案研究会与梁启超派之宪法研究同志会本同时发生，联络诸议员为将来大政党之予备，该两会主要人物因均以宪法制定为研究之标准，欲收意见交换之利益，于上月十二日在石驸马大街煤油矿事务所内开会，到会二百余人，汤化龙主席公同决定改名为宪法研究会，并定汤化龙、王家襄、刘崇佑、兰公武等起草章程，嗣又在该处开会，到者一百余人，汤化龙主席首先研究简章，其最要之点，即系国会议员，如于本会宗旨相同者得为会员，非国会议员须有三人以上之介绍得为会员，本会表决取决于多数人之同意，表决后宪法会议时取一致之主张，但其表决于各人主张反对者，本人于宪法会议时可自由提出异议云。

今已推定编译员八人，干事员十五人如下：

编译员：兰公武、陈光焘、林长民、陈善、贾庸熙、孙光圻、彭运斌、吴日清。

干事员：（文书）王家襄、陈铭鏗、曾有翼、陈光谱、刘景烈、（会计）梁善济、周大烈、虞廷恺、郭涵、王锡泉。

（庶务）凌文渊、刘星南、胡源汇、张树森、杜成谔。

五、任职北京大学

述 要

李大钊热爱北京大学。他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沒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京报》1923年12月8日）1917年11月中旬他到北京大学任职。“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回忆李大钊》第145页）无疑，北京大学时期，是李大钊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的活动是多方位的，头绪纷杂繁多。本部分仅限于他在北大任职任教及有关活动方面。其他见本书六至十一部分。

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北大图书馆原称藏书楼，自民国建立后始称现名。在李大钊五年的任职期内，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为我国第一个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在主要方面接近或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组织图书馆讲习班，热心倡导图书馆专业教育。同时，他也最早从理论上阐明了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及作用。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时代向近代图书馆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他是一个奠基者和开拓者。1922年12月2日，他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三天后（12月5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负责处理学校日常具体工作。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一致通过，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7月23日，北大文牍课向李大钊发出教授聘书。从此以后，李大钊便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系、经济系等以及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课。所开课程有：《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社会主义史》、《女权运动史》等。很显然，作为教授，教学工作是李大钊在北大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此外，他还经常应邀在校外各种场合发表讲演。

李大钊自被聘为北大教授后，连续四年当选评议员。作为评议员，他参与了北京大学的领导工作，在校务活动中积极发挥其作用。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期间的社会活动十分频繁，社会交往颇为广泛。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在北大发起成立了进德会。李大钊是该会的甲种会员，并被选为纠察员。此外，他还与李辛白、沈尹默、马叙伦、马寅初等先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北京大学赈灾会、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等。

从1921年3月14日起，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为反对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金，展开了大规模的索薪斗争。为领导这次斗争，各校教职会组成了代表联席会，每校代表为三人。李大钊同时被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两校推为代表，先后担任该会新闻股干事、《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这次索薪斗争历时四月余，正式会议76次，加上临时会议共百余次，这就使得李大钊异常繁忙。在“六三”请愿中，李大钊等教职员代表遭军警毒打，马叙伦受伤住院，李大钊再度代理主席职务，领导八校教职员与军阀政府展开不懈的斗争。

在这里应指出，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上海召开。由于李大钊作为八校教职员联席会领导人，站在索薪斗争最前线，这就使他不可能脱身去参加党的这次成立会议。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转入地下斗争，被迫离开了他生活、战斗过八年多的北京大学。

(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 任 职

北京大学职员录 (节录)

前任职员			
职 员	姓 名	就职年月	离职年月
...
图书主任	章士钊	民国六年十月	民国七年一月
...

现任职员				
职 务	姓 名	别 号	年 岁	籍 贯
校 长	蔡元培	子 民	50	浙江绍兴
文科学长	陈独秀	仲 甫	40	安徽怀宁
理科学长	夏元璠	浮 筠	34	浙江杭县
工科学长	温宗禹	善 甫	39	广东台山
图书主任	李大钊	守 常	30	直隶乐亭
庶务主任	李辛白		43	安徽无为

(下略)

(《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18年1月编印)

《李大钊先生传》序 (节录)

闻次溪搜集守常遗著,日刊文字亦在内,此种虽不为守常匠心经营之作,然因以考见袁黎遽嬗时代之政治断片,亦弥可宝贵。翌年即1918年^①,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

^① 据《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载“教授逻辑”课程,应为1917年。

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主动议。时校长蔡元培，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又守常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儕，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俾发踪指示，初季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意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

1919年，^①吾以广东护法而南下，故五四运动时，吾乃不在北京，其后余留滞于南者达四五年，行事因不与守常相接。迄广东失败，吾游欧洲一番，折回北京，则1922.3年之变，守常已赫然一变而为共产党人矣。守常则时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然吾之赋性，最为守常所了解，相视而莫逆者，则吾实乃一个性持重，不适宜于群众运动之人也。当年孙黄在东京创造同盟会，吾与情好极笃，而未尝参与此事，守常澈底知之。越飞来京，守常约吾在东交民巷见面，所谈俱极融洽，当时吾并不觉身非共产党人，发言宜多所避忌。越二年为1925年，吾以反对曹锟贿选，参加段执政内阁，守常似不谓然，而未显加阻止。所可怪者，时守常与吾见面殊罕，而其与吾家属之关系反日密，吾方寓东城魏家胡同，守常每星期辄二三至。吾之三子，皆拜在守常门下，受政治课；守常之大女儿星华，亦依吾妻吴弱男为义女；守常夫人及他儿女均不断来魏家胡同，饮食谈笑，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余妻曾述守常语见告：“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他友告余，亦亲闻守常

^①此次南下护法事，应在1919年。

吐露斯言。伤哉守常！我老而无似，诚媿对此宅心长厚之良友已
(下略)

李士钊 1951年8月于北京

(《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冀文书店1951年版)

2. 图书馆管理研究与工作实践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美国图书馆学员之训练》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关于图书馆的研究》

(见《北京党史研究》1989年5期)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讲习会简章

第一条 本会以利用假期，讲习图书馆学，谋图书馆事业之
发展为宗旨。

第二条 本会讲习事项、规定如左(下)：

一、图书馆教育。

二、图书馆组织法及管理法。

(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儿童图书馆。)

三、图书馆编目及分类法。

(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儿童图书馆。)

四、课外实习。

五、临时讲演。(幻灯讲演)

六、参观及调查。

第三条 本会讲习期日及时间，规定如左(下)：

日期，8月2日起，23日止。

时间，每日午前8时至11时。

第四条 本会讲习员姓名列左(下)：但临时得加请中外名人

演。

沈祖荣、戴超、李大钊、李贻燕、程时燧。

第五条 本会听讲资格，规定如左(下)：但男女得共学。

一、从事于图书馆教育者。

二、中等学校毕业，有志研究图书馆教育者。

第六条 本会听讲费每人五角。

第七条 本会讲习地点，在琉璃厂本校内。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23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图书馆讲习会广告

本校鉴于图书馆事业之重要，特利用假期开一讲习会。敦请东西洋留学图书馆专家讲演组织、管理、分类各法，并课外实习、参观、调查等。时间自8月2日起至23日止，每日自上午8时起至11时止。凡京内外从事图书馆事业或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有志研究图书馆教育者，不分男女都可听讲。报名以7月1号起至25日止，每人须纳听讲费五角，报名人数以100名为限，如超过定额时，得提前截止。

(附录讲演员姓名)

沈祖荣(美国图书馆学校毕业，现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长)、戴超(美国图书馆学校毕业，现任清华学校图书馆长)、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贻燕(本校前图书馆主任)、程时燧(本校图书馆主任)。

(《晨报》，1920年7月1日)

北高图书馆讲习会志盛

吾国图书馆事业至不发展，社会无修养学识之机会，学校无自动发育之辅助，虽日倡社会文化与教育改进，终无成绩之可言，此图书馆教育之关系重要也。北京高师有鉴于此，利用暑期开设图书馆讲习会，已于本月2日开幕。会中聘有图书馆专家担

任讲演，并时有名人演说及实地练习。到会听讲者不下百余人，内有女子十余人，多系各省或各校选派来京或有志研究此项教育者。每日开讲，座为之满，洵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一新纪元也。兹将该会讲习时间表附录于后。

北京高师图书馆讲习会时间表

日	曜	时	讲习事项	讲演员
8月2日	月	八至九	开会式	
		九至十	讲演	陈宝泉
		十至十一	图书馆教育	程时燧
3日	火	八至九	同上	李大钊
		九至十	图书馆组织法及管理法	戴超
		十至十一	图书馆分类法	戴超
4日	水	八至九	图书馆组织法及管理法	沈祖荣
		九至十	图书馆教育	李大钊
		十至十一	图书馆编目法	戴超
5日	(下略)			

(《晨报》1920年8月8日)

本校新闻

14日上午8时许，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讲习会来本校图书馆参观，先后到者约七、八十人。由询问处招待、导往参观毕，复由本校图书部主任将图书馆之沿革及组织为简单之说明。至11时而去。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21日)

图书馆寄存图书简章

一、凡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以供教职员或公众阅览者，本馆欢迎，对于该图书与本馆藏书一例保管。

二、寄存期间须在三个月以上，三个月以后得随时取还，但

须预先通知，以便检齐交付。

三、寄存图书者须备一详细之目录，本馆照目录点齐后，付以数条，将来取书即以此收条为证。

四、寄存图书须盖有定式之章记。

五、寄存图书中如有贵重物品，须特别保管者，宜预先声明并指定如何保管之方法，本馆当酌量情形，照所拟方法办理。

六、寄存图书者应将各书实价列入目录，本馆若因过失有所遗失，当按价值偿补，惟迂有不可抗力时不在此限。

七、寄存书籍但得在阅览室阅览，概不外借。

（《北京大学日报》1918年3月1日）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

第一条 本校教职员、正科学生及本校规程上所规定之各机关，向本馆借书须持借书证或机关公函，用本馆定式之借书条填具书名、号数、年月日，并由本人或各机关主任签名交付本馆存查。

第二条 借书人借书时，须将借书证连同借书条留存典书课，俟缴还所借图书时，再行取回。关于所借图书之责任，应完全由借书证上所记之人负之。如在第一次借书未到期之前再借书时，须将第一次所借之书持往图书馆，以资证明。

第三条 本馆藏书分贵重书类与通常书类二种。贵重书类，无论何人概不出借。通常书类，除辞典、字典外，俱可按本规则出借，但教员指定之参考书，若参考人甚众时，得由图书馆斟酌情形，暂不出借。

第四条 新到书籍若无复本，则自到馆之日起一个月内陈列馆内，供众阅览之用，暂不借出馆外。

第五条 本校规程上所规定之各机关及各教职员，每次借出图书，中国文以30册为限，外国文以5册为限。本校正科学生每次借出图书，中文以20册为限，西文以2册为限。图书之装成幅帙

者，以一幅或一帙为一册。

第六条 借书期限，教职员以14日为度，学生以7日为度，俱从借书之日起算，但期满还书时，如无他人需用，可以换条续借。

第七条 无论何人，借书期满不缴还者，除暂停其借书权外，并照下条规定征收违约金。

第八条 违约金之办法依下列方法定之。

(一) 违约金率用累进法定之。每逾限7日，递加违约金率一倍至该书原价之三倍为止，再不还书，停止其借书权，至还书时为止。

(二) 在逾限未满7日以内，中文图书、教职员每册每日征收铜元6枚，学生每册每日征收3枚；西文图书，教职员征收铜元12枚，学生征收6枚。在逾限未满14日以内，中文图书，教职员征收铜元12枚，学生征收6枚；西书教职员征收铜元24枚，学生征收铜元12枚。在逾限未满21日以内，中文图书，教职员每册每日征收铜元18枚，学生征收铜元9枚；西书教职员征收铜元36枚，学生征收铜元18枚。以下类推之。

(三) 违约金之征收，教职员或自交典书课，或由薪水中扣除；学生于还书时随交典书课汇收，若学期终了尚不缴还书籍及违约金者，下学期开始时，即停止其学生资格。

第九条 校外各机关如有以公函向本馆借阅图书者，本馆依其图书之性质，认为无何妨害，得贷与之，但该机关须派人蒞馆，以本馆定式借书条填具书名号数，签名盖章，并须于一定期限归还（期限由本馆临时酌定）。

第十条 借出之图书，如有损坏时，须按其损坏之程度，由图书馆酌定修补费，令借书人赔偿，在未赔偿以前，停止其借书权。

第十一条 借出之图书，如有遗失，应由借书人报告本馆。如其遗失报告在规定之借书期内，应由借书人赔偿本馆所估定之

代价；如已逾期则除赔偿以外，并按第八条征收违约金。

第十二条 借书还书均于本馆开馆办公之时间行之。

（《北京大学档案》）

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

今将图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之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十三条，报告如下：

第一条。本部依本校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掌理关于图书事务。

第二条。本部设主任一员，由校长于总务委员中指任之，承校长之命商同总务长综理本部事务。设事务员书记若干员，承主任之命，分办各项事务。

第三条。本部依现有事务之状况，暂设登录、购书、编目、典书四课。

第四条。登录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下）列各事：

- （一）新书之登录及公布。（小册子包括书内下同。）
- （二）杂志之登录及公布。
- （三）新增书之统计。
- （四）寄赠书册之答谢及公布。
- （五）本部各机关报告之检查保存。
- （六）本部来往文件之掌管。（关系典书购书编目课者不属此。）

第五条。购书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下列各事：

- （一）本校图书杂志报章之购买。
- （二）送赠书册（卖品及非卖品）、之征集。
- （三）新出书目之征求。
- （四）购书定单账目及函件之保存。
- （五）购书统计之编制。

第六条。编目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下列各事：

- （一）书籍、小册子、杂志、及图表目录之编纂。

(二) 书目片之整理装制。

(三) 图书年报之编辑。

第七条。典书课承本部主任之命，司理下列各事：

(一) 参考材料之指导及介绍。

(二) 中外图书及各项杂志报章之收藏保存整理及装订。

(三) 中外图书并各项杂志报章之借出及收还。

(四) 借书账目之编存。

(五) 借书逾限之催索。

(六) 各书库及各阅览室之清洁秩序。

(七) 各种图书杂志借出及阅览，月报及他项统计表之编制与保存。

(八) 各项借阅书证之发给。

第八条。本部设装订室，司理本部书报之装订。

第九条。本部设打字室，司理本部书目单及一切函件之打印。

第十条。本部所属各课得酌量情形设置领课一员，由一等事务员充任之。书记及装书匠打字匠得酌量事之繁简随时增减。

第十一条。本部各项办事细则，另章规定之。

第十二条。本条例试行后遇有不妥，得有图书委员会提议修正之。

第十三条。本条例经由行政会议通过后试行之。

校长钧鉴

图书委员会九年五月七日

图书委员长：顾孟馀

图书委员：李大钊、马衡、孙国璋、陈世璋、陈启修、朱希祖。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一）

（一）前据化学讲演会全体会员函称：化学书籍太少，而借出者又久不归还，以致学者无由研究。拟请将借书规则酌加修改，凡一种书籍无两帙以上者，不论教员、职员、学生概不借出等语，所陈甚是。除一面查照各国大学图书馆章，厘定一完善章程，请校长核准定期施行外，希望参阅化学书籍者，尽所可能在阅览室阅览。其余借出各书，仍乞按期限归还，以免多数向隅，此白。

（二）迭据学生诸君函称：国史馆及各科研究所，由本馆借书甚多，且无期限，殊有滞碍等情。查本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虽为分立机关，而于书籍之享用，究当谋一联络之方法。俟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一互相借书之规则，次第施行，总期使各处图书可以循回转置流通阅览，俾收最大最普之效用，以利研究而惠学子，此白。

（三）查本馆旧章，向无关于寄存图书之规定。现在颇有愿将私有图书寄存本馆俾众阅览者，因拟定简章数条，业经校长核准，即日施行，倘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者，本馆甚为欢迎，一切照寄存图书简章办理。此白。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日）

图书馆主任告白（二）

迭据学生诸君面陈，欲利用假期，阅览书籍，拟请将开馆时间略为延长。兹为尊重诸君好学之意向起见，自7月9日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汉文复本书籍，亦准借阅，特白。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7月9日）

图书主任告白（三）

本馆书籍，分贵重与通常二种，除贵重书及各国文辞典久定

不出借外，东西文普通书，凡只有一部者，亦既规定概不借出馆外（新定借书规则第二条），兹审度情形，特再规定：凡普通书虽有二部以上，而版次不同者，亦只出借其旧版，新版者仅得在馆阅览。此种办法，纯为谋大多数人阅览便利，并为慎重保存起见，本出于不得已，同学诸君，务希深体此意为要。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10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一）

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惟以书籍繁多，非顷刻所能毕事，只有陆续搬运。自本月14日起，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照常办公。此白。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4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二）

本馆第一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二十九号室，专备阅览中外杂志之用，现已布置完竣，由16日起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启室办公，晚间暂停，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6日）

图书馆主任布告（三）

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第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2日）

图书主任告白（四）

（一）本馆第二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三十一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现已到有十五种，详表另行揭布，凡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均可随时入览。

（二）本馆拟将阅过之月报，汇存备考。本校各办公室如有

阅过之报，幸勿掷弃，每旬日或半月送交本馆一次，至为感禱。

(三) 本校所设阅报室不止一处。本馆极愿相与联络，除数种必不可少之报外，其余订阅中外各报，能随时协商分购，以求齐备而避重复，可以定期互换陈列，殊觉便利。各表同情，即乞将所陈各报名目登布日刊，然后互定交换陈列之法。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6日)

图书主任告白 (五)

本馆借书规程，凡非有复本之书籍，概不出借，嗣因学生诸君，偶有以特别理由要求通融者，不得不稍为变通。近查此类通融借出者，亦多不能如期交还，公家殊感不便。自本日起，凡不出借之书籍，概不通融出借，其已经通融借出及当然借出之书籍，亦望如期交还，以重书籍流通之用。本馆设有五阅览室，频足供用。开馆时间又长，阅者诸君幸常来馆阅览，当无不便之处，且可藉此以养成利用图书馆之习惯。此告。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17日)

殷汝耕君与图书主任之通信

论编图书目录事

守常我兄大鉴，得来示两通，久稽裁复，不惟忙懒使然，亦以欲稍作详答，致不易执笔也。藏书要着有二，一即搜集，他即编制目录也。前者只须广搜，后者则大不易。图书之有用与否，全在目录。目录苟不得法，纵集十万卷，亦惟充栋而已。而目录之编法，又可大别为二，外形目录、内容目录（此弟姑设之名）是也。外形目录者，如，（一）书名目录（ABC顺或个口八顺或笔画顺），（二）著者目录（同上），（三）分类目录。其编制甚易，唯分类目录微难（因有只观书名难悉分类之书）而用途亦较大。然均不如内容目录之有用且便利也。兹就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研究室之编制目录法及南满铁道会社之编制法各述其略，

以供参考。

(一)法科研究室(吉野博士所担任之政治史政治学研究室)中藏书约二、三千卷,目录共有五种。其中三种,即著者、书名、分类目录。他二者,一为分国目录,一为分问题之目录。前者先分洲,次分国,例如(欧)之英、德、法等,(亚)之中、日、印、暹等各为项,每项下列参考书(或更分类,例如英国爱尔兰自治问题为一类。凡此二千卷中某章某节,足为此问题之参考者,胥以次录本项下),目录用Card式,每项别设Card录之,满则益以次页。然后研究者既定研究对象,则可依目录索之,只须翻此目录,得所研究之项,则此二、三个卷中,若干册足供参考,均可按索而得,毫无遗漏矣。分问题之目录,亦与此同理。唯此问题之名易国名耳。例如先大别为妇人参政权问题,殖民问题……,内设细项。然后依项编制。此等编制之难,在豫行遍阅此二、三千卷,且于阅时,一一摘记,本书可作某项之参考而后成耳。吉野博士告弟,渠自编此目录,每日费一小时,阅二、三年,乃竟事云。

(二)至东亚经济调查局之法,原理亦与此同。唯范围稍广,规模稍大耳。其概略如后。

甲、资料。共有五种。一、新闻、二、杂志、三、公家统计调查、四、私家统计调查、五、书籍。

乙、项目。豫将所有材料,应隶属之项目,编成册子。(该局共有二种,一新闻用,一杂志用。)

丙、新闻剪贴法。(1)共订八国文字之新闻,(摘要者)计百数十种。余则托各国剪报会社剪寄。(2)由通各国文字之人,分担阅读。(3)阅时以前项分项目录,对照于新闻纸上,划出所欲剪之栏,并于其上朱笔书该栏新隶部门之记号,例如依此目录,于新闻纸上见关于中国币制之项,则书Ba.97字样。(4)阅竟交与书记,专事剪裁。(5)剪下之记事,汇于筐中,送交总编辑。

(6)总编辑去其重复者(如同一记事见于英报复见法报等),

去其无关紧要不必保存者，改易其误于隶属者（因往往有一记事，其标题属于财政，而内容实属金融，或内容非精读不易辨为应何属者）。（7）总编辑阅竟，送书库贴存。（8）书库中贮藏贴报之处，设架分数千格（格数与前项目录中项数相符），格置贴报帖一巨册，册外各书符号，如Ba.9)之类，贴报人只须依符号分贴，不问内容也。（9）用时取其一册阅之，则关于该问题一切新闻上之材料，胥汇集于一册。

丁、杂志目录编法。（1）先编杂志记事索引一册如前。（2）阅杂志者，于杂志表纸标题上，以朱笔作记号如图：

第 卷 第某号	本号要目
杂 志	中国币制问题管见 某人

（3）阅竟送总编辑过眼。（4）由总编辑交与专司编制目录之人，目录为Cdra式，如图：

号
卷
杂志名
著者某人
Ba.97
记事
中国币制私议

录满此页，更续以他页，唯不易项目之标题耳。杂志之保存，则各种每半年汇订一册，换次贮藏。

戊、此外之资料，与此大同小异。

己、此办法之难，（一）阅读须得人。（二）分项目须得宜。（三）经费须充足。（四）材料须駭博。

庚、此种事业，本应中央政府办理，非一图书馆所能也。

至于购置保管书籍之办法，弟前曾赴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询问，因匆忙未及细查。容再查一告也。尚有见囑之件，亦容续告云云。

7月24日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8日）

卫德致李大钊信

本校纪事：美国国会图书馆派遣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Katharine H. Wead）到中国来研习汉文，并研究汉文书籍编目方法。本校于5月中旬接到金陵大学校长鲍文先生（A. I. Bowen）的介绍信云，（依原信译出）

北京大学图书馆诸位先生：

迳启者，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卫德女士此番到中国来，预备在金陵大学作一、二年的中国文学的特别研究，并且帮助我们做汉文书籍的分类事业。她想在5月底或6月初到你们图书馆来参观，如承你们允许她看图书馆的全部工作，尤其是你们汉文书籍的分类方法，我们十分感激。

卫德女士一、二年后就要回到国会图书馆，在施文葛博士（Dr. Walter K. Swingle 国会图书馆汉文部主任）的属下，继续担任国会图书馆所有汉文书籍分类的事情。

你们对他招待指导的盛情，先此道谢。

6月中，卫德女士到校参观图书馆，其时正在罢课期中，办事方面无可见者，由图书部主任李守常先生导观各书库，并请其转达美国国会图书馆长卜提间博士（Dr. Putnam），请他把他们的书目片子，送给我们一分，又汉文书籍编目法亦请其向施文葛

博士索寄一部。兹得来书云（金陵大学原译稿）：

守常先生赐鉴：今夏道出燕京，备承指导，又蒙示以藏书，甚感甚感。随即致函国会图书馆馆长卜提间博士，转达足下拟索取该馆目录卡片之盛意，想彼现已有报命矣。至该馆中文部主任施文葛处亦已去函，请其将中文书编目法函致到尊处，藉备参考。至尊处所有祁君著之中文书编目法，曾蒙允假给敝处一用，兹特请敝馆主任具函奉借，务希慨允，一俟译书告竣，立即奉还。此颂公绥卫德谨启1921.9.17

又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刘衡如先生函一通，正式告借祁君所著中文书编目法。本馆已将此书钞[抄]本寄去矣。将来中美图书馆事业，如能由卫德女士的联络，收提携的功效，那是我们极盼望的事情。

（《北大日刊》1921年9月30日）

3. 图书委员会

校长布告

照本校新定试行章程，应由校长于教员中：指任各部委员，以设立各委员会。除组织委员早经指任，并得评议会认可外，本月9日校长提出九部委员名单于临时评议会，经到会评议员公同修正，并由校长指任委员长九人。今分别记录如左（下）：（凡被任为委员长者，姓名下注一长字。）

（五）图书委员

顾兆熊（长）	李大钊（当然）	陈世璋	叶翰
宋春舫	陈启修	朱希祖	孙国璋
马衡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1日）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

今将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七项，报告如左（下）：

- (一) 预算案内之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
- (二) 图书部应设购书课。
- (三) 整理日报目录，并添购南方各报。
- (四) 建议总务处组织消防队以防火险，并从速建筑图书馆。
- (五) 纸片目录，每类应编总号数。
- (六) 各研究所阅览室书籍，均归图书部登录编目。
- (七) 订购书籍之函件，应编号存底。

校长钧鉴

图书委员会九年五月七日

图书委员长：顾孟余

图书委员：李大钊、马衡、
孙国璋、陈世璋、
陈启修、朱希祖。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第五次图书委员会会议

(民国九年十月六日)

到会者：朱希祖 陈启修 顾孟余 马衡 孙国璋
李大钊 陶孟和

- 一、议决：在第一院设教员阅览室。
- 二、议决：所有书籍概不借出馆外，以前借出之书籍，限期收回。

第六次图书委员会会议

(民国九年十一月八日)

到会者：顾孟余 陈世璋 马衡 叶翰 朱希祖
李大钊

- 议决：英文杂志应由陈聘丞、陶孟和两先生、日文杂志由陈

偃农、朱遜先、李守常三先生到图书馆审查应否续订。

(《北京大学档案》)

4. 捐贈北大图书馆书刊

图书馆布告

顷承本馆主任赠下乐群杂志第一期一册。特此布告。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0日)

图书馆书目室启事

……又承本馆主任李先生捐赠独立周报：第一年十四期(全)，第二年念一期(全)，俱共32本。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29日)

图书馆书目室启事

顷承李主任先生捐赠本馆学艺第三期一本。除编号存馆专函鸣谢外，特此布告。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4日)

图书馆[书]目室启事

顷承本馆李主任捐赠本馆：

今井博士《建国后策》一册

国耻之一一册

民彝第三号一册

言治第二号一册

……

除编号存馆专函鸣谢外，特此布告。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

国史编纂处启事

顷承本校出版部惠赠新潮第三号一册。

又承李大钊君惠赠湘灾纪略一本，醴陵兵燹纪略一本。

……

除编号存处外，特此通告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9日)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

本馆兹承本馆主任李先生惠赠教育第一期一册，特此声谢。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9日)

捐赠杂志

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以大批旧杂志捐助本校图书馆，日本文者有太阳、支那、外交、雄辩、生活、向上、正论、新日本、洋及洲、东大陆、外交时报、经济论丛、六合杂志、东京评论、东方时论、中央公论、哲学杂志、日本浪人、东亚之光、国民评论、隔周杂志、洪水以后、第三帝国、日本评论、日本及日本人、世界之日本、伦理讲演集、国民经济杂志、国家学会、国家及国家学、社会及国家，和黎明会讲演等267册。中文者如雅言、楚宝、寸心等30册。又小册17册。刻已登录完竣，分存各阅览室云。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8日)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

本馆兹承……

李守常先生惠赠俄文书两种

特此声谢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1日)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

本馆兹承……

李大钊先生捐赠《国风报》五十二册

特此声谢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12日)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

本馆兹承……

李守常先生惠赠《革命军》一册

特此声谢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14日)

5. 北京图书馆协会

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纪闻

北京图书馆协会于去年12月21日午后二点钟，假本校文科事务室开成立会，各馆代表到会者共20人。当将会章及附则各六条议决通过，并即选举职员。清华图书馆代表袁同礼君当选为正会长，副会长本校图书馆代表李大钊君，与汇文大学图书馆代表高罗题君 Mr Galt 得票相同，即提出高君请众认可，高君当选为副会长，李君当选为中文书记，协和医学校图书馆代表吉非兰女士 Miss Crilfillon 当选为英文书记，北京图书馆协会遂完全成立。兹闻将于本星期六日即25日下午一时半，仍假本校开第一次职员会，商议进行方法云。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1日)

北京图书馆协会章程

- 一、本会定名为北京图书馆协会。
- 二、本会宗旨在图谋北京各图书馆间之协助互益。
- 三、本会会员以图书馆为单位，但须设有专任职员者，始得

入会。

每馆派代表一人，有投票权，其他职员亦可到会与议，但无投票权。

四、本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中文书记一人，西文书记一人，每年春季常会选举之。

上列各职员得组织职员会，如须委员协助时，职员会得由会员中指定之。

五、本会每年开常会两次，于春秋两季举行。其地点、及日期，由职员会商定，迂有必要时，职员会得召集特别会。

六、本章程经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之肯定，得行修正。惟修正案须于开会前一星期通告各会员；附则之修正，得以出席代表之多数通过之。

附则

一、以个人书藏加入本会者，经本会职员会认可，得为准会员，享会员同等权利，但无投票权。

二、各图书馆所藏图书，凡经本会会员之介绍者，得互相来往参考之。

三、各图书馆互借图书，应由各图书馆自为交涉。

四、各图书馆应于每年春季常会报告各该馆一年之成绩，其报告书，应由书记保存之。

五、各图书馆应谋互换其出版物。

六、本会如需费用时，经大会议决，由各图书馆均担之。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1日、22日）

6. 辞职启事

鄙人已辞图书主任职，本校同人如有关于图书部的事件，乞与图书主任皮皓白先生接洽可也。

李大钊白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2日）

(二) 教学与校务管理

1. 受聘教授

北京大学评议会记录

北京大学评议会 7 月 8 日特别会：

到会者：校长蒋代、蒋、朱希、朱继、贺、黄、张贺代、何朱继代、陶、胡、沈、马夷、马幼(马夷代)。

(4) 图书馆用助教事。议决：(马夷初先生修正案) 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全体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

文牍课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收发文件事由单

△收文：无

△发出文件共十三件：

- 一、咨山西省长送学生李迳道等领到津贴收据文。
- 一、咨广西财政厅送学生梁民武等领到奖励金收据文。
- 一、咨吉林省长送学生张其伟等领到津贴收据文。
- 一、咨广西财政厅送毕业生陆善焜等领到回籍川资收据文。
- 一、咨贵州省长送学生陈廷纪等领到津贴收据文。
- 一、请王烈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
- 一、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
- 一、请谭熙鸿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
- 一、请齐昌豫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
- 一、请吴康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
- 一、请陈达材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

一、请王峻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

一、请顾颉刚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 (民国九年十一月)

职务	姓名	别号	年岁	籍贯	住址	住宅电话
校长	蔡元培	孑民	52	浙江绍兴	东堂子胡同	东局1919

.....

总务处图书部

本科政治学系教授兼图书部主任	李大钊	守常	32	直隶乐亭	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35号	西局2257
----------------	-----	----	----	------	--------------	--------

.....

本科史学系

教授	朱希祖	逖先	42	浙江海盐	德胜门内罗儿胡同21号	
----	-----	----	----	------	-------------	--

.....

本科政治学系教授兼本科史学系教授	李大钊	守常	32	直隶乐亭	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35号	西局2257
------------------	-----	----	----	------	--------------	--------

.....

本科政治学系

教授	陈启修	惺依	36	四川中江	地安门内米粮库20号	东局1873
教授	张祖训	慰慈	32	江苏吴江	东单棲凤楼65号	东局2429
教授	李大钊	守常	32	直隶乐亭	西城城石驸马大街后闸35号	西局2257

.....

评议会

议长 蔡元培 子民 52 浙江绍兴 东堂子胡同 东局1919

校长

.....

评议员 李大钊 守常 32 直隶乐亭 西城石驸马 西局2257

本科史学系

大街后闸35

教授

号

.....

图书委员会

委员长

本科德国文学 顾孟馀 32 京兆宛平 东城遂安伯 东局2942

系教授

胡同4号

委员

本科政治学 李大钊 守常 32 直隶乐亭 西城石驸马 西局2257

系教授

大街后闸35

号

.....

(《北京大学档案》)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 (民国十一年六月)

职员

职务 姓名
校长 蔡元培

.....

本科史学系教授兼总 李大钊
务处图书部主任

教 员

职 别 姓 名 担任课目

.....

学生事业委员会
委员长

李大钊

.....

学生事业委员会

委员长

本科史学系教授

李大钊

.....

各部主要职员

(职员录另印)

职务
校长
总务长兼代理校长
教授兼校长室秘书

姓名
蔡元培
蒋梦麟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概略》1928年)

薪水名册(节录)

陈独秀 300元
夏元瑛 350元
秦汾 100元
温宗禹
李大钊 120元

发讫
发讫
发讫

.....

卢遇庚 8元
赵如云 8元
毛泽东 8元

发讫

(《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1919年1月份)

.....

李大钊 140元

发讫

.....

(《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1920年6月份)

2. 任 课 讲 学

陈启修先生演说词

陈政记

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点关于政治学系的事情，却也是于大家都有点关系的，所以在此报告一下。

第一，从本学年起，添设演习一门，以后关于政治学理，教员和学生可以常常有共同研究的机会。

第二，添设了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因为现代的政治问题日趋复杂，如劳农政府、巴黎和会、国际联盟等等亟待研究的很多。加以现在的社会，无论如何，总还脱离不开政治，所以实在不能不研究。这个讲座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张慰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担任，打算帮助大家一同研究。

我国青年近来虽然对于政治上已有责任的觉悟，对于实际政治也总算多少发生一点影响，但是总说不到真正的解决，就因为没有学理的研究。要谋真正解决，非先共同研究不可。但是要全国学界共同研究是做不到的，只好希望北大同学共同研究。别的学系的同学，很有些热心研究政治的，很希望加入我们的研究。

《北大日刊》1920年9月17日

注 册 部 通 告

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始授课。此布。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日）

政治教授会授启事

兹将本月一日政治教授会议决事项列左，请政治系教员及学生诸君公鉴：

(一) 政治史教科书Hazen's Political History及二年级政治学教科书Oggand Beards National Government二书未到以前，暂用去年一年级讲习未毕之教科书。

(二) 本年演习之科目决定二年级为宪法，由陈启修及燕树棠担任。四年级为政治学，由陶履恭及张祖训担任。三年级因须兼习行政法总论及各论，钟点稍多，暂不设演习。

(三) 政治学系演习规则，决定如下：

(1) 演习分调查及译书二种，由演习人自由认定一种或二种。

(2) 调查之办法，系由学生各人就理论历史及在事实各方面，任意选择一题，与担任教员商定后，请教员指示参考材料及研究方法，自行调查研究之，于一定期间中，编为报告，轮流在规定之演习时间内，上堂解说，解说之后由教员及其他学生自由质问，或批评之，并由教员评定分数。

(3) 译书之办法，系由学生一人或二人就属于演习科目之外国书中，选择一种，与教员商定后，请教员指示翻译方法及参考材料，自行翻译之，于每两个月后，轮次将所译得之成绩，缮成小册，上堂报告其内容之大略，批评其书之长短，并述翻译时之疑难，报告之后，由教员及其他学生自由质问或批评之，并由教员评定分数。

(4) 各学生在规定之演习时间中，无论自己轮班解说或报告与否，皆有出席之义务，与普通授课时间相同。

(5) 关于调查，每人每学期至少报告一次。关于译书每人至少每二月一次。

(6) 教员或轮班之学生，于规定之演习时间中，若因故告假，其演习虽可暂时延期，仍须于相当时间中补行演习。

(7) 调查或译书之成绩须交存本系教授会，备演习员或本校同人之参考。

(四) 现代政治之讲题及担任教员，已定者如下，其他俟随

时决定后，另行通知。

〈一〉劳农政府：陶履恭，二次讲完。

〈二〉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陈启修，二次讲完。

〈三〉现代普选运动：李大钊，次数未定。

〈四〉平和会议与平和会条约：张祖训，次数未定。

〈五〉现代各国之社会党：陈启修，次数未定。

(五) 决定对于校长为下列之建议。

“以后遇有必要时，得由政治教授会主任商承校长，不经聘任委员会之通过，临时延聘对于现代政治问题有特别研究之本国人或外国人，在现代政治之时间内为二小时至四小时之讲演”。

(六) 因实行新制之结果，本年之三年级生，决定应与二年级生，合班听行政法总论之讲义，本年四年级生应与三年级生合班听行政法各论之讲义。并由主任转请注册部行时间表之移动。

九、十、六。

(《北大日刊》，1920年10月7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

本星期四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之现代政治讲题为《工人的国际运动》，由李大钊先生担任，在第一院第三教室讲演。特布。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21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

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时间和地点均照旧(上午九至十一、第一院第三教室)。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8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

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大钊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

际运动》，时间与地点均照旧（上午九时至十一时，第一院第三教室）。

（《北大日刊》，1922年2月15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

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时间与地点均照旧（上午九时至十一时，第一院第三教室）。

（《北大日刊》，1922年2月22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

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时间、地点照旧。

（《北大日刊》，1922年3月1日）

注册部布告（一）

李大钊先生所授政治、史学两系唯物史观本日上午上课。其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两课，均稍缓再行授课。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31日）

北大经济学会第六次公开讲演

讲题：社会主义的将来

讲演者：李大钊先生

时间：本月29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半

地点：第三院大礼堂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29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

本星期四（11）之现代政治，请李守常先生担任，讲题为

《印度问题》，时间由上午九点半起，至十一点半止，地点在第一院第四教室。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9日）

注册部布告

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5月10日）

史学系课程指导书

（十二年至十三年度）

课 程

第一学年

本国史一：

上古史……………4……………陈汉章

外国史一：

西洋上古史………3……………徐渭津

外国史二：

印度古代史………1……………钢和泰

本国史学名著研究………1……………朱希祖

以上必修科

社会学……………3……………

政治学原理……………3……………

经济学原理……………4……………

生物学……………2……………

人类学及人种学……3……………陈映璜

以上选修科（凡不注教授名姓者在别系选习，下仿此）

第二学年

本国史二：

中古史..... 4 (未定)

外国史三:

西洋中古史..... 3徐渭津

本国史五:

现代史..... 1杨栋林

外国史六:

现代史..... 1杨栋林

以上必修科

法律哲学..... 2

社会心理学..... 2

统计学..... 2

外国经济史..... 3

本国经济史..... 3黎世衡

以上选修科

第三学年

本国史三:

近古史..... 1 (未定)

外国史四:

西洋近世史..... 3张健

外国史五:

日本近世史..... 2张孝年

以上必修科:

政治史及外交史... 6

本国法制史..... 3冯承钧

本国美术史..... 3叶瀚

金石学..... 3马衡

以上选修科

第四学年

本国史四:

近世史	4	杨栋林
欧洲文化史	3	熊遂
史学研究法	2	张健
本国史学概论	2	朱希祖
以上选修科		
欧洲社会变迁史	2	杨栋林
史学思想史	3	李大钊
本国文学史	3	
本国哲学史	2	
以上选修科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9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

本年度政治学系演习细则，昨经本会议定如左：

（一）本年度演习限于调查一种。

（二）演习分设四类：

一、政治史及政治制度；

二、政治理论；

三、国际政治；

四、社会问题。

（三）凡选修演习之学生，须按各人所择题目性质，就左列之担任教员中，择定一人，请其指导：

陈源 王世杰 （政治史及政治制度）

周览 燕树棠 （国际政治）

高一涵 （政治理论）

李大钊 陶孟和 （社会问题）

（四）演习题目须于本年10月以内选定，向担任教员接洽，得其认可。演习报告至迟须于下学期开学后一星期内提交担任教员审

阅，由教员指定日期上堂解说。

十二年十月六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9日)

注册部布告 (四)

.....

李大钊先生因事请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

.....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5日)

注册部布告 (二)

李大钊先生因事离京，其所授史学系史学思想史及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俟回校后再行补讲。

.....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5日)

注册部布告 (二)

李大钊先生刻已回校，下星期起照常授课。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2月29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

星期三日午后一时至三时，请李大钊教授讲授“现代政治”。
讲题：人种问题。教室：第三院第一教室。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14日)

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

(十三年度至十四年度)

1. 旧课程

一、学科

甲必修学科

.....
现代政治——周 览、李大钊、王世杰、燕树棠、
高一涵、陶孟和、陈启修。

乙选修学科

.....
演习——周览、陈源、王世杰、李大钊、陶孟和、
高一涵、燕树棠、陈启修。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7月19日)

注册部布告

李大钊先生现已回京，原授之史学思想史，定于下星期一开
始讲授，欲选此项科目者，望于本星期内至注册部报名为要。

一、此项课程于半年内讲完。

二、讲授时间星期一第一时，星期六第一、第二时，共三小
时。

三、地点：第一院14教室。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2月23日、24日)

唯物史观（北大讲义）目录：

- (一)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 (二) 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
- (三)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 (四)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 (五)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 (六)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的原因
- (七)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未完）

史学思想史（北大讲义）：

- (一) 史观

- (二) 今与古
- (三) 鲍丹的历史思想
- (四) 鲁雷的历史思想
- (五)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 (六) 韦柯及其历史思想
- (七) 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 (八) 桑西门的历史思想
- (九)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 (十) 唯物史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 (十一) 唯物史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①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里，正式发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马氏的意思，似欲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按他的大意，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又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更，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等，他称之为观念态度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

^① 这是1923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贺廷珊的试卷，李大钊给该生的成绩是95分。——编者

明不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受马氏的经济历史观的影响很大，亦渐知从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究，依他们的主张，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异意。总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史学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者，研究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天才说解史实的还算深一点的，其余的不是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便是主张宗教是进化关键的人，还有些迷信君主万能的历史家，把君主的动作言语，看成历史。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

（《北京大学档案》）

3. 校务管理

校长办公室通告

现在校长室秘书职务已请李守常教授担任，定于本月5日起到室办公此布。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5日）

校长办公室通告

校长办公室秘书李守常先生，因事告假出京，秘书室事务暂

请本室助教章廷谦先生担任办理，本学年不再另设秘书。此布。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7日)

北京大学评论会规则

第一条 本会以左列人员组织之

(甲) 校长 (乙) 学生及主任教员 (丙) 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选，以一年为任期，任满得再被选。

第二条 本会议长一人，以校长任之，书记一人，由会员中推举。

第三条 选举于每年暑假后第一月内行之。

第四条 本会讨论左列各事项

(甲) 各学科之设立及废止；(2) 讲座之种类；(丙) 大学内部规则；(丁) 关于学生风纪事项；(戊) 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己) 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庚) 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将建议于教育总长者。

第五条 本会每月开常会一次，由议长指定日期于三日前通知。

第六条 本会遇有特别事件，由议长逕行或过半会员之提议，召集临时会议。

第七条 本会非有过半人数以上列席不得议决事件。

第八条 本会议决事件，凡关于校内者，由校长分别交该管职员办理，惟第四条庚项之建议者得以本会名义行之。

办理情形，会员可随时请该管职员出席报告。

(《国立北京大学20周年纪念册》)

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蔡元培启事

本届评议会选举，共收到选举票43张，内废票两张（因所举超过法定人数）。兹将各教授所得票数，开列如下：

陶履恭31票。顾孟余、蒋梦麟、俞同奎各30票。胡适29票。朱希祖26票。王星拱24票。陈启修23票。李大钊、马叙伦各20

票。何育杰19票。陈世璋、沈士远、郑寿仁、冯祖荀、张大椿各18票。以上16人当选。

朱锡龄、马裕澡各17票。贺之才16票。黄振声、颜任光各12票。陈衡哲11票。温宗禹10票。10票以下者从略。

蔡元培启事二

新被选评议员诸先生公鉴：兹定本月16日（星期六）上午九时在第一院接待室开评议会。请诸位先生按时到会。此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4日）

校长启事

本届本评议员选举，已于昨日下午四时一刻在第二院大礼堂当众开票，计收到选举票共69张，兹记其结果如左：谭熙鸿44票、顾孟余42票、胡适41票，王星拱41票、陈世璋40票、何育杰35票、陶履恭32票、沈士远30票、朱锡龄30票、李大钊29票、俞同奎29票、冯祖荀29票、马裕澡27票、夏元璠26票，以上14人当选。

温宗禹25票、贺之才25票、张大椿25票。以上3人因票数相同应于其中决选2人。

王世杰24票、李四光24票、朱希祖23票、丁燮林22票、颜任光22票、陈启修22票、李煜瀛21票、罗惠侨21票。以上次多数，20票以下从略。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3日）

校长启事

本届评议员16人业已完全选出，当选者为：谭熙鸿，顾孟余，胡适，王星拱，陈世璋，何育杰，陶履恭，沈士远，朱锡龄，李大钊，俞同奎，冯祖荀，马裕澡，夏元璠，贺之才，张大椿诸先生。兹定于本月9号（星期三）下午四时，在第一院接待室，开本届第一次评议会。请当选评议员诸先生，届时务必出席。为

荷。

11月7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7日)

校长启事

本届本校评议员选举，已于昨日上（下）午四时一刻在第二院大讲堂当众开票，计收到选举票共58张，兹记其结果如左：

谭熙鸿 42票、王星拱 42票、
胡适 41票、顾孟余 30票、
李四光 29票、陶履恭 28票、
马裕藻 28票、陈启修 26票、
丁燮林 25票、李煜瀛 25票、
李大钊 24票、朱希祖 23票、
冯祖荀 23票，以上13人当选。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3日)

校长布告

本校本届评议员选举，已于昨日下午三时一刻在第二院大讲堂当众开票，计收到选举票共67张，兹记其结果如左：

顾孟余 56票，王星拱 46票，李煜瀛 41票，马叙伦 40票，李大钊 39票，陈大齐 36票，谭熙鸿 36票，马裕藻 35票，沈士远 34票，朱希祖 32票，冯祖荀 30票，胡适 28票，罗惠侨 28票，余文灿 27票，沈兼士 27票，沈尹默 26票以上16人当选。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5日)

评议会议事录

6月22日常会

到者：蒋、陈、贺、何吟、陶、朱、俞、马夷、马幼、胡、

沈马幼渔代。教务长顾梦渔先生，法律学系主任黄右昌先生出席。

(1) 教务会议提交之北京大学本科转学规则。修正后，通过。

附录修正案。

(2) 教务会议提交之下学年课程修正案大纲。

议决：本案请教务会议重新审查一次，审查议决后施行。

通过。

(3) 临时工科取消后、善后办法。

蒋梦麟先生报告与教育部及工科学生接洽情形。现成为问题者：

① 土木工程班一年

② 土木工程班二年

以上二班因无法政科，又无法转学，呈请在物理学系增设相当之应用学科，以完学业，并情愿增加学费一倍。

议决：移交预算委员会与教务会议斟酌办理。

全体通过。

④ 修正教员待遇章程委员会报告。

“又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等25人提议议案：评议会长钧鉴：顷闻评议会将修正教员待遇规程之举，梦麟等以为凡属校中职员宜受同等待遇，此种规定似宜斟酌周备，俾全校职员均得适用。兹依本年4月1日通过之评议会规则修正案第六条，建议如右，请予提出，不胜盼祷。

蒋梦麟、刘钜锷、章洪钟、许文增、李振彝、郑寿仁、谭澄、张承隆、马家骧、周同煌、李辛白、左贯文、汪敬熙、郑阳和、李大定、沈士远、胡祖植、齐昌豫、胡春林、肖清海、李大钊、盛铎、徐之杰、杨真江、段宗林。9年6月21日。

议决：扩张原有之修正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加入：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五位。

通过。

(5) 陈邦济在开滦矿实习期满，已得证明书，应给予文凭事。（参考9年2月4日记）

议决：交教务会议议决。

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1920年6月22日）

7月8日特别会

到会者：校长蒋代、蒋、朱希、朱继、贺、黄、张贺代、何朱继代、陶、胡、沈、马夷、马幼夷代。

(1) 总务处庶务部增设收发课事。

议决：追认。

全体通过。

(2) 总务处增设日刊课。

议决：追认。

通过。

(3) 总务处图书部分课：

分四课：①登录；②编目；③典书；④购书。

议决：照原议分课。

通过。

(4) 图书馆用助教事。

议决：（马夷初先生修正案）

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

全体通过。

(5) 赠与名誉教授或名誉学位于外国著名学者。

议决：凡著名学者，经教务会议推荐，评议会通过，得由本校赠与名誉学位或名誉教授，或两者并赠。其祥章另定之。

全体通过。

(6) 国立北京大学募款规章（马夷初先生拟稿）。

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 1920年7月8日)

10月16日评议会

一、本年评议员改选, 当选人为左16人:

陶履恭、顾孟余、蒋梦麟、俞同奎、胡适、朱希祖、王星拱、陈启修、李大钊、马叙伦、何育杰、陈世璋、沈士远、郑寿仁、冯祖荀、张大椿。

二、本日到会者: 陈启修、冯祖荀、朱希祖、何育杰、顾孟余、陈世璋、李大钊、沈士远、马叙伦、郑寿仁、蒋梦麟、胡适蒋代、蔡元培。

三、陈启修被推为本会书记。

四、张大椿、俞同奎先生职退评议员案。

评议: 不能承认其辞职。(由书记通告)

五、委托本会书记整理旧议案并请校长室书记员帮同缮校誉写。

六、每次评议会于会毕时, 应决定应行公布之议决及不应公布之议决。

七、本届组织、预算、审计、出版、仪器、图书、庶务、聘任各委员会会员, 由校长推定, 提出名单。照原名单通过。

八、马叙伦提议: 预算委员会之决议, 应报告于评议会。

通过。

九、沈士远及郑寿仁提议: 本校毕业生来本校旁听, 免收学费一事, 发生种种流弊, 应有一定之规定。

议决: ①本校毕业生来本校进他系为正科生或旁听者仅正科生有寄宿权利, 旁听生无寄宿权利。

②正科生学生是否上课, 应由注册部严重调查之。

③此种正科生至本学期末不缴寄宿费者, 亦剥夺其寄宿之权利。

④以上于年假后实行。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 1920年10月16日)

评议会通告

10月16日评议会议决事件应行公布者如左:

(一)每次评议会开会, 于会毕时, 应决定应行公布之决议及不应公布之决议。

(二)本届组织、预算、审计、出版、仪器、图书、庶务、聘任、各委员会委员, 由校长推定, 提出名单, 业经评议会通过如左:

组织委员会委员: 蒋梦麟(长)、俞同奎、顾孟馥、陶履恭、黄右昌、陈世璋、沈士远。

预算委员会: 陶履恭(长)、蒋梦麟、马叙伦、胡适、陈启修、徐宝璜、郑寿仁、颜任光、谭熙鸿。

审计委员会委员: 郑寿仁(长)、徐宝璜、黄振声、朱锡龄、朱祖宏、陈廷筠、丁燮林。

聘任委员会委员: 俞同奎(长)、胡适、蒋梦麟、马叙伦、陶履恭、顾孟馥、陈启修、谭熙鸿。

图书委员会委员: 顾孟馥(长)、李大钊、陈世璋、叶瀚、陶履恭、陈启修、朱希祖、孙国璋、马衡。

庶务委员会委员: 马叙伦(长)、沈士远、朱锡龄、徐宝璜、马裕藻、周象贤、罗惠侨、陈怀、钱稻孙。

仪器委员会委员: 颜任光(长)、陈世璋、何杰、张大椿、何育杰、龚安庆、谭熙鸿、任鸿雋、俞同奎。

出版委员会委员: 胡适(长)、李辛白、钱玄同、陶履恭、王星拱、张大椿、陈衡哲。

(三)评议员陈启修被推为本会书记。

(四)评议员张大椿、俞同奎二君来函辞退评议员之职, 经评议会议决不能承认其辞职。

(五)关于本校毕业生来校为他系正科生或旁听生者之寄宿权利，议决如下：

(1) 本校毕业生来本校进他系为正科生或旁听生者，仅正科生有住宿权利。旁听生则无寄宿权利。

(2) 正科生是否上课，应由注册部严重调查之。

(3) 此种正科生至本学期末不缴寄宿费者，亦剥夺其寄宿之权利。

(4) 以上于年假后实行。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8日)

11月26日开例会

本日到会人：陶孟和、胡适之、陈聘承、马叙伦、王抚五、俞同奎、郑寿仁、陈启修、沈士远、朱希祖、冯祖荀、张大椿、何育杰、顾孟余、蒋梦麟、李大钊。

议决：

(一)从本年度预算年度起实行审计。

(二)蒋梦麟提出议案：以后由教育部领得款项时，除支发教职员薪水及工资外，按照预算按成分拨各部。

通过。

(三)顾先生提出：凡以前自7月份起借过薪水者以后遇发11月以后薪水时，只支給半数，以扣清为度。但部中补发欠款时，仍给与全数。但每月薪水在50元以下者不在此例。

通过。

(四)预算委员会提出预算案。沈士远先生提议将此案保留至下次开会时再议。

通过。

(五)顾孟余先生提议：以后无论何系之学生，其旅行费俱不由本校发给。

通过。

(六) 陶履恭先生提出：以后本校以学校名义向外借款时，须先得评议会之同意。

通过。

(七) 教员李续祖要求本校津贴留学半薪案。

议决：缓议待查。

(八) 孔德学校请本校增加补助费案。陈聘丞先生提出，每年由本校补助4000元，按月平均摊付。

通过。

(九) 李守常提出教员学生借书规则修正案。陈聘丞先生提议：(一)凡单车之书籍，不借与学生出馆外阅看。(二)暂取生及旁听生借书，无论单本复本只能在馆内阅看，不得借出馆外。

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1920年11月26日)

12月7日开临时会

出席人：蒋梦麟、顾孟余、朱希祖、李大钊、郑寿仁、沈士远、陈世璋、俞同奎、王星拱、何育杰、冯祖荀、陈启修、张菊人冯代、陶孟和顾代、胡适蒋代。

(一)解释前次关于补发欠薪之议案。顾孟余提议：前次关于补发欠薪之决议。文内所谓“仍给与全数”者系指未曾支领之月薪而言，其已经向会计课支领之月份，既无欠薪之可言，当然不适用此决议。……

主席对于前次原案付表决，通过。

……

(五)学生对于图书馆办法建议案，沈士远先生提出，交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

李守常先生要求下次开会时，应将此案尽先付议。通过。

.....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 1920年12月7日)

12月23日开本月常会

到会人: 蒋梦麟、陈世璋、冯祖荀、俞同奎、郑寿仁、陈启修、何育杰、李大钊、张大椿、胡适陈聘丞代、陶孟和顾孟余代、王星拱、沈士远、顾孟余。

(一)蒋代理校长提出考试委员会委员名单

考试委员会委员: 顾孟余长、郑寿仁书记, 马幼渔、黄国聪、贺之才、丁燮林、王星拱、罗惠侨、陶孟和、朱希祖、燕树棠。

照原提案通过。

(二)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照左粘修正案通过。

(三)修正讲师规则案。

照上刊修正案通过。

(四)化学定量分析室仪器使用规则第三条修正案通过。

(五)赠送白来士3月薪水问题。

议决: 在此范围之内, 请校长临时酌定优待条件。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 1920年12月23日)

1月26日开常会

出席人: 郑寿仁、朱希祖、陈启修、冯祖荀、陈世璋、顾孟余、张大椿、沈士远、俞星枢、陈聘丞、何育杰、陶孟和、蒋梦麟顾代、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代、王星拱。(一)职员待遇规则学(草)案。议决: 保留至下次常会时再议, 并由评议会推定委员五人, 调查部定章程及本校从前各种章程修正之。即刻推定蒋梦麟、陶孟和、朱希祖、李大钊、马裕藻五君为委员。修正之方针如左:

(一)恢复教部从前所允之权利。

(二)加入职员在内。

(三)留学及请假规则另定之。

(二)体育会规则。

议决：交回校长核办。

(三)体育会奖章。

交由校长请钱稻孙先生审查。

(四)本校三角旗及小徽章。

三角旗交由校长请钱稻孙先生审查后提出下次会决定。

(五)程演生先生出洋请本校津贴案。

议决：照梁敬淳前例。关于年限及津贴数目，俱同样办理。

(六)宋春舫教授出洋及代课薪水事并规定年限案。

议决：此议案之效力，截至本年暑假为止。代课人之薪金，按钟点计算，亦以暑假为止。

(七)校长提出请王照为仪器委员案。

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1年1月26日)

3月2日常会

朱逸先、李守常、张菊人、郑铁如、何吟管、陶孟和、陈聘丞、俞星枢、沈士远、马夷初^{沈代}、胡适之、王抚五^{陶代}、冯汉叔、^{何代}、顾梦余^{朱代}、陈惺农^{胡代}、蒋梦麟。

(一)音乐系之设立。由教育部每月给二百八十元，为筹备费；本校即以此费资送赵元任博士往欧美留学。两年之后，始实行开办。开办费及常年费，届时请部增加预算。

通过。

(二)沈尹默教授请续假两年，以便在京都大学继续研究。函中并言辞去本校所给津贴。议决：续假二年。

通过。

(三) 夏浮筠教授函称，无法买船票，请续假半年。议决：夏先生已延长一年，今已逾限，不得续假。请大学即汇寄回国川资，促其回国。

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1年3月2日)

10月18日开会

出席人：陈启修、何育杰、胡适、冯祖荀、朱希祖、陶孟和、沈士远、李大钊、陈世璋、顾孟余、张大椿、王星拱、俞星枢。

(一) 韩述祖先生要求延长留学期间六个月，研究职业心理案。议决：大多数可决。(二) 何育杰先生提出，本校教授孙瑞林自请赴美，研究高深学术，请援本校优待教授出洋留学条例支給全薪或半薪案。议决：支給原薪半数两年。

(二) 临时优待教员办法案。此后本校教员援优待先例，请求准假休息支取原薪或半薪时，须事前预先知会学校请求审查。多数通过。

(三) 预科委员会组织大纲。

经长时间讨论之结果，主席以下刊四办法付表决：

(1) 照提出之原章程，但加入主要科目之主任。

一票 少数。

(2) 照提出之原章程，但预科委员会之委员，不加入任何学生主任。

二票。

(3) 另组预科委员会，专管预科事宜，有处置一切之权，其委员长出席于教务会议，为教务会议之一员。

二票。

(4) 照今日校长提出原案试办。

八票。多数通过。

(四) 预科委员会委员同意案。

议决：照原案通过。

(五) 各委员会名单。

议决：除预算委员会及仪器委员会之名单外，俱照校长提出之名单通过。

(六) 陶孟和提议，建议提交校长请将预算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合组一经济委员会。胡适附议。

议决：通过建议提校长。

(七) 聘任委员会提出设立审查待聘人资格之标准案。

议决：照原案通过。

(八) 总务处提出设立女生宿舍案。

议决：缓办。

(九) 胡适提议，沈士远附议。请校长函聘本校教授新式的夫人若干人组织名誉的及义务的女生招待委员会。

通过。

(十) 林损告假一年请支原薪案。

议决：赞成告假一年支原薪金者，三票。

赞成准其告假一年支半薪，但假期满时准其续假一年仍支半薪者，七票。多数通过。

(十一) 物理学系扩充实验室设立小工场，修理仪器，并代理校长蒋先生承诺提26000元，现经校长提出追认案。

议决，“追认”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1年10月18日)

11月9日第一次评议会

到会者：王星拱、马裕藻、夏元璠、陶孟和、俞同奎、冯祖荀、沈士远、贺之才、朱锡龄、陈聘丞、何育杰^{蒞代}、张菊人^{蒞代}、谭熙鸿^{代理主席}、李大钊、顾孟余。

(票举评议会书记，李守常以五票当选，谭仲逵四票为次多)

数) (一) 议事规则宜实行案。议决：按评议会规则实行。(二) 校长委任组织委员会委员案。组织委员会：马寅初(长)、陶孟和、胡适、马叙伦、陈启修、陈世璋、顾孟余、沈士远、谭熙鸿。议决：原案通过。(三) 校长委任预算委员会委员案。

预算委员会：谭熙鸿(长)、马寅初、胡适、陈世璋、顾孟余、徐宝璜、沈士远、陶孟和、王世杰、王星拱、陈启修。

议决：原案通过。

(四) 校长交议预算方针案。

议决：赞成校长提议之《学术上充分发展事务上相当限制》之预算方针，俟交预算委员会推出具体的预算案再为审议。

(五) 校长交议校歌案。

议决：(一) 不承认廿周年纪念会歌为本校校歌。(二) 本校暂不制校歌。

(六) 沈士远提议，朱继奄附议。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如有记载本校事实及章程之单行本者，须于出版前交本校检阅。

议决：原案通过。

(七) 关于学生对于教员之非难案。

议决：如学生对于教员不满，可以不选该门。教员既经聘任委员会慎重聘来，不能因学生攻击而辞退。

(八) 化学系学生请本校呈请教育部咨行各县发给旅行费案。

议决：由总务长以相当之理由拒绝。

(九) 陶孟和提议蒋梦麟、马寅初两教授请假，应照教授休息例办理案。

议决：询明校长后再追认。

(十) 津贴地质学系旅行费案。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1年11月9日)

11月28日第二次评议会

顾孟余、陶孟和副代、谭熙鸿、傅之才副代、马裕藻、何育

杰、夏元琛何育杰代、王星拱、冯祖荀、沈士远、胡适、张大椿、俞同奎张大椿代、朱锡龄、李大钊。

(一) 校长交议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案。议决，由本会公推三位整理此次校长提交之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并从前本会通过之研究所办法，然后提交本会议决。

整理前次通过之研究所办法，并校长提出之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改为四人，已推定顾孟渔、胡适之、马幼渔、谭仲逵。

(二) 议决：未办研究所之各系，在该各系所设之学门研究所未成立以前，得斟酌需要设立研究室。

(三) 陈校医变更校医室组织并预算意见书案。

议决：下次开会再议（首先提出）。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3年11月28日）

12月14日第三次评议会

沈士远、朱锡龄、张大椿锡龄代、马裕藻、何育杰、俞同奎、冯祖荀、谭熙鸿、陶孟和季守常代、贺之才谭仲逵代、李守常、王星拱。

(一) 陈校医变更校〔医〕室并预算意签案。

议决：（一）仍称校医室，内部可以扩充。（二）扩充的办法交组织委员会审查后再交本会议决。（三）关于扩充的预算案，由校医详具一表交预算委员会审查后再交本会议决。

(二) 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案。

(三) 谭仲逵先生提议，马幼渔先生附议。《在研究所担任指导之教员之教员皆为名誉的及义务的》案。

议决：原案通过。

(四) 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案。

(五) 校长提案如下：（略）

议决：原案通过。

(六) 教务会议提出《本校毕业生在本校为讲师者一律改称

助教兼讲师》案。

议决：凡本校毕业生在本校为讲师者得称助教。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1年12月14日）

第五次会议 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出席委员：蔡元培、张大椿、沈士远、马裕藻、朱锡龄、夏元瑛、俞同奎、王星拱、贺之才、冯祖荀、李大钊、顾孟余、何育杰、陈世璋。

（一）主席提出教员待遇法案。

议决：先付油印交各会员审阅后，限于一星期内发表意见，两星期后再开临时会讨论议决。

（二）主席提出教员保障法案。

议决：（1）教授之聘任与辞职，均须经评议会之议决。（2）原案第二项立教务会议议决。（3）本会已有议决。

（三）主席提出兼职教授改讲师案。

议决：1.凡教授在校外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须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2.凡教授在他校充讲师者须先得本校承认，并限制钟点，但此项办法应在本年暑假后实行。

（四）主席提出朱教授锡龄请假一年照支原薪案。

议决：准请假半年照支原薪，或请假一年支半薪，但得续假一年仍支半薪。

（五）杨教授敏曾请假案。

议决：准请假半年与原薪或请假一年支半薪。

关于以上两案的附带议决：此后请假办法即行停止。

（六）韩述祖教授函请延长一年研究职业心理学案。

议决：照准。

（七）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并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案。

议决：原案通过。

(八) 主席提出本校留法同学会请本校补助该会经费案。

议决：否决。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2年2月11日)

校 长 布 告

本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议决案应行公布者如左：

(一) 教授之聘任与辞退，均须经评议会之议决。

(二) 凡本校教授在校外之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须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

(三) 凡本校教授在他校兼充讲师者，须先经本校认可并限制钟点。于本年暑假后实行。

(四) 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

<一>本委员会以规划研究所国学门之一切进行事项为职务。

<二>本委员会议决之事件，交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执行之。

<三>本委员会与各学系及各事务机关有相互事件发生时，得会同商定之。

<四>审查研究生入所之资格。

<五>审查研究生研究所得之论文，或由本委员会委托相关各学系之教员审查之。

<六>奖学金之给予由本委员会核定之。

<七>本委员会暂不定后期，由委员长随时召集。

<八>本委员会得设书记一人，由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兼任之。

<九>本规则遇必要时，得修正之。

<十>本规则经评议会通过后施行之。

(五) 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所长(当然委员长)

教务长、本门主任、图书主任(均当然会员)

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5日)

第六次会议

到会委员：蔡元培、沈士远、陈世璋、贺之才、何育杰、谭熙鸿、胡适、马裕藻、顾孟余、王星拱、陶孟和、夏元瑛何代、李大钊。

(一) 主席报告：仪器主任改聘李盛章先生等担任。蒋梦麟先生在美为本校图书馆募捐，延续假期及现请谭仲逵先生代理总长案。议决：通过。

(二) 陈世璋、沈士远君提议，限制职员在校兼职案。

议决：凡职员在校外兼职者，只能给与津贴不支与薪俸，不能受一切优待办法。津贴最高额以60元为限。

(三) 主席交议执行本校教授在校外非教育机关兼职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应改称讲师之手续案。

议决：1. 凡教授在教育机关兼职者应改为讲师一案，于本年暑假中实行。在行政机关者，即日施行。2. 凡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者不得享教授应享之权利。此项权利列举如下：(1) 教授会主任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2) 评议员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3) 关于优待教授之一切权利。3. 凡在校外兼职教授改为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的办法，限于曾在本校充当教授五年以上者，此外不得适用。关于“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的办法限于一次办完，将来不再适用。

(四) 职员待遇法案。

议决：由顾、胡、陈三先生将蔡、陈诸先生意见书加入，另成一修正案，下次开会再议。

(五) 世界语附人国文系案。

议决：缓议。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2年2月25日)

第八次会议

出席会员：胡适、沈士远、朱锡龄、马裕藻、顾孟余、陈世璋、贺之才、谭熙鸿、李大钊、何育杰、陶孟和、冯汉升、王星拱。

(一) 提议孔德学校借用第三院一部分，作为该校工舍。议决：通过。但须将原图稍加修改。

(二) 提议修正考试制度案。议决：通过。

(三) 提议修正学生在校肄业年限案。议决：缓议。

(四) 预科委员会提案。

议决：第一条加入“教务长为当然委员，由校长于七人中委任一人为预科主任”。关于权限采用原提案（甲）项。

(五) 体育委员会案。

议决：通过案如左。

(六) 设立医务部案。

议决：校医室得依扩充计划试办。其组织条例俟经组织委员会审查，提出本会议决。

(七) 化学实验征收保证金案。

议决：得征收保证金，但数目请由化学系主任及仪器主任酌减。

(八) 贺之才教授请假案。

议决：评议会以为当然可以，惟须经教授会认可。

(九) 宋春舫请回复教授权利案。

议决：交聘任委员会审查。

(十) 辞退纽伦、柴春霖、陈怀、周龙光等教授案。

议决：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2年6月15日)

第九次会议

出席会员：马裕藻、沈士远、马裕藻代、朱锡龄、陶孟和、顾孟

余、谭熙鸿、陈世璋、李大钊、冯祖荀。

(一) 本校附设音乐传习所案。议决：改其为音乐讲习会经费，每月以不得过750元为度。

(二) 请陈惺农先生为组织委员会会长案。议决：通过。

(三) 叶志自费出洋请按例支薪案。议决：以已竟离校，碍难照准。

(四) 周二为先生名留教授案。议决：不能通融，仍照原议办理。

(五) 聘请巴台尔案。议决：通过，但每月薪俸不得过五百元。

(六) 国文系讲师单不广、刘毓盘改为教授，史学系讲师杨栋林、马衡改为教授，生物学系聘汤尔和为教授案。议决：通过。

(七) 财政公开案。议决：由审计委员会及预算委员会会长会同召集会议讨论公开办法，再交本会议决。

(八) 两学期制收费办法案。议决：通过。

(九) 教授在他校兼职仿东南大学，以他校收入归本校而别，由本校酌送车马费案。

议决：下次再议。

(十) 专门以上学校应以各专门学科为本位，凡学校一切事务，除关系全体外，均归各主任教授分任。

议决：交预算委员会审查后再议。

(十一) 讲义收费案。

议决：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3册，1922年8月1日)

12月7日第一次特别会议

到会者：李大钊、冯祖荀丁代表、顾孟余马代、丁燮林、马裕藻、蔡元培、胡适亦请丁代表、李四光、朱希祖亦请马代表、陈启修、

谭熙鸿、李煜瀛。

一、组织案三续。

三续修正，通过。

二、预算案。

议决：预算照原案修正并加下列附录后通过。……

三、财务委员会组织案。

议决：照原案修正后通过。

四、财务部办事纲目案。

议决：本案改为《财务部办事细则》，交由财务委员会审核。

五、自财务部成立之日起，原属于总务部之会计课应即改为出纳及统计两课，隶属于财务部案。

议决：通过。

六、财务委员及财务主任名单：

委员：谭熙鸿（长）、顾孟余、冯祖荀、陈世璋、陶孟和、陈启修、徐宝璜。通过。

财务主任：王星拱。通过。

七、整理图书事。

议决：不添设主任，由校长酌量，随时由有关系之教授中请人整理。

八、整理校舍事。

由校长酌量需要，随时请人整理。

九、各委员会名单。

议决：通过。

十、法政经济记录室组织规则草案。

议决：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2年12月7日）

12月24日第二次特别会议

到会者：马裕藻、朱希祖、顾孟余、陈启修、丁燮林、冯祖

荀、王星拱、蔡元培、谭熙鸿、李大钊。

(一) 以评议会名义答复陶先生请其仍任评议员。

(二) 胡适之请假，以次多数补充，用拈阄法选定何基鸿补充。

(三) 改定王星拱为财务委员，徐宝璜为财务主任。

(四) 改定沈士远为庶务委员，马叙伦为庶务主任。

(五) 组织委员会名单。通过。

(六) 本校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至新聘教授不必经此手续。

(七) 议决由组织委员会草拟评议会、行政会议与教务会议细则。

.....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2年12月24日)

特别会议

因校长辞职，由评议员王星拱、李大钊、朱希祖、马裕藻、谭熙鸿提议。

到会者：朱希祖、顾孟余、丁燮林、冯祖荀、陈启修、谭熙鸿、马裕藻、王星拱、何基鸿。陶孟和先生来函声明不出席，李石曾先生在西山不能出席。

(一) 推举本日临时主席：公推顾孟余先生，通过。

(二) 陈提议：推举委员三人，代表本会处理一切临时事务。议决：投票选举王星拱、陈星恢、马幼渔当选。

(三) 王提议：请准陶孟和辞评议员，以次多数通过蒋梦麟补充，应发信。

(四) 关于校长辞职案。

(五) 函请教务长总务长积极负责。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1月18日)

第二次特别会议

到会者：李大钊、谭熙鸿、朱希祖、蒋梦麟^{马代}、丁燮林、李四光、冯祖荀、王星拱、陈启修、马裕藻。

(一) 本会推出席校务讨论会代表。

议决：请本会评议员、本校总务长蒋梦麟先生担任。通过。

(二) 马提议，派代表慰问被伤学生，陈附议。

议决：通过。请沈士远、马叙平、张凤举三先生担任。

(三) 丁提议，谭附议：对于本校学生被打事件，本校应如何经由法律手续办理，请何海秋先生先行研究报告本会。

议决：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1月19日)

第三次特别会议

到会者：马裕藻、陈启修、冯祖荀、王星拱、蒋梦麟^{马代}、丁燮林、李煜瀛、谭熙鸿、何基鸿^{陈代}、朱希祖、顾孟余、李大钊。

学生会要求本校寒假取消案。

议决：仍放寒假理由。

(一) 对外有不便处(即奖勉学生运动之嫌)；

(二) 对内恐自起冲突。

并推本校总务长、预科委员会主任及本会三位委员当面与学生会长接洽。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1月26日)

第二十六次特别会议

到会者：李煜瀛、谭熙鸿、何基鸿、马裕藻、蒋梦麟^迟到、李大钊、陈启修。

(一) 蔡先生承认完全负校长责任，复函并关于请蒋先生代表个人来电事。

议决：通过。

(二) 何基鸿教授请假一年，自费赴德留学。议决：通过。

(三) 教育基金委员会请评议会代表蔡先生出席事。

议决：请蔡先生出席。

(四) 程振钧先生来函事。

议决：复函：因本已辞职，故照马、费二先生一例办理，并无他种关系。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7月16日)

8月4日第二十一特别会议

到会者：李大钊、王星拱、陈启修、蒋梦麟、马裕藻、谭熙鸿、冯汉叔^{谭代}、何基鸿。

(一) 代理校长发表事。

议决：即日发表。

(二) 女子高师附设补习学校请求继续补助费事。

议决：不继续。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8月4日)

9月6日第二十二次会议

到者：朱希祖、冯祖荀、李煜瀛、李大钊、顾孟余、马裕藻、蒋梦麟、何基鸿、谭熙鸿。

(一) 预科委员会事。

(甲) 蔡先生来信：“预科委员会试验及成绩，不仅拟请改为教授会，[并]由预科全体教授公举主任加入教务会议。”。

顾：照蔡先生所提办法试办一年。

议决：通过。

(乙) 在预科教授会未组成以前，关于预科事务暂时办法。

议决：请总务长全权酌量办理。

(二) 蔡先生校长薪水事。蔡先生来函，不愿支校长薪。

议决：蔡先生仍支校长原薪，蒋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蒋先生代理校长之校长办公费，经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长薪中开支，前议决案取消。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9月6日)

10月4日第二十四次会议

到者：李大钊、谭熙鸿、蒋梦麟、马裕藻、王星拱、顾孟馀。

(一) 预科教授会组织草案。

本年9月6日评议会议决组织预科教授会，公举预科主任试办一年。又于10月4日通过以下之预科教授会组织大纲。

预科教授会组织大纲(略)

(二) 本校教授刘半依请津贴论文费。

议决：俟本校经费有着时，由本校暂填，俟该教授回校时于其薪水内扣除。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3年10月4日)

校 长 布 告

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十二年度评议会第一次会议议决事件如左：

(一) 照章选举本会书记，到会者10人，马君叙伦以7票当选。

(二) 校长提出拟任12年度至13年度各委员会委员长、委员名单(蔡校长原拟)，议决照单通过。(各单附后)

(三) 校长提出拟裁撤财务部，仍照旧制设会计课办理出纳等事宜，并提出财务委员会，监督出纳之办法意见书，议决照办。惟财务委员会监督出纳办法，应将意见书交财务委员会审议

后再行提出于本会。

附各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名单

(一) 组织委员会

王星拱 (长)、顾孟馥、胡适、陈世璋、马叙伦、沈尹默、李书华。

(二) 财务委员会

李煜瀛 (长)、顾孟馥、冯祖荀、李四光、马裕藻、陈世璋、徐宝璜。

(三) 聘任委员会

陈大齐 (长)、顾孟馥、胡适、王星拱、何育杰、沈兼士、王世杰。

(四) 图书委员会

顾孟馥 (长)、朱希祖、马衡、单不广、陶孟和、李煜瀛、皮宗石 (主任)。

(五) 仪器委员会

何育杰 (长)、颜任光、陈世璋、李四光、谭熙鸿、陈大齐、李麟玉 (主任)。

(六) 出版委员会

沈兼士 (长)、胡适、王星拱、钱玄同、肖友梅、钱稻孙、李辛白 (主任)。

(七) 庶务委员会

马叙伦 (长)、钱稻孙、马裕藻、徐宝璜、李四光、顾孟馥、沈士远 (主任)。

(八) 学生事业委员会

李大钊 (长)、沈士远、李煜瀛、肖友梅、钱稻孙、罗惠侨。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1日)

3月14日第一次评议会临时会

马叙伦、罗惠侨、王星拱、李煜瀛、沈士远、陈大齐、蒋梦

麟、冯祖荀、马裕藻、沈兼士、谭熙鸿、沈尹默、李大钊、朱希祖。

蒋：今日开会完全为大学条例问题。现在便可将起草委员所拟之草^①。

.....

议决：顾孟馀先生等所拟对于教育部新定国立大学校条例之宣言，照修改文句通过。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4年3月14日）

4月18日第一次评议会

到会者：罗惠侨、马叙伦、王星拱、余文灿、沈兼士、李大钊、沈尹默、马裕藻、沈士远、谭熙鸿^{马夷初代}。

议案：

（一）教务会议议覆学生旅行津贴案。

议长报告：前拟请教务会议规定办法，兹接教务会拟文前来，规定三项办法如下函。

.....

议决：照原拟办法通过。

（二）仪器部提出仪器保证金案。

.....

议决：暂行保留，由仪器部再审慎审查。

（三）教育改进社拟请康恩博士来华讲演，询本校能否津贴费用案。

议决：报告康博士来华费用7500元，由纽约到上海川资4000元，共约11500元。因经费困难无力津贴。

（四）日本拟用赔款作文化事业案。

沈尹（文化事务委员会会员）报告。

①原文如此。——编者

.....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 1924年4月18日)

4月23日第八次评议会

到会者: 蒋梦麟、罗惠侨、李大钊、沈尹默、马裕藻、余文灿、马叙伦、谭熙鸿、陈大齐、冯祖荀(罗先生代)、沈兼士、顾孟余、王星拱(病假)。

(一) 主席报告: (1) 今日会议纯为日本在华文化事业之讨论, 在委员会提出第三次意见外, 还有马、胡、谭三评议员提出修正案, 望从详讨论。(2) 昨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 各学术机关所拟之宣言, 其大旨与本校之意相同。

(二) 讨论第三次意见商榷书。

第一项议决: 研究所应以整理东方所有学术材料为主。

(三) 议决: 延会明午一时续会。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 1924年4月23日)

4月24日第九次评议会 (续昨日之会)

到会者: 罗惠侨、冯祖荀、余文灿、陈大齐、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李大钊、王星拱、沈士远、蒋梦麟、谭熙鸿、马彞初(课代)。

(一) 接续讨论意见书:

(1) 第一项下加: 所谓东方所有学术材料, 即指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及其他亚洲各国之人文及自然各种科学之资料而言。

(2) 第二项下加^①:

(3) 用改过之修正案第三项。

(4) 第四项照原案之修正。

①原文如此。——编者

(5) 第五项照原案之修正。

(6) 第六项照原案修正。

(7) 第七项：取消。

(8) 用修正第九项，改为第七项。

(二) 又办法修正。

(三) 预科主任有否教务长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问题。

议决：预科主任对于教务长[有]选举权，无被选举权。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4年4月24日)

5月9日第三次特别会议

到会者：余文灿、沈士远、陈大齐、马裕谭、罗惠侨、谭熙鸿、蒋梦麟、沈尹默、顾孟余、李大钊、沈兼士。

(一) 主席报告杨先生辞职事。

(二) 主席报告经费事：下星期一可望得八成七（五成五加三成二）或五成五

(三) 音乐传习所请改名案。议决：暂用原名。

(四) 主席：本校派赴德国留学生毛、姚二生增加学费案。议决：准由120元加至180元。

(五) 史学系主任朱先生请假，并以服务已过十年请准全薪假一年。议决：仍支半年全薪或全年半薪。

(六) 主席提：临时委员会之委派向例不经评议会通过，但事后须报告此节，本校章程未有明文规定，应否照向例办理。议决：照向例办理。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4册，1924年5月9日)

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委员长：蔡元培

委员：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

一、报告

(1) 特别阅览室设立之经过

沈兼士报告：本学门成立后，曾要求图书馆在四层楼本所附近设一特别阅览室，以便将本所提用之书籍，公开阅览。嗣以图书馆无人可调，遂未实行。但为谋图书馆及本学门双方事实上便利起见，实非有一特别阅览室不可，班已在四层楼另辟一室，专供普通阅览，暂由本门代为经理。一面已请图书馆主任派人接管。且前次图书委员会将本学门之提书规则取消，于研究上殊感不便。□□李大钊谓：图书委员会对于研究所提用书笈议决两种方法：（1）复本可借；（2）单本照借书规则办理，限两星期归还。

马裕藻谓：从前研究所尚无特别阅览室，图书馆或恐阅书者不便，所以取消提书规则。现在可再与商酌。

蔡元培谓：可由本委员会向图书主任声明，已设特别阅览室情形，由图书主任提出图书委员会复议。

(2) 歌谣研究会

沈兼士报告：歌谣研究会为进行便利计，现已并入本学门。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是定音标及发表已经收集之材料。

(3) 考古学研究室

沈兼士报告：考古学研究室已经设立，本校前购得之甲骨及古代画砖均已置入。校长又请罗叔蕴先生为通信导师。以后尚拟组织一考古研究会，商请本校之美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化学家、工学家……对于研究或保存古物有兴趣者加入之，俾古物之搜求和研究有一定之计划，可以逐渐进行。一面与史学系联合，一面还可以和校外古物学会等机关联络。

二、提议

(1) 研究规则

沈兼士提出规则草案，并说明本学门研究应打破学系观念。本学门虽由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三系组成，而国学范围所包甚广，研究上不应限于三系。

胡适谓，国学门以文学为范围，而不以学科为范围，如有人研究中国数学史，本学门自可延请数学史家做导师。

沈兼上谓，评议会议决之研究所组织大纲第六条，研究生以本校毕业生及未毕业生之有特别研究成绩者为限。惟新学制规定，入研究院者似不限于大学一校之毕业生。本所规则应否修改？

蔡元培谓，实在程度相当者亦不能拒绝，应有规则限制。可照本校未毕业生办法，限于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

胡适谓，组织大纲第六条及研究规则第一条，在“未毕业生”之后应加“及校外学者”五字。

蔡元培谓，可提出议案，请评议会追认。

结果议决“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如左。

(一) 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送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其审查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研究所。

(二) 凡本校毕业生及校外学者不能到校而有研究之志愿者，得通信研究；其报名及审查手续，均按上条办理。

(三) 研究生须将关于研究之经过及其成绩随时报告，以便在本学门所办之杂志中发表或入丛书。

(四) 研究生遇必要时，可要求本学门主任与有关系之各学系教授会代请本校教员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指导研究。

(五) 本校教员可以自由入所研究。

(六) 本校教员可以提出问题，招集研究生入所指导，或共同研究；惟须先期通知，经委员会通过。

(七) 本学门随时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讲演；其公开与否，临时定之。

(2) 奖学金

奖学金章程，公推胡适起草；俟草就后再行提出委员会公决。

(3) 杂志

蔡元培提议，以研究所四学门为基本，每一学门出一种杂志。议决：由研究所四学门分任编辑，每年每学门各学得三期，页数不拘。

月份分配如下：

1. 五、九—国学门。（国学门公推胡适为主任编辑）
2. 六、十一—外国文学门（未成立以前，由各相关学系分组担任）。
3. 七、十一—自然科学门。
4. 八、十二—社会科学门。

(4) 研究员用纸问题

议决：无论教员学生，研究时的用纸均应自备。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7日）

研究所国家学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事

委员长：蔡元培（请假）

委员：顾孟余（沈代）、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请假）、胡适、钱玄同、周作人。

议决事件

奖学金及助学金：

奖学金及助学金草章，由胡适拟定，提出委员会讨论。结果，议决《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如左：

一、本校为辅助毕业生继续求学起见，设助学金额，为奖励毕业生学术上的贡献起见，设奖学金金额。

二、助学金额每名每年得国币200元，分四次给与之。奖学金金额每名每年得500元，分四次给与之。

三、助学金之给与，限于贫苦之学生；奖学金之给与，以成绩为标准，不限于经济的状况。

四、本校研究所每门设助学金额六个，奖学金金额两个，皆以

研究所各门之名称称之。例如《研究所国学门助学金额》，《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奖学金额》。有时为特别提倡某种学科起见，得由研究所委员会指定一部分的金額为某种学科的助学金，例如研究所国学门得有一个《中国古物学助学金额》，或一个《中国科学史助学金额》……。奖学金额不立学科名称，但每年的授与，应按照每研究所内所包学科的种类，略采均匀轮递之意。（例如今年奖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生，明年轮奖中国古文及美术史的研究生。如美术史缺人，则轮奖科学史的研究生。）

五、除本校设立之奖学助学金额之外，各研究所均得收受校外私人或法人捐助的助学或奖学金额。其每人每年应得金数，由捐款人定之。此项捐助的金額，即以捐款人的姓名名之，例如张□□先生中国古物学助学金额》。

六、凡欲得助学金者须填请愿书，附加成绩、证书及著作物，于每年5月1日以前送至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所长于5月内召集研究所委员会审查决定之。审查之结果，皆于6月1日大学日刊上发表。审查合格者，于下学年9月1日，12月1日，3月1日，6月1日到会计课领取助学金。

七、奖学金之授与，由研究所委员会根据本年研究生的成绩，以四分之三以上的表决，拟定应得奖学金之研究生姓名，附加著作物，于每年6月1日以前，函请所长决定发表。发表之后，应得奖学金者，于下学年9月1日、12月1日，3月1日、6月1日到会计课领取奖学金。

八、助学金额与奖学金额，如本年不得相当之人，则宁缺勿滥，此项缺人之金额存储会计课，其用途或留为下学年之特别金额，或供研究所购书之用——另由研究所委员会决定之。

九、凡本年得奖学金或助学金之研究生姓名，皆刊于本年大学一览之末。

十、本条例经评议会通过施行。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0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马叙伦等启事

我们大家在一个学校里作事，很应该有一个联络情谊的组织，依互助的精神，筹谋本校全体的发展，增益团体生活的趣味。我们曾把这个意思和许多同人谈过，都认为有组织一个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的必要。现在定于本星期三（即21日）晚七时，在第二院（理科）大礼堂，开一教职员全体会，商量商量。请诸位先生预先把组织的大纲想一想，到了那时，务必到会，是我们很（很）盼望的。

俞星枢、周象贤、钱玄同、孙瑞林、张崧年、钱振榛、陈大齐、马裕藻、李大钊、刘三、徐宾（宝）璜、朱希祖、丁绪贤、何炳松、郑寿仁、孟寿椿、陈启修、黄右昌、张大椿、陈世璋、王星拱、程演生、孙浞、李辛白、唐伟、沈士远、蒋梦麟、马叙伦、陶履恭、胡适、姚憾、彭一湖、周作人、刘文典、马寅初、左德敏、龚湘、周泽春、沈尹默、郑阳和、李大定、谭澄、许文增、李振彝、段宗林、胡春林、吴继哲、刘钺锷、张承隆、周同焯、郭溷静、汪敬熙、戴岳、沈兼士等公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0日）

本校教职员会起草委员会启事

（一）启者，前月31日经本校教职员大会议定，暂由前次大会所举出之本校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一人，组织临时委员会。同人等即于2月7日开会，举定胡适君担任主席，沈士远、胡春林、李大钊三君担任交际。其余诸君，每日由上午八时起至晚十时，轮流值班。并于每日下午六时至七时，开全体委员会。即于8日起按时在总务处行使职务，至正式会成立为止。惟以同人等能力棉（绵）薄，时机又极紧迫，本校同人有愿来此协助者，无任迎喜，专此敬颂时祺。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临时委员：朱锡龄、陈启修、李辛

白、俞同奎、蒋梦麟、李大钊、陈大齐、胡适、胡春林、沈士远、徐宝璜等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10日)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组织大纲草案

- 一、本会定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
 - 二、本会宗旨，在于本互助之精神，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补助大学之发展。
 - 三、凡现任大学教职员者，皆为本会会员。
 - 四、本会采委员会制，设委员若干人，由本校教职员分别投票选举之。委员人数，以会员全数十分之一为标准。每年改选二分之一。
 - 五、本会委员，共分文书、会计、游艺、交际、庶务、五组，各组委员，由委员大会互推之。
 - 六、每组委员会互选一人为本组主席。各组主席合组总务会议，总持会务。总务会议，设主席一人，由各组主席互选之。
 - 七、本会遇有必要时，得由总务会召集委员大会，委员大会以委员全数之过半数为法定开会人数。
 - 八、本会每年开全体例会一次。委员之改选，即于例会举行之。
- 总务会议根据委员大会之议决或会员四十人以上之请求，得召集临时全体大会。
- 全体大会以会员全数四分之一为法定开会人数。全体大会，以总务会议主席为主席。
- 九、本会会员每人每年纳会费现金一元。遇有特别用项临时募集特别捐。
 - 十、本组织大纲得由会员四十人以上之提议，例会列席人数四分之三之可决修正之。但此项修正案，须于例会三星期前提交总务会议，由文书委员会印送各会员。

本会会务细则另定之。

(一) 本校现有教员二百五十四人，应举委员十五人；职员一百四十一人，应举委员十五人，共四十人。

(二) 按本年委员人数，暂定各组委员数如下：

(一) 文书九人，(二) 会计三人，(三) 游艺十四人，(四) 交际九人，(五) 庶务五人。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10日)

本校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

致黄黼馨等君函

敬启者。本月7日，本校开教职员会成立会，公决“仍推前起草各委员为筹备选举委员。并公决由各委员公请其他教职员会同办理选举事务”等因。查此项事务，极为繁重，同人等能力棉

(绵)薄，深恐或有疏误之处。夙仰先生热心公益，肆应才长，兹特依前议，恭请先生为筹备选举委员，以资广益，千祈勿却为荷。此致

周俊甫、丁庶为、吴善之、柴东生、黄黼馨、杨栋林、许葆初、段子均、马幼渔、杜国庠、刘仲谟、黄幼轩、马夷初、胡壮猷、李伟民、孟寿椿先生大鉴

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陈大齐、李辛白、李大钊、胡适、蒋梦麟、胡春林、俞同奎、朱锡龄、徐宝璜、陈启修、沈士远谨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2日)

本校教职员会委员选举结果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成立后，于上周举行委员选举。投票于星期六下午截止，于上星期日上午在第三院大礼堂开票。计共收到选举票284张。内有三张因无记名作废。余281票，由筹备选举委员会与到场襄助诸教职员共同检点计算。今将选举之结果详记于下。因票数太多，故得票过少者皆从略。

教员当选为委员者26人：

胡适248票，陶履恭226票，蒋梦麟224票，马叙伦214票，俞同奎213票，沈士远206票，冯祖荀164票，徐宝璜161票，温宗禹152票，何育杰150票，马寅初149票，黄右昌147票，张大椿145票，朱锡龄141票，姚憾139票，陈大齐137票，何杰131票，陈世璋130票，丁绪贤129票，王兼善112票，郑寿善110票，朱希祖109票，黄振声109票，林损100票，沈尹默92票，马裕藻91票。

职员当选为委员者15人：

蔡元培246票，李大钊240票，李辛白237票，胡春林211票，周同焯204票，黄世晖196票，郑阳和189票，许文培164票，吴继哲138票，刘钜锷128票，段宗林127票，李振彝101票，陈翊忠86票，岳绍武83票，徐之杰77票。

下列教员13人、职员8人，所得票皆为次多数。委员有缺额时，以次递补。

教员：

陈怀89票，叶瀚89票，秦汾85票，张承隆84票，钱维骥82票，王星拱81票，沈恩祉79票，陈启修78票，王宠惠77票，钱玄同65票，周作人63票，贺之才62票，顾兆熊59票。

职员：

陈鹏69票，梁展章68票，郭瀚华64票，江智53票，王道济51票，周丰45票，查士缙42票，左贯文40票。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3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总务会议启事

敬启者。本会进行事务略有筹划，兹经本会议公决，准于本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午后四时，在本校第一院三十六教室开委员大会，共同讨论。务祈委员先生拨冗准临列席为荷。再如有提议案件，务请于二十五日以前送交本校第一院岳信候先生收，交本会议以便印刷及编制议事程序。专此布颂，公祺此致

朱希祖、李大钊、林损、周同焯、马叙伦、马寅初、丁绪贤、何杰、徐宝璜、陈大齐、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蔡元培、岳绍武、陈翊忠、黄世暉、王兼善、沈尹默、陶履恭、陈世璋、温宗禹、吴继哲、马裕藻、蒋梦麟、胡春霖、黄右昌、郑阳和、朱锡龄、胡适、张大椿、郑寿仁、姚憾、许文增、刘钜锬、
诸位委员先生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总务会议谨启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6月24日)

北京大学教员会总务会议委员姓名表

姚憾总主席兼交际组主席、马叙伦文书组主席、黄世暉会计组主席、胡适游艺组主席、沈士远庶务组主席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各组委员姓名表

文书组委员

主席马叙伦、朱希祖、李大钊、林损、周同焯、岳绍武、胡春林、陈翊忠、黄右昌。

会计组委员

黄世暉、马寅初、郑阳和。

游艺组委员

主席胡适、丁绪周、王兼善、朱锡龄、何杰、沈尹默、徐宝璜、陶履恭、张大椿、陈大齐、陈世璋、黄振声、冯祖荀、温宗禹、郑寿仁。

交际组委员

主席姚憾、何育杰、吴继哲、俞同奎、马裕藻、许文增、蒋(蔡)元培、蒋梦麟、刘钜锬。

庶务组委员

主席沈士远、李辛白、李振彝、段宗林、徐之杰。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6月24日)

修改本校教职员待遇章程之经过

6月22日，评议会派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诸先生加入委员会。并将6月21日职员之提议，并案移交该委员会通盘筹算，另议详细章程。教职员统称曰职员，定名曰职员待遇章程。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7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总务会议主席姚懋启事

兹将迭囑挽留马夷初先生函件登布于左。敬希察览并祝台绥。附迭囑挽留马夷初先生函件于后。

恨吾先生大鉴：

敬启者，自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历经波折，赖马夷初先生等奔走维护其间，方得保持原状。今阅日刊得悉马先生函请解职，同人等默察教育前途事来未艾，用特函请先生切实挽留，俾得继续任职，以竟全功，无任盼祷。此上并祝教祉。

（下列署名以签名先后为序）

马联绪、董联桂、徐之杰、谭澄、吴继哲、周作人、余庆铨、姜懋昌、周白吾、周同焯、罗文、包开善、岳绍武、洪国栋、金韶音、赵增印、曹泰勋、傅钟济、曾昭纫、董霖、刘俊德、王建中、吴镛、张碧泉、谷源瑞、曹懋兼、郝桂林、刘聘臣、胡景周、蒋梦麟、李大定、吴家瑞、李志全、费永泉、苏甲荣、李景禄、项彦瑞、常福存、沈士远、顾孟馥、李煜瀛、李烈、张乃燕、胡文耀、沈兼士、郑寿仁、……李大钊、胡默青、何炳松、钱同玄、陈汉章、钱稻孙……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24日）

王绍法等通告

本校教职员诸君公鉴：敬启者，本校教职员会推出之临时委

员会，自经大多数委员相继宣告辞职后，几乎无形消灭，对内对外均无从负责，现在教育经费又生问题，若不将此若有若无之临时委员会告一结束，恐致有误进行。兹定于本月10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本校全体教职员谈话会，俾弟等得以报告经过之情形，而诸先生亦得以讨论善后之办法，事关公共，敬希贵临。王绍瀛、周象贤、王星拱、李大钊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8日）

紧急通告

启者，交通部对于教育经费，延不拨计，现已积欠将及三月。而财部对于阁议议决“俟关税实际值百抽五时，每月加拨八校经费10万元”一案。又行推翻。联席会议遂于本月10日开会讨论办法，议决决案两项提案一项如下：

决案一项

（一）交通部每月拨计教育经费22万，由关税实行值百抽五时起，改由关税项下直接支。

（二）“关税实际值百抽五时，每月加拨八校经费十万元”一案须即实行，并随同上项之22万元由关税项直接支付。

提案一项，□□（一）要求政府将两个月又七成之积欠，于3月15以前扫数拨清。若无圆满结果，则教职员对于学校不负责任。右项提案，由出席代表各回本校开全体大会。征求同人意见，方能取决。兹定于本日（13日星期一）下午四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本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以定办法。事关重要。务望同人拨冗惠临为盼。

联席会议本校代表

李大钊 王星拱 王绍瀛 周象贤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13日）

王绍瀛等启事

敬启者，弟等出席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原系由于本校教职员

代表临时委员会之委托，嗣后委员会多数委员相继辞职，委员会久已无形消灭。是弟等出席代表之资格久已不存，惟以本校教职员大会虽曾开会数次拟改选代表，而到会者总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在此期间对外对内苦无接洽机关，弟等只得权负此责。今弟等既依八校联席会议之议决，辞去代表之名义及任职，断无再行滥竽之理，是以再次声明，敬请同人速开大会，改选代表出席联席会，以免贻误会务，是为至要，谨启。王星拱、王绍瀛、李大钊、周象贤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26日)

本校教职员临时代表团第一次会议议决事项

(1922年4月29日)

议决(一)本代表团出席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之人，依下列方法定之：

A, 旧代表：每人轮流出席一次，其轮次依下列大会揭示之名次定之：

李守常、周象贤、王星拱、王绍瀛。

B, 新代表：每次联席会议须有四人出席，除下列名单上最初二人外，每人继续出席两次。各人出席之轮次，依下列大会揭示之名次定之：

何基鸿、沈士远、陈启修、黄右昌、胡适之、马幼渔、胡春林、顾孟馥、程振钧、燕树棠、朱经农、高一涵、周同焯、冯汉叔、陈世璋、沈兼士。

议决(二)明日本校代表出席联席会议，取劝商态度，希望各校代表顾虑是局纷乱，缓行总辞职，勉强维持现状。

议决(三)本临时会为进行快便起见，应推出临时出席、庶务、文牍、会计等，即推定陈启修先生为临时主席，沈士远先生为庶务，周同焯先生、胡春林先生为文牍，黄世晖先生、郑阳和先生为会计。

议决（四）明日联席会议，应提出建议案，请各校派出索薪代表，会同校长团一致催促政府，限期给薪。

议决（五）现在奉直已开战，应请本校代理总务长、教务长召集各部主任，开本校教职员临时互助会，筹商维持方法。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5月8日）

本校教职员临时代表团启事

本团照章改选代表已于本月17日上午11时，在第二院接待室当众开票，共计收到选举票143张，兹特将当选代表名单宣布于左：

马叙伦108票、谭熙鸿104票、沈兼士101票、罗惠侨100票、周同焯98票、王星拱97票、马裕藻96票、沈士远95票、黄世暉95票、余文灿90票、马衡87票、杨栋林86票、沈尹默84票、胡春林81票、郑阳和81票、沈恩祉74票、丁绪贤71票、万秀岳70票、包尹辅67票、李大钊60票、白雄飞56票、王绍瀛54票、李振彝52票、卢恩52票。

以上24位当选为临时代表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18日）

教职员全体罢课问题

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决定本月15日起全体停止职务一节，已见昨报。兹觅得12日所决议之事项，原文照录于左：

（一）对部复认为不满意，即当遵照上次议决停止职务。
（二）停止职务自本月十五日起。（三）于停止职务期间，组织视察团，视察各校是否实行停止职务。（四）上项议决修正为于停止职务期间，由本会推定会员若干人，调查各校情形。（五）继续执行职务，须由本会议决一致行动。（六）组织固定办事机关。

（一）会址，（二）职员：（一）总务马叙伦、王桐龄。

(二) 文牍费家禄、陈大齐、沈士远、陶履恭、吴永权。(三) 会计朱内光、沈士远。(四) 庶务关景山、张少山。(五) 新闻费家禄、陶履恭、李大钊。(六) 速记。(七) 交际。

本日出席专门中小学校各代表，除有本会他项职务外，皆作为交际代表。

闻教育当局自得此项消息后，频形恐慌。昨日傅岳棻特请各校长到教育部商议一切，面允发薪问题，厘定标准办法，对于小学教员全部发，中学教员搭八成，专门以上搭七成，嗣后即照此搭放，并通知财政部照发云云。

闻各校教职员以此项办法尚难满足，且每月薪水能否按期发放，及从前积欠如何清理，亦均未提及。故定今日(14日)下午一时，仍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开代表会议，决定最后办法。15日全体罢课之决议能否打消，一时尚难预测云。

(《晨报》1919年12月14日)

本校教授致校长公函 △为教部新颁大学条例事

敬启者：近见政府公报载有教育部2月23日所制定之国立大学条例，同人等均以为既悖乎理，复昧于事，况以如此重要条例之变更，未闻教育部曾向教育界公开的讨论，率尔颁布，其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而该条例中谬误之甚者，尤为设董事会一层，及其所订董事任务与产生之方法。窃惟董事会之制度，国外大学固亦有其先例，然此种制度之存在，率皆限于两种性质之大学，其一为纯粹私立大学，其一为公私合办之大学，英美二国之大学，多属于此两类，以是董事会之制度，亦采用于其间。盖此类大学之经费，或则完全捐自私人，或则由公共团体与私人协济而来，事实上容或有不能不设董事机关之处。至于欧洲大陆之大学(尤其是法国大学)及日本大学，率皆国立并无董事会之机关。其校内一切事宜，由校内教授所选举之机关处理，一

二特殊事宜，则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此外自无须其他机关，徒使之与部校相冲突也。今教育部之于国立大学设立董事会，在原则上立论，同人等已觉其谬于模仿；且就吾国实际状况而言，教育务求独立，不宜转入于政治之漩涡。今依教育部所颁之大学条例，第一届之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以后董事由原董事会推选；此种产生方法，实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夫国立学校之经费，政府应负筹措之责，无待于私人之捐助，纵令有待于私人之捐助，而历年以来国立学校经费困难，乃众目共睹之事实，亦未见有私人解囊相助者，是吾国无有以捐款而具有董事资格者也。如此则教育部之所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依吾人之揣度，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无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阂不通，而不及校长及教员之清晰。今以之审议学校进行计划及预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新颁之大学条例所规定者）而谓其有良好之结果，非大愚即诬妄耳。况彼等素以政治活动为生涯，其所以欲厕身于教育界者，非曾上台者以此为遁逃藪，即未上台者以此为制造场，一旦政治界中有活动之余地，又将弃其董事任务而他去。是徒以我辈历年累月，朝朝夕夕，口讲指划，手胼胝足之劳工，供其圆桌上偶尔的盲目的支配。吾辈何辜而受其颠倒谬误之统治乎？且此辈一入学校，则教育事业，牵入政治漩涡之危险，更将层出不穷，是又势所难免者也。或曰董事会中之分子，不必尽皆官僚政客，亦可延聘专门人材也；固然大学之外，专门人材大有人在，然专门人材之所以有重要价值者，在乎其有细密的点滴的实行，非徒以其能为概括的大体的计划也。校外专门人材，如肯热心担任清苦教育事业，则大学校长自当延聘为教授，上教室教书，入实验室做实验，日与学生直接相切磋，是诚为大学之幸事。若云概括的计划，可由校外专门人材主持，细密的实行，则以校内之校长及教员供其奔走，是又为本来价值矣。总之，董事会之制度，在其他特别情形之下，未尝无可以采择之理由，然就吾国现状言之，

——尤其是就北京现状言之，——同人只见其有弊而无利也。为此函请校长向教育部严重交涉，根本取消，大学幸甚。此呈，校长大鉴。

关应麟、胡潜济、林玉堂、江绍原、沈溯明、李大钊、朱洪、陈君哲、周览、宋春舫、顾孟馥、谭熙鸿、张竞生、林损、沈兼士、高仁山、陶孟和、黄节、陈大齐、载夏、吴虞、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单不庵、刘文典、魏友枋、朱希祖、陈汉章、叶瀚、马衡、燕树棠、朱锡龄、李麟玉、李书华、李泰棻、何育杰、胡适、王世杰、罗惠侨、高一涵、张贻侗、陈源、王星拱、石瑛、丁燮林、刘光一、皮宗石、颜任光、李仲揆、杨震文、何杰、程振钧、徐炳祖、徐宝璜、丁绪贤、陈世璋同启

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

北京大学总务委员会总务会议纪事（一续）

2月2日午后四时第三次总务会议。

到会委员：蒋梦麟、李辛白、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一、李辛白君报告与商务印书馆订购印刷机合同。

二、先着手改组日刊。

(一) 只登本校公布。(二) 第一版与第四版登广告。(三) 通常四号字，但因特别情形得酌量改用他号字。

三、订定各部职权界限。

四、文牍事每日由总务长择要宣布。

六时散会。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6日)

总务会议纪事（二续）

3月15日午后四时第六次总务会议。

到会委员：蒋梦麟、沈士远、李辛白、郑寿仁、陈世璋、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与组织委员会联席会议。

一、李辛白君提议：请出版事务员李振彝君担任讲义课职务，章洪铨君担任售书课职务。

通过。

二、李君白君提议、请杂务课书记田誉君与出版部聂庶培君对调。

通过。

五时半散会。

3月22日午后四时 第七次总务会议。

到会委员、沈士远、郑寿仁、李大钊、蒋梦麟。

蒋梦麟君主席。

一、李大钊君提议：补刻刘申叔先生遗著四种，所有应补刻价两项：（一）二十八元三毛五分二厘。（二）十九元一毛八分，可否由本校支计，将来即由本校出版部印刷发行？

通过：交由图书部办理。

二、沈士远君提议、各舍暑假留校学生类皆原籍较远，川资过钜，所以留校补习。今为体恤寒峻起见，可否自本年起，于暑假期内，免缴宿费？

议决：从先每人于暑假期内应缴宿费现洋五元，自本年暑假起，减为每人缴费现洋一元，以示体恤，而明限制。并任指定一斋为暑假留校学生宿舍，但非本校学生，不得移入住宿。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7日）

总务会议纪事

4月28日午后四时第九次总务会议。到会委员：

陈世璋、李大钊、李辛白、沈士远、蒋梦麟、郑寿仁。蒋梦麟

君主席。

议案：（一）主席报告：平民教育讲演团请本校津贴本年第三学期讲演录印刷费现洋七十八元，允否？祈公决。

议决：平民教育事业，同人极表赞同。惟学校经费异常支绌，补助綦难，应请该团团员另行设法捐募为便。

（二）主席报告：“由校长交下第二院事务员因兼办工科事务，向主任函请将该员等进级加薪案”应如何办理？

议决：从工科开办之日起，至注册课正式成立之日止。每月特别津贴事务员各十元，书记各五元。至各院人员进级事，则另行规定。

（三）出版部报告：音乐研研会，所出之音乐杂志，要求出版部代为发行及代出邮票事；应如何办理？

议决：以后本校教职员及学生，无论个人或团体发行之杂志，出版部只能寄售，其余概不代理。

（《北京大学日报》，1920年4月29日）

第十八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11月25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陈世璋、李辛白、沈士远、郑寿仁、蒋梦麟、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议案：

一、旧制旁听及选科生，新改正科，可否根据旁听及选时年考成绩，发给津贴？

议决：本校未便决定，电询各该省复电照办。

二、毕业生入研究所，或改系，或随意选习数科，可否继续领取津贴？

议决：此后各省津贴，限于本科毕业时停止。毕业后继续入研究所，或改系，或随意选修数科者，均不得续请津贴。今年之

已请者，至民国十年暑假后停止。

三、各班学生所考科目不一，有学生未缴卷者，有教员未阅卷者，平均分数，应如何计算？

议决：现存各省催选学生成绩，急不暇缓，暂定有几门分数者，以几门平均，此为暂时办法，以后不能例援。

四、口试分数，可否根据为领津贴之成绩？

议决：准工程师学系主任来函报告：“前次工科学生，因津贴关系，曾请求补行上学年试验，以定成绩。早经教务会议照准，并有教务长布告在案。至考验办法，亦经与顾教务长面商，赞成口试办法。故已遵照办理。查本校考取转学生旁听生、均用口试，教育部选派出洋留学生，亦用口试，所得成绩分数，与笔试成绩分数，当然同一效力。”认口试成绩分数与笔试成绩分数有领取津贴之同等效力。

五、校役夜班教授部来函：闻学校有裁撤该班之议，询问确否，并列理由，请予维持应如何办理？

议决：本会前虽有裁撤校役夜班之议，惟现查该班与平民夜班编制不同，校役既未便入平民夜校，夜班仍应继续办理，惟关于管理方面，由庶务部酌定办法。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1月26日）

第十九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12月8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蒋梦麟、郑寿仁、陈世璋、李大钊、沈士远、李辛白。

蒋梦麟君主席。

议案：

一、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请签发给拉丁文纲每人一本，以资参考，可否照准？

议决：本校向无发给参考书办法，未便照准。惟可由图书馆

购存三十册，以供阅览。

二、学生请废除班长制，如有事须与学校接洽，临时推举代表，是否可行？

议决：班长为各班学生平时正式代表。如废除班长，学生有事与学校接洽，虽可临时推举代表，惟学校有事与各班学生接洽时，则殊多不便，班长制暂不废除。

（《北京大学日刊》，192年12月10日）

第二十次总务委员会议

12月23日下午二时

出席委员：沈士远，郑寿仁、李辛白、蒋梦麟、陈世璋、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议案：

（一）修正讲师支薪规则草案

议决：无修改，照原草案提出评议会。

（二）学生仍请废除班长制，应否规定别种较良制度代替。

议决：废除班长后，每学年之始，每班票选干事十人，以二人为一组，分为五组，每组任期二月（每学年共十月，自9月起至翌年六月止），其次序以票数多寡定之。干事在任期内执行班长原有职务，即为全班代表，负本班有事时与学校接洽之责。其不满十人之班，则循环轮任。此制自下学期起实行，明正（年）开课后，每班应暂选干事六人，在本学年内轮值服务。干事选举事宜仍由注册部办理。

（三）吉籍缺考生请咨询吉省公署补送补考分数，俾得分领津贴，应如何办理？

议决：缺考生补考成绩，以本校咨文发出日止截，在咨文发出后补考者，不能补送。

（四）平民教育讲演团，请由学校于本校附近，设讲演所一

处，以为该团员讲演地点。□□议决：平民教育讲演团，所以提高国民常识，推行平民教育，应予提倡辅助，即由学校在本校附近，择适中地点，租房一间，为该团设备讲演场所。

(五) 各班查课事，因少数学生撕毁教室座位号数，或不按号数就座，致碍点名，以后是否继续查课，少数学生紊乱秩序，应如何设法补救？

议决：自下学期起，全校各班上课，仍一律按时点名。少数学生撕毁座位号数或不按号数就座，请校长布告警戒。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24日)

第二十一总务委员会会议纪事

2月2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李辛白、郑寿仁、沈士远、李大钊、蒋梦麟、陈世璋郑代。

蒋梦麟君主席。议案：一、以后校内各机关新聘事务员及书记，均以三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满，如确系称职，然后正式任用。议决：通过。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4日)

第二十二总务委员会会议纪事

10月15日下午三时

出席委员：李辛白、李大钊、余文灿、沈士远。沈士远君主席。议案：一、各省津贴缺额，多按学年成绩选补，现因上学年尚未举行学年考试，本屆各省催送学生成绩，是否仍以九年度学年成绩咨报各省，作为选补津贴之标准？议决：仍以九年度学年成绩咨报各省，作为选补津贴之标准。

二、本屆转学学生，是否与同年级之本校旧生，得同具选补津贴之资格？如同具选补津贴之资格，其成绩以原校十年度学年分数，抑以本校此次转学考试之分数为标准？

议决：成绩者，系指在本校之成绩。转学生初入校，无成绩可言，如各该省津贴以成绩为选补之标准者，转学学生应迟一年办理。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8日)

第二十三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11月14日午后四时

出席委员：李大钊、余文灿、李辛白、沈士远。沈士远君主席。议案：一、法文系学生要求核减书价。议决：学校采购学生各种用书，均照原价发售。法文系学生所请未能照准。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6日)

总务委员会临时会议纪事

1月24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沈士远、李辛白、李大钊、余文灿。

议案：一、提议以后本校聘用书记，用公开招考办法，由聘用机关将该员职务（注明每日办公时间）、报酬、资格、程度各项登本校日刊征聘之。

议决：通过。请校长复核批示遵行。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日)

第二十九次总务委员会议

3月1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谭熙鸿、沈士远、余文灿、李辛白、李大钊、李麟玉（谭代）

谭君熙鸿主席

议案：

一、积欠学费之学生中，有因经济困难目前新旧学费均无力缴纳。要求学校特别通融准暂缓缴案。

议决：学生到校限本星期五截止，如过期末交学费，应即作休学一年论。已经校长布告在案届期未交费者，应由注册部开单，请校长布告即令休学。其中确已到校上课，因经济困难曾声请缓缴，学校认为确有不得已情形可以特别宽许者，请校长同时宣布准其缓缴。惟只暂缓至春假止，届时仍应遵照总务会议办法缴纳欠费。

二、学生要求本校与各学校交换讲义案。

议决：不照办。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4日）

第三十次总务委员会会议

5月10日下午四时半

出席委员：李麟玉、李大钊、李辛白、余文灿、沈士远。

沈君士远主席。

议决案：

一、本期学宿费未交者，限本星期内交清。届期尚不交者，即作为休学论，不得应本届学年考试或学科考试。

二、所有旧欠学宿费各生，统限暑假前清交。

三、本届毕业生学宿费未交清者，不得请领修业证书及洋文成绩证书。

四、本科各班实行恢复点名。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5月11日）

第三十三次总务委员会会议记录

7月5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谭熙鸿、李大钊、沈士远、李辛白、余文灿、胡春林（斋务课事务员）、黄世晖（会计课事务员）、周同焯（文牍课事务员）。

谭君熙鸿主席。

议决：

一、暑假期内，全校各机关公共办公时间，定为每日（除星期日外）上午九时至十二时。

二、下半年第一学期收费时，旧欠未清者，不收新费。

三、学生借有学校图书仪器未还者，凡毕业文凭、毕业证书、学年修业证书及洋文成绩证书，均不得给予。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7月8日）

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会议记事

下月17日为本校第25周年纪念日，曩曾有举行纪念之拟议，现为期已近，学校方面经校长酌请各部人员暨各教授，组织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15日下午4时，在第一院接待室开第一次会议，其情形如下：

出席委员：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罗惠侨、丁燮林、沈兼士、沈士远、肖友梅、马衡、李大钊、谭熙鸿、苏甲荣、李四光。

议决：

一、纪念会分学术讲演、展览、游艺三部。

1. 学术大讲演，定于12月16日举行。讲演范围为最近25年来学术史，由各科教授讲师自由认定担任。如讲者较多，可延长时间于一星期内。

先期十日，将讲者、讲题、讲场容额公布，凡校内外愿听讲者，先期报名，领取听讲券。

讲演录编印成册，即作为25周年纪念册，曾听讲者，得以半价购取。

2. 展览分左列各种：

历史部：研究所国学门整理之清代内阁档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室之古物金石类。

美术部：清理前书画研究会之成绩品，并临时征集本校教员学生之书画等美术品。

出版部。征集五四以来本校教职员学生个人或团体之书报杂志。

地质部：地质研究部采集之标本及报告。

3. 游艺分左列各种：

音乐演奏会、运动会（足球、队球、篮球）、烟火灯色。

关于学生表演之其余各种游艺，随学生自动的组织，惟以稍带学术性质者为限，地点须集中，时间须连续，不宜〔过〕分地同时举行。

二、展览及游艺均于纪念日举行，地点在第三院于礼堂旁操场支搭蓆棚。是日上午开纪念会毕，开全体大茶话会。

三、推定各部筹备员

学术讲演：胡适之、罗惠侨。

展览：历史部：沈兼士、马衡。

美术部：钱稻孙。

出版部：李辛白、苏甲荣。

地质部：李四光。

音乐部：肖友梅。

运动部：白雄远。

烟火灯色布置会场：沈士远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17日）

本校第25年之成立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2月8日下午4时半

出席委员：马衡、钱稻孙、肖友梅、罗惠侨、沈兼士、沈士远、
蒋梦麟、苏甲荣。

校长因事不能到会，托蒋总务长代理主席。议决案：

一、校长交下此次纪念会临时干事部各股干事名单。（见后）

二、大会场约可容9000人，拟印发入场券15000张（以假定每日有三分之二人数到会为标准）并规定入场券办法。（见后）

三、规定程序单。(见后)

干事部名单

干事部部长：蒋梦麟

会计股主任：黄世暉

干事：会计课事务员全体

文书股主任：周同焯

干事：文牍课事务员及书记全体

苏甲荣 包开善

会场记录：章廷谦、陈政、胡鸣盛、谷源瑞

庶务股主任：沈士远

干事：杂务课全体职员

管理发给入场券：徐之杰

招待股主任：李大钊

干事：教授会主任全体、各部主任全体

谭熙麟、丁燮林、李四光、沈兼士、沈尹默、

胡春林、徐之杰

察纠股主任：白雄远

干事：学生军全体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9日)。

北大念五周年纪念会之第二日

北大念五周年纪念会第一日(16)之盛况，已志昨报。今日(17)上午6时开庆祝会。首由该校蒋代校长演说，略谓本校正在处于颠连困若之中，尚何开会纪念为。因为学校生命是永久的，经费困难是一时的。所以兴高采烈开会庆祝。蔡校长远在欧洲，常来函催促，谓无论如何困难，吾侪对于学术应努力不辍云云。次顾教务长孟余演说北大过去历史。次由教授李守常先生讲演，略谓北大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外界黑暗势力有如过眼烟云等语。次由教员杨栋林先生及学生

代表演说，俱念庆祝之意。全体摄影后散会，已12时余矣。下午3时该校附设音乐传习所在第三院大礼堂开音乐大会，演奏各种音乐。抑扬顿挫，听者掌声雷动。晚7时演剧，英剧为失去的丝帕，日剧为勇者，中剧为蠢货与一休和尚，俄剧为纪念日。棚内有滑稽电影。至图书、仪器、标本、档案、古物，继续展览。古物有新由洛阳运来者，皆极可观。是日观众拥挤，仍不亚于昨日云。

(《京报》，1923年12月18日)

校 长 启 事

本校同学编辑25周年纪念册，其编辑员姓名业已另单宣布，兹敬请

李大钊、杨栋林、周作人、胡适、王星拱、沈尹默、王世杰、徐宝璜诸位先生为25周年纪念册编辑导师，指导一切，并请徐宝璜先生为主任导师。

1月14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15日)

本校25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一续)

.....

第六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

.....

国内大人物

孙 文：473票

陈独秀：173票

蔡元培：153票

段祺瑞：45票

胡 适：45票

梁启超：29票

吴佩孚：27票

李大钊：25票

章太炎：10票

.....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5日)

8月1日季刊编辑员讨论会议决之条件

(一) 本校发行季刊四种：(1) 自然科学，(2) 社会科学，(3) 国学，(4) 文艺，均自本年8月起，每季出了一本。每本页数，由各组自定之。

(二) 季刊之形式：(1) 横行用五号字。(2) 纸张要好。(3) 封面要美。(4) 标点符号要完备。

(三) 季刊之体例：(1) 附欧洲文字提要。(2) 每节四期，附全年索引。(3) 页数每一年自为起讫。(4) 长篇文章必须在一年内登完。

(四) 自上列两条外，其他季刊之内容及编辑手续，由各种季刊编辑员自由决定之。

(五) 凡编辑员均于本校教授讲师中延订之，被延订而无暇担任者，须予先声明。

(六) 凡编辑员，每年至少交稿一篇，愈多愈妙。

(七) 凡编辑员，由本校赠阅各种季刊。其所交之稿在某某期登载，则加赠本组本期之季刊五本。

(八) 凡非编辑员而投稿者，编入后赠本期季刊五本。但以所投之稿从前未经发布者为限。

(九) 本校设一季刊编辑部，办理各季刊收稿发稿通讯等事，即附入日刊编辑处。其付印及发行，由出版部办理之。

(十) 版权为著作者所有，如有欲转载者，须得本人的同意，并须声明由北大季刊转录。

(十一) 季刊印刷等费，暂由本校担任。其有收入存作基金，此基金应如何分配，于每一年终，合各组编辑员讨论之。

附录业已延订之编辑员名单如左（此后续订者补报）：

自然科学组：

冯汉叔（主任）、秦景阳、颜任光、丁巽甫、李润章、陈聘丞、王抚五、李圣章、李仲揆、王霖之、谭仲逵、汤尔和。

社会科学组：

王雪艇（主任）陶孟和、胡适之、蒋梦麟、朱经农、张竞生、朱逸先、黄黼馨、何海秋、周更生、燕召亨、陈榷农、高一涵、张慰慈、李守常、顾孟馀、马寅初。

国学组：

胡适之（主任）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蔡元民、顾孟馀、李守常、刘叔雅、单不广、□钟麒、郑奠朱、朱逸先、周启明。

文艺组：

蔡元民（主任）、沈尹默、沈兼士、胡适之、周豫才、周启明、徐旭生、顾孟馀、宋春舫、陈师曾、钱稻孙、叶浩吾、马叔平、肖友梅、杨仲子、张凤举。

（《北大日刊》，1922年8月19日）

(三) 校外兼课与讲演

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课

程俊英 罗静轩的回忆

6月下旬，正是学校发送教师聘书的时候，我级教师都收到了，只有陈中凡老师没收到。这更激起同学们的公愤，在6月29日召开驱逐方还会议，委托冯沅君、刘云孙、高晓岚、罗静轩、程俊英等商讨驱方策略。小组会上决定起草驱方宣言和上教育部次长书。驱方宣言的内容，是数方干涉我校同学六四游行等十大罪，用崭新的白话文写成。过了几天，即将驱方宣言付印散发，并附一份在上教育次长书后，送到教育部。方还知道了，不敢到校。7月7日，教育部正式免方还职，委毛邦伟先生担任我校校长。他还未到校就职，我们就到他家提出下学年希望聘请的教师，主要是李大钊老师和陈中凡老师。

李大钊老师担任《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这使我们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记得李老师在一次上课时，大声疾呼地说：“马列主义给妇女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到将近考试时，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论文题：《论妇女解放》。到评卷时，他挑选写得较好的一二篇，送到我校校刊上发表。李老师又大力地介绍《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刊物。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杂志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为之一

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

《五四运动回忆录》)

关于李大钊先生（节录）

章廷谦

李大钊先生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时，我和他不熟。只记得他是一个圆圆的脸，上唇有两撇浓浓的胡子，戴一副金丝眼镜；中等身材，胖胖的，常穿一套草黄色或者藏青色的西装，也有时候穿一件草黄色的夹袍。他和人说话时，声调不高，很沉、很慢，还带些乡音，头向前微倾并且侧着。有时我们去听他的演说，觉得有极大的煽动力。一班朋友都曾以他的演说辞来作解释群众心理的实例——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所以能号召，能激励一般群众，他的演说辞也因这样才有力量。

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他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和现代政治，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讲书时，还是侧着头，站在讲桌后面，两只手支在讲桌上稳稳地立着，身子不大移动。

1921年冬，我调到北大校长室工作，因公或因私都和他接近的机会较多些。到1922年底，他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也到校长室做秘书。这以后他除了教课的时间以外，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来办公室，有时下午也来。这样我和他接近的机会，就比以前更多了。

李先生在办公室里，除处理校务外，也处理一些党务或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问题。和他常来往而且也是我所熟识的人，现在还记得的有：范鸿劫，高君宇，邓仲夏，刘仁静，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张挹兰，毛一鸣，金家凤……他们都住在北大附近：东斋，西斋，西老胡同，松公府夹道等。当时我晓得他们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0年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课，讲授社会学和图书馆学。我爱人也是他班上的学生——不过在那时节我们还没

有结婚。后来晓得那里的女学生对李大钊也都很推崇。

因为李先生的举止神情，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在背后亲切地称他为“老母鸡”（实在他的神气也非常象）。他总带着一群“雏鸡”，或者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一大群的“雏鸡”都围集在他的身边，领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学习生存也学习斗争；尤其在遇到有敌人来时，“老母鸡”必定英勇地支起全身的羽毛，奋不顾身地为那群雏鸡和强有力的敌人去拚命——有一天，我把我们在背后给他的这个“老母鸡”的称号，在公事房里向他说了，他笑着说：“那里！那里！”带着谦逊的神气。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2. 在北京的学术讲演

学术讲演会启事

本会定于六月廿七日（星期日），在西城前京畿道美术学校讲演。兹将题目及时间列左：

讲演题目：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

讲演者：李大钊。

时间：早午九时至十一时。

讲演次数：第一次。

（《晨报》，1920年6月20日）

学术讲演会启事

本会定于七月四日（星期日），在西城前京畿道美术学校讲演，兹将题目及时间列左：

讲演题目：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

讲演者：李大钊。

时间：早九时至十一时。

讲演次数：第二次。

（《晨报》，1920年6月30日）

读者日历

《读者日历》：“三十日（阴二十六日星期六）——八校公共学术讲演点。地点：美术学校。时间：上午九时至十一时。讲题：社会与个人。讲演者：李大钊。”

（《晨报》，1921年7月27日、30日）

昨日学总会之讲演

北京学生总会，昨日下午二时，第一次在女师大大礼堂举行讲演，听众千余人，由女师大代表郑亚雄女士主席，次由总务主任报告学总举行学术讲演之意义，及学总已往之工作。旋即请李守常讲演《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比较观》，历述中国与日本革命发展之程序，及以后进行的趋势。次即瞿秋白讲演《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革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之程序，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原因，和中国反帝国主义潮流高涨，均极受听众之欢迎，至七时始散会。

（《京报》，1926年3月2日）

3. 在武汉的学术讲演

演讲日程·寒期讲演会最近规定

寒期演讲会，兹又规定2月1日午后一时半至二时半，由王抚五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一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张仲琳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英法最近中、小学校之管理及教授方法；午后七时至八时，由王抚五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

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二讲）；2月2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王抚五先生在高师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三讲）；午前十一时至十二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一讲）；午后一时至二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文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第一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麦克乐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体育（第一讲）；2月3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二讲）；午后一时至二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中国文学之进化（第二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麦克乐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体育（第二讲）；2月4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等师范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三讲）午后一时至三时，由麦克乐先生在高师讲演体育（第三讲）；午后四时至五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高师讲演中国文学之进化（第三讲）。

（《江声月刊》421号，1923年2月3日）

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

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昨日（星六）下午七时至九时，特请李大钊先生在寒期演讲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由谢崇端女士介绍出席，听讲员一致鼓掌欢迎，李先生致词答谢毕，即演说谓所称四种妇女运动者：

（一）宗教的，（二）母权的，（三）女权的，（四）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先将四种运动的性质说明于后。

宗教的妇女运动，类分妇女青年会，妇女救世军，及其他慈善性，或救济性的妇女运动之团体，皆在其列。此种运动，系鉴于现代社会上有种种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特出而救济，为最有价值且为必要的一种运动。然亦有缺点，凡事必先固本，为此种运动者，只知于社会上有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发生后，临时讲求救济之术，究竟所以发生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由来，则毫不过问，舍本逐末，必将有防之不胜其防之隐忧。

母权的妇女运动，在北欧极盛，以社会学者额列克里主张最力。其唯一原因，以为妇女在社会上应有一种特别权利，国家亦当为极充分之保护，盖女子为人类之母，于子女教育之责比较男子既格外加重，是故母权实为一种特别之权利。主张此说者，对于女权，极甚注意，与纯粹良妻贤母的主义，实不相同。

女权的妇女运动，为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即资产阶级的女子，其居于社会的地位，虽亦有较男子为高者，但实际考查，仍然不免有极不平等之现象，故必毅然突起，为两性平权之运动。

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对于那种阶级的差别，绝不过问，只求同阶级中之人类俱得享有同等之权利，并不承认社会现象中有压迫与被压迫两种阶级之事实，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妇女，应与男子同等加入权运动团体中，换言之，其所主张者，确在男女两性都不处于压迫与被压迫之地位。

现在中国女权运动的团体[其后缺字——编者]一、女子参政同盟会，二、女权运动同盟会，就形式言，似无区别，如就实际上观察，前者似专注重在宪法上所享之权利，后者实包含母权、女权、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三项而言，其中组织的分子，以中产阶级者居多数，无产阶级比较为少。以中国现在妇女运动之情状来看，不是单独进行，可以完全收效的，须包含母权、女权及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联络一气，通力合作，方有效验。今姑从法律上归纳而言之，应改革者，如左之数种：（一）宪法上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应平等。（二）民法上之亲权、财产权、行为权、及其他种种不平等之规定，俱应加以修正。（三）婚姻法也应该规定。（四）刑法上一方定有重婚罪，一方解释纳妾不为罪，大伤人道，极不平等，应修改。（五）买卖妇女在刑法上应厉禁的。

（六）同意年龄提高问题，在美奥各国女权运动史上考察起来，极为注重，今中国刑法，尚付缺如，应要求国家增定之。（七）行政法上为官吏之权，女子应不受限制。（八）女子应有同受教育之机会。（九）职业平等，亦为极属重要之问题，女子苟脱离

家庭之拘束，欲求有经济独立之权，其第一步，则在有独立之职业，谋独立之生活。工作报酬之不平等，不尽中国然，美奥两国，前亦均有此等事实，如在学校为教员者，男子多而女子独少其适例也。（十）此外一切男子之职业，女子可以参加者，均须有同等参加之权。女权运动之性质，既如上述，中国现在切须注重者，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坚固团体，以为将来实际竞争之着手，譬如参政权，纵然宪法上有一纸空文之规定，苟无选举之实力，代议院中，未必就有女子参政之表现。吾甚希望各省县都有此种女权运动的同盟，吾更希望此种团体有极坚固之结合，无论是女子参政同盟会，抑属女权运动同盟会，于社会上有公益团体之组织，须毅然加入，力尽其责，夫然后势力才能扩张。美国妇女运动之能全收实效者，第一优点，即能与男子同负社会之责任。欧战发生后，奥国女子，每当男子临战之际，凡国内有何公益团体之发生，必乘机参加，甚至驰赴临战地境，救护伤卒，对于国家所尽之责任既大，功劳既高，以故所得权利亦最高。总而言之，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那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能如是方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恢复民权，能如是则今之为女权运动者，始得曰成功。明丙。

（《江声日刊》423号、424号，1923年2月5日、2月6日）

4. 在上海的学术讲演

第一次讲演

演题：《史学与哲学》“李守常先生在复旦大学讲，黄维荣、温崇信记录。”（文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觉悟》副刊，1923年4月6日）

第二次讲演

上海大学今日（星期日）上午十时邀请李大钊君到校讲演，其演题为《演化与进步》。（文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学灯》副刊，1923年4月15日）

第三次讲演

演题：《历史概论》，李守常先生讲，正厂记。原定六次讲毕，现改为两次，这是第一次所讲的。”（见《李大钊文集》下卷《史学要论》文）

（《学灯》副刊，1923年11月18日）

第四次讲演

演题：《史学概论》，李守常先生在上海大学讲，张湛明笔记。”（即《研究历史的任务》，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觉悟》副刊，1923年11月29日）

(四) 社会活动

1. 进德会

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

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然症，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昔仪狄作禹，酒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司马迁曰：“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子反涵于酒，而楚以败；拿破仑惑于色，而普鲁士之军国主义以萌。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又如吾国五六年来，政治界、实业界之腐败，达于极端。而祸变纷乘，浸至亡国者，宁非由于少数当局骄奢淫佚之余，不得已而出奇策以自救，遂不惜以国家为牺牲与？《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鄙人二十年前，鉴于吾国谈社会主义者之因以自便，名为提倡，实增阻力，因言“惟于交际之间一介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共产；又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见《民国野历》乙编《蔡子民事略》）正此意也。

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发起进德会于上海。会员别为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的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当时论者颇以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条为疑。然题名入会为甲等会员者踵相接矣。未几，鄙人

以事由谋道北行，同行者三十余人，李、汪二君亦与焉。舟中或提议进德会事，自李、汪二君外，同行者率皆当时之官吏若为议员，群以官吏、议员两戒为不便，乃去此两戒，别组一会，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为发起人，而宋遯初君提议名为六不会”，众赞成之。又同时发起一“社会改进社”，所揭著者凡三十六条，第一曰不狎妓，第二曰不置婢妾，第十九曰不赌博，第二十九曰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犹六不会意也。其后为政潮所激荡，“六不会”若“社会改良社”之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而进德会之新分子，则间见于上海之报纸焉。

北京自袁政府时代，收买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无所顾惜，则狂赌狂嫖，一方面驱于侥幸之心，一方面且用为钻营之术。谬种流传，迄今未已。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尤可骇者，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份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曾于南洋公学同学会（中央公园）及译学馆校友会（江西会馆）中，提议所嫖、赌、娶妾三戒编入会章，闻者未之注意也。其后见社会实进会规则，有此三戒；而雍君所发起之社会改良会，则专以此三者为条件。吾道不孤，助以张目。惜其影响偏于一隅。既承乏北京大学，常欲以南洋同学会、译学馆校友会所提议而未行者，试之于此二千人社会。会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今改组之议，业已实行。而内部各方面之组织，若研究所、若教授会之属，体育会、书画研究会之属，银行、消费公社之属，皆次第进行。而进德会之问题，遂亦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会中戒律，如嫖、赌、娶妾三事，无中外，无新旧，莫不认为不德，悬为厉禁，谁曰不然。官吏、议员二戒，在普通社会或以为疑，而大学则当然有此（法科毕业

生例外)。教育者，专门之业；学问者，终身之事。委身学校而萦情部员，用志不纷之谓何！且或在学生时代，营营于文官考试、律师资格，而要求提前保送，此其燥进，与科举时代之通关节何异？言之可为痛心！古谚曰：“人不婚欲，情酒失半。”加特力教之神父，佛教之僧侣，例不婚娶；西洋大学问家，亦有持独身主义者。不婚尚可，不宦何难？至于烟、酒、肉食三戒，其贻害之大，虽不及嫖、赌、娶妾，其纷心之重，亦不及官吏、议员，然而卫生味道之乐，亦恒受其障碍，故并存之。春秋三世之义，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疏，及历升平而至太平，用心乃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今仿其例，而重定进德会之等第于左：

甲种会员 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 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 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入会之条件：

(一) 题名于册，并注明愿为某种会员。

(二) 凡题名入会之人，次第布诸日刊。

(三) 本会不符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袁了凡曰：“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同会诸人，均不得引以为口实。惟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四) 本会俟成立以后，当公定罚章，并举纠察员若干人执行之。

入会之效用：

(一) 可以绳己。谚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吾国人在乡里多谨饬，而一到都会租界，则有放荡者。欧美人在本国多谨饬，而一到外国，则亦有放荡者。社会之制裁，有及有不及也。今以本会制裁之，庶不至于自放。

(二) 可以谢人。欧美之学者、官吏、商人，均视嫖、赌、娶妾为畏途；偶有犯者，均讳莫如深。而我则狎妓征优，文人以为韵事，看竹寻芳，公然著之柬帖；官吏商贾，且以是联络感情之一端。苟非画定范围，每苦无以谢人。今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是等相属者，径行拒绝，亦不致有伤感情。

(三) 可以止谤。《语》曰：“止谤莫如自修。”吾北京大学之被谤也久矣。两院一堂也，探艳团也，某某等公寓之为赌窟也，捧坤角也，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种之团体而言之。其他攻讦个人者，更不可以缕指计。果其无之，则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然请本校同人一一自问，种种之谤，即有言之已甚者，其皆无因而至耶？既有此因，则正赖有此谤以提撕吾人，否则沦胥以铺耳！不去其因而求弭谤，犹急行而避影也，其又何益？今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其或未灭，则造因之范围愈狭，而求之不难尽多数之力以灭之，岂无望耶？

发起人蔡元培白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9日)

进德会报告

丙种会员二人：李煜瀛、吴继哲。

乙种会员九人：蔡元培、章宪武、郭静华、孙文洲、包开善、周榕、鲁麟光、江永年、赵增印。

甲种会员十九人：夏元璠、李大钊、许绍癸、江益朋、郑阳和、刘绍文、卢恩、王造周、姜懋昌、杨吴泽、余庆铎、董霁、邓之诚、孙诒棫、吴道锤、李振彝、程绪颐、马云骏、吴炼。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0日)

进德会报告

被举之评议员、纠察员题名。本会之评议员、纠察员选举

票，至本月一日始检毕。今先揭当选人姓名及其票数于左，其他各人所得票数，嗣后亦当排日揭载，以供众览。

评议员当选者：蔡元培 242、王建祖 167、温宗禹 165、夏元璠 158、陈独秀 152。以上职员 5 人。

章士钊 111、王宠惠 81、沈尹默 49、刘师培 37。以上教员 4 人。

傅斯年 54、廖书仓 49、计照 45、石志仁 42、顾名 34、傅汝霖 30、肖纯锦 29、罗家伦 26、周烈亚 25、丁履观 25、区声白 25、陈宝铎 25、刘正经 24、李宏增 24、王世毅 23、高月彩 23。以上学生 16 人。

纠察员当选者：吴继哲 80、郑阳和 75、江智 64、李大钊 62、梁展章 62、周榕 56、李辛白 53、徐之杰 50、刘绍文 48、章士英 45、章献猷 45、以上职员 11 人（原定 10 人，因二章君票数同，故增一人）。

胡适 66、钱玄同 47、俞同奎 45、马寅初 44、孙国璋 43、陈汉章 41、陈大齐 37、李煜瀛 35。以上教员 8 人。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8日）

2. 学余俱乐部

学余俱乐部征求会员启事

敬启者，同人等发起学余俱乐部，如本校职教员学员诸君，赞同此旨愿入本部为会员者，请惠寄台衔，赐交（文学研究所）左翼苍、（图书馆）李守常、（英文研究所）杨真江、（哲学研究所）肖炼尘、（理科研究所）唐鸿志、（东斋日字号）狄君武、（西斋黄字号）陈乃谦、（西斋）滕统音、（西老胡同16号）刘光震、（国史编纂处）盛伯宣诸先生处。俟择日再开成立大会，兹将发起简章列后：

学余俱乐部发起简章

第一条，本部宗旨，因本校同人求学余闲，籍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主，不涉校外之事，暂定名曰学余俱乐部。

第二条，本部地点附设地学会内（东安门内北池子盔头作）。

第三条，本部会员暂以本校为限，如校外同人得本会会员介绍皆可入会。

第四条，本部备有各种书报，并随时罗致有关考证之古物及艺术品，专供本部同人展览。此外，次第组织游戏部，如柏球、投壶等类，文艺部如诗社词社等类。

第五条，本部会员月纳会费一元，由本部按月派人征收。其会员中现充学员者，会费得减为每季一元，按四季交纳。

第六条，本部于年终及暑假时，宴集各一次，愿与宴者届时另行组合。

第七条，本部职员应公推正副部长，常务干事及评议员等，俱一年公举一次。

第八条，本部事务及款项出纳，应由干事员按照议订会章时所定章程，办理报告，以供众览。

第九条，本简章未尽事宜，俟征求众意后，再定详细章程，以期尽善。

发起人：吴梅、杨真江、肖鸣籟、冯祖荀、邓之诚、滕统音、朱希祖、叶瀚、刘光震、黄侃、左贯文、盛铎、侯毅、童学琦、蒯寿田、蔡元培、张相文、陈钟凡、徐宝璜、肖清海、陈浏、唐鸿志、李续祖、许绍獬、马裕藻、孙诒棫、狄福鼎、马衡、沈尹默、陈邦济、李大钊、胡适、夏镜澄。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6日）

学余俱乐部成立会纪事

学余俱乐部于上星期日午后，在理科第一教室，开成立大会，到者300余人。公推吴瞿安君主席。由徐伯轩君报告部中经

过之情形。报告毕，古琴、钢琴、提琴之高手先后奏乐，昆曲、皮黄之巨子相继清唱。复继有幻术助兴不少。后即宣布选举结果，蔡子民君当选为正部长，叶浩吾君当选为副部长，徐伯轩、胡适之、成宪孟、肖鸣籀四君当选为交际干事，黄季刚、沈尹默二君当选为文牍干事，胡之德君当选为会计干事，左贯文、李大钊、廖书仓三君当选为庶务干事，后即摄影而散。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8日)

致学余俱乐部

学余俱乐部诸先生钧鑒：鄙人事忙，不胜庶务干事之任，乞另选。此颂公安

李大钊白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

3. 新 知 书 社

新知书社招股广告

本社附属于北京大学新知编译社内，以印刷发行新知编译社之图书杂志为主要营业，以(一)代售国内各种有价值之图书杂志；(二)由欧美日本返运书籍；(三)代印各处出版品等；(四)代售教育用品，为附属营业。资本总额暂定为两万元，共分四万股，每股五元，分四期招足。第一期先招五千元，业已开始招募，限于本年3月31日截止，募足时即行开办。凡本校教职员及同学诸君愿入股者，请向下列各处，交足股款，领取收据，即于4月1日起换取股票。所有招股简章、组织简章，除已揭载本月7、8两日本校日刊及京沪各重要报纸外，有愿索阅者，请函致南河沿大纯公寓成舍我君，当即寄奉。募股经收处：

(一) 北京大学学生银行(北河沿第三院)。

(二) 李辛白君(第一院出版部主任室)。

(三) 沈士远君(第一院庶务主任室)。

(四) 沈兼士君 (第一院国文教授会)。

(五) 李大钊君 (第一院图书主任室)。

(六) 杨钟健君 (第二寄宿舍)。

(七) 吴前模君 (第二寄宿舍)。

(八) 姚文林君 (第一寄宿舍)。

(九) 邱益祥君 (第一寄宿舍)。

(十) 罗敦伟君 (第一寄宿舍)。

(十一) 郭梦良君 (第一寄宿舍)。

(十二) 易家钺君 (西城宗帽胡同一号)。

(十三) 成平君 (南河沿大纯公寓)。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11日)

新知书社开会纪事

新知书社于上星期日 (即6日) 下午一时, 在第二院开幕股东大会。出席者约二十余人, 由成舍我君主席。先将新知书社之旨趣, 略为声述, 大意谓: 中国现在救济知识的饥荒, 实比救灾还重要。这种救济知识荒的责任, 当然是应由知识阶级担负, 若把范围缩小一点或可以说要由教育界担负。至于怎样才算尽了这种救济的责任, 那么, 当然是可以拿发扬学术, 传播文化八个字来代表。换一句话说, 就是文化运动。不过近来外间所谓文化运动, 是不是以救济知识荒为目的? 参加运动者, 是不是都能算有知识的人? 我们若仔细考察起来, 恐怕就不免许多怀疑, 所以社会上就发现了许多挂新思潮招牌、售黑幕的出版品。这个原因是因为那班文化运动者, 大半是以书价为中心, 以金钱为目的。实际上, 或竟与文化毫无关系, 现在社会上很希望我们纯正的教育界, 能够通力合作, 来组织一个以文化为中心出版机关, 来救济他们的知识饥荒。北京为全国文化之中枢, 教育界知名之士, 也要比各处为多, 而北京大学自其地位上立论, 尤有组织这种出版机关的必要。虽本校有一出版部, 但其范围仅限于印行本

校所用之讲义，规模过嫌狭小，所以我们校内同人，就联合北京教育界，来发起这个新知书社。并分途招募股款，现在款项已将次募足，一切筹备，亦渐就绪，虽然目前的能力，非常薄弱，不配说什么文化运动，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发扬学术，传播文化的。如果中国的教育，不至根本破产，这个书社的发展力，当然是无穷尽的。“成君述毕，将各募股人先期寄到之正式报告书宣布，除有数人尚未能如期寄到外，其余均与成君在新识书社计划书上所报告之数目，大致相同。报告毕。后由成君提出三项问题，共同讨论：（一）收款问题，（二）书社设立之地点，（三）组织一筹备委员会。各募股人，相继发言，结果第一项决定，限3月31日以前，由募股人将所认募之股，分三期交足。第二项决定在南池子大街、东华门大街，择一相当房屋。第三项决定即日组织筹备委员会，并当场推定成舍我君为筹备主任。李辛白君、钱秣陵君、李守常君、吴前模君为总务股委员。李正翰、蒋希曾二君为庶务股委员。邱益祥、郭梦良、孙芳三君为文书股委员。傅铜、易家铎、罗敦伟三君为编辑股委员。姚文林、汪选二君为营业股委员。叶志芳、杨钟健二君为印刷股委员。即日分头筹备。讨论毕，成君又报告自本社计划书发表以后，校内外赞助者极多，其委托本社代印杂志者，已有五种之多，本社为酬答此种厚望起见，不得不赶早成立，愈谓愈早愈妙。当即决定以4月15日，为开幕期。并决定开幕时，即印行罗素五大讲演。因此项讲演，极有价值。新知书社已委托罗敦伟、陈颐远二君记社会构造学。姚文林君记物之分析。夏韶君记数理的论理学。尚有哲学问题、心之分析两种，亦正在选择记稿，一并印行。并拟先行发售预约券，内容力求美备，定价亦极低廉云。至此，各项问题，均已讨论终结，乃宣告散会。

（《北大日刊》1921年3月8日）

新知书社正式成立

新知书社，进行极速，所募股款，业已逾额。即于本月14日在干面胡同3号总社开创立会。到会股东约百余人，即将各股东寄到之选举票，当众开票。计当选监事者为蔡元培、李大钊、王星拱、沈溯明四君，当选董事者为成平、李德临、吴前模、王正谊、孙芳、李正翰、姚文林、阙家梁、易家钺、罗敦伟、杨钟健十一人。当晚即组织董事会选举会长及总经理，结果成平君当选。即于15日在总社举行开会典礼。该社发行、印刷、编辑三部，组织均甚完备，并在南池子大街设有分发行所，不日亦即可开幕。其发行之罗素五大讲演已讲完之数种，不日即可出版云。

(《晨报》，1921年4月18日)

4. 非常教同盟

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

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天津河北日报、广州群报、汉口江声报、长沙大公报、成都川报、山东济南日报、广西民报、云南民声报、福州闽报、奉天关东报、吉林吉长日报、黑龙江公报、哈尔滨国际协报、山西日报、河南新中州报、陕西新秦日报、甘肃通俗日报、安徽皖江日报、江西实报、浙江两浙日报馆、南京大江南报，请转全国各报、各学校、各团体、各界同胞、各国同志均鉴，教毒日炽，真理易泯，邪说横行，人道弗彰，我国本为无教之国，乃近代受害，日趋日深，近闻世界耶教学生第十一次开会，今年4月，又欲举行于我京首都之地，亦将于我中国，宣传迷信，继长增高。同人等特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障雾，本科学之精神，实进化之光华。本同盟宗旨，仅非宗教，既无种族国家男女老幼之别，尤以一切党派作用无关，同志加入，一体欢迎，分途组织，亦为会友，惟信教非教，中无两可之地，爱人救人，必有一致之心，凡

我同志，尚希明决，急起宜追，幸勿犹豫。丞盼复示，请寄北京大学第一院金家凤君收交，来电屏营，无任祷切，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名详另单）同叩。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宗教本是没有的，他们偏要无中生有，人造迷信；宗教本是假设的，他们偏要装假成真，害人到底。总而言之，上帝本身，既不由理化物力所构成，到底是什么东西，教主生活，更不是吾人意识所能想像。既有造物主，何不将电灯飞机，早日造出；既有赏罚权，何不使世间人，尽成善士。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中国在世界，比较起来，是一片干净土，算是无教之国，无奈近数十年来，基督教等一天一天的向中国注射传染，最近几月，气焰更张，又有什么基督教学生同盟，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要到中国首都的北京来举行。回想我们人类所受过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重大些。他们传教的方法，比起他教，尤算无微不至。他们最可痛恨的毒计，就是倾全力煽惑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原是很纯洁的，不易煽惑，他们便使用他们不知怎样得来的金钱塌建筑高大华丽的房屋，叫做什么基督教青年会，他们始而对青年学生说入会的不必信教，其实既入会中，一步一步的引人入胜，卒至基督青年会就是基督教，预备学校是基督教徒养成所，弹子房呀，体育会呀，电影呀，名人讲演呀，茶会呀，英文呀，年会呀，津贴呀，招待员呀，交际员呀，干事呀，队长呀……

——就是他们施毒的麻醉药，催眠术。伤心呀，可怜的民国青年，真是上当不小，伤心呀！可恶的基督教徒，将置我们青年学生的人格于何地。

宗教的罪恶，千言万语，那能说尽，平日大多数人，或未注意，或不觉其害至如此之甚。过细一想，能不伤心，凡有血气者能不急起直追，维护真理。我们组织非宗教大同盟，实属忍无可忍。同盟宗旨，仅非宗教，不牵涉一切党派，亦丝毫无他作用，尤无种族国家男女老幼之别。信教与非教，中无两可之地。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扫除宗教之毒害者，即为非宗教大同盟之同志，特此宣言，普告天下。

（《晨报》，1922年3月12日，3月21日，3月22日）

非宗教大同盟简章

（一）定名。定名非宗教大同盟。（二）宗旨。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如为研究学术，而发挥崇尚一派一人之学说，无宗教作用者，（如研究佛学，孔子哲学，老子哲学……）不视为宗教。（三）入会。本同盟会员，无种族国家男女长幼党派阶级等别，凡赞成本同盟宗旨者，将志愿、姓名、籍贯、年龄、职业、住址详细告知本同盟，即为本同盟会员。凡与本同盟宗旨一致之团体，本同盟亦议认为同志会，愿尽协进之义务。（四）组织。由会员中推举干事若干人，又由干事中推举8人为常务干事，组织干事会，互选主任干事1人，书记2人，交际4人，会计1人。干事会未成立前，暂由大同盟在会同人组织临时书记处施行之。（五）经费。会员不征会费，平时用费，由同志乐捐。遇必要时，再由干事会酌定，特别募捐。（六）开会。遇必要时，由干事会随时通告，召集大会。（七）附则。本章程有不适用时，得由会员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议，过半数之通过修改之。通讯处，北京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霞电临时通讯处暂时似可代收）。

（《晨报》，1922年3月28日）

吳虞日记

一日 星期六（三月初五） 晴 沈尹默寄来像片一张，信一函，言再两周可以返回。……

《非宗教同盟二次宣言》，李守常主稿，（中夏持来请签名，有李石曾，予阅后为署名。

（《吴虞日记》（下册），1922年4月1日）

非宗教者宣言

我们相信在宗教的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显明，自由不能确保，故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开第十一次大会的时候，联合非宗教的同志，作非宗教的宣传运动。我们对于背反科学原理的迷信的宗教，不论是他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律反对。对于影响所及较为普遍的宗教，尤其反对。信仰一种宗教，固然是他们的思想自由，不信仰一切宗教，亦是我们的思想自由。他们信仰一种宗教的人，可以有组织同盟，作他们的宣传运动的自由；我们不信仰一切宗教的人，亦有组织同盟，作我们的宣传运动的自由。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不是想靠一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弊害，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脱出他的束缚与蒙蔽。信教自由，原是因为宗教互争的结果，没有全胜，只有分立，弱小的宗派，乃依此以为自存的方法。其实信仰自由，在宗教势力之下，只是一句空话，欧美诸国没有能够实行的，只有在人人的灵明都能脱出宗教的范围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思想自由，才能存在。我们反对宗教，正是为此，不但不是破坏自由，而且实在是拥护自由的。我们希望各处非宗教的同志们和那对于我们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的朋友们，要切实了解我们的真正意思，然后表示赞成或反对。至于我们以非圣以无法，是我们所不计的。（以姓氏笔画简繁为序），王星拱、吴虞、李石曾、李

守常、阮永钊、金家凤、陈爱梅、张佐汉、邓仲澥、钟继璜、颜燮夫、肖子昇等。

(《晨报》，1922年4月4日)

昨日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

非宗教大同盟自霞电发起后，响应已遍全国。昨(九号)日下午一时起至五时止，该同盟又召集同志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讲演大会，到会者中外合计约千余人。首由主席肖子昇报告开会，略谓我们都是不信宗教的人，并且是发起非宗教大同盟的人，我们反对宗教一本科学学精神，就是以科学胜宗教，所以今天又约到许多同志学者来演讲这个道理。我们反对宗教，无国家种族等界限，所以还要请外国同志来演说。我们反对宗教，是为的发挥真理，拥护自由，我们是酷爱真理与自由的人，所以我们反对宗教，既有了最大的决心。还有不断的努力。蔡子民因足疾不能站立演说，遂由肖子昇代读蔡子民之演说词(见后)，又次由主席一一介绍张耀翔，李石曾、李守常、吴又陵诸人出席演说，词容详录，兹将蔡子民演说词原稿，照录于次。(略一编者)

(《晨报》，1922年4月10日)

宗教防碍进步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李大钊在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演讲大会上的演说。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昨日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开会

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自前次开成立大会以后，继开临时大会一次，通过章程，并推举汪精卫、蔡元培等三十余人为干事。昨日(星期日)上午八时，该同盟各干事假北大第三院开第一次干事会议，选举常务干事，讨论以后进行方法。到会者共计二十余人，当选举肖子昇、李石曾、朱务善、张耀翔、李守常、韦玉、

范鸿劼及缪伯英女士等八人为常务干事。继讨论以后进行方法，结果略分（一）召集全国非宗教团体开总同盟大会。（二）办月刊。（三）举行定期讲演……五项，由常务干事办理之。该同盟还出有《非宗教论》论文一巨册，皆中外名人杰作，凡数十万言，廉价发售，该同盟即欲以之作为宣传之利器云。

（《晨报》1922年8月19日）

5. 其他活动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

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商请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附设一夜班于本校，业经校长认可。凡本校同人及本校同人所介绍者，均可入班。愿学者请至斋务课报名，以便尅期开课。发起人：周同焯、李大钊、段宗林、李辛白、徐之杰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8日）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缘起与简章

近世文明有一最可注意之趋势，即求学业之普及是也。有鉴于寻常教育之不足也，而济之以补习教育、工余教育。吾国古人已有“萤读”、“耕读”之风，皆其先导。今西方教育发展认此为最要之一，而促其进步之方备，至小而有一二十人夜校之讲习，大而有万国公会之提倡，皆以讲学为宗旨，以惜阴为方法者也。吾北京大学同人以二千计，若以公务之暇，移其时力于学，所裨于群体与个人进步者必非浅鲜。兹同人有“大学公余法文夜校”之组织，籍述普通之观念，如此并列简章于后，如承本校诸君同抱研究法文之志愿者，惠列大名以为之倡，或别有赞助，皆所感盼。

宗旨与功用：

甲：直接读法文书籍，或备参考，或供选译。

乙：练习会话及通俗文学以资应用。

丙：研究法国之学术与情形，为有志赴法游学或调查者之予备。

组织与教授：

本校由北京大学同人发起，教课由法华教育会会员担任，并常延中西学者轮流演讲。关于本校事务，由同志推举干事部经理之。

本校分为三科：一、普通法文法语科，第一年。二、译述科，第二年。三、语言科，第三年。

毕业分为二种：甲、在三科中之一科毕业，发给本科证书。丙、在三科完全毕业时，以前项三种证书换给本科毕业文凭。

学期与时间：

1 每年分上下两学期：上学期由1月15日至6月15日，下学期由8月15日至12月15日。

每星期八小时：一、三、五各二小时，二、四各一小时。

资格与介绍：以北京大学同人及同人所介绍者为合格。

学费与报告：每月学费2元，全年（九月）共18元，分四期交付，入班以前本期学费须一律交清，退学者无论何故，概不退还。交费期列有：报名时，第一月学费2元。二月十五日，第二、第三两月学费4元。四月十五日，第四、第五、第六三月学费6元。九月十五日，第七、第八、第九三月学费6元。入学者及插班者随时均可报告。报名处：北京大学庶务处。

课目与分期：

法文科一学期：字母、拼音、读音、读本、会话、文法、默写。二学期：读音读本、会话、文法、默写、作文。

译述科一学期：文法、字学、读书、默写、作文、译述。二学期：文法、读书、作文、讲述、译述。

语言科一学期：读音学、默写、默诵、会话、文法、通译。

二学期：默写、默诵、会话、文法、通译、译述、演讲。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8日）

世界图书馆之发起

7月9日午后四时，本校编译会开茶话会，欢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先生。是日，蔡校长及本校讲师李石曾君提出创办‘世界图书馆’议案，因请张先生于午后二时到校，并约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君，及京师图书馆迁移午门筹备员陈仲骞君到校会议。本校胡适之、沈尹默、朱逸先、钱玄同、马幼渔诸教授皆在座。提议后，全体赞成。张先生遂函告上海商务印书馆，顷已得来函赞同。拟由华法教育会报告于巴黎会所，积极进行。大约半年以内，此事当有成效矣。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17日）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2000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有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希交上海环龙路铭德里2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仲灏、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劫、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晨报》，1922年9月24日）

胡适、周作人、刘复、高一涵、陈大齐、李大钊、钱玄同、唐伟启事

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君，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这种谣言本来不值一笑，因为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不幸国中缺乏

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信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

（《晨报》1919年7月6日）

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节选）

……

21号因为李大钊先生来天津。①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社谈话。李先生对于本社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且还给我们许多的建议。

……

（《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北京教育会对于市之自治议决

日昨（14日）北京教育会，开临时评议会，由会长顾孟余主席，报告本届开会，专为讨论京都市自治问题。盖自治施行，于教育前途，关系甚大，亟宜由本会，组织研究编著，及执行两部，约集教界同人，共同办理。旋由张士铨、金庚绪、顾兆麟相继发言，对于主席提议，大体赞成，为详细之讨论。结果决定，研究编著部，定为高一涵、李大钊、赵毅、杨荫麟、燕召棠、杜国庠、陶孟和、陈启修、王道元九人。执行部定为祝椿年、顾兆麟、姚金绅、赵毅、金庚绪、王道元、杨荫庆、伊齐贤、万华、田世谦、高永恩11人。宣言书现已拟就，俟印成后分送各界，以便共同努力。其原文如下。北京教育会对于京都市自治之决议。我们深感腐败市政的痛苦，并且深感市政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今当北京市自治将要举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宣布我们对于市政的主张的纲领，要求全市面向此目标共同努力，为市民的

① 时间为1919年9月21日。——编者

运动。(一)我们认为民国十年七月宣布的市自治制,有修正的必要,我们以为应该参照北京市的实在情形,斟酌修正,以能实行及实行时不至发生弊窦为标准。(二)我们反对少数地痞假借名义把持市政。我们反对官僚政客以市政的职务为交换的私利,和敲饭的处所。我们主张人才主义,要求市民不存籍贯的歧视,一致努力,务使公正而有学识的人,能被选为市政机关的职员。

(三)为达上述的目的,我们要严定并严格实行选举规则,和市民监督选举的方法。

(《晨报》,1922年7月15日)

参加宪法学会

宪法学会之成立,在民国十一年夏。

.....

宪法学会会员录:王侃^{补宣} 王銮^{声中和} 王葆真^{卓山} 王试
功^{教云} 王吉言^{颀廷} 王双歧^{子邵} 王恺^{补唐} 王锡泉^{卓甫} 王源瀚
^{源瀚} 王敬芳^{傅抄} 王文琳^{岷璞} 史泽成^{刚峰} 李泰棻^{革痴} 李文熙
^{淑安} 李庆芳^{芬圃} 李青峰^{采岩} 李大钊^{守常}

(《〈宪法论丛〉发刊词》,1922年)

女权运动同盟会启事

本会自本星期起特请王世杰、陈启修、谭仲达(逸)、李守常诸先生及本会会员孙继绪、陶玄、张天珏诸女士陆续讲演,凡热心女权问题者,均可蒞会听讲。今谨将本星期演讲者介绍于左:讲演人:王世杰先生。讲题:女权运动者之任务与方法。时期:8月3日(星期四)上午九钟。地点:石驸马大街女高师。

(《晨报》,1922年8月1日)

昨日女权运动同盟会招待报界学界

昨日(13日)下午二时,女权运动同盟会,在石驸马大街女子

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开茶话会，招待北京报界学界。首由主席周敏女士宣告本日开会旨趣，（一）欢迎报界学界诸君，答谢援助盛意，并请指教一切。（二）报告本会由筹备经过情形。略谓本会由女高师自治会同人发起，当本年六月底时，即经提出评议会可决，嗣因考试与放假耽搁，迟至七月底始推定筹备员担任进行。本会性质，并非暂时的，系永久的。不仅以要求在宪法上加入一、二条文为止，必须将社会上种种不平等习惯，完全改正，恢复女子一切利权，故定名为“女权运动同盟会”。京内方面，由本校同学发起组织，欢迎各学校各团体一律加入；京外方面，亦由本校旧同学在各省自由组织团体，以收殊途同归之效。运动方法，略分三层，（一）文字鼓吹，已发刊《女权运动》，并请报界诸君帮忙。（二）学理讲演，请各界名流，轮流赐教。（三）实地调查，由同人分途担任，如公娼存废利弊之类。至于本会经费，暂由本校自治会担任，殊无竭蹶之虞云云。报告毕，来宾相继演说，北大校长蔡元培谓，女权运动第一步注意男女教育平等；此并非不可能之事，即举北大往事言之，亦已成效渐见，女界宜于此点特别注意。男界亦宜于此点与女界以援助云云。次由女来宾曹敏演说，历述本人民国二年参政运动之历史。次黄报记者周书言，希望贵会注意法律平等，并勿以失败而灰心。次北大教授黄日葵演说，继述英法女权运动之历史，并言十九世纪女权运动，是小姐太太们的女权运动，二十世纪女权运动，是劳动界的女权运动，我国劳动界妇女界程度均甚幼稚，希望互相提携，勿专为小姐太太们之女权运动，致起劳动界之反响。次北大教授谭熙鸿谓女权运动，（一）宜注重群众运动，（二）宜注重学理研究。最后北大教授李守常谓贵会进行，宜首先注意下列三项，（1）要求撤废治安警察法，（2）要求选举法中列入女子，（三）希望劳工保护法内加入女工保护之规定云云。时已五时，来宾略用茶点，遂散会。

（《晨报》，1922年8月14日）

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苍梧李超女士，幼失怙恃，长受教育，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矢志求学。不幸家庭之虐待，横被摧残。曩修业于梧州女子师范，广州公益女子师范时，几经艰阻。旋以姊丈之援助，跋涉京华，得受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其家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者，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姊丈筹济备受责言，嫂抱不平以身殉。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积悲成疾，遽于本年8月16日赍志以歿，遐迹咨嗟，同深惋惜。同人等谨拟于11月30日（星期），在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会追悼，俾慰女士之灵，聊以作生者之气。伏祈各界诸君惠临为盼，如蒙赐以挽章诗文，尤所感激，请交下列三处为荷。

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 梁惠珍

宣武门外后青厂广西三馆 区 諲

后门内松公府夹道第七号 苏甲荣

发起人：周绍昌、李大钊、陈钟凡、胡适、蔡元培、毛邦伟、伍树芬女士、吴弱男女士、赵炳麟、关冕钧、李济深、梁漱溟、李超、林炳华、周家彦、林世焘、梁昌诤、秦树忠、黎桂森、林伯启、叶镜潞、罗振英女士、王兰女士、胡学恒女士、彭梦民女士、罗家伦、黎启祥、康白情、杨葆俊女士、胡英女士、陶玄女士、刘韵琴女士、雷荣甲、黄土嘉、李家容女士、王绪贞女士、孙雅平女士、蒋粹英女士、顾翊嫻女士、王宗瑶女士、林伯铭女士、黄日葵、梁运曦、区諲、区家达、韦奋鹰、黄琮、陆善焜、谢起文、覃怀林、梁文瀚、梁惠珍女士、陈瀛、苏甲荣同启。

（《晨报》，1919年11月19日）

王文彬等启事

敬启者。自顷政局更新，国事诸待解决，国民大会之主张，

遂为舆论所公认。本校教职员及学生，亦有热心研究者。同人等窃谓兹事体大，既未便放弃天职，存而不论，又不宜掉以轻心，反滋貽误。爰就所知，邀集谭话，断于交换意见，有所折衷。讨论结果，以为时论之对于国民大会，大率趋重法律问题。（如修改约法、及制宪等等。）此固国本所关，至为紧要。然使国人心目中热望兴革之政治诸问题，尚未解决，则既使正式国民大会，果能成立，而武力干涉，金钱运动之历史，必不免于重演。此国民大会怀疑论所由起也。故同人等主张先行提倡临时国民大会，解决目前切要事件，庶不致筑室道谋，坐失时机。兹将拟就之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逐加说明，别纸录附。此不过同人等个人之主张，当否尚难自信。兹谨函达。

台端，征求同意。如荷赞可，即乞于函到五日内示复（请亲笔署名，并注明住址。）交汉花园北大第一院收发课汇存。再用全体赞成人个人名义，通告京内外各学校，及各界团体，以资联络而便筹备。专此布达，即颂
台祺。并盼答复。

王文彬、李大钊、何恩枢、沈士远、孟寿椿、胡春林、陈启修、黄右昌、廖书仓、蔡元培、蒋希曾、罗文幹、谢绍敏谨启

九年、八月、二十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21日）

临时国民大会提案七条

（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

（说明）非法国会——即新国会——产自非法，根本不能成立。非常国会——即旧国会——已失时效，当然不能继续存在。

（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

（说明）安福祸首虽经拿办，而平日依托党籍卖国自肥者，

亦应分别惩办，以儆效尤。又复辟犯帝制犯均罪在不赦，永不得再行起用。

(三) 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

(说明) 军队原以御外侮，而我国则以军队酿内乱，亟应裁减以轻人民负担。督军巡阅军区长以及其他同等军阀制度，均应一律废除，以符民治精神。

(四) 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

(说明) 凡载在约法之身体言论出版集会一切自由，均应得绝对的保障。

(五) 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

(说明) 地方有编练民团权，庶足防兵匪侵害，而举自治之实。

(六) 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

(说明) 民国财政，人民罔有闻知。一听奸人滥借外债，咸归中饱。饮鴆止渴，可为寒心。嗣后岁出岁入亟应公布。予算决算，亦须依法办理。并严禁秘密借款，以妨贪冒。

(七) 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

(说明) 我国外交素为少数人所把持，丧权辱国殊堪痛恨。以后外交，务须根据民意办理，庶免奸人操纵。所有二十一条与军事协定以及其他，卖矿卖路一切密约均取消之。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21日)

四十余团体参加裁兵大运动

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昨日(4日)下午二时开各团体联席会议，出席者凡四十余团体，公推国民裁兵促进会林长民为代表。议决下列各案。(一)各团体自认归入何队，计东队八团体，南队十二团体，西队十七团体，北队十一团体。(二)推定职员。决定各队自行推定，计推出团体如下：(甲)东队。北京青年会学校事业联合会；(乙)南队。高等师范。(丙)西队。工业专

门。(丁)北队，北京大学，北队并已推定蔡元培为指挥。

(三)推定讲演员，计推定蔡元培、李石曾、林长民、丁锦、马君武、张继、郭泰祺、王孝英、刘衡静、周垣、张维镛、张耀曾、李大钊、胡适、陈炳瀛等十五人，其中丁锦已拟定讲题为欠饷问题。(四)规定办公时间，为下午二时至四时。(五)经费问题，主席报予算须600元，现银行公会之到捐款300元，尚有300元，拟由各团体公摊。当经各团体及个人自由认捐，约一百数十元。此外提议事项，可决者两件：(一)丁锦提议各团体须于游行时，各备一旗帜。(二)李石曾曾提议各讲演员讲稿，可印成专集。时已5时余，遂散会云。又闻该会原拟游行路线，因与军警交涉，结果已略有变更。兹将其变更之路线如左。游行路线，分东西南北四队，各队准12点出发。东队，自灯市口公理会出发走米市大街出崇文门，经打磨厂进前门到天安门。西队，自祖家街工业专门学校出发，走西四牌楼经长安街到天安门。南队，自先农坛前出发，走前门大街进前门，走西交民巷到天安门。北队，自北大一院出发，走景山大街出后门顺皇城根宽街经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

(《晨报》，1922年10月5日)

北京学生的读书会

前日(19日)有北大、法专等校一部分学生，发起一学生读书会。午后二时半在中央公园董事会开会，讨论读书方法，到会者有五十余人。先由主席略述组织读书会之理由：(1)共感知识缺乏。(2)补助学校教育不及。述毕，即请李大钊、谭熙鸿等演说，李、谭对于学生此种组织，深表同情，且云，自身亦乐加入读书会之列云。

闻读会对于读书方法，分为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经济五辞，分组研究，每组有导师一人或数人指导。入某组研究由会员自由选择。每一星期至少须开研究会二次。会址在中央公园图

书馆侧近。李大钊、谭熙鸿、邓萃英等均被该会聘为导师云。

(《晨报》1922年11月21日)

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

北大同学新闻记者同志会，系由该校教职员及已毕业或未毕业学生从事于新闻界者所组织。12日上午在该校第二院大讲堂开成立大会，来宾方面到者有胡适、徐宝璜、李大钊诸教授。由众公推黄右昌主席，当报告开会宗旨及筹备经过。次由徐宝璜、胡适、李大钊演说（见后），再次会员黄右昌、徐一尘、张煊演说。随通过简章，选举职员。

选举结果，（一）会务书记顾名、张煊当选，候补者为鄢祥崧、费觉天。（二）讲演书记罗敦伟、费觉天当选，候补者为徐一尘、顾名。（三）会计书记汪翰、谢绍敏当选，候补者为张煊、陈顾远。遂即共同摄影，尽欢而散。兹将徐宝璜、胡适、李大钊诸人演说分录于后。（下略。李大钊演说词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国内外集金赎路运动之踊跃

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前日（23）已宣告成立。蔡（元培）、王（家驹）两会长，积极进行一切，定于今日（25）开会，通过各项职员及办事细则。商界方面，闻风兴起，拟邀集银行公会及其他之团社[体]，一致加入，以收集腋成裘之效。京兆同乡会，亦拟发起北京平民赎路集金会。女界之何慕班、陈维亚各女士，正在组织女界赎路集金同志会。其招股方法，闻系推出劝导员若干组，向各家女眷，请求协力襄此美举云。兹将学界赎路集金会会长蔡元培指定各员之衔名职务，及其通启，照录如下。通启云，辱承推选鄙人为北京学界集股赎路会会长，事关公益，勉效驰驱，谨遵会章，先行指定委员若干人，衔名职务，另纸开呈，即祈察照。并请于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在美术学校各委员会同时

开会，推选委员长，以利进行。敬希准时驾临云云。至指定之衔名职务，即，总务：谭熙鸿、郑锦、尹炎武、毛邦伟、李贻燕、沈士远、张鼎乾、鲍寿康、钮振、金庚绪、李辛白。宣传：祝椿年、李大钊、高松秀、周松秀、周宣德、王子均、王兆荣、邱时明、杨璠、谷源瑞、陈作霖、温廷杰、鄢祥提、陈政、张瑾。交际：顾兆麟、汪翰、祝椿年、周绶章、经子渊、耿星江、徐迪、南式容、张瑾、吴宗栻、张黻卿、闵京山、顾孟余、俞同奎、马寅初、王永灵、王士杰、陈启修、李建勋、王家驹、又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昨发出通告云，本月25号（星期三）午后二时，在宣内刚家大院四号本会事务所开全体代表会议，讨论筹款赎路，抵制劣货各案，务希贵代表准时拨冗出席为荷云云。

（《晨报》，1922年1月25日）

昨日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之成立会

昨日（十九）下午三时，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到会者六十余人。众推法专王兆荣为临时主席。主席宣告开会后，谓此会非仅为研究此次太平洋会议，系有永久的性质，故名曰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旋将发起人第二次会决定之草章，逐条加以说明后，主席即将草章付讨论。马叙伦主张应逐条讨论。蒋梦麟则以为应注重将来之研究，章程字句，如大体无甚不妥，毋庸多费时间。姚憾对于其中主张不设会长，如有对外事件，可用本会名义，并主张应加设调查部：将本会分为研究、调查、干事三部，各部设主任一人，共同协理事务。主席遂以逐条讨论咨询众意，并咨询应用何种表决法。马叙伦主张概括表决，众无异议。主席遂将草章七条朗读一遍。大家略加讨论，原案均经通过。嗣马叙伦、徐瑾提议应加设修改章程一条，并由马叙伦提出条文为“本会章程经会员十八人以上之提议，得修改之，须经大会多数通过。”全体无异议，即以此条为附则。主席乃将章程全部付表决，全体一

致通过。次讨论选举会长副会长方法，决定用无记名投票。开票结果，正会长蔡元培当选，副会长蒋梦麟当选。寻即推举李大钊为中文干事，胡适为英文干事，谭熙鸿为法文干事，王世泽为德文干事，陈亚牧为俄文干事，王兆为日文干事，许绳祖为会计干事，李贻燕为庶务干事。最后公推王世杰、燕树棠、何基鸿、熊遽、何炳松、李建勋、谭熙鸿、马叙伦、高一涵、陶孟和、张鼎乾、陈启修、李大钊、顾孟馥、王家驹、姚憾、胡适、朱锡麟、黄右昌、蒋梦麟、宁协义、徐瑾等为研究员。时五时，遂宣告散会。

（《晨报》，1921年8月20日）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我们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的三层意思：——

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

我们以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得到益处。我们又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纵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智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

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

这是和上面说的一层互相关连的。普及两字，在别一意义上就是筑根基，各种讲科学讲思想的入门书，在现今确是很需要，便是主张“提高”的，这一步也是跨不过。

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但进学校读书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就连看点自修书的时间和经济，也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去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学的门径。

这就是我们编辑这个丛书的一点意见了。关于编辑方面的办

法，下面说明。

一，定名：本丛书定名为新时代丛书。

二，宗旨：本丛书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

三，内容：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不限定册数，或编或译，每册约载三万字。

四，编译：由同人组织《新时代丛书社》，社员负责，社外著作如合本丛书之性质，而愿让与本社出版者，经本社审查后，再议条件。

编辑人（以姓字笔画繁简为序）：

李大钊、李季、李发、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戴季陶、经亨颐。

（通信处）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转新时代丛书社、商务印书馆

（《晨报》；1921年6月28日）

争自由的宣言

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瞬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要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从民费去一点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

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

(A) 消极方面

一、治安警察条例把人民政治结社、政谈集合、屋外集合、公众运动、游戏、群集、演说、布告、和工人聚集、女子参政、种种自由，交给警察官署去任意处理，结果便把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思想宣传运动、劳动运动、女子运动、根本打消，使约法上规定的集会结社自由成了一句废话，故民国3年3月2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一、出版法把人民著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书图书的自由，交给警察官署或县知事处理，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故民国3年12月4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一、报纸条例把日刊、周刊、旬刊、月刊、年刊和不定期刊的言论自由，放在警察官署手里，并且先要求许多保押费，这是中国抄袭日本的特别法律。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故民国3年4月2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一、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故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一、预戒条例中所举的犯罪事件如破坏社会道德，阻挠地方公益等罪名，范围标准都由警察厅或县知事决定，并且不限于已经犯罪的人，便是警察厅县知事认为“欲行”犯罪的人，也一律适用。凡受预戒令的人居住迁移职业行动都不得自由，与约法上居住迁移自由的规定完全相背，故民国3年3月3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一、戒严令第14条规定的事件、凡人民、身体、家宅和财产

营业等自由，没有一件不被干涉。这种重大的问题，断不可让行政官自由处置，应该要求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B) 积极方面

一、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

(1) 言论自由

(2) 出版自由

(3) 集会结社自由

(4) 书信秘密自由

一、这几年来，行政官厅和军警各署对于人民，往往不经法庭审判，擅自拘留，或擅自惩罚，把身体自由权剥夺净尽。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

[附注] 《人身保护法》便是英国的 Writ of Habeas Corpus，章秋桐译为《出庭状》。该状有几层用处，(一) 出庭状有一定的格式，英国是由高等法院 (High Court) 发出来的，如果受违法的拘留时，不但本人可以请求，便是亲友或相熟的人也都可以去领。(二) 拘留人的人接到这状，便要立刻将被拘留的人交出。(三) 被拘留人一经出庭状发出，无论生死都要交到法庭去依法审判。(四) 法院既受人请求，应该即刻发出出庭状，不然便要重罚；受出庭状而不将被拘留的人交出者，也要重罚。——故这种法律是救济违法拘人的最周密的方法。

一、这几年来选举舞弊可算是达到极点，应由无党派关系的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于选举时实行监督，并公请律师，专调查犯罪证据和管理诉讼事项。

胡 适 蒋梦麟 陶履恭 王 征
张祖训 李大钊 高一涵

(《晨报》增刊，1920年8月1日)

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通告

本会现已成立，定于本月20日午前九时起在本校第一院（汉

花园)开始报名。凡有妇孺入会者,务即前来报名(名额以六百人为限,额满即行停止)。兹将本会办法并干事各单列后,希即察阅为荷。

△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入会办法

(一)凡报名入会者须随意捐助会费。

(二)凡领有保护标识之妇孺,届到会时,每日收火[伙]食费一角五分。先缴五日,五日满后仍住会者,续行照缴。

(三)本会火[伙]食每日两餐。

(四)贫苦妇孺临时来会者,免收各费。每日给稀饭两次。

(五)本会酌请中西医生担任卫生及诊治义务(医药费自备),但贫苦妇孺得由会施送医药。

(六)凡未经规定事宜,均适用京师妇孺救济会入会简章。

△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干事名单

总干事:蔡元培

副总干事:沈士远

(一)调查部主干:李辛白、李大钊、徐宝璜、许文堵。干事:徐之杰、胡春林、卢勃华、苏昭桂、周同焯、黄世晖。

(二)交际部主干:马叙伦、姚憾、郑阳和、胡春林。干事:万秀岳、卢勃华、许文堵、李振彝、杨德泰、段宗林、董霁、何育杰、罗惠侨、盛铎……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1日)

北京大学赈灾会启事

今年北方旱灾,异常重大。灾区有五、六省之广,灾民有数千万之众,无衣无食,道殣相望。瞬届寒冬,苦痛尤甚。窃思此等难民同属国民份子,坐视不救,夫岂人情。同人等念责任之所在,用特组织斯会,仰祈本校全体赞助,慷慨认捐,以尽互助之谊,无任禱荷。此启。九、九、一六。

认捐办法:假定教职员学生每人认捐以一元为单位(多多益

善)。教职员认捐者交由会计课代收，学生认捐者交由斋务课代收。俟集有成数，届时如何赈放，再行公决。

发起人：李守常、沈士远、蒋梦麟、蔡元培、顾孟余，李辛白、马叙伦、胡祖植、郑寿仁、陈世璋、俞同奎、马裕藻、朱希祖、黄右吕、罗文干、胡适、黄国聪、张祖训、郭滌华、李振彝、冯祖荀、朱锡龄、胡春林、郑阳和、周同焯、万秀岳、周丰、黄世晖、包开善、卢中严。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23日）

李大钊给《北京大学日刊》记者的信

记者足下，友人张君国威原名国宾，富有恤性，尝留学日本，习陆军。一日游游就馆（在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中陈甲午庚子两役由吾国虏获之物品甚多），见而大愤，挥拳击毁之，为日人所捕。某公使敬其忠勇，为更名国威，仍令留学。辛亥事起，张君归沪，督率义军，厥功颇伟。民国建立后，复返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习矿科。卒业归国，赴粤开矿，以诸多阻碍不克用其学。乃于去岁应沪上赴法华工之招，刻已抵法国矣。兹得其由法来函，述华工状况颇详确，特将原函录呈概要，请登入日刊，以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介绍，余不白。李大钊。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4日）

介绍学生工作

现在有一些学生想实行半工半读的主义，用他们的劳力来帮助他们求学的费用。各机关的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个人，并请说明工作的种类和工钱的数目，我们可以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

胡适、李大钊、徐彦之同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9日）

(五) 索薪斗争

1. 李大钊就北京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的谈话

目前中国教育界的困境

就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发表的谈话

教职员联合会主席^① 李守常

由于经费断绝，教学无法维持，北京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于3月14日开始总罢课，至今已经两月有余了。在这期间，虽然政府和“教联”之间多次交换意见，均未取得结果。最近政府方面声明，只有各个学校从速开学上课，才能支付拖欠的经费；而教职员方面则认为政府言而无信，只有发放拖欠的全部经费，才能谈复职开学问题，遂导致了作出总辞职的决定。

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李守常以极忿懑的心情谈到这次事件的经过，他说：北京的专门以上学校，即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八校的教职员由于政府连续数月拖欠经费，在已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经各校教职员联合协议的结果，不得不于3月14日起停止上课，静观政府的态度。在此期间，政府方面曾以种种口实强迫学校开学，但直到目前政府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无诚意负责支付所需要的经费，这种情况已越来越明显，同人迫不得

^① “教联”的正式名称为“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该会的主席为马叙伦。在马叙伦生病和被军警打伤住院期间，李大钊被推为代理主席。

——编者

已才作出总辞职的决定。

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政府毫无诚意，纯属万般无奈。在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负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新支那》1921年5月22日晚版，原文系日文，韩一德译，刘多田校）

2. 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停职宣言

国立教职员停职宣言

我们从前因政府没有维持教育的办法，已经停职过一次。当时郑重的宣告，是“要政府切实筹集全国教育基金，并须急速筹足。无论如何的特别情形，不得挪移或减少。在基金没有筹足以前，按现在教育进行的状况，指定确实款项，作教育经常费。经指定后，不得挪移或减少”。这是我们明明白白声言的，政府明明白白答应的，国人明明白白听见的。

现在怎么样了？政府本有教育经费的预算，国民本有教育经费的负担，这种经费到哪里去了？政府平日所说筹集的教育基金在哪里？指定的教育经费在哪里？全不过是一套骗人的空话。各校的教育经费，比从前愈形困迫，盼政府发款像大旱的时候盼雨一样艰难。添聘教员没有钱，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试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一切用品都没有钱。学生终日皇皇，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皇皇，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能安心授课。试问教育机关困穷至此，还有何法可以维持下去。若说财政艰难，何以政府办那些毫不相干的事，一用就是数千百万，而维持这几个经

费有限的学校，便没有钱了？况且政府现在明明还在那里添设特种学校，而于缔造经营了多年的几个国立学校，倒反眼看着他们停闭而不维持。似乎政府不维持教育，不是没有力量，乃是没有诚意，不是不能，乃是不肯。

我们再不能忍了。所以我们于3月14日宣告暂行停止职务，与政府作最后的谈判，问政府是否还有维持教育的意思。如果还有维持教育的意思，就要政府由现在最确的收入，如国家所办的铁路、邮电等项内，指拨一点点定数，作教育经费，并须确实的保障，不得挪用或减少。如果办到这样，各校才能持久，我们才能恢复职务。如这种要求办不到。我们宁愿政府明明白白的宣告他停办教育，断乎不愿再和政府苟且敷衍，使教育事业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并且贻误了许多青年的学子。

凡我们的举动，系为急救垂危的教育事业，系为巩固常久的教育事业，系为使国家不要成为无教育的国家。

我们所最痛心的，是耽误青年学子最可宝贵的光阴，但是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去负。

（《晨报》，1921年3月17日）

3. 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

教育界之罢工风潮

昨日国立各校教职员已实行罢工。上午十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二十余人，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会，临时推定北大代表马叙伦为主席。先由高师代表马裕藻提出，高师教职员希望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从今以后，组织一永久的联合机关。讨论结果，先组织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每校得派代表三人到场，惟只有一表决权。自明日（即今日）起，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半，在美术学校开会。并票选马叙伦为主席，由主席指定女高师代表李贻燕为文牍股办事，美术代表

吴起凡为庶务兼会计股办事，美术代表徐瑾及北大之李大钊为新闻股办事。全体议决。（一）要求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基金。（二）要求清偿积欠薪修。并由美术代表徐瑾，报告该校教职员会决定要求政府将各部所办学校，一概划归教育部管辖，以谋教育统一。付论结果，均以此问题，为正当办法。决于上政府呈文内详叙须统一教育之理由。直至下午一时半，始宣告散会云。闻该会对于宣言书一项，拟从速发表。将此次罢工之目的，宣告于世，以免外间之误会。至学生方面因教职员罢工致因学业停顿，昨日下午学生联合会在高等师范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方针。当时共决定办法数项：（一）上书府院要求拨付确款充教育基金。（二）通电各省各团体请其一致援助。（三）派代表探询教部应付方针。（四）函问教职员联合会此次罢工之态度，是否坚持到底。

又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教职员因高师教职员已实行停止职务，该校系附属学校，不得不有所表示。故特于昨日（15日）下午四时在该校会议室开全体教职员会议，讨论是否与高师取一致行动。当场情形非常复杂，有主动取一致行动者，有主张先探听其他各中学校者，有主张先观风头者。当时教职员纷纷退席，因之不得要领而散。但该校教职员虽未停止职务，而教员告假者甚多。闻今日下午四时，仍召集会议。

（《晨报》，1921年3月16日）

4. 索薪斗争

教育经费独立之大运动

北京教育界以政府积欠各校经费至三个半月之久，且对于将来之教育经费，亦无确实办法，不得已而起为同盟罢工运动。

……
北京大学方面，亦于昨日下午四时在第二院开会。由姚憾主

席，前由陈世璋发言，力数政府对于教育绝无维持之诚意，提议要求政府一方面指定的款，一方面将积欠薪水补发，并以罢工为后盾。继主席宣读李石曾来函。略谓教职员同人不可为消极的罢工，而当为积极的罢工。即先调查政府中可靠的收入（如邮费加价等），要求拨发教育经费。如不得要领，即实行积极的罢工，于罢工之后，当对政府为种种抵抗之行动。郑寿仁等表示赞成。继陈启修提议，对高等工业为同情的罢工。次黄佑昌提议，一面罢工，要求政府指定教育经费，一面向法庭起诉，追求积欠薪水。继陈廷璋、郑寿仁等发言，略谓教育经费不过占政府支出百分之一，政府反不一为筹措，致国家每年数千万之收入，尽供彼辈武人政客之挥霍，此时非实行停止职务，诉之国民，殆无其他办法。继胡适发言，略谓罢工为重大事件，所要求之目的，须足以与之相应而后可。现在根本问题，在政府各部各以本部之收入为私产，彼此不能相通。如农商部交通部皆以本部收入为其私产，此次国立各校，其经费之支绌为向来所未有。政府于固有之学校不与以维持，而交通部反自新设交通大学。同属国家机关，而畸轻畸重若是。此际宜请求政府，（一）以后各部收入不得作为各部私产。（二）指定交通部直辖各铁路收入项下，每月拨付国立六校经费。盖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文不付，而对于不急之务，如翻印四库全书则耗至四百万元。设立航空年耗至数十万元，毫无吝惜之意。政府漠视教育如此，非指定的款，经费问题决无解决之望云云。后由陈廷均提出决议，由胡适略为改正，谓自3月14日起暂行停止职务，要求政府于直辖各铁路收入项下，拨付教职员积欠薪俸及国立六校常经费。主席付表决，全体赞成。随选出委员郑寿仁、陈世璋、马叙伦、王绍瀛、王星拱、陶履恭、何基鸿、周象贤、顾兆熊、谭仲逵、李大钊十一人，以执行上述决议案。并宣告在北大教职员而在其他国立学校兼职亦一律罢工。闻法政专门、高等师范等校，将于今日开会讨论此问题。该二校之教员多与北大相通，开会之结果，必不免于与北

大、高工采一致行动。

(《晨报》，1921年3月13日)

昨日教职员代表之联席会议

昨日(18日)下午一时半，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至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次大会。首由主席马叙伦报告，添派北大之外国教员柯乐文担任新闻股、孟寿椿担任文牍股，与各校长京师学务局之复函，教育次长王章祐之复函，学生联合会之来函，及法专派定姚恨吾、徐吉安、王宏宾、胡可庄、戴薰琴五君为代表，北大加派郑寿仁、陶履恭、顾孟馥、王绍瀛、谭熙鸿、何基鸿、李大钊、周象贤等八人为代表。报告毕，即讨论。(一)本会对于各校长及京师学务局寒日通电所言，以所得税作教育基金一事，并未根本反对。不过，以缓不济急，故要求铁路邮电等项收入为教育经费。诚恐外间多所误会，乃决定仍致函校务讨论会及京师学务局申明此意，并希望该会该局为设法表明寒电系该会局所发。(二)复函学生联合会，表明本会目的所在。非达到目的，决不上课。(三)前次派定三代表，决定于教育总长未到部以前，暂不与接洽，仍造谒总统总理，质询其对于此事之态度。旋以电话询问国务院，复言由郭则沅秘书长代见。乃定于明日往见郭氏。(四)马叙伦提出“教育基金案”。经详细讨论，结果全体一致主张由本会先行组织一“教育基金委员会”。诸如所得税、铁路收入、关余、盐余、印花税等国家收入，均拟拨定若干款项，作教育基金，并以社会组织的由人民自动的监视收支。该委员会组织，主席一人，委员十六人。其中八人由各校代表各自推举一人，余八人则由各校自由推定，并即以本会主席为委员会之主席，旋即推定郑寿仁(北大)、姚憾(法专)、李贻燕(女高师)、朱其燁(医专)、经亨颐(高师)、戴济(工专)、许澹(农专)、徐瑾(美术)八代表为委员。其余八人，则俟各校另推出后再定。最后并全场一致决定教职员停

止职务期间，各校之图书馆图书室及学期毕业等考试，与夫春季旅行等事，均一律暂时停止。并定于下星期（21日）再开大会。散会已下午四点矣。

（《晨报》，1921年3月19日）

教潮仍未可抱乐观积欠问题仍未解决

昨日（25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三次大会。主席马叙伦因病未愈仍缺席，由北大代表陈世璋代理主席。报告（一）女子高等师范教职员会来函，补推李大钊君为代理有发言权代表。（二）主席马叙伦来函，因脑病未愈，请假一星期。（三）北大毕业同学会派代表前来，已由李大钊接待。报告毕，由北大代表谭熙鸿报告上星期六检验教育部领到33万元支票情形，及教育部与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接洽情形。并谓据云积欠款项，本日下午三时，当有确实消息云云。旋对于积欠问题，有所讨论，以斯时已至午后三点，尚无消息。余以当款项未发下以前，是否将积欠全数发清，抑系发一部分，同人无从推测。俟发出后，再行讨论进行交涉办法。次由美术代表徐瑾，报告北大毕业生同学会23日在北大第三院开会，决定上呈文于大总统、总理及教育部，并通电全国。（原文录后）惟对于积欠一层，则有愿教职员让步之意。报告甫完。李大钊归席，报告接见北大毕业生同学会代表廖书仓、林彬二人情形，谓二代表叙述该同学会意见，在确实筹定教育基金及有担保，希望教职员方面，勿为政府所欺。并述该会上府院部呈文及函电内容。该会已决定联络八校毕业同学组织联席会，为教职员后援，望本会议随时将进行情形，报告该会云云。维时将届四点，校长方面，尚无回答。且闻尚经国务院签字，然后由教育部向银行领取。代表以其不履行预定时间，于是决定再函校务讨论会，质问其延宕情由而散。兹将其致校务讨论会函录下。迺启者，前据教育部正式答复同人，称支票已由财政部领到。当

即致函台端务于今日（4月25日）下午三时以前，将收此项欠薪，交付同人。今时期已届，欠薪尚未见付，究竟如何，望即赐复为荷。此致校务讨论会。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代表联席会，25日下午四时。

北京国立八校罢课学生代表何玉书（法专）、王麟昌（高师）、汪瀚（北大）、黄族翘（美术）等四人，昨日（25）上午，又往国务院请谒总理。因总理赴津，由许秘书出见。该代表等谓八校罢课迄今月余，荒废宝贵光阴，至为可惜。政府对此，何故不早日设法。现闻积欠已有解决之望，惟对于教职员及学生方面，所视为最重要之教育基金，则并无切实办法，以致上课无期。政府苟不甘受破坏教育之罪，应请速即俯从教职员以及学生之请，速定基金。于基金未筹足以前，每月拨定的款，作八校经费，以便早日上课云云。许氏当允将此意俟总理回京后代为转达云。兹将北大毕业同学会上大总统、国务总理、教育部呈文录下。（下略）

（《晨报》，1921年4月26日）

消息沉闷之学潮

昨日（26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三（四）次大会。主席马叙伦仍因病缺席，由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来函，请辞职教职员代表及各校长，于星期五（29日）下午二时，到女高师该会事务所，会商八校经费问题。金以学生方面，既能注重于此，星期五下午，虽为本会议定例开会期日，可暂停一次会议，由全体代表齐往会商，当即复函与该会。次即讨论积欠问题，金以教育部方面，对于已领到二个月薪金，有自由支配，并划出一部，为发给部员薪金之意，同人当然不能承认，且尚有三个月欠薪未发，乃决定昨日散会后，全往教育部追索。并定于本日（27日）下午四时，全体仍往教育部，为严厉的要求，非欠薪问题解决，其余诸问题，概不过问。散会时

已下午四时，随即赴教部索薪，仍无结果云。

（《晨报》，1921年4月27日）

教职员辞职索薪之无结局

昨日（27）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五次会议，各校代表俱到，主席马叙伦仍请假，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一）八校此届毕业生，派代表黄哲文（法专）、方豪（北大）、朱光桓（工专）、顾华孙（农专）、黄汝贤（医专）等五人来会。谓此届毕业试验，可以师生名义，出题考试。（二）教育部三司长任鸿雋、陈宝泉、高步瀛三人来函，谓本日下午奉国务院之命，须与各校长接洽，请代表不必赴部。当即讨论，对于毕业生要求考试问题，咸以同人辞职后，已脱离学校，按法当然不能为负责的回答，惟对于学生自身，同人亦甚抱歉，希望学生向校长方面交涉，倘校长不能负责，可再向负责机关交涉。次讨论三司长来函问题。该函原文云：“敬启者，昨闻贵代表来谈，今日下午四时到部接洽。因适得国务院电传，派雋等往见各校长，届时恐难相候，请下午暂勿到部。是所盼祷，专肃顺颂，教职员代表诸先生公安。任鸿雋、高步瀛、陈宝泉鞠躬。4月27日”。讨论结果，同人与该司长等之约见在先，此时以一纸搪塞。决定仍赴部坐待。其次讨论本星期五到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应有发言之人，乃由徐瑾提议，请谭熙鸿、马裕藻、陈世璋三代表发言，无异议。最后约请八校校长到会谈话。当有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医专校长张馥卿、工专校长俞同奎、农专校长英挚臣、美术校长郑锦五人到会。代表要求各校长早将欠薪发清，否则请同到教育部追索。蒋校长发言曰：索欠一层，是同人等应尽之责，当然可以同去。本日教育部任司长与鄙人在电话谈话，谓接院电，靳总理回京尚无确期，前提三项办法，教职员方面能否满意，却别有意见，请提出当局。明日（即今日）国务院会议时，

亦可讨论。俟讨论之后，当派员往天津，请示总理。惟司令〔长〕之意见，以为此项办法，与教职员方面之要求，相去太远，认为无磋商之必要。故拟定二条办法。第一，交部特别协款，非教育基金筹足以后，不得停止。第二，每月应由交部尽先拨付财部，不得延宕。此项意见，日前国务院与鄙人在电话中谈话时，彼对于“筹足”二字，欲改为“筹定”，谓筹足不易，可否用“筹定”二字。鄙人以此“足”字，大有关系，未曾允许，惟此不过同人之意见，仍须与诸位教职员商量云云。代表等以此项问题，于未解决欠薪问题以前，不能表示意见。故未有明白之态度。旋即同赴教育部。至五时始，有任鸿雋、陈宝泉二司长出见。代表当责以何故籍词不见？三司长与校长约定时间，据前代理校长云，是下午五时，同人昨日约定系下午四时，此等官话，以后望不必再向同人发挥。任、陈二人均力辩白，代表等亦不深究，只向其要未发之欠薪。任等均力言，可以代达代表之意于国务院，惟不能负责。旋有美术代表徐瑾起而诘问，既不能负责，何以美术学校之欠薪，教育部竟仅发一月，任意扣留一月？照国务院公函，明明申明发两个月，教育部何以随意扣留？同人业已辞职，素（索）欠是应有之权利，教育部究凭何项理由，扣留一月欠薪。任等谓此系会计科长之责任，我等不得而知。惟此系国务院发下者，教育部未曾扣留。徐瑾又言，国务前已声明发二月，今又扣留一月，其中显有教部人员出而捣鬼，应请明白答复。任等不得已，派人觅会计科长，不得。乃约于今日（28）下午三时，请会计科长出见，表明此事。而对于尚未发清之薪金，任等始终只允照已过办法，代为转达国务院，不能负责。代表等极不满意，于是提起国务院公函内所言，“已与各该主管机关商妥”之一语，谓据此看来，教育部必有人负责无疑，何以言不能负责。请问此负责交涉之人，究竟是谁？任等各推自己未曾负责交涉，始终不得要领，惟欲其与代表校长商量办法。旋由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发言，谓政府对于同人，虽蒙慰留，不允辞职，惟

照法律论，契约不履行，而欲同人复职，万无此理。今教职员业已辞职，彼等应享权利之欠薪，政府负有履行清偿之义务。政府苟不履行此契约，以后之事必无从办理。同人惟有请二司长转催政府，速即准予辞职，否则偌大学校，只有校长一人，既不成体统，复有许多危险，倘有意外，同人不能负此重责。至于前提三项办法，与教职员方面之要求，相去过远。此事无商榷之余地。现在最要者，惟望政府速将欠薪清还，然后能为第二步之进行。否则请速准予辞职云云。任等默然不发一语。直至六时余尚无办法。代表等不得已约于今日（28）下午三点，再到部取讨回答而散。

又昨日（27日）上午十时，北大毕业同学会代表鲁邦瞻、林彬、顾名、黄文弼、廖书仓等五人，往总统府请谒总统。因总统事忙未见，谓谒秘书长。而秘书长又不在府。不得已只留壁文，又往国务院请谒总理，因总理赴津未回，由王秘书出见。该代表等谓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校长相继辞职，教育部长官亦已弃职赴津，全国行政之首都，竟陷于无教育之状态。政府虽与教职员校长等接洽将近两月，而于最重要之教育基金，尚无切实办法。若长此以往，国何能国？最好指定的款，不作别用，由国务会议通过，正式公布，宣示遐迩，庶免疑虑。至欠薪一节，系教职员分所应得，亦宜从速筹妥，以便恢复原状云云。王氏允将此意代为转答云。

（《晨报》，1921年4月28日）

政府旅行中之教育界消息

昨日（29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在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大讲堂，招待八校校长及辞职教职员代表。除高师校长外，余七校校长均到，教职员代表则八校齐到。首由学生代表陶玄（女高师）起立，述招待校长教职员理由。略谓学生方面，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分为三项。

第一项，八校现在经费数目。第二项，筹足教育基金，基金

未筹足以前，由交通部每月尽先拨付财政部特别协款为八校经常费。第三项，须有切实保证，不能任意停止拨付。对于二、三两项，学生方面业已再上呈文，要求政府速即照办。惟第一项之八校现在开支数目之实在情形，学生方面甚不明了，请校长教职员明白宣示，以便进行。并希对于国务院提示之三条办法，表示态度云云。旋由法专校长王家驹起而说明，略谓八校经费照八年度予算，约175000元。然而实支数目，只有143000元，相差31000元。虽各校情形不同，不能为具体的说明，但可断言均不敷开支，只可忍痛维持现状而已。至于国务院提出之三条办法，同人均表示不满意。盖同人此次运动，系为一劳永逸之计。乃政府所提办法，既不通过阁议，又不为对题的回答，始终惟有敷衍。同人固知在此不良政府之下，而欲求完全安稳的办法是不可能，但亦须求有比较的安稳之办法，方不致国家教育，长在风雨飘摇之中。故校务讨论会方面，将政府提出之第一条办法中“在财政未筹定的款以前”一句改为“在教育基金未筹足以前”，将“由财政部就交通部特别协款每月按期拨付”之句改为“由交通部每月按期尽先拨付财政部特别协款”，并申明“此项特别协款，非至教育基金筹足不得截止”。如此改正，似较政府办法为切实，亦稍稳固。昨日（28日）鄙人以私人资格，往见交通当局之代表，质问交部意向。据云，交部始终情愿协济，惟要求，（一）无论如何，不得打破交通部之特别会计。（二）不能放松财政部，仍须责令财政部负责。校务讨论会对于此二项要求，均已承认。前日已由校务会提出说帖于政府，要求于本星期六（即今日）以前，须有切实的回答。大概政府方面之意见，大体可以表示同意，明日即提出国务会议讨论，结果如何，明日可以知悉云云。次由教职员代表谭熙鸿发言。略谓同人态度，自罢课以来，无日不表示，亦无处不表示。今虽已辞职，然亦仍以国民资格极力进行。同人要求之目的，在于“筹足教育基金，基金未筹足以前，按月由交通部铁路邮电收入项下拨付20万元为八校经常费”。故

政府提示之三条办法，同人不能满意。盖同人所谓的款，与基金性质虽有不同，然其实际则与基金相等。故无论如何，对于教育基金一项，是绝对的不能让步。至于积欠一层，倘政府对于基金之要求，能完全承认，同人未始不可牺牲。但政府始终并无表示，故同人亦惟有力索积欠，不肯牺牲云云。次由陈世璋发言。同人此次运动，希望为最后之一次，不愿以后再有罢课之事发生，故同人坚持非筹足教育基金不可。顾政府始终以敷衍试探之手段，对待同人。同人亦惟有不满意之一法，不能视为实际。故政府未有切实办法表白于世以前，希望诸君不可为政府所欺云云，次由医专学生良铎发言。大意希望校长教职员尽力从速进行。倘八校现状可以维持，希望稍为让步，以便学生等早日上课。学生方面之要求，与校长教职员方面之主张，不俟而合。是可知团体虽有三个，其实即为一个。故学生甚希望以师生之谊，双方极力进行云云。北大学生鄢祥禔亦将此意申明，并希望校长团积极进行，务期早日解决。及希望教职员对于此事，亦有具体的表示。王校长家驹，遂起立言曰，校务讨论会对于此事，已一再申明，必尽心尽力去做。万不至如教育当局之不辞而去，倘至无法维持，亦必将其始末公表于世，藉明责任之所在。诸君尽可放心云云。教职员代表李大钊、马裕藻二人，亦发言曰，教职员现在辞职之中，原不能过问，惟以公民资格视之，亦何忍教育破产，故校长团方面，提出于政府之说帖，要求筹定教育基金。乃基金未筹定以前，不能中断交通部之特别协款之办法，同人亦表示赞成。故若政府能依此而行，并正式经国务会议通过而宣布于世，同人亦必不坚持索欠云云。最后女高师学生陶玄发言曰，综观校长教职员诸位先生之表示，是对于教育经费之必须独立。三方面之意见，业已完全一致。学生闻命之下，不胜欣幸。此后惟希望校长各位先生，对此为猛力进行；教职员诸位先生，亦一致进行，则解决必可期其速。学生等不敏，亦当尽其力量，向政府要求，务必达到目的而后已。惟多劳校长及教职员诸位大驾，请

以师生情谊，略坐闲谈，粗备茶点，藉供谈助云云。于是全体茶会尽欢而散。此已下午四时余矣。

（《晨报》1921年4月30日）

教职员昨讨论复职问题详情

昨日（1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五次临时大会。八校代表全到，主席马叙伦带病出席，仍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一）前日教育部任、陈二司长咨国务院公函来会接洽情形，及与校长非正式接洽情形。（二）本日八校长已正式来函请同人复职。其公函如左：

敬启者。前次贵会宣言辞职，梦麟等曾一再恳切挽留，未蒙允诺，所以未敢□瀆者，诚以当时尚无确切解决之法，自未便贸然请求复职。惟昨由教育部转到国务院第812号公函一件，附国务会议议决办法三条。梦麟等虽未能认为十分满足，第迁延日久，莘莘学子，学业坐荒，至可惋惜。诸公热心教育，素所钦佩，甚愿委曲求全，俯允复职，除抄录原件函致学生联合会外，合将国务院函并所开办法三条，送请查阅，并希格外见谅，允如所请。毋任企祷之至。此致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代表联席会议。5月1日。

报告毕，即将第二问题付讨论。讨论之点，大略分为二层：第一层，国务院之三条办法，同人对于其大体上能否予以承认？第二层，该三条办法，与同人向持宗旨，略有出入，能否表示迁就？工专代表戴济以为，该三条中（一）、（三）两条，均与同人宗旨不符，应请大家注意。北大代表郑寿仁、谭熙鸿均主张大体上可以表示承认，惟须就其条文中，再加以切实的解释，使以后不致发生问题。美术代表徐瑾，对北大代表意见，表明付议。主席乃付表决。表决结果，对于“国务院三条办法，大体可以承认”一层，大多数通过。于是讨论条文中之应注意之点，决定如

下：

(甲) 对于第一条应注意之点：

(一) “未筹有的款及确实保障方法以前”句，其保障方法究竟如何，同人对于此点，政府方面应先得同人之同意，认为的是“确实”始可算无变更。(二) “每月经常临时经费22万元”问题，无论如何最小限度，八校必须照八年度预算支配，每月应拨发八校175000元。(三) “此款由财政、交通、教育三部，订明不作别用”及“尽先拨付”二句，须详细订明三部办理手续并请校长团及本会议参与其事，且须明定每月何日拨发。(四) “俟财政部筹有的款或教育基金筹定时”句，是否与前段相同，亦有“确实保障方法”。

(乙) 对于第二条之注意点：

(一) 此条与八校无大关系，惟可以证明此22万元，系在报部类领款项之外，使八校教育经费无变动之虞。(二) 倘他日八校及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小学校等有扩充必要时，此项经费应仍向教育部领取。

(丙) 对于第三条之注意点：

(一) 积欠问题希望政府一次悉数清还。如万不得已，于可照原条办法办理，惟须三期均分摊还，不得随意多少拨发。(二) 须有银行之确实担保，校长方面与银行均须负责。(三) 4月业已过去，故4月份薪金须即日发给，并同时发欠薪三分之一。

(丁) 国务院秘读〔书〕长郭则法日前在电话中言，“如照国务院所定办法，马上就有款发，否则一个大〔子〕也不给”一语，侮辱教育界太甚。须质问政府，何以出言不逊。并须有明白之答复，向教职员表示歉意。

上项诸款决定后，已下午四时。当请校长到会接晤。除高师校长邓萃英未到外，其余七校长均到。先由教职员代表谭熙鸿发言，将上述甲乙丙丁四款向校长述明，并谓同人对于三条办法大体已表示承认，请校长先行复职，然后详细磋商以后问题。校长

方面，内法专校长王家驹代表发言，对于教职员方面提出之事件，为详细恳切的答复。其大略如左：

(甲) 对于第一项，“保障方法”略云，因“的款”二字，然后发生保障方法。保障二字，虽属抽象名词，然而其的与不的，必须经教育界同人认明，然后可定。诸位不必疑虑，日后必将保障方法之切实办法公诸于世。第二项22万元一层，校长方面当然承认，并当与政府声明。第三项参与订明办法一层，恐不能办到。惟亦必有切实办法请诸位承认。第四项当然包含“有确实保障”意义。此层注重“基金”二字，同人何以声明“筹备基金”与否，必须经教育界之认可，不能听政府方面意见。

(乙) 对于第二条办法，校长方面当然承认，并向郭中声明。

(丙) 对于第三条办法，分三期偿还原非正当办法，校长方面亦认为不妥，惟政府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实无力量一次清还。此层惟有请诸位通融迁就。照第三条认为，有40余万元，其实已发一月，所余只有30余万元。政府既能每月认22万元，则此道过之数，政府自无不能办到之理。惟校长亦曾顾虑及此，诚恐又发生拖欠。故对于银行担保一层，校长团必负完全责任。至于4月份薪金与三分之一欠薪同时拨发一事，昨经教部任、陈二司长言明，此款已有着落，只俟支领而已。故此层自然可以照办。

(丁) 国务院电话侮辱教育界同人，但教职员方面不能默尔而息。即校长方面，亦不能默尔而息。校长当然正式向院质问有无此言。如有此言，须即日道歉。倘无此言，亦须令其声明。王校长回答毕，并申明希望教职员早日复职。谭熙鸿谓，三部订明办法，必须许同人参与。否则亦必须与同人以前主张相差不远。至于挽留同人，同人甚为感佩。惟须请校长先复职等语。王校长答谓，同人之呈文，虽已被退回，然并未允许复职。只要教职员能早日复职，则校长之复职已不成问题。否则不敢复职云云。谭

氏乃再申明国务院侮辱同人电话，非有明白答复不能复职。王校长答言，此层校长当负完全责任。如国务院无明白答复，校长亦不能复职。盖此与教育界之人格有莫大关系，为校长教职员若被如此辱骂，何能作育人材，故此层请诸位放心，必有切实办法等语。于是教职员暂请七校长退席。校长退席后，已下午五时半。乃复开会讨论。盖以校长方面如此殷勤劝同人复职，非今日有具体的答复不可。惟复职问题，与国务院侮辱问题，有密切关系，非政府对于同人完全表示歉忱，同人实无颜再执教鞭。且取消总辞职与恢复职务问题，不能混为一事。取消总辞职而恢复职务一层亦须另议办法。〔于〕是决定对于积欠问题，完全听凭校长同负责两法，同人不必争执侮辱问题必国务院正式道歉方能取消总辞职。议毕、复于六时请各校长列席。当将上项议决向校长团表明，校长团当即允于明日下午四时以前，向国务院请问，有相当之回答。并定于今日（2日）下午四时，仍到联席会议为二次之会谈。散会时已六时半矣。并闻联席会议定于今日（2日）下午二时，再开会议讨论云。

（《晨报》，1921年5月2日）

教育经费不解决中之解决

昨日（2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五次常会。八校代表俱到。主席马叙伦仍带病出席，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昨日（1日）（2日）与校长接洽结果。今日（2日）（日）午后三时至四时之间，必有正式答复。随将北大孟树（寿）椿及法专宁协万二人分议本会议事项付讨论。盖以二人之提议，有共同之要点，须就共同之点及本会现在状态能讨论之点尽先讨论。于是由北大谭熙鸿提出赞成该二人提议。“定5月1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之案，美术徐瑾、高师马裕藻付议，即时无讨论全体通过。次讨论留职问题。盖谓校务讨论会未有正式答复以前，

宜以“假定该答复为满意”为条件，然后能讨论留职问题。主席即以此条件为前提，将文书组予拟之《留职宣言》付诸讨论。字句间略有修正，随即一致赞成通过。次复讨论“各校自开教职员大会问题”。美术代表徐瑾提议于星期三（4日）以前，各校召集教职员开大会，报告一切经过及以后办法。讨论结果，定于星期三日上午十二时以前，各校可自由开会。并即商妥开会时应行报告之问题。（一）一切经过；（二）注重经常费及确实保障方法原由；（三）总辞职及留职之始末；（四）恢复职务问题。议毕，已四时。当有七校校长（高师校长未到）及教育部司长任鸿雋、陈宝泉二人来会。先由法专校长王家驹代表校长团发言，略谓：（一）昨日接洽事项。对于即发四月份应发三分一欠薪一层，校长团可负完全责任。该款已确有着落，支票亦已备好，惟因内阁阁员大半已赴天津，而财政次长亦已赴津，致无人签字，手续上尚未完备。但可保于最短时间内，将欠薪发出。（二）国务院侮辱问题。今日上午已到教育部质问，当由任、陈二司长负责接洽。现任、陈二司长在座，请当面报告云云。任鸿雋发言曰，今日因郭秘书长须下午三点以后始有余暇，故在电话中与郭氏交语。据云，彼始终未尝出此言。当日仅云“教职员如能准照国务院办法，则款有法可筹。否则无法可筹。”且当日此言，系由陈任中代达云云。而据陈氏言，彼当日在院，因事忙无暇打电话，故令院中听差代达，致有此种错误。心中甚觉抱歉。郭氏亦言抱歉实甚。今证以郭、陈二氏之言及当日接电话之徐鸿宝秘书之语，可知全是听差传语之误。现在陈秘书及郭秘书长托鸿雋与陈司长亲到贵会表明歉忱，幸希恕谅等语。北大谭熙鸿及高（师）马裕藻均谓此等重要问题，陈氏竟令听差传达，实非慎重国政之道。且当日徐鸿宝对代表等声明，此电话确系陈任中所讲，今乃以听差相搪塞，代表等认为不得要领。应令陈任中本人亲到本会，当众声明。陈司长宝泉言曰，误传电话，郭、陈均已认错，希望诸位视为枝节问题，放开大量，容恕为幸云云。王校长亦代

任陈二氏说项。北大王星拱乃提出折衷办法，请二司长要求陈任中以书面道歉。任、陈已允。于是请二司长、各校长暂时退席，再开会讨论。（一）对于道歉问题。现郭则沅推在陈任中身上，应令陈任中以正式公函表示歉忱，并宜申明所以不能亲到本会道歉及托二司长代为道歉之理由。（二）对于四月份应摊还欠薪之三分之一，限校长团于明日（即今日）起，三日之内发出。以上二项均一致通过。随请二司长及七校长复席。由谭熙鸿代表述明上次二条办法。王家驹代表校长团，完全允许于三日内发四月份应摊还三分之一欠薪，并再申明希望早行复职。陈司长亦概允令陈任中以公函道歉，并请各代表稍候即有回话云云。时已下午五时矣。至六时余，任、陈二司长将陈任中道歉公函送到，于是复开会讨论。金以同人复职条件，已完全达到要求目的，自宜早行宣言留职。于是一致决定将本日假定通过之《留职宣言》即日发表，并决定对于校务讨论会一日来函要求复职之事，与以正式答复。随由文书组起草，当众朗诵一遍，略有修正，亦全体一致通过。于是乎扰攘月余之教育风潮，完全解决矣。兹将教育部首席秘书陈任中道歉公函及复校务讨论会事与《留职宣言》照录于后。（略）

（《晨报》，1921年5月3日）

北大教职员捐俸建筑图书馆

昨天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召集各该校同事，报告罢工以来经过及宣言复职情形。北京大学因校舍被人纵火，守卫甚为严密，故特假美术学校大礼堂开会。因天下大雨，到会者共五十余人。代表李大钊、谭熙鸿二教授将罢工后经过详情，一一当众报告。后由徐宝璜提议，该校教职员对于该二代表之奔走和措施，当加以感谢及追认，众赞成，遂一致道谢。次由代理校长蒋梦麟报告校中失火情形，谓失火以后，由在校职员组织委员会日夜轮流守卫，全体教职员理应表示感谢，并于复职后分任仔肩。

全体赞成。次由胡适教授提议，“校中此次出险，幸立时设法扑灭，未至成灾。事后又由在校职员组织委员会分别守卫，故无发生意外之虑。但此种举动，究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北大图书馆关系何等重大，非特数十年来购藏中西书籍为值甚钜，即论开学以来之公文案卷，学生成绩，关系亦属非轻，倘一旦付之一炬，损失之大，何堪设想。此次教职员罢工运动，早已一再宣言，系为维持教育，不为个人私利，本校教职员对于本校有深切肺腑之关系，对于最重要之图书馆，自然同有维护之责。所以我提议，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请今日到会诸君发起，将本校教职员本年4月份罢工期内应得薪俸，凡每人每月在60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筑建费。其每月薪俸在60元以下者，自由捐助。此款由北大会计课分四个月摊发，存储银行，作建筑图书馆之用。次议案由今日在会同人发起以后，持往各教职员传观，并请赞成者签名。”当时在场教职员全体赞成，惟对于办法上稍有讨论。马裕藻主张，“薪俸在60元以下者只能自由捐助。”结果将60元之限制打破，无论60元以上或以下之薪俸，经多数赞成通过以后，均捐作图书馆建筑费。众赞成，散会已七时矣。

（《晨报》1921年5月4日）

下星期一各校上课有希望

本月3号，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在本月4号上午十二时以前，各校须开一全体大会，经志前报，兹闻医学校即于4号上午九时，开全体大会，由葛竹书教授主席。先报告在联席会议中经过情形，次对于国务院所提出之三条办法，详细讨论。结果，在第一条中之“此款由财政、交通、教育三部订明不作别用”之句，认为极重〔要〕，必在复职上课前，先行订妥。但现在教育部无总次长，此项正式公文，恐难办到，若必俟有正式公文，然后上课，恐非一、二星期内所能解决，拟要求教育部与交通、财政两部，暂订一种草约，订妥即行上课。至于正式公文，俟各总长

确定后补行之云云。

又昨日（4日）上午十时半，北京美术学校教职员全体，在前京畿道本校开会。首由该校教职员代表徐瑾报告，自3月14日停职与七校取一致行动以来，至4月8日总辞职，迄于本月3日宣言留职之经过情形及总辞职与留职之便宜行事原因，与夫此次联席会议团体，自始至终，坚持预定宗旨进行，毫不受外间影响之精神，及该校所以少发一月欠薪之理由。报告后复将（一）联席会议议决，以5月1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拟不日开八校教职员恳亲大会。（二）此次八校联席会议，八校代表有拟改为永久机关之议。（三）留职以后，对于上课之期日应如何定夺等三事，咨询全体意见。经详细讨论结果，对于（一）开恳亲大会，一致赞成。（二）改现在之联席会议为永久机关，亦一致赞成。以上二项之详细办法，均由代表在联席会议酌量办理。（三）上课期日，务以速为妙，决定在联席会议席上，由该校代表申明该校希望，至迟于下星期一（9日）上课。最后该校代表吴起凡、孙毓俊、徐瑾三人欲于此事办理完毕后，请另举代表出席八校永久机关，全体教职员均不赞成。乃决定此次八校永久机关成立后，即以现在之代表为本校代表，至于代表之权限，俟机关成立由该机关定出办法再议，此时乃付代表以便宜行事全权。比复对于吴、孔、徐三代表此次争教育经费之劳绩，极力表示感激之意。散会时，已午后一点矣。又昨日（4日）下午二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第二十六次常会。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先由法专王兆荣、医专葛成勋、美术徐瑾、女高师李贻燕、高师何炳松、农专毛恩旭、北大谭熙鸿、工专戴济等八代表，各将前昨两日各在本校开教职员会情形，详细报告一番，大意相同，均主张速将确实保障方法办妥，并希望能于下星期六（一）（9日）上课。主席乃将此事付讨论，经详细讨论结果，约略决定办法六条。至下午四时，各校长（高师校长未到）集会，乃由谭熙鸿代表发言，要求校长方面，速照代表办法办理。王家驹代表校务讨

论会发言，略谓校长方面对政府已有二种表示：（一）正式呈文，（二）公函。呈文中要求速将三部订明不作别用之办法订好宣示，及请指定担保之银行；公函则质问预算问题及的款问题。至于教职员方面提出办法，自当尽力做去。如至彼时不能解决，校长方面当负完全责任办理，总希望早日上课云云。教职员对于此事，亦已表示同意，大约下星期一，准可上课矣。

（《晨报》1921年5月6日）

教育经费问题忽生变化

昨日（6日）上（下）午二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开第二十七次常会。主席马叙伦乃请假，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宣告开会后，北大王绍瀛提议，于上课之前，必须将经费之确实保障方法办妥，然后不致将来发生危险，并提出上课条件，（一）须与校长团严重交涉，使其催促政府速将三部订明不作别用办法，拟好公布，若谓各部尚无长官，不能完全决定，亦须将此办法拟成草案，声明俟长官到部后，即照此办理。（二）须由政府与国家银行以权利[力]，并由银行声明，允为担保每月经费22万元，必能如期发出。（三）倘此不能办到，最少限度亦必须将4月份经费及4月份应摊还之积欠发出。美术徐瑾、高师马裕藻二人，均主张不可以第三条为上课条件，盖4月份薪金□□虽可如教职员要求拨发□□诚恐五月以后不能照办，彼时反生许多枝节，不如以（一）、（二）两条为交换条件比较确实。因同人此次运动，费如许之力，月余之光阴，始得稍能满足之结果，若政府并此不能照行，不特同人之运动终归泡影，而且必受外界之指摘也。最后对于银行担保一层，曾讨细详论〔详细讨论〕，并略有办法，至三时半停会，约校长会商。适校长以经费问题，尚无具体办法，同赴教育部交涉未回，直至四时半始来会，高师校长仍未到，当由法专校长王家驹代表校务讨论会发言，谓教育部已有函来，函云，敬

启者，承询各件，敬悉。第一次原定22万元，大致足敷分配，如或不足，对于专门以上八校，自应按照八年度预算尽先分配。设或有余，应俟本部长官到部后，由敝处等，陈请拨归八校。第二项，此条前次公同拟定，经国务会议通过，后半所谓筹得之的款，原系承接上文，指有确实保障方法之的款而言，今晨各位校长到部，询及日昨所上本部公呈，作何办理。按银行担保欠薪一项，当经陈秘书代询国务院云，正在接洽，指定后，即行通知。第三项，三部订明保管不作别用办法，亦经任、陈二司长代询国务院云，此层国务会议业经声明，至将来办法，应俟教育长官确定时，再与财交两部会商云云。案教育长官现时既未到部，秘书司长等为官制官规所限，实属无能为力，惟有请俟本部长官到部时，再由诸位先生商同办理。至其他面谈条件，均经当面陈明，兹不复赘。此致校务讨论会诸位校长先生。教育部秘书处普通司专门司同启。5月5日。至于4月份经费及4月份应摊还三分之一欠薪，支票虽有，然期限是5月20日始可支钱，故八校领到之期，至速亦须5月21日，此层似乎难办云云。旋由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报告关于支票失信之事，略谓昨日（5日）鄙人到联席会议报告，支票业已领到，4月份经费22万元之支票，亦已领到，即日可发云云，系根据教部秘书陈任中之言，谓星期四领到支票，星期五必可发出，及至昨晚（5日），忽言支票虽领到，而领款之期不能在20日以前，本日到教部催问，陈任中及任司长均不在部，会计科长由国务院归来，只言有财政部之“支付命令书”，支票尚未签字，并言财部无论如何，不能于5月15日以前发出，鄙人以此事关于信用问题，曾极力交涉，均无办法，只得将此情形，报告于诸位，盖非鄙人愿意说谎，是政府无信用所致，希望诸位格外原谅云云。代表等事关重大，乃请校长暂退，复开会讨论。金以此事于前途有莫大关系，不可不从详研究。且4月份经费22万元，系由交通部拨付财政部者，交部是否照拨，抑财政部有移作别用情事，同人均不得而知。惟第一次已经

失信，而以财政部之“支付命令”搪塞，支票未签字，即等于无，同人若苟且敷衍，实无以对同事，亦无以对天下。于是决定：4月份经费及4月份应摊还积欠，限期于下星期二（10日）全数发清，而确实保障方法，亦须妥定，方能上课，否则同人惟有再行总辞职，以谢天下。随请各校长复席，当将上项决议，向校长声明。校长方面，惟有允为尽力办去而已。校长等退席后，已下午五时半，于是复开会讨论今后对付方针。经详细讨论结果，决定办法四项，非政府完全办到，必不再与政府苟且敷衍面子，兹将其四项办法照录于下（前附致校务讨论会公函）。

迳启者，本月4日曾由敝会议拟定保障方法办法六条送上，当蒙审阅。现以有应行修正之处，复改拟办法四条奉陈，希望察照，前拟之办法六条，即行撤消，并此声明。此上校务讨论会。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5月6日。

《本会议附订保障方法四条》

一、交通部自四月份起，每月拨付财政部特别协款充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大学暨公立中小学校经费22万元，须先拨存国家银行，一面咨明财政部，财政部接到交通部前项咨文，即日咨达教育部，教育部接到财政部前项咨文，即日送达支付书于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大学，暨京师学务局。二、教育部于每月15日止，未接到财政部前项咨文，应即咨行财政部转咨文交通部，促其于三日内，履行附则第一条办法。三、财政部筹有上列各校经费的款，及拟定确实保障方法，或筹足教育基金时，须先咨行教育部，转令上列各校，俟得同意后，交通部方得截止拨付前项特别协款。四、交通部或财政部，须指定价值200万元以上之担保品，征得国家银行之同意，以备交通部如届附则第三条规定期限，不能履行付款时，即提出该担保品于国家银行，由银行暂照前项办法第一条额定数目垫付，限期由交通部拨还。

（《晨报》，1921年5月7日）

五里雾中之教育经费问题

昨日（10日）下午三时，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临时会，八校代表均到，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当即报告八校校长原定本日来会，切实答复，现在只来一函，声明无从接洽情形，旋付诸讨论，金以校长从前既愿完全担保发还三分一积欠，现忽自食前言，又4月份经费亦系校长自身愿极力催促之事，今乃仅以无从接洽一语答复，是否可以如此解释？于是一致决定于今日（11日）午后二时，约各校长谈话，并催索积欠。散会时已四时半矣。兹将各校长来函，照录如左。

敬启者，上星期五敝会同会出席贵会，属将4月份应摊还之积欠并4月份经费，迅与政府接洽，尽本星期二以前如数发出。当即赴部要求，以部中主持乏人，未有结果。昨日午后拟再前往磋商，先行电部要约，据回电称，普通、专门二司长均因病不克到部，首席秘书陈君，亦赴津未回。旋又电约总理当面商榷，嗣得复电，谓连日三使在京，公务忙迫，不暇接待，一有机会再行邀请谈话云云。似此情形，委系无从接洽，为此据实函达，即希鉴谅为荷。此致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校务讨论会谨启。5月10日。

（《晨报》，1921年5月11日）

昨日教职员与校长之谈话会

昨日午后二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第二十八次常会，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昨日校务讨论会来函及本日约八校校长于三时来本会议谈话情形毕，无甚讨论，即请八校校长到会列席。八校校长均到，当由本会议代理主席，提出（一）4月份应摊还积欠，系诸位校长之责任，4月份经费亦是同人留职后政府应履行之条件，何以昨日来函，竟称同人等所属办的事件。（二）保障方法，昨函并未提及，到底如何？

(三) 昨函称无从接洽一事，今日到底有政府否？质问各校长。校长团方面仍由法专王校长代表发言，略称4月份应摊还积欠，须于诸位留职以前发还，系同人等完全担保。而4月份经费，于留职以后应当发出，亦经同人等与教部任、陈二司长及陈秘书声明，彼等均谓已有着落，惟因4月份数目与前此不同，正在会计科核算云。不料教部欺骗同人，至于此极，〔同〕人等实为抱歉。现国务院以三使在京，教育部以陈秘书赴津，任、陈二司长均抱病，总理门禁，又异常森严，贸然往见，必遭拒绝，不过稍延数日，总有可以会见政府当局之一日，万一再做不到，惟有引责辞职而已。至于政府欺骗同人，致同人等失信于教职员诸位，将来亦应当向总理声明。支票一层，前曾与陈秘书提及，何以要5月20日以后？陈云，因财部言交部协款现尚未交来，非20日以后，不能拨款。同人等以为能将支票先期领出，或可以再与诸位商酌。陈云，此事已向过郭秘书长，以总理不在京时，彼不敢负责签字，今总理在京，彼又言非总理亲自签字不可，以致并支票亦不能领出。同人等受政府欺骗，及事实上做不到之处，应请诸位原谅云云。次由代表等向校长等声明，此次失信之事，同人等亦不愿苛责诸位，不过诸位于接受政府提出之三项办法时，关于银行担保及三部订明办法。即应先向政府交涉清楚，然后再挽留同人，而诸位校长当日并未注意及此，所以有受政府欺骗之结果，以后幸勿再蹈此复辙，致同人等不能再为诸位谅〔解〕，且诸位校长职责尚在，应迅图〔谋〕解决方法，以免旷延时日云云。校长等唯唯而出，即赴教育部矣。

(《晨报》，1921年5月12日)

学潮将又起一波

昨日(13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席联(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九次大会。八校代表均到，主席马叙伦仍因病请假，由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本日来函本会议，请同人于明日(即

今日)上午八点,到石驸马大街女子高师该会事务所开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针,究应如何答复。闻校长团方面对于该会来函,已表示到会,似乎本会亦应到会方为妥当。经讨论结果,曾以学生方面,既有协力进行主意,同人自须到会。于是一致决定到会。此事讨论毕,当有校长团来会,为非正式的报告,略以本日校长团曾晋靳总理于其私宅,靳以秘书翁庆民出见,校长将要求政府早日解决之情形,详为陈述,翁代靳答言,准今日(14日),有确实复金云云。代表等以既然如此,自应静待其正式答复后,再议其他事件。当由北大代表谭熙鸿提议,政府既如此欺骗同人,同人宜有最后之对付方法,日前略为决定之二次辞职宣言,可否提前讨论发表。金以政潮起伏无定,同人前已决定暂持冷静态度,似不宜过于急促。而且各校亦有应先征求全体教职员意见之必要。于是决定于今日下午三时,开临时会议,先请各校长到会报告靳总理正式之结果后,视其回答程度如何及有无诚意,然后再议全体二次辞职与否之问题,较为妥当。全体均无异议,遂约校长团于今日下午三日(时)来会会谈而散。时已下午五时半矣。又闻美术学校及其余各校代表,均定于今日(14日)上午十一时,在本校召集全体教职员讨论二次辞职与否问题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诚非国家之好现象也。

又自政府坐视八校学子失学之后,各地来电□请维持者,连篇累牍,政府充耳若不闻,迄无维持之诚意,日昨南通张季直先生来电,申请政府确定教育基金,原文附金如下,国民均受其殃,其中尤以教育一途,影响最大,盖中央地方,军书旁午,财政艰窘,纵有维持教育之意,力亦不及。日来复因经费难筹,各处均有罢课之举。蹇衰病残生,对于政府久不过问,徒以此事关系国家百年树人之大计,不得默尔不言。此项教育基金,急难确定,请专由交通项下筹款划拨,以立永久之基础。若所得税则宜暂勿推行,以苏民困而维商业云云。

(《晨报》,1921年5月14日)

愈趋愈远之学潮

昨日（14日）上午九时，八校学生联席会约校长教职员在女高师开联席会，举法专王校长主席。首由学生方面提出校长教职员学生三团体联合往国务院，要求政府早日解决。校长方面因（一）地位不同；（二）本日政府约定答复，宜视其答复如何再定进止。惟对于学生之主张，亦表同意。教职员方面亦与各校长之主张略同，惟学生持之甚力，议至十二时，卒无何等结果而散。下午三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临时会议，主席马叙伦仍病假，由李大钊代理主席。首先报告代表等本日上午出席学生联席会情形，次由某君提议，范静生氏有回长教育部消息，范氏对于此次教育经费根本问题，同人等苦心孤诣，百方运动，范既不负责代同人进行，且令参事蒋维乔发表侮辱同人等人格之言论，散见于京沪汉各报，同人等实难缄默。经详细讨论，结果议决由本会议发函警告，并议决例案数起。时已下午四时半，八校校长乃来会（惟医专校长未到）。仍由法专校长王家驹代表校长团发言，略谓教育部因任、陈二司长病重，连陈任中秘书亦不知去向。前据陈秘书言，款已备妥，且已问过郭则沅秘书长，据云确已有款。今陈既不知去向，无从当面证明。又云，昨日（14日）往见国务总理，总理派翁广（庆）民代见，同人等即请其三部订明保障办法，银行担保及四月份经费暨积欠等条件，转呈总理，总理能亲自接见更好，否则亦当具体以文字答复，后翁秘书约同人等于本日（15日）午后答复，但至现在尚未见有电话来，故同人无话可以对教职员说述。惟此事无论如何政府亦须答复。并对于政府提出之三条办法，因事前采询任、陈二司长及陈秘书，均言“可靠”，故同人极力担保，而亦愿为担保，此无非委曲求全之意。不料政府如此失信，今又误答复之期，同人疏忽之罪，尚希教职员原谅云云。代表等以事既至此，即令责校长，亦无办法，于是请校长退

席。金以俟今日或明日再听校长之回答，然后决定本会议之态度。散会时已五时半。

(《晨报》，1921年5月15日)

不可收拾之学潮

教育经费问题，因受政潮所鼓荡，延宕至今，迄未解决。内閣改组成立后，一般人庆幸负责有人，学潮旦夕当可平息，即日上课。不意轩然大波又忽涌起，校长团竟又不得已而提出第二次总辞职。兹觅得其上府院部辞呈及宣言书二通，录之如左。(一)上府院部辞呈(下略)(二)辞职宣言书(下略)

又昨日(16日)下午一时，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第三十次常会，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范静生复函，及校务讨论会迄今日尚未答复，应如何对付。金以政府对于同人等屡次失信，已迁延至今，万不能再听其延误。于是一致决定向政府声明，限期于本月20日止，须将国务会议决定之三条办法，及拨付将来经费之保障方法，完全办妥，切实履行。并即推定起草员即日起草，其原文俟明日续志。

(《晨报》，1921年5月17日)

校长团辞职后之教职员态度

教育经费问题，自政府二次失信后，从前教职员及学生之运动，已完全失败。各校长因受各方面之指摘，业于前日全体二次辞职。教职员方面因事关重大，于昨日(17日)上午十时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召集紧急会议。八校代表均到，主席马叙伦仍因病缺席，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校务讨论会来函称，业于16日呈请辞职，本日形势已大变，昨日(16)本会议议决向政府声明于20日以前须完全解决之议案，应有修正之必要。讨论经二小时之久，金以政府漠视教育，至于此极，目前国务会议议决之三条办法，并非同人强其通过，系出于政府自身之意。

同人为委曲求全，虽不能认为满意，然亦谅政府苦衷，于5月3日宣言留职。不料政府自定之办法，尚不能履行，屡以搪塞手段欺骗同人，并轻视教育。而八校校长又以连日奔走无效，且被拒于国务院之卫兵，迫而辞职，此后教育界，当愈不堪问。若同人无切实办法，公诸于世，诚恐国人误认同人多事。于是一致决定直接向政府明白表示无法维持之意，上书政府限至本月20日上午12时止，须将国务会议所议决之三条办法，及拨付将来经费之保障方法，以及四月份五月份之经费与应摊还之积欠等问题，为完满解决。如届期不能解决，仍以延宕手段对付同人，同人等则视政府已无维持教育之诚意，取消5月3日宣言暂允留职之原议。孰是孰非，惟听国民公判。一方面八校应于三日以内，各召集全体教职员开临时大会，将经过始末情形，报告全体，及筹商进行各要件。随即推定起草员，即日起上政府书而散，时已下午一时半矣。

（《晨报》，1921年5月18日）

教育经费问题解决无望矣

昨日（20日）下午三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大会，仍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首先报告（一）高师发言代表何炳松、刘玉峰因病不能出席，请张贻惠代理出席。（二）美术学校加推李祖鸿为代表，女高师加推焦占峰为代表，均有发言权，于本日起出席。

（三）法专教职员会来函，报告毕，即由各校代表分别报告各该校开临时大会情形。（一）女高师李贻燕报告曰，本校开会，全体教职员承认本会议所办理一切事件，毫无异议。（二）医专葛成勋报告曰，本校开会，对于本会议所办理事件完全承认。并申明倘政府必须解散八校，可与西南大学取一致行动。（三）高师马裕藻报告曰，本校开会，承认界代表以全权，惟申明能不辞职即不辞职。至于外间所传，绝非事实。若至万不得已，亦全体辞职。（四）工专许绳祖报告曰，本校教职员态度，与高师完全相

同。（五）美术吴起凡报告曰，本校开会，完全承认本会议行动。以后进行，惟以多数为从违。（六）农专梁希报告曰，本校教职员，对于本会议，毫无异言，惟至政府解散学校时，希望全体教职员，不再入新校，藉维人格。（七）北大谭熙鸿报告曰，本校昨假美术学校开会，因人数不足，只开谈话会。惟代表有全权，且是日各教职员亦报信任代表，故本会议行动，当然从多数一致进行云云。报告毕，即由马叙伦发言略谓，本日十二点，政府答复期限已至，尚无正式答复。本席会于午前到教育部，见有国务院致教育部第961号公函，兹已抄来，请大家一看。查该函所言，直不啻推翻前次阁议议决之三条办法。同人要求是保障方法及应发经费积欠等，该函所言，文不合题，应请大家注意。旋由李贻燕报告云，顷接八校毕业生同学会电话，本日下午，该会已开临时会议，对于国务院第961号公函，一致认为不满意，已决定驳复，并定下星期一派代表到国务院请愿云云。主席乃将此函付讨论。余以政府答复，既未正式送交本会议，本会议只能认为一种传说，以非公式的讨论。且政府至此，不特不自悟其非，反推翻自己议定之办法，对于同人要求之保障方法，竟一字不提，是政府已毫无诚意，同人惟有履行十八日宣言，为第二次总辞职。于是决定于今日（21日）下午一时开临时会议，公决最后方针，并将公函附以驳复，于本日发号外通知全体同人。其第二次总辞职宣言，即由文书组起草，今日（21日）提出讨论。散会时已四时矣。兹将国务院致教育部公函第961号，照录如左。

迳启者，京师高等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前经议决办法，原为维持各校尅日开课，以免诸生旷候事业。兹经国务会议议决，以该八校迄未开课，所有八校教员薪费，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议，储款以待。俟该各校实行开课，再行照发。至从前积欠经费，仍照原议分月陆续发给。其中小各校经费，现均照常上课，其经费自应仍由部按期拨发，等因。除分函外，相应函达，即希贵部查照办理。此致教育部，中华民国10年5月19日。

又北京专门以上各校毕业生代表联席会议，昨日下午一时，复在高等师范开会，各校到者十余人。首由主席林君报告日前赴谒府院及教职员学生各方面接洽最近情形，嗣即征询此后援助之办法。经各代表详细讨论，议决数事如下：（一）本会议决请政府迅速履行前次阁议三项办法为主旨，不涉其他枝节问题。（二）推定代表与八校学生代表及教职员接洽，说明学生与教职员有团结一气必要之理由，并须着眼经费问题，不可因其他细故，致生误会。当经推定代表三人，于今日下午前去接洽。（三）据5月19日国务院复教职员公函，殊属轻视教育，故意延宕，拟向政府质问。当即推定起草员，并定23日再去府院请愿。一俟与学生、教职员、政府各方面接洽后，再定第二步进行办法，以期达到恢复母校之目的云。

（《晨报》，1921年5月21日）

再度辞职后教育界之会议声

昨日（28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第三十六次会议。八校代表全到，马叙伦主席。报告北大前日（27）开本校全体教职员会，议决对于大会提议之十二条事件：（一）代表联席会议继续存在。（二）联席会议所办之事，除催索积欠外，仍应照最初目的积极进行。（三）代表仍旧。（四）代表仍旧付与全权，并绝对信任。（五）追索积欠问题，加推周同焯、胡春林、沈士远、陈怀、胡鸣盛、高一涵、徐之杰、朱锡龄、马衡、杨震文、吴梅、梁展章、徐宝璜、丁绪贤等十四人帮同全权代表办理一切。（六）因联席会议既仍旧存在，则此条不成问题。（七）如最初目的不能达到，当然不受政府延聘。其余数条，因时间短促，未及讨论。惟另有议案，当于他日提出云云。次由高师代表张贻惠报告该校开会情形。前四条议决与北大相同。第五条为追索积欠，加推代表之事，加推李运勋、陆费执、熊遂、钟道赞、汪懋祖、张贻同、林励儒等

七人，惟不限于索欠。第七条亦赞成，惟申明不以法律的拘束限制而已。其余各条亦有讨论，可待他日详细提出云云。次由美术代表徐瑾报告。次由法专代表王兆荣报告该校教职员议决，对于第二条除索欠外，在各校长承认教职员总辞职以前仍照最初目的进行。第四条则决定在第二条目的范围以内有全权。至办理索欠，无加推代表之必要云云。次由医专朱其辉报告云，前四条亦与北大相同，惟认为无加推代表帮同索欠之必要。若至有需要时，则由全体教职员出席。并另推秦彬、高公遂二人为代表，出席联席会议云云。次由工专许绳祖报告云，前六条与北大意见全同。惟对于第五条加派代表之事，暂不实行，俟有必要时，然后继续推定云云。次由农专梁希报告，前四条亦与北大相同，惟加推万声扬、胡宗灏、赵济舟、杨景辉、胡继曾、唐廷秩、钟毅、尹炎午、曾沂、吴景澄、陈懋、周建侯、杨学恺、张凤魁等十四人，帮同代表索欠云云。次由女高师李贻燕报告，前四条亦与各校同，惟加推孙庆霖、刘汉卿二人为代表。孙庆霖、刘汉卿、祁尧焕、杨埧、黄壬宾、佟双润、黄德润、梁栋选、陈奠球、曹治等十人，为帮同办理索欠云云。报告毕，主席云，八校之议决，对于联席会议，既一致认为有存在之必要，则本会当然存在。而对于第七条以下之六问题，各认为可于将来讨论，自宜改日再议。惟欲加推副主席一人，并即投票选举，北大代表谭熙鸿得票多数，当选为副主席。次由主席报告，因文牍组事件太烦，干事不敷担任，已加派黄文弼、黄节、陈怀、胡鸣盛、沈士远五人为文牍组干事。半周刊之编辑，除李大钊为总编辑外，派黄文弼、孟寿椿、李翼庭、谭熙鸿、谷源瑞、胡鸣盛六人，分任其事，并希望八校各派一人为编辑云云。旋对于扩充出席代表之发言权问题，有所讨论，彼时议论极多，有主张依旧各校三权者，有主张扩充为各校五权者，有主张一人为固定出席，其余二人可轮流出席者。讨论结果，仍照旧日规定，发言权代表各校仍为三人，惟每次会议，至少须有一人以上之代表出席。散会时已下午四时半

矣。

(《晨报》1921年5月29日)

教职员连日索欠之情形

前日教职员在部索欠薪，下午六时以前之情形已如上述。是祖(日)代表等分为三团，分头往陈宝泉、任鸿雋两司长及陈任中密(秘)书私宅请他们三人明日九时到部，并交涉许久至十二时而散。

又昨日十时，教职员等代表五十余人，又赴教育部索欠。由该部庶务科派员在西花厅招待。普通司长陈宝泉、专门司长任鸿雋出而接见。教职员中马叙伦、李大钊、谭熙鸿等，相继发言，陈述索欠之理由，并质问国务院究竟有无具体之办法。任、陈等均以教育当局业已发表为词，不肯为负责之答复。双方辩论甚久，不得要领。唯是日陈任中又负约不到部，教职员代表与陈、任两司长到陈宅，时陈任中适坐车中要走。代表等阻之。陈任中出言不逊，代表等力请下车。陈不得已下车，代表又请其到部，并责其何以出言不逊。陈不得已，跪地叩首谢罪。

旋有陈老夫人，陈老太太等出来问他儿子怎么样，丈夫怎么样，陈即退入内室，令许多儿辈出来，大发雷霆。陈氏旋又由内宅出见，言实在要辞职。因次长未来、部中不能叫我去。司长亦不能指挥我。非总次长到后，我必不到部。云云。

至下午一时，司长乃请代表在部午膳。至下午四时，任、陈二司长来言，本日实无办法。请诸位暂回，俟明日马次长到部再商。马次长既敢到部，自有善法云云。代表等答言，同人到部，并不与马次长相干。如要同人回去，请诸位在同人等前宣誓。不管次长到与不到，限一日或二日，将积欠之事办妥乃可。任、陈不允，惟云须部中全体负责乃可。可否由诸位请各参事司长全到此处，当众负责。于是医专代表往请参事汤中，女高师及法专代表往请社会司司长高步瀛，工专代表往请参事邓萃英，高师代表

往请参事秦秘，北大代表往请参事蒋维乔。一面徐鸿宝泌（秘）书饬庶务科预备晚膳十桌。此昨日下午五时之情形也。

（《晨报》，1921年6月1日）

挨打后教职员学生之文告

（一）八校教职员呈国务院文

呈为国务院卫兵殴伤校长、教职员、学生，据实呈报事。窃校长等因京师教育问题，久悬未决，无法应付，叠呈请辞职，未蒙允准，昨日午后赴部晋谒次长请示办法。适各校教职员学生等亦先后到部，校长等以教职员学生之要求，随同次长齐赴新华门请见总统、总理。甫至辕门，守卫兵士拒不许入，继则用枪柄殴击，家驹被挤，昏晕倒地不省人事，馘脚头部被击重伤血流如注，教职员学生等受重伤者十余人，当经检查厅派员验明在案。查人民请愿载在约法，卫兵如此横暴，实属目无法纪，若不严行惩办，置国法于何地。况教育为立国根本，如此摧残士子，必致动摇国本。校长等目击身受，据实上陈。至此后续行政，实在无法维持，更无力负此重大责任，请即日批准辞职，并迅予派员接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大总统国务总理。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北京高等师范校长邓萃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校长熊崇煦、北京法政专门校长王家驹、北京医学专门校长张馘卿、北京农业专门校长吴宗棫、北京工业专门校长俞同奎、北京美术学校校长郑锦。

（二）八校教职员通电

上海时事新报、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时报、神州日报、新申报、及各报馆转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江苏教育会、各省教育会、各学校、商会、省议会、各团体鉴：

政府摧残教育，停给经费，同人等万不得已，罢课辞职，向政府力争，奔走呼号，心力交瘁，此两月以来之事，已为国人所

共见共闻。本月2日，京师公立小学以上学校男女学生代表二十余人赴国务院请愿读书，并请见总理。乃总理不惟不见，反闭之院内，绝其饮食，冻其体肤。同人等为维持国家教育及援救在院三学生代表计，于3日下午，全体赴教育部交涉，而京师公立小学以上学校男女学生，先期不约而至者近千人，同人等乃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率领专门以上八校校长及公立小学以上男女学生暨同人等赴府请愿面见总统。不图甫至新华门铁栏外，即横遭卫兵百人毒打，枪柄刺刀，一齐交下，头面刺破，脏腹受伤者不计其数。马邻翼头部首遭卫兵枪击，医专代理校长张焕文、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高师教授黄人望、张贻惠、女高师教授汤臻真、职员刘兴炎、医专教授毛咸、工专教授许绳祖；学生中：法专何玉书、美术封挺楷、女高师王本仪、陈激、梁惠珍、刘因民、赵林书等受伤尤重；女高师附中女生及附小女生被枪柄击伤，仓卒间由卫生队保送回家调养者，尚有多人。卫兵等用枪击伤多人后，复将其余诸人包围在新华门前大街上，行动全失自由，等于俘虏，同人等困于雨中者有三小时之久，始被驱散。迨至下午八时，院中复令卫兵数十人先将二日闭在院中之医专学生代表梁铎捕去，不知下落，更不知如何处置。后复将其余之男女学生代表轰出院外。如此情形，实足为政府自暴其破坏教育，摧残民权之铁证。日本人所不敢施于朝鲜人者，政府竟以之施于同人。同人等牺牲一身虽不足惜，然号称共和国家，竟有此等野蛮惨毒之政府，国法何存，人道何存，瞻顾前途，伤心何极。现同人等除依法向法庭起诉外，谨将经过实在情形报告国人。惟国人速图谋之。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全体，支。

(三) 各校学生通电

上海各报馆转各法团公鉴：昨日小学以上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到国务院请愿拨发教育经费，被拘纯一斋内，经一昼夜尚未

出院，消息不通。本日各校同学千余人，复偕同马次长及各校校长教职员冒雨续行到院请愿，自上午九时迄下午四时，始终拒绝不见。同人坚求放人，不意门前密布之军警，即用枪柄肆行殴打，并往来追击，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遍）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此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同人痛愤之余，恨不能与万恶政府同时并[拼]命于新华门前，特据情飞电奉闻，同人誓奋余生，作最后奋斗以殉我神圣教育。至应如何惩此万恶政府，惟国人速图之。临电不胜迫切。又此电将发时，闻教部人员将于明日全体辞职，并闻。北京公立各校学生临时联席会议叩。

（四）八校辞职全团教职员宣言

同人等前以国家予算案中规定之教育经费，为政府所滥用，以致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暨中小各校，均不能维持，不得已而停止职务，以与政府交涉。中经三月之久，政府始则置之不理，继则以国务会议议决之三项办法相欺骗，而并不履行，旋又自翻前议，而厚辱同人，以自掩其失信之迹。同人等数月以来，奔走呼号，及维持教育之运动，实已心力俱瘁，而卒无效果。八校之莘莘学子，因此而损失其宝贵之光阴，即已甚钜，而复哀号吁请而无门。是政府早有灭绝教育屏弃士类之决心，同人等再无徘徊迁就之余地，只有决然辞去之一途。辞职而后，除追索积欠外，同人等本不愿再向政府有所交涉，乃各中小校教职员同人暨八校并中小各校学子，不忍见首都教育之沦亡，亦复一律罢课，共起而为最后之挽救，连日以来，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呼吁于新华门内者，经两昼夜，饥寒虐辱，已备尝之，中且有十余龄之幼年男女，此辈纯洁之青年，何辜乃使之为维持教育而遭此侮辱。同人等义不能忍，爰于6月3日集议，以为吾辈亦属国民，安能坐视青年学子之奔呼困辱而不予以援救，遂议决以本日到部，

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同人等所推出之代表八人，同往总统府，意在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并质问其对此有无维持之办法，藉以援救学生代表，倘仍不得要领。同人等誓不退出新华门，饥寒困苦，愿与各校学生代表共之。迨至教育部，各校学生六百余人，已在教育部大讲堂中，询知为冒雨赴新华门请愿为卫兵所阻，不得入而退至教育部者。同人等乃请马次长出席，与同人等及诸生相见，并即要求马次长与八校校长并同人等，同赴总统府，马次长允予同行。各校学生亦随行于后，至新华门东辕门之铁栏，早已紧闭。西辕门外早有武装兵士一队，列阵以待，同人等请次长、八校校长及八代表并学生代表等入府，詎卫兵不准通过，蛮横异常。同人等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遂向理论，令其放行，该卫兵等不但不许通行，并用枪柄、刺刀乱刺击，知几之马次长稍受微伤，立即声言，我是次长，卫兵等乃许其通过，彼遂独自入府。卫兵更继续痛殴同人及学生等。是时天方阴雨，新华门外血肉横飞，同人及学生等，相继伤仆，枕藉于泥涂之中者不计其数。最痛心者，十余龄之男女学生，亦均遭蛮横军卒之痛击，嗟呼，政府而蛮忍至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迨至卫兵之凶威稍戢，同人等始从血泊泥涂之中救出法专校长王家驹。先生腰部重伤晕倒在地；医专校长张焕文先生后脑骨一根打断，血流不止；北大教授沈士远先生，头部刺伤，口长寸许，额头打开，流血甚多；高师教授黄人坚先生两肩重伤；女高师教授汤噪真先生，内部重伤，两眼发直，全身已失知觉；职员刘兴炎先生，额轧破伤；医专教授毛咸先生，背胁受伤。学生受重伤者，法专有何君玉书、美术有封君挺楷，女高师有王君本仪、陈君激，梁君惠贞、刘君因氏，赵君林书，其余教职员学生中受轻伤者甚众，此6月3日新华门前政府纵令卫兵击伤校长职员代表学生等之情形也。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

之辱蔑师儒，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挽救之方，又复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之事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犹恬然自居于文治魁领而不辞，外则引友邦文学博士之崇徽以自夸重，内则收集所谓名流者，设立四存学会。四存学校等以颜李之学欺世盗名，夫颜李为河北儒宗，其学以言行合一为主，而四存之义，尤重存学，今徐氏躬行祖龙焚坑之事，而口说颜李之学，使颜李有知，亦当痛哭于地下也。同人等遭政府之侮辱甚矣。除将政府摧残教育杀伤士类之罪状布之国人，请求全国同胞起而问政府之罪外，即日与此惨无人理之政府，停止一切交涉，至于如何处此摧残教育暗无天日之蛮忍政府，惟在国人矣。临书悲愤，不知所云。

（《晨报》，1921年6月5日）

教职员对政府不取消极态度

教育风潮自张一麟调停无结果后，政府方面，连日毫无表示，尤有置之不理之概。至教职员方面，则照其预定目的，积极进行。除前日已宣布马邻翼十大罪状外，昨日上午开第五十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下列案件。（一）国务院删电问题。金以于删日（15）更发出捏诬同人之密电，至昨日（27日）始行发表，似此鬼域行为，绝无悔过之心，本会议应再行驳正。（二）八校经费问题。本日益世报所发表之大同通信社教育部消息，谓八校经费，并未少发等语。教部虚账，姑且不论，查八校在教潮未发生以前，所领数目，合计系十四万余元。而4月30日阁议办法三条，政府规定八校经常临时各费175000余元，（合北京师范及公立小学为22万元），明明差3万余元。教部安得糊涂瞎赖。而据益世报所发表八年度预算，八校每月共支151855万元，此次每月少发9000余元，抵作各校直接收入，而临时费向例实支实销，此次各校并未开报，无从予发云云而论。查八校八年度临时费数

目，均于二年前报部在案，教部会计，所司何事，不为一查。即无暇查看，亦不得以本报相搪塞，岂教部未见该次长，临时经常各费，扫数清厘之大令乎。至八校175000余元之款，虽分经常临时两种，而此标准数目，已决定实发与八校，毫无疑义，今扣留在部，不行发给予各校，其意何居。若谓留作部款，而部款学款，固已明白划清。若谓留作其他教育费，则京师教育费，固另行定有四万余元，北京师范暨公立中小学经费，亦不能挪用。是则该次长每月扣留3万余元，诚不堪问。该次长又称“本次长到部以来，复发70余万元”，计本次陆续二次发给八校，为四个月经费。按益世报所载，经常费八校每月为150万余元，四个月即为600余万元，而该次长称70余万元，所不符之数万元，显系四、五两月临时费项下之款，可知该次长并未实发70余万元，亦未按4月30日。阁议办理，临时经常各费，实未扫数清厘，今得益世报发表，益足证明该次长之部令与事实不符，其欺人处，益彰彰在人耳目，既迭经同人驳斥，自可置之不理。（三）对于国立公立学生之29日之各团体联席会。推定王兆荣、李大钊为代表，届时前往赴会。议毕遂散会。至检厅对教职员所告诉之靳总理、马邻翼、殷洪寿，迄今未正式提起公诉，该会决定从事催促，业于昨日分呈地检厅，其原呈如下。（一）催诉靳总理呈文为陈诉恳乞迅予传讯，并从速提起公诉事。窃代表等于本月16日，为国务总理靳云鹏，指使公府卫兵，刺伤请愿教职员及学生多人事，曾经告诉在案，至今已逾十日，未见传讯被告人靳云鹏。兹特乞贵厅迅予传讯查究，以维国法而顺舆情，实为公便，仅[谨]呈京师地方检查厅。（二）催诉马次长呈文为陈诉恳乞迅予传讯，并从速提起公诉事，窃代表等于本月16日，教育次长马邻翼意图裁诬，捏造事实，曾经告诉在案，至今已逾十日，未见传讯被告人马邻翼。兹特乞贵厅迅予传讯查究，以维国法而顺舆情，实为公便，谨呈京师地方检查厅。（三）催诉殷总监呈文为陈诉恳乞迅予传讯，并从速提起公诉事。窃代表等于本月16日，为警察总监殷鸿

寿擅行监禁，并捏辞诬陷教职员事，曾经告诉在案，至今已逾十日，未见传讯被告人殷鸿寿。兹特乞贵厅，迅序[予]传讯查究，以维持国法而顺輿情，实为公便，谨呈京师地方检查厅。

(《晨报》，1921年6月29日)

军警干涉后之各团联席会

京师公立各校学生联席会，发起各团体联席会。本定于昨日午后在女高师开会，嗣因事前军警干涉，乃通知各团体移于某校开会。到者除教职员及学生各团体外，有全国报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及京师教育会，共十一团体。由众推公立各校学生代表何玉书为临时主席。旋即报告该会主张，关于六三问题，请政府撤换靳云鹏，关于教育问题，筹办学校。并请全国教育会提前开会，及学生总会开会，以讨论一切。又该会代表刘衡静发言，谓当先解决六三事，以去解决教育根本问题之障碍。京师教育会代表丁雨生发言，谓对于教职员及学生当积极援助，对政府提出警告。至于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本定于10月10号举行，现已发出提前开会电文征求各省同意，俟答复即积极进行。全国报界联合会王玉圃，谓对于此次风潮，就个人意见，此刻无与政府谈判之余地，六三事件，应听法庭解决，又主张自办教育，惟尚无确实方法。八校教职员代表王兆荣，谓同人意见，已屡次发表，所应当申明者，外间有误会教职员仍在争欠薪，其实欠薪已发清，现当先解决六三问题再及于经费问题云。各界联合会代表钟少梅，谓政府所摧残的教育，非学界的教育。乃全国的教育，六三事件，应诉诸国民。部立私立学生代表范连英，谓六三事件为全国问题，所以一致罢课，援助八校，以促政府反省及社会注意。公私立小学界教职员代表李庭楨，详述罢课以来一切困难及苦衷，主张非俟政府恢复教育尊严，及确实履行4月30日阁议后，决不复职。虽近受某方面激刺，然一本良心上主张，决不改变宗旨。中等学校教职员代表张大和，谓罢课专为援助八

校，当与八校教职员一致行动。八校教职员代表李大钊，谓教职员前因所处地位的关系，以索欠为一种手段，社会一部人的观察，对于此点，颇不明了，马邻翼亦误会教职员为争欠薪，而不知此外尚有教育经费巩固之一大目的。至于六三事件，所以在法庭起诉，实因政府欲假法律为利器，教职员不得已而以此手段对付之。在现政治下之法律，非国民起而拥护之，难望其有独立精神，今日多数团体主张从法律解决，应当注意。教育会代表张承荫，谓今日到会各团体，多属于教育界，应再联络各团体，以壮声援。政府征纳租税而不办教育，最好方法，即联络全国各团体，声明不承认此政府，停纳租税。至于教育基金问题，希望各团体努力，运动退还庚子赔款。随后尚有多人发言，金以此次不过彼此交换意见，对于以后办法，尚须从长讨论。主席以此次主张，征大众同意，当议决于相当时机内，再召集一次会议，除当场到会各团体外，尚拟请其他有力量之团体加入。闻此次函件将以维持教育名义，由京师教育会发出，至此时已六时，遂由主席宣告散会。

（《晨报》，1921年6月30日）

昨日之教职员联席会议

昨日教职员开第五十四次联席会议，王兆荣因病请假，由女高师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范静生氏来与本会议主席王兆荣接洽情形后，续即报告本会议赴沪代表谭熙鸿由杭来信，报告与各方面接洽情形后，对于清华学校此次因援助八校罢课，致高等四年级学生未能毕业，三年级以下未能升学，牺牲太大，同人等实抱不安，不得不图挽救调解之法，寻议决致函清华学校董事会及教职员会，并派梁希陆费执燕树堂三人为代表，与金仲藩校长接洽。次议决对于安徽学〔生〕姜高琦受伤过重，已于7月1日殒命，应电吊唁。次于筹划全国教育基金问题，如退还庚子赔款，分清国家教育租税等，议决作一议案，俟下次交本会议教育基金委员会，详细研

究，以备将来全国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时提出，遂宣告散会。

（《晨报》，1921年7月5日）

调停中之学潮消息

教育风潮自范源廉、张一麟、傅增湘等出任调停，已渐趋于缓和一途。政府方面，因日来粤桂陕直各军均已发生战事，而湖北浙江问题，又甚觉棘手，故对于教育风潮，颇有希望从速了结之意。据闻关于六三问题，教职员所提出之条件，如政府派大员道歉，明令引咎，乃赔偿医药费等条件，可望办到。至于经费问题，除履行4月30日阁议办法外，但闻对于教职员新拟之四项保障方法，就中尤以第四项须指定价值之二百万元以上之担保品，政府大有难色。至于教职员方面，除由主席王兆荣与调人方面会晤外，尚未有正式接洽，刻抱冷静态度，以待调停人之消息。微闻若六三问题有圆满解决，则教育经费中之保障方法问题，将开大会征求多数意见，以便解决云云。

又昨日（6日）教职员代表开第五十五次联席会议，仍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最近情形及八校毕业生代表来访王兆荣之谈话情形后，即由梁希报告与清华学校金仲藩校长接洽情形。金校长已允将本会议来意，转达董事会。旋议决本日再派代表二人，到外交部与该校董事会接洽，即派梁希、燕树棠前往，遂散会。

又京师国立公立学校学生临时联席会议，于下午二时，在法专开会，由何玉书主席，议事进行如下。（一）报告派往调停清华学潮代表四人近来接洽情形。（二）去函上海各代表报告本会最近情形。（三）讨论靳、郭诉状，议决由本会推定二人，会同诉讼委员修正，并定于本周内，呈递检厅。（四）美术学校代表，提出对于学术讲演会组织意见书，议决须待与教职员开联席会时决定办法。（五）法专代表讨论对于调停人之态度，议决以冷静态度对待。旋以警察干涉遂闭会。

（《晨报》1921年7月7日）

决定承认五条办法之教育界

迁延四月之教育风潮，自前日下午范江傅张四调人，正式与校长教职员学生三方面接洽后，各方面意见，大体已归一致，惟形式上尚有待商之处，故未能即告解决。昨日（15日）上午九时，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开临时联席会议，仍由王兆荣主席，报告14日下午在中央公园董事会与调人接洽情形。略云，调人对于经费问题，虽不能如同人议定，将条文更改，然对于第四条之200万元证券作为准备金一层，已允由教育次长马邻翼正式函询代理财政长潘复，由潘氏函回复教部，说明证券担保品，系以明年某月起至某年某月止廿五个月之盐余项下，每月拨出8万元，教育部接到此公函后，即行发表作为公（正）式的保证。对于第五条之临时费支給办法，则由调人公函教育部，说明应照4月30日阁议通过三条办法，按月支付，教部即覆函调人，允为照办。至于明令，亦必由政府自动的速行发表，内容无非关于经费及军警之事等语，（此项详细情形，已见昨日本报）。报告毕，即付讨论。余以同人要求目的，全在经费稳固。关于六三事件，政府已有转圜之意，则虽与同人当初条件不免不符，然亦不外分量轻重之问题，同人为维持教育，只要能保持人格，经费有着，其余细节无妨略为迁就，于是一致决定对于调人所提五条办法之大体，予以承认，并以公函回复调人，申明其旨。至于复职问题，无论如何必须于政府对教职员实行慰问之后，并将诉讼等问题结束始能谈到。于是对于复职之程序，略有讨论。上述之意见，决俟函复调人时口头申明，免致外间发生误会。次对于学生方面之意见，讨论结束，由本会议公推王兆荣、李大钊二君，即日与学生会接洽。时已十一时，遂宣告散会。闻今日（16日）上午尚须再开会议讨论一切。至校长团方面，昨日（15日）上午亦曾开校务讨论会，讨论结果，大致与教职员之决议相同。此外对于调人方面之奔走则拟于此事解决后，公同表示谢忱。学生方面，昨日上午国立公立各校学生临

时联席会在高等师范开会，由何玉书等报告与调人接洽情形后，金以学生所注重之问题，调人尚无正式回答，此时不便讨论，俟接到调人正式答复后再议。当时教职员会议派王兆荣、李大钊两代表到会，将教职员开会议决情形，向学生报告，并希望学生与教职员取一致行动，大概学生方面不致再发生他项问题，惟俟调人正式答复之一番手续耳。

（《晨报》，1921年7月16日）

六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

述 要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2卷1期起改名),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中国兴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文化运动。有一种意见说,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在日本东京。(《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47页)当然,1914年陈独秀在东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通过章士钊及《甲寅》为媒介,结识李大钊也许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后期,实际已投入新文化运动。1916年春,他在日本写作的名篇——《青春》,就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1916年冬,陈独秀为东亚图书馆募股来京,李大钊盛情款待,并介绍陈独秀与梁漱溟等相识。这一时期,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指出:

“孔子者,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由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共同编辑的同人刊物。这样,以《新青年》为中心,便大致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这期间,李大钊继续撰文,号召新青年们要“进!进!进!”

这一时期,他还著文阐述他的东西文明观。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新旧思潮的斗争日趋激烈。1919年2、3月,林纾在《新申报》上连续发表《荆生》、《妖梦》等小说攻击、恫吓新派人物,掀起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李大钊迅速作出反应,于3月9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纾等企图借用军阀势力,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阴谋,作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抨

击。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与威信日益扩大、提高，青年学生在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时，请他作指导或聘他作顾问。同时，他也直接发起组织或参加组织社团，通过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和周围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以后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密切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发展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以补《新青年》在这方面的不足，李大钊与陈独秀等决定创办《每周评论》。胡适说：民国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第52页）政治性强烈确是该刊的鲜明特点。《每周评论》从1918年12月22日创刊，到1919年8月31日遭军阀政府封闭为止，共出37期，李大钊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该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以及在宣传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巴黎和会以来，《每周评论》以很大的篇幅报道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如13期、14期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朝鲜的“三一”起义，说明“民族自决的思潮也流到远东来了。”这对中国人民的斗争是个鼓舞。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8、19两期点了曹、章、陆等亲日派的名字，揭露他们卖国贼的罪恶行径。五四当天的第20期，更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山东问题。五四运动爆发后，从21期起，一连五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详细报道和评论了五四运动的进展。5月18日，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明确指出：我们的仇敌不只是侵略我们的日本，而是整个“强盗世界”，要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到11月，他继续向中国人民说明：“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李大钊文集》（下）第112页）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他还与陈独秀等到北京南城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陈独秀不幸被捕。李大钊一

方面积极设法营救，一方面继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评。

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下，6月10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被免职，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这一阶段的重大胜利。

在本部分须简要说一下李大钊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交往方面的活动。当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便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人民区别开。因此，他在五四运动中，一方面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他又告诉中国人民，这次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李大钊文集》（下）第101页）不仅如此，

“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李大钊文集》（下）第214页）

当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日本也出现了一个“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指导者，就是日本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博士。这期间，李大钊与吉野互致信件，希望在斗争中彼此“遥为声援”。在五四运动中，吉野同情五四运动，驳斥各种诬蔑，并给李大钊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李大钊将此信公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此后，吉野邀请北大教授和学生访日，李大钊邀请吉野访华。

1920年4月，在李大钊等多方努力下，北大组成了学生访日团。5月5日，北大学生访日团一行五人到达东京，立刻在日本引起轰动。历经一个月的访问活动，盛况空前，极为成功。同年8月，日本亚细亚学生会访华团到达北京。20日下午，“由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介绍与学生联合会接洽”，中日两国学生在北大举行了茶话会，“彼此相谈甚欢”，最后合影留念。（《晨报》1920年8月24日）

在从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中,李大钊以他坦诚的胸怀,亲切的态度,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尤其是日本青年。李大钊与伊藤武雄的关系可堪称典型。

李大钊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种种活动,在现代中日友好关系史上是应写上感人的一笔的。

(一) 参加编辑《新青年》 和《每周评论》

1. 《新青年》编辑工作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窈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勸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丘

之籍。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寢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寢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上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 (Nietzsche) 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 (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

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不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耳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

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 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馀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

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 (J. S. Mill) “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 (Comte) 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 (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槩生活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也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

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称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唯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916年9月16日）

《新青年》第六卷分期编辑表

第1期	陈独秀	第2期	钱玄同
第3期	高一涵	第4期	胡适
第5期	李大钊	第6期	沈尹默

（《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关于 《新青年》问题的来往信函（六则）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九二一年二月

（1）陈独秀的信

适之，一涵兄：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

《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 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2）胡适的信

仲甫：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始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于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即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分。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

(3) 胡适的信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陈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 移回北京，2.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意，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绝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想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十一月二十二日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之。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

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见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4) 鲁迅的信

适之先生：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以为三个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办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树（一

九二一)一月三日。

(5)李大钊的信

适之兄：信已传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到你那里去。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象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厌！起明、豫才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守常。

(6)陈独秀的信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 独秀 白 二月十五日

〈原件存藏于北京大学〉

守常文集题序

青 迅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

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这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象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面、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象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叠叠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

2. 《每周评论》编辑工作

每周评论发刊词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人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陈独秀）

（《每周评论》1号，1918年12月22日）

《每周评论》出版广告

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

1. 《新青年》里面，都是长篇文章；《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
2. 《新青年》里面所说的，《每周评论》多半没有；《每周评论》所说的，《新青年》里也大概没有。
3. 《新青年》是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
4. 《新青年》一月出一册，来得慢；《每周评论》七天出一次，来得快。

照上边所说，两种出版物是不相同的。但是，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宗旨却是一样，并无不同。所以，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

（《新青年》第5卷6号，1918.12.15）

忆守常（节录）

张中府

大家都知道，“五四”以前，指导新思想运动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是在一九一八年冬创办的。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适在那儿。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我还记得，创刊第一期出版的前夜，他同我曾亲自到印刷所里去校对。等校对完了，看了大样，改好印成，那时已到凌晨四点钟。我俩各拿着一张首先印出的《每周评论》创刊号，出印刷所进宣武门徒步回家，一路上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虽然那时正值冬天，但我们都忘记了寒冷。又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怎的，本来是印五号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号字。等我们去校对时发现了，对此，守常同志曾大闹一阵。此虽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不苟来。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许会觉着一个前进的革命家总是紧张严峻，斤斤躁急的。但守常同志则一方面在行动上可以说是紧张严肃的，另一方面在风度心情上又可说是超脱潇洒的。守常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名文中，有一篇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前进、及时；还有一篇是《今》，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超拔而切实。还有他在主编《甲寅日刊》时的一些社论里，告人春日作郊游，教人接近大自然，也使人感出他的与众不同的潇洒飘逸，悠闲自在，诗人般的风趣来。他也偶然写些小诗，也别有意境，不同凡响。中国古军人常以“好整以暇”相尚。守常同志这个革命战士，就大有“好整以暇”的气概。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两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

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2.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出版）

3.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青春》

（均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三) 指导社团活动

1. 国民杂志社

国民杂志社启事

同人感于世界潮流变迁之剧，国民智识不足以资为因应，实为国家前途之一厄象；爰集同志组织一月刊杂志，名曰《国民》，以增进国民智识为主旨，本研究之所得贡献国民。刊行伊始，亟待匡正，倘荷赐教，无限欢迎！兹将本杂志例言附录于后：

《国民》杂志例言

一 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下列四大宗旨：

- (一) 增进国民人格；
- (二) 灌输国民常识；
- (三) 研究学术；
- (四) 提倡国货；

二 本杂志内容略例如下：

- (一) 插画 历史上可作国民纪念之影片、各地风景影片及其他关于教育实业之摄影；
- (二) 通论 登载有关道德及智识之音通论说；
- (三) 专著 登载学术上之专门著述；
- (四) 译述 逐译欧美日本名著及外报论事、论学之文；
- (五) 调查 国内教育实业之现状、国外教育实业之新制及本国风俗、物产，为国民所必知者，详细调查，著之纪录；
- (六) 艺林 录最有旨趣之诗文、笔记及小说；

- (七) 通讯 与全国学子商榷意见，剖析疑义；
- (八) 记载 中外大事，为有系统之纪述；
- (九) 附录 本社特请名人讲演之稿及其他重要文字，
经本社认为有转录之必要者。

三 本杂志敦请国内有名学者，每期担任两篇以上之著述。

四 本杂志无党无偏，一唯真理之是尚，凡不背本志宗旨之投稿，极表欢迎！刊录时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别。

五 本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定于民国八年一月十日发行。

六 本杂志社设北池子五十三号，电话东局二七三六。如索组织大纲，通函即寄。

(《北京大学月刊》1918年12月19日)

国民杂志社成立纪事

10月20日，本社假欧美同学会开成立大会。社员到者30余人。来宾有蔡子民、徐伯轩、邵飘萍、徐彬彬诸先生。9时开会，由许德珩君主席，报告经过情形，并申说办本志之必要。次请来宾演说（辞见后）毕，主席致谢意，次由社员易克嶷、朱一鹭、吴载成诸君演说。少倾来宾退，乃讨论改正社章。原定讨论完毕即行选举，后以来宾不能久待，乃将摄影提前举行。此后选举职员，以时间不敷，不能开票，公推易克嶷君等10人改日开票。是日会场秩序甚为整齐，散会时已十二句矣。

(《国民》1卷1期，1919年1月)

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节）

八年十月十二日，本社同人假南湾子欧美同学会会场开成立周年纪念会，并欢送社员陈宝鏖及许德珩二君赴法留学。是日到会者除社员七十余人外，尚有来宾陈独秀、李大钊、蓝公武及徐宝璜诸先生。

二时开会，由易克嶷君主席，报告年来经过情形及“五四”以

后未能出版之原因，末致辞欢送赴法社员，并希其介绍西洋新思想于本社同人，俾得先睹为快。乃请来宾演说。

陈独秀先生演说略云：久闻贵志发达，惜未细读，又闻五四运动诸君出力独多。窃以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其觉悟之程度却不一律，是可分为三步观之。其一，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此在一般国民均具有此种觉悟，不独参与五四运动者为然；即反对斯举之官僚，甚至曹、章辈，虽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尔，然亦非绝对无此感悟。其二，则政治不良之觉悟。吾人日者屡闻各方面有请愿之举，多涉内政问题，可见国人已有此种觉悟。特以例前者，则觉悟之程度及具此觉悟者之人数，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则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种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似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种觉悟者之人数增加，则尽美尽善矣。

次李大钊先生演说谓：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次蓝公武先生演说五四运动之价值。其言曰：此次运动之价值可言者有二。一、各人能认识自身能力。自身能力为外部压力之奴隶，恒隐而不见，非消失也；经此番运动，自身能力之效大著，此后当用此能力以与外界抗，匪复如前之畏避矣。二、知个人能力有限，非合多数人之力不足有为。益必先有组织而后始能奋斗，设“五四”后而无组织的运动，卖国者何能遽去？斯二者，苟能保存而发挥之，则改造中国不难矣。

徐宝璜先生乃起而演说谓：月报之效，尚不如日报之巨。中国政治之不良种种，不胜枚举。即以国会选举之投票而言，多为金钱投票，而非良心投票。由此所产之恶果，即为政治紊乱之因。然欲免去金钱投票之事实，必国民大多数对于被选人之个人及其事实方面具有确实之观察，而所以供给此等材料于国民者，非日报不为功。吾国新闻界人材缺乏，加以有机关报为种种不名誉之攻击，国民对于一般政客，不能下良心的判断，只为皮相的吹求，长此不已，即能为瑞士之国民有直接投票权，亦无所用之。Webster（即著字典者）氏有言：“在平民政治之下，经理报纸之人占社会上重要的位置。”深望诸君子办月刊外多加入新闻界云云。

来宾演说毕，由易君致谢辞，乃请赴法社员演说。

（略）

（《国民》2卷1期，1919年11月）

回忆国民杂志社

许德珩

《国民》杂志是在1918年反日运动高潮中创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几件事对我们影响很深：（1）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模糊的方向；（2）大战后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民族自决的口号；（3）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压迫。此外，胡适在北大提倡白话文、新文学，曾引起一部分学中国文学的人的不满；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化，但他本人的私生活不甚严肃，有些学生因此不赞成他。所以《国民》有两个特点，一是反帝，一是写文言文，和《新潮》的白话文对立。因为不用白话文，北大的“国故派”黄侃、刘师培等教授，都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宣扬国故的文章。

那时我在北大念“国文学门”，是二年级，邓康和我同系，

低我一班。当时北大有几个人常爱谈民族危机问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1918年4月间，我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游行，要求青岛归还中国，被日本警察逮捕了一百多人，一千多名留日学生因此全体罢学回国。他们回国后，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各地进行联络活动。当时有四个人来到北京，记得其中有李达、王希天、阮湘等。他们都是湖南人。4月20日左右到北大来找我们。第二天，我们（有我和邓康）到湖南会馆去看他们，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二千学生向国务院请愿的事。这次请愿我是八个代表之一。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学生请愿，国内国际上都发生了影响。孙中山当时也很欢迎，似乎还曾打来过电报。

就在这一次运动中，北京的北大、高工、法政、医专、工专、高师等校的学生开始团结起来，成立“学生爱国会”的组织，以后改称“学生救国会”，到“五四”时发展成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国民》就是“学生救国会”这个组织的刊物。办刊物的钱完全是学生和同情学生运动的教员与社会人士捐出来的。学生每人出了五元钱，就算杂志社的社员，其实负责办杂志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多数社员只出了钱，并没有管杂志的事。同情我们的社会人士有邵飘萍（北京《京报》编辑）、戈公振（上海《时报》主编）、蓝公武、林长民等。北大教员中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顾问，杨昌济似乎也是顾问。除了北京的学生外，天津“觉悟社”的谌志笃等也加入了社，上海、济南也有。我于1918年暑假和另一个人一起由北京去上海，沿路在天津、济南活动，各地都有人加入“学生救国会”。到1918年8月底从上海回来，已有二百多社员，凑足了一千四百多元钱，但负责总务的鲁学淇贪污，亏空了五六百元，只好再行募集，因此本定1918年8月出版的，后来延到1919年1月才出版。我们那时立志不依靠任何人，完全自己办杂志，也不沾染任何一个党派，因此和孙中山只有私人接触，没有要他一个钱。我们和李大钊是通过

黄日葵联系起来的，黄也是那次回国的留日学生，认识李，到北京后来北大旁听。《国民》和少年中国学会也有些关系，不少社员都是少中的会员，我也是一个。李大钊关于“亚细亚主义”的文章就是在《国民》上发表的。

《新潮》杂志是傅斯年主编的，傅斯年也是国文学门的，和我同班。胡适来到北大后，我和傅等几个学生对他不满，想法反对他，后来傅“倒戈”了，倒到胡适那边去了。1918年5月间傅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教育部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投靠了胡适，和罗家伦、康白情、杨振声、徐彦之、何思源、汪敬熙等组织了“新潮社”。《新潮》和《国民》不同，是受到校方支持的，学校每月给《新潮》四百元，并在校内挂牌子。它比《国民》筹备晚，却能在同一天出版，这都是因为有胡适帮忙。从文学革命和介绍欧美新文化的角度来说，《新潮》比《国民》的影响大。因为我们反对胡适、傅斯年，所以北大的黄侃、刘师培等人都同情我们，章炳麟也支持我们。

“五四”以前我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他们干的事我们就不干。傅反对我们抗日，也不加入学生会。“五四”以后才统一起来。《国民》杂志“五四”以后也写白话文了，李大钊起了调解的作用。“五四”时，新潮社的康白情、杨振声倾向我们，后来加入了学生会。“五四”后《国民》二卷一期开始用白话文，其实“五四”前我们在校外也是写白话的。我在上海办《全国学联日刊》，一篇文言文都未写，但一回北大就只写文言，这里面也有些意气用事。“五四”以后，我们对陈独秀的态度也转变了，因为陈赞成我们搞学运。

为了学生救国会和《国民》的事，我曾找蔡元培谈过一次话。他当时有些倾向无政府主义，不赞成我们用“爱国”名义，说极端爱国主义不好。我与他辩论，问他：“你为什么以前也办爱国女学呢？”他说：“那是那个时候。”他对我们提两点要求：1. 社址不要设在北大；2. 不要把爱国会的名义搞出来。

而《新潮》社址却可以设在北大红楼，并且以“北京大学之新潮”名义作宣传。

五四运动时，我们都去搞运动，好几个人坐了牢。我出狱后，5月19日到天津，经济南、南京到上海（5月23日？），参加全国学联工作。8月底，学联暂时结束，推出七个干事负责，我才回来。运动时《国民》停刊，10月才继续出版。1919年底，我去法国求学。《国民》后来也分化了。

《国民》的主编是我、邓康与黄日葵，名义上则推陈钟凡（现在南京民盟）、黄建中主持，他们年级高，实际并不问事。高尚德、易克嶷都起过很大作用。李泽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在《国民》发表过，毕业后胡适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了二三十年，现已故。

瞿兑之（宣颖）是清宰相瞿鸿禨的儿子，是个公子哥儿，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很阔气，当时他同情我们，他在上海有房子，学生运动时给我们不少方便。后来做了徐世昌的秘书长。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2. 新 潮 社

新 潮 杂 志 启 事

本部敬请图书馆主任、庶务处主任为顾问。所有本志印刷、登广告、发行及其他银钱出入事项；即由两主任分派出版部杂务课、会计课事务员执行之。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3日）

新 潮 社 成 立 启 事（节）

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

如肯賜以指教，最所欢迎！所有本社社员姓名及组织章程如下：

(甲) 社员 (以姓名笔划简繁为序)

毛 淮	成 平	汪敬熙	吴 康	俞平伯
高 元	徐彦之	黄建中	张崧年	陈兆畴
陈嘉蕙	康白情	傅斯年	杨振声	刘 敌
潘元耿	潘家洵	戴 岳	谭鸣谦	罗家伦

顾颉刚

(乙) 组织 (略)

(丙) 职员

主任编辑傅斯年，编辑罗家伦，书记杨振声。

主任干事徐彦之，干事康白情，书记俞平伯。

(丁) 社址 (略)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3日)

回 忆 新 潮 社

顾颉刚

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秋季，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和徐彦之。《新潮》杂志最早的编辑就是傅、罗两人。徐彦之这个人很能干，也很活跃，于是大家就推他搞杂志的发行工作。新潮社中山东人很多，除傅、罗、徐等人外，杨振声、汪敬熙等也都是山东人。新潮社成立时我不在北大，当时正在生病，到我1919年回北大时，傅斯年已经出国留学去了。

早期新潮社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北大文学院的学生。1918年时，文学院只有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哲学系三系，历史系是1919年后成立的。参加新潮社的中国文学系学生除傅斯年外，还有俞平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则有罗家伦、潘家洵等人；哲学系的有我和谭平山、陈家蕙、吴康、朱自清等人。当时只要喜爱文学并能写白话文章的，就被拉了进去。在“五四”时期，能写

白话文的青年是很少的，凡能写些白话文章的，人家都觉得很了不起。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在社期间，我还介绍了叶圣陶、王伯祥和郭绍虞三人入社。他们都是我中学的同学。

“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是《新青年》。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人看到《新青年》这样鼓舞人心，于是也想学着《新青年》，办一个刊物；而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

傅斯年这个人很会讲话，也很会写文章。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投稿到《新青年》上去的。蔡元培、陈独秀都很看重他，蔡每月由北大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来给他办杂志，这样，《新潮》杂志就办起来了。《新潮》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的第二层。李大钊同志曾给过《新潮》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

《新潮》出版后，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看到。因为《新潮》中的文章多半是青年人写的，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

新潮社除编辑《新潮》杂志外，还印过好几种《新潮社丛书》。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徐彦之负责。徐毕业后，改由李荣第（即李小峰）负责。李后来用贩卖《新潮社丛书》赚的钱办了北新书局。“北新”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北京大学新潮社”。新潮社本来还计划出版一套《文艺丛书》，结果并未实现。

新潮社在五四运动中并没有起甚么积极影响和作用。我们都是文学院的学生，只想埋头写些文章，不愿搞实际的活动。我记得罗家伦在《新潮》二卷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今中外派的学说》一文，对我曾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当时很赞成他那种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说法。至于傅斯年，他本人当然是不赞成五四运动的，为此还受到同学们公开的指责。

但是，傅斯年和罗家伦实际上都是政治野心家，他们看到胡

适在社会上有力量，因此就常到胡的家中去活动。

1919年傅斯年毕业离校，《新潮》的编辑工作就由罗家伦负主要责任。1920年罗家伦也毕业了，编辑工作就交由周作人担任。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新潮》二卷虽然名义上是由他主编，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任何编辑工作，而主要是靠我们几个人支撑着。到了后来，社中许多成员都出国留学，人越来越少了；加之蔡校长此时已离校，《新潮》经费无着，北新书局又不肯帮新潮社的忙，于是《新潮》就停刊了。

我为《新潮》写文章，因为怕被父亲看见，引起纠纷，所以都用了笔名顾诚吾。

1960年12月29日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3.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

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兹登其征集团员启与简章于后：

（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

盖闻教育之大别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民教育也。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苟乏术以补救之，则人民智识必大相悬殊，社会上不平之景象必层见迭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救之术维何？厥曰露天演讲、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补助学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北京大学固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者也。平民主义

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发起兹团，所以达此旨也。同学中热心平民教育者，愿兴起共襄斯举。

发起人：康白情 夏镜澄 易克嶷 朱一鹗 陈宝鐸
陈兴霸 周长宪 罗家伦 黄日葵 周炳琳
陈云程 廖书仓 许德珩 邓 康

凡愿加入本团者，请至下列诸君处报名，或通函报名亦可，但须注明别甫、籍贯、科别、住址。

廖书仓君 住东斋宙五号

周炳琳君 住东斋宇三号

邓 康君 住东斋宙七号

(二)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

第一条 本团定名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第二条 本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

第三条 本团由北京大学学生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之。

第四条 本团讲演分为定期与不定期两种：

甲、定期讲演 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一时至四时举行之。

乙、不定期讲演 此项讲演，如有事件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

第五条 本团讲演稿，如认为重大者，送交本校日刊掲載，并藏存团中，以便汇集成册。

第六条 本团团员应纳常年金现币一元，愿特捐者听。

第七条 本团于暑假及年终时，各开恳亲会一次。

第八条 本团设干事四人，经理一切事务，任期半年，但得连举连任。

前项干事由大会选举之。

第九条 本团团员有轮流出席讲演之义务。

第十条 本团团员当轮流出席时，除婚丧疾病不能出席外，

不得任意推诿。

第十一条 本团讲演题目及地点，须先期在大学日刊揭载之。

第十二条 本团团员如有损坏本团名誉事情，得由本团团员多数议决，令其出团。其所纳各费，概不退还。

第十三条 本简章自本团成立时即发生效力。

第十四条 本简章得全体过半数之同意，可随时修改之。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

乡村讲演办法

本团星期六晚干事会议议决“乡村讲演”具体办法数项，开列于后，务望团员注意：

一、定为四月二、四、六、八、四天；

二、每天出发，至多不得过两队；

三、每队至多不得过五人；

四、讲演队由报名团员自由组织；

五、地点定为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梅甸、罗道庄等处；

六、火车费由团中开支，但饭费则由各人自备；

七、每队须推定书记一人，详记讲演情形，报告于团中；

八、讲演员如恐方言、名辞不易为听众所晓，可作成讲义，

交由本团代为油印，但须于三十日以前交来。

再者，团员未经报名加入此项讲演者，尚有余额可补，请速来函报名可也。又此项讲演不嫌人多，如果人数过多，亦可扩充队数。又非团员亦得加入，但须预先报名，经本团认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30日）

平民教育讲演团农村讲演的报告

丰台讲演组的报告

讲演员

汤炳荣 刘炽昌 王星汉 郭衍盈 李荟棠

讲演地址

丰台 七里庄 大井村

讲演题目

北大平民夜校与七里庄国民学校的比较（七里庄）	汤炳荣
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七里庄）	刘炽昌
缠足的害处（大井村）	王星汉
平民教育的重要（大井村）	李荟棠
为什么要读书？（大井村）	郭衍盈
人生与工作（丰台）	刘炽昌
同业联合与儿童教育（丰台）	李荟棠

听讲的人数

七里庄约五六十人

大井村七十余人

丰台约二百人

各位讲演稿子及经过情形的报告书悉存团中，由本团讲演录内刊登之，兹不赘及。

丰台讲演组书记李荟棠报告 九，四，三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0日）

丰台讲演组活动的详细报告

九年春假本团农村讲演报告

丰台一带经过的情形

四月初二日午前八点钟，我们五个人——汤君炳荣、王君星汉、刘君炽昌、郭君衍盈，再就是我一——拿着旗子还不敢放开，因为恐怕巡警误会我们是“五四”、“六三”那种露天讲演，来和我们打麻繁（烦）。所以偃旗息鼓，给他个神不知鬼不觉，乘着京奉车直到丰台。下车后，远走三里多地，到了一个村落，名

①原文大标题为：“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这是丰台讲演组书记李荟棠就1920年春假期间到丰台讲演一事所写的第二个报告。

叫七里庄。住的人家有五十多户，共计二百余人。有国民学校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齷齪，鼠洞一般的黑暗。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千字文》、《三字经》、上下《论语》。坑上躺的一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见面先说道：“我们也会私塾改良哪”！经我们数次的请求，才发下命令叫学生出来听讲。首由汤君炳荣讲演“北大平民夜校与本村国民学校的比较”，次由刘君炽昌讲演“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村中的老人听讲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只是那位年轻的先生，吸着旱烟，闭着眼，颇有点不赞同的样子。仿佛我们说的话，都足以引动学生的邪念似的。但是他那不赞同的态度，又不敢大模大样的表现出来。村里除了在学校里读书的小孩子，来听讲的又有二十多个，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村中的生活很苦的，老弱年幼的又这样多，教育又没有，这真是一件极危险的事！

后至大井村。该处三百多家，约有千人。南苑第十二日新学校设在此地。这是个国民小学，门外墙上贴了一篇黄纸，大书特书的是：“新旧兼授，加讲经传策论”。里边教书的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我们再三的请求，也允了叫学生成排立正，站在那边听讲道的。以后我们不叫学生们那样拘执了，这位先生也说道：“我们私塾改良过来呀，不过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此次讲演，乡里人来听的也不少，共有六十多人。首由王君星汉讲“缠足的害处”。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的袅袅娜娜的回家去了。这个村子比七里庄见富裕，所以就添上缠足这一回事了。其次我讲了个“平民教育的重要”。再由郭君衍盈讲“为什么要读书？”当讲演时，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在我们开讲以前，右营游緝队想着干涉，后经解说明白而去。这也是个村子略见富裕的表示，添上了剥夺穷民的大兵，来保护几家害苦了老农人的地主。天到十二点半，我们才拿着旗子，回到丰台午

餐。

丰台为铁路交汇的地方，市面还算热闹，但是到处都是极脏的水沟，未免卫生上太不讲究。有慕贞女学一处，约五十余人。私塾五处，共约六十余人。丰台公立小学一处，约三十几个人，内藏孔圣人牌一座，戒尺一大根。此外有英文日夜学校一所。因为讲演时间无多，未便详细参观。土产著名的有芍药、花生、白菜、柏树等。社会上生活状况殊形艰涩，闻野娼尤多。

午后半点钟，在车站旁边讲演。刘君炽昌讲演“人生与工作”，其次我讲的是“同业联合与儿童教育”，直到两点三十分。听的不少，约有二百余人。因为午后到京只此一趟车可及购票，于是停止讲演。午后四点十分到京。

这次农村讲演，我有两种感触：（一）是乐观的；（二）悲观的。乐的是乡中人思想单纯，却极其清白，易于灌输新思想；悲的是现在教育太不讲究。近日教部有实行强迫教育的消息，这不是小孩子玩吗？大家想想，预先没有农村讲演员解释他们的误会，开通他们的风气，又无此项适宜的教员之养成，势必至于当教员的都像七里庄、大井村两位先生同一步调。这样一来，岂不是倒害学生不轻吗？请问，这样能算教育普及吗？这个暂且不必多说，我来京这次是第一回考察乡间的情形，不料丰台一个大镇，离北京城才几十里路，教育一途就糟糕到这步田地，其他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看来，中国还能算一个有教育的国家吗？教部是假的，这个事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九，四，二 芸棠附志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7、28日）

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

讲演员

罗运磷 刘正经 张广鸿 杨钟健 马元材 杨真江
邓 康

讲演地点

长辛店 赵辛店

今天出发讲演的人总不算少了，可是成绩比二、六两日，真是“瞠乎其后”。这也有几个原因：

(一) 今日是星期，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

(二) 赵辛店原是个“不成村落”的地方。三家村学究先生教学生天天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句诗，仿佛是为他写照。况且春天到了，农夫自然会“有事于西畴”。试想人家那么少，农事那么忙，谁来听你们的讲演。

有上边的两个原因，所以在长辛店虽然扯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的讲演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掩旗息鼓”，“宣告闭幕”啦。

没办法，向西走，问他们附近有大村庄没有？他们答有赵辛店。及到赵辛店，又使我们大大的失望。既到了这个地方，也不得不实施我们的职务。于是仍把旗帜扯起来，留声机开起来。然而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那么，自然又要“免开尊口”了。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式衣服（但不敢拟定是那个朝代的），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都总不敢进前来。但是我们也不好理他。好！入京的火车快到了，回去罢，莫要尽在这里作“时间耗费者”啦。

还有一事须报告的：就是我们在火车上卖《新生活》。我们的讲演录因无钱没有印出，所以暂把《新生活》代之。很有趣味。起初还羞羞答答说不出话来，到后来就“买《新生活》吧！两个字。很有趣味的东西，买吧！”也不觉害羞了。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3日）

通县讲演组报告

本月六日，本团通县讲演组出发。上午十时到通。计出发者八人，即分两组讲演。约十二时，会齐午饭。饭后合成一组，在该地最热闹之地讲演。至四时乃参观该地之潞河公园、通俗图书馆等，即上车回京。到东站下车时，已六时余矣。计此行讲演共六次，听讲人总数在五百人左右，结果甚为圆满。兹将出发团员、讲演题目开列于后：

出发团员

陈兴霸 戴朝震 周长宪 熊卫邦 汤炳荣 田奇隼
朱自清 杨钟健

讲演题目

平民教育是什么？	朱自清
中华民国	杨钟健
皇帝和总统	汤炳荣
我住在此地应管此地事	杨钟健
怎么做家长？	田奇隼
破除迷信	陈兴霸
做人的道理	周长宪
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	杨钟健
靠自己	朱自清
平等与自由	周长宪

通县讲演组书记杨钟健报告 九，四，十一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3日）

4. 觉 悟 社

《觉悟》的宣言

“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厉害。我

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遍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在这种时期内，我们天津有些学生也本着这种感想，集合起来，要打算发行一种不定期小册子，用“觉悟”这两个字做他的名字。这个集合的团体遂叫他为“觉悟社”。

“觉悟社”的名字在社会上传布了三个半月，然而“觉悟社”的小册子——《觉悟》——还没见他出版。社会上想要看他、批评他的心，未免有“迫不及待”的情形，并且人人怀着一种“《觉悟》到底是怎么样？”的念头，寻问催促的很急。但是外界催促的愈急，我们内部的恐惧愈甚。我们标榜的名字既是“觉悟”，我们小册子的内容要没有一点“觉悟”的实质表现出来，对着社会实在是惭愧，并且还要夹着一种“哄骗”的成分在里头了。

因为恐惧，遂越发迁延。迟到现在，我们“觉悟社”内部的组织，经了几次从“觉悟”上得来的改变，稍稍有一点粗具模型的样子。我们的小册子——《觉悟》——也经了几次变化，方敢大着胆子决定出版的日期，要在社会上露第一次的“面孔”。

《觉悟》的主旨同内容经几次的毁改，现在的结果是：要本我们“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新”、“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发扬宗旨的方法有四种：

- 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
- 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

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

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我们从这四种方法里，要表现我们能够“觉悟”的程度。但是，是否合于现代“觉悟”的潮流，我们很盼望社外边的人，从旁观的态度上能够给一种严重的审查、深刻的批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至于“觉悟”的程度够不够，我们全是学生，决不敢说已经“觉悟”，并且也不能说是现在已经“觉悟”。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

1919年12月29日

（《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觉悟社社员名单

在觉悟社初成立时，社员共同决定对外不用真名而用代号，每人的代号都是经过抓阄决定的。虽然当时社员约有二十人，但代号却是一至五十。社员们在抓得自己的号数后，又根据相应的汉文字音安排了代名。其中有些社员的代名，在以后曾作为自己的笔名应用了相当一段时期，而有些人的代名则未应用。社员中吴瑞燕的代名尚未查到；张淑文是后来加入的，故无代名。这份名单是根据觉悟社参加者们的回忆，经过仔细核对后，确定下来的。

——原编者

邓颖超（逸豪）[1]（女）	周之廉（珊）[3]（女）
周恩来（伍豪）[5]	赵光宸（奈因）[9]
薛撼岳（石逸）[11]	郭隆真（石衫）[13]（女）
关锡斌（石霸）[18]	潘世纶（述庵）（石久）[19]
胡维宪（念豪）[20]	刘清扬（念吾）[25]（女）
李震瀛（宝森）（二八）[28]	马 骏（念久）[29]

李锡锦 (衫逸) [31](女) 郑季清(漱六, 岩)(衫峙)[37](女)
张若名 (衫陆) [36](女) 张嗣婧 (衫奔) [37](女)
谌小岑 (施以) [41] 李毓韬(峙山)(施珊)[43](女)
谌志笃 (武陵) [50] 吴瑞燕(女)
张淑文(女)

(原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

谌小岑

(一)

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先生来到天津。他是应新改组成立的由男女学生联合组成的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到天津讲演的。这次讲演会是觉悟社社员提议发起组织的。所以,李大钊在讲演以后,又特别提出要到觉悟社同社员们见见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中国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先驱人物,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开会成立的。由于当时女子师范、高工、第一师范都在河北区,所以暂时由一个女社员匀出一间客房来作为临时社址,地点在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十一月迁到东兴里)。这是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张书桌,一张折叠的饭桌,几把椅子和两张靠背椅,我们请李大钊先生坐在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十几个人都站着听他讲话。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李大钊那种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在他身上没有半点骄矜之气,讲话时他总是用勉励的词句。他衣著朴素,穿一件蓝长衫,外罩一件黑色马褂,和我们十几个人拥在一间小房子里,象一家人一样和睦友好地亲切叙谈着。这便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缘由。

觉悟社一位最年青的社员邓文淑(即邓颖超,当年才十六

岁），简单地向他介绍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先辈学习。李大钊用赞许的口吻说：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这样一句简短的鼓励之词，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

下午四点钟，由周恩来、谌志笃陪同李大钊到新车站，乘火车回北京去了。

(二)

李大钊先生在天津的讲演里，勉励大家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我们在他的启发下，开始阅读他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之妇人问题》等，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全体女社员对于《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深感兴趣，反复传颂，如获至宝。

在这以前，我们大部分的社员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那是“过激派”搞的，并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意思。就我个人来说，“五四”前夕，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北洋大学同学一班十六个人去唐山实习测量。当我看见那里的煤矿工人，蓬首垢面，衣不蔽体，食住情况十分恶劣，矿井安全毫无保障，而那些英国人则骄奢淫逸，作威作福……我有过第一个想头，认为如果这些吸血鬼不逃跑，中国的工人同胞得不到拯救，我们学了工程技术，空谈“救国”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当我第一次读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受到很大启发，就同黄正品（即黄爱，当时他是高工学生）谈论，在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少数外国鬼子和中国工人的对立。

在我们的心目中，原来只是从传说中知道俄国是西方一个最腐朽的国家，那里有过大批的“虚无主义者”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革命一定是那些“虚无主义者”干的。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后，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农民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们开始有一种崇敬列宁的心情。记得

我们曾集体写过一张传单，署名用“李宁二”，其实就是希望中国能出现第二个列宁的意思。这是读了李大钊的文章以后，才有的思想。

我们有几个人，特别是社友黄爱，常常谈到我们在学生运动以后，要从事工人运动。这显然也是因为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

(三)

1920年7月，天津“一·二四”、“一·二九”事件被捕的二十几个人释放了。觉悟社社员联名写信要我回天津（我已于1920年3月到汉口工厂作工），参加觉悟社的年会。我于8月初回到天津。这次年会有十四个社员参加，开了三天会，照了一张像。在年会上，周恩来同志提议，我们应同北京的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今后中国革命的进程。会后，有十一个社员到了北京。原意是想请李大钊主持召集一个座谈会，李大钊谦虚地说：这次座谈既是觉悟社发起的，应该以觉悟社为主体。至于邀请那些团体参加，可以大家商量。

会议在陶然亭召开，会址是少年中国学会选定布置的。到会的团体，除觉悟社外，还有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共有二十几个人参加。会议由刘清扬担任主席，邓文淑报告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周恩来谈了我们来北京召集这次会议的宗旨，对希望联合进步团体改造中国的意义作了说明。

李大钊先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对觉悟社邀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他说，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全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

当时决定，由到会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办法。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有李大钊、陈愚生、张申府。觉悟社的代表不是固定的，由在京的社员轮流出席。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过几次会。

几经商议，通过了少年中国学会代表起草的《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的第一句是“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同时，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宣言还说“我们这次联合……是要组织起来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约章》的第二条标明“即须举行之事业”为：“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还规定成立总通讯部和各地通讯部。

这次集会所决定的事项虽然有许多没有实行，但参加这次集会的人，包括觉悟社社员和其他几个团体的人，后来有不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本成员。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出版）

5. 少年中国学会

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节录）

王光祈

本会在去年6月30日发起。同人为郑重其事起见，筹备期间预定一年，应于今年7月1日开成立大会。现刻本会同人散居各地，不易聚集。兹特将开成立会时所应报告各事，提前通知，以便选举职员，督促会务进行。

本会同人在本会未发起以前，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规模。去年留东同人归国，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书中历叙同人今后进行，宜为一种有统系的有秩序的，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其时东京会员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设学会之计划，乃先

派雷宝菁君归国接洽一切，同人意见遂归一致。曾琦君、张尚龄君亦先后由东京归国，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岳云别墅之会议。

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清、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遂由王君光祈起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岳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君大钊商榷一切。于是本会规约七十条全体产出。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清、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七人也。

本会同人为何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吾人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夫少年中国之形式为何如乎？则应之曰：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

盖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故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则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何则？彼所创造之意大利、德意志，固非适合于二十世纪之思潮也。同人等因个人观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亦有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更有以安那其式 Anarchism 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吾人既抱有如斯简切明了之目的，又将遵何道以达吾人之希望耶？欲答此问，请略述本会之宗旨：

(一) 振作少年精神 本会既为青年活动团体，故出版书

报，多系鼓吹青年之作。盖青年者，吾人所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也。

(二) 研究真实学术 同人等主张凡事皆本于学术，见诸事实。故会中有科会、学术谈话会等之组织，皆所以达研究学术之目的者也。

(三) 发展社会事业 本会同人大半皆从事教育实业，亦即同人等所视为建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好手段也。

(四) 转移末世风气 本会信条，在积极方面，则有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之规定；在消极方面，则有第十四条概括规定之禁约，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以造成一种善良之风气。

以上所述系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发起时之情形。今再就筹备期间一年中之会务详述如下：

当时规约既已拟定，遂组织筹备处，设主任一人，会计交牍各一人。公推王光祈君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无君为文牍。又设临时编译部，公推李大钊君为主任。其余会员皆归入编译部办事，为临时编译员。筹备期中所有会务已见诸实行者：

(一) 刊布图书 八年一月刊布《国体与青年》一书，为会员曾琦君著。其余在编译中者尚有数种。

(二) 发行杂志 从八年三月一日起，创刊《会务报告》。每月发行一次。近似于七月一日开成立会时，创刊《少年中国》月刊。原来之《会务报告》，即并入此项月刊内。

(三) 举行讲演 本会同入散居各地，不易聚集，故每期《会务报告》皆请名人撰述一篇，以代讲演。

(四) 供给材料讨论问题 此事虽有少数会员业已履行，惟尚未如当时预期，此实由于科会进行未臻活泼之故。本会研究学术成绩之有无，全视科会进行活泼与否为断。故此后选举科会主任一事，极宜注意。

(五) 学术谈话会 此条在当时规约中并未规定，惟上海会员魏嗣奎、宗之魁、张尚龄、曾琦、李璜、周元（李、周二君现已

赴法) 诸君, 欲互相交换智识, 乃有斯会之组织。所谈均有笔记, 成绩极佳。此实为本会筹备期中一极好之现象也。

(六) 印刷储金 此事由吴淞会议决定, 现刻多数会员业已实行, 以养成吾人之储蓄习惯。

(七) 会员人数 本会对于会员资格限制极严。凡加入本会者, 须有会员五人介绍, 经评议部认可。现在筹备期间, 评议部尚未成立, 须俟七年一月开成立会后, 评议部正式成立, 再为请求追认, 方能取得会员资格。兹就筹备处所收到之入会愿书, 其人数如下:

交科十二人: 周 无、魏嗣奎、宗之魁、赵曾俦、易家铎、
沈懋德、彭 举、李劭人、袁同礼、左学训、
黄日葵、许德珩

工科四人: 雷宝华、赵世炯、郑尚廉、葛 津

经济科四人: 陈 清、李 璜、李大钊、王光祈

政治科四人: 曾 琦、张尚龄、刘正江、雷宝善(已故)

商科一人: 涂开舆

(八) 联络友会 本会同入曾经决定永远不与其他学会合并, 然有宗旨相同之学会, 亦可联成友会, 互通声气。月前东京、北京、湖南方面皆有宗旨相同之学会愿与本会联成友会, 惟未经正式接洽, 暂不宣布。

以上所述皆系筹备期中会务进行之状况。将来本会正式成立, 如办理得法, 必能蒸蒸日上。盖今日全国之青年已渐臻觉悟之境, 本会实为应运而生之团体也。

(后略)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 1919年5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①

本会于去年6月30日发起, 预定筹备期间一年, 应于今年7

① 标题是编者加的。

月 1 日开成立大会。在京同人特于 7 月 1 日午前十钟齐集回回营陈宅开正式成立大会，由王光祈君主席。首由王君发言，略谓本会于去年 6 月 30 日起发起，当时预定筹备期间一年，至昨日止恰满一年，故特于今日开成立大会。今日开会程序分为两部分：首先报告筹备期间所经过之情形；次再讨论选举职员及今后进行方法。（一）报告经过情形，本会会员散居各地，召集甚不容易，故筹备处特将开会应行报告各事，提前两月通知，已于第三期《会务报告》详载一切，无庸赘述。今日所应报告者即五、六两月所发生关于会务之事情。第一、联络友会。6 月 13 日清华学校仁友会与本会开第一次恳亲大会，由王光祈、曾琦、袁同礼三君代表本会赴会。第二、成都于 6 月 15 日成立分会。第三、本会五、六两月新加入会员十八人（包括成都分会会员）。本会现在共有会员四十二人。第四、筹备期间内收支状况。第五、本会发起人雷宝菁君旅榘归国筹备安葬情形。以上所述皆系报告经过情形。（二）讨论选举职员及今后进行方法。选举评议员一事，各处会员业已投票，选举者尚不及会员全额之半。今日是否有发表之必要，请大家表决。到会者皆主张暂缓发表，一俟投票者已逾半数，再为发表。未经选出职员以前，所有会务仍由筹备处主任负责办理。月刊编辑职员，亦俟评议员举出后再由评议部选举，此时暂由筹备处主任兼办，并由到会者议定月刊宗旨。至于今后会务进行方法，到会者均主张渐进，用一种步步为营的办法。次讨论规约，大体无异议，惟规约第二条词句略有修改，作为一种提议，征求各处会员意见再为议定。会议既毕，逐欢宴而散。吾少年中国学会逐呱呱堕地矣。

（节录《少年中国》一卷一期“会务纪闻”，1919年7月15日）

关于修改学会宗旨的通告^①

会员诸君均鉴：本会于 7 月 1 日开成立大会，由李大钊、王

^① 标题是编者加的。

光祈、曾琦、陈澧、康白情、雷宝华六君提议，将规约第二条原文——“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词句较为简洁。诸君如有意见，请于一月以内通知敝处，以便改印规约。惟在海外者可展期三月。即颂
著祺。

少年中国学会谨启 7月1日

附录第二条修改后之词句，译为英文如下：

“Our Association deb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华文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一卷一期《本会通告》，1919年7月15日）

少年中国学会规约*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学会定名曰少年中国学会。

第二条 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第三条 本学会信条如下：

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凡中华民国之有志青年，由本学会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得为本学会会员。

第五条 凡中国人或外国人，以学术或经济赞助本学会者，经评

议部认可，得为本学会赞助员。

第六条 会员入学会时，须具入会愿书，遵守一切规约。

第七条 会员入学会时，须纳入会金一元。

第八条 凡会员均须选择下列各科之一种以研究之：

一、文科；二、理科；三、工科；四、农科；五、医科；六、商科；七、政治科；八、法律科；九、经济科。

第九条 凡会员认定专习科目，若中途更改，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部认可。

第十条 会员有选举及被选举为本学会职员之权。

第十一条 会员有使用本学会各种设备之权。

第十二条 会员有建议于评议部之权。

第十三条 会员有编译调查之义务。

第十四条 凡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评议部提出警告书，送交该会员，劝其从速悔改。

- 一、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之行为者；
- 二、与各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
- 三、违背本学会信条者；
- 四、对于会务漠不关心者；
- 五、介绍会员不加审慎、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

第十五条 凡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经评议部调查确实后，召集临时大会表决，由本学会宣告除名：

- 一、违背本学会宗旨者；
- 二、利用本学会名义为个人私利之行动者；
- 三、既入本学会后又加入其他党系、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
- 四、会员人格上有重大污点、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
- 五、犯第十四条之禁约、关于同一事件已继续提出警

告书二次而无悔改之望者。

第十六条 凡会员自愿退会，须提出理由书于评议部。

第十七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退会会员须缴还徽章及一切证书。

第三章 会 务

第十八条 发行报章，本学会发行报章，为研究学理及会员通讯之用。

第十九条 刊布图书 本学会编译丛书，以为补助教育之用。

第二十条 举行讲演 本学会按期由执行部推荐会员或延聘名人讲演，以益学识。

第二十一条 解释疑问 会员于学理或事实上发生疑问时，得提出于科会研究之。如科会不能解决，应由该科主任征求中外学者意见以解决之。

第二十二条 供给材料 凡关于某科需要之材料，某科科会主任负供给或介绍于该科会员之责，该会员有研究答复之义务。

第二十三条 学术谈话会 凡一地方有会员三人以上者，即应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智识。

第二十四条 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之细则，另以专则定之。

第二十五条 本学会除力行上列各项外，当随时扩充举办有益事业，以图发达。

第四章 机 关

第二十六条 本学会设总会于北京，综理全国及外埠分会事务。各省外埠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分会。

第二十七条 本学会机关分为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三种。

第二十八条 评议部由评议部主任一人、评议员若干人组织之，对大会负责。

- 评议员额数由大会酌定之。
- 第二十九条** 评议部有议决及监督全会会务之权，但须经大会同意者不在此限。
- 第三十条** 本学会临时发生紧急重要事件，不及召集临时大会时，得经评议部议决，经交执行部执行，俟开大会时请求追认。
- 第三十一条** 评议部得提出议案于大会。
- 第三十二条** 评议部于开大会时，须派员出席报告经过情形及经济状况。
- 第三十三条** 评议部有审查预算之权。
- 第三十四条** 评议部议事，以评议员过半数之同意决之；赞否同数时取决于评议部主任。
- 第三十五条** 执行部正副主任各一人，办理本部事务，对评议部负责。副主任赞襄正主任办理会务，正主任缺员时代行其职权。
- 第三十六条** 执行部分总务、交际、调查、会计、庶务五股，其办事细则另以专则定之。
- 第三十七条** 执行部有执行本学会对内对外一切会务之权，但须经大会或评议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 第三十八条** 执行部须编制预算及提出决算案于评议部。
- 第三十九条** 执行部得提出议案于评议部。
- 第四十条** 编译部由编译主任一人、编辑员若干人组织之。编译员额数由大会酌定之。
- 第四十一条** 编译主任综理本会编译事务，编译员分担本会编译事务。
- 第四十二条** 第八条各科会员，得组织各科科会，讨论该科问题，由该主任召集之。
- 第四十三条** 本学会设书记、校勘若干人，由主席或各部主任于会员中指充之。

第四十四条 本学会设出版部。

第四十五条 本学会设图书室。

第四十六条 本学会设阅报室。

第四十七条 本学会设体育室。

第五章 职 员

第四十八条 评议员由大会用无记名连记投票法从会员中选举，以得票满投票人数五分之一以上之最多数者为当选，其得票次多者为候补员，票数相同时以抽签法定之。

评议部主任由评议员互选，以得票过半数者为当选。

第四十九条 执行部正副主任及编译部职员由评议部从会员中用无记名连记投票法选出之。编译主任由编译员互选之。

第五十条 执行部之各股主任及股员由执行部正主任从会员中推荐之。

第五十一条 第八条各科主任由各科会员互选之。

第五十二条 出版部经理一人，由评议部选举或聘请之。

第五十三条 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选举，以得票过半数者为当选，其次多者为候补员，票数相同时以抽签法定之。

第五十四条 职员任期一年得连任。

第五十五条 职员辞职，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部同意，得听其退职。

第五十六条 职员有违背本规约者，经评议部议决，得命其退职。

第五十七条 职员有缺额时以候补员充任。

第六章 会 议

- 第五十八条 会员大会由全体会员组织之。
- 第五十九条 会员大会于每年七月一日开会一次，由执行部召集之，其会议事项如下：
一、表决评议员及编译员人数，选举评议员；
三、议决预算；四、讨论本会进行要项；五、议决评议部之提案；六、议决会员之提案；七、承诺第三十条事件。
- 第六十条 本学会临时有特别重大事件，由评议部议决或会员十人以上连名要求，经评议部审查后，通知执行部召集临时大会时，会员三十人以上连名要求召集临时大会时，不必经评议部审查，执行部须依其要求即刻召集之。
- 第六十一条 执行部通知召集临时大会日期及所议事项，须酌量道路远近，提前付邮。
- 第六十二条 开大会时，须全体会员三分之一以上到会，始得开议；开议时以年长者为主席。
- 第六十三条 会员提案，须五人以上连署，始得付议。
- 第六十四条 表决议案之法，以投票者之过半数决之；赞否同数时，由主席采决；表决权得以书函代之，视为到会投票。付议事项与该会员私人有关系者，该会员无表决权。

第七章 会 费

- 第六十五条 本学会会费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会员入会金；二、会员常年捐；三、职员特别筹募；四、赞助员之赠与。
- 第六十六条 会员常年捐二元，每年7月1日开会员大会时缴纳。

第八章 附 则

- 第六十七条 本学会分会得自行议定规约，但不得与总会规约抵触。
- 第六十八条 本学会总会与分会之关系，另以专则定之。
- 第六十九条 本规约须经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之表决，始得变更。
- 第七十条 本规约自议决日实行。

(《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

少年中国学会历届职员名单

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届职员名单，散见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周年纪念册》和《少年中国》月刊中。这里发表的名单，是根据上述刊物的有关记载加以校订之后重新编排的。名单中的说明基本上根据原材料。各届职员个别的和暂时的更动，以及各届名单的材料来源，另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编者

1919年7月1日以前学会筹备期间职员名单

本名单是根据《周年纪念册·会务报告》第一页的有关记载，并参照《会务报告》第三期重新编排的。

——编者

筹 备 处 主 任：王光祈

会 计：王光祈（兼）

文 牍：周 无

临时编辑部主任：李大钊

编译部临时编译员：魏嗣銮 宗之魁 赵曾铸 易家铨
沈懋德 彭 举 李劭人 袁同礼
左学训 黄日葵 许德珩 雷宝菁
赵世炯 郑尚廉 葛 津 陈 清

李 璜 曾 琦 张尚龄 刘正江
雷宝华 涂开舆

第一届职员名单

(1919年7月—1920年7月)

本名单是根据《少年中国》一卷二期“会务纪闻”，并参照《周年纪念册》中的第一届职员名单加以补充订正，重新编排的。
——编者

评议部主任：曾 琦^①

评议员：左舜生 宗白华 雷宝华 易克嶷

(评议部系监督会务进行、选举各项职员、审查会员资格之机关。)

执行部主任：王光祈^②

副主任：陈 清

(执行部系办理本会对内对外一切会务之机关。)

编译部编译员：李大钊 徐彦之 袁同礼 陈 清 康白情

黄日葵 孟寿椿 苏甲荣 王光祈

(编译部系审本会丛书之机关。1920年4月10日，恽代英由执行部推荐为组织丛书编译部专员。)

总务股主任：王光祈 (兼)

庶务股主任：邓 康

会计股主任：孟寿椿

文牍股主任：黄日葵

交际股主任：徐彦之

月刊编辑主任：李大钊

副主任：康白情

① 曾琦于1919年8月赴法留学，辞去主任一职，因当时来不及改选，暂由左舜生代理。——编者

② 王光祈于1920年3月赴欧，执行部主任一职暂由陈清代理。——编者

第一组月刊编辑员：李大钊 康白情 徐彦之 孟寿椿 黄玄
陈清 袁同礼 沈懋德 刘正江 雷宝华
周炳琳 王光祈

（本组编辑第三期，系9月15日发行，8月20日以前齐稿。）

第二组月刊编辑员：田汉 宗之魁 左学训 易家钺 黄忼华
黄日葵 苏甲荣 赵曾侔 彭举 李哲生
李劫人 孙少荆

（本组编辑第四期，系9月15日发行，8月20日以前齐稿。）

第三组月刊编辑员：魏嗣銮 李璜 周无 许德珩 陈宝锜
罗益增 雷国能 涂开舆 段子燮 张尚龄
陈登恪 曾琦

（本组编辑第五期，系11月15日发行，10月20日以前齐稿。）

说明：一、以上分组之规定，系按照各编辑员所居之地方以为分配标准。譬如第一组编辑员多居北京及其他各埠，第二组编辑员多居东京及长江流域各省，第三组编辑员多居欧美南洋等处，纯为收集稿子便利起见也。

二、各组编辑员轮流编辑，每三月轮流一次。譬如六、七、八期之月刊，则应由一、二、三各组依次分任编辑是也。

附：编辑部名单^③

李大钊 康白情 张崧年 孟寿椿 黄日葵

第二届职员名单

（1920年7月—1921年7月）

本名单是根据《少年中国》二卷二期和二卷四期的“会员消息”，并参照第一届职员名单补充订正，重新编排的。

——编者

评议部主任：左舜生

^③ 根据《少年中国》一卷八期“会务纪闻”所载，1919年7月推定的编辑主任李大钊和副主任康白情，均“因事未能执行职务”，实际上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王光祈。王光祈出国前夕，学会才议决重组编辑部，改由李大钊等五人负责编辑工作，一编者

评 议 员：李大钊 恽代英 杨贤江 余家菊 孟寿椿
黄 玄

候补评议员：宗家魁 黄日葵 陈 清

执行部主任：陈愚生^①

副 主 任：邓仲澥

苏演存（兼）

月刊编辑主任：苏演存^②

副 主 任：黄日葵

第三届职员名单

（1921年7月—1922年7月）

本名单来源于《少年中国》三卷四期《总会通告》中的有关记载。按规定，职员名单应在开年会时发表，但由于国外会员的投票延至9月10日还未收齐，故迟到11月才发表。本届编辑部名单，月刊没有记载，这里暂缺。

——编者

评议部主任：左舜生

评 议 员：恽代英 苏甲荣 李大钊 余家菊 陈愚生
邓仲澥

候补评议员：黄日葵 杨效春 杨贤江 邵爽秋

执行部主任：杨钟健

副 主 任：陈 政

① 1920年12月8日陈愚生因事离京，执行部主任改由邓中夏代理，邓中夏决定于1921年赴粤任教，执行部主任一职改由陈仲瑜代理，后因邓中夏赴粤未成，执行部主任一职又改由陈、邓二人共任，直至届满为止。——编者

② 苏演存于1921年1月坚辞编辑主任一职，会员推黄日葵代理。黄日葵坚辞不受。后又经苏演存提议，经北京总会临时会议决定，将编辑部迁往上海，改由右舜生任编辑。——编者

第四届职员名单

(1922年7月—1923年7月)

本名单是根据《少年中国》四卷二期和四卷三期的执行部和评议部通告，重新编排的。编辑部名单原缺。

——编者

评议部主任：左舜生

评 议 员：苏甲荣 李大钊 陈 政 邓仲澐 杨钟健
陈启天

候补评议员：邵爽秋 恽代英 朱自清 谢循初 杨贤江
高尚德 刘仁静 曹 乌 陈愚生

执行部主任：杨钟健

副 主 任：刘云汉

会 计：刘云汉（兼）

第五届职员名单

(1923年7月—1924年7月)

本名单是从《少年中国》四卷十一期“学会消息”中摘录下来的。编辑部名单原缺。

根据《少年中国》四卷八期《少年中国学会紧急通告》中的记载，1923年10月14日苏州大会议决将总会由北京迁至南京，当时第五届职员尚未选出，这项决议还是由第四届评议部通过的。11月1日，南京分会根据上述决议着手组织总会，并选陈启天、曹乌为临时执行部正副主任，沈昌为会计，接办北京总会事务。直到第五届评议员选出，并将执行部主任正式确定后，这个临时执行部才停止行使职权。因此，第五届职员执行会务的时间，虽然按规定应为1923年7月——1924年7月，但实际上却与此并不相符。同时，根据这个材料以及会员选票未能按时交回等有关记载也可以推知，历届职员开始执行会务一般都比规定时间晚几个

月，而结束工作也晚于规定时间，并且这种现象愈到后期则愈普遍。

——编者

评议部主任：左舜生

评 议 员：杨效春 杨贤江 恽代英 邓仲澐 李儒勉
倪文宙

候补评议员：黄仲苏 恽 震 李大钊 苏甲荣 田 汉

执行部主任：陈启天

副 主 任：李儒勉

第六届职员名单

(1924年7月—1925年7月)

本名单是从1925年《会务报告》第一期中摘录下来的。第六期评议员名单尚未发现。

执行部主任：杨效春

副 主 任：李儒勉

会 计：唐 珏

编辑主任：黄仲苏

对内发行：唐 珏

对外发行：吴俊升

编辑部会计：沈 昌

校对及杂务：杨效春

改组委员会名单^①

委 员：吴俊升 曹 台 黄仲苏 李儒勉 舒新城

候补委员：金海观 王潜恒

^① 根据《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消息》（油印本），该委员会是在1925年7月南京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编者

（《五四时期的社团》）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刊物^①

《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②

(丁) 发行月刊 本会发行月刊两种：

(一) 《少年中国》月刊注重

}	文化运动
	阐发学理
	纯粹科学

(二) 《少年世界》月刊注重

}	实际调查
	叙述事实
	应用科学

《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从第八期起，组织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春椿、黄日葵五君担任编辑事宜，用会议制，每月开会一次。黄君日葵兼负催稿之责。

“学会消息”一栏，则由陈清君担任编辑。

(编者按：第七期以前，系由王光祈君编辑。)

《少年中国》第四期，系由本会自行经营印刷发行诸事。从第五期起，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本会所发行之《少年中国》，只能登载关于哲学、文学、纯粹科学等项文字。所有本会工农各科会员，常有应用于应用科学之作，均以体裁不宜，不便在《少年中国》发表，深以为憾。且《少年中国》专载理论文字而无实际调查之记载，亦系一种缺点，故由会员提议再发行第二种月刊，名曰《少年世界》。

《少年世界》由南京会员编辑，系由南京会员全体组织编辑部，分为数组，轮流编辑。黄君仲苏兼负催稿之责。《少年世界》从第一期起，即委托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事宜。

《少年中国》由宗白华、左舜生两君担负校勘责任。

^{①②} 标题是编者加的。

《少年世界》由张闻天、沈泽民两君担负校勘责任。

(编者按：宗君已于今年五月赴德，张、沈二君将于今年七月赴日，以后两种月刊由上海会员左舜生、王崇植、吴保丰、恽震四君分校。)

送阅交换各事，从今年三月十五日起，由北京会员苏甲荣、南京会员赵叔愚、上海会员左舜生三君担任付邮。

两种月刊之发行事宜，由左舜生君随时与亚东图书馆交涉。

《少年中国》系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创刊，现在销路五千份。

(编者按：第四期《妇女号》，八、九两期《诗学研究号》，约第七千。)

《少年世界》系民国九年一月一日创刊，现在销路五千份。

(节录《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会务报告》第三节，1920年)

6. 北京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顾兆熊 李大钊 蔡元培 陈独秀 胡适
周作人 陶履恭 程演生 王星拱 高一涵

张崧年 李辛白 孟寿椿 徐彦之 陈溥贤
罗家伦 王光祈

关于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工读互助团简章

- (一) 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 (二) 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 (三) 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
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
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 (四) 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
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 (五) 工作种类 暂分九种：
一、石印；
二、素菜食堂；
三、洗衣服；
四、制浆糊；
五、印信笺；
六、贩卖商品及书报；
七、装订书报；
八、制墨汁及兰墨水；
九、其他。
- (六) 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 (七) 设备 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 (八) 组织 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

设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

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

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 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工作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 出团 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 附则 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

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报名愿入本团者，请注明愿在本团何组工作。

通讯处：北京东华门内宗人府东巷蓬庐王光祈。

(《少年中国》1卷7期)

《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四) 在五四运动中

1. 《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

苦了章宗祥的夫人

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時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把一位公使的夫人吓得哭了。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忍这样恶作剧！

怎么商团又要骂曹？

段内阁和寺内内阁时代，前后二万万圆的借款，抵押了无数的矿山铁道和森林，不用说都是日本西原氏、中国章曹陆诸人的大功。破坏铁道统一的功劳，也算曹汝霖第一。这回设法妨害巴黎专使提案的亲日派卖国贼，还没有查实是谁。上海商业工团，又居然归功于曹汝霖。我想曹汝霖必然暗中笑道：就是你们中华民国的全国国民都站起来骂我，我不但不怕，而且正于我有大大的利益。

(双眼)

陆宗輿到底是哪国的人？

有人说中华汇业银行是中日合办的，有人说完全是日本的银行，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为了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的事，那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輿，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满纸的贵国贵政府。这中华汇业银行到底是哪国的银行，陆宗輿到底是哪国的人，我们实在弄不清楚。

(双眼)

(《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

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

一、四日事件以先的酝酿 山东问题在最近两三个月里，成了中国外交上唯一的大事件，国人的动作很活跃。最近一个星期里竟有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而所以失败的缘故，一大半为着国内有亲日派暗中动作，所以国民的愤怒达于极点。不特各地自行动作，并且互相来往，山东人到北京来，北京的公民到山东、上海去。共同的目的是外而争回青岛，内而惩罚国贼。3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的军人——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国民对日本人取最坚决的对待，更于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的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4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因为等不及5月7日了。这举动议决的时候，已经夜十一点钟。

二、四日上午的学生代表会 4日上午已经有几个学校制造旗子，预备出发；也有几个学校，前一夜的临时大会不曾知道，所以本日上午十时，又在堂子胡同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到会的有十二个专门学校，并且有一个陆军学校也派代表列席。这个会在一个半钟头里议决了几件要事：（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街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这会里最可记的，就是大家议论行事很迅速，面上都带着很愁很怒的颜色。

三、四日的示威事件 这天下午一时半，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或两个白旗，旗上写着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还我青岛”，“不复青岛宁

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取消二十一款”，“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等，好几千面没有同的。有也用英文法文写的，也有画很有刺激力量的图画的。到两点钟整队出中华门前面，两面很大的国旗当中夹着一付挽对，上面是“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旁边写“北京学界泪挽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遗臭千古。”到了东交民巷西口，使馆界巡警不放行。大队就退出交民巷，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街、石大人胡同，直指赵家楼曹汝霖宅去了。沿路散了许多传单，许多人民看见掉泪，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原有传单一件略〕

到了曹家门前，大家齐呼“卖国贼呀！”曹宅的周围有二百多个巡警站着不动。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緝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学生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翻，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苏佩秋，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这天晌午，曹和陆章二人都在总统府宴会，有人劝曹不要回去，曹说：“怕些什么？”所以就同着章宗祥回家，就碰到这桩事。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了个晕倒血流、头盖上露骨。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到这时候，火势已大，不能再停，一齐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就带队赶到。曹看打人的已去，才从老妈子的屋里出来，大喝吴氏疏忽，还说：“你快快把这些不知道曹总长利害的混帐学生全给我捉去。”吴有点迟疑，他又说“有我哩！”吴才下令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捕到三十二人。然而曹也不再停，坐着吴氏的汽车，带着武装，携着秘密文件一箱，直往东交民巷。交民巷的巡捕因为他车上有武装，行的又太快，把车夫汽车捉了去，他一个人只得躲到六国饭店去。

四、曹章陆方面的所闻所见 曹到六国饭店就打电话给老徐，请替他作主。接着慰问的人来了许多，有梁士诒、许世英、龙济光等，和旧新交通系的要人，新国会的有康士铎、胡钧等，日本人方面有公使馆员、满铁当局、新支那记者。至于外国人方面只有葡萄牙公使，送了一个名片。外人都说他是“政治上死了。”然而他的活动却不休，当晚聚了与党，开一个秘密会，设了许多计策。次日到日使署，又次日到日华同仁医院，上了个辞呈；把老徐牢牢把住，说他历次的外交事件，都是老徐当局。又拉上陆征祥、顾维钧，说二十一条是他三人定的。章被打得不省人事，他的门徒在司法界的很多，这几天一个个都在大活动。陆是一天到晚的东奔西走。至于他们的密计是什么？记者可就不得而知了。

五、被捕学生的经过 捕学生的是巡警、宪兵、游緝队。游緝队捕几个人到步军统领衙门去，很虐待的，曾把他们放在站笼里登了几点钟，当晚十二点钟送到警察厅去了。巡警、宪兵捕去的稍须好些，但是被捕之时，也不免挨几下打。到了警察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行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从他们警厅方面看来，也算优待。然而房屋的腥臭，行动的监视，小便的限定次数，在受之者已甚苦了。各方面保释的人极多，有商会、山东同乡会、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等，都无效。后来各校长以全力担保，警厅才许保释。但是被捕的学生都不愿出去，经吴炳湘再三慰劝，然后才各回各的学校。

六、杀气腾腾的国耻纪念日 国民外交协会原定于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忽然被政府禁止。从当天上午十时起，中央公园的门封了，天安门左右两三里间的交通断绝了。南至中华门，东西至两个三座门，都被两千多巡警、几百马队、几百步队、千多什么军布满，如对大敌一般。四围集聚赴国民大会的人，约七八万，因为没有集中地点，慢慢散去。然而在道旁和中

央公园门前——十点钟以前集合——的人，还能集合演说，不久便为马队冲散。有的往先农坛，有的往商会，又都被军警解散。有的往国民外交协会，这里的会虽开成功，也因地方太小，人数太少，没有什么结果。这天的国民大会，总算被暴力压散，但是公民的怨怒已达极点了。

七、各团体的活动 几天以内，国民外交协会里，无日不开会，无会不激昂。商会也天天集议。七日的会没开成，大家更怨怒极了。罢市的传说，已经很盛，抵制日货的见端，已经有了。原来商人恨卖国派的情形，在一切外交案件以外，还加上个直接受痛的中交钞、捣乱币制的条例和借款。所以他们议决的：（一）坚持外交；（二）惩办国贼，（三）释放学生，是“以死力争。”学生方面已经组织了个精密、稳健、有条理而又勇猛的团体，虽然已经上课，力量却是一天大似一天。山东人在北京的尤其的活跃，所筹划的对外对内方法非常之多，各地方响应的每天数十起。就是北京的新国会，也提出了好些查办弹劾质询案。政客的活动不消说了。现在已经成了许多问题堆在一起，这两天外表似乎稍平静，而里面的政潮仍是很大。

八、亲日主战派的眼中钉 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商民听了更是愤愤不平。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把大学学生所有的举动，归到蔡校长一人的身上。这里头自然免不掉那纲常名教派的人从中鼓动。国务会议时，钱对傅说：“你说蔡的地位不能摇动，那么蔡死又怎么样？”于是外间盛传某上将已调廊房某军进京，已向政府提出以马其昶为大学校长。9日夜间，政府居然发出三道命令：一是查办北京大学校长（这条命令中途收回了），一是学生送交法庭，一是整饬学风。蔡校长得此消息，就于10日早八点钟出京去了。各校学

生听得蔡校长被政府逼走了，大为愤恨，相约在数日内，政府倘然还不觉悟，全北京的学生都一律罢课，都以蔡君的进退为进退。此时京中各校的教职员学生，都认为这正是黑暗势力和教育界全体开战的起首。

2.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节录)

杨 晦

巴黎和会召开了，特别美国总统威尔逊临到巴黎去参加会议时曾宣布他的和平条件十四点，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更引起了我们的幻想。但是，到后来，半点也没有做到，所以，有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抵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象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五月七日，就是袁世凯跟

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五月七日了。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五月四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象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的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

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多，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的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纪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

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逮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三十二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的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议论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五月七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了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十五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抵制日货时，大家戴的日本货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十九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二十六个学校的校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六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十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拟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六月二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六月三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六月十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到这里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这次运动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

3.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段芝桂、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以宣告，敬希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节录）

高一涵

.....

五四前，大家都对现政府不满，彼此的区別不明显。五四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胡适派后退了。青年学生中，落后的加入国家主义派，中间的加入国民党，最前进的加入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守常从五四运动以后，经常领导青年学生和工人们进行革命活动，遭受北洋政府的注意，在他的住宅门外设下一个警察岗

位。从此，我们交谈都是在北大学学校里。

一九二四年后，守常负责领导北方革命的实际行动，为避免反动军阀迫害，转入地下工作，我们会面的时机就少了。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到达武汉，守常劝我往武汉参加革命工作。我在武汉中山大学任教，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听到守常光荣牺牲的消息，不胜悲愤，自此与守常永别了！守常虽然死了，守常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五四运动回忆录》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4 “挽蔡”

蔡校长辞职后所闻

教职员之言动：蔡校长出京消息已传遍该校，虽蔡校长留书以工科学生温宗禹暂代校务，但一时校内极为不靖。北京大学遂于前晚（9日）八时，开一教职员会议，决定推举代表八人赴教育部，请傅总长设法挽留蔡校长。昨日下午一时，所举定之代表马序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齐赴教育部，谒见傅总长，请其设法挽留。傅总长当对各代表宣明自己诚恳挽留蔡校长之态度。各代表复问总统总理之意如何，傅总长默默有间，谓总统总理之意见，余未深知，故余亦无从代为宣布云。谈至此，各代表遂退出。闻北京大学各教职员之意，如不能挽回蔡校长，亦决定总辞职云。

（《晨报》1919年5月11日）

5. 李大钊谈五四运动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太上政府》

《新华门前的血泪》

《哭的笑的》

《威先生感慨何如？》

《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以上均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6. 促进中日人民的交往

李大钊致吉野作造信

释启：

赐下黎明讲演集均收阅，谢谢。

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尊论正大公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尊议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甚喜甚幸。顷商之敝校教授连，均极赞成。惟详细办法，须俟蔡校长回校后，始能议定。至时当详函以告。

陈独秀先生因发布《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捕拿，乞持公论，遥为声援。

吉野博士

李大钊

（1919年）6月15日

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

自北大游日学生团方豪、孟寿椿、康白情、徐彦之、黄日葵五人来日后，颇惹起此间各界之注意，或以为来比作排日之宣传

者，或以为来此调查排货之影响者，或又以为系来此鼓惑日本青年者，或又以为系受日本新文化运动感召而来，可以受日本之软化者，揣测纷纷，不一其词。日本报纸间亦多作此事之评论。该团自5月5日到东京，即从事与日本新思想之学者及大学生，接洽交换文化上之意见。所接洽之团体有黎明会、新人会、劳学会、建设者同盟、友爱会、冷忍社、六日俱乐部及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学生会、同志社、大学学生会等，所会晤之学者有吉野作造、森户辰男、宫崎滔天，细川柁次郎、今井嘉幸、片上伸，潭新次郎、木村久一、大山郁夫、长谷川如是、闲节田畑、麻生次藏与谢野晶子、西川辉、荒畑胜之、河上肇、贺川丰彦等。该团5月11日与新人会晚餐会，吉野作造、森户辰男、康白情、黄日葵诸君皆出席间有演说，不外论扩大国民外交之必要与无诚意的中日亲善之不可能。席终，赤松克麿君演说新人会与少年中国学会之握手，由康白情君致答，此后视通声息，交换印刷品。12日访问东京新村支部，晤其执事者长岛。彼君谓新村主义乃将以渐进的方法，诱致世界大同，如俄国列宁党徒之行动，彼辈实不赞同云。13日与东京帝国大学辩论部演说会，康白情君演说“大和魂与世界之文化”，略谓大和魂之精神在重名誉，尚廉耻、勇敢、轻死，实为人类应具之美德，惟此种精神推之日海而准，但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今日本人以此精神作利己国而损世界之事实，误以大和魂而发挥其数性……次方豪君演说“今日青年之责任”，略谓中国青年之所以排日者，实由日本之教育上采取军国民教育，致日本国民有侵略的国民性，此后世界已由国家主义而入于世界主义，改善此种不合世界新潮之旧教育，实为日本青年之责任云云。17日与“十七日会”之演说会。到会者中日人士各二三百人，颇为一时之感。首由高一涵君演说“中日亲善之障碍”，谓中日亲善障碍有三，一为帝国主义，一为狭义的国家主义，一为以中日亲善为手段而图达他种目的，吾人须竭力排除此三种障碍云。次早阪二郎君演说“国际生活更新之一大暗示”，

谓此后外交当由政府的而入于国民的。次方豪君演说“世界改造与思想之关系”，述中国排日乃基于世界主义的意义而非国家主义的意义。次由汉君演说“中日文化之结合”，谓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新文化运动实有共通之点，应结合以图共进。次康白情君演说“中日学生提携运动”，谓提携者非亲善之谓，乃由“义”之发展而立“义”，即“利”也，相利而无相损之谓也。今中日学生实处于同一难堪之境遇，吾人欲举提携之实，惟有互相扶助……，最后吉野博士演说“日支亲善之文化的意义”，即根据于“日支学生提携运动”之论文，而以中日不能亲善之罪全归诸日本军阀及财阀云云。19日与建设者同盟演说会，由北洋新次郎博士致欢迎词，说明中日智识阶级联合之必要。次康白情演说“东亚之新建设与中日文化同盟”，略谓东亚之足以有为之国家，乃中日两国。今两国青年既皆有改造世界之志愿，而欲以新建设代替旧组织，则两国青年为排除为障碍之旧势力起见，不可不为文化同盟。但此种同盟非形式的乃精神的，也非契约的乃事实的，末并提出文化同盟之四种办法云。

次片上伸教授演说，以水为喻谓，中日国民犹之水冷则结冰，然其不仍为水，今中日两国其上面虽结冰而下面仍有活水云。次孟寿椿君演说“最近中国思想之改革”，谓中国之思想由五四运动之结果而有一剧变，即由国家的而变为世界的，由静的而变为动的，由个人的而变为社会的，由机械的而变为自觉的云云。21日参观女子大学，麻生次藏校长中日今后该大学将实行升为大学而授以大学内之科目，将渐变其贤妻良母主义之教育方针云。22日与东京帝国大学青年会之晚餐会。席间方豪君用英语演说青年会之世界的意义，谓吾人之来日，非以国民之资格，政治家之手腕，而为国际运动乃以人类之资格，作人类间友谊之往来也云。29日与同志社大学欢迎会。校长海老名弹正演说，谓世界之创造的事业。耑赖青年。今日中国青年欲创造一新中国，而日本青年亦欲创造一新日本，两国青年须互相了解，共同努力与世

界文化之进云云。康白情君演说“世界和平与吾人之使命，谓世界战争之责任当由智识阶级负之，致世界于和平之责任，亦当由智识阶级负之。中日两国之现势，实有战争之可能性，中日青年会实有莫大之责任，吾人欲弥将来之兵祸而谋世界之和平，舍打破帝国主义无二法云。30日与六日“俱乐部”之欢迎会。首由户田博士演说，谓今日之社会问题莫大于劳动问题，然解决此问题，实则智识阶级自身之觉悟而放弃其优越之地位并数俄国种种事实以为证明云。次康白情君演说“中国社会的改造”，谓辛亥革命为政治的改造，甚不彻底，此后当为社会的改造，改造之目的将以谋全人类之永久的最大安全与幸福，而建设一种尽善尽美之制度。惟此刻当在预备时代，目下所做预备事业可分为四种，（一）鼓吹如办报及教育等类皆是。（二）组织如设立各种团体，令中国社会有系统，有组织。（三）社会的建设如种种关于文化上之永久的设备。（四）实际运动如学生之群众运动及排货运动等皆是。并谓中国人重在言而能行云，次末广博士演说，谓中日须互相亲善，以阻白祸之东渐云云。最后高山义三君演说，谓予愿以人类之诚意的亲善为目的，而排斥虚伪的中日亲善云云。该团此行本为与日本学生交换文化上之意见，于日本并无危险，乃自“十七日会”开过之后，东京朝野怱闻，遂大惊小怪，谓中国学生言论过激，督促其政府注意，越二日，日本外务省遂有警告东京帝国大学之事实，以腾笑内外。而大学生早阪二郎亦被拘役一日，其家亦被检查。又自早稻田大学演说会开过之后，而木村久一教授越日即被捕而下狱，虽曰彼自有其他种种关系，而日本执政诸人之始终不觉悟，亦可想见矣。

（《晨报》1920年6月15日）

中日学生之谈话会

日本亚细亚学生会旅行团来京，由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介绍与学生联合会接洽。闻该会于20号下午1时，假北京大学

第二院开茶话会。日本学生方面到者有早大诸富一郎，庆大长滨松二，松下俊雄，拓大小杉三郎，明大伊藤七雄，拓殖楠木靖臣，古贺重雄，安武慎一等8人。学生联合会方面有林家慈，鲁士毅，高尚德，瞿士英，向大光，孟寿椿诸君，并请有邹宗孟，孙伯纯两先生翻译。其中谈话颇可记载，兹探录于下。

该会于20号下午1时20分开会。首由林君表示欢迎的意思，略谓诸君此次旅行敝国，并驾临敝会，同人等无任欢迎。中日两国感情素来颇好，因为军阀所扰，两国国民乃多有隔阂。今得此机会，彼此交换意见，从前猜疑当能冰释。次日本诸富一郎君致词，并言两国国民，应以诚意的接洽，为排除障碍之起点云云。瞿高两君先后发言，请报告亚细亚学生会之组织及其宗旨。日本伊藤七雄起立言曰，斯会于去年由中日学生各15人发起，其目的在改造亚细亚之基础。现时正在进行。至于宗旨，尚未完全确定。第二次在东京开会，中国学生到者甚多，有反对者，有赞成者，而反对派居大多数，日本学生因此愈深惭愧。自北京上海等处排日事起，斯会因之滞阻，至5月2日继续开会，筹商联络亚洲各国学生，组织斯会，期望成立。目前尚无他项团体加入，唯日本学生作会员云云。

瞿君谓听了伊藤君的话，贵会宗旨已明了。其大概，不过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进步是全体的，军阀是社会进步的障碍物。社会如白纸然，纸上有黑点，全体的白纸都受侮了，并非一部分的事，若这一部分与别的一步同时并进，社会始能进步，倘一部不及某部，必定是他生了障碍。要求社会进步与白纸上无黑点，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非一部人所能做到的，欧美亚各国的学生均有力焉。世界能进步与否，即视各国学生对于此于此点之热度为如何耳。

日本小杉三郎君起立，略谓深佩瞿君之语，此后吾人当以正义为根据，互相提携云云。

鲁君士毅谓诸位来到敝国，以亚细亚学生会名义与敝会接

洽，敝会同人于兹颇有所感触。窃思十八十九世纪人类的智识限光，尚不免有井蛙之见，时至今日，世界潮流已趋向于共同轨道，从前所谓国家主义、部落主义，实无存在之必要。即贵国发起之亚细亚学生会，虽云为联络亚州各国学生起见，然此种主义在吾人心目中，似觉有所偏向。昔日我们中日两国以国土人情上之关系，稍为接近，彼此的国交都讲亲善。中国人对内对外，素来以诚相见，所以我们对于贵国的亲善是实在的，此乃已成的事实，谅贵国人亦深知之。我以为世界是交通的，人类是进步的，我们当舍去大陆主义，进而为世界主义，然后适合于人类的趋向。学生会的联络，不必限于亚细亚，欧美诸国之学生未尝非吾人之良友。更进一步说，吾人同为青年，欲谋人类的幸福，当保持人类之和平。吾人所行所为，若与人类之趋向隔离太远，当然失去人类之同情，自身陷于孤立的地位。即如敝国此次因国内军阀专横，肇乱祸首，已由我国政府下令通辑，贵国公使不察事实，竟以正式文书送达我外交部，而一并收容之，且认为国事犯。比不特使我国国民对于贵国公使之不能满意，即英法美诸国亦大不以为然。国际间之条约尚难遵守如此，而欲谋彼此感情易于融洽，犹之新嫁娘勒令其即时生产，势有不能，或因此再引起我国国民排货之举动，亦意料中事。贵国公使听命于贵国政府，吾人深望贵国人民默察友帮之态度，敝国人民之心理，督促贵国政府即时觉悟，无为此越轨行动，致使两国感情日愈薄弱，而吾辈青年之希望，不能达到云云。

高君尚德谓，中日两国青年相聚谈话不必客气。亚细亚学生会之不适合于世界潮流，鲁君言之甚详。诸君（指日人）既称谈会有改造世界之意，当联合全世界之青年而为全世界之改造，是吾人很希望的。各国青年，和军阀官僚奋斗，以破除世界之黑暗，是吾人所欢迎的。吾人当以世界之所欢迎而为世界之贡献。贵国讲民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总觉得是假的。朝鲜受辱已达极点，因为军阀派之罪恶。但贵国青年何以无所表示。再由

其他方面观察，贵国青年，多以种种虚名为牢笼他人手段。如是而欲求改造，是无希望的，甚望贵国青年注意此点。贵国天皇之下有财阀军阀，这也是贵国的污点，如能将此等财阀军阀打破，就是世界青年牺牲也都可以的。

日本伊藤七雄君谓，人生宇宙，求幸福是一大宗旨。幸福何在。要亟力研究改造，为求幸福之基础。但改造也有联络之必要，鄙意（日人自称）以为不必从□□下手，至于日本人之大财董，如其财分给全体国民，亦复何份？法律方面也是要紧的，普选本为急务，但事实上颇难做到。鄙意对于此数事不大赞同。

瞿君士英谓，法律，普选，政治诸问题，都是要由平民定的，然后才能合乎人类之要求。

孟寿椿君谓，我于今年5月曾游贵国，因时间仓卒，未与诸君接洽，今幸诸君来此，并聆诸君言论，以人道正义为前提，深为佩服。中日两国，因有许多误会，致国民颇有隔阂。上次游历贵国，是敝国国民自动的与贵国国民联络的第一个机会。误会之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则为向外发展向外侵略两个概念，而日日鼓吹这两种观念欲自收其利益者，就是日本财阀和军阀。以此侵略之罪归诸日本，不但中国人有此评论，即贵国之某某君亦承认之。不过此种责任，日本人当担负中国国民亦当担负，因军阀财阀之侵略，由于国民不能匡助政府以排除此障碍也。贵国国民如果觉悟，宜取直接行动，不宜徒尚空谈。贵国之军阀财阀，望贵国国民负积极的责任而排除之。我曾忆贵国早大某教授云，世界之水，其成分都是一样，因气候和衡力不同的缘故，某处结冰，某处混浊，军阀财阀压倒平民也是如此。要想世界流通，当扫除这些冰块混浊，要想世界平民政治实现，当要将平民政治的障碍物一切扫除，至于法律，普选，都是极重要的问题，我以为当从教育上下手，为根本的解决。高君刚才说两国国民携手，贵国国民宜将军阀财阀先行打破，此非过论。因为有破坏然后有建设，贵国国民勿因此误会，军阀未打倒以前，恐不能携手也。

鲁君士毅复谓，诸君（指日人）言论各有所表示，我也明了许多。因两国国体不同的关系，所以双方的主张，自然略有不同。但是帝国制度的计划，万难与世界共同一心在一正轨上进行。各界人深望迷信□□无上的国家，打破阶级制度，应随世界潮流，无使欧西人讽东方人之部落主义，于此实现，不特贵国人民之福利，亦世界国家之一大进步。语毕有长滨松二、林宝慈君先后发言，都极沉痛。时已4点50分，彼此相谈甚欢，茶话间日学生方面的感谢优礼，并合撮一影而散。

（《晨报》1920年8月24日）

伊藤武雄忆李大钊

姜殿铭

熟悉战后日中友好运动史的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伊藤武雄这个名字。在日本统治集团还敌视新中国的时候，他同风见章、内山完造等发起建立了日中友好协会，直至1985年去世为止，曾先后担任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理事长、顾问，他还同中岛健藏等发起建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一直担任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晚年，他又亲自创立了东方科学技术协力会，组织和动员已经退休的日本科技人员为协助中国的四化建设献计献策。伊藤的一生经历具有很大的戏剧性。从20年代直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他曾长期在日本侵华的经济机构“满铁”供职。在谈到由旧满铁官僚转变为推动日中友好的战士的原因时，伊藤说，20年代在北京结识李大钊并建立了深厚友谊，是他决心把后半生献给日中友好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1983年4月，在李大钊遇难56周年前夕，已经88岁高龄的伊藤老人曾用了三个半天，向笔者讲述了他同李大钊交往的始末。

同是吉野作造的学生

20年代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列强纷纷试图瓜

分中国的时候。刚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伊藤武雄，作为当时满铁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北京。从东京出发时，当年通过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的宫崎龙介（宫崎滔天之子），建议伊藤到北京后无论如何要去见见李大钊，并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伊藤来到北京后，工作还没有安排，就立即拿着龙介的信和名片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谈到这次会面，伊藤说，当他恭恭敬敬呈上龙介的介绍信时，李大钊开口第一句话就问：“吉野作造先生还健在吗？我是先生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授课时的学生。”当伊藤告诉李大钊，吉野先生还健在，他本人在东京帝大时就是吉野先生的学生时，李大钊同伊藤紧紧地握了手并让他坐了下来。于是，回忆吉野先生就成了两个人首次见面的主要话题。在谈到这次见面给他留下的印象时，伊藤笑着说，李大钊先生当时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是著名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见面前想象先生一定是一个学者风度和教授派头十足的人，见了面才发现先生待人亲切温和，用日语谈起来缓慢而有力，简直就象一位乡村的私塾先生。当天告别时，伊藤提出他以后想就中国社会问题经常向李先生请教，李大钊立即表示欢迎他随时到图书馆或家里来。伊藤说，从那时起直到1926年因去美国留学离开北京，他时常到李先生在石驸马大街的家里去，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从李大钊先生那里听到了许多在报纸上看不到的有关中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情况。

石驸马大街夜话

伊藤说，他常常是晚上到石驸马大街李大钊家里去。那时，他只知道守常先生是知名的教授和主张变革中国社会的学者，并不知道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领导人，一年前还曾在北京会见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沃伊钦斯基，而且正筹划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不过，在同他交谈时，守常先生怀着满腔热情向他介绍了当

时正在中国兴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先生非常强调有志于变革的知识份子应当“到民间去”，“到军队中去”，强调唤醒民众的重要性。1922年9月的当开滦煤矿爆发大罢工时，他还得到李大钊的帮助，直接到唐山现场看了罢工的情况，并从矿工那里听到了“一条人命不如一匹驴值钱”的凄惨控诉。伊藤后来才知道，李大钊不仅在工人中做了大量启蒙工作，而且正是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大罢工、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并在罢工遭到吴佩孚残酷镇压后，组织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救济工作。

伊藤说，通过同李大钊交往，他终于找到了研究中国问题所应把握的方向——紧紧抓住中国民众的解放斗争史。也正是在守常先生这一思想影响下，他对后来发生的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在广州先后会见了苏兆征、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袖，以及在上海的鲁迅先生。伊藤说，他是通过苏兆征的介绍认识刘少奇的。当时苏是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长兼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刘少奇当时还邀请他参加预定在第二天举行的总工会干部会议。第二天在去会场的路上，伊藤碰上了刘少奇。刘对他只说了一句话：“对不起，今天请你回去吧”。伊藤一时摸不着头脑。待到第二天打开报纸才明白，原来蒋介石发动了扣留中山舰事件。

胡适的一句公道话

伊藤说，他在北京同守常先生相识之后，通过陶孟和的介绍，又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胡适。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适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主张“好人政府”，并且同李大钊就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管如此，通过一件与伊藤有关的事，伊藤认为胡适对李大钊还是很尊重的。当时恰好伊藤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

中国解放运动的文章，胡适看到后就对伊藤说，你的那篇论文只字未提李大钊及其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五四运动的作用，而这样是无法谈论五四运动的。伊藤说，不管人们对胡适作如何评价，他在对李大钊的评价上，毕竟还是讲了一句公道话。

李大钊与冯玉祥

伊藤说，李大钊当时出于革命的需要，交游很广，几乎同各种人物都有接触，并在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统战工作中有着出色和卓越的表现。当中共二大决定国共合作后，是李大钊出面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就两党合作达成了协议，并于1924年1月协助孙中山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1924年10月，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处于紧要关头，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在北京发动兵变，废除吴佩孚所颁布的反动法令，宣布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并且撤消了逮捕李大钊的命令。伊藤说，当时在北京的人，包括各国的使领馆在内，很少有人知道李大钊同这次兵变有什么关系。而实际上，李大钊同冯玉祥是当年策划过滦洲起义的旧交，冯是在守常先生影响下才发动兵变的，并将孙中山迎到了北京。

李大钊之死

1926年夏末秋初，伊藤结束了在北京的6年生活，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27年4月初的一天早晨，伊藤突然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张作霖在北京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二十几人的消息，接着又先后看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李大钊在不经法庭判决的情况下被处以绞刑的消息。伊藤对李大钊先生被处死的消息尤其感到震惊和愤怒，那种心情真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他不仅为个人失去了一位朋友和先辈而悲痛，也隐隐预感到中国大革命面临着一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挫折。伊藤说，表面上是张作霖派兵于1927年4月6日闯进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他杀害。而实际上，在背后策动的则是

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当时如果没有这些国家驻北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张作霖是没有胆量也不可能闯进东交民巷抓人的。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兴起怕得要死，早把李大钊视为眼中钉了。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不久，李大钊就被他们杀害了。李大钊虽然倒下了，但他所从事的事业却最终在中国取得了胜利。

× × ×

伊藤先生逝世前不久，我曾收到先生一封信。那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几年前，我曾在北京和上海凭吊过李大钊先生和鲁迅先生墓，却没有看到苏兆征、刘少奇和林伯渠墓，不知此生是不是还能有这个会”。字里行间，流露了老人对故友的怀念。

《中华英烈》1988年4期）

七 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创 建中国共产党

述 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最初“送来”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呢？我们有一种意见：马克思主义最初恐怕就是通过李大钊从日本转道而送到中国的。很明显，虽然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报纸就陆续作了报道，但由于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加之中俄交通一时中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一下从苏俄直接送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了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回国后仍订阅了大批日本杂志，因此，为尽快探明十月革命的真谛，他继续瞩目于日本进步思想界，搜集一切有关资料加以比较研究。这样，到1918年春，他就开始向周围的人及友人宣传十月革命。7月1日，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同年11月，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标志着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大钊邀请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又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利用编辑《新青年》6卷5号的时机，将该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还协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他在与胡适就“问题与主义”进行的论争中，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杰出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者要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与日本有关系的。1919年1月，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介绍马克思学说。春，日本掀起了“马克思研究热”。（《晨报》1919年4月24日）其实，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一至三期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作蓝本写作的。在此不可能详述两文的异同，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大部分，是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两篇文章为蓝本写作的。

为了深入地有组织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于1921年11月公开招收会员）出于团结一切对社会主义有信仰的人共同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1920年12月，李大钊又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李大钊为了培养共产主义干部，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引导他们深入实际，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工人运动的据点。邓中夏等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开辟了长辛店这个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使它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促成这二者结合的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桥梁作用。1920年初，李大钊就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酝酿过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经天津转赴上海。（据考证，陈独秀于2月19日到达上海，以前说1月是不准确的）在路上，李大钊就和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在李大钊等筹建党的过程中，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据目前有关资料，在1920年5月前，李大钊大致会见了以下几个

俄国人：

(1) 布尔特曼。1919年夏秋，李大钊到天津与布尔特曼会见。在会见中，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联合工人组织工会方面的经验很感兴趣。后来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2) 鲍立维。1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小组）。因被发现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会见中断，李大钊搭车返京。以前说李大钊到天津特别一区会见“某苏俄友人”，其实就是鲍立维（Broway）。鲍立维到北大任教不在1920年春以前，而应在1920年秋以后。

(3) 荷荷诺夫金。1920年2、3月，经鲍立维介绍，荷荷诺夫金到北大会见李大钊。荷荷诺夫金称赞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希望李大钊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给陈独秀写信，陈独秀回信表示同意后，荷荷诺夫金欣然赶回苏俄远东。不久，李大钊就接待了维金斯基一行。李大钊还给荷荷诺夫金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霍乐勤”。

(4) 维金斯基。1920年4、5月，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请各方面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未成立，维金斯基等是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领导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往中国的。但因行前得到共产国际领导同意，也可以看作维金斯基这次来华负有共产国际的使命。

此后，经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程。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李大钊又直接领导了建立北京社

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他还在北方进行建党活动，正是在他直接关怀和影响下，山东、天津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相继建立。

另，还须说明的是，李大钊在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同时，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保持着联系。1920年底或1921年初，李大钊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并函购了五十册该同盟的宗旨书。看来，李大钊在筹建党的过程中，也很注意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组织方面的经验。

李大钊还最早在中国公开提出建党号召。他在1921年3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急急组织”一个“强固精密”的统一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领导国立北京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的索薪斗争，无法脱身前往赴会。

中共“一大”后，根据“一大”通过的关于加强工人运动的决议，李大钊在这个时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在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领导下，长辛店、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山海关铁厂、京绥路、唐山开滦五矿、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等工人群众相继举行了罢工斗争，直至发生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这些斗争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宣传马克思主义

1. 李大钊的五篇文章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

《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新纪元》（1919年元旦）

（以上见《李大钊文集》上卷）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2. 《新青年》和《晨报副刊》“马克思 主义研究”专号目录

《新青年》6卷5号刊文目录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李大钊
马克思学说	顾照熊
马克思学说批评	凌霜
马克思研究	
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陈启修
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渊泉
三、马克思奋斗的生涯	渊泉
马克思传略	刘秉麟
巴枯宁传略	克水

《晨报副刊》

“马克思研究”专栏目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河上肇作 渊泉译	1919.5.5—8
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作 食力转译	1919.5.9—6.1
马氏资本论释义	柯祖基作 渊泉译	1919.6.2—11.11
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节译自日本“改造”杂志“社会主义批评”）		1919.7.25—8.5
马克思年表	绍虞	1919.12.1

《晨报副刊》“五一纪念专号”目录

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	渊泉	1919年
“五一节”杂感	守常	1919年
对于劳动节的感想	一票	1919年
廿世纪三大问题	一湖	1919年
饭碗问题	辛木	1919年
劳动者的权力	若愚	1919年
劳动问题在中国的意义	西谿	1920年
劳动纪念小史	品今	1920年
国际劳动会议经过的情形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放圆	1920年
现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问题	一湖	1920年
五月一日与中国人	伏庐	1921年
各国劳动界罢工日志	晴川	1921年
好吃赖作	止水	1921年
劳动与要求	陆沉	1921年
别辱没了五月一日	太空	1921年

3. 林伯渠谈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

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几次来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次年，“五四”运动更始我认识群众力量伟大，如何使自己确实站在群众内活动，而不是其他。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了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1956年10月，王来隶、董其昉访问，王来隶整理，经林伯渠本人审阅、修改。)

(《“一大”前后》二)

4.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经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报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

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时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

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

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每周评论》31号1919年7月20日）

问题与主义（节录）

知 非

近日《每周评论》上，有一篇胡君适之的文章，劝人少讲主义、多研究问题，说得非常痛快。吾们舆论界从这篇文章里得的益处，一定不少。但是中国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极，是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东西。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况且他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现在记者且把自己的意见，分几层写出来，就正胡君，并质之一般舆论界。

现在请先一论问题的性质。

一、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这困难是从三种情形来的：（一）旧存的制度和新的理想冲突，（二）新变化的生活（外来的或自发的原因）和旧事物的冲突，（三）社会中有扰乱迫害的事实发生。因有这三种情形，问题的性质，便有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其解决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并论的了。

二、问题本因实际利害而起。但是在这不等质的社会，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问题，未必不是乙部分的问题，甚或互相冲突各自构成相反的问题。故问题的范围，常不相同，有世界的问题，有一民族的问题，有一地方的或一阶级的问题。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问题愈狭，现实的色彩亦愈甚，决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三、问题之发生，固起了困难，但构成一种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观的反省。有主观的反省，虽小事亦可成为问题；无主观的反省，即遇着极不合理的，或是极困难的事实，也未必能成为问题。譬如专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使成了极大的问

题，产生出这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何东方的家庭制度，奴隶劳动，在今日思想已经进步的时候，尚不能成为问题，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种不可终日的问题了。可见构成问题的要素，全在这主观的反省。

问题的性质，既是这样的复杂，那解决的方法，当然不能简单一样。遇着局部的现实的经过反省，成了问题的时候，自然用不着主义学说来鼓吹，只要求具体的解决方法，便有结果。若是一种广泛的含有无数理想的分子的——即为尚未试验实行的方法——问题，并且一般人民，对于他全无反省，尚不能成为问题时候，恐怕具体的方法，也不过等于空谈，决没有什么效果可言的么！况且解决一种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关系的人，毫无丝毫感觉这问题的重要，即使人起来代劳，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恶，是可断定的。故所以吾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决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根据，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否则问题尚不成，有什么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问题两个字，一定把他当作具体的性质看，其实不尽然。哲学科学上的且不提，即如与吾们实际生活有关系的问题，抽象性质的也很多。……从他根本的方面着眼，即成了抽象性的问题，从他实行的方面着眼，便成了具体性的问题。……

象吾上文第一项所举的旧制度和新理想的冲突问题。这种问题，大概通常称为革命的问题，——广义的。初起的时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恶的方面争，即标示的改革方法，也决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一定是一种趋向的标准（这种标示，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目标）。譬如法国大革命时候所标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国辛亥革命所标示的排满，算是具体的方法呢？还是理想的目标呢？这可以不言而喻的。故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

才能发生效力。若是胪列许多具体方法，即就变成一种条陈，连问题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进行方针呢？于此可见问题不限于具体性，而抽象性的问题是更为重要的了。

象吾上文第二项所举的例，凡是一阶级一地方的实际利害，自然是具体问题居多。但是涉于事物制度起源的问题，那就变成抽象了。譬如选举权及自治权的问题，在起初的时候，决不是他内容如何的问题，一定是正当不正当及权利义务的理论问题。何况自一阶级以及他阶级，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通点来作进行的标准，那人力车夫的利害问题，如何能算小学教员的问题？小学教员的问题，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问题？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结果了。“去其特别点而取其共通点。”若如民族的世界的问题，因他范围之广，那抽象性是自然越发增大的了。故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于此更可见抽象性问题的重要了。

象吾上文所举第三项的例。人类主观的反省，固多起于实际苦痛的压迫。但是人有一种习惯性，他的性质异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动的事物，一成习惯，便如生铁铸成，决不能动他秋毫。古今无量数的人，为苦痛压迫的牺牲，因为这习惯的桎梏，宛转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并没有人把他提出来做个问题。必定等到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把他提作问题，加以种种理论上的鼓吹，然后才成一个共通的问题。故抽象问题常在具体问题之先，到了第二步，才变成具体的性质的。

从这三点看起来，问题不限于具体，抽象性的更为重要，而当问题初起之时，一定先为抽象性，后才变成具体性的。照此讲法，主义学说如何可以说是不重要，而一笔抹杀呢？吾且再把主义学说的性质论一论。

主义是什么呢？胡君说从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因为传播的缘故，才变成一种抽象的主义（简略胡君原语）。这话果然不错。但是有许多主义，他的重要部分，并不在从具体主张变成抽

象名辞，却在那未来的理想。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并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即如从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也决不是单依着抽象方法便能构成，尚须经过理想的洗练炮制，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义的最重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

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与具体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为愈具体，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设个比方，主义好象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航海的人照着他进行罢了。至于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与他无必然的关系。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冲突，绝不相容。各种的实行方法，也都是按着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为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向着这目标走，果然是一定不变；至于从那一条路走，路中所遇的事物何如，行路中间所起的事变何如，与这目标并无必然的关系；换一句话讲，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故所以同一主义，在甲地成了某种现象，在乙地又成一种现象。乃至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义的人，因实行方法的不同，变成种种极不相容的党派。这种例证，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举的了。

胡君说，主义的弱点和危险，都在这抽象一点上；这话也不尽然。吾上文已经说过，范围愈广，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为抽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自然愈增多。自来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义能鼓动一世，发生极大效力。都因为他能涵盖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趋向的缘故。若愈近具体，则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发动的力量，顶大也只

限于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动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种主义，在主义进行的时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团结也非常坚强。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主张分歧，立刻成一种扰攘的现象。象那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极好的一个例。他们当初所以能成功，都因为共同奉着一个抽象主义。若是起初就拿具体的方法来进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冲突，纷乱扰攘，早为旧势力所扑灭，还能等到革命后来纷扰么？

胡君说主义有危险。依吾的意见，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那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何以故呢？因为凡是主义，必定含着一种未来的理想。在尚未实现的时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险不危险呢？若指他试验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恶现象而言，则凡属试验的事物，必须经过种种错误，才能成功，——所谓错误，也只方法上的错误，——不独主义为然。况且主义不过是一种标准，趋向，态度，并非实行方法。在同一主义之下，可以有种种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险不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如何能怪及主义呢？譬如罗盘针虽是航海趋向标准；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条，海中间所有的危险，也不只一途；你自测量不精，走错了路，如何能怪及罗盘针指示的方向不对呢？故说主义危险，实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说法，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现在且把问题主义方法三种相连的关系，归结到下列五点。

(一) 一种问题的实行方法，本有种种条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联属的，有矛盾的。若无一贯的精神，把他整齐贯串，如何能实行有效呢？这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故吾说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

(二) 问题愈大，性质愈复杂。一个问题往往含有无数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为问题的中心一点。这最重要而为中心的一点，在问题自身原为解决方法的标准，抽象出来，推行到

他部分或是他种问题去，即是主义。

(三) 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从受动这方面去看，是个问题，从能动这方面去看，就是主义。换一句话讲，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二者自不能截然区别的。

(四) 社会的环境不同，主义和问题的关系，也就不能一样。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因为在这种社会，一切事物都属能动性，常跟着时代前进。偶有那不进的事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为问题。有问题，便发生各种运动。从这运动中，便产生了若干主义，拿来作解决方法的实行标准。若是在那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因为在这种社会，问题的发生，极不容易。非有一种强有力的主义，鼓吹成熟，征服了旧习惯，则无论何种事物，都有一个天经地义的因袭势力支配在那里。有敢挟丝毫疑义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来当一个问题去讲求解决方法呢？故在不进步的社会，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成的。

(五) 不论何种社会，凡是进到何种程度，文化必定渐渐化为固定性，发生停滞的现象。故必常常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起来鼓吹新理想，促进社会的文化；这种新理想，在一般人渐渐首肯之时，即成为主义。由此主义，发生种种问题，试验又试验，常悬为未来的进行方针。而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以上五点，即是吾上文所说的结论。胡君对于主义，于吾上文所说外，尚抱有几个疑点。现请就这几点上讨论。

一、空谈主义是很容易的事，解决问题是很难的事。

难易本来是比较的话，没有绝对的标准。……譬如主义，谈

一二小册子便可乱谈，看起来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种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明白得十分透彻，鼓吹到社会上去，使社会的若干部分，成为信徒，发生主义的运动，这事恐怕就很难。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往往费尽力量，不得一个圆满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很难。但若不问结果，只要糊里糊涂了结，那了结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见主义的易，不易在主义本身，而在随便乱谈；问题的难，不难在解决方法，而难在解决后的好结果。再进一步言，解决的结果，何以有好坏，好结果何以很难，这不可不有一判别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种主义。……胡君不说应当从主义上做工夫，却教吾们去想实际解决的方法，那自然是难极的了。

二、胡君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的方法转变来的，和吾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这话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时代，各社会的需要，渐渐日即日近，一地有效的主义，在他地亦未必无效。吾们只能问主义之有效与否，不必问他是外来的或是自生的。况且所谓实际需要，也得有个解说。在因袭势力支配的旧社会，他的需要和那文化进步的社会，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那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出来的么？如果胡君的话是专指不合现时用的那些极端主义而言，命题果然正确得多；但是亦有未尽然的地方。因为一切主义，都含有几种理想，其中有现时可适用的，有现时不可适用的；甲地可适用的，乙地不可适用的；极端的如是，温和的亦复如是；这是选择应用上的问题，和输入外来的主义无关。即如过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其中不适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处的地方，也并非绝无。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要在能否运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

三、胡君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

胡君这种忧虑，是大可不必有的。因为主义进于鼓吹，已不限于纸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义，必定要问这主义的内容和他的影响结果。无耻政客，决不能用来欺人的。……王揖唐讲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当的。至于假借名目，用来作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没有这些主义的时候，他们何尝少害了人呢？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倒是吾们现时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罢。

吾现在再简单包括几句话：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

（《每周评论》33号1919.8.3.）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5.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初期 与河上肇、堺利彦的关系

三个影响李大钊的日本人（节录）

这次，在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之际，我希望有关李大钊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向前进，并想就对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以影响的日本人向大家作一介绍，就李大钊的思想阐述我的一孔之见。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李大钊是很喜欢看书、并且广泛阅读各种书籍的人，而且他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新书。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到李大钊曾推荐书给他，因此，人们认为他的著作里，受东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当时西方的新思想最先在日本被人翻译、介绍，所以很多情况下它们是通过日本而进入中国的。我在阅读李大钊文章的时候，发现了与日本思想家的文章非常相似的说法。以此为开端，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在李大钊的论文之中有时把日本思想家的文章、译著一模一样、原封不动地当作蓝本使用着。

今天，我想举出我所发现的三本成为李大钊文章蓝本的书。在这之前我首先申明，我很担心有人会认为，李大钊的思想的前面有其蓝本为依据，是贬低了李大钊独立的思想之价值，从而伤害中国朋友们的自尊心。人类的文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超脱外来的影响及效仿等而存在。在许多情况下，影响和模仿正是在有了接受它的基础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它是在其内部自己从零开始的起因，它给了自身内部虽有但还未最后生成的萌芽之中的东西以样板。假如影响、模仿等与自己的独创毫无相关，那是丢人的事，但李大钊则与此完全不同。李大钊的方法使人想起这样一种情景。在被烧伤，旧的皮肤被烧焦成为废物的时候，在新的皮肤再生以前，作为应急措施用生猪皮作代用品敷在身体表面的医学治疗方法。这样，猪皮的营养成分被吸收，新的皮肤再生以后，猪皮即逐渐干瘪脱落。可以说很多情况下，李大钊在把日本思想家的文章、译著等作为蓝本使用时，是作为促进和帮助他思想独创地发展的养分而使用了的。诚然，在思想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中，外来的影响在其思想的外表上处于主导地位，以及难以从这种影响中摆脱出来的情况也是不可否定的。因此，前面所说的不仅不是贬低李大钊的思想的价值，而应该说是以他不断努力

发展自己思想的过程来高度评价他。

二

下面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线部分是河上肇1919年1月创刊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里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有关经济论所论述的后半部分没有以河上肇的文章为蓝本。我以为，李大钊对经济学很自信，发表出来的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最初写的论文是《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在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原著研究成绩也很好。

没有依据河上肇的部分，第一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驱，列举了桑西门、孔道西、基佐等法国历史学家，作了一些论述。可以认为，这与李大钊终生对历史理论，历史哲学一直非常关心是有联系的。

第二是他把“阶级竞争”（河上肇则使用了阶级斗争一词）看作是“宇宙间一切生命”有机体的“自己发展（teck-expansion）”的“倾向”。即他所说的“‘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就是说，李大钊是把“阶级竞争”当作起源于生物进化论的东西来考虑的。

第三，他接受了河上肇的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学说看起来矛盾的发问，但与河上肇找到了合乎马克思的话的解决办法不同，李大钊以没有在马克思主义里找到解释两者矛盾的理论而告终。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学说二者关系的说明“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认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认为那是一个“小小的瑕疵”。李大钊把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的社会主义自然成熟论的错误，说成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但是他又举出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劳工阶级的号召，高度评价说，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把这一点告诉人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指出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上有其必然性，承认它在“阶级竞争”中使人们奋起的宣传上有巨大的效果。李大钊在注重作为人的自觉的，能动的实践的“阶级竞争”的意义上是卓有成绩的，但是，其问题在于没有克服掉唯物史观的机械论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因此，他的“阶级竞争”中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另一方面，唯物史观被机械论地、经济决定论地解释，其理解上的错误为唯意志论的解释所弥补。

第四是把“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解释为“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这是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机械论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进行修正的尝试。

第五，是李大钊关于“阶级竞争”与互助、博爱的“伦理的观念”的见解。李大钊认为，“马氏的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按照李大钊的观点，“在这经济结构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为它常为经济结构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因此李大钊把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变更看做“马氏学说应该救正的地方”，呼吁“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基于注重这种“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的观点，李大钊欢迎当时风行于全世界的、用康德的哲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新康德派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出现。这是把物质的诸条件变革与精神变革二元论地区分开来的看法。这样，按照李大钊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就只能被看作社会组织改造的理论，经济条件改造的理论。总之，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与哲学理论的经济组织理论。因此，按照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以看作是缺少辩证唯

物论的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伦理的社会主义。

三

最后，我们来看《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这篇文章的（一）（二）是以堺利彦的《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1916年9月）为蓝本，（三）是堺利彦的《宗教及哲学之物质的基础》（1916年11月）为蓝本。（四）部分地依据了卡尔·考茨基所著、堺利彦翻译的《社会主义伦理学》（1913年发行，后来改名为《伦理与唯物史观》）。另外，考茨基的这部著作还成为堺利彦的《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的蓝本。正象李大钊也说到的那样，（五）是依据douil Boulin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其场合，可以认为，李大钊以堺利彦将其中一部分翻译介绍的《欧洲战争之经济的原因》。

从《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样，李大钊的思想受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把道德从一切超自然的、神秘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奠定了进行社会生活的动物——人类——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但是，因为道德当作具有动物基础的社会本能是万世不变的、适于所有人的普遍的、自然的东西，所以不为社会历史变化所左右。从而它成了承认超时代的、超历史的道德观念的存在。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到的互助、博爱的理想将永世不变地存在就是来自李大钊的这种道德观。还有，“阶级竞争”与互助、博爱的理想相对立的说法也是来自李大钊的这种道德观。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把握人类精神是受了生物学的唯物论之影响，还没有到达辩证唯物论的水平。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如《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里所说的，在此也提出了道德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这种观点

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出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否定了道德的历史性，从而使李大钊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

（日本信州大学副教授后藤延子在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1984年10月）

(二)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

（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重要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的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3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已有同志19人了。筹集了120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1. 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2. 讨论会；
3. 讲演会；
4. 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四、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五、会员有分担购置书籍费的义务。

六、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期缴还。如会外人想借阅时，须经本会特别许可，并交纳保证金。

通讯处：（一）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

发起人 高崇焕 王有德 邓中夏 罗章龙 吴汝铭
黄绍谷 王复生 黄日葵 李 骏 杨人杞
李梅羹 吴容沧 刘仁静 范鸿劫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雄 朱务善 范齐韩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2.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通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二）

不论何人，凡愿加入本会者，请到下列三处接洽（通函接洽亦可）：

北京大学第二寄宿舍李骏君；

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北京大学第一寄宿舍罗章龙君；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23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

会员公鉴：

本会正式成立，已经一月有余，其间经过新旧两个年关，耽

误日子不少。故仅仅只开过两次讨论会，一次纪念会。起初会员虽不足20人，现在已增至63人了。

本会成立之时，都讲实用，不事虚文。所以简章未定，至今尚付阙如。惟经一月余试验的结果，每次开会，例必有新会员数人加入。因此书记又不能不每次将本会议决几条实用的办法，当众重述一次。书记固不胜其烦，旧会员亦甚觉其讨厌。为免除这个困难起见，特详细通告于此，务希查照。

一、研究方法

(1)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准时开会，过时不候），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诸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

(2)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暂时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由书记负责接洽。俟本会研究确有成绩后，则完全自行担任。

(3)特别研究——完全由会员自动的自由组合，现已有了三个：

A.劳动运动研究 由几个感觉此项知识之需要的会员组成的。每星期三晚集会一次。

B.《共产党宣言》研究 由几个感觉西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一、四、五晚请会员一人教授之。

C.远东问题研究 材料分三种搜集，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已在酝酿中，尚未开会。

以上三个小组会，任何会员皆可随时加入。

以后拟实行固定的分组研究如下：

第一组 唯物史观

第二组 阶级斗争

第三组 剩余价值

第四组 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

- 第五组 社会主义史
- 第六组 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
- 第七组 经济史及经济学史
- 第八组 俄国革命及其建设
- 第九组 布尔札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
- 第十组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
——特别注意于中国

但会员研究，选一组选三四组或全选皆可，只要力量来得及。请即来函认定，以便刻期着手实行，至要至要！

二 入会手续

得会员一人以上之介绍，或径函及亲至本会接洽，本会亦得酌量请其入会。

三 会 费

(1) 常费 每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缴常费五角，皆于开学时缴纳。

(2) 买书费 由各人自由量力认捐，认百元亦可，十元八元亦可，不认一文亦可。又认十元以上者，书籍所有权或归公或归私，可由认捐者自愿决定。

四 借阅书报的时间及手续

阅书时间 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开馆，惟星期日均在上午八时至十二时。

阅书手续 向值日员领取，不限册数。

借书手续 向图书经理员交涉，借期至多不得过一星期，但得图书经理员认可得连借，惟大本书籍暂不出借。

五 职员

本会为办事便利起见，暂设四种职员：（一）书记；（二）庶务并会计；（三）图书经理。以上三种为公举固定的。（四）值日员。此一种为挨次输流的。兹将此届公举固定的三个职员姓

名、地址开列于下，有事可向他们接洽。

书记 黄绍谷（住井儿胡同12号）

庶务兼会计 李 骏（住东斋天8号）

图书经理 范鸿劫（住西斋黄3号）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

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兹报于下*：

社会主义丛书

- | | |
|---|-------------------|
| Communist Manifesto | (Marx and Engels) |
|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 (Engels) |
| Ethics and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 (Kautsky) |
| 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 (Labriola) |
| Socialism and Philosophy | (Labriola) |
|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 (Bondon) |
| The Books on Socialist Philosophy | (Engels) |
| Some of the Philosophical Essays of Joseph Dietzgen | The |
| Poverty of Philosophy | (Marx) |
| Anarchism and Socialism | (Plechanoff) |
| The Origin of Family | (Engels) |
| Bolshevik Theory | (Postgate) |
| The Infantile Sickness of «Leftism» in Communism | |

* 这份书目中的外文书名和作者名的译法有不少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纠正。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有些经过改正后可能仍有错误，有些虽明知是错误的，却无法改正。——编者

- (Lenin)
-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enin)
-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Hermania Cahn)
- Militarism (Liebknecht)
- Two Pages from Roman History (Daniel De Leon)
- 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
- 阶级斗争 (恽代英译)
-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李汉俊译)
- 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 达译)
- 社会主义史 (李 季译)
- 社会问题详解 (李 季译)
- 社会问题概论 (周佛海译)
- 到自由之路 (膺冰 凌霜 崧年共译)
- 工团主义 (李 季译)
- 共产党底计划, 政治思想、社会结构学 (太 柳译)
- 经济丛书
- Boehm-Bawerk's Criticism of Karl Marx (Rudolf Hilferding)
- Capital Today (Herman Cahn)
- Progress and Poverty (Henry George)
- The Evolution of Banking (Robert H. Howse)
- Socialization of Money (E. F. Mylluis)
-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Marx)
- High Cost of Living (Kautsky)
-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Lafargue)
- Solution of Trust Problem (Leon and Berry)
- 工钱劳动与资本 (袁 让译)
- 劳动问题丛书
- Unfty (Leon)

Woman' s Suffrage	(Leon)
Industrial Unionism	(Lein)
Industrial Unionism	(Leon and Lebo)
Lincoln Labour and Slavery	(Schluter)
Violence and Labour Movement	(Robert Hunter)
Reflection on Violence	(Sorël)

历史丛书

History of I. W. W	(Bussendon)
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Guizot)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Marx)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
An Introduction to Middle Ages	(Emerton)
The Ancient Lowly	(Suole), (War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	(Gide and Rist)
Lenin, The Man and His Work	(Albert Rebo and Williams)

中国近时外交史	(刘彦著)
中日交涉史	(刘彦著)
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欧战史要	(黄郛著)

东方问题丛书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2 vols.) (Morse)
Democracy and Eastern Question	(Millard)
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	(Overlach)

俄国问题丛书

Reminiscences of Russian Revolution	(Philip Price)
The Russian Workers Republic	(H. roel Brailford)

劳农会之建设 (列 宁著)

讨论进行计划书 (列 宁著)

杂志报章

Soviet Russia (苏维埃俄罗斯)

Asia (亚细亚)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米勒评论)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国际共产党)

大陆报 共产党 新青年

先驱 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

济南劳动周刊 长沙劳工周刊 晨报

民国日报 时事新报 申报

广东群报 时事月刊 妇女声

以上各书，或系会有，或系私有，皆有符号，归众共览。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140元之英德文书籍，当不久可到，并告。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 (五)

本会开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不论会员或非会员皆欢迎自由来听。

讲演人 李守常先生

题目 马克思经济学说

地点 北大第二院大讲堂

时间 本月19日(星期日)下午一时起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7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一

会员诸君：

诸君所认购书捐款并经常会费的，多有未缴纳者，兹因需款在即，请即掷交会计李君骏。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2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二

会员诸君：

本会分组办法前已通知，但尚有少数会员未曾加入何组，兹将分组名目再行刊布如下，务望从速加入，以便召集分组会议。

再分组研究办法未成立以前，周期讨论会仍照常举行，望诸君准于每星期六下午七时到会。

第一组，唯物史观；第二组，阶级斗争；第三组，剩余价值；第四组，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第五组，社会主义史；第六组，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第七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第八组，俄国革命及其建设；第九组，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第十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2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通告

本会另设《资本论》研究组，并承陈启修先生允为本组导师。不论本会会员或同学诸君，高兴于此项研究的，请通知东斋李骏君，以便定期召集。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2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告（第二号）

会员诸君：

你们借的书报杂志均请即日归还。因为本会新到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种，所以要重新编号，以便检查。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24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

5月5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诸先生讲演。此会系公开性质,无论何人均一律欢迎。特此谨告。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5月3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本会上两星期,因开滦矿工罢工之事,曾发出通告,募捐援助。兹有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我校学生会,并有工人代表来校接洽。顷因学生会尚未组织就绪,本会乃权派会员代为接洽一切,并介绍与本校大多数同学所组织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接洽一切。兹特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及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之宣言书登出如下: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

径启者:敝处唐山工人三万余,因生计压逼,迫不得已,要求加薪罢工以来,已三星期有余,而仍无良好结果。现有矿务局工人代表董君鸿猷,特来贵校报告详情。素仰热忱,想定有相当援助也。敝校同人不敢冒谬,敬代介绍。此请
学生会会长先生大鉴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总干事 李鸿斌

张创鸣

书记

蔡 膺

十一月十三号

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宣言

全国父老兄弟诸姊妹:

近来不是发现一桩人吃人的举动么?开滦矿洋资本家置我国

矿工同胞四万六千人于饥饿冻死的地步么？此次矿工罢工的原由，实因平日遭洋资本家的牛马待遇太深，加以食料物价日涨，原定工资实难养活，请求洋资本家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又被严词拒绝。且不但不允许他们的请求，还要贿买洋人走狗杨以德派兵弹压，对于工人惨加杀伤。可见洋资本家有意乘矿工之危，使他们累死、病死、冻死、饿死而后已。各界同胞！这不是洋资本家实行吃人的举动么？矿工同胞至此，乃誓守“生不如死”的志愿，不得已演成此次凄惨的同盟罢工。

矿工同胞现在忍饥耐寒支持一月了，洋资本家还是狼心狗胆要矿工做牛马，不承认他们正当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但矿工方面因得各省的援助，暂未冻饿至于死地。而洋资本家因塌矿停工之损失，反达数百万。

各界同胞！天灾火祸，固须踊跃援助之事；此次洋资本家有意残害同胞，吾人更应如何援助，完成矿工同胞罢工最后的胜利，方能拯彼等于水火，而尽同胞之天职？

同人等义愤所迫，爰乃组织此会，向各方面募捐，维持罢工同胞罢工期内之生活。所得之款，悉数汇往开滦各矿工处，以资救济。若有同志自愿加入合作者，尤所欢迎。

本会通信处，北大第一院收发课转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月20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

本会备有关于马氏学说之书籍数百部，专为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诸同志而设。凡京内京外有愿入本会者，请致函北京大学第二院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将通讯处示知。

兹将本会组织摘录如下：

- 一 会员 分京内、京外两种。其在本京之会员，得向本会借阅书籍（备有汉文、英文、德文、俄文各项书籍，借期以半月为限；遇有特别情形，亦可通融）；京外会员得

向本会询问购办书籍一切情形，并有与闻本会常会所讨论之结果之权利。

- 一 会费 每学期五角，不拘一次缴清。
- 一 开会 每星期五晚七时开常会一次，讨论各项关于马克思学说之问题。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13日)

德国李卜克内西与卢森保女士 殉难纪念大会^①

今日系德国笃信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保女士殉难之第四周年之日。彼等为主义而奋斗，为无产阶级而牺牲，不惜舍其毕生精力与生命，前后与德皇及爱伯尔特派政府反抗。其身虽死，其笃信主义与实行之魄力，至今犹令人敬仰不置。敝会特于今日(15日)下午一时，假厂甸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该二氏殉难纪念大会，敦请名流讲演，并当场发送关于该二氏之各种出版品。届时深希本校同学(尤其系S.Y.〔社会主义青年团。——编者〕团员)全体赴会为盼!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谨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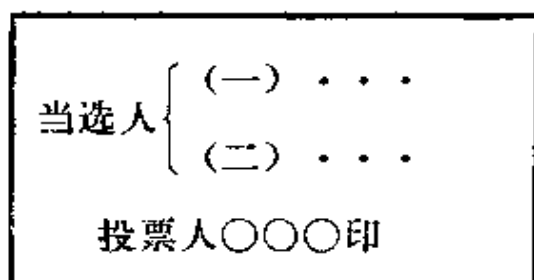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一)

兹因学校业已开学，会员诸已到齐，下届职员亦须从速改选，请会员诸君，务于一星期内，票选同志二人负责办理会务。是幸。

票式如下：

^① 标题是编者加的。



选定后，将票寄至二院号房转交本会。开票期间为本月25日下午四至五时。届时请来会观察。

(二)

本会现将改选，会员所借之书籍请暂交还，以便清理。

10月17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18日)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本月7日(星期六)为苏俄革命第八周年纪念日。本会特订于是日下午一时假三院大礼堂开公开讲演大会，敦请吴稚晖、罗觉、赵士炎、蒙古代表暨本校教授陈启修、陈翰笙、谭熙鸿诸先生讲演。凡关心俄事、蒙事者，不可不往听。会后并演映革命电影(孙中山阅操诸影片)，以助余兴。兹将讲题已定者列举于下：

吴稚晖——中俄关系

陈启修——周年之苏俄(详述苏俄之政治、经济状况)

罗觉——苏俄革命之根据及其在世界革命上之意义

赵士炎——鲁纳会议与关税会议

蒙古代表——蒙古问题

(《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11月7日)

3.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朱务善

中国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当时在

日本的同盟会知识分子，为介绍西洋学术，曾写了几篇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并节译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片断章节。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但是李大钊同志这时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鉴于中国当日政治经济的混乱状态和十月革命给予他的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在“五四”以前，即在1918年当北洋军阀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就在天安门前高呼：这次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同时在《新青年》上面以《Bolshevism的胜利》为题的那篇文章里，李大钊同志特别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是如何热情向往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从此以后，李大钊同志就大力团结先进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前途，只有走俄罗斯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四”以后，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聚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集在李大钊同志的周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成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那时除开始致力于工人运动、发展党的组织而外，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所读的是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以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其他如考茨基、河上肇等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也都辗转相传，争相阅读。这时不但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队伍中，即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曾几次讨论过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实际上，在1920年初已经组织起来这个研究会，不过还未公开登报而已。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主要是党、团员，也有群众参加。李大钊同志之所以未列名发起人，是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常工作分下列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是将研究会成员分为若干小组，各自研究某一问题，然后开会集体讨论；第二种是定期讲演，约请当时教授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作学术报告；第三种是通过公开辩论以达到宣传的目的。记得在这个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如胡适之流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深表不满，大肆污蔑，另一方面梁启超、张东荪这一班人，也借着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素在中国讲学的机会，叫嚷什么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利用这一机会，在沙滩大楼一

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同志作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连座位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面辩论终结时，听众都想听一听李大钊同志的结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慢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意识与感情所能左右的。记得评判员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喻来说明这一点：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内部，及其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李大钊同志最后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他着重指出：此地所说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这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不要斗争而垂手以待社会主义之到来。李大钊同志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会后，教室里还拥挤着很多人，在那里互相争论，喋喋不休。我还记得有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好象是费觉天）最后对我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同志的发言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专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样，同为北京党部外围组织。它的活动范围，不只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对进步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也常参加一般政治、社会活动。这个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设在马神庙西口北大第二院内（即理科）。在该院西头，辟有不少房间作为学生团体活动之用，研究会占了两间，平日借阅书籍，开讨论

会，都在这里。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4. “亢慕义斋”及其活动

现存盖有“亢慕义斋藏书”印章的德文书目

Lenin; Die Grosse Initiative (列宁: 《伟大的创举》)

Lenin; 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
munismus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Clara Zetkin und Henti walecki; Dem Reformismus ent-
gen (蔡特金和瓦勒齐: 《反对改良主义》)

E. Brand und H. walecki; Der Kommunismus in Polen

(布兰特和瓦勒齐: 《共产主义在波兰》)

G. Sinowjew; Die Roll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季诺维也夫: 《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G. Sinowjew; Zwölf Tage in Deutschland

(季诺维也夫: 《德国十二天》)

G. Sinowjew; Alte ziele Neue Wege

(季诺维也夫: 《旧目标新道路》)

L. Trotzki; Die Frage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Frankr-
eich und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①

(托洛茨基: 《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

“亢慕义斋”编译的康民尼斯特丛书书目:

《共产党底计划》(布哈林),

^① 在这八本书封面的下方, 分别印有“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和“伯尔尼联合出版社”等字样, 印刷出版时间分别为1920、1921、1922年。——编者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

回忆“亢慕义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会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①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Das Kommunistisches 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六十年前珍藏下来的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图章^②的德文书八册)。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① 当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时。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按：《周易》乾卦，爻辞云：“亢龙有悔”，历代注释者自东汉郑玄，唐孔颖达，到南宋朱熹等均释“亢”为“极”、“穷高”、“亢阳之至、大而极盛”等义。《周易》文言传云：“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综言之，“亢”乃“盈、满、穷、极”之义，即吾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致幽远的境界，故称为“亢斋”。

^② 亢斋图书室成立后公推我和天放等主持图书的征集和对外联系，以及图书的编目、出纳等事务。当时由我设计，天放自刻“亢慕义斋图书”章一枚，图章正方形长宽各32毫米，篆文六字左右直列分二行，每行三字。天放素善治印，篆文简朴，线条清晰，六十年后犹可想见其治印风格。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歌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

入，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192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28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48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14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他9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

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出版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1938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文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1921年前后，我们在允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出版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Volker，刚和太等。

（罗章龙：《椿园载记》）

(三)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1.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通告

本会于本月2日正式成立。编译丛书及请名人讲演，均在积极进行中。特先将简章宣布如下：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简章

- (一) 宗旨 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 (二) 定名 暂定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暂时限定北大同学）。
- (三) 方法。
1. 文字宣传
 - A. 编译社会主义丛书 甲种（大丛书）
乙种（小丛书）
 - B. 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
 - C. 发表社会主义论文
 2. 讲演
- (四) 会 员 对于社会主义有信仰和有研究能力的北大同学，由本会会员介绍或自愿入会，均经全体会员通过加入。
- (五) 出 会 会员因（1）自愿、（2）信仰变更、（3）于一年期内对于本会无所贡献者，得自由或由本会认为退会。
- (六) 职 务 会务由全体会员负责，采轮流或自由担任制度。
- (七) 所得捐 会员用本会名义发行之书报或论文，所得报酬应

抽百分之五为本会会费，又百分之五为公共购书费。

(八) 特别捐 会中遇有特别需款时，用绝对自由的方法，征收特别捐。无人会金及常年捐。

社员名单

李大钊 (守常) 何恩枢 (北衡) 徐其湘 (六几)
陈学池 (儒康) 郭弼藩 (梦良) 陈顾远 (晴皋)
费秉铎 (觉天) 鄢祥禔 (公复)
通信处 本校第一宿舍郭梦良处

(《北京大学月刊》1920年12月4日)

2. 劳动节之北大讲演会

5月1日为劳动纪念节。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特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开演讲大会。担任讲演者为北大教授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诸人。演题皆关于劳动运动及社会主义各问题。公开讲演，无需入场券，均可听讲云。

(《晨报》，1921年4月30日)

3. 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

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刻实行社会主义，这件事目前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问题。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

多的劳动。有人认为历来的借款多用于政界，而最近成立的四国新借款团已决定将借款用作实业方面，这样既可不使政界发生骚动，又能使我国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反对这种说法。如前所述，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要使人们了解为什么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并进一步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然而我坚信，将来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采取怎样的手段才好，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为此本校有志诸君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我想本会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方法问题。我也是这个研究会的一名成员。本会于去年冬季成立以来，曾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此外在社会上还没有进行什么活动。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但在现阶段应着力介绍优秀书籍，组织编辑研究丛书，作为它的第一编已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书（本书为卡尔所著，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发凡”为题，引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乙种丛书，由郭梦良、徐六几两君翻译，书价大洋一角）。目前正在翻译中，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书籍还有数种。

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除此之外，尚有新青年丛书第一编，社会主义史第三编，哲学问题第五编，到自由之路哲学研究小丛书第一编，共产党宣言第二编，资本论入门及改造的原理等。

（《新支那》1921年1月27日）韩一德译、刘多田校

（四）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20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3万人干着各种可疑的职业。北京的大口不过93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追求

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牢牢地记住了古代哲学家们的说法，即“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 民主主义运动；2. 基尔特社会主义；3. 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例如，在去年五四运动

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30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报，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的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5万到6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

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等，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其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纲领，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340至350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组织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10人当中只有1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要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各种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

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①，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时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5月1日^②，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1500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在工厂车间里发生了数十起使管理人员感

^① 此处所说的《工人周刊》系《劳动音》周刊之误。

^② 此处所述“去年5月1日”，即1920年5月1日的情形，与长辛店工人活动的实际不符。据考证“去年5月1日”系“今年5月1日”之误，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工人在娘娘宫召开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办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坚决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印刊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遍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的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5—22）

2. 《劳动音》发刊词

心 美

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今天是我们与各位见面的第一次，我们怎样的喜欢！我们愿时常得与各位亲近，来大家谈天谈天，但是我想各位心中一定发生两个疑问，（一）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二）这个劳动音里面的文章，又说些什么话呢？我要使各位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第一篇文章，不得不先将这两个疑问 详详细细的讲清楚，请各位且瞧下去就明白了。

我们相信“劳动”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第一个要件。因为人类是进化的，一天比一天不同，天天变动，天天进步，由旧的变为新的，由不完善的进为完善的，所以能达到这新的完善的，就是由人类“劳动”的结果，那末，我们就明白，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

但是我们试放开眼光，瞧瞧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所有的人类，都人人能从事有益于人生的劳动吗？我们知道今日各国社会上都有一种最不好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唉！世上那里有这样便宜，这样没道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的做来，他们安安乐乐的拿去，使我们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所

① 即邓中夏。

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

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

更进一层讲，各位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你瞧英美法德意荷俄日等国今日的现象，那一国不发生罢工问题，以实行劳动运动，那一国劳动者不有坚固团结的工人团体呢！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术，又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

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场的规则等，和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我们出版这“劳动音”的本意，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你们既然明白了，我们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了，请了，第二期再见罢！祝你们努力！前进！

（《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3. 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

与长辛店工会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

国 煮

长辛店离北京有三十里路程，是京汉路唯一的重要铁路工场所在地，有工人三四千人。地方虽然是很小很不开通，但是工人们是很热心很有见解的。这地方从前所组织的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会，都是工人做中心，救国十人团有工人团员500余人。他们屡次赞助学生运动，每次为公益的事情捐款，总在百元以上，从此也可见他们的魄力之一斑了。而且现在还正在进行劳动团体的组织，预备和上海及各埠的劳动者——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联络一致，并进于与全世界的劳动者握手。现在他们觉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由十几个最热心的工人自动的发起一个劳动补习学校，不久就可开学。他们的募捐启事和简章等，我现在把它录在下面。各处的劳动者，你们看看他们的精神，是怎样的好呢！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呢？看下面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废辞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学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学”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么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子，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

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

附录：简章及预算案于下

(甲) 简章

(一) 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二) 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 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80人，分组上课。

(四) 本校课制：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

(五) 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

(六) 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

(七) 本校设驻校办事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

(八) 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

(九) 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

(乙) 预算案

(一) 开办费

1. 制桌凳30张，洋50元。

2. 修理校舍洋20元。

3. 杂费洋10元。

共洋80元整。

(二) 经常费

1. 校舍房租每月约13元，全年约156元。
2. 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30元。全年360元。
3. 校役一人月支7元，全年84元。
4. 书籍文具等费全年40元。
5. 杂费每月支5元5角，全年共支66元。共706元。

发起人 陶善琮 段其伟 史文彬 施五常 郭长泰
张 珍 李茂根 武明科 邓长荣 陈励懋

（《劳动音》第15册，1920年11月21日）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节录）

（1920年12月19日夜12时）

心 美

今天因为长辛店的工人，所组织的劳动补习学校，开筹办会议，请我们去帮忙，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和太雷、仁机、郭淘三位同志跑出前门西车站，坐火车往长辛店去。长辛店距离北京42华里，约一点钟火车就到，是一个很大的乡村，有三个大工厂，共有工人2500多人。这些工厂，都是归京汉铁路局管辖的，按铁路的组织，共分三部，一是车务处，二是机器处，三是养路处。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谈谈笑笑。觉得很快乐，严酷的冷气，都退避了三舍。车过永定河，我望芦沟桥在晨曦的底下，衬着一座破塌的古城，有两三杆布帘随风飘摇，刹是好看，真一幅绝好的天然图画。那时就引起了我的画兴，我的手就痒了，可惜当时没有带写生器具去，且不在芦沟桥停，所以不能画。车愈走愈远，我的心愈记着它。车到了长辛店，而芦沟桥的风景，还在我心头。

在长辛店下车的时候，我见了许多灾民——男女老幼的麇集

在站边的地方，那种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的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正社会上最不公道的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的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①，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

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群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今天刚是长辛店的一位工长邓寿亭先生，因他热心办了一间女子国民学校，几年成绩很好，长辛店居民送了他一个“乐育英才”的匾子，所以今天他摆酒请客。男女老幼的来宾很多，大半是工人。我们躬逢其盛，一尝乡村社交聚宴的风味，觉得很有乐趣，见他们那种平民的生活，亲热熙攘的风习，非常羡慕。

我们食完了饭后，就开筹办会议，首由一位工长明科先生布告筹办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经过情形，班在进行的方法和今天会议的事项。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是由长辛店工人自行组织的，款项是由捐款而来的（他的募捐启事和章程附录在下面）。次由郭淘君说明创立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大概说：为什么我们工人

^① 原文如此。

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饱暖；而那班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哪里来的，他们的衣食住哪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的血汗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得享受，弄到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回幸福，非先有知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而且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独不应当享受吗？亚丹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该享同等的教育和幸福。当他演说的时候，在座听的工人，个个都点头象有点感动的觉悟的意思。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开成立大会，于5日开课，那天想必有一番热闹。

会议后由几位工长带我们去参观各工厂，今天因是星期，所以各厂的工人多数停工休息。

有少数工人，因特别的情形如生计困难或不明白休息的意义，所以仍然作工。按工人每日冬天约作工十时，夏天约十一二时，工钱每天因工程或个人而不同，约自三毛至一元不等。晚工徒〔从〕前作一小时加一刻都计算，但现在却一小时了（闻唐山南厂的工人因这个情形已于16号罢工了）。工人的生活费约每月三四元至十五六元（指有家庭者）不等。我们到一处，貯有许多砖头放在地面，我问他是预备建筑的么？他笑笑地答我说：“这些砖已买来了六年的工夫，说是为我们工人起医院的。你看那座山房子不是盖好了吗？但是其余的房子不知他们六年了也没盖呢。”我笑说：“那不是很方便你们害病吗。”他说：“你那里知道个中的黑暗，好在我们不害病，倘真个害病他们也不医，不说是没有病，就说没有药，除非有脸子才得到一点药呢。”我听了很气，敬告铁路总办千万要关心下工人的幸福才好，不要开了一笔大公款，难为了贫苦的工人。

长辛店的工人知识很高，团结力很大，他们已组织成有很强固的团体。他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叫做《劳动音》，每期销售2000多本。

我可惜对于机器学没有研究，所以参观了工厂，也没有什么心得能写出来。光记得一个是专修蒸气锅的，一个专修机关的，一个制铁条的。入了总发动机，只见无数皮带和电线而已。各位工人向我指点说明，我真感谢他们增长了我许多知识。五点半十分我们再坐车回北京，经过芦沟桥时，那幅天然好画图已被黑沉沉的暮烟罩住了，我不能再见那样失望。……

(北京《晨报》1920年12月21日)

长辛店工会成立

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给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

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选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定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

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厂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

长辛店铁工大结合

长辛店铁路工人，计2000余人，近来他们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不到三月的工夫，加入的工人，居然有1800余人。他们即于9日

借长辛店上坡店的地点，开成立大会。到会部员，共约1500多人。此外还有北京来宾邓某、贺某、陈某、朱某，郑州铁路工人代表凌楚藩，陇海代表林楚荣、伍子湘，彰德代表赵光前，汉口江岸代表陈述明，信阳代表邵允铨，京绥代表胡道生、张济海，京奉代表丘祥生、李如华诸人。其余如京汉路各机关办事员及长辛店警察所长等等，到的也很不少。开会时全体部员向国旗行鞠躬礼，三呼“劳工万岁”。由部员阎文周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次日由该部秘书洪永福报告经过情形，言词都是淋漓周详，娓娓动人听闻。再次就是各来宾各代表的演说。他们虽然多半系工人，然而他们都已经彻底的觉悟，故其见解，迥异于其他工人。他们的演说词很长，不能于此备载，总括起来说，不外：（一）彼此联络感情，共谋幸福；（二）因世界的潮流所趋，亦当连合团结；（三）当此内政日糟，外侮日迫□时候，吾个人既系工界一分子，更宜互相接洽，以尽吾工友们爱国的天职；及（四）吾俱乐部成立之后，必须和衷共济，以图发展，使全国一致，绝不受任何方面的利用诸节。他们讲演的时候，静无人语，讲演之后，掌声如雷。开会直至三时之久，无倦容，于此可以想见他们对于该部的热忱了。讲演之后，复继以鞭炮，其响声与一般工友们高呼“劳工神圣”之声相应，振动天地。此诚长辛店工友们空前之盛况了。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4月12日）

4.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①

（1921年3月）

诸位同志们：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

^① 此种系关谦4月2日给王怀庆报告的附件。

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我们在3月16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达得很快。

我们的报告将用种种的可能的办法，送达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总局或东方局。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

北京青年团上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

致王怀庆报告

（1921年3月17日）

为报告事：窃3月16日早，由陈德荣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北大第二院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谦此为第一次到青年团大会，须有二团员介绍，故谦于一时到陈德荣处，约王伯时同往。适值无政府党陈廷璠、黄兼生、陈友琴、邵光典等在座，讨论将来统一会议之通知书，订期8月10号至20号在汉口或广东召集，以便合力进行，谦亦签名“伊知”。发起人又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之方法，因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每日在广东《群报》（青年团报）与《晨报》（互助团报）两相攻击，然独秀又来函至京，甚为和蔼，联络凌霜、廷璠等人，议决由北京方面去书独秀，劝勿自相伤斗，总以协力推倒现政府为要，如其再事反对，则进行排斥也。因阅广东报论说，遂延至二时四十分，谦方与廷

璠、德荣、伯时同到青年团会议。查是日到会者共24人，探知其姓名者如罗章龙、李一志、徐六几、张作陶、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宋价、何孟雄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廷璠、伯时、德荣。由书记报告：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现年不过20岁，住天津，时来北京，住灯市口12号，已来京两星期之久，今来函陈述赴津有事，不克莅会，惟希望我们即日选出赴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代表，此次会期为4月25日，会址柏林，总机关或在莫斯科分处，说明川资由伊代垫云云。查期限已近，此次会议最关紧要，将来国际间运动与信用，是吾人必须参加，愿望今日同人，以投票式慎重公推1人为北京代表，随同格林齐往。于是以何孟雄多票当选。随即建议临时设一审查委员会，以5人组织之，专收此次各同志对于赴会之意见书，并审查将来赴会提议各案事。谦于选举时，并未投票，因未知各人之名。遂于事毕由德荣起立介绍，谓谦热心改造之好同志，请众赞成入会后，谦谓连日病魔，今日不克多发言论。甚歉！唯声明愿牺牲一切，以追随诸君之骥尾，建设新社会之义务云云。后各人稍有议论，当即散会。预定收齐意见书再作钱行之大会云云。……兹将经过情形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3月17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形报告

(1921年4月2日)

为报告事：窃于3月30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25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郭〔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在3月

16日以前，共计会员47人，现又加入8人，共计55人。但内中已有出京者7人。这几日极力设法筹经费，今由会员所缴来之款及特别捐等，共得现洋96元5角，并陈述料理何孟雄出发种种手续。次由李大钊、顾文萃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得亦很快，所以应极急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计表决，多数赞成。事务所由调查股极力寻找，而油印机由李大钊、顾文萃担任筹措。惟会计刘仁静发言，谓设立事务所必添设什物，经济上应请各同志设法特别捐助云云。再由团员张君临时动议，将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员制，改正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11人，分书记1人，会计1人，组织3人，教育3人，出版3人，并说明改组之理由：（一）旧有之四部制及委员制，有互无关连之弊。

（二）将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人俱负事务上之责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员会制，则可以免此二弊，况同志皆系负责者，有事时自可随时分担职务等语。即付讨论，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萃、高尚德、祁某为组织委员，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并议决：每星期执行委员会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又由陈德荣提议，谓昨接同志李芟来函，谓本团象少爷式的平民集合，试思此语极是，欲救此弊，便须多介绍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公议赞成。至于如何向全国中学生及工人宣传，请同志发意见书，由大会决择。并公议办理同志赴俄调查及赴俄留学事；筹经费及造预算，事务所问题，因组织改变，须修改章程等事，统归执行委员会斟酌办理后报告大会。议至四时十五分始散。谦连日到无政府党人处，探悉该党近日并无特别议案，但各人拟半月刊出版底稿而已，前日有上海无政府同志张秀书、邹进二人来京，谓由上海方面派赴俄调查，随后一星期内尚有同志二人北上云云。查该二人准于一日晚由京出发。并由陈德荣转来汉口萧俊章来函，报告抵汉后之进

行及请助资事，原函抄呈〔略〕。谦又觅得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带交国际少年共产党书，原函译呈。以上均数日经过情形，合亟报告。按各方面进行，日见紧急，至于如何联络资助等情，以便窥其全豹，而易进行之处，恭请核夺施行。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日

关 谦 谨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 “五一”活动等事项报告

（1921年4月8日）

为报告事：兹探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于4月6日在北大第一院开执行委员会，所讨论之事有六：（一）筹备五一运动，使群众游行，为劳动大会以作平民自决之始。（二）筹备五一运动时，刊行一、二种小册子，征求团员文稿，以为社会运动之文化品。（三）讨论委托团员分任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之平民学校及平民讲演所，并设法使变为社会主义化。（五）印刷及其他工人组织问题，以便鼓吹工党联盟，要挟资本家。（六）讲演会之筹备及如何研究主义等事。……合亟报告。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4月8日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情形报告

（1921年4月25日）

为报告事：窃于4月24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五次大会。查是日出席者16人：李大钊、王伯时、谌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张国焘、高尚德、祁大鵬、宋

价、刘仁静、罗章龙，不知姓名3人及谦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议决之事：（一）修改章程，请大会通过。（二）“五一”运动已付印一种小册子，定名“五一日”，二千本；又一种明信片式之纪念品乙千张，皆于30日前分散工厂。又一种简明宣言传单，注重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星期停工，仍支薪金，鼓吹抵抗资本家，要求加薪，于5月1日散发各处。（三）会址因无适宜之处，暂设于平民讲演所内，以便办公。（四）陈述前次国焘与李实赴津，联合该津会，亦拟于五一日发布传单，及到唐山，此处本无青年团，经伊等联络工业学生^①数名，从事组织，并于五一日由京派代表及印刷品助辅进行，谓该处工人俱粤民，较易传播也。（五）宣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志来函，拟于5月1日开工团成立大会，是日招集工人演讲游行，请京派多数同志莅会帮助云云。次由会计刘仁静报告：收支数目尚余17元2角，随即讨论。何孟雄来函，谓在满洲里京、沪、津赴俄同志13人被拘，转解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已十余日，饱受痛苦，因伊有格林介绍赴莫斯科书，故只好承认赴俄考查教育，请设法向学务局或本校去电证明释放。当由书记发言：幸未被搜出本团证书及致大会书，“因该件缝在棉衣内，大半由格林带去”，尚易营救，此次是同人公推他去，现在被捕，理应尽力请公决办法。即由李大钊云：接各处来函，皆说上海代表自认过激，以致招祸，而学务局及本校事前未发证书、护照，此种彩色断然不允援救，且时隔多日，恐更有不便。兹有黑省友人熟识督署，托为设法，料有八九成功。惟昨与之预算，往返交际等费，至少所需300元，再加孟雄回资，合计400元应用，请公决如何募捐。当议由到会人先行认出特别捐，有李大钊签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5元，高尚德及谦各4元，其余各捐1、2、3元不等，共计筹得49元；则所差尚多，拟再以分担法，每团员2元，除出京十数人，预得100元；

^① 指唐山路矿工业学校的学生。

其不敷之数，李大钊提议向北京方面无政府党筹负小半数，“因该党亦有刘仲容、刘稀、孟知眠三人被捕”附带代为设法；其余之数，再由热心同志分头募捐，李大钊担任总包足此数，并于未筹足以前，由伊垫办，以促救出。又议设“五一”运动委员会，推选法即：举出7人，如王永禄、罗章龙、王复生、高某等，先期设法联络北大印刷工人及各校役，财政部印刷工人，同文、新社会、国京各报工人，在北大“五一”以前集合，帮助其游行运动劝诱及派传单，预备印刷品或国旗，担任散布；并选出3人赴长辛店，及2人赴唐山，协助进行，所有各费，由会计发通知，征收4、5、6月份各团员常费及请特别捐；并请各团员于三日内拟运动法之意见书，七日内交常费及特别捐等事。……合亟报告。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中华民国十年4月25日

关 谦 谨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王怀庆等报告李大钊等领导社会主义 青年团革命活动情形

（1922年11月）

据报称：于11月7日下午二时，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举行苏俄共和纪念日讲演大会。此会名为中俄协进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所发起，实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人李大钊、邓仲澥、刘仁静、杨廉、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毛一鸣、阮永钊等所主办。闻是日发布之传单小册子等印刷品，亦有苏俄来华代表团助洋200元，籍以联络学生对俄同情而鼓吹其共产主义也。查是日共有四五百人莅会，由青年团中人为招待员及散放纪念号之传单，场中悬一“全世界劳动者快联合起来啊”横联。届时由李守常（即大钊号）为主席，宣布开会，并陈述苏俄纪念日即俄国劳农政府前五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历史，并论中国应仿行俄国革命，实行劳农专政，

以打倒军阀、资本家及抵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而与苏俄携手进行之必要，故庆祝纪念日引起吾人之感化云云。继续演讲者，有北大教授陈启修、谭仲逵等，俱言中国不平等、不自由之现状，非联合起来努力奋斗实行改造，不足以解放而共享幸福等等。论说最后，为奏乐、摄影及电影等事，六时散会。查北京现有组织之团体，为革命运动而足以扰乱社会，图谋破坏大局者有二：（1）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信仰克鲁泡特金学说，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然组织，自由契合，而为大同主义者之宗旨，欲推倒政府，为无政治，无法律、宗教一切束缚之理想。但北京方面，该党缺乏经济之补助，势力非常薄弱，人数亦在20余名，虽比较为最激烈之党，亦无所施其能为。仅有时发出少量之印刷品以资宣传耳，如景梅九之《国风报》，冯省三在《时言报》副刊，及陈空三、陈德荣、王伯时、吕传周、刘果航、陈声树等所发之《社会运动半月刊》鼓吹无政府主义及组织世界语学会等消极行为也。（2）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过激派之集产党，信仰马克思学说，仿行劳农专政，预备创设劳农政府，集权集产于一般劳工会，如苏俄现状然。专鼓动工人罢工，利用群众运动，以掀起大风潮为手段。其近来进行甚为速顺，其号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部，设于上海，以陈独秀为首领，由俄国政府汇款及陈炯明捐助，为活动上之财源。现北京方面各校中，以北大居多数，共有党员300余人之多。并于政治上极力活动，且在各团体及工会积极扩张势力。近顺潮流，组织民权女权运动大同盟、劳动组合书记部、中俄协进会等团体。如请愿国会宪定劳动立法，更组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会，以引起劳工、平民之同情。对于各处罢工之事，必派人到场鼓吹，并代为拟文，筹化一切。今累发文言，攻击政府军阀资本家，并力谋中俄携手，攻击外交界为亲美派，而不赞同不与越飞会议。默查该党潜势力日渐膨胀，将为大局之害，闻其中央执行部联络一般学界，如胡适、李石曾辈，进行其所谓“好政府”之预备也。北京青年团其主要人为：李大钊、张

国焘、邓仲夏、罗章龙、邓飞雄、何孟雄、刘仁静、杨廉、郭春涛、宋天放、李梅羹、范鸿勳、阮永钊、朱务善等把持事务。以上该两党大略情形，合亟报告。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一〇〇一）3485）

关于李大钊等在北大秘密开会的密报

（1923年5月16日）

密报：：5月10日下午八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北大楼第二教室开秘密会议。有李大钊、王文彬、刘仁静等，约共40余人，公推刘仁静主席，张国焘书记。首先报告本团近增团员，计各校已250余人，皆谋主义之发展，改造社会，拥护工友，推倒军阀为目的。继有学生会代表李骏龙等相继报告出席，谓“五一”、“五七”两次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议决中有关于内政者二条：（1）推翻政府；（2）肃清国会不良份子。遂大众发言，俱主张破坏现政府，利用群众之运动。

各会代表提倡群众对于政府虽学生会已有不承认之宣言，然可以张绍曾、彭允彝为矢的，则由本团以报（暴）动行为加诸二人之身，或众至其宅，如无军警防范，则提倡将各持纸旗堆集，乘隙燃之，而毁卢舍，以扰乱政府，无法收拾。

对于国会不良份子云云，不录。

议决由学生会提议，联合教职员一致每日齐到教部或其宅，共同声讨驱逐之。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一〇〇一）3486）

5.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散发的宣传品

一封给铁路工人的信

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沪宁各铁路工人钧鉴：

列列（位）亲爱的伙伴们！我们17个人素来是在铁路上赚饭吃的，和众兄弟是一样的境遇，今天特为借着段君的乡亲出的一本

小册子上，和诸位说几句最诚恳最亲热从心坎儿出来的话。

什么叫做铁路工人呢？只要是在铁路上机务处车务处干一份活的，无论是工匠、司机、小工、学徒、拿旗的，各色人等，都叫铁路工人。所以我们盼望还是在铁路上干有一份活的，都请细心瞧瞧我们的信，并请众位兄弟们仔细想想，看我们说得在理不在理。

列列（位）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么？咱们闲谈的时候，总是说咱们不过是个小小的工人，有吗的力量呢？殊不知这五条大铁路，都是咱们流了许多血汗一手一足的造成的。那些客车货车能够开着走，都要有咱们一天到晚的卖力气才行的。要是没有咱们造的这五条铁路，中国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要是咱们不给开车，政府还能有钱办选举么？军阀还能打仗么？商家还能运货做买卖么？北方灾民全靠有咱们的火车天天开着走，才能有点粮食接济。客人能够往来南北，也都靠咱们。所以咱替没良心的政府卖的力气替大家谋的幸福，比什么人干出来的都要大，这就是咱们的力量。

卖了这大的力气，替大家谋了这大的幸福，回头看看自己的地位是怎样呢。咳，说来真伤心！一天干到晚，起码干十个钟头，还有许多伙伴们，简直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难道父母生下咱们来，就注定了要卖一世的死力气到老么？咱们的生活年年长高，赚的钱年年一样，因此有好些不够养家的，有的自己还要受饥受寒的。还有许许多多的黑暗，叫工人们受苦的，说来也难尽，大家都明白，也不用我去细说了。咱们是生来的就命苦的么？

朋友，不是，断乎不是生来就苦命，也不是应当受苦。咱们要是大伙能够齐心合力的想法子救自己，那命就不苦了。诸位，咱们也不要想局长处长会发善心，总长官僚们会记得咱们，会替咱们改良地位。他们心目中那里有咱们，那一个不把咱们当牛马看待。

诸位，也不要想那些得到咱们的好处的客人商人们会想到咱们的苦处，来帮助咱们。

诸位，也不要想去拍马屁，卖伙伴，丢人格，谋自己一个人的私利。咱们要改良地位，增高生活，也不做牛马，只有大伙救大伙的一个法子。

咱们大伙救大伙的法子，就是咱们要结合起来。凡是做工匠的司机的拿旗的，小工学徒等都一齐结合在一块儿，各站结合各站的团体，合拢各站的团体结合一路的团体；再合拢各路的团体，结合五路的团体；再结合其他铁路的团体，组织全国铁路工人的团体。咱们结合这些团体，互相帮助，谋改良地位，增加生活，换言之，就是要不做牛马要做人，多赚些工钱，少干些活，这就是咱们救大伙的办法。

诸位，结合团体是最好的办法，是唯一的办法，咱们努力干去，一定人人都可得到幸福。咱们同人中间有许多听说结合团体，就吓怕了。诸位，你如果打算永远做牛马，受洋人总管工头们的压迫，你就去吓怕罢。但是你还要准备你的子孙都做牛马奴隶呢！

你如果不愿意做牛马奴隶，就只有赶快起来组织团体。组织团体，是人人应享的权利，政府不能够干涉的。你看那些学生们，他们组织了这多的团体，难道咱们就不能组织团体么？诸位，民国无二年的中华工党，是一班政客想利用咱们工人的个二[一个]团体，那是咱们不赞成的。现在咱们自己组织团体是为自己谋幸福的。现在把咱们的应要求的几件事写在下面：

(一) 要长工钱。咱们的工钱，还是十几年前定的，现在生活程度长高了一两倍，咱们的工钱也应当随着生活程度长。因此咱们的工钱至少要长一倍。

(二) 减少工作时间。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工人都是至多做八小时的工作，咱们也只能做八小时的工作。

(三) 增加花红。咱们铁路上每年赚的不是很多的，现在每人至多得一个月的花红，咱们得要求每年两个月的花红。

(四) 放假日不扣薪。有许多地方，放假日都扣薪。我们得

要求以后放假日，都一律不扣薪。

(五) 星期休息不扣薪。咱们得要求每星期日都得休息，每月要做满月发薪。

(六) 卫生设备。各处的医院，都是有名无实的；机务处的同人，简直象住在黑暗的地狱里，所以同人每年病的死的，简直不知多少。因此咱们得要求种种卫生的设备。

(七) 改良待遇。反[凡]洋人总管工头们不得随意污辱工人，要一律平等看待。

(八) 各路平等。各路的待遇工人和为工人的设备，都一律平等。

以上不过是八条主要的要求，其余还有许多要改良的，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了。

诸位伙伴们，赶快醒过来！赶快联合起来，咱们同携着手向光明的道上走去罢。

津浦路机务处工匠段长寿等十七人谨启

1921年4月17日

（《“一大”前后》（三））

五月一日（节录）

（1921年5月1日）

“五一”纪念日，是世界上历史上一个最重大的纪念日，比什么没有意思的国庆日还强百倍。因为“五一”是劳动界战胜资本家——即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我们从上面知道欧洲美洲各国的工人到了那一天都有很剧烈的庆祝运动，举行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们中国却很沉寂的，好象“五一”那天没有多大关系。这也是我们工业没有发达，工人没有觉悟的原因。但是在近几年来，情形却有点进步了，劳动的声浪渐高，“五一”的纪念庆祝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了。

自1912年（即民国元年）我国革命成功以来，一般的国民却

抱有一种活泼的生气，对于社会的运动，很明显的努力的进行。

“五一”在中国的运动也和革命的新纪元共同长进。1913年的“五一”纪念日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那天其他的工会也有派代表到会，但是没有什么的议决和运动，不过发了一种劳动节的传单，将“五一”的历史和意思说明，并鼓动工人的觉悟，去实行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可是并没有坚决的议案和向资本家示威的运动，到了1920年的“五一”，那回的运动却又不同了。那天广州的工业团体如机器行西家、岭南工党、香港电车行、石行、茶居行、学源社等和学界，如工业女子职业、铁路专门等校联合在东园举行庆祝，到会的有几万人。同日在中国的北部北京也有“五一”的运动，由北京的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坐两辆汽车，拿劳动节传单去散布，车上插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末日”等字。传单题目为《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大概说：“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纪念日，我们工人应该快快起来休業一天，大庆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驱逐净尽。我们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取回——由少数人的手里归大家管理，不要将生产的结果，被一般不做工的人剥夺了去。我们要人人做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喂！我们工人朋友们，快快联合起来呀！”这种传单除在北京派外，还在长辛店各工厂里派给各工人看，他们都很欢迎。我们有一层要知道，就那张传单的宣言，不可轻易看过。这次劳动运动却与向来外国“五一”运动有些不同，就是带有社会革命的色彩，不可不算是中国“五一”运动的特点。那天早上北大的校役夜班也开会庆祝，由各人自由登台演说劳动工的事件。到下午他们派传单，两辆汽车，一辆在王府井大街，一辆在骡马市，通通给武装警察抓去。派传单的八位热心运

动者，那时就被拿进京师警察厅受审问。审问官某见了他们不象是做工的人，他问他们说：“你们不是学生吗？你们不是工人为什么……”他们不待他说完，就答说：“我们就是学生，就是工人。”他再问：“谁叫你们出来派传单呢？”“我自己叫我出来派的。”“你知道这种传单是犯治安警察法吗？”“什么叫做治安警察法？我不知道犯的是什么？”“你传单上说，要驱逐官吏、政客等那岂不是无政府吗？”“你错了，难道吃饭不做工（与公同音）的官僚政客，政府也要他吗？”“为什么你把田园、工厂等取回，岂不是共产党吗？”“难道人家抢了我的东西去，我不应该取回吗？”

审问官见寻不出他们犯罪的口供和证据，就囚监了他们在—所黑房子里头，后来因没有法子和理由定他们是犯法行为，所以只囚了16天就放出来了。那天上海的各工会和社会党也举行庆祝，虽遭巡捕解散数次，毕竟有千余到会，演说者十余人分散传单万余份。有一小部份工人也休息。而唐山各工厂的工人于做工休息的时间也聚了数百工人开了一个庆祝会，演说呀，发传单呀，也算很热闹。那时各地方的报纸杂志，如《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社会》等都发刊劳动纪念号。

以上所说的“五一”运动，我们不能算是实际上的运动，因为不是完全工人的自动，且没有罢工、休业、种种示威的运动与具体的议决，他们也没有直接向资本家宣战，我们只可算是宣传的运动。可是经这几年“五一”的宣传运动，生出许多效果，中国的工人，却受了感动不少觉悟了也不少。连年来各地方的工人有工会的组织，且屡次发生罢工的事，如今年三月间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广州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和各种工业如造鞋、纺织的工人的罢工，上海人力车的罢工，唐山开平等矿工的大罢工，通通都是受了历年来“五一”运动的洗礼。他们罢工就是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结果工人占了胜利。但是没有达到八小时的工作律。现在中国各地方的工人，都正着力来从事组织工会，

有许多已成立了，还有许多地方工人如长辛店、唐山、上海、广州等都自己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以从事求知识。因为他们已觉悟非有强固的团体，充足的智识，不足以与资本家抵抗，那是可哀的一件事情。我们中国的工人也跟着世界的劳动潮卷向前进。

中国的工人们和社会党呀！你们应该赶快起来，和世界的工人一块儿庆祝这个“五一”盛节。

应该在五月一日停工！

应该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呀！^①

（《“一大”前后》（三））

“五一”劳动节传单

（传单一）

五一节的问答

成君问劳君道：什么叫做五一节？

劳君道：五一节，就是民国元年前25年（西历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运动每天只做八小时工作大胜利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工人稍得着自由的第一纪念日。我们不但要纪念他，还要达到这同样事的“目的”呢！

成君道：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呵。那末，我们就要把这纪念日看得非常要紧，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要大大的庆祝的才好呢。

劳君道：不错！不错！您真是一位明白老人家！

（传单二）

北京劳动界的伙伴们：

现在社会上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劳动界的朋友们辛苦勤劳用血汗得来的东西？

回看我们自己，甚么都没有享受，只得着痛苦和饥饿，这难道是平允的事吗？

^① 这是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散发的宣传品《五月一日》中的第9节。

今天是32周劳动纪念节，是全世界劳动界朋友们奋起图强的日子，我北京亲爱的伙友们，也快些起来救救自己罢！

(传单三)

卖力气的弟兄们：你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又出了一桩重大的事情么？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我们中国的广州、上海，以至于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在今天都发生了这汹汹烈烈的事情。

诸位，你猜这是怎样一回事？是谁干出来的事？

诸位，这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卖力气的工人们啊！

今天不是5月1日吗？距今35年前的今天，美国的工人们因为对资本家要求每天只做八小时的工作打了一个胜仗。不久，世界各国的工人也用“同盟罢工”的方法，得了同样的胜利。于是万国工人的代表就公共议定了这么一个劳动节，到了这天大家却都习一番汹汹烈烈的庆祝和举动。

弟兄们呀！别因为今天前门天安门警察厅的门口少了一座花牌楼，总统府东西车站少了几百支电灯，便以为今日也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啊。他们做官的人只知道庆祝他们升官发财的日子，至于我们卖力气的苦人的纪念日，和他们升官发财是没有益处的，他们自然是不管了。

但是我们劳动的弟兄们哟！他们不管就让他不管，我们庆祝终归是庆祝。只要大家牢牢的记着年年的庆祝，总有一天让我们作苦工的弟兄们自己出来扎牌楼，放烟火，悬灯结彩，喝酒欢呼的。

弟兄们哟！各地的弟兄们何等热闹，算来只有我们北京是地獄了。我们劳动的弟兄哟！从今天起，牢牢地记着，慢慢地结合到明年的今日，我们也可以奋起来热闹，合口同声的三呼：“五一劳动节万岁呵！”

(北京《晨报》1921年5月5日)

6. 其他活动

毛泽东给陶毅的信（节录）

（1920年2月）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劳动节之京学潮

昨日为世界劳动界之纪念日，此节迺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劳工26万人大罢工，为争每日作工8小时制度，受绝大之牺牲史。已孙氏即死于是役，工人死者甚众。至1889年万国社会党开大会于法京巴黎，议决定是日为劳动纪念日，故自1890年后，欧美各国工界至5月1日皆休业一天，以为纪念。并有劳动之集会。我国工人素与各国劳工不相往还，故世界之劳动节亦且鲜知之者。今年各处居然大倡举行劳动纪念之议，是亦中西劳动界渐趋一途之新动机也。一日晨八时，北大理科开劳动纪念大会。会之主体皆以校役组织之到者百六十余人。主席亦校役，学生作来宾，当场散油印一种说明。北大校役所以纪念五一节的原因约千余言，辞长不录。有北大藏书楼主任李守常及学生鲁士毅等之演说，或说明劳工之神圣，或讲欧美罢工情形及其效用。至十一

时，始散会。……

（《大公报》（天津），1920年5月2日）

劳动节之长辛店工人大会

张 锡 彬

我在北京的时候，听见说长辛店的工人，将于5月1日举行劳动纪念大会。因为我是一个工人，所以我就高高兴兴的去加入他们的盛会。我到的时候，他们工人已经在会场聚集了，到会的人数，约有1000以上。内中除当地工人外，还有由天津保定各处来的工人，及各界国民学校的学生，与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在上星期六日，他们做了一种传单，散布各处。所以今日到会的人，就特别的多了。今将昨日所发的传单抄下。“列位列位！明天是阳历五月一号，是做工的人的节气。厂里的工人们打算开一个纪念会，大家在一块儿，谈谈话，演演说，热闹热闹！明天不是大礼拜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八点半钟开会！早点去罢！”到了八点半钟，就摇铃开会了。首由工人陶君出席，推举李懋银君为主席，众赞成。李君登台，报告开会秩序如下：（一）振铃开会；（二）推举主席；（三）唱纪念歌；（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五）报告组织工会情形；（六）报告五一节历史；（七）自由演说；（八）讨论及决议；（九）游行；（十）到原处散会。旋由工界国民学校及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歌。

歌词如下：

其 一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拚吾热血，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其 二

红旗飞舞，走上光明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

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唱歌完毕，即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为我们工人最可纪念的日子了。一则因为世界劳动纪念日，二则因为我们长辛店工会今日复活；故此开一个大会。一方面表示纪念，一方面议决几个条件，求我们工人生活的改良。次由工会主任马君登台报告工会组织情形；略谓长辛店工会，曾于五四运动时成立，后因种种困难，以致停顿。今因潮流之所趋向，生活之困苦，不得不把死而无声之工会使他复活。我希望我们工人们，不要忘掉下面几条才是：（一）固结团体；（二）求生活上之丰裕；（三）不受工头之压制；（四）铲除工人作工一切之障碍。马君报告毕，即由天津来此与会之汤森年君，报告五一节历史。汤君报告完，即由来宾张尧卿君演说。略谓今日当五一劳动纪念日，固可大事庆祝。然自问工人生活如何，工作时间如何，则不特不可庆祝，抑且悲伤不了。故此我劝列位努力望前，务必达到工作八小时；教育一小时，休息八小时。然后我们再大大的庆祝一下。次为保定工人邓秀山君演讲资本家之专横。再次为陶善琮君演说，略谓吾人欲谋生活上之改良，务必有强固之团体。望今后大家联络起来，把工会弄一个名实两全。到明年今日，至少要有点进步，然后才可以自宽告慰。此外来宾演说甚众，限于篇幅不能全载。末由劳动补习学校夜班学生丁梦周、徐宝安，日班学生白文起、王凤汝等讲演，均动听。令人兴奋。演说毕，主席即提出讨论，当场决议：（一）巩固工会；（二）邀集同志加入工会；（三）游行大会。报告毕。即整队游行。由长辛店前街，过车站，经后街而归。沿途拍有照片，并齐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一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上面书

有“工会成立了”，“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平等”，“最合理的事情是个人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一小时”，“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劳而食的人”等等。同时分散传单小册子数十种，计有数万份，沿途观者无不拍掌欢迎。一时叫号声唱歌拍掌声杂出。几乎把火车气笛的声音都压住了。游行完，即归原处，三呼劳工万岁而散。以上所记，是开会详情。我佩服长辛店的工人勇敢，我更佩服他们办事的有精神、有秩序。

（北京《晨报》1921年5月2日）

昨日三团体之五一纪念大会

高师工学会、北大马克思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三团体，共同于昨日午后二时许，在高师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个人感情。随请李大钊演说，其大意可分二段。（一）五一运动历史概略，先述五一纪念由来及美国五一运动经过，次述大陆方面法、德诸国对于五一运动的表示，及远东日本、中国近来亦极重视，末述俄国劳农政府纪念五一之特色。（二）工学主义与五一纪念，劳动乃愉快的非痛苦的，自由的非强迫的，学界人士以求学之暇，从事作工，乃尊重劳动之表示，工人以作工之暇，从事学问，乃人类应享权利，工学打成一片，乃为人类极轨。次阐发八小时工作及八小时教育之原理及其利益，极为痛快淋漓。次由高一涵演说，主张应看五一纪念为历史的，此后应以7月10号为纪念，其理由则谓从历史上观察，一种制度，发生弊病，即以—种学说补救之，挽救希腊之奴隶制度，故提倡人类平等说；挽救近世初期之工钱制度，故提倡劳力生产说。此后人类全体劳动适用“不劳动不吃饭”原理，故应有工人政治之学说，（1）因非工人不能执行政治，（2）非工人执政不能平均，（3）舍工人以外无执行政治之人。而开工人执政之端者，厥为劳农俄国，7月10日又为俄国劳农政府宪法公布

之日，所以用五一为纪念可以表示历史上的希望，用7月10日为纪念，可以表示将来希望。高氏长于演说，态度设问均极动人。又闻该会尚请有陈启修及长辛店工友代表演说，后陈以大学救护团事务，未能脱身。长辛店工人代表，则以战事关系，仅请假3小时，会未开毕，即仓卒回去。又高师工学会工学杂志特刊五一纪念号，说明纪念原因及其价值甚详，而马克思研究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各印有传单在会场内散布云。

（《晨报》，1922年5月2日）

裁德探报（一）

此文为北洋政府步军统领右翼总兵申振林呈京畿

卫戍司令的裁德密报

为报告事：窃查前旬民权运动大同盟邓康、杨廉、郭春涛、阮永钊、邓飞雄等曾在裁兵促进会联席会议时，提出废止治安警察条例案。当时他人稍有发言，则受伊等群起攻击，要挟蔡元培、林长民等领衔签名，并随同请愿于府院后，经阁议结果，将该条例交内务部酌量修改。查此案纯为民权运动大同盟利用群众运动之时机而提出废止案，以达其宣传共产过激主义之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之目的，行其该党为所欲为之宗旨。而蔡元培、林长民等之研究系，素持利用见好于学生，而对于该条例毫无关系，本无赞成与否之别，但见是日会议时邓康等之激烈动作，实非蔡等所满意也。观乎近日蔡元培等之促进会不愿与伊等联合，仅举代表出席以后之裁兵联席会议耳。此可征政客不援助过激派也。据近日民权运动大同盟中人，尚不满意酌量修改治安警察条例，拟日内招集大会进行，以达全部废止，并由李大钊起草呈文，再请愿于参众两院，今正联络研究系及民党议员代为主持。适北大学生全体要求免收讲义费风潮发生，而李大钊又借题排除与该党敌手及攻击该党最力之无政府党学生冯省三、延瑞祺二人。特意唆使手下杨廉、王汝琦、阮永钊等借挽留校长为辞，组织学生会，

以便把持。查此次北大征收讲义费为全体学生所反对，将来必可取消，料风潮不致扩大，明日仍照常上课。但青年团之李大钊、邓康辈借事排敌，潜伏势力，现正积极进行扩张党员，诱动劳工，以谋作乱。正所谓涓涓之水，将成江河，过激所传将使全国共受其祸，实宜防患于未然也。以上近日情形，谨此报告，俟容再访。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载 德 谨 呈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档号北洋军事机关(二十四)106]

昨天的苏俄纪念会真热闹

北京各团体发起之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于昨日(7日)下午三时，假北大第三院开会，到会的共有三千多人，公推李大钊主席。先由主席讲演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的影响，据他的观察，有四种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后由程某唱第三国际的歌，又由北大的音乐队奏革命歌。继由陈启修讲演，略谓苏俄革命异常重要。中国内有军阀，外有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他这种法子之外，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继由谭熙鸿、张竞生等讲演。张氏以为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公道的理想政治，所以希望把俄国的共产主义的精神拿来。智识阶级的人，只要肯从事宣传，成功自然很快。后由李秦芬讲演十月革命史。其次由唐山工人代表，代表四万多劳苦工人向国人请命，要国人起来帮助他们。并谓他们被洋资本家压迫很厉害，竟至做工也要死，所以他们挺而走险，只求速死。当他演说时，会场的人，无不感动，掌声动天。后由长辛店工人代[表]演说，略谓今日是苏俄革命底纪念日，苏俄是工人革命的大本营，是工人解放唯一的国家，我希望学生们要拿‘五四’的精神，来干革命的事业，使我们工人的国家早日成功。后来由张人瑞女士演说：世界上有什么

国家把女子当了人？唯俄国现在才达到，所以女子在今日更宜庆祝这个纪念。我中国是受压迫的民族，女子受了被压迫的压迫，所以我们女子要将苏俄革命的精神拿来，才能够有见天日的日子。最后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演说，讲演少年共产党在世界做了的事情。后全堂起立，三呼苏俄万岁，三呼中国革命万岁。后演电影而散。

（《晨报》，1922年11月8日）

长辛店和小沙渡的初期工人运动^①

（1930年6月） 邓中夏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者”（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

组织工人工作是从1921年开始。

1921年1月1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3000余人。张特立（即张国焘）和邓中夏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对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5月1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竟有1000余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

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后来变为叛徒），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

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

共产党上海党部在1921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

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

（节录《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版）

（五）创建中国共产党

1. 公开提出建立劳动界的政党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3月）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2. 关于建党活动的回忆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

张 申 府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

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陈独秀在上海建党，首先主要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参加组织，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此外有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都是当时在沪的。1920年9月十几号，因罗素来中国讲学，我去接罗素，到了上海，就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上面这些人我都见过。罗素在上海呆了几天，由傅铜（英国留学生，北大教授，搞哲学的）陪着他先到长沙讲学。9月下旬，我就回北京了。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是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了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也回到了北京。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这时我准备出国，十月份我又到上海去了。后来听说北京方面发展了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全是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党后又退出，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了。

（胡庆云、高军访问整理，1980年3月经本人审阅、修改）

北京小组的组成

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

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

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9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茫〔范〕鸿劫、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

多，其中并无一个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形地停顿了。

10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象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11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4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9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扩大为15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11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步入正轨。

（节录张国焘《我的回忆》）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用惯了，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们还沿用这个名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范围在北京，北京区委则是稍后的事。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做些宣传、翻译工作，同时也有过一些行动。后来，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工作，得到李守常先生的支持。我们经常聚集在守常先生的办公室里探讨一些有关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在这些谈话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我记得守常先生常提到：

“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很多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

业。”许多同学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组织，也迫切想建立类似的组织。我们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更不止在一个地方酝酿这个问题，但真正组织起小组，还是在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内部许多事情还没有就绪，远东还有白俄捣乱，赤塔政权还未解决，因此中俄关系没有解决，中俄之间尚无来往。

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中俄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于是1920年5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到北京。

那时听说维金斯基来北京是经日本到中国的，又有人说他是直接来中国的。维金斯基来北京之后，首先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大学经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际上有了一些声望，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渐渐与北大有往来。一是图书的交换，二是北大的同学出国留学，只要由北大出一个证明，证明学习过什么课程，国外大学都承认有效，而其他学校则没有此种地位。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金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金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李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了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位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金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金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如此，中国应有一个象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金斯基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进行几次座谈后，又

邀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我们谈话是漫谈性质，主要是了解个人学习、工作情况，涉及面也很广泛。有一次谈话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坐下之后，他象谈家常一样，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找了张地图看了看，说：“这离北京很远吧！”他还说：“你们同学中间，南方人不少，家离这里都很远。”然后他又问，你们是如何学习的，从前读过一些什么书，现在在读什么书，学校里现在教些什么，学些什么？我就把学习的情况，看过的书刊，一一同他谈了。同时把我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跟他说了。我说，现在我们学习的书很少。他就把北大地址、个人名字及通讯处都记下来，并答应回去以后寄些读物来。此外，他还同我谈了一些青年的理想、前途等问题。他还说，俄国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维金斯基是学经济统计的，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这次谈话中，我了解到维金斯基十月革命前和美国学习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美国工人运动研究也很全面，后又游学欧洲。维金斯基年纪四十开外，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在谈话中，他表示来华前，对中国问题曾作过研究，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和同盟会主要人物的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内部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通过与他谈话，我感到维金斯基是一个学问渊博、思想革命的人。他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的介绍。在两人漫谈间，维金斯基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谈到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及展望未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50年到100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

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落后7倍，比德国少3倍，燃料比美国少17倍，比英国少10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50%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三分之一。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他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他的一席话，使我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我们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之后，他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他行前与我重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的事。我们后来源源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外文书刊。他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写信介绍到上海，是作为北京小组写信给上海的。他决定离开北京，转往上海访问，临行时对我说：

“我们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不久的将来会有重要结果。”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握手道别而去。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当时我们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我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中坚分子，参加过工人运动的，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后工人党员渐渐增加了。当时的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推守常作为小组领导人，其他人遇到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后来工作渐渐发展，开始有了简单分工。张国焘主持组织、交际；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与共青团工作；我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当时彼此分工界线不明显，可以说是既分工又合作。

（节录罗章龙《椿园载记》）

张国焘的回忆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8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10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30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20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我的回忆》）

郝久亭的回忆

于方舟、韩麟符等在五四运动前就受到新中学会的影响了，

至五四运动起来后，就更与李守常、于树德、安体诚等密切起来。天津五四运动的组织与各种组织名称，均与李守常等指导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后，曾由于树德等在元纬路某里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既又在河北建立女星社，于方舟、韩麟符等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着在会内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订有新青年刊物。会与团建立的确切时间我不敢肯定，但确有期可循。五四运动后，我去烟台时尚无此种组织，至1921年6月，我去宣化中学教学路过天津，与安体诚见面，才知道于方舟等已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并了解是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变的，我才在口头上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教学中发展团员。

（《郝久亭谈天津建党情况》）

王贞儒的回忆

1921年暑假，方舟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在1922年联合各校学生代表重新组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被选为执行部部长，加强了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各种运动；在学联的主持下，兴办了多处平民学校，更与各界人士联合在1922年6月3日禁烟节，举行了林则徐焚烧鸦片的纪念大会，积极发动和参加了天津小学校学生联合会，为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准备。在1921年和1922年之间，方舟和先烈李大钊同志发生了联系，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在天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在李大钊同志的指示下，在天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方舟是天津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方舟更响应党的号召在津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天津分会，当时参加的同志很多。

1923年方舟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入党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对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更为积极努力。在党的领导下，他先筹划怎样发展党员和建立天津党的组织；着手的方法是先办直隶全省和天津各工厂的工人平民学校，

并自己编写平民课本三册。1924年天津各纱厂成立了平民学校，当时有李培良、安幸生、卢召亭等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在办理平民学校的同时，宣传工人组织工会，发展工人党员，为工运打下了基础。

（《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1期）

黄秀珍的回忆

1920年，以王尽美为首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大约五、六十人。召集各种纪念会都是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后来这些人大部分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

在搞“励新学会”时，王尽美同志就同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联系。我当时跟着父亲在济南读书。记得王尽美同志经常出发，作什么工作我不大了解，可能是搞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同北京什么人联系我也不了解，常听父亲同王尽美同志谈李大钊同志和刘仁静（后为托派）。

（黄秀珍：《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
《山东党史资料》创刊于1963年。）

罗章龙的回忆

我对山东建党初期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因为那时我在中共北方区委负责工运工作，经常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东北等省区巡视工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情况忘却了，一些记忆不很清了。现将还留有的若干记忆作一介绍。

早在1919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

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在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如天津、唐山、西安、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地都吸收了一些通讯会员。通讯会员有的是本人亲自来登记入会的，也有的是本人不在京，写信申请加入的，这样联系就更广泛了。连河南、湖北、广西、云南等省也都和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了联系。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通过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通讯会员，名字记不清了。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同志1921年7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一大以后，他曾被派到苏联去出席远东民族会议。山东同他一块去的还有邓恩铭、王乐平等人，是属于北方区派出代表中的成员。通过苏联外交使馆办理的出国手续。1922年七、八月份，我到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王尽美同志也到了上海。王尽美同志自己主动提出到北方区委工作一个时期，说要锻炼锻炼。我当时想，他是山东的领导人，山东离不开他，他不能放下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到北方区委来。可是他坚持这个主张。后来中央、北方区委和我也就尊重他的意见，都同意了。他到了北京，我的意思是推荐他负责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但他不同意。他说，我在这里当战士，做基层战士的工作。这样就让他当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秘书兼北方劳动组合部的副主任。关于山东共产党小组是从何时建立的，我记不清

楚，但在我的印象中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党、团、工会先后组建的。有人问我，说山东共产党小组是陈为人帮助建起来的，我不清楚。因为陈为人是同刘少奇、肖克飞、王一飞等十来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苏联去的，他回来时是1922年了。他从苏联回国后，山东已建党他未赶上。陈是湖南人，是我的同乡，我们非常熟悉。如果说杨明斋为建党的事去过山东，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山东人。杨明斋1920年前后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他是我们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在北京，我和他曾住在一起。

关于山东共产党小组的成员问题，我认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这些人似乎可以基本肯定下来。王象午也是很早就入党的一个人。我在建党初期，曾到济南去过很多次，因为那时我是负责工会工作的，又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负责人。那时，中共北方区主要是李大钊、张国焘和我几个人，后来，张国焘到上海中央去了，这边的工作就是我和李大钊来管。李大钊是老师，许多事他不经管，因为他很忙，一些事务事也不必经他去管，具体事务工作主要就是我来搞了。

（《济南工运史料》第2辑，1983年10月）

3. 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

与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

（1919年夏），布尔特曼从外国干涉者占领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天津。李大钊与他建立了联系。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工人组织工会方面的经验很感兴趣。在外国干涉（苏俄）的年代里，来到天津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们向中国大学生们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并给他们讲述了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1919年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未来的主席布尔特曼会见了李大钊，后来他称李大钊是“杰出

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

与 鲍 立 维

我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该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转引《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冰弦回忆：“1920年春间，接到一封用世界语写的信，署名是布鲁威（即鲍立维——编者），信则发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绍，说他是布尔什维克人而居华北，他又说由阅读《民声》世界语版，知道自一九一二年紧跟辛亥革命后即有自由社会主义一群，在华南努力宣传……他相信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革命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生疏，或许乐于携手，这是他发来这封信的缘故。”“那时留守学舍的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于北大黄超海（即黄凌霜），让他们就近接洽。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

与布氏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者同盟’。没有分什么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者，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于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1951年香港版，
转引自北师大《党史学刊》1980年试刊第1期）

郑佩刚回忆：“1920年3月间，我接到黄凌霜来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 Broway（即鲍立维——编者）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将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1920年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为领导人，袁振英，尉克水（山西人）和我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加……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派来两位同志经海参崴到上海（一是俄人 Slromisky <即维金斯基——编者>，一是华人杨明斋任翻译）推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某日夜晚，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二号）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

（《“一大”前后》（二））

黄凌霜早年撰文谈在天津会见俄人情况：“当露国革命之初，忧国人对于露潮之误会，为译1919旅俄六周见闻记（北京晨报出版），足下曾为余读稿，想当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编者按：黄凌霜以“兼声”笔名所译《1919年旅俄六周见闻记》发表于《晨报》副刊1919年11月12日至1920年1月7日。黄说“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应是1920年1、2月间。）

（《同志凌霜的一封信》，《工余》杂志第16号）

附鲍立维有关情况

据张西曼回忆：北大俄文系于1920年秋季正式开办招生，与张同事的该系教员中“另有一败类，华名柏烈伟（即鲍立维——编者），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铎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编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张西曼还说鲍立维向第三国际冒报虚领经费，后被发觉要调他回国查办，他声明脱离苏联合国籍。1937年日本侵占北平，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加入美国籍而赴美。

（《张西曼：《历史回忆》1949年1月版）

又据北洋政府密探关谦1921年2月19日的报告中，鲍立维是苏俄政府人员，也是北大教员，住天津，每逢周五周六来京上课。曾发动北京的青年赴俄留学考察，并与无政府主义者会谈等。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2集）

与荷荷诺夫金

据彭述之回忆：经鲍立维介绍，荷荷诺夫金来到北大图书馆找到李大钊。荷荷诺夫金极力推崇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希望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表示要和上海的陈独秀商量。陈独秀回信同意后，荷荷诺夫金便赶回远东。不久，李大钊就接待了维金斯基一行。

彭述之还回忆说：1924年李大钊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时，曾到东方大学参观，向当时在东方大学的彭述之谈了荷荷诺夫金的情况。彭述之还说荷荷诺夫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

（《彭述之回忆录》，香港《争鸣》月刊1983年第6号）

又据郑超麟回忆：

1924年前，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已知道荷荷诺夫金去过中国，与李大钊见过面，但年月不详。荷荷诺夫金1924年时在东方大学任职员，他出生于哈尔滨，汉语讲得很好。荷荷诺夫金中文名“霍乐勤”，系李大钊所起。

（《“一大”纪念馆工作人员访问郑超麟》）

与维金斯基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金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在北京大学教师鲍立维的协助下，维金斯基等一行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其他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北京是反动派的堡垒，没有发达的工业，也就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当时很难成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因此，他们就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K.E.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

张国焘回忆：

1920年，约在5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

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一大”前后》(二)第129页。)

4. 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关系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规约草案*

第1条，本同盟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名之，事务所设于东京。

第2条，本同盟由团体和个人组织之。

第3条，直接加入同盟的会员每月交纳会费30钱，团体会员每月交纳10钱。

会费滞交者出席大会时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

第4条，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可拒绝团体和个人入盟，对已入盟的团体和个人得开除之。

遇这种情况，执行委员会必须向下一次大会报告并取得认可。

第5条，本同盟于每年（4月）召开一次全体大会。

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或盟员4分之1以上要求得开临时大会。

第6条，盟员有向出席大会代表委任行使对大会决议的表决权和选举权。

*据1971年8月号《图书》杂志(岩波书店出版)所载的山道健太郎《巴黎公社一百年与日本》，其中介绍了作者保存的该同盟名册，有“李大钊加支那北京大学内，丸山幸一郎加支那新支那社……”的记载。在李大钊名字上方并写有“50枚”字样，说明李大钊购买了50册该同盟宗旨书。

委任时必须进行记名投票。

第7条，直接入盟者同时又属于某入盟团体的成员时，或者属于几个入盟团体的成员时，在大会上只限有1人的表决权 and 选举权。

第8条，大会的决议由出席大会（包括委任者）代表半数以上通过才能成立。

第9条，执行委员会必须在大会召开的3周前（临时大会则在1周前），将大会拟讨论的议案通知全体盟员。

由盟员20人以上提出的议案，执行委员会也必须履行上述手续。

第10条，大会议案必须按本规约第8条手续议决，但在会议中临时动议并经出席会议4分之3以上代表支持的情况例外。

第11条，为执行大会决议及其他会务，设置执行委员会（委员15人）。执行委员会由定期大会投票选举。

第12条，临时大会有权对执行委员全部或一部进行改选。

第13条，执行委员会根据任务需要得设各种专任委员会，专任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为6个月。

第14条，大会有权对专任委员的全部或一部直接解任。

入盟启事

本同盟几经修订，已于通知所示，拟于10月召开成立大会，确定规约，选举执行委员会。在此正式成立之际，欲广泛征集同志，请速速申请入盟。

本同盟非政社团体，入盟者无男女、年令、职业等限制。

同盟正式成立之前不收会费，但有愿支持创立费者表示欢迎。

至成立大会之前希望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入盟，志愿入盟者请通知姓名和住所，将在您方便的时候寄上发起书。

按规约草案规定，个人或团体都可入盟，加盟后将于各地组织地方机构（或支部），地方机构（或支部）的组织也是我们所

最希望的。

自9月1日起，将由筹备会发行《社会主义同盟》月刊，并在该刊发布同盟筹备工作的情况。（定价每册30钱，全年3元30钱，帐号为东京平民大学31370号）。

计划在大会召开前组织讲演队，在方便的地方游说，如蒙来信联系，以进行具体洽商。

入盟申请（明信片也可）请注明姓名、住所及职业，寄本盟事务所。

（韩一德译自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12号）

(六)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 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

(1922年3月12日)

北京大学教授 李守常

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只要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还要受资产阶级意志统治的这种时代继续存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正是这种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也可以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

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最近时期内的表现就是拥有两万多名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坚持罢工三月有余的香港海员工会同盟。在工会组织还不发达的中国，香港海员工会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成员，握有如此丰富的基金，并且一旦向资本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条件，就不管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和苦战都要坚持斗争到底，有这样一种集体团结力量，加上每个罢工成员那种团结心和坚韧力以及由此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都将会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各地的各种团体以强而有力的鼓励和支持。

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人的斗争和目标，固然是依靠了香港海员工会本身的力量，然而不容忽略的是，对于初次举行的

* 原编者按：最近中国也已建立起工会等组织，以至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劳工运动，为此我们访问了中国劳工问题专家、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氏，请他就中国的劳工问题的现状和未来，谈了如下意见。（昏迷生）

这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从一切方面即物质的、精神的等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援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举一例来说，即使是尚处于分散状态的小组织林立，很不容易取得一致行动的上海各个工会组织，也极力劝阻了准备取代香港罢工船员的工人赴港。与此同时，各团体还几次募集捐款以支持海员罢工的持久斗争。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尽管与香港远隔两地，也凑集了工资的几分之一作为捐款送往香港，还有些组织或派代表前往声援或筹集募捐给予资助，其数目之多已达惊人程度。这一次香港海员罢工的成功确实是与海员工会的团结力量和全国各团体的支援分不开的。因此香港海员工会的胜利，将会给当前在工人中正方兴未艾的工人联合的思想——即使面对具有绝对势力的资本家，只要依靠团结的力量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那种工会主义思想，增添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完全可以相信它必定会促进各地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关于海员罢工暂时就说到这里，现在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情况。

就当前看来，不管怎么说，工会组织要属长江流域和广东一带比较先进，至于北方，几乎看不到象样的工会组织。上海的工人团体拥有的人数虽然相当不少，工会的数目也非常之多，不过这种小团体的分立的状态，一旦需要采取共同行动时就有许多不灵便之外，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小团体的分散存在，又会有利于工会组织和团体运动的发展。

再看广东的工会，这是中国工会团体中居于先进地位的地区，这里不仅有一般的机械工人工会等，而且还有茶业工人工会、木工工人工会、女界职业运动会等。广东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中国工人最先采取强硬态度的罢工，由此难免使人想起，先前在上海被查封以后又搬到广东，因此而迟误了三个多月才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等，它所主张的思想对促使这次罢工的迅速发展和采取强硬态度所发生的某种影响。

长江上游（应为中游——译者注）的汉口，工会组织也有相

当的发展。不过象本月2日发生的男接线员为排斥女接线员而举行罢工一类事件，若从一个方面看，有人可能认为这反映了工人运动颇为幼稚的思想水平，此等行为只能对资本家有利；其实，这种看法不过是一种片面和表面的观察方法，因为不论是汉口的排斥女工、还是广东的男工反对雇佣女工等，都有力地说明了职业妇女出现的事实。只有通过这一事实才能增强妇女对职业的强烈观念，才能培养出维护团结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促进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也只有如此，才能加速妇女职业团体的建立和日益增强其团结的力量。

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工业不发达，可以说工会组织，还没有一个达到值得一提的程度，能够勉强列举出来的不过是京汉线、京绥线及其他各条铁路线上职工的工会组织。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除开上述铁路工会之外，在天津、北京就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会组织了，尤其在北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工会组织；然而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职工人数也会随之增加。他们的知识也在不断增进，必然会感到组织工会的必要，随着也就会进一步地知道团结起来提出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事，从而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开展，自然地必将获得日新月异地发展和进步。

以上意见是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参考，单靠记忆所及说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写出更详细的意见。

（《北京周报》第八号，1922年3月12日）

韩一德译 穆传金校订（1984年9月）

2.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 的报告（节录）

（1922年6月30日）

北京方面的劳动运动*

《工人周刊》每期印2000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今犹继续刊行。

参加陇海铁路罢工。

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

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北方路矿工人的斗争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北方分部（节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亦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是中共“一大”前成立的。其迅速发展则在1922年间。书记部在1921年初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人革命宣传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领导数十万工人斗争的司令部。书记部成员以学生和工人为主，这个庞大的男女青年队伍包括有各项专才。他们之中有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也有学理工农医的，还有学文学、艺术以及军事的。他们在工作上各尽所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接触面极广。当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以后，

* 此标题是编者加的。

战斗力量就更加强大了。他们团结一致、勇敢坚毅、不屈不挠地在城市与乡村进行严酷的对敌斗争。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与贡献。现就其源起组织、活动业绩等简述如下。

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学生数人，即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该会原是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究竟不是革命行动的集团，固然会员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同时也进行了某些革命活动，不过这些活动是漫无计划的。因此在中共北方地区小组建立后，开始讨论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经过多次研讨，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接触工人运动的机构，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试行探索，借与当地工人建立初步工作关系。在这个时期中，恺荫（张特立、张国焘）、文虎（罗章龙）和孟雄（何孟雄）等分途到上述各地旅行访问，结识了当地工人某些组织的领袖多人，又通过这些认识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初步建立了工作据点，这就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前身。

1921年5月中共党组织决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主任为张特立，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渔洋里六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由罗章龙负责。在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别成立各地区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由王瑞俊，武汉由林育南，湖南由毛泽东，广州由陈公博负责。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北方工人运动有春云渐展之势，但面临许多新问题，人力与经验俱感不足。此时中央自上海来信，通过北方区派代表前往出席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推动工人运动与产业工人区域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等问题。

中央扩大会是在1921年9月间召开的，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担任中央书记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

当时中央负责人仅仲甫（陈独秀）、恺荫及国际代表等人，对于如何开展中国工人运动尚无经验，所以召开扩大会的目的主

要是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处代表。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瀛、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湖南毛泽东，广东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

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北方书记部仍由我负责。

……北方书记部工作范围管辖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即：顺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北京、天津、开封、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郑州、洛阳、徐州、蚌埠、张家口。后来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所以事实上北方书记部涉及范围很广。沿着铁路南至上海、武汉、广州、安源、昆明、腾越、蒙自等城市都有工作联系。

中央扩大会议结束后，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将扩大会议决议向中共北方党委报告后，即讨论具体措施。大家说：“咱们当初曾从事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宣传与教育活动，创办《工人周刊》，开办长辛店补习学校，劳动通讯社，并在南口、丰台、唐山等地开展工作，今后就从这些据点向前推进，努力工作，坚持不懈，自然会有成就”。最后，决定了北方工运工作的初步方案。

（一）选定长辛店、唐山、南口和丰台四处作为工作试点。因为上述地是北方铁路工人集中的地区，且长辛店、南口靠近北京，丰台为交通枢纽站，唐山是靠近北京的最大煤矿。（二）在上述各地设立两个或三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灌输革命意识，讲述罢工斗争知识。（三）试行开辟工人斗争战线，设法争取参与领导北方区内重大工人自发斗争。（四）加强党报《工人周刊》编辑阵容与发行工作。（五）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渐向工会组织

形式转变，第一步先成立工人俱乐部。（六）在铁路、矿山城市建立党与团的组织。（七）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合法斗争与直接行动的罢工斗争方案。（八）调查了解情况，决定对抗交通系斗争方案。（九）筹办工人运动讲习班，训练工会工作人员。

（十）在工人集中地区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减少商人居间剥削。特别重要的是密切注意激发工人的斗争意志，有计划地推动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且对于任何自发斗争都要积极参加、引导和组织，使其获得成功，以扩大书记部的政治影响。

但是要实现上述方案，就当时北方书记部人力条件来说，是相差很远的。若只凭书记部极少数青年学生奔走呼号，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会议决定北方区党员以全力参加书记部工作，同时又决定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集一批志愿工作人员，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

当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1921年至1923年)如下：罗章龙（主任）、王瑞俊（副主任兼秘书）、邓培（唐山大厂负责人）、史文彬（长辛店工会委员长）、孙云鹏（正太路工会会长）、唐宏经（京奉路沈阳工会会长）、王荷波（津浦工会委员长）、时奎元（开滦矿工会会长）、张汉清（京绥路工会会长）、傅书棠（胶济铁路负责人）、伦克忠（青岛四方纱厂负责人）姚佐唐（津浦路徐州工会会长）、王符圣（陇海工会负责人）。特派员：京绥路：何孟雄、张汉清、王旭文、马净尘；京汉路：吴汝铭、凌楚藩、项英；陇海路：游天祥、王忠秀、魏荣珊；京奉路：王瑞俊、王麟书、韩玉山；津浦路：王仲一、张振成、孙鸿儒、李保成；胶济路：郭恒祥、李青山，道清路：童昌荣；淞沪路：余立亚；正太路：袁子贞、傅茂公、高克谦；沪宁路：孙津川；沪杭路：沈干城；粤汉北段：郭亮；株萍路：朱绍莲、李涤生；开滦五矿：李昌兴；天津市：安幸生、李培良；北京市：陈楚梗、萧明；唐山市：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郑州市：汪平

万；济南：李味农、刘俊才（余从略）。

.....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所规定的革命计划在1921至1923年期间工作实践中，经过大小数十万人次的罢工斗争，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生活，取得了工人的自由权利，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北方书记部创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北方矿工会，各大城市产业与地区总工会，并进一步成立了全国总工会。由于上述工会组织与罢工斗争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广大地区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北方中共党的建立乃通过若干次重大的罢工得以迅速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对团结青年学生工人固然起过很大作用，但在北方产业工人区域，特别是铁路矿山城市地区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则完全以几次重大罢工为契机。所以自从1922年间北方路矿工会接连十余次的大罢工有如万弩齐发，表现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威力，同时也使中国工人政党名实相符地成长壮大起来。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

北京出版社1981年）

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

京绥路局职工罢工风潮，尚未完全平息，继之而起者，昨日（24）又有京汉路大罢工事实发现，兹将其经过情形，详细披露于左。

罢工之起因 先是京汉路局全体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向该局要求加薪，并对于工人之待遇上，亦提议请稍加优渥。路局当事左支右吾，毫无确切之表示。迨22日，工人方面作最后之要求，路局始漫应于23日正午十二时当有圆满之答复。及期，工人代表晋谒路局当事，仍是敷衍。工人大为愤激，各代表遂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集议，讨论对付方法。结果决定坚

持永久罢工，不达目的，誓不转圜。此掀天动地之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

要求之条件 工人既全体议决罢工，于是由北京，长辛店，琉璃河，各地铁路之工人，集于长辛店者有3000余人，共同议决八个条件（见宣言中）。

罢工时之情形 工人既向路局提出八项条件，长辛店方面，集聚工人约3000余人，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情愿一死”，“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打倒国贼高恩洪”等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昨日（24）下午三时第四次客车由汉口开至，工人即全体上前，阻止列车行驶。该车过保时，曹使因该车有要公须至北京，即命宪兵王司令带兵百名，随车护送。至长辛店站，王司令下车一再述明来意，并极力以调人自任，工人坚持原来主张，誓死不放。车中坐客，亦相率说项，工人坚执不依。迄六时二十分，工人因王继续劝告，乃谓路局当事屡次失信，非先行签字，允许工人之八项要求，万不能开车。复要求列车车长将请愿工人，随车带至北京，直接向京汉路局交涉。言时工人一拥而上，所执白旗，皆插于车头。此际白旗蔽空，迎风招展，拟于昨晚车抵西站后，先向京汉路局，实行包围。若仍置之不理，则全体一面向交通部包围，要求作有保障之答复，一面向高恩洪住宅包围。其罢工步骤，则定24日由北京至顺德线，25日由顺德至鄆城线，26日由鄆城至汉口线。

各方面之援助 昨日（24日）第四次列车乘客中，有国会议员李国珍、陈邦变等，目睹工人要求之合理，大表其同情心，咸谓交通当局之太不人道，毫无保护劳工观念。决定今日向国会提出弹劾交通当局议案。又京绥，京奉，正太，津浦，各路工人，均派代表至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表示决心援助。一二日内，交通当局若再不予圆满答复，即一致起而罢工云。

但又据一报告，京绥路局职员为反对高恩洪以该路向泰康洋行抵押借款，曾派代表向府院请愿，要求取消该项合同，政府方

面因近日政潮起伏无定，内阁问题悬而未决，对于该案，未曾作负责之答复。该路职员以未得要领，颇不满意，故于前昨两日派人分赴京汉津浦陇海三路，运动四路联合一致罢工，籍以对抗高氏。现已得三路同情，准定三日内一齐罢工。自昨日上午八时起，京汉路局车务会计文牍各科已如约开始停止办公，由京赴汉之交通，业已断绝。闻今昨两日内，津浦陇海两路亦决将相继罢工云。

据长辛店方面消息，长辛店工人自驱逐邓长荣之后，工人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北段总会和全路总会先后成立。长辛店有位郭福祥总管，专以摧残工人利益为自任，就是邓长荣所做的事，都是他嗾使的，工人早已恨入骨髓。兼之郭某串通他的私党，黄绵锦，王龙山，谈荫棠，徐家楣等共同舞弊，长辛店工人已将他的弊端呈明交通当局。自长辛店的俱乐部成立以来，工人等过年过节，决定不送礼物与总管们。平常进厂也不施运动费了。凡厂内要请长工或工人，都要由平常的小工按次升入。郭某见这情势，所以对于俱乐部，成了仇敌，接前次邓长荣破坏俱乐部时，郭某捐了200元给他。近日工人将他种种劣迹呈明总会和交通当局，但工人屡向当局要求，当局一味敷衍，不以为意，所以工人在20号发出通告，要当局在23号答复，到22号才派人说项，而工人要求的条件一无答复。至昨日而实行大罢工，兹录其宣言书如下。

全国工友兄弟，父老，姊妹们，我们长辛店的工人，因感受生活困难和一部份暴戾厂长的欺凌的痛苦，力谋自卫计，才组一个正大光明的工人俱乐部。我们的俱乐部完全是由长辛店工人组织而成的，绝对的不受任何党派的利用，亦不受任何党人的指使，只专为工人求幸福，争自由，谋得到工人应享的权利为止。这种纯洁的宗旨，在四月九日成立会的宣言书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想各工友父老兄弟姊妹们还能记忆。

我们这次到底为什么事情罢工呢！恐各界人士，不明白个中真象，难免不有谣传失实之患，只得向各界人士，涕泣详呈之。

一、我们为要求革除无端虐待我们的人们，——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电务科段长黄绵绵，书记王龙山，机务处电汽厂司事谈荫棠，科长徐家楣等五人——该五人平日对于工人之虐待，欺骗，苛罚，克扣等恶劣手段，罄竹难书，使我们不驱逐他，处在他的淫威之下，永无安宁之一日。我们已将他的罪恶一一呈报铁路当局，当局竟不允许我们的要求，我们迫不得已，只得停止工作。

二、我们因感受生活上的困难，并想除去厂中历年的积弊，向铁路当局要求八个条件，兹将我们所要求之八条录后。

(一) 厂中日后上人革人，均要通过工人俱乐部委员会，厂内司事，概不得私行荐人（如此，可以免除私受贿赂，阴用菲材，而免假公济私等毛病）。

(二) 长苦店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有加过一次工薪者，值此米珠薪桂之际，工人之苦况艰难，前者姑无论矣。从今起，工人应每月加月薪一毛，以后凡作工够二年的工人，如没有增加工薪，应立即增加。

(三) 短牌工人，凡作工够二年者，均应改为长牌。

(四) 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作工之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

(五) 此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开赴前敌者倍受辛苦，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性命几不保，应每人增薪一级。

(六) 北京，玻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处应由当局盖立官房，以便行车工人休息，以免流离失所之病。

(七) 长辛店工人甚多，几无宿地，铁路当局应该盖设官房，以便工人住宿。

(八) 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

以上所要求的八个条件，都是我们应得之权利，并没有出乎铁路规章之外，乃铁路当局，竟吝不与我求，我们迫不得已，只得全体罢工。

全国的工友，父老，兄弟，姊妹们呀！我们处在黑暗地狱之下，何等痛苦，何等的惨伤。我们天天象牛马样的作工，竟得不到一絲一毫好处，言之心痛。我们原不想攻击上司，他们自己天天压迫我们攻击上司，我们原不想罢工，铁路当局竟强迫我们罢工，谁是谁非，曲宜当有公论。但我们工人既无学识，复无能力，望全国最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与我们以实力的帮助，我们是感激不尽的了。

我们自8月24号起，各厂均停止工作，机车除军用车照常开驶外，其余长短客货票车，概行停驶。

又一报告，罢工开始后，过二三小时，北京方面即得报告，立即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镇服工人。不知北京车站工人与长辛店方面，早有联络，兵至前门车站，工人不与行车，局中无法，乃电长辛店工人云，“罢工宣言中已言明不停止军车，此次由京南下军车，自亦当在不停之列，希准予通行”。工人方面之答复路谓：“兵来则死，兵不来亦死，与其日后受压，受饥饿而死，无宁兵来饮弹而死，如必欲派兵至此任从君便”云云。于是兵车乃开至长辛店，车至后，兵士皆居车中，数约200人，全体工人亦聚集于其对面，扬旗列队，严阵以待。时有游行监察之工人数人与二铁路警察冲突，警察以手枪向之，声言敢前进者立即开枪，势其凶恶。工人愤不可遏，即以胸向枪，令其立放，多数工人即上前夺枪即未得。同时闻在长辛店北之芦沟桥车站，有游行工人6人为警察捕去，工人乃立将此以枪示威之二警察拥入俱乐部，以为抵制。当时3000余人，齐声高叫，此俘虏之警察，大为气夺。至于派去军队，则始终未敢下车。工人与之对阵二三小时后，乃扬旗举行游街运动。至于调人方面，则有山海关及唐山之工人代表，劝告铁路当局，促其立允工人要求，局长亦请京中许某及警察局长作调人，宣言，对工人提出之八条，立与局长商量，明日即可答复，惟请工人开车，工人不允。只允将此次由京开来之兵车开回。调人又请求将被虏之二警察放出，工人方面已应允。对

局长又提出十一条要求，迫其承认。

十一条如下：

(一) 前所要求之八条概行允许，但短牌换长牌应六个月一换。

(二) 在罢工期内不得克扣工资。

(三) 不得因罢工借端开除俱乐部人员。

(四) 凡出差饭费各大小工均为一工一饭，各站各厂均取一致。

(五) 前砖瓦窑所革除之工人九名应即复职。

(六) 工厂改良，夏天多开窗，冬天添暖炉。

(七) 行车处司旗挂钩看车等人饭钱应与第四条同。

(八) 年终余利工人应得花红应即发，按京汉规定章程照办实行。

(九) 监工处北京工务处存车厂，无论星期假日，概不休息，应照厂中工友一律休息。

(十) 以上所要求八条，从北京总局起至顺德府止，凡属工人都应同等享受。

(十一) 前门段长车务段长带同随身警士，狐假虎威，嗾使巡警持手枪射击工人，应严行查办。

现局长对此十一条尚无表示云。

(载《晨报》1922年8月25日)

京汉路罢工昨日尚无结果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一节，已志前报。顷据路局消息，前晚(24日)1000余名之工人抵西站时，即由京汉路局警务处长张汝霖，向工人代表极力挽劝，令其先将团体解散，徐图解决之法。工人方面仍坚持原案提出之八项条件，谓有一项不达目的，不能散去。当由第三者与京汉铁路管理局长具细磋商八个条件，由局长作后盾之批示，工人犹不满意，详又往返更改，始获逐案批复。

惟对于革去工人须通过俱乐部一条，尚未承认。各工人以尚未获圆满之结果，延至昨日（25日）上午三时三十分，遂相率遣返长辛店，共谋对付路局之方法。闻其罢工进行之节略，与前日所传又有变更，即第一日由北京至保府，第二日由保府至郑州，第三日由郑州至汉口。又闻陇海线今日已决定罢工，作一致之协助。政府方面，昨日曾派出军队一部分，开往长辛店一带，作弹压地面之准备。兹将路局批复工人之条件，披露如下。

京汉铁路管理局渝

（一）据称火车房总特班郭福祥，虐待欺骗苛罚克扣等。

（批）郭福祥已开革，伤人正在查办，查实当然撤革。

又据称厂中日后上人革人，均要通过工人俱乐部等情。

（批）事关政局权限，要请部里批示。

（二）据称从今起，工人应每人日薪一毛，以后凡所工够二年的工人，如没有增工薪应立即增加等情。

（批）准由各该处择优呈请酌加，限期开单具报。

（三）据短牌工人称，凡作工二年者，均应改为长牌等情。

（批）准择优到期改补。

（四）据称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作工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等情。

（批）交机务处查明宣布。

（五）此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开赴前敌者，倍受辛苦，出入枪林弹雨中，性命几不保，应每人增薪一级等情。

（批）已屡催机务处开单候奖。

（六）北京，玻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处，应由当局盖立官房，以便行车工人休息，以免流离失所之病等情。

（批）已由工务处筹办。

（七）长辛店工人甚多，几无宿地，铁路当局应该盖设官房，以便工人住宿等情。

（批）准愿筑休息官房，俟本路财力宽裕，再筑住房。

(八) 凡工人因工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等情。

(批) 此系本局定章，向无扣薪之事。

各工人等应限令即日恢复原状，此喻。

又前晚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曾派总段长及警务处长往长辛店晤会工团，磋商解决办法。工人方面，仍坚持所提条件八项，警务处长及总段长以工人所提条件，其第一项与路局行政权上不免冲突，未敢遽然承认，遂回局报告赵氏。昨日上午工人方面复派代表数人，到管理局谒见赵氏，陈述工人方面所提案要求之理由。赵氏当极力安慰，允为设法。谓只须工人方面能停止罢工，恢复工作原状，所提各节，均能一一酌量容纳，希各代表回见工人，剴切劝导，不必趋于极端，以免公家工人两方互蒙不利影响等语，各代表遂辞赵回长辛店，据闻昨晚又续有工人代表四人到京，言该代表五十余人返后，宣示工友，均表满意，则此次风潮已告结束，但此说未知确否。

又闻昨日某税关监督向高恩洪进言，拟对为首罢工工人加以严厉取缔，以儆效尤。高氏深然其说，现正预备最后对付之方法云。

(1922年8月26日《晨报》)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给各职工会的感谢信

职工会列列工友钧鉴：

我们罢工风潮已解决了，已于26日照常工作了。我们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24和25两天——可是经过的困苦却不少了！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预料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可笑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我们知道你们很挂念着，所以特地将

这个喜信报告于你们，一方面还要特地感谢你们！你们这种互助精神，我们真是刻骨铭腑呵！此后，还望彼此努力，同奏凯旋之歌！

敬祝劳动者胜利！顺祝
工友们康健！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印章）

8月27日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矣

京奉路山海关工人酝酿罢工之详情，已志本报。顷该工人等已发出宣言书，原文照录如下。

工友们！同胞们！我们山海关工人受工头赵璧，及其党徒陈宏经等之虐待，和生活艰难，年长日久了。于今赵贼虽去，而其党陈贼仍留，千方设计，图谋破坏工人俱乐部并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景树庭二工友，我们曾向路局提出要求条件，已宣言过了。

工友们，同胞们，京奉路局曾于8月30日并未向工人俱乐部磋商，单方用上谕式批复，对于驱逐陈宏经及佟景二工友复职，毫未提及，其他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亦未允许十分之一，工人等忍不能忍，全体议决于本日（10月4日）以最后手段——罢工——对待。工友们！祈本“阶级的利益”，“奋斗的精神”与以“实力援助”。同胞们，请依“平等的原则”，“互助的友谊”表以“热烈的同情”。工友们！同胞，我们已开到前线放火了，祈起来努力助战啊，无产阶级的胜利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幸福从此传来了。

要求条件六则。

（一）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凡工人一律加薪，按15元

以下者加三成，15元以上者加二成，50元以上加一成。（四）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金。（六）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2）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晨报》1922年10月7日）

山海关路工风潮已解决

山海关京奉路罢工风潮因当局之无诚意，以致延长至今，后当局见工人方面，团结坚固，万众一心，恐唐山工人牵入漩涡，遂于12日承认工人要求条件之大部分，经该路局长明白批示，工人方面亦颇为满足，故于13日已宣言全体上工矣。兹录京奉路当局已允准工人之条件如下。（一）陈宏经立时革除，佟惠庭，景树庭2人复职，并将佟景二人停工期间的工资完全发给。（二）大礼拜及放假日，均发给工资。（三）普遍的增加工资。（四）每年增加工资一次。（五）每年有两星期例假，每三年有两月例假，假中均发薪。（六）病假有医生证书者，第一月发全薪，第二第三个月发半薪，以后停给。（七）工人家眷来往车费完全免费。

（八）承认本俱乐部为正当团体。（九）罢工期间的工资完全发给。（十）上工后本俱乐部职员或部员，不得无故开除。又工人曾发有宣言书，词长从略。

（《晨报》1922年10月16日）

唐山路工提出五项要求

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全体工人，因物价昂贵，生活困难，特于14日呈该路事务处，提出五项要求，限三日内答复。一面并发出宣言，请求各地工人援助，其宣言如下。

我们在黑暗地獄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个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呻吟憔悴，限于求生不能，求死不甘的状态。我们心酸泪落，怀著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所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列后），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素仰贵处工友热心，敢为我们工人阶级争利益，祈本互助之谊，与以实力援助，则我们感激到万分了。今将所提条件五则列后：

（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15元以下者加三成，15元以上者加二成。50元以上者加一成。

（三）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

（四）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三年须有二月例假。（2）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病假须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晨报》1922年9月16日）

唐山制造厂工人实行罢工

唐山制造厂工人受各处工人罢工之影响，曾于上月向该厂当局提出要求六条，限时答复，业志报端。兹闻该厂当局与京奉局长接洽后，除工人所要求之“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及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之损失应照车房例同样发给恤金”二条外，余已分别办理，惟工人方面认为不满，因于前日复提要求六条，限路局于10月12日以前答复，否则罢工。其要求之六条如下，（一）铁路当局应承认职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限。（二）以后厂中雇用

和开除工人，须经过职工委员会通过。（三）铁路当局应在适当地点建筑工人住房屋和工人俱乐部，并须设备自来水电灯。

（四）工人因公受伤或年老不能工作时须养其终身，并照常发给薪金。工人死亡，工作一年须给两月工资恤金，工作二年给发四个月，余此类推。（五）罢工时间工资须照常发给。（六）消灭旧包工制度。及至12日路局无答复，该工人等乃于13日晨七时许相率罢工出厂，其时厂中员司尚未进厂，工人即将全厂入门处派人把守，并组织纠察队1000余人，维持秩序，及组织调查队，探访各机关消息，故秩序尚无纷乱状态。闻路局方面闻讯后，即于14日派警务处长吴某前往调查，至今尚未接洽就绪云。

（《晨报》1922年10月17日）

唐山罢工风潮平息

唐山铁路工人罢工风潮发生后，天津方面，曾派警300名前往弹压，同时滦州彭寿莘所部亦派兵一营赶往唐山制止，然迄无解决办法。最后由唐山警察局姚桐章，暨该路总稽查彭寿华等，极力与工人磋议，遂商定互相让步之办法九项，请双方签字。于昨日（21）始已一律照常工作。其办法如下：（一）罗代表在津急速放归。（二）工人年龄加薪，应准一律加薪，惟在年龄21岁以上，以3角6分为标准，学徒以2角5分为最低。（三）每年两星期例假照给工资一节，用记假办法，应给两星期之薪工，年终发给。（四）特别加薪，另案办理，如十余年未加薪者，应普遍加薪等，斟酌办理在案。（五）建筑俱乐部，须俟本路财政充裕，或由该工匠等自行成立，路局酌量补助之。（六）旧包工制度不善，要求照前薛总管课工包工办法，查明核办，候商同外人缓为筹办。（七）裁减人员，并无事实，如无过失，当然不得借故开除。（八）罢工薪水一律照给，但须承认开工。（九）开工期限，定于即日照常开工，先放自来水电灯，至迟不得过晚五点钟云。

（《晨报》1922年10月23日）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

工友们同胞们呀，我们工人一身一世，如牛马一样的劳苦工作，自己所作的，自己完全享不着，这已经是够不平了啦，现在我们虽然那样的拚死作工，竟落得自己一饱一暖，都享不着，天下岂有这种道理。我们铁路上的工人，尤其是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一身如机器一样的跟着火车奔走，不论怎样的烈风暴雨，怎样的酷寒炎暑，片论日夜，火车转一下我们也得转一下，火车跑，我们而得跟着跑，什么节日啊，什么礼拜日啊，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事。这也罢了，但终久也总得使我们吃几顿饱饭，穿几件暖衣，并且使我们家中老的小的得以安然养活罢，——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有许多自从火车头一天在京绥铁路上跑起，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至少的也跟着跑了五六年，计看这二十年来社会上的生活程度，增高了若干倍，京绥路线又延长了多少里，大人先生们的官俸又增加多少了，这些事谁都知道，独单单我们工人籍以养身养家的一点苦工资，至今却没有加多分文。工友们，同胞们，这是一回什么事。我们工人现在就是想拚命作工，也快要无命可拚了，我们就是怎样的想恶衣槽食，以维持这机械似的身体，现在也维持不下去了。加以我们家中待着的老小，不住的在后面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这叫我们工人如何办呀。我们车务工人在万不得已之中，上次也曾呈请本路局要求加点工资，以维持我们的生活，不料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了，上面不但没有半个字批示给我们，反出一些通告，说什么我们铁路上几年亏了啦，希望本路职工人员安心服务，维持这条铁路——种种的话。哈哈他们积聚我们工人一些血汗，造成他们的快乐还不够，另外还想一些好听的话来哄骗我们。即使是真的，铁路上亏了，难道这是我们工人没有尽义务，或者把国家的钱，抢到荷包里去修洋房，讨小老婆去了，致铁路亏的吗？铁路上亏了，要我们工人补偿，来作要求加薪的抵制，这简直是要我们作了工，还

是要我们的命啊！这是何等蔑视工人、欺骗工人，我们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然而我们前天还是以诚恳的态度，向着当局作最后最低的条件请求，不料当局仍是一味的哄弄，还加着威吓，毫无顾及我们利害的意思。我们现在实在无法了，惟有出我们所不愿意作的最后行动，暂行罢工，静待解决。工友们，同胞们，与我们以实力的同情援助呀。

还有我们应当郑重申明的，就是我们这次罢工，系因被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出此，完全是自己自决的，决没有受何党何系之指使，务要请大家谅解我们这一点。特此宣言，布告全国。并附录要求条件如左。

（一）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

（甲）工人月薪，无论多少，一律加增2元。

（乙）工人跑车饭费，一律加至3角。

（丙）每年加薪一次，至路局工人薪资表最高资额为止，但遇社会生活程度超过此项高资额时，须重新定薪资表。

（二）每逢礼拜日节日，路局官假，及工人应休息之假日中作工者应给双薪。

（三）工人因病身故者，给全薪一年于其亲属；因公遇险身故者，给全薪二年；如系积劳或因公致病告假者，其假期不论长短，均不得扣薪。

（四）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在官假中曾作工作者，请照局电，一律补给双薪一月。

（五）承认现在之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

（六）局中因故开除工人，须先期以充分理由通知车务工人同人会，俾有辩护余地。

（七）工人亦须一律发给与本路下级员司同样之制服（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

（192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

有关京绥路罢工专电（二则）

专电：京绥全路工人因交部欠工不给上呈，质问不答，不得已于今早（27日）起全体罢工，京至绥完全停止开车。

又电：密讯。京绥路工潮与高恩洪借1500万镑款，有特殊关系。

（1922年10月28日天津《大公报》）

专电：京绥路罢工，因要求七条件，当局不允，故誓死不肯开工。今日（28）该路机务、车务、警务三处全体加入罢工，形势扩大。

北京电话：高恩洪知高压手段不能制止工潮，因将京绥路工要求完全允准，昨晚之京绥车已开行。

载（192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

京绥局罢工风潮已告结束

京绥局罢工风潮，自部派人查办，陈世华始引咎辞职，现交通部已令派沈琪兼领局长，罢工人员驱逐陈李业经完全达到目的，故即由总代表林竞通电，及全体罢工人员宣告恢复原状。兹将其通电及宣告照登于下。

（一）通电。各处课段站厂院所公鉴，12月17日本局奉交通部令开派技监沈琪兼领京绥铁路管理局局长，此令。又令开据陈局长世华因病电呈辞职应即照准，所有局务仰由新任沈局长琪督余各该处长转饬各该管员司即日照常办事，恢复原状，毋违。切切此令。等因奉此。查同人驱逐路贼陈李，业已达到目的，所有机车工电各部分公务，一律完全克日恢复原状，此次能得胜利，端赖内外一致。人心不死，公理难逃，谨为我本路同人三呼万岁，总代表林竞叩。

（二）宣言。由陈李祸路以来，同人含愤忍痛，祸机四伏，

早知必有爆发之虞，顾犹苦口进言，冀其悔悟。不谓贪狠之性，习于天成，失节之妇，难言洁贞，忍隐至今，事非得已。此次事虽起于停发薪工，而实际在陈李之破坏路务，不然谁无身家，罔计利害，卵石之喻宁有不知。特以大义所关，难安缄默，是故风声所播，内而员司工役，外则各界同胞，无不一致赞同，共起援助。今者陈李去矣，原状已复。至于违法之约，如何废除，贪赃之罪，如何惩办，残破之局，如何收拾，负责有人，新任将到。同人等既抱牺牲保路于先，今又不能顾堕破甑于后。苦衷惟冀共谅，愆尤尚篆玉中，谨于12月18日一致恢复原状，听候长官办理，特此宣言云。

载（《晨报》1921年12月19日）

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始末记

唐山通信员 佩 寰

唐山开滦五矿系马家沟，赵各庄，开平，林西，唐山五处煤矿。此次唐山京奉路制造厂罢工而得胜，工人乃自思动。加以外人有种种虐待行为，对于工人生命，更无以保护，——外工每死一名与以大洋30元之恤金。每年平均计算，绞车轧死者在400名以上。——9月初旬工人组织团体，未几，开平，林西，马家沟及赵各庄亦先后成立，而秦皇岛则最早告成。均称为某处矿工俱乐部，而以唐山矿工俱乐部为总部，名曰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矿工俱乐部对比国总矿师杜克尔提出6项要求之条件，其6条如下（一）加薪分为三等，15元以下加三成，15元以上加二成，50元以上加一成。（二）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之例，给回一月偿金。（三）工人每星期日及年节假停工，应援庚子年前之例给回工资。（四）工人煤条和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发给——每月工资12元以下者应受偿给煤条。（五）凡工人在局有过25年者，因年老不能工作时，须照原薪发给养老金，养其终身；若无大过，不得籍端取消。（六）工人因公受伤应给回工资，受伤至重，终

身不能工作时，应给回原薪养其终身；倘因公致命者，须一次发给5年恤金，按原薪给算。矿师以赴天津总公司相商为名，返时带来保安队200余名，平日五矿均用保安队监督工人工作——只许30元以下加一成，群情愤激。10月22日晚，五矿代表开联席会议于林西，议商对付办法，而总矿师闻之，乃令保安队捕去代表6人。代表等乃议决次日罢工。由林西派出代表至四矿及秦皇岛，复由各代表于夜中分头布告工人。林西代表至唐山时已晚九时矣。复由各代表分头出觅工人报告一切，工人更为愤激。次日工人群赴工厂，即日实行罢工，时矿师已得林西罢工电话，乃令保安队分守厂门，许进弗许出。然工人举行在先，保安队亦无可如何矣。林西为五矿汲水及绞车总机关，又为唐山全街电灯之总电门，未及关闭，而保安队早已看守甚为严密。工人虽欲有所举动，势不能矣。工人已罢工由各团体及下窑工人组织10人团，每团各举团长；由团长举出纠察队2000余人，以防资本家收买工人而为扰乱之事。同日并发出宣言以告国人。议定在粥厂每日开全体大会一次，籍以传达消息。粥厂之设，乃为外工，盖下窑工人甚为贫苦，每日只可得个其人每日之食费而已，至于衣住等费，极为困难，如果无粥厂之设，则必即时流为乞丐。平日不识者若见此等工人，则必然之曰乞丐团。

11月24日上午九点余，工人正在粥厂开全体大会。保安队队长刘某带领保安队30余名，包围粥厂之外，作预备放式。刘某问工人因何罢工。工人以其无理，质问之甚苦：谓不宜作如斯行动；若作如斯行动，则我等亦无与你谈话之必要。刘不得要领，听工人在场演说。工人每日大会有演说员，开会时由其专作报告事宜，演说员谓“我们工人是中国人；他们保安队也是中国人。他们这样是要与我们打仗，但是我们因为他们人太少，所以不与他们打仗。他们若想打仗还得多来些个。”众鼓掌。刘见情形不佳，乃谓众曰“代表安在”。众答“全在场中”发声甚高，群情愤激，均对刘表示不满意。刘不得已遂去。工人继续开会。

25日九钟余又开会。刘又至，欲觅捕代表并谓我绝不对于资本家有所偏袒云云。乃又由工人代表发誓谓“我们工人为生活困难而罢工，本来是正当行为；你先生既来说这些话即请回去先把我们生活费用提高，而后再来罢。”刘见机而去。工人每于散会之后，必赴俱乐部一看。俱乐部墙高数丈，满贴有各处捐款之收条；中坐有三五代表指挥各工人，若军中之司令部然。

26日有少数司员及工友（系被保安队扣留于厂中者）不得出，亦无食又不得住所，甚为困苦。同日纠察队在厂门游行，而保安队出面干涉。工人不平亦不服其干涉，两相冲突。保安队遂先发枪伤工人，工人以保安队平日待工人本甚苟，今又开枪，群起反抗，棍棒齐下。一时商铺关闭，行人断绝。枪声，叫喊声，马蹄声，棍棒声，和成一处，演奉直战争以后未有之音乐。时工人在粥厂开会者有之，在俱乐部者有之，闻枪声至，枪愈响而工人愈多，大有直军攻击奉军之概。保安队见景况不妙，遂止枪，工人执旗以攻之——旗上书曰“唐山五矿工人俱乐部”。进数十步而保安队则持枪守于门及临近之警察署，相持约有三小时之久，遂止攻而各散。计伤警察2名，工人7名，小卖1名。兹将7人录之于后：

郑芝刚 18岁 霸县人。在草厂作工，肚子左边受枪，伤甚重。

张庆祥 22岁 胥各庄人，井下拉马，左腰受枪伤。

孙发顺 31岁 小集镇人 在三包锅火作外工，右肚受伤。

马世春 37岁 翼州人 在刘宝贤锅火作工，小肚受枪伤。

刘 佐 19岁 唐山人 在监工处，肺受重伤。

毕鹤亭 24岁 山西刘家庄人 在五道行拉马，双腿受伤（穿过）。

韩秋成 25岁，保定曲阳人。在三包锅火作外工，左肚受伤。

以上7人除刘佐未愈，今尚不能出院，肺已割去少半，据医

生云，恐不能愈，愈亦成为废人矣！余均出院。

29日天津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杨以德来到唐山。马家沟在此时尚未罢工，其总警刘某来唐山接杨。工人见机遂罢工，并有工人谓“我们今日罢工系对杨以德来唐山之表示”。五处遂均罢工矣。

开平，赵各庄及秦皇岛之罢工也，始于唐山罢工之次日。秦皇岛为五矿煤炭出口之咽喉。其团体甚为坚固，预备亦极严密，俱乐部终日令数十人看守，夜则看守者站立于房上——其团体之基础在五矿以上。

12月2日杨以德赴大会演说谓：“你们工人不知矿局种种优待之处，乃妄举罢工。不但矿局对你们不错，是你们的衣食恩人，就是我姓杨的，今日对太阳说话，也是对你们很好。道路我走不着，我可在唐山大街出钱修道。你们看我姓杨的不好，我可作了十几年的官了，要是不好，早就不能干了。你们看这些保安队都有枪，你们是徒手空拳，要说打战，打死你们白打，你们还不赶快去上工。若再不上工，我就要用压制手段，到那时候，你们后悔也晚了。”大家听罢，无言而散，旁有保安队千余人，其队长令大家举手表示赞成，但无有应者。杨与保安队遂均去。工人以政府压迫太甚，乃上国会请愿书——为提出弹劾案事。3日比国矿师请本地绅商及军警各界，交通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行长，商会会长，股本决，杨以德，警察厅厅长姚章彤在辛园设席。首由矿师发表意见，谓“我们股东会已开过会了，议决30元以下加一成！其余不准其要求。因为若此次允许，则每年当必有罢工之事发生，势必至矿局停办而后已。与其将来因损失而停办不如现下即时停办还较省事。”除商会会长，交行行长及股本决之外，均鼓掌赞成。后由杨以德发言谓“矿师所言非常之对。因为今年允许他们六条，明年他们就要提出十二条来了。要是老允许他们，那还得了。罢工的事情，全是由工会发生出来的，若是将工会的办事人枪毙10个20个，则罢工的事，立刻可以断绝。我的

意思——今天在此发表出来，与其中国亡了，也不让工会成立。”除前述3人外，众又鼓掌。殷本决听毕，将手枪取出说：“二位说话，非常的对。但是如果有害我良民者，我必以此当胡匪办了他。”说完欲出，由矿师劝止。后杨表示道歉，事遂止。由德国矿师某传出消息谓“中国官有叫杨梆子者，受矿局钱甚多。所以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可证明杨之言语确是表示为金钱尽责任。

同日张参谋召集五矿及秦皇岛代表，谓将开谈判，代表8人与保安队同至张参谋处一室内。保安队长谓保安队曰“带此8人走，即时枪毙。我已得有长官命令。”将出，张参谋至，命之返。谓工人说：“杨处长想枪毙你们，我来保护你们。你们可速回去，令彼等上工。”工人代表谓“上工并非我们可以办到，今因张参谋来我等未死，甚为感谢。如果一死我们为公办事，只可说是命短。与罢工的事，也没什么关系。”张无奈，乃令之返。

4日下午八钟余，保安队将唐山五矿工人俱乐部占据。时代表会议将散，俱乐部工人甚少，不能作抗。次日早七点又将京奉路职工总会封闭，谓其为罢工机关。并将唐山工人图书馆——系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唐山矿局及启新洋灰公司三厂工人合办——工人黎和捕去，认为过激派；黎不过受工人之指示写几个骂杨以德的传单而已。同时洋灰公司工人俱乐会亦被封，并失去洋600元——现该项款已由警察署交于该公司总理李希明，而李并无意将该款交回工人，不知作了什么用了。

至6日有张参谋之弁兵，遍觅工人各代表而不得，作调人亦弗可。盖因俱乐部被封工人代表均开秘密会议，真有发号施令而无人知其出自何地者。至九号始觅得一代表。告以张参谋欲为调和，代表以俱乐部被封，若不让出则条件无从商议而谢绝之。故10日由张参谋代借山东会馆以为开会之地点——有主张不受者。调人仍提30元加一成一条可以允许。和议弗成，而山东会馆又不准开会矣。

11日俱乐部会长只某出席大会，被少数工人及赵各庄代表

——资本家买出者围住；有令其赔偿罢工期内之损失者，有令其将所谓捐之款按人均分者，时俱乐部为唤起精神，乃大书曰某处捐10万元，某处捐200元，实则伪也——时并由工贼报告警察局，警察来捕只某。既去不数步而工人齐至，将某署长枪棒打下夺回只某，警兵见势不佳，遂各散去。次日又有代表派人捕去，亦皆由工人夺回，然被捕去已为21人矣。工人仍每日开大会一次，声势甚壮。

12日董政国(十七混成旅旅长)出示略谓，“胥各庄及稻地镇皆为训练兵士之要地，工人不许在此二处30里以内开露天大会”。唐山就在此二处30里以内也，工人闻之无不怒视而去。但斯时警军来唐者，亦有六七千人矣。先是杨以德见各报纸主持公道，反对之甚力，乃返津。对各报宣言，罢工之事，困体不良，无理要求。并谓警务处一时乏款，有自矿局暂借情事，然则是不但承认是警务处与矿局有密切之关系，即受贿一层亦成为疑问。但各报不为工人之助矣。

13日由杨及董出示限3日上工，百元以上加一成，被捕工人上工后释放。工人见之仍不理，但薪大之司员头目，遂为上工运动，16日期已满，但马家沟、林西已开工。乃由住唐比国教师筛司锋及张参谋出为调人，将风潮解决，惟六条日后均须有其一部分实行由牧师作保人，工人以外人信用在其中，亦颇欲结束，遂于17日由总矿师欢迎工人上工，而37000人之绝大风潮，遂皆了结。

15日，唐山一代表误与一工人败类相见。该工人告以6条均经矿师允许，可速返上工。代表信之而返。买鞭炮甚多。遂于16日开工。既上工知为误，欲再举不能矣。计此次罢工有三：

(一) 远因

(1)精神上之虐待，平日外人视下窑工人如马牛，工人因工作致命者只与大洋30元之恤金。又洋灰公司有拧耳之说：工人上工迟则拧耳，令跪而骂之。

(2) 生计上之虐待，每吨煤加价七角，而工资不加。至罢工后煤价又加一成。

(二) 近因

(1) 唐山京奉路制造厂罢工而得胜利。

(2) 禁止工人组织团体（于未罢工时捕去工人6名）。

(3) 武力压迫（保安队于未罢工前，来唐山表示淫威）。

(三) 未能得完全胜利之原因

(1) 电门未关闭。

(2) 日期过长（罢工延长至24日之久）。

(3) 天气过冷（下窑工人衣食不足，井上不如井下暖）。

(4) 经济不足（下窑工人非粥厂不能生活）。

(5) 压迫力过大（除工人弹性之外）。

（《晨报》1922年12月31日）

北京各团体援助开滦工人罢工情况

自唐山矿工被该地军队惨杀消息传出后，北京各界人士对之颇为感动。兹闻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于昨日常会时，主席提议捐款援助，当即有新自唐山归来之某君报告枪杀工人的详细情形，大意与京内报载情形相同。惟矿井内部现尚有极少数（每井五六人）车水工人，被兵士强迫作工，终日不准出井口一步。矿内拉煤车骡马因罢工无人照管，死尸枕藉，为状甚惨。至于罢工人数实达37000，情形极危者为千余包工工人。盖彼辈纯系包工营生，计日而食，毫无积蓄故也。据闻矿局对于此次工潮，处心积虑，欲以极残忍之饿毙手段对付，一面虐杀工人以寒其胆；一面迁延时日以待其自毙。在彼等推测以为工人决不能支持五日之久，故态度极为镇静。工人方面则以屯储之煤，转瞬告罄，如再坚持数日，京津铁路工厂将大受影响，而煤矿本身亦将蒙极大损失，于是四处劝捐，决为最后之奋斗。结果当地铁路职工会既捐千八百元。山海关团体亦助巨款。上海各工团，广州海员会，汉

口工团联合会，郑州铁路总工会，萍乡矿工工会均于日前来电赞助。工人等遂分途劝募，不日巨款毕集，将更有一种新发展云。报告毕，即讨论进行办法，决议下列各项：（一）成立募捐队十队，分途向各界劝募；（二）宣传英人残酷行为，唤起国人注意；（三）募款队每日出发劝捐；（四）结合各团体成立唐山矿工罢工后援会。今日西城南城一带均有该游行队踪迹。后援会即于日内开成立大会。

（《新民意报》1922年10月27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支援开滦工人罢工的启事^①

现在唐山有3万被生活压迫的工人罢工。他们的矿主（外国人）用高压手段压迫他们，请杨以德派五营以上的武装警察打他们，杀他们。同胞啊！中国没有亡，这3万苦同胞已被外国资本家压迫死了。同胞们！快起来援助你们兄弟啊！赶快捐资援助吧！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晨报）1922年10月31日

开滦五矿大罢工

邓中夏

开滦矿工的生活状况

开滦五矿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加以叙述。

……

开滦系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而成，全年约产煤四百余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20%。矿工共约5万人。

^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2年11月20日就开滦矿工罢工一事，又发出一则启事登载于《北京大学月刊》上。参见本部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节。

矿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时间虽名为8小时，实则11小时，因为工人必须连作两班，方能维持生活。甚至有这样的情形，矿工在井下工作有继续一星期不出的。中国矿山大抵都采用包工制，开滦当然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因此，工人虽卖劳力，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工头之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2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20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1角可换20枚至30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再则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1元以上只给1元，其尾数被扣去，如不上1元者则仅以上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有。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往往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输光在赌博场上。不赌又不行，因为包工头可以借故开除不赌的工人工作。包工头经常借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恤金20元，但死马一匹须损失60元，所以该矿有“人命一条不如一马”之谓。其他凌辱打骂，更是不用说了。

罢工的爆发

开滦矿工以前亦曾因不堪其苦发生过小小斗争，但都是旋起旋灭。1922年的罢工高潮，必然激荡了开滦矿工，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为他们所目见的事，于是引起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罢工。

10月16日，矿工联名向矿局提出要求。其重要条件如下：

（一）工人每月工资在15元以下的加30%，在15元以上的加20%，在50元以上的加10%。

（二）每年年底每一工人应得一个月花红。

（三）工人服务满25年的应另加一个月花红。

（四）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贴津贴。

(五) 工人在受雇期内死亡，应由局中给以五年工资之
恤金。

条件提出后，矿局拒绝，工人大愤，于是召集大会，继续提出两条：

(一) 工人现时正在组织俱乐部，应由矿局承认。

(二) 非经俱乐部赞同，矿局不得开除工人。

这样的形势愈趋严重，矿局为缓兵计，于20日宣布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30元以下的增10%。工人不满意，于23日着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26日马家沟亦罢工。整个开滦煤矿都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开前所未有的创举。

矿局门首的喋血

罢工开始时，矿工声势甚壮，当组织纠察队，巡逻要地，维持秩序，并监督破坏者之私自复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个特派员在此指挥，唐山铁路、纱厂、洋灰工人皆起而援助，交通大学学生亦罢课上街募捐。

矿局方面，除有英国兵舰调集印度兵到唐山镇压外，并有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由天津调派保安队驰赴唐山，于是宣布戒严，如临大敌。25日，工人聚集矿局门首示威，高呼“打倒资本主义”、“要求经济解放”。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数人，伤50人。登时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铁路、纱厂、洋灰各工会也同时被封，并严厉禁止工人开会。开始逮捕罢工工人领袖，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牺牲）同志亦被捕。

罢工工人的坚持

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于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书记部当时有一错误，即未多派得力同志前往，固然当时因各地罢工纷起，到处需人，应付实感困难，但无论如何开滦罢工关系至巨，就有如何困难，亦应多派得

方同志前往才对。自罢工总领袖潜逃后，书记部特派员大感困难，重新提拔新领袖，一时又来不及，但领袖虽失，工人群众却非常坚持，他们并不因喋血而气馁，只看当时竟无一人私自复工，便可证明。

最后的失败

开滦罢工事前毫无准备，事起仓卒，罢工经费当然没有。书记部在北京方面借款，一时不能到手。罢工人数又多，每人发1角，每日便须5000元。罢工工人忍饥受饿，一直坚持到20日之久，最后由当地军队师长和滦州县知事出面调停，其结果如下：

(一) 工人每月工资在15元以下者加10%。

(二) 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

(三) 工人在罢工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这个调解条件当然与罢工工人原来要求条件相去太远，但罢工旷日持久，的确工人再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于11月16日方始忍痛逐渐复工。

书记部对于此次罢工的确异常重视，曾召集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会议，拟以全国铁路总罢工为开滦声援，但等到代表到京，开滦已最后失败，来不及了。

这次罢工的教训

这次罢工的失败，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主观上的错误，举其大者如下：

(一) 准备太不充分：这次罢工是被当时罢工高潮所刺激，工人们迫不及待而宣布罢工的，因此，一切最低限度的必需条件，都未准备，如工会就是在罢工前数日才组织的，关于罢工经费，事前更是作梦也想不到。

(二) 组织太糟糕：领导机关只有一个上层组织。开滦五矿范围数百里，岂是一个机关所能指挥！最低限度至少每

矿须有一个指挥的机关，那时没有，其他可知了。

(三) 领袖非人：其时罢工总领袖本一投机分子，未有任何斗争经验，我们当时未能于广大群众中选拔多数积极的骨干分子，以致领袖一跑，便难于为济。

(四) 罢工经费不足：矿工生活既苦，那有积蓄，罢工下来，如无金钱接济，便只有挨饿。这一点是对于矿工罢工更要留意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正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太原函云，正太铁路工人，迩来鉴于各路工潮之勃兴，曾于数月以前，组织全体工会。该会自成立后，精神颇为团聚，全路路工均行加入。据云，该会前月曾向路局申述彼等要求改良待遇之意，提出九条件，要求路局履行。旷日持久，尚未得复。工人至此，深知非和平手段，所能奏效，遂于14日决议，即行总罢工，以示决心。现已发出正式罢工宣言，并要求条件。其条件如左：

(一) 加薪分三等：(甲) 现得薪金15元以下者，加日薪2角。(乙) 15元以上至30元者，加日薪1角5分。(丙) 30元以上者，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 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

(三) 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容纳工会之所介绍者。

(四) 凡车务处工人以及夜间守厂与屋外操作工人，均应由路局每年发给羊皮袄一件。

(五) 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照员司成例，并每年给20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 路局每月须辅助工会所办之每一工人学校200元。开办费由路局全给。

(七) 工作时间，不得过 8 小时，否则，照所增之时间增薪。

(八) 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至死后三年为止，除由路局给予 300 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 30 年。又在路局服务，满 25 年，或 15 年，而年逾 55 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三年为止。

(九) 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免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免费通票三次。

(《晨报》1922年12月16日)

正太路工人态度强硬

正太铁路工人罢工风潮，业志前报。顷闻，该工人等因该局对于彼等所提出之九条要求，毫不采纳，以致工人实行罢工。罢工之后工人为维持秩序并坚持与路局对抗起见，特组织调查队和纠察队，不许私自上工与路局勾通，不许轨外行动或自己互相争斗。虽军警监视他们极严，然亦无可如何。路局近因无法对付，非常惶恐，故托太原各报馆，警局，商会，矿务局等，竭力调停。而山西督军阎锡山亦欲派代表往石家庄，设法疏通。惟该工人等，因既已罢工，不能开车，故已去电谢绝。且于 17 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除前所要求之九条外，又提出要求五条。其宣言如下：

我们牛马样的终身劳苦工作，还不能赚到自己最低的生活费用，养家更难说了。而且我们正太铁路工人，处在洋资本势力之下，所受敲剥特重。因此我们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命起见，于数月前曾向路局提出改良生活条件九条，不意当局置之不理，不得已乃于本月 15 号罢工。这些情形，已于每一次宣言上说过，倘若要我们开工，须得铁路当局正式批

准前所要求的九条件（该九条原文，已详第一次宣言），还要批准左列的五项新要求：

（一）路局应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全路工友之权。

（二）罢工期间不得扣薪。

（三）不得因罢工而借端开除工人，以后路局处罚工人，亦须先得工会同意。

（四）本会会员有因小故而被革除者，应即复职。

（五）短工均改长工。以后新上短工，满一年后，亦须改为长工。

这些新旧条件，共计十四条，倘铁路当局不予我们以满意答复，我们决不上工，谨此宣言，以告全国。

（《晨报》1922年12月20日）

正太路工人大胜利

正太路全体罢工风潮，经各界调人竭力疏通，延宕逾十日。于26日，一切条件，始为双方承认。当晚即有一部分工人入厂开工，次早全路通率。局外多不明真象，兹详述之。起初工人要求之条件，前后共十四条，经地方绅商一再向洋人方面，苦口疏解，大多数承认。所差者只加薪之多寡，及用人之权。洋人准工人介绍工人，亦非绝对的把持权限，因工人中有代表一二人，要求洋人完全交出，致互相坚持，调停束手。未几，交部委员李大绶、曹使委员冯团长宋营长，及北京直隶国会议员代表王秉璋，齐集石家庄，偕同路局姜局长，商会姚会长，及绅商各界，各方磋议疏解办法。往复再三，遂将工人已获之利益，遍告工界，工人等亦十分满意。首由工会组长（每百人为一组）十余人，拥到工会，求各代表一同向调人道谢。次由路局印业已允许条件之传单数千份，散遍街衢。又推举代表面见商会姚会长，请其转向洋人要求，将条件签字。姚立约原调人等，偕工会代表同赴路局，面

见华洋局长，将要求之十四条件，逐项说明。由三方面分别签字，约定即日开工，此项风潮，至此告一段落云。兹将正太路局最后允许工人各条件宣布如左。计开，（一）加薪，除十一分已加一成不计外，凡工人薪金在15元以下者，一律月加3元，16元至30元者，一律月加2元5角，30元以上者，一律月加2元。（二）以后加薪办法，照京汉路新章程办理。（三）雇用工人，工人代表可以向路局介绍。（四）本路所有打旗挂钩下夜护勇查道护勇，各给皮袄一件，每隔二年一换。（五）放假，本路放假日期，一律给薪，放假期内作工者准给双薪。（六）工人子弟学校，照京汉京奉各路，呈由交通部办理。（七）做工钟点，照京汉长辛店钟点。（八）因公受伤，所有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医治期内概不扣薪。因公受伤立时毙命者，路局给予一年薪资。（九）工人免票，每年准给三次。（十）罢工期间，不应给薪，兹为体恤起见，准给7天薪资。（十一）罢工工人，本路不因罢工开除工人，准一律上工。（十二）已革工人复职，毋庸议。（十三）短工改为长工，凡短工到工满一年者，路局准其改为长工。（十四）加点，打旗挂钩照司机升火一律加点。

（《晨报》1922年12月29日）

4. 二七大罢工

京汉路总工会今日成立

河南通讯员 禾 甘

京汉全路工人这两年来来的工会组织，总算已经逐渐结实了。经过四个月的切实筹备，才能够把这两千多里纵贯南北的一条大干线，联到一个目标之下，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产业组合，预备来解决这大崩溃后的建设问题。京汉铁路总工会预备于2月1日在他们的总工会地方（郑州）开成立大会。这种声浪，已经宣传好久了。全国各路和各业的工团，届时都要到郑来参与这个大会，

不料好事多磨，近闻郑州地方警官，已奉到河南张福来命令，将以武力禁止开会，压迫工人。并有靳云鹗等所部军队，亦将施行压迫消息。果如所闻，则2月1日，郑州必有若干之冲突也。据调查所得，工人方面，团体异常坚固。且多以集会为人民应享之权利，若当局果加以压迫，则誓以最严厉之手段对付。今日（30日）距会期虽仅2日，然前途吉凶，固难逆料也。十二、一、三十。

（《晨报》1923年2月1日）

京汉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路工人突于昨日罢工，因之客货各车已一律停止。各方面对于此事，深滋骇疑。兹闻该路工人此次罢工原因，系因郑州警务局长，以暴力干涉工人集会。盖年来铁路工会运动，以京汉情为最佳，沿路22站均已分会林立，故3月以前，即有总工会筹备处之设。迹来全路进行，更称顺利。除极少数员司从中阻梗外，99%工人俱已加入工会。最近郑州员司所组织之传习所，亦宣告全体加入，其盛况可以想见。此次该总工会于2月1日在郑州开成立会，先期东请全国工会，报界，学界及其他各团体莅会参观，到会者极为踊跃。即就汉口一处，男女学生，新闻记者，律师，工会代表到者百数十人，并有音乐队偕行。他处与会者亦有二三百人，各处来宾及代表分住该埠第一宾馆，五州旅馆，福昌旅馆等处。此时众皆以为诸事均系公开，事前未闻官厅有何干涉，故不虞有他种意外也。开会前一日，各地代表俱已到齐，忽闻吴佩孚自洛阳来电，令靳云鹗以武力制止工人开会，电文内称系据京汉局长赵继贤之报告。工会接电后，如晴天霹雳，莫知所措，当即派代表五人到洛陈诉，冀可挽回。詎交涉数小时，无结果而返。此时该地工人及代表来宾均甚愤激，一致主张照原议开会，虽牺牲亦所不惜。委员遂以此意通告大众。次日下午一时，工人，代表，来宾等相率整队赴旅馆迎接匾额，狂风乍起，尘沙蔽天，彼等不稍畏惧，追随乐队，背负“劳工神圣”，“赤

县神州”……等匾额投奔钱塘里会场（系一戏院）。沿途军警森严，阻不得前。此际工人奋不顾身，破门入戏院，宣布开会。顷之，大队军队复包围戏院，该地警务局长黄殿辰亦到，满院宪兵，警察，侦探，兵士，逡巡逼迫。大会未及开成而散。会既解散，工会复被军警占据。福昌，五州，第一宾馆三处俱已兵士密布，言谈亦不得自由。工人遂秘密聚谈一次，而全道罢工案即于此谈话中决定。闻彼等所提条件甚多，道清，正太，两路亦取一致行动，条件内容虽未尽悉，大意不外争开会之自由，驱逐赵继贤等，并附加改良待遇等款而已。又闻京奉，津浦两路代表俱已回本路活动，京汉总会亦派人四出联络，则以后闹到如何地步，殊难断定。际此年关在迩，旅客如织，深盼当局妥筹善法，早决纠纷，否则日渐滋蔓，殊非社会之福也。

又长辛店消息，京汉北段已于4日上午十一点罢工，有一列车自保府开来行抵辛店，即不能前进。工会现已发表宣言，至于一切条件，则云均由江岸总工会主持，分会概不过问。罢工后车站张贴“敬告旅客”一文，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云云。

又据某方面消息，京绥，陇海，津浦，正太四路，现已议决与京汉路一致行动云云。兹将长辛店工人罢工通电二则，照录如下。

其一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参众两议院，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公私团体，各邦人士钧鉴：顷接本路总工会急电，订于2月4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罢工原因，详急字二号通电），因此本工会遵照总工会命令，届时一律停止工作。此次罢工，完全为争工人自由，并不受任何方面指使及任何党派利用，特此电闻。长辛店

京汉路总工会。2月4日。

其二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议院，保定曹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订于本月4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自由争人格，绝对不受任何党派及任何党人之指使与利用。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受生活困难，上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者，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2月1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之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藉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冯沅，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尽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1月31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2月1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乐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枪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侵犯我们自

由者，黄殿辰赵继贤冯沅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干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解。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晨报》1923年2月5日）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真理报记省北京来信）

中国的工人运动，在经济要求的旗帜下，已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这次要求指的是：承认工会，八小时工作制，并要增加工资等等。但是在京汉铁路的罢工当中，工人们首先感到与敌人斗争的严重性。这次罢工斗争对象是意外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想在离吴佩孚将军驻地洛阳不远的郑州举行庆祝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吴佩孚把铁路工人组织起来的愿望看作是对其军阀统治的严重威胁，认为是来自孙中山方面的密谋。吴佩孚就是这样对工会代表说的。工会代表知道不允许他们开会庆祝，就去找吴佩孚协商，吴佩孚表示他不反对工人成立组织，但是不允许像北京大学那个李教授那样的共产党人来领导。

这样，铁路工人们就看清了，禁止开庆祝会不是简单的警察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镇压工人运动的计划。警察包围了代表的住所，工人代表和铁路工人进行抗议示威也无济于事。于是工人决定进行全线罢工，但是这个决议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让代表回汉口，并作出罢工的决定。那时候也有一部分工人代表希望找吴佩孚和平解决问题，但是毫无结果。最终决定在2月8日举行罢工，实际上2月4日就开始罢工了。尽管吴佩孚从北京和洛阳调集军队，还采取诡计劝说工人，企图破坏罢工队伍，但罢工工人一直是团结一致的。2月6日，湖北铁路工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计有7000多工人参加。中外资本家十分惊慌，他们要求英法巡捕实行紧急状态。这些“外国朋友”

偷偷地和他们的中国同行密谋，决定动手。一方面工人组织了只有大刀武装的共有240人的纠察队，另一方面军阀给士兵们下达了开枪的命令，100个士兵中就有20个人开枪。工人们英勇地进行了反抗，他们打死了1个士兵，打伤了1个，缴械了3个，但是他们仍不得不退却下来。仅这一次就死亡了40名工人，受伤20名。在被捕的工人中有汉口江岸铁路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他被绑在电线杆上，在工人面前被砍了头。到2月8日已经很清楚，工人不能再坚持，罢工要失败，火车司机开始忍痛复工。据说在铁路机修厂当青年工人复工时像死一般的沉寂，不准工人讲话，工人们无言对望，大声痛哭。曾经想号召其他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它包括津浦、京奉、汉阳兵工厂、自来水厂、汉口电厂等。但是这些工人组织得不够好。此外，汉口有许多外国技术人员和司机，他们可以接替罢工的人，这也是促使罢工失败的原因之一。2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生了停止罢工的命令。中国工人在这次斗争中牺牲了近60名同志。他们把2月7日这一天比作是俄国1905年元月9日的行动。

这次罢工结果如何？在这之前北京学生已开始行动，打破了曹錕政府和吴佩孚的平静，铁路工人的罢工，给了他们社会革命的恐怖，于是中国军阀决定要惩戒听布尔什维克话的工人，汉口宣布实行军事状态，国民党在那里出版的《真报》被封闭了。到处通缉工人领袖。2月16日，积极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员、律师施洋被捕，惨遭杀害。他在湖北省工人群众中很有威望，特别是在人力车夫中很有威望。施洋自己在人力车夫中进行的工作，引起了“外国朋友”对他的极大仇恨，因此，这些人迫不及待的要杀害他。在长辛店有十一人被逮捕，其中有一名大学生，至今下落不明，人们认为他也被处死了。在北京，禁止报纸报道有关罢工的一切消息，禁止大学生集会。在上海人们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采取措施，举行全面的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军阀镇压工人组织起来改善自己地位要求的中国统治者。上海政府宣布了军事状态，关

闭了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对工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害怕吴佩孚、曹錕军阀，但又想要京汉铁路工人站在自己的一边。因为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对于他们的内部斗争非常重要。因此，他们计划组织“工援处”，标榜“保卫”工人利益，但所有这些企图都失败了。京汉铁路工人鉴于曾因相信吴佩孚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教训，认识到不应该把政治与经济分开，那种指望有“好”的军阀能够帮助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从现在起，在中国工人群众中，在反对军阀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表示了对吴佩孚的仇视。在2月6日，汉口7000工人群众高呼“打倒军阀”的口号中，可以听到对吴佩孚的声讨。与此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家庭式”的方法调和劳资争端的幻想也破灭了。京汉铁路工人在斗争中已经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保卫工人的利益并善于领导他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在汉口罢工的时候，已经听到工人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中国工人第一次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应该相信，汉口、长辛店大屠杀的教训，奠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基础。

斯列巴克 2月8日于北京

（莫斯科《真理报》，1923年3月21日）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全国工人，农人及一切被压迫的同胞们！

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的被惨杀，想你们都知道了。自此次罢工开始以至现在，敌人方面——军阀及其雇用的政府——利用他们的报纸电报及文告，捏造种种诬蔑及诱惑的事实，不断的来欺骗国民，以冀破坏我罢工工友团结及阻断国人对于罢工的同情援助。我们很相信：在被敌人方面造谣的宣传欺骗下的国人，必然有一个很热心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将这次大屠杀的实际经过作较详细的一篇报告。

京汉铁路工人此次罢工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了争集会结社的自由，就是约法上规定我们人民应享的自由。

近两年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1922年春，全路皆就绪，得16个单位，每站工人过百人者即组织分会，较少者属于附近分会。4月9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8月10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决定总会地点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在成立大会未开以前，由总工会筹备处行使职权，并决定统一名称。然后依“权力集中”“经济集中”两原则，以促成一有实力而统一的组织。整整筹备了四个多月，才于本年1月5日总工会委员长会议，定于2月1日召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与典礼。

因为集会结社是约法上赋予人民的“自由”，一方面军阀在相当期间内尚保持其假面，和工人谋妥协。因为这个原故，京汉工人遂得在军阀高压下发展到这个局势。宣言“保护劳工”咧！赞成“劳动立法”咧！但是工人却始终“谨防扒手”，阶级的战线日益紧切。

当国家铁路为其私产的直隶系军阀看工人的组织愈进步，他们愈恐慌，遂不得不揭开其“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拿出摧残工人很辣的手段来，图灭尽工人的势力了。在路局方面，如赵继贤，冯运，他们原来就是持破坏工会主义的。赵氏在先曾利用一部分工人组织传习所，以图工人的势力破裂，不想恶谋失败，凡示好于彼者工人群弃之，而工人底团结遂益坚实。冯氏先亦联络司电生以上的员司，组织京汉同人通谊会，与工会对抗，乃终亦未成功。自总工会成立会之召集露布以后，于是他们谋摧残的进行益急切了。赵以保系嫡派的资格，冯以京汉南局局长不啻吴大军阀的外帐房，而又有两湖巡阅使署副官的资格，遂日夜奔走于曹吴之门，以制造空气，谋覆工会。而乖巧奸诈的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于靳云鹗，使其严禁开会，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于是军阀借刀杀人计划便决定了。

仇人嫉视工会，工人未尝不知，且身处虎口，固军阀掌中物。但尚不知对方欲摧残若是之急迫，所以大会筹备皆取公开，以为如此或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至1月28日，而意外的消息到了！黄殿辰首先来会声明禁止开会；始而取出赵继贤致吴佩孚的电报，继又取出靳云鹗张福来给他的命令，猜他底意思，好似讨好于工人，显得此事主动者大有人在，但其心也太险恶，相持者几三日夜，工人愤激非常。至30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阳。

代表既到洛阳，当日（30日）往西官，吴辞不见，约以当晚用电话谈。至晚，用电话约定次早八时谈话，次早得见该署副官长徐某及其政务科长白坚武，由他们转述吴意，只是一味敷衍恐吓，代表方面坚持愈烈，最后才由吴佩孚亲见。现在把那时谈话大要，记在下面：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无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尽歼之，其手段真辣呀；约接谈三时余，不得要领而散。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微笑中，好危险奸诈呀！

先是，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庆祝。至31日晚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

武汉轮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30余团体，代表百三十余人，尚有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30余人。

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60余人，本路分会——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各分会代表到者计65人。

赴洛代表于31号晚返郑，赶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态度后，全体大愤。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因为我们乃本于约法而开会，当即决议，无论如何，仍照原议，决于次日仍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开会。

2月1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凡若大敌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妄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一方郑州工友全体由会所出发迎接，至距会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全体鹤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愤，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警军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2月1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

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遗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会所即被封闭。

晚间，各处代表全体集议，以吴佩孚违背约法，摧残集会，并兵困旅馆，不准来宾自由出入及互相谈话，勒令酒店歇业，不准来宾集宴，来宾出街，则以武装军警迫随；在在皆待工人如囚犯。似此情形，惟有迅速引去，以免其他人民同受无端惊怖。于是全体决议从速离郑州。武汉方面的代表，当晚仍搭原车南下，其他各路代表概搭次日早车北上。各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此后工人地位危险万分；都说，“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同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成立会既遭如斯之摧残了。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在十分忍无可忍之下，当即通过一决议，其大要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4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退后的。一并议定要求五项：（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及南段处长冯沅，要求吴巡阅使靳师长及豫省当局撤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损失洋六千元；（三）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的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乐队再送至总工会；占领郑州总会会所的军警应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总罢工的第二日（2月5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

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天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2000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3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龙罗海臣等4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3人，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3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置者，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次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最末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3000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那知同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

家在租界正大开会议，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呢！

2月7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罗网捉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拒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沅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7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生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告候，参谋长准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半途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是，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环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32人，残伤者200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顷，军队又大肆抢淫，计福建街一夜连洗三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精光。当时情形之残暴，恐江水汉河亦为之呜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害的时候，有工友60人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3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二次，张厚生即呼喝下令，在数十被拘工友面前，将其“梟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

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辨的。戮杀之而又重诬之，军阀之肉，其足食乎？

同日在长辛店亦有大残杀的事情。自罢工开始，各分会都一律惟总工会命令是听，赵继贤却数次威迫辛店工友单独交涉，分会工友只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答之。于5号有曹锟兵开到三营。6号宛平县知事手执“绅商与军界”旗子前来劝说上工，赵继贤亦布告威吓，要工友上工，工友只以镇静处之。不意当天晚上，曹兵四出捕人，当捕去工会职员史文彬、吴汝明等11人，都是赤身提赴保定。在7号晨九时曹兵大队又来工会捕人，当时工会门前有工友数百人聚守，军队到肘即开枪乱放，计当场被残杀者5人，受重伤者60余人，其屠杀之数虽之较江岸为多，然军阀之残暴亦云极矣！当时路局竟甚至于禁止工人家属购买食粮！至捕送保定之11人，至今生死尚未明了，闻已决定将枪毙2人。

在郑州情形，尤足表现军阀摧残我争自由的人民之种种手段。在罢工的第2日，靳云鹗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同志等5人，加刑拷打，威迫要彼等开车，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靳又令押赴街市，持旗招呼开车，亦没结果。靳知威吓无用，乃又改用软化手段，当即与5人大摆饮宴，遂又释放2人；要他们出来劝工人上工，二工友出即外逃。靳又出妙法，即一方面捏用5人名字，打一造谣通电，一方面黄殿辰在普乐园开一国民大会，制造几个威吓工人的决议，并大打其造谣通电（载京津各报）。不过当时只到了30余人，大半又系其署内警察，而他们用的名字却是“郑州军商政学路局”，竟假之以断绝工人的饮食和居住，这真是又好笑又可恨的事情。此外，各分会差不多都受过武力的摧残，受伤的人不知确数。信阳州分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从，竟被斫断一臂，至今生死

未卜。

在武力蛮横的压迫之下，未死的工友，他们是手无寸铁，只有回复工作之一途了！然而他们回复工作时的勉强和眼泪，足以证明他们是终于不甘屈服的呀！现在他们的作工，是和狱囚一般，这些将使他们更需要为自由而奋斗了。

此次罢工，不但表示本路工友团结的一致，亦表示全劳动阶级联合的一致。计自罢工后3日，道清正太等路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其他各路亦都表示参加，惜都为武力压迫，结果不得不步京汉的同一命运。有好多职员被捕。工会被封闭了。在二七惨杀之后，武汉劳动者都义愤填膺，当由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布总罢工命令，为京汉路工人之后援，计自8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五军士挟一工人，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竟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被难工友；有扬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工作；他如武汉电话、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工人，事前都被军队包围，不许外出，遂不得实行。军阀以武力摧残罢工的劳动者不算，且将湖北工团联合会及真报封闭了。施洋同志于7日被捕，于15日亦被萧耀南惨杀了！

全国的工人同志及被压迫的同胞们呵！

这次他们的罢工，他们的被杀，所代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国人知道这次惨剧的经过，当然都完全会了解：

（一）自由是全国被压迫的人民都需要的，所以此次工人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单独的利益，是为了全国人民共同的需要。

（二）军阀是全国被压迫者的共同仇人，他们此次屠杀工人，其意义不仅是屠杀罢工的工人，实是屠杀我争自由的人民，屠杀为全国人民争自由的先锋队。

全国被压迫的国人呵！自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京汉铁路

工人此次的被屠杀是证明军阀已向全国人民很恶劣的进攻了呀！
我们农商学各界人民要急速联合起来，起来做。

(一)打倒我们的仇人军阀和帮助他们为恶的国际帝国主义！

(二)同时也勿忘了我们目前还有急迫的责任，就是京汉工人是有死者39人，伤者300人，入狱者27人；被开除失业者500余人。这些被摧残的人及他们的家属，是正需要我们的援救呀！
国人要速以财力来援救他们！援助他们恢复工会！

国人起来，起来一致的解除压迫！援救京汉工友！

全国的工人呵！你们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惟有你们做前导的努力，中华民族才得着自由与独立！此次京汉工友的被摧残，是证明我们更要努力于阶级的团结呀！

打倒军阀！

工人的自由团结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3年2月27日

(《尚志》第20期，1923年2月27日出版)

赴会记事

赵春珊

五十七年前(1923)，我在国立师范大学(原武昌高师)历史社会系读书。当时我系教授李汉俊(他在参加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即来我校任教)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两门课。有天，李汉俊老师向我系同学(全系只有十余人)说：“我们讲社会问题，光讲了一些理论问题，若不与实际相结合，体会是不深刻的，譬如讲劳工问题，若不亲身参加工人运动，是不行的。目前有一个好机会，就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你们是否愿意以来宾身份参加呢？”此时正值寒假期间，全系十余人中，只有四个同学愿前往参加。一是我(原名赵瑞麟、湖北当阳人)，二是张作范(山东寿光县人)，三是任开国(四川眉山县人，北伐大革命中牺牲了)，第四个好

像记得是徐孝祥（四川云阳县人）。

1922年正月卅日下午，我们四个同学随李老师一同过江到汉口江岸东站，会见了林祥谦。他与我们李老师好像很熟识，他们交谈，我们在旁边听。林祥谦身材不高，瘦瘦的，头戴一顶礼帽，身穿一件兰色长衫，他当时很忙。招待他们的地方是在距江岸火车站不远的的一个低湿的地方，是一些芦席搭盖的临时工棚，这就是工人俱乐部。傍晚，林祥谦就在这个棚子里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夜晚，我们坐火车去郑州。到了车上，除了李老师和我们四个同学外，还有各地代表。我记得有：陈潭秋、恽代英、施洋，还有张国焘。其他各地代表和来宾，我们多不认识。车行半夜，次日早晨到了广水车站，工会筹备会早已用电话通知该站铁路按时到站迎候。车一到站，就由施洋代表在月台上演说，报告此次到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意义。工人鼓掌欢呼。谈话约十余分钟，即开车北行。以后到了信阳、驻马店、漯河、许昌这些大站都有这样安排向工人讲话。讲话的人，以施洋的次数最多，我记得他讲到郑州时，他的声音都嘶哑了。天黑到达郑州，工会筹备会把我们安排到车站附近一个大旅馆内住下。

31日夜晚，我们四个同学见各地代表和来宾对工会赠送有祝贺的礼物，去请教李老师，他很赞成。于是我们四人到街上买了五尺红绫子。由我向施洋请教写几个什么字为好？他随即说：“写‘大地赤化’四个字”。记得是由施洋代写的，下面写了我们的校名，就送去了。去年冬，我有一个亲戚因公到郑州，据他回来说，我们的这一份礼物，现在还保存在郑州二七纪念馆一个玻璃盒内。

会议受阻。(略) 李汉俊老师和我们与武汉的代表一起于2月2日回到武汉。我们回到学校时，北大教授李大钊正在我校教务主任室作客，他找我们四个同学询问了郑州开会的情况。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

八 对吴佩孚的工作

述 要

联合吴佩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当然也就是共产国际初期的策略方针。周恩来说：“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京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3页）事实就是这样。维金斯基第一次来华时，既带来了“决定联合吴佩孚”的任务，也开始做争取孙中山的工作。但在初期，基本是亲吴疏孙，重点放在吴佩孚身上。共产国际之所以联合吴佩孚，原因有多种：既有中国政局的原因，吴佩孚个人表现的原因，也有中俄关系及苏俄远东局势等原因。因此，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1920年10月9日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苏俄期望中国出现“吴佩孚将军的俄国方针”。一直到1922年他还说吴佩孚是中国“最好的军阀。”

在共产国际没有做出联合吴佩孚的决定之前，李大钊没有与吴佩孚接触过；决定后，他便肩负使命，通过他的好友，时为吴佩孚亲信的白坚武，开始了对吴佩孚的工作。在1921年至1922年的两年中，李大钊为争取吴佩孚做了不少工作，成为党争取吴佩孚工作的主要执行人。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利用军阀矛盾，积极推进北方工人运动，“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他们“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

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1922年下半年以后，共产国际对吴佩孚的策略方针开始发生转变。一方面，自华盛顿会议后，吴佩孚从英美处不断得到大量军费、军火。5月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更是气焰万丈，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策略面临危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这一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8月，马林与越飞来到中国。在这次来华前，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在粉碎依赖吴佩孚的赤塔方针方面取得了成功。”在中共西湖会议上，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说：赤塔政府倾向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一大”前后》（二）第572页）但此后，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方针，而是设想在联合孙中山的同时继续争取吴佩孚。因此，西湖会议结果后，李大钊于9月8日至11日在洛阳与白坚武会见。10月9日，李大钊又与张溥泉、王励斋一起代表孙中山赴洛阳会见吴佩孚，“张与吴将军谈颇欢洽”。10月14日，李大钊又致函白坚武，谈海参崴军械问题。（《白坚武日记》第十八册）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新的联盟结成，震动国内外。几天之后，吴佩孚便开始镇压工人运动，于是发生了血腥的“二七惨案”。同时，吴佩孚下令通缉马林、陈独秀等。这样，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立即转变为打倒吴佩孚。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与好友白坚武就此彻底决裂。

1922年5月12日，李大钊应胡适之约，与梁漱溟、汤尔和等八人到蔡元培家中集会，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同意列名为提议人（《胡适日记》）13日，与蔡元培、胡适等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6日，李大钊又与胡适寄信白坚武，介绍《我们的政治主张》。（《白坚武日记》）为什么李大钊在做争取吴佩孚工作的过程中，同意列名发表这一政治主张？对这一问题似应做进一步研究。

(一)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方针

1.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节录)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选集》下卷)

2. 对吴佩孚的态度

(2) 与吴佩孚的关系。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是当时国际代表主持的。彼时纵然有一、二同志对吴多少有些幻想，然始终未上大当。几个同志利用在交通部的职务，迅速地发展了几条铁路的工作，铲除了交通系工贼在各铁路的势力；同时在文字和口头的宣传上，亦从未散播幻想于群众之中。‘二七’之役，工人代表及群众自动的决斗起来，便是对吴没有幻想的表征。这些情形与所谓“与冯合作”，“与蒋合作”，“与汪合作”对照一下，便知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当时利用吴佩孚的政策并未做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节录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3. 包惠僧的回忆(节录)

维金斯基第一次到中国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守

常因孙丹林、白坚武的中介，曾到洛阳与吴佩孚见面，作过商谈。吴佩孚在1921年曾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就是守常与吴佩孚会谈的结果。1922年党派了安体诚、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和我五个同志到交通部任职，发动了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五路的工会组织活动，也是守常的上层掩护。

（《包惠僧回忆录》）

4. 马林的回忆（节录）

“我于1921年4月启程赴华。

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前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全球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专门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专门指示可给的，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也许有一点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情报。伊尔库茨克局清一色是俄国人。它和非正式的北京俄国使团有接触。中国政府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管用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唯一是同赤塔政府合作。它的话动独一无二地只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这是1920——1921年间的情况。”

“这时，我途经马赛回莫斯科，抵达时（约1922年9月），那儿正是在作出派越飞来华的决定的时刻。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拉狄克报告了我的工作。……无论如何，我的报告在粉碎依赖吴佩孚的赤塔方针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种想法彻底告终了。”

——《马林赴华回忆》《“一大”前后》（二）。

(二) 李大钊对吴佩孚的工作

1. 李、吴会谈

吴佩孚拉拢教育界

教育界与军阀，向不接近。唯年来风潮迭起，吴佩孚颇注意及之。适其秘书白某与李大钊有旧（现北大图书馆主任）因招李致洛，询以教育趋势与总长人才。李头脑极新，尤不愿在此时做官，更不愿由军阀进身。乃简语吴曰，教育界事惟教育界任之，他派人插足其间，未见其可也。吴点首者再，乃询谁氏可长教部？李不愿足功，谓蔡子民为教育界元老，公曷电询蔡。吴颔之。适蔡将赴鲁，参与教育改进会，蔡先属意蒋梦麟氏，时蒋亦在鲁。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0月6日）

白坚武日记（节录）

1922年5月11日

11日 辰到保定，寓督署光园，沐于德润池。寄函询家中有无扰乱。并函申江友人告以吴公决心恢复法统。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

1922年5月22日

22日 请吴将军聘张英华充财政高等顾问。俄人霍德罗夫来保定谒吴公，并以李守常之介绍同余作主义上深谈，余答话分三段：一新主义之结合，一新政治之趋势，一远东问题。渠聆余言表十分满意，谓入中国来第一伟论，与余订交殷殷握别，其译员薛德岳亦美材也。

1922年6月7日

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万仞千来，昨即回申。收崔丽叔函一件，劝移眷北来。余复函，令洁芬酌之，浙卢通电，维护东海。好恶与众不同，进退失。据黄陂电，吴子玉表示诚意，吴复电披沥翊戴。

1922年7月7日

寄李守常一函，叙日来进行各事。

1922年9月8日

李守常、李寂庵、林素园来洛，李寂庵谈杨子惠二军及政府改革前途。守常自申江来，谈申江离公近情回京。

1922年9月9日

李寂庵回京，林素园为闽长事，不得要领亦与同归。崔丽叔来函，介绍王延年医士，王亦旧识。守常及李晓沧约余同看元铁木耳坟，途中共谈南北政情，人事之短长得失大略。

1922年9月10日

王长龄来洛，代丽叔商洽数事。复吴寿椿函。电孙汉忱介绍李晓沧，并託维持教育费。荐吴子超、郁宪章于张暑长月生，请在监署任用。孙馨远总司令佳电，託询军饷。吴巡使言自九月起有办法，据情电复张月生暑长。青电声明国务院闹薪系四局长，川边陈镇使代表危道丰回京，吴巡使资函代催款。电温佩珊託向齐督为崔少将可亭询谋淮北缉私事，是否同意斯事，余诚不愿向也。同李守常话别。

1922年9月11日

晨李守常回京。杨柱黄昨晚自京来，今日去汉，久别略叙。京中政情非无办法，中枢无人可慨也。徐季龙寄复吴公一函，吴公嘱代拟一函，并叙明工兵之要，如有所就必以中山总其成。广川王锡三旅长代表郭瑞、浦宁恙、刘积之，重庆邓晋康、田颂尧、刘斌、陈国栋、何光烈、刘文辉代表吴莲炬、刘邦俊、傅鲁唯均来洛，商酌解决川事办法。凡事无復无躁，自有收束，余信

之，苏荫眉来函，故乡人士多谨，实不能处变性然也。

1922年9月23日

晨早起沐浴。电李守常托张则民事，嘱向王亮侗、罗文干说项。接张则民号电，马日北来。玉嘯云来电报京情，并言张则民已发表。宜昌樵运局既如此，只有促令到任耳。孙佩章、柯定础、赵承钦、王幼侨、杜济美均有函到。余嘱康桐生代告王蕤唐、丁颜馨暂缓候，以待时会。孙汉沈、高定庵均来电，叙明去张月生原因，高并陈述究办京绥路局长赵蓝田详情。复汉沈电，慰勉勿负气。南京齐督介绍罗光楹来洛，接洽粤事滇事。

1922年10月9日

孙中山代表张溥泉及王励斋、李守常来洛。张与吴将军握谈颇欢洽。闽乱徐又铮出头，阴有蔓延之势。雨叔来函，告麟儿入学，并询祝平过洛情况。连晚与守常谈京况。

1922年10月10日

双十节，午后同张溥泉、王励斋、李守常、宋庵臣、项子和、陈东府、张竹桥、李参谋长倬章等游关陵、龙门、香山寺。登临尽日，夕阳归来。

1922年10月11日

张溥泉今日言归，吴子玉将军复函，答孙中山以共同忠于民国相勉，勿与卖国党匪党邻近。溥泉电孙中山，意大略亦同。家谕来，即复。刘尧初复函答谢崔祝平自太原来函。世赏言，吾欲云云，实则云云易耳，脚踏实地难矣。短期中之忍耐尚易，长期中之忍耐甚难。余今日稍稍知之。借吴巡使、李参谋长送张溥泉、王励斋、李守常、项子和至金谷园车站握别。更至七里河洛河两处看察桥工。归晤王普涵，王言将赴京。

《胡适日记》节录

1922年6月10日

守常从保定回来，带来边守靖、吴景濂、张绍曾等捣鬼的电

文十二件，我把他们编成一篇，在《努力》上发表。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

1922年6月19日

孙丹林（汉尘）来京，现暂就内务次长的事，他要和我们谈，故守常约我和才民、石曾同他吃饭，此人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他的功劳。吴氏用兵确有天才，孙氏说他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却全是他的天才。他在政治上实在不过是一个婴孩，全靠孙氏及白愷亚的扶持。功段之计，与去徐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去年孙氏本劝吴氏到湖北后即回头对中央宣战，赶去徐世昌；吴氏不能听从，孙氏大愤，辞归蓬莱故乡；后吴氏在湖南大战，死的人过四万，为民国十年来第一场血战，战虽胜而吴氏声名一落千丈，吴氏大悔，再三把孙氏请回来。

吴氏固是幼稚，但孙氏亦不是很有学识的人，不过比吴氏稍高一筹，故两人可以相助为善。但这种现状，究竟是不好的，盲人牵瞎马，当此日暮途远的时候，可怕呀！

1922年8月14日

我想试作一个政治计划，预备今晚与孙丹林谈话的底子，写了一千多字，仅成（一）财政，（二）政治问题中的统一问题。正要谈到中央政局，有人来谈，就打断了。

知行来谈。他对于联管自治，与吴佩孚有同样的误解。但谈话的结果，他也觉得我的主张有理。

.....

晚七时，到大陆饭店会着孙丹林。同坐者有才民，尔和，梦麟，守常。我们谈的都是很恳切的忠告。孙的态度很不好。他似乎还在那儿做“武力统一”的迷梦。他说，吴佩孚大事不糊涂，他在几年前就说要和老段比一比，再和张作霖比一比；当时人都不很留意，后来果然都灵了。孙说时，颇得意；他又说“要是我

肯给子玉上条陈，只消两师兵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生气。才民先生说，“那么吴子玉也不过是一个军阀！”梦麟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说到后来，他的态度稍软下来了，也承认吴佩孚对于联省自治应该逐渐改变态度，不可没有一个退步。

2、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在上海最先会见了孙文先生，孙先生首先从北上问题谈起，他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应当一面采取集中兵力于中央的办法，一面扩大县的自治权力，从而削弱现有督军的权力。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

* 原编者按：李氏利用暑假游览上海、洛阳等地，会见了孙文、陈独秀、吴佩孚及各地的工人等；于十二日夜返抵北京。翌日他向访问的记者就与孙吴两氏会见时谈及中国统一方策问题发表了上述意见。

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到了洛阳。回到这里后听到种种风言风语，说什么奉直还将再战，吴佩孚要移驻郑州等等，但在洛阳期间一点儿也看不出有这种迹象。至于移兵郑州一事，将来怎样无法预测，但在近期内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动静。眼下吴氏正在热心地实践他那前些时刚刚公布的兵工政策，早上五点前就全体起床出动操练到七点，然后再到附近的山上植树。吴氏说，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那么他自己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另外，孙吴两氏还就前几天报上披露的、近日刚刚收到的徐树铮致吴佩孚论述统一方策的信谈了他们的意见。

下面将就此事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联省自治或联邦制度，作为制度本身不一定就不好，然而象现在这样有督军在各地实行割据的情况之下，要想直接实行这种办法那就行不通的。首先在中央必须备有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政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最上策，在这一点上孙吴两氏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当一接触到如何向中央集中强大的兵力，又如何去削弱各督军的权力时，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了。现在我国的形势与日本相比较，很象明治维新当时的状况，不过日本当时确实有过真正的军阀，这就是被称为长州、萨摩这样强有力的藩主，这些藩主协同一致推翻幕府，也就是推翻了支持军人的那些藩主，把国家政权从“武家”手里夺取过来。但在我国并没有种样真正的军阀，在现有掌握兵权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把政权从军人手中移交给人民，把自己也变成人民中的一员参加进去。看来，我国的现状倒不在于因有军阀而苦恼，苦恼的倒有是没真正好样的军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没有这种真正的军阀，倒可能相对地

加快统一的步伐。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我国能称得上是军阀的人们，即那些被称为督军、师长的人们，都不是真正的军人，只不过是一介商人而已。一个普通的商人只能从倒卖商品中取得了盈利，而督军之类的特种商人，却是通过培植个人权力和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收取苛捐杂税的办法谋取私利。因而对他们来说，维护权力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用所占有的权力谋求余人的利益。倘若一般的民众都觉悟起来，使他们觉得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捞取利益了，那他们就会马上离开那个职位，就象王占元之流，当他把数百万（据传如此）家产弄到手之后，一旦发觉再象以往那样捞钱已十分困难时，便立即离开了他的职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只有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各督军等盘剥私利，这才是削弱督军权力最有效的方法。不过发动民众并不那么容易，这里也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用财政手段使督军失去养兵的力量。向来只要中央政府的财政稍有结余，就被各督军取走，所以不管有多少钱中央总是要陷在财政艰难的困境中，加上因各省督军的权势不见削弱，因而各国虽然几次答应贷款，仅只停留在反复表态上，据说大宗贷款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只要中央能有数千万的收入，把各督军的兵力集中到中央手里是不难办到的，就是说现有各督军，凡他们自己所能筹集到的军费都由自己筹集，每个师团都要有几个月以至十几个月的缺额。如果明确规定这些军费由中央来支付，那么各地的士兵必将拉起队伍向中央集中，到了那时，各地督军会不会因害怕自己兵员的减少去谋求军费自给来挽留其兵士呢？正如前面说过的，各督军既然作为一介商人而存在，就决不会把已经装进腰包的钱再倒出来。假如今后督军割据的状态再继续十几年，那时的情况会怎样虽不可确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一些督军由于深知自己将会当不成军人，所以绝对不会把中饱私囊的财物再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督军的兵力自然要向中央集中，地方的兵力必然逐渐削弱。一旦兵力被集中于中央之时，就可以对其一部分

加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成为中央的军队，而将其余的大多数用于开垦矿山等使用，这样一来统一也就自然形成，剩下来就只有东三省和广东的问题了。可以想见，只要中部地区的各种力量都集中于中央一处，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与之相抗衡。然而实行这一计划如果没有数千万元的资金也就只能作为一纸空谈而告终。我们应当采取的，只能是逐步实施的办法，必须首先唤起民众的觉醒，然后还必须依靠民权运动的力量来削弱督军的势力。目前各地的工会组织已在考虑这一问题；商会、农会等虽还未形成公开的运动，但由于各地捐税过重，又都深受军人之害，只要对此持反对态度，运动一经发动，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把督军们赶下台。而且由于各地深受军人飞扬跋扈之苦，都深切期望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世界各国也都盼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些希望之变成现实，也许要花费一些时间，但统一政府的出现已是必然的明显的事实，我们应为它的出现而努力。

（《北京周报》第33号，1922年9月17日）

韩一德译 穆传金校订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3. 有关的回忆

邓中夏的回忆

1922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余，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共产党当时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

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新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6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臚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6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16个之多。

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摔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

佩孚斗争的。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

（节录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包惠僧的回忆（节录）

1922年5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当时都用的化名。在那种军阀官僚政治的场合里，他们的地位不高，自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只要在铁路上能够进行工作，也就够了。在交通部里，他们是守口如瓶，不同任何人扯关系。而高恩洪却希望他们多多为之效劳。高以总长之尊，常常召见他们，有时甚至还用电话约他们到高家里，询问铁路上的情况。当然他特别注意的是交通系的人物和活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满足高的要求。

有一次，包正在总长室同高恩洪谈话，次长劳之常进来。高恩洪对他介绍说：这位先生是蔡子民先生介绍来帮忙的。可知李大钊是扯蔡子民先生的关系，把他们介绍到交通部的。

当时他们常向李大钊汇报交通部的情况。李大钊要他们搞好同周围的人的关系，最好多拉些人作掩护，免得孤立。那时育才科新来了一个科长，名叫黄统，是吴佩孚交用的人。李大钊曾和他在日本同过学。因此特别要他们同黄统密切联系。后来发生了“二七”工潮，他们五个人以鼓动工潮的嫌疑被撤职。此时高恩洪去职，吴毓麟任交通总长，欲置他们五人于法网，倒是黄统多方解释，始得免于根究，这时，他们才了解李大钊同志当初的用心。

（《包惠僧回忆录》）

(三) 蔡元培等等

《我们的政治主张》

1. 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 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 ‘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提议人 职业 十一，五，十三。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徽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努力周报》第2期, 1922年5月14日)

2. 胡 适 日 记

1922年5月11日

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 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 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 故半夜脱稿时, 打电话与守常商议, 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 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 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

此文中注重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 这个意思是我今天再三考虑所得, 自信这就最切实的主张。

1922年5月12日

七时, 打电话与蔡先生, 借他的家里开会, 讨论《我们的主张》, 其余各人, 也在电话上约定十一时相见。

十一时, 在蔡宅开会, 到者: 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余、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 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 都列名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 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

蔡先生闲谈。三时，王亮畴、罗君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15人。

下午，孟余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16人。

下午四时，开教务会议。

3. 白坚武日记

1922年5月16日

16日 川代表宋斗文，湘代表邹尧仁始到保，促速电川、湘当局宣示法统主张。王笑云来保叙近况。胡适之、李守常均有函表示政治主张中有纲领条目，宜分前后者，亦列入一册。开南北和会一节，徒延时日，多涉纠纷，余意尤不表同情，安有真正民意附内。王儒堂来谈法统自治，并裁兵各节目。

4. 张国焘的回忆（节录）

这年6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6月2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以主张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于6月10日通过之后，我即于6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予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

九 第一次国共合作

述 要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一声明赞扬国民党在中国现存政党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提出由中共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重申“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主张。

对于党的这一重要决策，李大钊非常拥护。在党的“二大”前，李大钊就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联名向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提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党的“二大”后，他又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等文章，进一步宣传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

为确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以实现联合的问题，同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在会前，李大钊在上海与孙中山作了长谈，在会上，他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并在他的耐心说服下，会议原则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西湖会议补充和发展了党的“二大”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使党在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李大钊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湖会议后，为贯彻会议精神，统一全党认识，李大钊又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说服的工作。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

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二七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步伐。4月，李大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5月，他又在《北京周报》上著文呼吁，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而要改造就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要有一个中心力量。在中国，这个中心力量就是国民党。同时又指出，目前国民党的实力不大，问题很多，因此我们就要改造它，加强它。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与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11月，他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对党应如何进行国民运动作了部署，以促使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中共开始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到作出国共合作决定的全过程中，李大钊出席了中央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决策，并在党内外反复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所起作用，显而易见。

为实现国共合作，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李大钊和其他同志一道，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作了大量工作。1922年8月西湖会议前后，李大钊多次会见孙中山，向他痛陈时局之险恶，表示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中山先生合作，并“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在会见中，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精辟见解和非凡才能极为赞赏，与他“畅谈不倦，几乎忘食。”（《狱中自述》）李大钊坦率地告诉孙中山，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也很诚恳地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中国国民党“二大”政治报告》）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此后，李大钊一直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研究改组计划。草拟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深得孙中山的信赖。1923年1月，经李大钊、林伯渠的安排，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随后代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在中共“三大”召开期间，李大钊又与孙中山在广州共同商讨了国共合作及有关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7月，李大钊在北京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国民党负责人一起，研究重建北京国民党组织问题。到11月，北京的国民党党员总数达千余名，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10月，李大钊应孙中山电邀赴上海谋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11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此外，他还担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大会各项主要文件的审定。会议期间，李大钊与孙中山“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范良：《国民党“一大”见闻》》）

大会期间，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制造种种“理由”，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李大钊代表中共当即发表了声明。他的声明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使右派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

会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并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涨的起点。

国共合作实现后，李大钊始终以巩固和发展这种合作为中心，以加速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为此，他作为国民党北方领导人，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国民党领导机构的作用，以巩固国共合作的组织基础；（2）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以巩固国共合作的阶级基础；（3）加强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以巩固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4）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坚持和发展国共合作。

李大钊对维护国共合作是非常诚心而认真的。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在合作中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良好关系，将永远铭记于人们心中。

(一) 国共合作的酝酿

1. 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

(1922年7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終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

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民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还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本党旗帜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左：

(A) 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 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 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北京同人提案

——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朋友们：

这次杭州盛会，北京同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参与，引领南望，能不依依。我们认这次大会，不仅是联络会友感情，乃为求彼此意见一致而讨论几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虽未到会，我们很愿对你们的讨论贡献我们的一点意见。如荷你们的多数赞同，请共同签名在月刊上发表。

下面便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只看他要求于我们的是那一种，是政治活动，抑或社会活动。凡是此时住在中国的人，我们想，恐怕没有不感觉武人的横行和人民所受的困苦的。军阀盘据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

的掌握。他们登用一般趋炎附势、借公肥私的官僚，豢养一群毫无纪律的土匪式的兵士。他们为保存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一大群寄生阶级，遂迫而横征暴敛。他们因军队太多，一省地盘不足，遂迫而侵略邻省。于是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养贍游民和征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言念及此，我们真觉不寒而慄了。

中国内政腐败既已如此，而同时外国资本挟政治势力以俱来，以金钱贿赂，以武力威吓。他们从中国的军阀与官僚手中将中国利权劫取无余，复束缚我们海关订税的自由，享受豁免厘金的权利，更能避免去兵匪的滋扰。他们挟几十年休养的雄厚的资本主义，以与在种种束缚之下的我们新兴的资本主义竞争。为防止我们民众的勃起，乃维持扶植腐败的北方政府（如日本借款给北方讨伐西南），使中国永远在军阀互争之下，不能崛起，他们也可以永远遂其劫夺。近又为调解国际间的资本竞争起见，成立新银行团，召集华盛顿会议，希图以协和的国际资本主义代替互相竞争。在这样情状之下，我们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遭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我们的经济日渐枯竭，生活的程度日渐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直到奴隶的生活为止了。

这样物质的束缚，影响及于精神。他在道德上的表现，是缺乏振作的精神、奋斗的意志。大多数生活不安，自顾不暇。所以同情心消失，合群性沦亡。他在知识界的表现，是知识贫乏，缺乏活气。大多数既奔在衣食，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何能更有余力研究学问？道德、知识两俱缺乏，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国，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社会了。

我们认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产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

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

在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以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加速度破坏人类生活，将人类境遇愈陷于悲境，将人类道德愈约成服从的奴性的道德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不敢而且不想动他分毫，要学脱尔斯太慢腾腾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减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还侈言创造少年中国，这真是甚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扑灭燎原之火了。倘使少年中国不因此侈谈而得创造，我们也就延宕少年中国的运动，成了少年中国的罪人了。

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在社会上尚有不平等阶级之时，被压的民众永远没有全体意志之可言，一部分的民意总要被治者阶级所收买或威吓。俄国的农奴有反对农奴的解放的，林肯放黑奴，而黑奴反对者颇不乏人；俄国帮助撒^①的人民名为 Blackhundreds（黑群众^②）；湖南的人民竟有替张敬尧请愿者。只有真的革命家他不愿退化层的人民的反对，迳引导一般最有觉悟的群众向前斗争，以冀顽固的人民的归附。我们如若死

① “撒”即沙皇。——编者

② “黑群众”即帝俄时代的黑帮党人。——编者

守或全体参加政治活动或不参加的教义，这只是一种怯懦的心理，只是不敢以少数与最有势力的权威对抗罢了。况且，照不问政治的社会运动者的想像，社会运动不直接与军阀冲突，怎样可以一时大显灵异将黑暗政府扫去无余呢？

我们鉴于中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渐次殆尽了，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啊！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 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朋友们，我们再不能延宕了！我们再不能使内部分裂反与敌人以可乘之隙了！

我们不是奴性主义者，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这就是说，军阀可以扑灭军阀政治，也就无异说君主可以废除君主专制政体，资本家可以废除资本主义了。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既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根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虽然有人认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广州近二年来的施設，如废止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罢工权、振兴市政、发布工会条例、办理外交不辱国体等，也可证明他们还是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常为军阀所驱逐（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像这样，便是

间接的扶持或默认反动阶级的利益了。

少年中国学会是知识阶级的团体。知识阶级在中国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替统治者阶级的丑行做知识上的盾牌，替统治者阶级用深渊的学识解释、辩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自己却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第三是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唤醒国人的同情。朋友们，你们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走那一条路呢？

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啊！你们不是因为要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么？但是你们若不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不更在实际活动的范围中指导他们，民众虽由你们得了感情的激发，他们或者将陷于无办法的境地，或者流于无结果的暴动了。

少年中国的科学家啊！你们不是想在中国发达科学、普及科学教育么？你们的同胞现在正为奴性和因袭思想所支配，他们现在只能终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他们要你们先将他们从物质生活的羈勒中解放，再来领受你们的精神粮食啊！

少年中国的工程师和实业家啊！你们不是要创造一个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么？你们的机会、地盘全遭军阀和帝国的帝国主义所蹂躏或强占了，你们还不起来收复么？

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黄日葵 陈仲瑜 邓仲澥

刘仁静 李大钊 沈 昌

（《少年中国》3卷11期，1922年6月1日）

3. 关于西湖会议

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节录）

道夫·宾（Dov Bing）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杭州中央全会

在中国，中共中央委员会忙于执行斯内夫利特的建议。1922年4月第一次杭州全会后，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8月15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第一次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仍在批评孙中山的党，现在却号召和国民党采取联合行动。他们还采纳了斯内夫利特的反军阀的政策。一个月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第一次主张”，并决定把这个文件递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表示共产党人愿意与国民党联合的愿望。

1922年8月初，斯内夫利特又回到中国。这时他的战略已经为共产国际领导正式同意。由于1922年4月第一次杭州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不愿意接受他的非正统的建议，他现在急于要使那些坚持己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遵从他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1922年8月17日，他召集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杭州会议。除了斯内夫利特外，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张太雷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受了斯内夫利特的建议。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张 国 焘 回 忆

8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7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什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

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然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合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销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改。

.....

1922年8月9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13日到达上海,这正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销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人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的回忆》)

《致胡适信》（1922年8月）（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1923年）

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

5.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1923年6月）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份，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

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份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 我们在国民党内，须注意下列各事：(一) 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 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 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 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八)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份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份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让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6. 中共三届一中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十月二十日召集，嗣因与劳动大会

时间冲突，改在十一月十五日，又以候驻粤委员，延期到二十四日始开会。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开会，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议事日程如左：

- (一) 中局报告大会后进行事项；
- (二) 各委员报告地方工作情形；
- (三)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
- (四)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
- (五) 教育宣传问题；
- (六) 第五次国际大会准备事件；
- (七) 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
- (八) 胡鄂公等党籍问题；
- (九) 党证问题；
- (十) 中局会计报告。

讨论的结果：第（六）催取各地方对于党纲草案之意见，原选出席代表张同志失踪，届时由中局另派。第（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第（八）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依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第（九）暂行从缓。其余报告及决议案另录。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第135—136页）

7. 李大钊谈与孙中山的会见

李大钊《狱中自述》

（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8. 马林与孙中山的会见

斯内夫利特与孙中山的第二次会见和孙越宣言

斯内夫利特和孙中山的第二次会见是在1922年8月25日，在上海法租界。虽然孙中山为陈炯明的叛变感到沮丧，但在接见斯内夫利特时他仍象往常一样愉快。孙中山告诉斯内夫利特，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在他们的谈话中，斯内夫利特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斯内夫利特告诉孙中山关于他去莫斯科的情况，并告诉他共产国际领导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会见后不久，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就参加了国民党。双重身份的先例已经建立。同时，孙中山也接受了斯内夫利特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意见。

斯内夫利特第二次来华，是同时受命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在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谈话时，他想到他应与苏联有名的外交人员越飞一起来华。后者对斯内夫利特的思想很感兴趣，也赞成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越飞，是当时仍有势力的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对孙中山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感兴趣。正当苏联同北京的中国政府进行正式谈判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报纸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北京出面的越飞身上的时候，更重要的、但是完全秘密的谈判正在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为孙中山之间在上海进行。斯内夫利特坚持不懈地来回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经过五个月的秘密商谈，他在苏俄和国民党之间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协议。于是越飞决定去上海缔结这个协议。这样，1923年1月26日，著名的苏联外交人员和 中国革命之父签订了他们的历史性协定。一年之内，为履行这个协定，顾问、武器和钱都来了。苏联的注意明显地转移到孙中山国民党的方面。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党人开始了新的行程。它的后

果，全世界都将感觉到。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 孙中山的有关函电

孙中山致上海事务所电

（1923年10月19日）

事务所诸同志鉴：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孙文。皓。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10页）

孙中山致党内同志函

（1923年10月24日）

诸同志均鉴：

兹委廖君仲恺，邓君泽如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本总理有厚望焉。此致，敬颂
大安

孙文 10月24日

特派临时执行委员：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

候补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

国民党总理孙文

（《孙中山全集》第8卷）

10.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26日）

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授权发表下记

宣言。在越飞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重。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非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非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之权利权附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再来中国南部，然后赴北京。

1923年1月26日上海

孙逸仙 越飞签字

（《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11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3年11月25日)

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落落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损(捐)生命者，不可胜算，当之者摧，撻之者折。其志行之坚，牺牲之大，国中无二。然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澜，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可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为讳者也。

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痾，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则民众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为军阀之牛马、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牺牲而已。国中政党，言之可羞；墓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凡此派流，不足齿数。而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国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

* 孙中山于1923年10月委派人员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国民党事宜，这个宣言便是由该委员会起草并在这一天发表的。

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愿与同志共勉之！

（《孙中山选集》）

12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节录）

宋庆龄

孙中山在前三十年中把全副精力用于唤起中国人民认识他们的处境和危险，并且要求他们行动起来改变这种处境。虽然他一再遭到失败，但是他是坚强的，们不屈不挠地沿着民族革命的道路前进。他建立和领导了许多革命组织，最后一个是国民党。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理命：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国和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的有政治觉悟的人民。

.....

孙中山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重要性，而当时其他人不是害怕它的主张，就是由于它早期党员不多而低估了它。1923年当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

1924年1月，他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便在共党的帮助和参加下改组他的党。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到那时一直是他的政治纲领。毛泽东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出，这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旧范畴的三民主义的结束和新范畴的三民主义的开始，前者属于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将导致资产阶级专政；后者属于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将导致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他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

在一起才是对他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

毛泽东主席称这个纲领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①他还对这个纲领作了这样的估计：“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②

这种估计同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的看法完全一样。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他在这方面说得很明确，他认为这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

1917年以后，孙中山感觉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早在1919年，他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他在1924年一篇《论人民福利》的讲演中公开承认这一点，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有些人往往在斗争当中在这个或那个基本原则后退却，在这方面，他在自己的党内曾有过许许多多痛心的经历。在他的争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 同上。

制、粉碎农村中的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中，他发现只有他遇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们真正的同盟者。孙中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立场和行动对中国革命的好处后，决心同一切想阻止他同共产党合作的企图作斗争。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二) 出席国民党“一大”

1. 李大钊赴粤及返京报道

国民党在京党员派代表赴粤

国民党北京支部之民治社，与某社近因接广州孙中山来密电，请派代表6人赴广州接洽党务。特于日昨（4日）在某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主席为某大学教授李某。除讨论报告外，当选定谭仲逵、李大钊、许宝驹、谭克敏等6人为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党务大会。闻是会定于1月15日开幕、连开10日，北京6代表因距开会日期甚近，已于昨晨由京乘特别快车南下，所有代表用费，均由党员平均分担。此次各处选派代表，甚为秘密，盖恐为官厅所干涉，于党务有碍云。

（《京报》，1924年1月6日）

浙沪国民党代表明日赴粤

前浙江省议会议长沈定一，受孙中山先生委任，于7日在杭州召集国民党大会。由沈主席，说明开会宗旨，并选举代表。到会党员发表意见后，选出戴立夫、胡公冕、宣中华3人为浙江出席大会代表。昨沈君与3代表来沪，寓东亚旅社。拟今夜上苏州轮，明日上午九时启轮赴粤。又上海大会选出之张拱辰、黄泳台、谭惟洋等3代表亦同时赴粤。

又闻京、天津、山东、武汉等处代表，亦多已抵沪，购定该轮船位。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9日）

国民党要人返沪

国民党大会闭幕后，其执行办法，将各执行监察委员及候补

人等重要党员分派各地，主持一切，上海闻定汪精卫、胡汉民等十人，汪胡二君由港乘智利轮返沪，昨晚九时余抵埠，同船归者尚有李守常、沈玄庐、王立（励）斋、丁惟汾、谭熙鸿诸君及浙、鲁、湘、鄂代表多人。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2月10日）

注册部布告（二）

李大钊先生刻已回校，下星期起照常授课。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2月29日）

2. 国民党“一大”有关文件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纪

又国闻社广州通信云，国民党全国代表于19日上午十一时开大会谈话会，出席代表128人，公推胡君汉民主席。首由胡君报告，谓今日谈话会即明日大会之预备会，大会之事，如组织主席团，本党宣言，谓须先组织委员会。汪精卫则请廖仲恺先行报告筹备大会经过情形。廖君乃起立报告，谓当未筹备改组之先，即在广州开一次谈话会，请党员发起改组事情。至大会之代表，由各省党员互选3人，总理指派3人。其改组要点，在修改党纲，订定党章，改组手续，一概以大会决定。此次开全国代表大会之用意如此。至各省党务情形不同，有可公开者，有属秘密者。因以上原因，所以选举之手续不同，有在上海举行选举者，有在广州举行者，盖各省之有不能公开党务者，须在广州举行。至海外党员人数极多，每支部定派1人，由当地选出，但分部亦推派1人，但无表决权。至议事日程第1天组织主席团，每日议事，由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下午七时半开委员会。至议事日程，明天可发出。因各种章程，先预先决定也。明天广州市各区分部

致欢迎词，下午总理宣布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代表资格，其中稍有变更，所以决定有资格审查委员会。至大会之提案，须经审查，故有各种委员会之组织，其方法仍请各位研究云。次胡公冕、谢英伯等，请将主席团如何组织，先行讨论。王恒发言，谓应将全部计划，加以讨论。（一）表决权须划分清楚。（二）财政计划。（三）用人。（四）党略。会议规则须大会讨论表决通过，方可适用。至是汪精卫复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大会之内容。（一）所以改党之理由。（二）纪律问题。（三）筹备所有提案，概归党务委员会审查。（四）大会议事问题。执行委员会既有会议，不妨适用规则。继讨论议事细则，叶楚伦主张可由谈话会表决，通过适用。茅祖权则以为议事细则关系重大，须由大会讨论表决方可适用。沈定一谓主席团应由大会产生，议事规则则可由执行委员会议定，大会采用之。主席乃以“赞成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草定之议事细则，交由大会表决通过适用”，付表决，大多数通过。复次讨论主席团组织法，谢持谓主席团问题，只有二种，或由大会选出，或由总理指定，现在可分为人数人选两种表决。张秋白谓主席团可以党务委员会委员充之，主席团乃以主席团人数人选，由总理指定，不必大会通过，付表决，大会多数通过。于是主席乃宣告散会。

（《民国日报》1924年1月26日）

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

广东： 。廖仲恺^① 谢英伯 胡文灿 冯自由 。邓泽如
 。陈树人

广州市特别区： 方瑞麟 陈竞西 董 维 。孙科
 。吴铁城。谭平山

上海特别区： 黄詠台 张拱辰 谭惟洋 朱之洪。叶楚伦。何

^① 带“。”号为孙中山指派代表，无“。”号者为各省选出代表。

世楨。伏彪

北京特別区： 许宝驹 谭克敏 石 瑛。李大钊。谭照鸿
。延瑞祺

汉口特別区： 李能至 廖乾五。屠正。夏声。李法

福建： 许卓然 林黄卷 林雨生。丁超五。黄楫山
。刘通

广西： 蒙卓凡 施正甫 徐启祥。刘炯。苏无涯。覃超

云南： 周自得 杨华馨 刘国祥。李宗黄。杨友棠
。胡盈川

湖南： 林祖涵 罗迈 邹永成 夏曦 袁达时 毛泽东
。程潜 陈嘉祐。李执中。谢晋 刘况

江西： 赵干 刘伯伦 洪宏义 徐苏中 胡谦 周道万
。萧炳章。彭素民。王恒

浙江： 戴任 胡公冕 宣中华。沈定一。戴季陶。杭辛斋

贵州： 周仲良 王度 凌霄。李元箸。简书

直隶： 韩麟符 于兰渚 陈镜湖。王法勤。于树德。李
永声

山西： 邓鸿业 苗培成 赵连登。谷思慎。韩书麟。刘
景新

陕西： 姚丹峰 江伟藩。于右任。焦易堂。路考忱。张
兆基

山东： 王尽美 杨泰峰 孟广诒。王乐平。丁惟汾。张
苇村

江苏： 顾子扬 朱季恂 张凌霄。茅祖权。刘云昭。狄侃

安徽： 凌毅 杨虎 李次宋 曹似冰。柏文蔚。张秋白

四川： 刘詠闾 刘泉如。杨庶堪。赵铁桥。谢持

湖北： 刘芬 张知本 孙毓 刘成禺。詹大悲

河南： 王友梅 赵峻 薛广汉。李存智。刘荣棠。李衡
。张善与。宋聘三。王传恕

奉天： 王秉谦 。朱霁青 。祁耿寰
 吉林： 张晋 李忠逸 赵志超 。李希运。董耕云。徐清和
 。何猛
 黑龙江： 葵德宣 常毓莖 韩喜亭 。田铭章。乔根 。傅
 汝霖
 甘肃： 张宸枢
 西藏： 。乌勒吉
 蒙古： 。恩克巴图 。克兴额 。白云梯
 哈尔滨特别区： 。秦广学 。张识尘
 海防： 冯苇渔
 安南河内： 。陈觉梦
 三藩市： 刘芦隐
 雪梨： 黄右公
 暹罗： 。萧佛成 陈美堂 。林伯岐
 怡朗： 杨挺秀
 八打威： 李国瑞
 芙蓉： 。萧振堂
 西贡： 陈颯生 。林永伦
 菲律宾： 梁为杰
 仰光： 黄馥生 黄德源
 联义社： 。林达生
 日里棉兰： 深如九
 东京： 宋垣忠
 西贡薄寮： 。何觉非
 西贡金欧： 邱家荣
 西贡美荻： 许英祥
 西贡金边： 陈有庚
 日本神户： 刘土木
 澳门： 。蔡世芬

菲律宾吡吗倪： 赵鸿汉
加拿大： 黄季陆 。 赵卫平 。 黄发文
檀香山： 刘福球
墨西哥： 余和鸿 。 黄宽祿
南洋： 陈鸿锐
尾利伴： 。 雷鹏
美国： 。 叶崇濂 。 陈汉子
香港： 。 阮旺 。 李林
妇女界： 。 陈璧君 。 何香凝 。 唐允恭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80—83页)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录第一号 (节录)

主席：宣告按照本日议事日程，开议第三案“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提议主席团人数定为五人，由总理指派。(附议者人在20人以上。)

主席：廖君仲恺主张主席团人数5人，由本席指派，附议者已在20人以上，现在表决，赞成廖君仲恺主张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席：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录第2号 (节录)

秘书长：朗读宣言全文毕。

主席：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后，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后，须要负责回各省报告、宣传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

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鼓掌）此宣言，尚须付审查，审查完毕后，再付大会表决。现在按照本日议事日程，讨论第六案“组织宣言审查委员案”。

140号廖仲恺：本席提议审查委员请总理指定九人。（附议者在10人以上。）

169号王代谦：主张审查委员人数应按照各省区分派，以便采集全部分人意见。（附议者在10人以上。）

119号韩麟符：赞成第一办法廖君之提议，其理由即对于第二办法主代表主张之精神也可调和在内，请总理指派时注意区域的分配可也。

主席：现在分别付表决，赞成提议宣言审查委员人数按照省区分派者，请举手。（举手者28人，少数）否决。

主席：赞成廖君仲恺提议审查委员会九人，由本席指派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席：宣言审查委员9人，须本总理详细考虑后，方能定夺，现在不能报告。

主席团胡汉民：宣言审查委员最好现在即指定，因已定今晚即开审查会之故。

主席：现因要仔细考虑指定宣言审查委员，应暂退席，请主席团胡君汉民代理主席。

……（略）

主席：现在宣言审查委员九人，已由总理指定：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守常、恩克巴图、叶楚伦、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九位。（众无异议。）

主席：宣告散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2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录第五号（节录）

主席：现在孙代表说明完毕，应即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人数多少？如何产生？请大家决定。

主席团汪精卫：该章程审查，关系重要，如照宣言审查委员人恐尚不够。盖宣言审查委员为9人，章程审查委员如倍之，应得18人，但18人是双数，不合惯例，故主张审查委员人数为19人。（附议者在10人以上。）

主席：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人数19人，由汪君提出，已有10人以上之附议，现表决。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可束决。

主席：委员如何产生？由本席指定抑由大众公推？

67号居正：请由主席指定。

主席：委员产生，居代表主张由主席指定。有无附议。（附议者在10人以上。）

50号黄季陆：章程内对于海外党部一无规定，实为遗漏，指定审查委员时，请主席酌量指定海外代表数人，便于贡献海外党员之意见。

27号张秋白：顷间主席谓开审查会时各代表如有意见，可到委员会提出，但如此恐怕难办。本席主张代表如有意见可以书面提交审查委员会，以便审查委员采择办理。

主席：以张君之主张咨询有无附议。（附议者在10人以上。）成立。

108号江伟藩：本党章程，关系重大，似应稍稍征求大家意见。

25号李希莲：提书面应否要连署人。

27号张秋白：本席再将顷间提议之意思声明一下。如见各代表有意提出书面之后，审查委员犹不明瞭者，可请提出之人到审查委员会出席说明。

主席：宣告张君声明毕。现在指定谢君持、何君世楨、譚君平山、丁君惟汾、廖君仲恺、茅君祖权、孙君科、朱君霁青、李君守常、蕭君佛成、汪君精卫、张君知本、戴君季陶、屠君正、于君右任、毛君泽东、石君瑛、邓君泽如、谢君英伯19位为章程审查委员。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5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七号

委员会委员

主席：现在按照议事日程第二案“组织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案，有无讨论？（众谓无讨论。）

主席：此项审查委员如何产生？由大众公推？抑援照前列[例]，由本总理指定？（众请由总理指定。）

主席：委员人数多少？

30号冯自由：本席主张定为九人。

主席：冯代表主张定为九人，大众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

主席：宣传问题审查委员，本总理指定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伦、李守常、冯自由、黄咏台、黄右公、刘成禺、白云梯九位。

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7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二号

主席：方代表瑞麟对于章程审查报告要发言。现请发言。

105号方瑞麟：登坛发言。略谓：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主席：以方君主张，咨询有无附议？（附议者在十人以上。）

主席：现在审查委员李君守常有答复方代表之言，并有声明，即请李君发言。

主席团李守常：登坛发言。略谓：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详文另稿印布。）^①

主席：现请江代表伟藩发言。

108号江伟藩，登坛发言，反对李君之跨党主张。略谓：吾人既入一党，信仰此党之主义，遵守此党之党章，即应始终归服此党，尽忠党务，不能再兼外务。盖以一个人的精神材[才]力而言，必如此而后可，且吾人从事国民革命事业，实为适应全体国人之心理，故先致力于民族主义，继则再努力于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今看国人多数之心理，盼民治之实现，既殷且迫，故吾人应就民权主义旗帜下做我们的工夫，以求适应人民之要求。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包括于民生主义，然其途径距离尚远也。特唤起李君注意。

主席：现请叶代表楚伦发言。

114号叶楚伦：登坛发言，反对方君瑞麟之提议。略谓：凡加入本党者，只要能行本党主义，能遵守本党党章，就是我们的同志。本党为甚要宣传，宣传即是使人知道联袂来归，今既有人来归，加入我们的团体，为甚又不要他？是否与宣传精神自相矛盾？请大家对于这几点注意。

主席：请李代表永声发言。

183号李永声“登坛发言，反对方君之提议。略谓：我们现在制定章程，要定出一个革命的章程，不要定出一个被革命的章程。我们的宗旨，是要顺应世界的潮流，现在的章程草案适得其中，最合现在的环境，与共产党之主义亦差不多，尤希望有大多数青年加入，无青年加入，本党是不会发达的。现在国中的社会党、无

^① 参见《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见《李大钊文集》下卷。

政府党诸激烈派皆无首领，惟本党在中国、在世界为有历史的、有主义的、有首领的革命党，希望他们都来加入才好。

主席团汪精卫：登坛略谓：现在不是以个人资格发言。本席是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有应报告的事情，均须提出报告，此应向大众声明者，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我曾记得戴君季陶说过一句狠[很]警辟的话。他说：“只有民族主义者不赞成民权主义或民主主义，断没有主张民主主义者不赞成民主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理；亦未有赞成民生主义者不赞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且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用将审查委员会意思及个人意思说明一下。

135号周自德：提议本问题不必付表决。

125号李希莲：提议修正方君之条文为“党员非经总理许可不得加入他党”。

155号王恒：反对方君之提议。

50号黄季陆：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相对的赞成，以为党员跨党一层，应有一种明文规定。盖既入此党，又加入他党，认为这种事情应有一种适宜之规定。

24号李国瑞：赞成汪精君卫之意思，对于党员加入他党不应加以限制。

主席：请廖君发言。

140号廖仲恺：登坛发言，略谓：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

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

主席：现请林君森主席。本席要发言。

主席团林森主席。

主席团胡汉民：登坛略谓：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之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在纪律已定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

39号毛泽东：请付表决。

主席：在付表决。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五号

主席：现在提案人已将提案旨趣说明，按照报号发言顺序，请何代表世桢发言。再者，本来午后开会，主席团原推定李君守常主席，因李君未到，故由本席主席，现李君已经到会，且本席下午尚有他项要事情请假半日，仍请李君主席可也。

主席汪精卫退席。

主席团李守常主席。

151号何世桢：登坛略谓：本席为政纲原案中关于教育一条之第二项有补充修正，条文为“国家对于全国男女学龄儿童负教育上之绝对义务不得使人民因贫苦而失受教育之机会”。请大众讨论公决。

主席：何代表对于政纲中教育一条之第二项提出补充修正条文，有附议者，请举手。（附议者在10人以上。）

13号刘伯伦：何君提出之补充条文，拟加入何处？是否主张加入政纲？

主席：何君谓补充原案。

3号王尽美：加入是加入，补充是补充，请主席注意。

4号沈定一：综校胡、何二君之言，不过一句话可以包括，所谓“教育机会均等”罢了，用意未尝不善，但是宣言在本会期中已经通过，修改政纲，惟总理有此权衡。本席主张，仍照先例将胡、何二君之提案均予保留，俟明年大会时再附议决定可也。

主席：现在王代表发言。

3号王尽美：本席意见与沈代表同，倾沈君已说得很透彻。本席以为政纲已经通过，不能改变，主张将胡君提案交付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留，明年大会时再提出附议。

主席：大众对于沈代表定一之主张有无讨论？（众谓无讨论。）

沈代表主张将胡君提案保留待明年大会再议，有附议者，请举手。（附议者在十人以上。）现付表决，赞成将胡君提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留待明年大会再议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4号沈定一：本席尚有声明，请将何代表世桢所提补充之条文一并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留待明年大会再议。

主席：以沈君之声明宣告之何代表提案一同保留。

主席：现议第八案“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编制五权宪法草案并先由本党实行”案。请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

25号李宗莲：登坛说明提案旨趣毕。并声明现当军政时代，尚不能实行五权宪法，唯应先从事编制，以为日后之用。

124号夏曦：反对李君提案。谓此于宣传上并无益处，且现在编制五权宪法，因时代之关系，于将来实行五权宪法时亦无用处。

134号李宗莲：赞成李君提案。谓贯彻吾人之主张，完全达到目的，即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且现时革命之历程分三个时期：一、军政时期；二、训政时期；三、宪政时期。如得一城一地之后，军政完了，即施训政，设根本大法，尚无准备，将从如敷衍？至宪政时期，又更不待言矣。若当三权打破之余，五权又未产生，试问中国大局呈何景象？请大家注意国家大计，成立此案。

116号李次宋[菜]：此问题很大，如果组织五权宪法起草委员会未尝不可，即由本党实行，本席认为不可。

主 席：李君已自行声明，现当军政时代不能实行，而党务审查委员会报告中亦于此案加有按语，谓军时事[事时]期中不能实行。请大众注意。

124号夏曦：如编制一种五权宪法说明书，作宣传之用，本席亦赞成。

27号张秋白：此案属于法律范围，不必在大会讨论，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法律委员会拟议办理。

主 席：现在关于此案讨论之结果可分三点：一、即组织起草委员会编制五权宪法草案；二、现在可以不必起草，仅将五权宪法之意义，为现在之宣传材料；三、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法律委员会拟议办理。现将第三说付表决。赞成提本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法律委员会拟议办理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 席：现在谭代表熙鸿有临时动议提出。请谭君说明动议旨趣。

41号谭熙鸿：登坛略谓：本席动议提出此案与今第议事日程第十一案石代表所提“本代表大会对于海外同志为国为党奋斗应有一种诚恳表示案”同一理由。我们自革命以来，广东人民因革命而受经济上之牺牲为数甚大，而广东人民对于本党政府热忱输助，一无怨言。所以本席主张本代表大会对于广东人，亦应有一种诚恳之表示。

主 席：现在谭君已将动议旨趣说明，请问谭君用何方式表示？

41号谭熙鸿：用电文表示。请主席交秘书处拟稿，以文字表示本大会对广东人民感谢之忱。

主 席：谭代表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广东人民，表示感谢之忱。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 席：现议第九案“上海、香港、广州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案”。请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

71号刘芦隐：登坛说明提案旨趣毕。并请将本案交中央执行委员

会酌定办理。

主席：现有18号赵代表卫平主张在江门一并设招待所，请赵君说明。

4号沈定一：本党对于华侨同志应该积极联络，此为应做之事，无所用其讨论。请主席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付一表决可也。

18号赵卫平：登坛说明江门应设一海外同志招待所，主张在刘代表案内加入“江门”二字。

188号许卓然：江门既要招待所，而厦门地方甚为冲要，亦应设一海外同志招待所，本席以为广州既有招待所，江门似可不必再设。

主席：尚有主张在哈尔滨、宁波、旅顺、大连亦均设立招待所者。

104号陈璧君：本席以为江门固应设立招待所，本席亦甚赞成，若谓广州已有招待所，江门即可不设，实不尽然。

180号许卓然：本席不是反对江门设立招待所，不过本党既为便利海外同志起见，设立各处招待所，即应因地制宜，平衡办理，厦门一带来往之海外同志为数甚多，尤不能不设立也。

主席团汪精卫：设招待所原不必限定何处，现在我们不过决定一个大体，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视经济上能力如何，斟酌办理，将来越多越好，对此际[际字衍]于设立场所无须预为限定。

41号谭熙鸿：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事，可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酌核情形办理，不能谓何处当设，何处不当设。

64号刘士木：本席赞成汪君之说，处处都是应行设立的。

49号周仲良：本席意思，招待所事，凡属特别区域，应归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其他各省归各该省自行办理较为便利。

25号李希莲：本席意思，只要各处招待员负责尽其职务即可，否则，虽有招待所，仍属无益，且华侨同志之回国者，亦不能决定每年究有若干人？应否设立招待所？实有研究之余地。

主席：赞成汪君精卫之主张，将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案（不限

定设立场所) 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量度财力办理者, 请举手。

(大多数) 可决。

主席: 现在议第十案“建筑上海党所及招待所案”。请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

142号黄咏台: 登坛说明提案旨趣毕, 并请通过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酌定办理。

104号陈璧君: 赞成本案。

110号黄右公: 主张将本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办法举办。

主席: 以黄代表右公主张, 咨询有无附议? (附议者在十人以上。)

主席: 现付表决。赞成黄代表咏台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办法举办者。请举手。

27号张秋白: 本席主张今天即将本案通过。

主席: 现已付表决。赞成建筑上海党所及招待所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办法举办者, 请举手。(大多数) 可决。

主席: 现议第十一案“本代表大会对于海外各同志为国民党奋斗应有一种诚恳表示”。请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提案人石代表瑛因[因字衍]请假。)

4号沈定一: 此案石代表已有书面印布, 甚为明白, 不必再用口头说明。请大众阅过, 即付讨论可也。

26号狄侃: 请大众注意, 本案不是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事, 说办就办, 要表决就表决。

27号张秋白: 本席意思, 可电致广东人民, 诚恳表示。电文办法, 请主席交大会秘书长拟一电稿, 以文字表示, 拍致海外各同志可也。

4号沈定一: 石代表原案上已列有办法, 就是这个办法恐大众尚未细看。请主席付表决可也。

主席: 现付表决。赞成本案用电文作诚恳表示者, 请举手。(大多数) 可决。

主席：今日议事日程所列各案均已议完，尚有程代表潜提出“募特别捐以储本党基金并决定基本[?]独立案”。现请程代表说明。（程代表潜因事缺席。）

24号李国瑞：程代表既缺席，本案改列入明日议事日程再议可也。

主席：施代表尚有临时动议，提议抚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族。即请施代表说明提案旨趣。

58号施正甫：登坛说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族抚恤案旨趣毕。

4号沈定一：本席对于施代表之提案完全赞成。但于“抚恤”二字用之于先烈遗族不敢赞同，因“抚恤”二字完全为帝国时代之专制名词，决不能加诸死难先烈之遗族。今有两种办法：一、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实调查七十二烈士之遗族；二、确实调查之后，对于年少者给以教养，对于中年者安置工作。总使烈士遗族得到教养和工作的机会，如此办法较为妥当。

主席：查党务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内尚有韩代表麟符提议调查各地死难先烈于某地点纪念表彰，并由本党党员集捐抚恤其家属案，审查会决定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案与此案性质相同，可否与此案采同一办法？（众谓可采同一办法。）

主席：施君提案与党务审查委员会报告内韩代表麟符提案采同一办法。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

主席：尚有地方报告。现请周代表仲良报告贵州省政治及党务状况。

49号周仲良：登坛报告贵州省政治及党务状况毕。

主席：现在议事已毕，宣告散会。

时五时十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5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六号

主席：现在按照议事日程，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暨中央监察委员。本总理前要大家推选，每代表10人，用连记法推选中

中央执行委员24人，乃有几处未有推选。现据各代表推选之人，由本总理提出当众报告，请予通过，其中有二位是我们老同志。现在欧洲留学二位，一是邓家彦，一是邵元冲[冲]。现在外省，一是石君青阳，一是张君静江。此四位是我们加入的，其余都是各代表所推选者。兹将得票最多者提出宣布，请公决通过。又，中央监察委员人数现定为5人。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赞成中央监察委员5人者，请举手。（大多数）又，中央执行委员240人，连本总理共为250人。赞成这250人之人数者，请举手。

（大多数）又，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赞成这17人之人数者，请举手。（大多数）

主席团胡汉民：朗读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毕。

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 继、谢 持。

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 正、戴季陶、林 森、柏文蔚、丁惟汾、石 瑛、邹 鲁、谭延闿、覃 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傖、于树德。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莘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主 席：现在逐一提付表决。中央监察委员五人，如名单。赞成者，请举手。（全体）可决。

主 席：中央执行委员24人，如名单。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 席：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如名单。赞成者，请举手。（多数）可决。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

一、决议案

1. 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组织问题案

民国十三年1月31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设下列各机关：一、秘书处；二、组织部；三、宣传部；四、工人部；五、农民部；六、青年部；七、妇女部；八、调查部；九、军事部。

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应设一秘书处及八部。上海、北京、汉口三处执行部不设军事部，关于军人军事事项，应由调查部秘密处理之。其余四川、哈尔滨两地，应分设各部，俟中央委员到该地体察情形后，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2. 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

民国十三年1月31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 监察委员拟定驻地如下：

甲、驻粤监察委员（名略）。

乙、驻沪监察委员（名略）。

丙、驻京监察委员（名略）。

2. 监察委员会设在广州，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

3. 监察委员专监察各地党部及党人行动调查事，并列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各地执行部。有地方执行部不能解决者，必须提交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4. 上级机关监察委员，对于下级机关有发出训令之权。

5. 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

3. 党部常务会定期案

民国十三年2月6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1. 常务委员会议定每日开会一次，时间上午十时至十一时。

2. 中央委员会会议每星期开会两次，时间为星期三、星期六下午七时至十时，地址星期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星期六在大本营。

4. 对外问题态度案

民国十三年2月1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甲、收回租界问题；

乙、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

丙、自管关税问题；

丁、庚子赔款问题。

理由：

本党宣言中对于以上四个问题已有明白表示，各地党部应该如何宣传及运动，亟须预备进行方法，并应如何整齐各地党员之行动。

决议：

(一) 先搜集以上四个问题之沿革及现在中国所受之影响，编成各种出版物，向全国人民宣传，使之了解本党宣言所以规定四个问题之原因，并本党在国民革命中所负之责任，且使人民知道欲解决以上四个问题之困难，必要国民党成功方有希望。

(二) 组织对外委员会担任(一)项责任，同时推定邹鲁、于树德、廖仲恺三同志为对外委员会委员。

(三) 对外委员会用对外委员会名义聘请专门家为对外委员会委员，共同组织对外委员会。

(四) 关于以上四个问题之出版，限一个月內编成。

5. 对广东政治财政统一问题案

民国十三年2月1日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理由：

广东为最高党部所在地，与全国革命有极大关系。目下广东政治、财政未能统一，亟应设法统一，使吾党革命根据地趋于巩固，方能全力以策全国革命之进行。

决议：

以中央党部名义建议于本党总理。

二、附录

一、据《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史料》：国民党一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即1924年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下列机构，组成中央党部，其组成如下：

(一) 秘书处

(二) 组织部 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谭杨均为中共党员）。

(三) 宣传部 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

(四) 青年部 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

(五) 工人部 部长：廖仲恺；秘书：冯菊坡（中共党员）。

(六) 农民部 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林、彭均为中共党员）。

(七) 妇女部 部长：曾醒；秘书：唐允恭。

(八) 调查部 部长：（未定）。

(九) 军事部 部长：许崇智。

二、1924年1月31日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由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前往组织，并规定各执行部所辖的区域。实际上，建立的只有北京、上海、汉口三个执行部，其成员如下：

(一) 北京执行部

组织部长：李大钊；宣传部长：马叙伦；学生部长：于树

德；妇女部长：褚松雪；工人部长：丁惟汾；农民部长：谭熙
鸿；调查部长：王法勤。

(二) 汉口执行部

组织部长：林祖涵

秘书：李实番

干事：李能至、许白昊。

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未到任）

秘书：（未定）

干事：项德隆、杨德甫

青年部长：覃振（未到任）

秘书：李廷铿

干事：林育南、杨继肃

妇女部长：覃振（未到任）

秘书：杨道馨

干事：夏之栩

(三) 上海执行部

1. 秘书处

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傖、汪精卫。

文书主任：邵元冲（邵未到任前由毛东泽代理）

书记干事：叶纫芳

录事：向昆

会计庶务主任：林焕廷

庶务：周雍炆

录事：刘其渊

2. 组织部部长：胡汉民

秘书：毛泽东

统计登记干事：郑观

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

录事：陈德征

3. 宣传部部长：汪精卫
 秘书：恽代英
 检阅本国报纸干事：韩觉民
 检阅外国报纸干事：张君谋
 宣传指导干事：施存统、沈泽民
 录事：曾繁彦
4. 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
 秘书：邵力子
 调查干事：邓中夏、王陆一
 办事员：刘伯伦、王荷波
 录事：帅功
5. 青年妇女部部长：叶楚傖
 秘书：何世楨
 助理：向警予
 录事：费公侠
6. 调查部部长：茅祖权
 秘书：孙镜
 调查干事：周颂西、喻育之
 录事：周渭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

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选举结果

18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210人；主席汪精卫。
 主席报告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结果：
 （执行委员）汪精卫249票，蒋中正248票，谭延闿248票，
 胡汉民248票，谭平山246票，宋庆龄245票，陈公博242票，恩克
 巴图237票，于右任234票，程潜234票，朱培德231票，徐谦224
 票，顾孟余222票，经亨颐218票，宋文子211票，柏文蔚201票，
 伍朝枢200票，何香凝200票，丁惟汾197票，林祖涵196票，戴季

陶 196 票，李济琛 196 票，李大钊 192 票，于树德 190 票，甘乃光 188 票，吴玉章 186 票，李烈钧 184 票，陈友仁 184 票，王法勤 179 票，杨匏安 17 票，恽代英 172 票，彭泽民 170 票，朱季恂 166 票，刘守中 159 票，肖佛成 149 票，孙科 141 票，（候补执行委员）白云梯 201 票，毛泽东 173 票，许楚魂 172 票，周启刚 170 票，夏曦 168 票，邓演达 167 票，韩麟符 165 票，路友于 165 票，黄实 163 票，董用威 162 票，屈武 162 票，邓颖超 159 票，王乐平 158 票，陈嘉佑 158 票，朱霄青 157 票，丁超 155 票，陈其瓌 155 票，何应钦 151 票，陈树人 142 票，褚民谊 141 票，缪斌 133 票，吴铁城 111 票，詹大悲 84 票，孙科 58 票，（监察委员）吴稚晖 226 票，张静江 225 票，蔡元培 204 票，古应芬 203 票，王宠惠 179 票，李石曾 179 票，邵力子 173 票，高语罕 167 票，柳亚子 158 票，陈果夫 157 票，陈璧君 155 票，邓泽如 135 票，（候补监察委员）黄绍雄 176 票，李宗仁 167 票，江浩 159 票，郭春涛 158 票，李福林 153 票，潘云超 149 票，邓懋修 148 票，谢晋 130 票。

（《政治周报》6.7 期）

3. 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

戴朝霖

我于 1919 年考进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担任过北京学生联合会所办日刊的主编。日刊编辑部设在北大文科大楼，这样，我就有机会经常同李守常（大钊）老师接近。1923 年秋，国民党筹备召开“一大”，守常老师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他让我以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主任和新民国杂志会编辑的名义随同南下采访，因此，我得以随同守常老师一起去广州，亲历“一大”的某些活动。

到上海乘船南下

当时，北京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会

议，只能秘密行动。我们都是各自购票乘车，分批动身。我比守常迟走两天，先乘车到天津，再换车去上海与他会合，然而一闻乘海船南下广州。那时船比较小，速度很慢，到广州时，已是1923年的年底。

守常老师住在长堤的东亚酒店，我陪他同住一个房间。行装甫卸，中山先生便打发侍卫来请守常老师去谈话。以后，过不了几天就约他前去，有时谈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我曾问过他：中山先生找你谈什么呀？他说，主要谈大会宣言及改组国民党和创办军校的事。

毛泽东同志当时也住在这家旅馆，他不时来看望守常老师，对守常老师很尊重，有时很晚很晚也要来谈一阵。那时他年纪很轻，头发蓄得比较长，着长袍，有时也穿马褂，神态潇洒，气宇轩昂。

蒋介石也来看过守常老师。记得那天我正陪着守常老师在客厅吃桔子，蒋介石进来了，我略事周旋便退进了卧室。他完全是一副军人神态，言谈很拘谨。蒋介石走后，守常老师告诉我，是中山先生要他来商量办黄埔军校的事，他当时任中山先生大本营的参谋。

讨论宣言草案

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是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顾问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经中山先生审定，再提请大会讨论通过的。作为记者，我有幸列席了讨论宣言草案的几次会议。

会议在东山鲍罗廷的寓所举行。每次开会，鲍罗廷坐在客厅一端的中央，前面摆一张条桌，瞿秋白坐在桌子的一侧担任翻译。客厅的另一端，靠墙陈设着一套沙发；中间的一大块空地，摆了二十几张凳子。会议开了三天，参加的人除鲍罗廷、瞿秋白外，记得还有于树德、韩麟符、毛泽东、于方舟、夏曦、谭平山、李大钊、廖仲恺、戴季陶、傅汝霖、林伯渠、汪精卫、王法勤、谭鸿熙（常坐沙发上）等人。鲍罗廷就重点作了一些说明，

然后由大家发言，记得发言较多的有守常老师、汪精卫、王法勤、毛泽东等人。会后回到旅馆，我曾问过守常老师：实行三大政策，中山先生有这样大的决心么？他说：孙中山先生一心为公，襟怀豁达，他寄很大的希望于我们共产党。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守常老师对中山先生的尊敬溢于言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会上的小风波

国民党“一大”每次开大会，都由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他坐在讲台正中，前面桌上摆一个大铃，当维持秩序或制止喧哗时，他拍着铃子叮当叮当作响，会场便立刻宁静下来。

大会讨论宣言草案时，产生过争论。因为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如谢持、居正、张继等人，反对三大政策，特别是反对“容共”。但他们慑于中山先生的威望，都不敢公开出面，于是便怂恿冯自由出来当“大炮”。冯在大会上曾发言三次。廖仲恺听了立即起来驳斥。廖讲的是一口广东话，别人很难听懂，由胡汉民用普通话复述一遍后，博得了大家的掌声。冯自由第三次起立发言时，刚讲了几句，中山先生就很不客气地把铃子拍打得叮当直响，大声喊道：“冯自由，你坐下来！”接着简单地批驳了几句。冯只得乖乖的坐了下来。

讨论宣言草案的最后一天，坐在大厅中央的张知本也起立发言了。他也是反对三大政策，同样遭到中山先生的制止。从此，再没有人敢出来唱反调，大会顺利地通过了宣言。

（《团结报》1984年1月28日）

(三)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1.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建立

北京执行部报告书

第一项：北京执行部成立及改组之经过

北京执行部自十三年4月20日成立后，即在本京织染局29号租定房舍一处，分设各部办事处，开始办公。当时因规模过大，经济困难，曹吴极端压迫，横捕张国焘诸同志，以及石委员瑛辞职、李委员大钊被迫出京诸情形，各部强半停止办公，惟秘书处常务委员会，仍寻觅秘密地点，指挥各省市筹备员，秘密进行，筹设各地党部。适十三年7月，党内发生风潮，在京中央执行委员皆赴广州。开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执行部仅留秘书一人，与各省通讯，因经费毫无着落，所租办公房舍，亦经辞退，重要党务暂归停顿。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驻京中央执行委员，由粤北来，因政变关系，交通梗塞，至11月始得抵京。当时由于委员惟汾带回经费600元，稍还旧欠，此后中央虽允月给600元，但未陆续汇寄，故执行部仍只设秘书处，其办理秘书处事务及文件者，只有一人。办公地址，仍未能租定。直至本年2月20日，因总理来京，北方党务有急速发展之趋势，同时在各地党部服务之职员亦皆纷纷来京。北京执行部，必须速设办公地点，以维党务，遂经汪委员精卫由总理旅费项下拨给经费。自是执行部遂租定本京翠花胡同8号为办公地址，北京市党部，则附设于同地址之后院。然因经济关系，所谓执行部，仍只设秘书处，由常务委员（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办理日常党务，其余各部终难恢复，即房租一项拖欠常至数月。迨至本

年11月底为止，尚能勉强维持原状。此即北京执行部成立，以及改组经过之大略情形也。

第二项：组织及职员姓名

北京执行部最初成立之时，其组织及职员姓名如左，（附北京执行部办事通则）

（一）秘书处

常务委员，丁惟汾（会务），王法勤（党务通信）、石瑛（财务）。

文书科，主任傅汝霖，助理余惟一，何孟雄，录事管涤我。

会计庶务科，主任刘范祥、录事孙鼎元

（二）组织部

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统计登记路友于，组织指导陈兆彬。

（三）宣传部

部长马叙伦，秘书邹德高，阅中文报纸王振钧，阅西文报纸许式己，教育宣传指导朱务善。

（四）青年部

部长于树德，秘书邓飞黄，助理陈铭德、张苇村。

（五）工人部

部长丁惟汾，秘书张昆弟，助理王尽美。

（六）农民部

部长谭仲达，秘书张伯根，助理张畴。

（七）调查部

部长王法勤，秘书潘云超，调查刘月、延瑞祺。

（八）妇女部

部长褚松雪，秘书缪伯英

由十三年11月起，北京执行部组织及职员姓名如左：

秘书处：

常务委员 3 人，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秘书 1 人，路友于。书记 2 人，李朴国（至 5 月换谭祖尧）、王冬珍。庶务 1 人，郭士芬。

以上为北京执行部自成立以迄现在之组织及职员姓名。

第三项：党员人数

计北京执行部所辖为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哈尔滨、晋、甘、新，共十五省区。兹分述于下（11 月为止）：

北京：2600 人	直隶：1500 人
山东：2500 人	河南：3000 人
山西：400 人	甘肃：300 人
奉天：300 人	热河：800 人
内藏古：800 人	察哈尔：400 人
绥远：400 人	吉林：20 人
哈尔滨：200 人	黑龙江：无确数
新疆：无确数	

共计约 14000 人

（说明）北京执行部规定，凡各省市党部领取党证之多少，须以缴到愿书之数为凭。故此时若依执行部所发出之党证计算，各省市党员人数当较上列表内数目为少。惟事实上，北方自曹吴以迄现在，无一日不在反动军阀压迫之下，即函件亦无一日不在必受检查之中，因之，各省市愿书多半未缴，党证多半未领，且河南党员人数约有 3000，而该省党部并未缴送愿书，亦尚未领取党证一枚。故上列表内数目实较党员确数尚少。

第四项：财政状况

北京执行部经费开支，自十三年 4 月起，至同年 10 月止，概归财务委员石璞负责，因石委员去职时，对于执行部常务委员，并无交待，故十三年 10 月以前之财务状况，执行部现在无从报告。惟概括言之，则执行部初次成立时，除收到中央数次汇款开

支本部一个经费，及发给各省区党部三个月或四个月的经费不等外，即陷于经济困难而已。

自十三年11月起，于委员惟汾由中央带回600元，（开支另有详细帐目及对照表）。

十四年2月汪委员精卫及邹委员鲁先后拨交经费5100元，同年10月李国宣由中央带来经费4000元（毫洋4000折洋3184元）。

以上为自十三年10月起，北京执行部由中央所领到经费之概数。

（说明）总理至津时，曾特派宣传员分赴北京执行部所辖各省区宣传国民会议，共支路费4000元，当时已另行报告，不在执行部开支之列，故不列入。

又除上述经费外，执行部于十四年6月起，至11月止，由各处捐来洋5702.75元。

计自十三年11月起，合中央发给经费，及执行部自捐之款，共计约洋15000元。就中分给各省区党部约5000余元，捐助各团体爱国运动，共计约500余元，大宗宣传品印刷费，共计约千余元，执行部办公印刷旅费，员役津贴各费，共计支洋约7000余元，迨至现在，如上总计实在亏空300余元，（收支洋细数目，另有清帐，及对照表）。此亏空之数，尚无着落。执行部12月开支无着，北京特别市党部需款尤急，各省区党部迭来催款，亦无以应。此执行部本年以来，财政状况之大概也。

第五项：集会纪要

北京执行部内原分四种会议：（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二）各部联席会议，（三）各部会议，（四）常务委员会议。此外，则为与北京特别市，以及北京特别市区党部区分部，及各党团之联席会议，今分别简载如左：

驻京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自十三年以及本年4月，共开会49次。自本年4月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反动分子齐集北京，每一

次会议之内容，无论如何严重，辄被会场内之反动分子洩漏于外。如邓家彦等且竟公然以谈话形式，在帝国主义者之喉舌，顺天时报上，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重要决议案，信口发表。因此，自北京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关于党务上之重要事宜，多在政治委员会讨论，由党务委员会执行，盖为避免反动分子之捣乱之故也。各部联席会议，仅在十三年4月，北京执行部成立之始，开过三次，各部会议亦然。至执行部与市党部等之联席会议，则迄至现在，每群众运动，事先必举行几次以讨论如何领导，如何组织。又因北京处于极端的反动势力之下，全市党员大会，不易召集，此项联席会议，尤感重要，故召集次数为最多。至北京市全体党员大会，由北京执行部召集者，计举行十余次。第一次为十三年五五纪念，最末者为本年9月12日北京市党部追悼仲恺同志大会。中间经过欢迎总理，恭祭总理，以及参加各种群众运动，已载迭次报告中央文件中，兹不赘录。

除以上诸种而外，所有由北京执行部临时组织之集会，其工作较好者，约有四种。一为十三年10月所组织之筹备欢迎总理委员会，一为同年11月所组织之宣传训练委员会，（系为训练由京赴各省区之特派宣传委员而设者），一为最近之交通委员会，（系专为应付最近政变，在北京秘密活动传达消息者。）

第六项：来往文件（函件与通告等）

北京执行部，自成立以至现在，常在经费困难之中，故除间有中央发来之电报而外，自本执行部发出者甚少。所辖各省区党部，经费尤窘，故无来电。至函件通告，则有去年（十三年）以至同年底，为数较少，因彼时曹吴压迫过甚，党务邮件不能传达，只能由来往可靠同志，口头报告，驻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录，并经议决，绝不印刷分配，其议案中，有关于各省区党务者，则分别择要，用秘密方法，及代名函稿通告。自十四年3月起北京执行部始有固定之通信地址。同时中央各种函件通告，皆能寄到。（十三年中央所寄邮件，强半不得收到），惟由北京直

寄中央函件，则常被检查收没，重要报告，不敢邮寄，而直鲁热东三省各省区之函件，则至现在尚难传达。兹择要汇报如左！

第七项：宣传工作

北京执行部最初成立时，曾由宣传部拟具宣传计划书，交驻京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并经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但因经费关系，并未实行。自总理来京后，一方由执行部，自募少许捐款，一方由总理旅费项下领取一宗印刷费，同时转派宣传委员，分赴各省区宣传国民会议，对于北方民众，始稍收宣传之效。

至党设机关报，则除北京民国日报出版不久即被封闭外，执行部迄未能办到出一周刊或日报之目的。其在北京党员自由所创办之出版物，国民周报，冲锋周报，实践旬刊等，亦皆因经济关系，或中道停刊，或材料不丰，于宣传上工作效力甚少。至所辖各省区党部之出版物，如山东之十月刊，哈尔滨之平民周报，河南之每周通讯等，亦皆因经济竭蹶，中途停版。新民国杂志，本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发款，现亦停版。最近北京一部分同志，创办国民新报，为党宣传，执行部正在设法就原有基础，加以扩充。

除此以外，北京党员，每逢群众集会，常得利用机会，公开讲演宣传本党主义。惟此种讲演，并非定期，本年春，上海民智书局寄来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凡在京各学校各机关及团体，皆由本部分酌赠送一份，并发报申明，京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如具公函索取，即行邮赠，收效颇大。兹将北京执行部关于宣传方面之印刷品，汇报如左！（中略）

第八项：指导或参加群众运动工作

北京方面之群众运动，在十三年一年中，皆为学生运动，自本年五卅惨案发生，始渐趋于市民运动化。在十三年一年间，于五七、五九，以及双十警告节，诸纪念日而外，北京方面无重要之群众运动可记。而当时领导上述诸种运动者，皆为北京学生联

合会，该会分子强半为本党同志，一切工作皆有成绩；然因当时执行部及北京市党部组织，均不坚强，（详第一项报告及北京市党部报告中）。故十三年一年间，北京方面之学生运动只能谓为北京学联合会中之同志所领导，不能谓为党部所领导。自本年五七国耻纪念日起，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成立，所有一切北京群众运动，始渐归北京执行部所主持。其最要者自五卅惨案起，北京执行部即由在京党员中指派同志18人，用各种团体名义，与北京其他各界接洽，发起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案同胞雪耻大会。该会于6月5日组织成立，举出临时执行委员30人，负责办理一切，其中有本党同志20余人，故该会一切活动俱受北京执行部指挥。该会成立后，连开三次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为6月14日，到会者10余万人，主席为李石曾同志。第二次大会为6月25日，到会者10余万人，本党党员俱在北京特别市党部旗帜之下，自成队伍，主席为于右任同志。第三次大会为6月30日，到会者5万余人，是日大会专为广州沙基惨案而召集，到会者并有国际工人后援会代表，（德人）印度代表，日本劳动联合代表，朝鲜台湾各民族代表，主席为顾孟余同志。雪耻大会，除召集上述三项大会外，并在天安门搭讲演台，每日派人讲演。至北京学联合会，在此期间，除加入雪耻大会，共同领导群众外，并单独领导北京各团体，作过两次示威游行。一为6月3日，一为6月14日，皆有群众在5万人以上。在上述数次大会中，在京本党党员皆能踊跃参加，努力分配宣传品及担任指挥诸种工作。至参加大会之群众，除学生外，工人最多，商人次之。最近自双十警告节起，北京群众运动始渐趋革命化，双十警告节之日，北京执行部及市党部除分发“对于工会问题之宣言”，及“为第十四次双十警告节告全国民众”数种宣言外，尚预备传单多种。是日在天安门开会，主席为于树德同志，到会者5000余人，本党同志登台讲演者甚多。对于段祺瑞之卖国政府，及屠杀群众之奉系军阀，尽量暴露其罪恶于群众之前。预定演说者尚未及半，突有大队武装警察

蜂拥而至，将讲演台推翻，用枪柄刺刀殴击群众，遂起冲突，本党同志受伤者数十人。继之为10月16日之欢迎广东外交代表团大会，及10月25日、26日两日之天安门关税自主运动大会。北京执行部分发“广东真相”小册子及“对于关税会议之宣言”数万份，至最近11月22日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本党同志益加努力，全体动员。是日于树德同志因担任副总指挥冲锋前进，两次被军警殴击，头破血流，受伤极重。其余同志受伤者数十人，群众激昂，势不可遏。同月28、29日，举行革命运动在京党员，均全体动员。28日包围执政府驱逐段祺瑞。29日开国民大会，群众皆达万余人，通过北京政府委员会预定议案，（一）即日在北京组织国民委员会政府。（二）此国民委员会政府之任务，对内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对外谋国际平等，更须召集国民会议。（三）由国民会议组织正式国民政府。此三次大会总指挥兼主席为朱家骅，副总指挥兼副主席为于树德，朱家骅系同志，于树德系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在各团体筹备会中，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为主席。（代表朱家骅）北京执行部为事股主任，（代表于树德）故本党在三次大会中，均居领导地位，三次运动，青天白日，遍布街市。经过三次大会后，计在京新加入之党员，迄现在为止，已有百余人。此年以来，北京执行部，指导或参加群众运动之大略情形也。

第九项：工作之成败得失与社会

所受之影响若何

自北京执行部成立迄现在，为期已一年有半，因反动势力之压迫与本身组织之不强，所有工作进行处处感觉困难，而经济不给尤为困难中之困难，因经济不给，致党部活动之能力减少，指挥不便，党员之活动遂不能完全统一，工农全体之组织遂不能着手进行。执行部所属各省区各级党部，情形亦复相同。惟概括言之，在十三年一年中，吾党在北京方面之群众运动工作，完全为秘密的从中主持，不能公开的居于领导地位。自本年起，本党在

北京之群众运动工作，已取得领导地位。所有示威运动之行列，十之九，皆以本党党旗为先导，且十之九皆有本党同志为领袖。除少数商人外，多数群众，不但对此不起反感，且逐日增加其信任之程度。所属各省区党部，则因所处形势之不同，或以在公开，或迄今犹在秘密，然对于所有该地方之群众运动，已强半能居于主动地位。至社会所受之影响如何，则除绅商及官僚政客军阀而外，凡北京执行部所辖各省区之民众，皆已对本党有相当之认识，国民革命已成为惟一有力量之呼声。就中如直豫鲁热察绥内蒙各民众要求国民革命之程度尤甚。（各省区党务概略，另有报告）

除此而外，两年以来，本党自身之组织，尤未达于坚强之地位，实为今后最注意之问题。此种现象，以北京为最甚，北京党员，本届北京市党部未改选以前，组织训练，十分欠缺，反动分子复从中破坏纪律，故发生总理时，一在北大第一院设筹备处，一在中央公园设筹备处。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时，一在虎坊桥，一在江西会馆。正在对抗英日惨杀同胞时，既有北京学联合会，复有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之现象。此数种组织中，前者皆承受北京执行部指挥，后者则自由活动。至最近复有西山会之发生，以上种种，颇与社会上以不良之印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月刊》第10号）

2. 迎接孙中山北上与国民 会议促成会

孙文决定北上致冯玉祥等电

（1924年10月27日）

北京。冯焕章、王孝伯、胡律孙、孙禹行先生鉴：义旗聿举，大煞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大计，亟须决

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孙文。感。

(广州国民政府档案)

大元帅孙中山北上命令

(1924年11月4日)

(1) 令之一

大元帅令

前以曹锟、吴佩孚祸国殃民，罪在必讨，故亲率诸军由韶入赣，以期北向中原，与天下共除残贼。连日迭接奉天张总司令捷电暨北京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孔岳诸将领来电，知曹吴所凭藉武力摧残殆尽，友军义勇奋发，海内闻之，莫不欣慰。此时余孽未靖，固当悉予扫除；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本大元帅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所有肃清余孽，绥靖地方一切事宜，仍责成留守暨各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妥善办理。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此令。

中华民国13年11月4日

(2) 令之二

大元帅令

本大元帅现因统一建设等要务启行北上，除仍由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外，所有大本营关于北伐事宜，着由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全权办理，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

此令。

中华民国13年11月4日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31号)

北上宣言

(1924年11月10日)

孙中山

本年9月18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州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錕、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党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方得充分发展。

(二) 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 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团结力之增长，有改善之机会。(四) 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 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益，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六) 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具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莘莘诸端，无繇实现。为谋目的之达到，不得不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之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逆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

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求逞，军阀亦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此，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

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30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者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

（《孙中山选集》下卷）

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1924年11月）

（一）

此次北京政变之后，在国内政象上，一方面表现出反直派在北方之胜利，将回复到直皖、奉直战前安福、交通执政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直系在中部仍保有其地位；同时，在外交上，一方面表现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能独力挟曹吴攫取全中国，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没有挟段（祺瑞）张（作霖）统一中国之可能。

（二）

帝国主义者宰割中国之企图，约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是所谓瓜分政策，由帝国主义的列强协议在华势力范围之划定，华盛顿会议以前，均属此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谓共管政策，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协力共同宰制中国，自华盛顿会议至今年

七月伦敦会议，均属此时期；——这两种政策，均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间在华利害之冲突不能成为事实，遂进入第三时期，即现在之分立政策。

这种分立政策，和第一期不同者，只是不取列强间协定形式及表面上避去瓜分之名，而实际上乃是帝国主义者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

独有后到的美国，一面因为其国内经济力特别优裕——余资、余货——之故，一面因为在中国尚未有独占的势力范围，遂极力鼓吹什么“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道威斯计划”，以图寻得相当的机会与工具——游移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外的军阀，达到其以经济力宰制全中国之野心。

(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此时不得不大声疾呼，警醒国民，勿固执从前的预料与恐怖，以为帝国主义者宰制我们只有瓜分与共管两个死板方式，应该觉察他们希图宰制我们别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计划。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之可能，其危险更迫在目前。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划之实现。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

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

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一一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此临时国民政府：（一）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危机而成立，自应不妥协的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之阴谋；（二）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至少也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方能得工农兵等民众的同情。

（四）

此临时政府如果成立，本党当然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中国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

（五）

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本党认定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责任，尤其是国民党之责任。要求如下：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

（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

（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回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

(四) 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取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

(五) 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 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 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 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

(九) 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

(十) 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

(十一) 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退伍士兵失业贫农及推广教育之经费；

(十二) 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 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向导》92期，1924年11月19日出版）

孙文今日午间来京

孙文来京宣传已久，因种种关系，迄今未成，段祺瑞特派公子宏业代表赴津谒孙，促即来京。孙当允于31日启行。段宏业当即电召乃父。同时汪精卫亦致电北京各团体迎孙大会，谓孙31日准入京，惟病躯不克演讲与谈话，请为谅解。执政府去铁狮子胡同顾宅设立筹备迎孙事宜处，即奉执政府秘书厅谕令妥为筹备孙文来京后，即以此处为行辕。并制备来宾谒孙入门证，凡拜见者，须在该处领取入门证，以便稽查。执政府已派许世英、曾毓雋、林长民为代表，于昨日（30日）下午四时，专车赴津迎迓。于孙抵站时，派梁鸿志秘书长率领侍从武官吴霖泉等代表欢迎。警卫总司令鹿钟麟与参谋长李兴中、王书箴昨已命令陆军第一师，今日上午十时派出步兵两连，一在车站迎接，一在孙住处警卫。又派军乐队一连赴车站迎接。警察总监李寿金已谕令内城警署，于31日派出长警一排，警备行辕。中央公园水榭迎孙大会，亦于昨日（30日）下午三时开各团体代表会议。由主席报告汪精卫来电后，当议决各案如下：（一）推举石淑卿女士为总代表赴警厅见李总监，请领徽章，并接洽其他事宜。（二）派代表携带欢迎传单10万份赴航空署，请于今日下午孙抵站时，派飞机2架，代为空中散布。（三）通知各团体学校于今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整队赴站。（四）本月秩序，由北京大学学生军警官学校武装学员担任维持。（五）散放“青天白日”之小红旗。20万面，欢迎人员手执一面。（六）欢迎会之所备欢迎传单百四十七种，共256万张，沿街散放。（七）孙抵站时，欢迎员高唱革命歌。（八）欢迎队前高揭白旗2面，皆书斗大黑字。（九）推举代表石淑卿女士等4人，入站慰问。（十）明日（1日）下午六时举行提灯大会。

（《晨报》，1924年12月31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今日成立

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日昨开第五次干事会。到干事20余人。当议决要案多起。其中最关紧要者为遵照去年12月27日代表大会议决案。谨于本日开成立大会一事。当场金谓本会所包含之团体既逾二百之数。而时事日亟。各地促成会皆已成立。本会业经筹备就绪。自应遵照大会决议。即日开成立大会。首都观瞻所系。筹备自不能不庄严整肃。特假北大第三院容数千人之大礼堂。妥为布置。门前并扎大彩牌楼。以壮观瞻。更为使国人明了国民会之真相起见。特请孙中山、段芝泉、汪精卫、许世英、李石曾、易培基、吴稚晖、于佑任、顾孟余、李守常、先生及各大学校长蒞会讲演。极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再该会章程及宣言业已由起草委员会拟就。本日提出大会通过云。

(《京报》，1925年1月4日)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进行

新闻编译社消息云，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传股，为使一般民众了解国民会议之利益，与促成国民会议之必要起见，特于昨日在虎坊桥办公处，开宣传股会议，议决请各名人举行讲演大会，并邀请加入各团体之团员，分组在各通俗讲演所及街市间，举行大规模之通俗讲演，该股为此事特致函各公私团体，请派讲演人员，兹录如后，

迳启者国民会议，为全体国民之公事，本会既以促成国民会议为目的，自应注重民众的宣传，以期获得强大之后盾，因此本会议决，除请名人在北京四城借会场讲演外，并举行通俗讲演。

(在通俗讲演所及他处)素仰贵团体热心服务如有愿任讲演者，本会极表欢迎，请先将人名住址，通知本会宣传股，以便分配时间地点为盼，北京国民会促成会启，

又该会宣传股，以前次报载，国民党派有宣传员9人，担任

北京市宣传事务，并闻此9人，即北京市党部委员，特备函商请通力合作，兹将原函录下，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诸先生鉴，阅报裁贵党部委员诸位，为北京市之宣传员，并闻将借各讲演所，举行关于国民会议之讲演，敝会宣传股，亦有此种计划，并拟筹备露天讲演事务，兹以彼此目的俱同，亟宜有所联络，拟请贵党部将贵处办理情形示知，在事务上或可互相扶助，又敝会宣传主旨，除详释国民会议外，并说明敝会之宗旨，与任务，倘贵部党宣传员，具有同情，亦希作一致之宣传，俾得民众之了解，而引起强大之后盾，国事前途，实利赖之，揣此并颂公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启，此外并闻该会已请定宣讲人为汪精卫、李石曾、于右任、李守常、王世杰、周鲠生、高一涵、杨杏佛、黄昌谷，诸先生，自昨日起，至20日止，每日下午二时，在北京大学，美术专门等处轮流讲演云。

至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进行，则自受津、鲁、察会之委托，办理全国联合总会筹备事宜之后，前日起，即已分别组织，开始进行，一切应办事务，甚形忙碌，

日昨中国回教国语推进会（系回教方面教育机关）世界语专门学校，及益群协进会，务本女子大学，京报馆，新闻编译社等各团体学校，已来函加入本会，而天津促成会，已有快函来京，响应京会虞电，不日选派代表来京，兹录其原稿如下，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钧鉴，虞电敬悉，京会应本会之提议，通电全国各会，着派代表赴京，组织总会之意，本会当首先响应，表示十分同情，除由本会着手进行一切赴会事宜外，合将此意先达，以慰远注，迩来进行状况如何务恳随时通知本会，再该会定于本月18日（星期日）上午在会所开全体委员大会云，

（《京报》，1925年1月17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讲演纪事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原定举行公开讲演大会五日，第一次已于16日在北大举行。第二次与第三次有17、18两日，分别在师

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佑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极受听众欢迎，兹略记其梗概于次：

李首详述葡萄牙荷兰等国势力东侵之历史，因英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甚，叙之尤为详尽。次则分析太平天国之事实，谓本系一般农民受帝国压迫而发生之国民革命运动，因帝国主义者巧为宣传，将人民之恶感集中于满清政府，帝国主义者自身则回避其锋，使蓬蓬勃勃之国民革命运动，竟变为狭隘的排满运动，帝国主义者初则阴遣教士暗助洪秀全，使战事扩大，以逐其挟制清廷任意要索之野心。迨所求既逐，则素被太平天国称为洋兄弟之外国人，一改其面目而化为戈登之长胜军矣。于是此最可注意之革命运动，竟以此而销毁。义和拳亦系受帝国主义者压迫过甚而起之反抗运动，然因其智识浅陋，手段不良，竟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酿成巨祸。至辛亥革命因鉴于义和拳之害，亦仅以倒满为唯一目的，对于外人力任保护，不敢有反抗的言论。现在孙中山先生看清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祸患，高树国民革命的旗帜，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相号召，全体国民都应在此旗帜之下努力备斗。最后李先生复郑重声明，谓现在有一般人，以为现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是义和拳思想之复兴，大为恐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现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仅仅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反对他们全体人员。孙中山先生在俄德退出侵略团体以后，即声言联俄联德，有一个时期曾极力帮助菲律宾的革命运动。可见孙先生是抱世界主义的人，他反对的仅为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以现在的国民革命运动和义和拳的运动，是大不相同的。

（《京报》，1925年1月22日）

记昨日国民纪念列宁大会加拉罕等之演说

（本报特讯）中华民国国民纪念列宁大会，昨日下午3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会场布置极为严肃。门首扎有五彩牌楼

一座，上缀“中华民国国民纪念列宁大会”数字。会场四壁，满悬布联，上书列宁遗言。讲台上设一列宁遗像，五色国旗及苏联国旗交叉其上，中置匾额一方，文曰‘列宁虽死而列宁主义仍存’。到会人数约在3000以上，除汪精卫、马叙伦、蒋梦麟等多人外，苏俄大使加拉罕及其随员十余人亦均莅会。由李守常主席致开会词，略谓今日为列宁周年忌日，我们今天开会纪念他的意义，因为他是世界革命指导者，同时又为东方被压迫者的良友。李氏致词毕，全场起立，由乐队奏演第三国际歌。次由赵世炎报告列宁事略，依序请加拉罕演说。略谓今日纪念列宁，不是纪念列宁个人，乃是纪念其生平伟大之事业。列宁事业为何？即领导被压迫民族打倒国际主义。一年以来，中国民众渐渐觉悟，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似将成熟。今日外报载有舒尔曼氏之演说，谓中国之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运动，实为苏联使馆之指使。此种错谬之观察，我们可勿置辩，明眼人自可了然。孙中山先生在沪发表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宣言，帝国主义者又指孙先生为过激派，此种腐败守旧不明世界大势的论调，与美使口吻都是一样。但是他们帝国主义者，亦承认不平等条约是应该取消，不过他附带的条件，就是要中国先成立有实力的政府。试问不平等条约不先取消，有实力的政府从何而来？此种欺人之谈，可不攻自破。我希望中国人民加倍努力，解除一切不自由的束缚，建设强国的民众政府云云。次由汪精卫演说，阐述中山先生之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多相符合，要实行民主主义，非打倒帝国主义不为功云云。依次马叙伦、蒋梦麟均有简单演说。演说毕，主席请全体起立，三呼“列宁主义”、“世界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五时半宣告散会。

（《京报》，1925年1月22日）

三团体招待民党纪事

前日下午一时，民治主义同志会，民生周刊社，大中公学数

百会员，欢迎民党要人于北京大学第二院宴会厅。计当日到会者有李烈钧、吴稚晖、邹海滨、谢无量、杨庶堪、陈敬修、徐谦、蒋梦麟、马叙伦、凌毅、王德（法）勳、杨杏佛、李大钊、王亚樵、杨德甫等数十人。首由主席袁世斌报告开会大意，继由邹德高致欢迎词，孔庆宗报告民治主义同志会、民生周刊社、大中公学之由来，关系工作及使命。……

李大钊报告前到俄国时，一般俄国人民学生，无不热烈慰问孙中山先生之身体事业，于此可见孙总理于世界革命人材之地位矣。并朗诵孙总理勉励同志词：“革命当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杨德甫等后报告其实身参与之革命运动。经过白雄远、谌少岑、袁正道、张和竞、王光辉等，均有极长演说。时已八点，来宾主人精神愈加焕发，惟为时过晚，乃宣告散会。

（《京报》，1925年2月23日）

国民会议后援会出现，应时团体层出不穷

中国青年协进会、苏浙皖三省旅京青年协会、北京妇女同志会等50余团体，发起组织国民会议后援会，以援助全国公团促成国民会议为宗旨，积极联络京中各公团协力进行。昨日继续加入该会者，有正谊通信社、华北大学学生会、浙江两级师范旅京同学会、青年励志团、华大平民教育委员会等十余团体。至正式成立大会日期，至迟在下星期以内，拟假中央公园水榭为会场，届时并拟请汪兆铭、邵瑞彭、吴敬恒、李大钊、汤漪等莅会讲演。已推定张维城等为筹备员，并推定董秋芳等为代表，于今日前往协和医院省视孙文病状云。

（《晨报》，1925年2月7日）

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启事

本会于24日开筹备会，业已决定28日（星期六）下午一时，假门前内中国大学开成立大会。并请汪精卫、李石曾、邵飘萍、

李守常诸先生及廖仲凯夫人、伍智梅女士、鲍夫人等演讲，届时望各界女士蒞场指导，如女界中有愿临时加入者，无论个人团体一概欢迎。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启。

(《京报》，1925年2月27日)

国民会议促成总会明日开幕

国民会议促成总会筹备处，日昨开第一次筹备会，到会各省市代表20余人，当议决：(一)3月1日上午九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行正式开幕典礼，由总务、文书、庶务各股，分途筹备牌楼、传单、广告等事。(二)敦请段祺瑞、赵尔巽、汤漪、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褚辅成、许世英、于右任、李协和、邹海滨、李守常、马寅初、蒋梦麟、章士钊、林长民诸人及各大学校长、教授、新闻记者到会云。

(《晨报》，1925年2月28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通告

本会筹备月余，响应遍于全国。各地已派代表来京者共计63省县。兹定于3月1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假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举行开幕礼，并敦请孙中山、段芝泉、汪精卫、李守常、吴稚晖、褚辅成等数十名人及执政府各机关、各法团代表演说，届时各界人士均可到会旁听。特此通告。

(《晨报》，1925年2月28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昨日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是日北大第三院门前高塔彩牌坊一座。上悬大会名称。两旁对联为一致促成国民的国民会议。努力建设民主的独立国家。自九时起，各地代表来宾及参观者均陆续到会。计各地代表89人，来宾20余人，参观者约800余人。先是前日总会已派人在各街市散发传单。说明今日开

会。故市民到者甚为踊跃。十时余军乐队奏乐。由顾孟余君主席。宣布开会，致开会词。略谓十四年来中华民族对内并未达到自由。对外并未达到独立目的。今日国民会议促成开会有三意义，一为人民之自由与权利应由人民力争，不应希求实力阶级之赏赐，二为人民不应怀疑自己实力，而应有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之坚定信仰，三为今日吾人要求国民会议实因国民会可团结全国人民为战斗与夺取权力之机关。今日之会为历史上国民自决运动之第一次有组织的表示，故吾人当努力以完成此历史的使命云。次由朱务善报告筹备经过。略谓总会筹备处自成立以来，至今2月，各地先后来函加入共同筹备者，计有75处。各地代表抵京向本会报到者，共80余人。现在各省除云南贵州黑龙江新疆青海西藏外，均有促成会之组织。现各地代表均已齐集，已届开会时机。次由江西会馆各界促成会总会代表报告愿与本会合并之意思及前日合并之情形。报告毕。来宾演说。首由汪精卫演说。略谓国民会议之意义。就是要把民国主权从帝国主义军阀手中夺回来交与人民。我们应注意（一）应怎样促成国民会议。（二）我们在此会议中提什么问题。次由林子超、徐季龙、邹海滨、李守常诸先生演说。徐季龙演说略谓本会所促成的国民会议与官僚所办的代表会议有二不同。一系人民的预备会议所促成。一系官僚的善后会议所促成。此一不同。第二点即为选举法不同。一则由军阀等有限制选举所产生，一则应由人民行直接的普通选举。李守常之演说略谓，真正国民会议之召集，非由诸位代表回去在工人农民中组织宣传不为功等语。非愿脱离中国，实因今日中国政府并非人民的政府。且历来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屡利用蒙古王公压迫蒙古平民。故蒙古不得不宣布独立。我们大家须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须打倒蒙古王公等语。又由广州军人代表萧人鹤演说革命的青年军人之责任。时已一点钟。遂由军队奏乐。主席宣布摄影散会云。

（《京报》，1925年3月2日）

昨日之国际妇女节纪念会在民大举行

昨日(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纪念日,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20余团体,发起在太平湖民国大学,开纪念大会。上午十时,即由该会筹备员石道璠等,到该校布置会场。于校门高悬国旗两面,并用彩绸扎成“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等字,会场设在该校大礼堂,门外亦悬旗结彩,讲坛上悬挂“国际劳动妇女节万岁”横匾,并张贴“争回人格”、“争回政权”、“向国家妇女方面做去”、“同等教育”、“同等工值”等口号,于整齐之中寓一种严肃振备气象。昨日下午一时以后,狂风大作,黄沙弥漫,各团体各学校妇女代表、及中外来宾、新闻记者等,仍踊跃到会。实可为北京妇女界空前未有之盛会。三时许,正式开会,公推刘清扬为临时主席,夏之相等为临时书记,石道璠等为临时招待员。主席宣告开会后,即全场起立,唱歌。次由主席报告开会旨趣,大意谓:今日之劳动妇女节,系1909年美国妇女共产党首领紫芝根女士(Clarnjeitlin)所创议,1910年在丹麦京城开开会,决定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1911年在德奥两国为极激烈之示威运动,维也纳开大会时,有3万妇女参加,自此以后,3月8日逐渐成为欧美各国劳动妇女所遵守之一个“圣诞”节日。我国方面,直至1924年(即去年)3月8日,才开始在广州第一公园开第一次纪念大会。今年今日,改在北京举行,在北京为第一次,在中国则为第二次。今天所以要纪念的原因,略有三种意义:

(1) 我们在今天,应追想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尤应当追想我们中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地位。(2) 我们应当回想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奋斗工作的成绩。(3) 我们应当确定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奋斗工作的方针。现在我们女同胞最紧迫最重要之奋斗工作,就是对于国民会议组织法,要力争妇女参加权云云。次广东女界联合会代表伍之媚女士演说,略谓妇女运动,宜注意(1) 团结,(2) 教育,(3) 奋斗三点。并详举本人在广东省议会争

县议会选举权血战议场之成绩，眉飞色舞，大有辟易千□之概。次由俄国共产党代表鲍罗庭女士用英语演说，代表苏联妇女庆祝中国妇女运动成功，并力阐中国曹大家“三从学说”之荒谬。最后尚有李大钊等演说，至五时余，演说毕，全体起立，唱国民革命歌，高呼各种口号，六时许，始散会。

(《晨报》，1925年3月9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二次代表预备会3月10日正式开会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自筹备以来，各地来电加入者，异常踊跃，而先后派代表莅京者，已有60余处，130余人，现闻该筹备处定今日召集第二次代表筹备会，明日(10日)假北长街北京教育会正式开会，开始讨论，并拟聘请各专门委员，如汪精卫、戴季陶、李守常、李石曾、吴稚晖及各教授，出席报告国际及国内各种主要问题，已印旁听卷，备各界旁听。

(《京报》，1925年3月9日)

中国国民党欢迎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

昨日下午二时，中国国民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欢迎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主人方面到者有吴稚晖、丁惟汾、戴季陶、李守常、于树德等十余人。代表到者百余人。由丁惟汾主席，致欢迎词。次由吴稚晖、戴季陶、李守常相继演说。大意说明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提倡国民会议的原因，并希望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接受该党的主义，及主张到广大的民众中间，努力于宣传组织的工作。次由代表江著元、王乐平相继致谢词，均希望该党于形式的欢迎外，予以精神上的指导，以实现真正的国民会议。继全体摄影，并由北京执行部秘书处分赠代表每人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各一份，至五时散会。代表等并当场推举20余人，齐赴铁狮子胡同行辕，慰问中山先生病况。到后由邹鲁报告中山先生病况，并致谢意，代表等遂兴辞而出。

(《京报》，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先生治丧处秘书股之组织

孙先生行馆本有秘书处。今因治丧往来文件甚多，特另组秘书股。今日上午十时，该股召集全体会议，议定职务分配如：

主任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中文主稿邵元冲、谢无量、易寅村、杨沧白、谢慧生、吴稚晖、于右任、戴季陶、王太蕤、徐季龙，邵海滨、李守常、吴玉章、王陆一、路友于、收发摘由于范亭、陈去病、范体仁，戴朝震、李汉樵、李渤海，保管文件杨杏佛，邹德高、蒋希曾、滕录、王震、，新闻杨杏佛、李建民，黄贻孙、邹德高、于树德、张国权，英文陈友仁、马素，法文韦玉，日文戴季陶，井上谦吉，德文顾余孟，电报朱和中，郭兰生，李仙振、陈耀祖、张乃恭、张国权。又该处以丧仪礼节等在有研究举行之必要，以免有辱中山先生之遗意。昨由治丧主任会议，函请徐固卿，张溥泉，周惺甫，等为指导员云。

（《京报》，1925年3月14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 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节录）

（1926年2月4日）

主席：请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说明提案理由，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总理遗嘱之经过。

汪精卫同志：代表大会各同志：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向大会提出一个“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的议案，委托兄弟把接受总理遗嘱的经过报告一下。自去年1月26日，总理在北京协和医院受手术后，已发现是一个不治之症，当时在北京的各同志听见这个不幸的消息，大家都觉得此后各位同志身上，要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那天晚上即开政治委员会会议。这个政治委员会，原本是总理在广州时所组织，总理自己做主席的，但当总理将入医院的那一日，知道病势不轻，不能

躬亲庶务，而许多政治委员都不在北京，胡汉民、廖仲恺诸同志在广州，戴季陶、邵元冲诸同志在上海，只兄弟一人随在北京，当日总理特加委于右任、吴稚晖、李大钊、李石曾、陈友仁做政治委员。那天晚上，政治委员会诸人商量了许久，都以为应该趁总理未临危之前，求他一个遗嘱，好交付同志遵守，大家对于这层意见，是经一致赞成的，但经过一月，这事还没有决定。因为大家对于总理的病总还有一线的希望。虽然经医生说过是完全没有希望，但大家还觉得总理的精神强固，抵抗力总比别人强，就令不能够完全痊愈，总可以抵抗久一点，或者能够延长一年半载，或两、三年的生命，也未可定，如果对他照直说明，是不治之症，使总理心上预备逝世，会消灭他许多抵抗的精神。因此。大家都决定非到最后的时间，不能够将他直说。……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8号）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次大会纪事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下午二时在北京教育会开第三次大会，到会人数百零四人，议事日程，（一）签定席次，（二）提选秘书处长，（三）组织各种委员会，（四）讨论议事细则，（五）临时动议。主席顾孟余报告开会议决事项，

（一）签定席次下次再议，（二）选举结果安体诚当选为正秘书长，郭景仁为副秘书长，（三）组织四种委员会，并聘请汪精卫、于右任为国际问题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邵元冲为内政问题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唐有壬为财政问题委员会委员长；吴稚晖、李守常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四）议事细则，讨论二十四条。因时至六时，乃宣告散会。

（《京报》，1925年3月17日）

孙文灵柩今日移中山公园

“路引及殡仪”

孙文灵柩定于今日上午十一时由协和医院移置中央公园社稷坛，其略引及殡仪已决定于下，柩由三条胡同医院后门出王府井大街，北转东长安街，直至天安门，入中央公园。其出殡仪仗则前导者为警察队，次为乐队，军队、乐队、团体代表（每团体以一二人为限），乐队，机关代表，特别护队（即警卫军）。次为引导护柩人即执紼人（纯为国民党员）分为左右两列，各100余人，灵柩居中，左右各有举柩换班者八人，柩之后则为孙夫人马车，及护队。而今殡仪里以送丧者（即普通人）为殿后至左右两紼，左紼执头者为吴敬恒，执尾者为于树德。右紼执头者为黄昌，执尾者为朱和中。女界执紼者亦有12人，左右各6人，俄人1人（鲍罗廷）。

“党员自舁棺”

孙文灵柩决定由国民党员自行抬送，不用杠夫，以表尊敬之意。闻已派定24人，分三组更番替代，其人皆国民党中央人物也。

人名如下：第一组：张继、汪兆铭、孔祥熙、林森、石青阳、宋子文、喻毓西、石衡青。第二组：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白云梯、邹鲁、戴天仇、邵元冲、钮承健。第三组：李烈钧、姚雨平、郭豫初、焦易堂、邓家彦、朱卓文、蒋作宾、林祖涵。此外又指定黄惠龙、马潮、邓彦华、马超俊、赵超、李朗如、李仙根，吴雅觉、李荣、林耀先帮同照料。

（《晨报》，1925年3月19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招待专门委员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自开幕以来，进行非常热烈，现各种专门委员，如国际问题委员会，内政问题委员会，财

政问题委员会，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等，皆已组织就绪，并于昨日（20日）正午十二时，假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各专门委员。昨已发出通知，被聘之专门委员，除各省代表外，会外有汪精卫、戴季陶、李守常、吴稚晖、邵元冲、唐有壬、雪亭、周硬（鯁）生、马寅初、易寅村、李石曾、于右任、高一涵、蒋梦麟、邹海滨、李协和、于树德、李春涛、邝摩汉等多人。又该会20日例会代表，大部分系专门委员，须赴中央公园招待会，由主席团议决休会一日，昨日发出通知，照录如下：迳启者，本会业已组织四种委员会，代表大半加入研究，今为迅速预备各种问题方案起见，定于明日开委员谈话会，特由主席团议决将本星期五代表大会休会一日，至下星期一继续开第五次大会。用特函达，务希贵代表携带出席、表决两证依时到会为要，此致台鉴。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秘书处启。19日。

（《京报》，1925年3月21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昨日闭幕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昨日（15日）下午一时，在北长街教育会会场举行闭幕式。到会会员朱务善、石道睿等百余人，来宾吴稚晖等十余人。二时许开会，由上海代表刘清扬主席，宣告开会。奏国乐，向国旗行三鞠躬礼，来宾吴稚晖、张松年、于树德等，代表李血泪、陈潜夫、朱务善、胡南湖、邓颖超等相继演说，历时其久。次全体起立唱国歌，高呼“国民会议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等口号，五时余，始摄影散会。

（《晨报》，1925年4月17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

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

——1925年4月25日北京通信——

罗 敬

一、全国民众代表之集合

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前后一月有余，到会代表200余人，代表20余省区，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些促成会旗帜之下集合的是：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到会各代表虽不能将各地团体人数作确切的报告；但所代表的民众，当在数十万以上。这个民众性的大集合在北京开会一月有余，而全国知者尚少；其原因是：在安福派政府高压之下，该会于开会时常不能自保安危；该会所寄出的会报，多被政府劫留；该会所发表的新闻，在北京占大多数的反动报纸，多不予以登载，而对于安福部政学系研究系联治派及军阀代表所组的善后会议消息，则逐日连篇累幅的与以登载。

这是一个民众的会议！从会议之经过与结果看来，是颇良好的。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本报代表民众利益，并曾屡次勉励此会之成功，对于此次会议，实有不惜篇幅介绍之必要。记者曾觅得该会各种材料，并曾到会旁听，特作此篇以告本报读者，并盼本报读者特别注意于该会议之各种议案与宣言。

二、会议时期与政治环境

当大会开幕之日，段政府的善后会议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各方面的“人物”，段政府竭力网罗，从好政府主义者以至于新官僚“社会党”领袖，都被召应试；与此会议之各地人民代表纷纷到京，遥相对应。北京城于安福派统治之下，早已在恐怖的状态

之中。人民不仅集会不得自由，而且言论也遭政府罗织。但在当初，孙中山先生尚存一息于病榻之上，段祺瑞还不敢马上撕破面具，人民的活动还勉强自由。及至孙先生去世，骨尚未寒，而孙先生主义庇护下的民国日报被封，嗣后连续压迫各报馆与通讯社，无端逮捕新闻记者，无数侦探鹰犬，大形活动，中山灵柩之停放，政府最初不允许在中央公园，而指定远离民众之城外荒坛。中山遗体之移往西山，也是政府所欣愿的。北京城日堕于恐怖，反动势力日益增长，民众不能抗争。

军阀角逐而要造成的未来大战，自张作霖来京忽而离去之日，其局面已经开始。从此以后，段张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多。然而执政府谋臣甚多，能奔走者尤众；善后会议或连续或间断，日以金钱与交换条件购买，务期成功。自中山逝世，分裂国民党的计划便自执政府而出；政府的机关报与附属于政府的各党系报纸，都扶掖国民党右派，宣传国民党之分裂。

但在这个时期的全国民众，反对善后会议之声遍于各地，哀悼中山，誓愿继续革命的表现，来自大小城市与庄村。然而政府对此，充耳不闻，只图应付军阀，手忙脚乱，急谋成功。

三、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工作

各地民众代表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集会，自然感觉到人民自身责任之所在。因此，大会决定否认段祺瑞所提出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又以为趁人民代表聚集的机会，应该详细讨论中国衰弱祸乱之真因，并提出具体的救济方案，以宣告于民众；民众应从此继续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之成立，必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重要工具，因此大会决定讨论各种国际与国内的问题，而定出下列的范围：（一）国际问题，其中包含：（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2）不平等条约及特权；（3）租借地与租界问题；（4）关税问题；（5）外人在华驻兵问题；（6）外人在华航行权问题；（7）外人在华传教及教育问题；（8）外资与其势力问题；（9）华盛

顿会议；（10）临城案件；（11）金佛朗案；（12）鸦片会议；（13）无线电问题；（14）外国银行团；（15）上海租界焚书问题；（16）沪西日本纱厂罢工问题。（二）国内问题，其中包含：（1）军阀军队与内乱；（2）联省自治问题；（3）人民自由问题；（4）实业问题；（5）教育问题；（6）商业问题；（7）工人问题；（8）农民问题；（9）妇女问题。（三）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内外债各问题；并详细备查中国的财政与提出救济方法。（四）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其中包含：（1）批评并否认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国民会议组织大纲；（3）促成国民会议与励行民众组织。

大会的责任既是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而此国民会议之产生，非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不足为功；所以该会议开会后于发行会刊时便宣言说：

“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其使命乃为客观情势确定无疑，质言之，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锻炼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民众运动的。今日之一粒种子，他日必结为最大果实，我们必须努力栽培灌溉，扫除其周围之蔓草荆棘。此工作最初虽不免于艰难困苦，牺牲流血，然吾人之责实无旁贷”。

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之决议

大会自决定讨论各项问题后经过半月余的工作，便整理出各种问题之报告与其决议方案，报告的内容是十分繁多的，这绝不是豢养的善后会议议员甚至国会议员所能作的事，而唯革命的民众代表才能做到。各种内容该会将另出专册印行，下面所述乃简略指出决议案中之重要者：

国际问题之决议——最初说明欲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须将已经为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攘夺以去的国家权力，完全收

归在集体的人民手里。其次说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经过，历述自最初的商业政策以至为鸦片贸易扩清道路的英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民族史的第一页。马关条约为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一新时代，割地赔款保护外货的关税制度，由此而生。马关条约外，辛丑条约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酷烈者之一，这个条约是对中国民族反抗外力的惩罚，把中国军事、经济的国防完全打破，将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尊严蹂躏无余。鸦片战后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入史。中国自从堕入这个历史里，就变为国际的殖民地。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依国民会议产生国民革命政府，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大会决议案中曾一一指明：（1）领事裁判权；（2）租借地、租界及中国境内其他的外国行政权；（3）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等规定；（4）外人管理财政权；（5）庚子赔款；（6）外国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7）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教育设施。此外，又指明帝国主义列强于近数年对中国之进攻有下列诸事实：（1）华盛顿会议；（2）临城案件；（3）鸦片会议；（4）金佛朗案；（5）无线电问题；（6）上海租界焚书问题；（7）上海日本纱厂华工罢工问题。对于以上诸问题，都分析其内容，而提出严重之抗议。本决议案之结论是：恢复国家权力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就是恢复国家权力的机关，故大会决以全力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实现。

五、“打倒军阀！”“排斥联治！”

国内问题之决议——在国内问题中，包括九个重要问题已如上述。决议文中一再申述打倒军阀的口号，在军阀军队与内乱之决议里，说明全国民众在打倒军阀的旗帜之下，应当猛勇的以人民要求民治为前提，对于一切军阀施行总攻击；尤其要反对的是军阀的武力主义，因为那是军阀否认人民力量的标语，与人民所

期望的和平与统一，绝对背道而驰。同时又说明广大的兵士群众之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在国民革命中，兵士应该为国家利益战，不要为军阀官僚战，应该为国家利益作捍卫，准备为国家幸福而牺牲。〔其〕次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大会决议痛斥联省自治论者之误国，其理论既幼稚，其所根据事实更错误。大会以为在此封建残局之下，决不能由制宪而获得自治。真正的自治必待国民革命成功，中国民族获得独立与自由之后，始能实现。

关于人民之自由，大会要求废除一切警治与军治。人民应有绝对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警察不得任意逮捕，羁押或搜索人民住宅，非军人绝不受军治。工人应有罢工的自由。惩治盗匪法，陆军审判条例等，均当废除。复次，对于实业、商业、教育诸问题，均各有确切之决议。最后关于工人、农人、妇女三问题，更一面分析在被压迫各阶级中此三大群众的痛苦，一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大会尤注意广大的工农群众与妇女界，应速起急谋团结，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成功。

在各项国内问题中，且提出各自的切实主张或要求；大会为注重国家财政问题起见，又单独讨论财政问题。

六、“十年的外债停付！”

大会特别讨论财政问题，为求详细探索财政紊乱之情形，与国家财政破产之根源。据财政委员会讨论报告之结果，其结论就是：“十年的外债停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其用途！”

这种主张是关系严重的，帝国主义的列强一定畏惧，因为这种主张之结果，绝对有利于中国国民，而无利于列强。列强听到这种主张，一定要惊惶失措，指我们人民为“过激”。殊不知这种“过激”的办法，在列强各自的国家里，在他们祖先的历史上，早就实行。法兰西曾要求过外债停付，比利时也要求过外债停付。“停付”（或缓付）这个名词，这个办法，是他们自己当初想出的。论到“过激”的办法，并不这样。“过激”——假使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自从革命以后，

并不是停付，而是不付了。

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不困难，难在帝国主义之继续侵略。一国的财政破产并不是稀奇的事，所奇在无救济办法。中国的财政家梦寐以求，只学算账，不知清账；即有清账的办法，又都是有利于列强的，如主张再借外债以救财政的，便是一例。

大会同时感觉借债之危险，故发出公开宣言两种，一给外国银行团，一给国内各银行，警告不得再借债与政府。

七、宪法是人民收回政权的证书

大会于各种问题之外，又特别注意宪法问题：

“中国国家的权力，现在不在国民手中，而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使者——军阀手中；一切不平等条约，即是保障此等权力的明文。所以吾中国全民众，应集中其精力以求于最近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目前中国国民所要求于此国民会议的职任，不在制定一部空文无力的宪法，而在为一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斗的人民机关。”

这是国际问题决议案中评宪法问题之一段。在国内问题决议案里，也有同样的说明：

“宪法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国国民保持主权的一部证书，这部证书，必须国民自己得了政权以后，才能产生出来，向统治的军阀要宪法，与奴隶要求主人严订管理法一样，结果反让统治阶级强奸民意，任意造作。政权的取得是由于革命的力量，必须国民革命成功，才有国民自己的宪法可言。……真正的国民会议之目的，就是要求政权收归人民以解决一切外患与内忧。”

八、“敌人软化不了工农阶级”！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有两种政治的遗嘱：一为国内的，一为国际的（即致苏俄之遗书）都笔记而出，为民众所普知。在这两种遗嘱传授之时，中山先生警告其同志说：“你们不怕敌人的软化吗？”记者曾于本报通信中述过。现在这一句话，全国民众还没有公开的答复，唯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中之工农代表

团早就答复了：“敌人软化不了工农阶级！”

工农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人数虽少，且偏于南方，但在大会中仍产出良好的工作。大会会刊中，我们看见农人代表某君的论文，充分表示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使命。大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工作，关切于大多数被压迫工农阶级最深。此次各种的决议，一方面证实民众代表工作之良好结果，一方面也可断言将受全国民众之有力的拥护。

九、第二安福国会与人民的国民会议运动

当大会闭会之时，安福部的善后会议也闭会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是要召集预备会议；善后会议闭会之后，是要召集第二安福国会。后者也许是可能的，可能则必是较快的，因为“政权”在段祺瑞之手。

然而大会指示了人民以国民会议之性质，指示了人民以奋斗的方法，并指示了人民对于各种问题之确切方案。素来藐视民众无组织的，将由这次人民代表的实际工作中证明其为恶势力所迷。现在促成真正国民会议的民众代表大会闭幕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闭幕了！我们需要一个第二安福国会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全国革命的民众应当答复这个问题！

（《向导》113期，1925年5月3日出版）

3. 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国民党纠纷益多

前日（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帅府园开会，到会者计有20余人。首讨论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办法，以于树德、李大钊2人发言最多。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开成立会时，到会人数竟有2000以上，实为不可轻视之举动。而同志俱乐部之总章内，载有跨党者不准入会一条，明系反对共产之表示。如果任其成立，未免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本上发生影响，非设法抵制不可

云云。当议决登报否认该俱乐部为本党同志所组织，与本党毫无关系，以免误会。又以于右任及张继2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是日不应加入同志俱乐部之大会内。应向于、张二人提出严重交涉（闻于右任已允登报否认加入，张继则拟置之不理）。最后提议，自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京之后，因无武力可借，不能发生强制效力。一般党员，已不受执行委员会之支配。危险情形，不堪设想。现值广东陈（炯明）军完全失败，不如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会广州，将来全国执行委员会，仍在广州举行，俾有所凭藉，易于支配云云。此项提议已一致通过云。

（《晨报》，1925年3月12日）

国民党左右两派大争执

右派主张在京开会

左派主张回粤开会

国民党自孙文逝世后，其内部因反对唐继尧副元帅，及召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二问题，大起纷扰。对唐事件，因京中国民党员，多主张国民党各派大结合，故汪精卫、邹鲁等数次提议下令讨伐，均无结果。召集第二届代表大会事件，则因北京及广州之开会地点问题，争辩甚烈，亦未解决。前数日该会在帅府园开会，出席委员11人，于右任主席。非共产派之邓家彦、谢持、石青阳、茅祖权等主张在北京开会。共产派之李大钊、王法勤、丁维汾、于树德、邹鲁等主张在广州开会。李等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之理由，谓该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邓等逐条驳之。结果付表决，赞成反对者各5人。主席于右任遂声言将此案保留。闻汪精卫主张在广州开会之意见极为坚决，拟不理多数党员之反对，迳由胡汉民以大元帅及代总理命令，召集在广州开会。反共产派闻之，亦拟召集海内外全体党员大会，以否认汪胡等之行动，日来正在磋商一切进行方法云。

（《晨报》，1925年4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

北京执行部电

北京东城翠花胡同8号转于右任、李大钊、王法勤、丁维汾、于树德、恩克巴图诸委员鉴：本会据外交代表团文电称，邹鲁在京发表告平木文，语多诽谤，经于卅日议决，邹鲁著交北京执行部查办特达，政治委员会马印。

（《京报》，1925年1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

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

（1925年12月）

中国国民党自去年一月改组后，党内革命空气陡见紧张。两年以来，在党务上在民众运动上均有确实之发展。然因工作之进行，党员之间不免勤惰各别；对于革命政策，亦意见互殊。于是显分左右两派。惟右派人数极少，且皆属腐败懒惰分子，日惟升官发财为念，慑于积极革命之不利于升官发财，乃大反对。廖案起后，一班革命意志强固之党员，看明白此乃革命反革命之分水线，乃奋其不妥协手段削平一切反革命分子，因以巩固了广州的革命政权。然因此懒惰右倾分子倚靠国民党升官发财之路愈绝，其怨愤情状亦愈加甚。尤其无状者，竟不惜勾结熊克武企图倾覆国民政府，进而与南方之陈炯明北方之段祺瑞相联结，完全抛弃革命地位而站入反革命的地位。不料国民政府东征北讨，熊陈势力根本铲除。此辈计穷，乃怂恿少数在京沪之中央执行委员，谋托于北方军阀势力保护之下，通电主张在北京开会，要求在粤委员赴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即复电驳斥，并就法理事势两方面万万不能在京开会之理由，电告各地各级党部各同志使大家明了此意。兹将两电照录于次：

致北京电

北京东城翠花胡同第八号转于右任，李大钊，王法勤，丁惟

汾，于树德，恩克巴图，诸同志鉴。本日接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邵元冲，邹鲁，戴季陶，叶楚伦，沈定一，张继，谢持，吴敬恒，茅祖权，傅汝霖等铄电，致广州汪精卫，谭组安，熊锦帆，谭平山，林祖涵，邓泽如诸同志，称已于铄日决定梗日在碧云寺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等语。兹严驳如下：

(一) 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体会议，只能在广州开会，已经决议在前，并已定期开会，何得违反决议。(二) 此举显然未得北京执行部之同意。(三) 熊克武已因通敌被捕，听候审讯，何得通电请其□京，公□□□中央决议及政府命令。以上三点，以中央委员而举动□此，实为可耻，惟背鉴之事，已成习惯，望北京执行部诸同志切实查明，如系背签，请复电声明。其主动者，应施行惩戒。中央执行委员会苛。

致各级党部电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近接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铄（11月16日）电，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复电严驳。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今年四月间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未半，即中辍南下，继续开会于广州，即基于此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岂可复蹈故辙，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况第二次全国大会原定8月15日在广州开会，嗣因省港罢工，交通梗塞，广州扫除反革命派，战事频仍，以致屡次展期。兹者广东全省统一，广州安如磐石，纵使交通颇感不便，亦无碍于开会。故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2月11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

议，愿念事势，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除胡汉民同志现在莫斯科，李烈钧柏文蔚两同志于役京外，已电征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之主张，并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谨此宣言，诸维鉴察。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谭延恺，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感（11月27）。

观此，则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必须在粤开会不能在京开会，已十分明了。惟尚有一部分人不甚明了党部组织者，以为署名通电召集在京开会者，已居委员之半数，纵使前已议决全体委员及代表大会须在广州开会，惟署名者既占多数，亦应服从。不知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原有24人，候补委员17人。执行委员除在中央党部执行职务外，余分在上海北京各执行部，谋党务之活动，其余到有监察委员5人，候补5人。其人名如次。中央执行委员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传贤，谭平山，谭延恺，杨希闵，李大钊，于树德，邹鲁，王法勤，丁惟汾，居正，覃振，李烈钧，于右任，恩克巴图，叶楚傖，石瑛，熊克武，石青阳，柏文蔚，林森。候补执行委员则为邵元冲，林祖涵，邓家廉，沈定一，瞿秋白，张秋白，李宗黄，彭素民，于方舟，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张苇村，白云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其中执行委员张静江辞职，廖仲恺逝世，杨希闵熊克武及邓家彦李宗黄等皆以先后谋叛除名，以林祖涵邵元冲沈定一递补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邓泽如，张继，谢持，吴稚晖，李石曾。候补监察委员为蔡元培，杨庶堪，刘震寰，许崇智，樊钟秀。而刘震寰因叛乱已除名。查北京署名召集开会者虽有15人，惟执行委员仅得其九，余则为监察委员或候补委员，而监察委员则向无表决提议之权，既无冒签情弊，亦仅为全体委员之最少数。况其中多有冒签者，不日即可证明。而吴稚晖且当数日前政（致）汪精卫函，声明后此凡京中一切通电或函件，非经本人签字，一律

无效，盖已明知京中少数不肖分子，或有此等谬举矣。

（《政治周报》1期，1925年12月出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

执行部紧要启事

顷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广州来电云，谢持邹鲁等在北京召集非法会议，各地同志多愤。彼等此举不遵中央决议，大干党纪而欲置本党最高机关反动势力之下，其心尤不可问。兹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5次会议议决，将此案提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特先电闻中央执行委员会文，查近日谢持、邹鲁等复在各报冒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大登广告，声称取消共产派党籍并将全部党员重行登记，分别去取云云。纯系冒用名义违背党纪，本执行部除将彼等行动报告中央，提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外，特此声明俾党内外咸知真相。

（《京报》，1925年12月27日）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全体

党员大会紧急启事

查有本党反叛分子谢持、邹鲁等，“违反本党决议”，擅自“秘密”召集西山“非法”会议，历经本特别市各级党部及各地党部否认在案。该反叛分子不知悔悟，反盗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妄发宣言通告竟谓本特别市各级党部已在解散之列云云，殊属荒谬。本特别市全体党员于24日开全体大会，一致否认违法之西山会议及所妄发之宣言通告。除急电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厉惩办外，恐各界人士不知内情受其欺骗，特此郑重声明。

（《京报》，1925年12月27日）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及 各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联席会议启事

查有谢持、邹鲁等少数叛党分子，前曾盗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集非法会议，妄发宣言；近日又冒名登报声称解散本特别市各级党部，实属破坏本党，违反纪律。除由党严办外，特亟辨明免，滋疑误。

（《京报》，1925年12月27日）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报告书

径启者。本党监察委员谢持，自离粤来京，对于广东党务及政治措施，即有许多不满意之表示，并向本党在京要人作破坏广东政府之鼓吹。而广东外交代表团来京后，本部曾作大规范的欢迎，以为彼等定将广东政府真相宣布于北方群众之前，而打消一般之怀疑与谢等之谣言。不料彼等到京后，总代表林森秘书邹鲁等，不但不为国民政府有利的宣传，且作与谢持等如同一鼻孔出气之反宣传。林森同志在3000余人欢迎会上，公然说“无论北政府南政府一概都是不可靠的……”等等荒谬言论。上月此间忽接到上海哲生，楚伦，玄卢，季陶，理鸣，诸同志来电促慧僧，溥泉，右任，觉僧，季龙，子超，海滨，衡青，石曾，青阳，詠熏诸同志赴沪开会。电中有谓尽于十日内南下开会，经费已有办法等语。嗣以此间同志多不能前往，于是又来一电，请此间同志就近在京开会。至此会议内容如何，本执行部常务委员既不在被邀之列，无从详知。但由谢持，邹鲁，林森诸同志在京举动观之，则其内容必不利于本党及广州国民政府可知。广东外交代表团于本月14日抵京，而邹林等终未来执行部一谭。忽于21日邹林两同志来本执行部，声言限本执行部于两日内召集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又不以会议何事相告。当时本执行部常务委员王法勤同志去西安，丁惟汾同志去张垣，只于树德同志一人在京。乃答复

林同志，大意谓本党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定至迟于本月26日开会，现在为期已迫，诸委员应赴广州开会，不宜在京集会，以免决议之冲突。即或召集会议，亦须有两个常务委员负责召集，丁惟汾同志日内返京，可少缓一二日云云。不料此信去后，邹林谢傅茅石（衡青）诸同志大不谓然，乃由个人出名，定于10月25日在翠花胡同8号开谭话会。是日于树德同志以赴天安门国民大会，未能出席。乃是日上午十点钟时，谢持，傅汝霖，邹鲁，林森，石衡青，茅祖权，诸同志率领四五十人，全系同志俱乐部及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到本执行部，一面派人将大门把守，一面派人把持电话，入内翻箱倒柜，墙角厮所等处搜查，一若强盗入室，诚不知是何用心。幸而是日本执行部人员皆到天安门参加国民大会对于关税会议示威游行，无人在部，得免于难。计是日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惟本执行部门前，近日常有便衣侦探，往来梭巡，一切重要文件，皆收藏妥当，故是日并未失落重要文件。是日邹谢林等连名发出通告，定于次日（26）召集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正式会议。26日本部常务委会于树德同志在本部候其开会，至九时顷，同志俱乐部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三五成群，来本执行部。问其何事，则答云开非常会议。问其何人所召集，则云不知。令其签名，则皆签一假名，或不肯签名。迨至十时顷，谢林邹相随之至，已达二三十人，大半皆持铁手杖，其势汹汹，大有用武之势。适是日有许多党员来本执行部齐集，预备出发赴新华门示威（北京示威运动分25、26两天），彼二三十人始不敢动手，邹鲁同志到部一见人多，即行走去。谢林等候甚久，只有傅霖汝茅祖权到场，至十二时顷，吴稚晖先生亦到场，终以执行委员到者甚少，乃各散去。10月28日，见联合通讯社稿，及29日黄报新闻，皆登载谢持等又作“反共产运动”新闻一则。大意谓谢持等联合北京同志俱乐部及民治主义同志会，欲强占共产派所把持之北京执行部，以共产派早有预备，此种计划，乃归失败，只大骂共产派于树德而返云云。按此新闻，

必系同志俱乐部人所发，吾人始知谢持等所以带领若干人来执行部者，实有极深之阴谋，而绝不料被集合以待出发之示威群众无意中破坏之也。按邹林等身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为广东外交代表团政府代表，来京后既不为政府宣传，已为失职辱命。而况更作反宣传，其应受若何之惩罚乎？谢持身为本党监察委员，又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对于失职辱命之反宣传之邹林代表，不但不加闻问，且更借彼等来京之便，以遂其掠夺北京执行部之阴谋，真所谓丧心病狂者矣。其余如石瑛久已自行辞职，誓不闻问党事之执行委员，今亦忽随同志俱乐部及民治主义同志会分子前来本执行部捣乱。傅汝霖乃候补执行委员，宝任此次捣乱本执行部之总指挥。茅祖权实为其参谋。其余若邹德高，姜绍模，张开铭，黄英，陈兆彬，彭革陈等，皆前来本执行部捣乱。甚至如段政府国民代表会议华侨代表林森，亦冒称委员来捣乱，真所谓本党无奇不有之怪现象矣。至今彼等是否尚再来本执行部捣乱，此次尚不敢定。不过彼等俱乐部与同志会之间，似有破裂之痕迹（由联合通讯社之稿及黄报新闻可以推知），而邹林谢等则将别有所图。现闻彼等四处运动此间老同志，将发攻击共产派及不利于国民政府之宣言。此事尚不知能否实现。谨将此事前后经过情形，据实陈明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如何处置之处，即希中央斟酌施行是幸。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

（《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

丁维汾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 关于北方党务问题发言记录

（1926年1月7日）

主席：现在可照议事日程请丁维汾同志报告北方党务。

丁维汾同志：关于北京的党务已有书面报告，现在把其中几个要点说说。

北京党务不能发展的原因甚多，现在择其中三点来说：

- 一 北京政府的武力压迫。
- 二 经济的缺乏。
- 三 内部分子意见的不能一致。

有了以上三个原因，所以党务发展，极感困难。在这三个困难之中，觉得：（一）武力压迫，我们还可以秘密进行，避免这一点障碍。（二）经济缺乏，原本是一件困难的情形，但我们革命的工作，系和困难奋斗，在这困难中我们能够建设，才见得我们革命的精神。至于（三）内部的意见不能一致，真使我们的工作感受无限的痛苦。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恨民治主义同志会那个反革命团体。民治主义同志会，民国十三年在北京成立，他成立以来，便天天作反宣传。第一次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会选举，他们因为不能入选，向中央党部控告同志怎样的选举不公。原来在北京地方的党务进行，是秘密的，当然手续上有不能完全之点，但决不至如他们诬控的事实。他们也明知是这样的，不过有意捣乱就是了。到了去年6月，又发生共产和反共产一个问题。共产和反共产，在别处确不成一个什么的问题。单在北京有他们那般民治主义同志会的造谣，便像煞有介事的，生出许多问题，作为反宣传的材料。十四年春间，冯自由、马素、邓家廖辈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首先加入者，便是民治主义同志会。后来因为北京同志许多退出同志俱乐部，他们表面上也宣告脱离，但我们每次被人捣乱时，都是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分子，暗中有在内面活动。即如这回西山会议，向北京执行部捣乱，都是这班民治派的人物占多数。本来西山会议在北京的同志是没有人理会独自民治主义同志会非常给他捧场的。民治同志会在北京便成了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大本营了。

自从总理北上之后，北京党务的进行，本来比较从前容易活动。但因为每次活动，都有民治派反动的运动，而且十分出力，所以独感困难。原来在北京的团体，从前反对过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有一个青年团。民治派斗青年团不过，才加入国民党和青年

团反抗，原是想利用本党，来达到他不正当的目的的。当时系由谢慧僧同志介绍他们入党，后来他们对人说，国民党在北京不能够作公开的运动，不若把民治主义同志会这招牌拿出来，便容易活动。如果入国民党，只要先加入民治同志会。他们还想把民治同志会推广到各省区，这不是成了一个国民党的预备会吗？当时我在上海，谢慧僧便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当时便不赞成。因为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国民党，给他利用，将来介绍加入我们的，至多不过六成。但不能介绍的，还有四成。那四成便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何苦给他利用，反成立了一个反对我们的机关。谢慧僧当时听了我的话，便拿此事作罢论。因之他们亦不能推广到各省区，他们的总部，仍在北京，使我们感觉得十分痛苦。

现在北京许多青年，已经明白他们的真相，都不愿意加入。他们又改头换面，用孙文主义学会来号召。一般青年们不察，以为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名义是好的，便有许多人加入。不过他们实在仍旧做破坏我们党务的运动。今日我所以特别提出者，因有许多人未明白北京孙文主义学会的真相，故特别报告，请大家注意。其余党务之详细状况，兄弟有书面报告，请大家指教！

（国民党中执会档案）

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启事

本部市（党部在翠花胡同8号）所辖之北京各级党部已于去年5月间组织成立。近因各区分部委员任满，故定于本月10日起重新划分区分部，并改选执行委员，已通知各党员在案（报到者已千八百余人）。日来各报所载“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注意”启事一则，谓将北京市划分七党区并在北大三院等处登记云云，纯系背叛本党之少数分子冒用本执行部名义所为。除已通告各区分部并查办外，恐新来党员及党外人士认假为真受其骗惑，特此声明。

（《京报》，1926年1月8日）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通告

本党部自十三年七月成立至今，领有党证之党员共2818人，离京及赴黄埔军校者786人，故目下党员在京者共有2027人。惟查已向本部报到而划入各区分部者为1782人，尚有231人未曾报到，此中不无误向南花园一号冒称北京执行部之非法机关暨记者。特再通告，望未向本部报到之党员，务于本月20以前将住址函报翠花胡同8号本部，以便划入区分部。幸勿迟悞致干党纪。（十五年一月九日）

（《京报》，1926年1月11日）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

（1926年）

关于本党少数中央委员及监察委员发起西山会议，大会接受各地报告之后，认定此等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大会聆悉关于本案之审查报告以后，认此事为吾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但西山会议诸人，有主动最力而蓄意谋危本党者，有属于盲从附和因一时之误解为人所愚而致引入歧途者，有因个人之主张不同而致为人利用者，情节既有主从之分，则处分自不能不有重轻之别。兹特按照各人之行为判定其应得之处分如左：

（一）谢持邹鲁二人，自民国十一年即在北京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其意即欲于本党之外，自成私人团体，以谋一己之利益，此次在京发布种种反对国民政府言论，诬蔑同志，破坏党政府之信用。纵无西山会议，亦当处以严重处分。况此次西山会议，谢邹二人事前奔走联络，利用同志会之分子，捣乱北京执行部，更进而发起西山会议。事后又派遣党徒，分赴各地运动联络，攘夺党部。故谢持邹鲁二人，纯为主动之人，其违反党纪，

以此二人为最。谢持邹鲁应永远开除党笈。

(二) 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12人，附和谢持邹鲁，除张知本外，均参与西山会议，实属违背纪律。张知本虽未到会，然未声明与西山会议脱离关系，亦不能无附和之嫌。惟此12人，并非西山会议之主谋，略述原情，应予以自新之路，由大会用书面向上列12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此12人中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执行纪律，开除此不接受大会警告者之党笈。

(三) 戴季陶于去岁五月，曾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起草关于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训令，乃曾未一月，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但于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志表示悔悟，综核其个人言论，虽或出于爱护本党之热情，然因此致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与戴同志原意适得其反。惟念戴同志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对于西山会议一案判决如此，其有与别案关涉者，当另案办理。

(《政治周报》6、7期，1926年4月10日)

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

(1926年)

(一) 列名西山会议诸人兼有其他违犯党纪行者

甲 居正除列名西山会议外尚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经警告不理；且现尚在湖北捣乱应予以除名处分。

乙 石青阳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且勾结军阀，亦应予以除

名处分。

丙 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应予以警告。限二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

丁 邵元冲现尚在上海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予以警告，令其立即停止进行。

戊 叶楚傖除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复主持民国日报作反动之言论，应令停止职务，并将该报交出改组。

己 沈定一在浙江省党部作反动之举，应予以警告，令其立时停止进行。

以上诸人，经警告而不服从大会决议者，是自绝于本党，应予以除名处分。

(二) 凡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分子，限二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否则开除党籍。

(三) 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人员，如邵元冲，叶楚傖，并入(一)条丁戊二项办理外，其他九人如桂崇基，周佛海，刘启明，沈仪彬，刘庐隐，马超俊，郎醒石，袁世斌，黄季陆，等则加以警告，限二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否则除名。

(四) 服务段政府机关者处分如下：

甲 马君武彭养光参加段祺瑞之善后会议应予以除名处分。

乙 杨庶堪未得本党许可，而参加段政府阁员，应予以除名处分。

(《政治周报》6、7期，1926年4月10日出版)

十 主持中共北方区委

述 要

中共“一大”后，由于全党只有党员57人，故北京、武汉、湖南、广东等地党的组织开始均称支部。1921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规定：“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在党的“二大”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共合作建立后，为加强北方党的工作，北京区委曾于1924年3月8日进行了改组。李大钊任委员长；蔡和森：秘书；张昆弟：劳动运动；何孟雄：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范鸿劼：会计。在这期间，李大钊在京建立了秘密印刷所，除继续翻印党中央机关刊物《响导》周报外，于4月27日创刊了北京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周刊。

同年5月21日，张国焘被捕叛变，李大钊在长子李葆华陪同下，急往昌黎五峰山避难。离京当晚，便衣特务就到家中搜捕，其后军警又追到乐亭大黑坨村搜捕。

在李大钊出席的于1925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讨论“第五次国际大会准备事件”时，就“决守常出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9页）这时，李大钊接中央开会通知，遂秘密返京，约集王荷波、刘清扬等研究出国办法，后分批前往哈尔滨。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7月1日，李大钊向大会第22次会提交了书面报告。会议结束后，他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访问，多次发表讲话，介绍中国革命运动。他也

撰文寄回国内，向中国人民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热烈支持。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冬，李大钊由莫斯科回国。

在李大钊去苏联期间，中共北京区委改称“地委”，由赵世炎任书记。李大钊回国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北方政局，召集北京地委负责人赵世炎等在家中开会，分析形势，决定采取争取冯玉祥、联合国民军反对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并讨论了关于成立北方区委、筹办党校等工作。

1925年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局开会，鉴于“中局离京广甚远，不能直接指导，决定由中局指定中委二人会同当地书记外加技术委员二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之后，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并兼北京地委工作，由李大钊任区委书记。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决定，北京地委不再由区委兼任。这期间，成立了北方区委党校，正式开始培训党的干部。

北方区委负责领导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三省、内蒙等广大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李大钊同时肩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重任，他的这种身份，就为充分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直接宣传、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具备了有利条件。这样，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北方革命运动从1924年冬起，又重新高涨起来。从长城内外到渤海之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革命风暴。从1924年冬至1926年春，仅北京一地就先后有“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卅”的运动、“关税自主”和“首都革命”、以及“三一八运动”等，参加斗争的群众少则几千人，多时达二、三十万人，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腹之地，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给予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以沉重的打击。

在这期间，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北方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到1926年6月，据直、鲁、晋、热、察五省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农民协会五十多个，会员达两万人左右。北方农运最活

跃的河南省，于1926年4月18日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二十七万之谱。”（《中国农民》第1卷第8期，1926年10月）各地农会会员团结广大农民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另外，少数民族革命运动也蓬勃兴起，培养了一批党的少数民族干部。

在大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的同时，李大钊十分注意发展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培养吸收党团员的工作。至1926年7月，北方区委已有党员两千多人。党团组织的壮大，有力加强了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保证了群众斗争运动的深入发展。

李大钊对北方区党的工作倾注了全副精力，领导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在这过程中，显示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被人们称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领袖”。

（一）北方区委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 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
宣传工作的决议^①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希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

^① 副标题是原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节录）

（1924年5月）

.....

京 区 报 告

一、党 务

北京区委，3月8日改组：守、和、昆、孟、鸿为委员。区委分工：守委员长，和秘书，昆劳动运动，孟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鸿任会计。

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处，为内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员会能管理并指挥一切行动。至于组织及训练则还未至于完善。

北京现有党员32人（工人同志仅1人）；新加入候补14人。

唐山现有党员8人（皆工人）；候补工人^①（系交大学生）。石家庄有党员7人（工人）。

唐山石家庄皆早已成立地委。惟石家庄现因缺人主持，有等于无。唐山情形颇好。

天津有候补党员4人、党员1人，已成立一组，以树为组长。天津情形很好，S.Y.地方新成立，市民极活动，纱业工人亦不少，此地颇有发展希望。保定有候补及党员5人，已决定成立小组。此外，山西有候补党1人，热河1人。全区合计有75人。工人占四分之一强，余皆学生。

至于政治宣传，《向导》可销八百多份。区委新出一《政治生活》，第一期在京销三千份，重印两千份。现已出至第三期。影响还好。关于反对太戈尔的宣传，除《政治生活》外，又散了几千份传单。李义元案参与中央公园之集会并发散传单。“五一”在工刊上发了一个布告，在京只有一个小集会，但在民党印了四

^① 原文如此，“工人”似为“工人”之误。

种传单。此外各种政治宣传问题，皆提交民党照办。

.....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①)

中共中央通告第一号

——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分工

(1925年1月24日)

“同志们：

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照章选举同志仲甫、守常、和森、特立、德隆、秋白、述之、平山、罗迈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志邓培、荷波、章龙、太雷、锦堂五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月22日）决定分配工作如下：仲甫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华组织部主任，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特立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和森、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驻中央局；守常驻北京，平山驻广东，德隆驻汉口，罗迈驻长沙，邓培驻唐山，锦堂驻安源；章龙、荷波任铁路总工会工作，太雷任S.Y.中央工作。特此通知

中央总书记T. S. Chen”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

2. 北方区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节录）

(1925年10月)

京区报告议决案

扩大会议听了京区报告以后，对于京区的工作应指示左列几个缺点：

在几乎没有工业的北京市，现在竟有了三十一一个工人同志，

这是第四次大会后京区唯一的成功。惟北京是中国智识阶级之大本营，在北京实际的政治运动，我们不能不看清知识分子是目前的最大动力，北京方面未能得着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乃是一个缺点；尤其是唐山乃是北方第一个大工业区，至今我们只有三十九个党员，这是应该立即救正的缺点。

此次天津唐山罢工之失败，当然原因甚为复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党在唐山天津的工作从来太未曾努力，因此未能乘五卅运动之初起，发动罢工，而发动在全国运动低落之时，致为军阀所乘。党的指挥不得力也是一个原因。

京区同志中，对于工人阶级与国民军的关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假定国民军是比较开明的军队，对他存了过量的希望与幻想，甚至依赖国民军领袖是工人之保护者；这是应当痛改的，以后应当根据本党的政策决定工人阶级对于国民军的態度，且从事实际工作。

北方工作日见重要，以前的京区委兼地委，多注意北京市的工作，不但不顾及东三省和山西，即对于近在天津、唐山两地方，也未曾有充分的指导；扩大会议后，北京市地委应立即组织，不由区委兼任，以使区委能够注意全区的工作。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①）

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1925年1月—1927年4月）

（管辖：北京、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
1926年7月统计全区党员共2069人。）

书记：李大钊

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后）范鸿劫（1926年6月）

宣传部：部长赵世炎

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兼）（后）王仲一（1926年6月）

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怀才

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于方舟

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北京开办，担负轮训全党部分干部任务）

校长：罗亦农

北方区团委：书记肖子暉

（后）赵士炎（兼）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

3. 北方区委的工作

内务部通缉李大钊等之咨文

案准京畿卫戍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①等扶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有张坤生^②等扶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盛德^③、刘仁静、沈杰等^④等，女党员有陈佩兰、^⑤廖佩英^⑥等，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明，转令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以保治安，而遏乱萌，等因，到部。除分行外，相应密咨查明办理。

（《晨报》1924年6月28日）

-
- ① 疑为谭平山之误。
 - ② 疑为张昆弟之误。
 - ③ 疑为高君宇即高尚德之误。
 - ④ 此人不详。
 - ⑤ 疑为陈碧兰之误。
 - ⑥ 疑为廖伯英之误。

政府查禁各大学共产党

案准临时执政府军务厅第一〇一三号函开，本月三日据京师宪兵司令部密报，转据宪兵第二营报称：北京大学首倡共产党李大钊，字秀昌，现住该校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并不日开会，议决进行手续之消息等情。据此，当函复该司令部，加意严密侦察，随时报告。兹据报称：于本月九日，据第二营续报，探闻北京大学共产党首李大钊于昨晚在该校第三院寄宿舍，招集党员，密开会议事，其宗旨系令各党员分派成组，密往京师中学以上各校，运动学生加入该党等情。据此，除仍严密查察续报外，相应函请通飭各校，严行防范，以靖地方，而肃学风，等因。准此。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校、局即便遵照转飭各中小学校严密查察，认真防范，是为至要。此令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教育总长 王九龄

(《晨报》1925年3月25日)

一九二四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

五大后对北方区工作的部署

彭 健 华

1924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后回到北京。当时北方区委还未成立，赵世炎任北京地委书记，高君宇和范鸿勳是地委委员，我是地委技术书记。有一天，赵世炎告诉我说：守常回来了，今天晚上在我家里开会，我已通知了君宇和铁总的同志，你早点去。当时他家住在西城石驸马大街尽西头一个小胡同里，门牌八号，是个座北朝南很整洁的小四合院，只有三面房，进门只是一间门房。北屋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时北屋有微弱的灯光，据说是他老太爷和赵世兰姐妹的住室。东屋三间大概是厨房等杂屋。西屋三间两明一暗，即赵世炎住所。室内对门和东窗下放着一张方桌，靠南墙竖着两只书架，摆着俄文、法文

和中文的书籍。内间为卧室，陈设虽很简单，却极整洁。

我到后不久，李大钊即到。他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也不落座，便谈起他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的情景。共产国际开会时，赵世炎还在莫斯科，他比李大钊回国早几个月。他俩谈论得很起劲，我也以极大的兴趣入神地倾听。过了十几分钟，李大钊便说：“怎么他们还不来？”赵世炎说：“我都通知他们了，不知是未接到通知，还是有事不能来。”李大钊便说，“那我们就先谈谈吧。”于是三个人就在东窗下围桌而坐，因其他同志未到，这次会议便成了三个人的座谈会。

赵世炎先把北京地委的工作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他谈到，最近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工作倒很顺利，只是基层干部很感缺乏，有些入党较久的同志，除了南调的之外，又不断派到外地去开辟工作，或支援外地去了，所以干部很感不足，不足以适应目前党组织发展的需要。最近我从各学校支部选拔了一些积极分子，办了几期短期训练班，每星期开两次会，就党的建设、马列主义常识和国际形势，以及党的政策等问题，作过几次报告，同志们兴趣都很高，提高了大家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还有许多同志都争相参加学习。李大钊听了之后便说，干部训练非常重要，我们须赶快为党的工作的大发展准备大批的基层和中级领导干部。李大钊原是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未成立之前，就一直住在北京，开辟和领导北方各省市的工作。当时北方各省市党的工作虽与北京地委没有隶属关系，但各地党和团的工作大多是由北京地委所开辟，待成立地方组织之后，呈报中央，始与中央发生直接关系，但北京地委在工作上仍继续给予支援。因而，李大钊便说，我们这个地区范围很广，任务很重，过去虽派出一些同志去发展工作，但还不够，还须培养大批干部去各地加强领导。现在中央决定正式成立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领导北方各省市的工作。我看为要适应今后工作的迫切需要，我们要办个象样的党校，来训练干部，迎接党的工作的

大发展。党校的课程既要讲授党的政策，又要传授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方法，还要讲授些基本的理论知识，以提高同志们的认识和工作能力。因此，需要有个适当的人专门负责主持这一工作才行。世炎你担任这一工作当然很合适，但你地方工作很忙，不能分身，须另找个既有理论修养，有党内教育工作经验，而又熟悉党的政策的同志。我们斟酌一下，看什么人合适，可以向中央提出，请中央派来。现在我们不妨就开始筹划。至于经费问题，我来想办法筹措，赶快办起来才好。赵世炎说，听说罗觉（罗亦农）即将回国，由他来支持党校工作最好，他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造诣很深，世界革命历史的知识渊博，对党内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经验，最好请求中央派他来主持这个工作。李大钊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时，罗亦农在东方大学任中国班党委书记，彼此都很认识。李大钊便说，好！他最合适。于是即命我将创办党校，请派罗亦农来京支持的计划，连同北京地委工作情况一并写个报告，向中央请示。赵世炎考虑到这是有关整个北方各省市工作的问题，不单纯是北京地委工作范围之内的事，而李大钊则是负责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作的，因此他便提议，最好由守常同志再另外以个人名义写个报告较为妥当，也会更有效果。于是筹办党校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下来。

接着，赵世炎谈到党的日常宣传和教育工作。他说《政治生活》这个刊物很重要，最近我把过去出版的各期都翻阅了一下，觉得应把内容再加以充实，对当前形势和重大问题要反映得及时一点才好。一方面要结合当前形势，及时地阐明我们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宣传；同时也作为对党内同志的教育和行动的指导。过去是刘仁静主编，现在他忙于别的工作，有时不能按期出版。而君宇也是事忙，身体不好，所以现在由我在主编，只是写文章的人很少，几乎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脚戏。李大钊说，这个刊物很重要，君宇虽然身体不好，写点文章总是可以的，可要他多写点文章。我有时间也可写点文章。他很风趣地说，我来对付那个

“老虎杂志”（指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我来打“老虎”。赵世炎又接着说，《向导》周报现在销量亦在激增，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很繁要，你（指我）忙于党委的工作，兼顾不来，急需另派个专人负责才行。我今天已为郑×（忘记名字，是山西人，北大法学系学生）谈过了，由他担任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已同意，你再找他谈一谈，就马上交他接办好了。我说，繁重还是其次，最困难的是接洽印刷厂，因反动当局搜查很严，许多印刷厂害怕，不敢承印。有时出两期就要调换印刷厂。有些印刷厂便乘机抬高印价，并因怕受损失，定要先支付清印刷费，所以在出版方面很麻烦。尤其是印党署名的传单更困难，要跑好多小印刷厂，出大价才能找到承印的地方。李大钊说，这倒也是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中央在上海自己办有印刷厂，印刷各种刊物和宣传品。我们今后也还会有很多的宣传品要印刷，我看也要想办法在北京办个印刷厂才行。当然，要办印刷厂既需要筹措一笔可观的资金，还需要物色具有相当管理经验的人来主持，我们要想办法办好这件事。开始不妨先小规模地办，印些传单之类的东西，以后再慢慢加以扩充（北方区成立后，1926年春，在陈乔年计划下，北方区办了一所印刷厂，指派高风任厂长，一位对印刷业较有经验的同志作助手）。

赵世炎接着谈到，过去北京地委的工作，几乎仅限于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界。北京虽不是工业区，但也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如财政部印刷厂等等。过去我们虽对工人运动作了些努力，但迄今还没有成立一个工会和党的工人支部。铁路方面的职工运动有铁总他们负责，北京地委也急需有个专人负责职工运动，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才好。我想把陈为人从天津调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对职工运动具有相当经验，天津工人运动已有基础，把他调来，天津工作也不致受影响。李大钊说，很好，我们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很多从事各部门工作的干部。农民运动也需要加以重视，现在各地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在相继兴起，

需要我们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比如，河南的红枪会是一支很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成份都是贫苦农民，但大部分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被他们所利用。我们曾派去一些同志进行工作，今后还要加派同志去掌握这支武装力量。还有内蒙三特区（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少数民族的工作，也应加以重视，将来办起党校时，要吸收些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到党校来学习，培养一些少数民族的工作干部。

李大钊接着谈到，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许多旧正军队也在发生变化，都希望和我们拉关系。国民二策胡景翼曾邀我们的同志去，成立了学生军。西北军冯玉祥想让我们帮他仿照黄埔军校办所军校，聘请苏联军事顾问，遣派政工人员。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主意，这些工作我们都要派同志去作，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最后，李大钊谈到国共合作问题说，目前我们党关于联合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已执行得很有成效，还要教育同志们，一方面定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也不要态度过于生硬，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把这一工作进一步做好。关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首脑人物，我来对付他们。听说现在环境比前个时期稍微好一些，我想仍在北大教点课，这样可以和教育界人士多接触。同时我回到北京后，必然会有许多人晓得，如果不露面反而不好。这样我们可以各方面互相配合，来推进工作的发展；你们看怎样？赵世炎说，很好。

会议结束了，临走时，李大钊把他的住址告诉我，要赵世炎和我有事随时到他家里去，并要我最好每三、两天去一次，看有什么交办的事没有。

当时李大钊住在西城（详细地址已记不清了），记得是一所座北朝南很整洁的四合院，北屋五间是他一家人的住室。东厢房是厨房和杂屋。西厢房是他的书房。南屋是客厅，客厅里除了些桌椅外，还放着一张大写字台。平时他并不在书房里，会客和写

作都是在客厅里。当时他在北大担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有次我去见他，他正在客厅里备课。写讲义。他看到我便说，有什么急事没有？我说，没有什么急事。他便说，那你先到西屋里去坐坐，葆华他们在那里，等我马上把这段讲义写完，咱们再谈。西屋三间，北首的一间就是他的书房，房内西墙全是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中文、外文书籍，还有一大书架线装书，李葆华和他一位年龄相仿的亲戚正在房里作功课，他俩都在北大教授创办的孔德中学读书。当时我除了常到他家里去请示工作外，也曾乘他在北大第一院上课时去教员休息室找他。我和赵世炎住在沙滩北大第一院附近的中志胡同三号（实际上是北京地委的机关），有次赵世炎患病，有事需要和李大钊面谈，我曾乘他在北大授课时，请他到我们住的地方商谈过工作。

1925年春，环境日趋恶化，李大钊便不再去北大授课，搬到苏联大使馆去住。时北方区委已正式成立，他是书记，我是秘书，因他不便常出来，区委即决定，为便于处理区委日常工作，与住在外边的区委委员联系起见，我也搬到大使馆去住。直到1926年秋末冬初我离开北京止。

（《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节录）

（1960年7月30日）

萧三

1920年4月底，我和世炎同船到法国去。同船的有些湖南人、四川人及各省人。毛泽东同志曾到码头上来送行。船行五十天，6月15日到达法国马赛。同船到法的人下船后即乘火车到巴黎，然后分散到各地寻找工作或先学法文。本年冬在蒙达时一批新民学会的会员和其他在法勤工俭学的人，如王若飞、袁子贞（后在天津牺牲了）等同志，在蔡和森同志的倡导下，组织一个“工学世界社”。社章的第一条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以“实行社会革命

为宗旨”，这个组织已不简单的是个学会组织，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了。当时，世炎不和我们在一起。

1923年3月世炎和若飞、延年、乔年……许多同志都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当时，一起学习的还有彭述之（后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萧劲光、许之桢、蒋光赤、谢文锦等同志，都是由国内去的。还有汪泽楷、郑超麟、尹宽（此三人后都成了托派），记得在—项分组学习中，我们推世炎为组长。在东大学习一年半后，我们先后陆续回国。我是和萧劲光等同志一起回国的，在1924年夏天；世炎回国是同年的秋天。

我回国后在湖南作共青团湘区（比省的范围大些）的书记。以后我由中央调来北方工作，初任张家口地委书记，名义上是干国民党的工作，经常接触铁路工人。有一个工头接受冯玉祥的津贴，他密告了我。有一天冯的副官找我谈话，并把告密信（涂去写信人的姓名）给我看。他说：“冯督办不欢迎你”，（这是1925年夏秋之间的事）。我便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李大钊同志要我回北京来，因为这时虞正和冯在拉国民革命的关系，还是暂时避免和他冲突的好。那时世炎同志在北京地委工作。不久，中央来北京开会，会后成立党团的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任党的北方区委书记，世炎是宣传部长并主编《政治生活》，陈乔年是组织部长，范鸿劼也是搞宣传工作的。我作共青团的北方区委书记，因此经常和世炎见面。世炎同志等虽是搞北方区党的工作，但主要力量放在北京（他是北京地委书记），办公机关设在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占二楼的一排房间。团的工作主要是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并且团员主要是各大学学生，中学生都很少。

1926年6月世炎被调到上海。秋天我也被调往上海作团中央的组织部长。因为任弼时同志去苏联，我又代理团中央书记的工作。上海工人三次暴动时，我和世炎同志在闸北区指挥，住在一所房子里，听消息，发布命令。当时世炎同志是江浙区委的组织部长，罗亦农是书记。三次起义成功后，亦农代表共产党去出席

上海市人民政府会议，区委无人负责，我便提议由世炎代理书记，并得到在座同志的同意（我所写的悼世炎同志一文中的“第二书记”即由此而来）。有时开会我们总是等他，回来迟了，大家都很担心。记得他每次回来虽然显得很累，但讲述他如何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工人接头等等情形，非常详细，具体。

1927年7月初我到海参威养病。秋冬间听到一个去苏联学习的上海工人江源清告诉我，关于世炎被捕牺牲的情景，非常气愤。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1925年春北方区创办党校的回忆

彭 健 华

1924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后，回到北京，在赵世炎家里召开了一次北京地委会议，决定要在北京创办一所党校。会后，由我根据会议的决定起草了一份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北京地委的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计划。李大钊也同时以他个人名义就当时北方工作情况和创办党校，请调罗觉（罗亦农）来京主持党校工作的计划报告中央。中央接到报告之后，于1925年初即作出决定，认为：为大力开展北方各省市党的工作，有正式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必要，因即回信：一，正式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指定李大钊任区委书记，赵世炎、陈乔年、李希逸（当时天津地委书记）、邓培（当时唐山地委书记）为区委委员，范鸿劼、于方舟（当时天津地委委员）和我为区委候补委员。赵世炎任宣传部长，陈乔年任组织部长，我任区委秘书。二，批准了北方区委创办党校的计划，并同意罗亦农在京主持党校的工作，并说罗亦农不久即将回国，他可能先到北京，就留在北京主持党校，但及一期为限，俟一期党校结束后，即去上海，另有工作。当时李大钊筹措的经费也已有了眉目（是向加拉罕筹措的）。

党校主持人和经费问题都已有了着落之后，在罗亦农来到北

京之前，便由赵世炎负责，我作助手，开始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首先在北京后门外，鼓楼北大街西的一条偏僻胡同里租定了一所较宽敞的房子作校址，估计可以容纳六十名学员住宿。于是便以三个月为期，就课堂设备、炊事等用具、学员六十人膳宿和纸笔文具等用品的费用以及外地学员来往旅费等等造了一份预算。

当时考虑到几十人在一所房子内几个月集体生活很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和怀疑。为保证完全起见，觉得对外还是用公开的学校名义较好。于是便决定取名为“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但创设学校须先将学校宗旨由学校负责人向教育当局申请注册。因顾及到罗亦农初到北京，对国内情况不熟悉，不便由他以校长名义出面。须另派一适当的人出面才行。虽然在北京可以物色一些同志，但当地熟人太多，不易隐蔽，又怕有人为谋求职业而来报考“学校”，招惹麻烦。为了慎重起见便和天津地委斟酌，从天津调来一位曾在天津主持过某私立中学而又与北京教育界素无关系的同志，对外以校长的名义出面。那位同志的姓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个四十多岁的矮个子。遂由赵世炎草拟了一份申请注册的申请书，由那位同志以学校创办人和校长的名义出面向教育当局办理了注册手续。他对外的名义是校长，而实际上对内则是事务主任，负责关于教学用具和学员膳宿的备办等事务工作。因他办过学校，这方面有经验，所以办理得很妥当。罗亦农是学校的主管人即实际的校长，但对外的名义则是教务主任。

校舍是一所座南朝北的大型四合院，南屋正厅敞开的三间充作教室，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耳房是教务主任室，西耳房是文书室和图书室。东西厢房各三间充作学员宿舍。沿东西厢房的北墙有一道砖墙和一个屏风门，分作前后两个院落。前院临街的一排北屋是接待室、校长室、庶务室和厨房等。大门是开在最西边的一间。校长室就设在临近大门的地方，以备如有外人有事到学校来即在前院应付，内院教学不受干扰。每个办公室门口都挂着牌

子，安排得十分周全。大门口挂出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看起来很象一所普遍的学校。

当学校的筹备事务安排妥当时，罗亦农即到京，与党取得联系后，先和赵世炎会面。当时李大钊已搬到苏俄大使馆住。赵世炎即约我一起陪他去会见李大钊。李大钊在莫斯科已和罗亦农熟识，所以一见面很高兴地交谈起来，李大钊先把当时党的工作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便提到为了大力发展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极需培训大批中下级工作干部，决定在北京创办一所学校，但感到须有最得力而又富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同志专门主持学校工作才行。接着说，因听说中央已决定调你回国，我和世炎考虑觉得能由你来主持这个工作最为合适，便向中央提出。现在中央已作出决定，你暂时不必去上海，就先留在北京主持这期党校的工作，你有什么意见？罗亦农说，我刚才已和世炎谈及，既是党的需要，而又作出决定，我当然服从党的决定，也极愿暂时担任这一工作。只是我刚回国，国内情况不熟悉，心里没底，不知怎样着手进行。李大钊说，这不要紧，世炎情况熟悉，由他协同你办理就是。关于教学内容和训练计划，我们再一同仔细研究。赵世炎说，关于校址和一切事务方面的问题，都已经安排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你来了，我们就可鸣锣开场了。预备选送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是期望学习心切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到时候你只管教学和培训方面的辅导工作就是。谈话结束后，赵世炎即和罗亦农到他临时的住所去作莫斯科分别后彼此情况的长谈去了。第二天，赵世炎即命我帮罗亦农搬到党校去住。他就住在内院钉有教务主任室牌子的东耳房内。有位女同志担任文书和图书文具保管员，住在西耳房内。不记得那位女同志的姓名了，只记得她是安徽人，党校结束后，曾在北京地委作过短时期的技术工作，以后被调到广州去了。

当时北方区委已依据各地区工作的需要，确定了各省市选派学员的人数，并规定了选拔学员的条件：较有工作能力，学习心

切，有培养前途的党、团员积极分子。遂即分别通知北方区所辖各地委照区委所决定的人数限期选派学员携带行李和自己日用品来北京报到。

党校的课程和教学计划是李大钊、赵世炎和罗亦农三人拟定的。学员辅导工作主要是由罗亦农负责。记得讲课的除了赵世炎、罗亦农、陈乔年之外，还有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肖子璋（肖三）、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等。记得课程和讲授人大致是：

罗亦农——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革命史。

赵世炎——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职工运动、农民运动。

陈乔年——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党的建设、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概况。

肖子璋作了关于共青团的任务和青年学生运动的专题报告。

刘伯庄作了关于党的国共合作政策等问题的专题报告。

罗亦农和赵世炎将授课时间表安排好后，便于一九二五年春（确切时间记不清了）正式开学。

开学那天，李大钊出席了开学典礼，发表了重要讲话，详细阐述了当前革命形势和党校的任务，勉励大家抓紧时间努力学习；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斗争的前线，为革命的事业，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

赵世炎接着讲话，简要地讲述了党校筹办的经过。阐述了学员守则，着重指出环境恶劣，大家必须严格遵守校规，在校期间一律不得外出。校内一切事务均由罗亦农负责领导，如需要外出必须经他批准，不得自由行动。某某同志以校长名义对外，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关于食宿和应用教具均由他统一筹办。这些事大家不必管，只要安心学习就是。他接着说，在目前客观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在我们党经济情况极困难的条件下，办起这样一所党校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必须比在普通学校更加注意遵守校

规，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定要养成习惯，对某某同志称校长，不管他在校内的实际职务如何。由于条件的限制，一期学习只能有三个月，不能时间太长，因此，我们必须珍惜时间，星期天也不能虚度。希望大家辛苦点，尽可能多学到点理论知识，多汲取点实际工作的经验，来提高认识，增进工作能力，以便将来在实际工作中作出贡献。

最后，罗亦农讲述了教学计划和课程的安排，上午和下午上课或听报告，空余时间和夜晚自修，整理笔记。每十人分为一组，推选一位组长，召开小组会进行讨论。每星期将学习记录和讨论会记录汇齐交教务处审阅。学校订有几种报刊，搜集了些参考书，大家可以阅读。对所讲授的内容，如有疑问可随时提出。他接着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者，那就必须对共产主义理论具有起码的知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内容极其浩瀚的科学，绝不是几个月时间就能通晓和掌握的。我们虽然计划了一些讲授的科目，课程也排得很紧，也只不过是向大家提供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入门的途径，使大家对党的理论、党的路线和政策有一定程度的领会，学到一点从事实际工作的方法而已。但这个入门的途径却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愈丰富，便愈会增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唯有在革命的实践中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入门的第一步做好，以备将来大家回到实际工作岗位后，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继续深造，继续不断地提高认识，提高工作能力而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罗亦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极深，历史知识极渊博，又有从事党内教育的丰富经验。除了计划讲授的课程外，他还经常举行时事报告和组织学员讨论。学员们在校学习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他精心筹划和辅导下，大家学习情绪极高。因校址偏僻，胡同内往来行人稀少，环境安静，计划进行得极为顺利。记得这期党校开学后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预定的教学计划，最后举

行了一次联欢会，就结束了。

党校结束后，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往回原地，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也有的指派到其他地区去工作，如保定的一位姓黄的同志被派到唐山地委去工作。当时参加学习的同志有尹才一、陶永立、唐从周、卓恺泽、邓鹤皋等，当时他们都是北京各院校的学生和党的工作的积极分子。之后，他们都离开各自所在的学校，专门从事党或团的工作了。尹才一曾任共青团北方区委委员，天津纱厂罢工时曾随赵世炎去天津参加纱厂罢工的斗争。陶永立被调到北方区委组织部工作。唐从周曾任共青团北京地委书记。邓鹤皋曾任地委委员。他们都在党和团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期党校结束后，北方区委本打算再继续办几期，但由于北京环境日趋恶化，考虑到如仍以公开名义办学，有暴露的危险，而且罗亦农依照中央指示去上海，又感一时没有适当的人负责主持，所以一期结束后，就没有再继续办了。那位名义校长就返回了天津。

党校结束后，罗亦农动身去上海之前，由赵世炎布置，曾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了一次公开的讲演。事前由北太史学研究会的名义，在各大学张贴海报：“兹聘请罗亦农先生于×月×日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讲演《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欢迎听讲”。当时数百人到会听讲，罗亦农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很有讲演才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讲演结束后，许多听众纷纷议论，以为他是北大新聘请来的一位名教授。

一九七九年九月

（《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4. 回忆《响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

刘 鉴 堂

（《近代史资料》编者按：作者曾参加过1923年“二七”罢工和1924年北京印刷工人罢工；于1925年曾受党的委托，经营印刷厂印行《响导周刊》等期刊。这篇回忆录，叙事不免简略，但也可以看出北京的进步工人，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由“俱乐部”发展成“总工会”的经过；又可以使我们知道党的机关报《响导》，如何在敌人环伺的情况下印刷出版，和党依靠工人群众坚持斗争的情况。）

我的名字叫刘明，别名鉴堂，现年六十二岁，十六岁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厂京华印书局学徒，由于当时资本家对职员与工人待遇不平等，我于1920年愤而辞职。1921年经友人介绍到京汉铁路印刷厂工作。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党的教育下，为了反抗军阀压迫，在1923年发动了“二七”大罢工，我被选为印刷所工人代表，参加长辛店总分会罢工大会，事后被军阀走狗印刷所所长孟彬卿开除。我虽然失业了，但经过罢工的斗争，对于共产党是非常向往，但那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我多方想办法要找到党，恰巧同行师弟王永珍（化名王丙中）认识共产党员北大学生于国桢、陈伟人二位同志，由他们介绍，满足了我的愿望，得以接近伟大的党。

于国桢同志知道我参加过“二七”大罢工，遂要求我在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一次报告，介绍了罢工情况。当时党正在北京组织工人运动，由党员陈伟人（化名陈涛）领导北京各报馆印刷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群众中选出骨干，如海北寺街同昌印刷局进步工人董学仁，负责招集了北京各报馆的工人，全体报业印刷工人，都派有代表到陶然亭开会。主要目的是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参加开会的各代表一致通过。会后工人代表向

资本家提出此项要求，资本家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反而用种种手段威胁工人。印刷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有了初步组织，为了与资本家展开斗争，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大概在1924年12月间，北京大小报馆二十余家的工人一律参加了罢工，罢工时间延长了三天之久。当时《益世报》工人未参加是为了留一分报纸便于报导有关罢工消息。《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办的，在压制下工人也未参加此一行动。资本家在工人的威力下，不得不答应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原薪上又加了六元。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工人的组织尚弱，罢工结束以后，奸狡的资本家就把进步的工人和代表借故开除，作为报复。这种诡计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工人阶级已有伟大的共产党在领导支持，这时李大钊同志认为工人必须从速组织起来，于是决定建立工会，在党领导下，以工会为工人运动的核心。1925年2月党派陈伟人为领导，董学仁、丁振华、马荣昆、王永珍、赵铨材、林维翰和我共同组织“工人俱乐部”，地址在东琉璃厂东太平巷一号，成立以后入会者日渐增加，地址感觉狭窄，就迁到南池子内小苏州胡同五号，从此事务日多，就扩大为“北京总工会”，林维翰任工会主席。工会成立时，记得有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同志、刘清扬先生分别赠给贺联。回忆工会当时曾设有文娱的部门，并设有交际干事，曾举办了失业工人登记的工作。

由于1924年北京报馆印刷工人罢工的胜利，影响了其它行业的工人，很多工人愿意参加总工会，计有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财政部印刷局、电话局、机器业等以及全市各大小印刷厂的工人代表；此外还有水夫、粪夫、人力车夫等都派代表联系，加入了“总工会”。

1925年2月3日，李大钊同志通知陈伟人，召集我们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第三教室开会，主要是讨论成立印刷厂，为党印刷刊物，这天到会的有陈乔年，陈楚榭（化名陈昌华）、陈伟人，刘抵如和我五人。开会前李大钊同志很谦虚的向我说：“你就是刘

明吗？”我说：“我就是刘明。”大钊同志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印刷厂，主要的是印《响导》，你们把这工作做得好点快些”。他跟着说：“我有点事，你们几位谈罢，”就离开走了。开会由陈乔年主持，他向我和刘抵如说：“要建立一个小型印刷厂，需要多少时间？”刘抵如说需要两三个月，陈乔年说时间太长不行，大家讨论了十几分钟，最后陈乔年要求两个星期，我说二十天可以出版，这样就决定了。于是陈乔年派陈楚榷主办我来协助，陈乔年并付给陈楚榷华比银行钞票二千元，散会时已三点钟了。

我与陈楚榷离开北大后，马上就到西便门外贻来牟机器制造厂购买印刷机，看了一盘十六页铅印机，要价八百元，我们嫌贵未买，商量后决定由我去买旧机器。我与陈分手后，即到各处托人物色旧机器，后来打听到前门外兴隆街兴华斋刻字铺有一批机器和材料出让，我去看后，计有东洋十六页铅印机一部、二号脚踏机一部、二号铅字半付、三号铅字半付、四号铅字全付、五号铅字全付双四盘、各号空铅料字、各号字架全份并带字盘、油墨半桶、另星小工具等共议价洋一千四百元，当时查点清楚，即付定钱二百元。又到广安门大街兴艺铁工厂买了铸字机一部、镟铅刀壹架、浇铅条机一部，又由棉花五条傻李处租了一部十六页铅印机，于2月8日在广安门大街广安市场后身广安西里八号租到房屋，是一个独院，计房十二间，对外字号为昌华印刷局，由王永珍协助建厂事宜，筹备于2月10日开工。人员分工是：陈楚榷为经理，我为厂长，马贵珍（别名马子明）任会计兼营业，刘抵如为排字部主任，何振芳为铅印部主任，马扶青为通讯员，计有工人三十五名，于2月11日正式开工。

1924年北京报业印刷工人罢工虽取得胜利，但事后进步工人被资本家开除不少，印刷厂成立后使一部分失业工人得到安排，所以印刷厂除了给党服务外，救济他们也是一项任务。

印刷厂开工后，主要印刷《响导》、《政治生活》及传单

等。这厂里没有编辑部，取稿子由陈楚榭负责，他无时间就由我去取，有时在王府井大街北边菜厂胡同四号汪再春处；有时在北城锣鼓巷八号李大姐处。当时印刊物有一期《响导》就有一期《政治生活》，《响导》来稿中有的的是编写的原稿，有的是剪贴的印稿《政治生活》来稿多是原稿，印《响导》是用的桃牌日本纸，《响导》开始时印1500分，以后有增有减，这两种杂志印好后送往北京大学。事隔多年，只记得《响导》地址仍印广州字样，此外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伟大的党报《响导》就是这样坚苦的在偏僻陋巷中，一期一期的印行，半年之后，终于被敌人注意，可是任他多方调查与询问，都被我们机警的应付过去，并且承印一些市民的活计，以便掩护真的内容。我们白天印市民的稿件，夜里搞党的工作，虽然随时随处警惕着，但敌人的危迫一天比一天加紧，今天警察来问，明天侦辑队来查，还有很多便衣走狗罗列在厂的周围，形势是异常危险，我们为了保全实力，不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起见，不得不转移陈地，把印刷厂迁移到北城花枝胡同十一号，厂名改为明星印刷局。在1925年冬天陈楚榭因另有任务，介绍朱干臣担任经理职务，陈临行时说要去天津转汉口，以后就不知下落了。

《响导》在1926年大概只印了两三期，《政治生活》同时也不印了，后来在何处印我不清楚。

1926年4月间，军阀张作霖的势力侵入北京，对共产党及进步工人的压迫日甚一日，我们为了保存一点力量，由于国桢同志想办法，推出董学仁、刘抵如二人率领全厂工人，随着冯玉祥的军队撤往西北，工人方面计有白润庄、刘祯、姚增瑞，索文镛、索文忠等三十儿人，听说这批人到萨拉齐后也就分散了。我后来来到济南、太原等地印刷厂工作，“七七”后由山西临汾到延安中央印刷厂担任铸字纸版等任务，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北京解放后在新华印刷厂第一厂工作，因身体残废退休在家。现在回忆过去，很多事情已记忆不清，其中遗漏之处，希望曾参与其事的同

志，多加补充。

(《近代史资料》1958年1期)

5. 《政治生活》与读者

(一)

本刊的篇幅有限，一时的力量又不许可我们能扩充，这次为评论政治现状与记载北京民众运动，只两篇长文字便已占满本期的篇幅。但是这两篇长文是有意义的，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都有明了政治现状的欲望，以求了解政治及民众运动复杂内容之热诚。这次的两篇文字使为合于读者的要求，虽长，但材料仍没有完备。

一个革命主义者绝不应该隐避自己的政见；《政治生活》与读者的关系，便是希望读者读了以后发表其意见。这种意见之发表并不是说只于写信或投稿给我们而已，我们是求读者要把自己的政治意见表现在行动上。据调查，读本刊的大多数是学生、工人，及自由职业者。在几千个订报与按期购阅的读者中，我们曾收到许多信件而分别给与答复；同时，我们亦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本刊读者赞助《政治生活》的政见，在本刊所指出的政策下行动。这种现象本是好的。但我们还盼望与读者亲切的发生关系，——请读者与自身怎样参加政治活动及其结果告诉于我们。

(二)

政治的工作虽然繁多，虽然现象复杂，但是我们自然找得出最重要的。譬如现在，不管报纸与一切消息怎样报告许多杂乱的新闻，但是主要的政象有两件大的需要认定：第一，最恶的奉系军阀尚未推倒，段政府尚喘延于北京，我们应当推倒张作霖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至于彻底，要求革命的人民政府之建立，而不要任何内阁政府。第二，争自由的工作最重要而最切实，我们现在应当了解凡现存的武力，具有压迫民众运动之倾向与可能，其原因

是政权尚未归于民众之故，所以我们争自由亦即为争民众政权。

你如若主张且从事这两件切实政治工作，你便是一个真实的革命主义者。一个时期有一个的切实工作，我们应当时有考查，努力从事。你若这样努力做组织与宣传工夫，而别人便要说你是共产党——这时候，你便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了。

(以下略)

(《政治生活》第59期)

(二) 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1. 在共产国际五大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见《李大钊文集》下)

2. 在苏联的讲话和文章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琴华同志对 《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

(1924年9月13日)

中国目前的内战是由国际帝国主义策划和支持的。英美资本家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和段祺瑞集团正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角逐。

英国资本正在孙中山革命政府辖内的南方帮助受直系军阀支持的反动将领陈炯明去反对孙中山。英国资本又组织了并正在支持以(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为首的所谓“纸老虎”的法西斯军队。

应当指出,南方孙中山的政策至今还不够明确。他本人尚未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前不久他甚至指望能在“纸老虎”的军队里得到支持,曾出席他们的阅兵式并给他们授了旗。最近发生的事件彻底暴露了外国资本的全部阴谋,而且必定会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踏实牢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这次内战的原因和性质。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

① 李大钊在苏联期间的化名。

国反革命斗争的同时，将组织这些工农群众投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二) 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 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24年9月22日)

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活动的舞台。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落入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一些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和生产工具，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目前正处于危机状态。一部分农民到国内的工厂去做工，另一部分投军，现在当了军阀的工具，还有一部分流亡国外，因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正进行着军阀混战，但这并不仅仅是军阀之间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日本一直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美则帮助以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尽管中国现在有这两个和更多的军事集团在进行角逐，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

然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发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把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

你们，莫斯科的男女工人们，组织起“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吧！共产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莫斯科，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聚集起你们的力量去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吧！

(三) 中国的内战和工人阶级

(1924年10月)

中国民众多少年来，一直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沉重压迫下生活。英帝国主义在中国表现了最大的侵略性。太平天国起义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把关税制度作为他们进行最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现在，这个制度犹如一根长年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把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置于完全破产的境地。农民失去了土地，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饱受失业之苦，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不断涨价又使他们背上异常沉重的负担，难以糊口活命。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到世界各地——到日本、欧洲和美国去，那里的资本家利用他们一盘散沙的状况和廉价劳动来破坏本国工人的组织。而那些还留在中国的被夺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则走投无路，只好去参军或沦为盗寇，为军阀和土匪头子的狭隘利益卖命。嗜血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不断鼓动中国的军阀和匪盗，向军阀头子提供秘密借款，向中国运送武器和军用装备。

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已非昔日可比，无暇顾及中国，这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巩固它在中国的势力。但美国不愿将巨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日本，于是就拚命地与之争夺。美国知道，日本依靠的是安福系和奉系军阀，便开始支持了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让曹吴出面反对日本的走狗。多亏美国的援助，吴佩孚才打败了安福系和奉系。后来美英帝国主义者又联合起来共同支持吴佩孚，帮他打击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仅向吴佩孚和倒戈反孙的将领们提供武器，而且还借助陈廉伯开始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组织法西斯活动。

因此，目前中国的内战是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吴佩孚进行军事冒险的结果，也反映了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分子以在中国内战期间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而联合起

来，以便利用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靠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麦克唐纳所谓的工党政府彻底撕下了伪装，公开赤裸裸地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政府，积极支持其法西斯代理人。由于帝国主义者玩弄的阴谋，中国的局势正在日益复杂化。因此，很难说中国的这场内战还要持续多久。

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的军队，当然都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组成的。他们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去当兵，去为帝国主义走狗们争权夺利而卖命。城市的工人、乡下的农民被强征入伍，赶往前线。直系势力范围内的铁路工人受到了特别残酷的迫害。比如吴佩孚就是1923年2月7日血腥屠杀铁路工人的罪魁祸首。他唯恐再有反直系军阀的罢工运动爆发，就逮捕或解雇了所有与工会有关系的工人。工厂工人人们的境况也不好。帝国主义的走狗带给他们的是死亡、恐怖、压迫、饥饿和强制服兵役。

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已经开始懂得谁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懂得，为了世界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要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领导人孙中山认识到，在反帝反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策谋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必须依靠农民和工人。广东的部分工人已经武装起来了。革命政府吁请全体中国工人给以援助。这个呼吁是中国工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发出的第一声军事号令。

英国所谓的工党政府干涉广州的消息刚一传开，几十万苏联工人就在“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下一致行动起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了这场运动。因此，工人群众已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资本主义宣战了。中国工人

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全中国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队。

(彭宏伟译、李玉贞校，原文载《远东问题》1985年第1期。)

附：关于李大钊在苏联

讲话和文章的说明

李 玉 贞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5年第1期公布了李大钊访苏期间的四篇文章。这些珍贵资料反映了李大钊1924年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活动，从而充实和丰富了他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四篇文章的第一篇。它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用的是当年《真理报》加的标题《中国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88—92页）已经收入。但是关于文章本身的情况应予说明。

这篇文章并不是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经查实，他并没有在会上做什么报告或发言^①。

不错，《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1卷第668—672页确实载有“琴华”的“报告”。但是，本次（7月1日第二十二次）会议执行主席盖什克在会上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做报告，但是今天他不能做报告。

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②

显然，琴华的“报告”不是7月1日口头宣读的，而是后来

①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49页；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第107页；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第109页。

②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668页。

编入的。

认真分析琴华的报告，也可看出，它不象别的代表那样按会议安排，直接针对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进行讨论，各抒己见；他的报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与会上讨论的殖民地问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琴华的“报告”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据李星华回忆，还在大会开幕之前，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就写好了的。李大钊写出初稿后“与其他五位代表一块儿做了详细的研究、修改，然后由他亲自将报告送给了共产国际。”^①7月11日《真理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标题是《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该报编辑加的说明是：“现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声明，将其补入7月1日讨论民族问题会议的记录之中。”

所以，载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的所谓琴华那个“报告”，实际上并不是在会上的发言，因而也根本谈不到琴华是否回答曼努伊尔斯基的“批评”问题。

下面再说明其他三篇文章。

（一）关于《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

在国际“五大”开会期间，李大钊深切感受到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者对中国人民的关怀和对孙中山的仰慕。他记述说，经常有人“询及孙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由然的流露出来。”^②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由孙中山主盟于1922年8月就加入国民党的孙中山的战友和知交李大钊，看到这种情景自然是感到

①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06页。

②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49页说，曼努伊尔斯基批评了中国共产党。查共产国际五大速记记录第1卷第591、592、593页等涉及中国处，并未见“批评中国”的内容。

③ 《李大钊选集》第511—512页。

十分欣慰的。同时，他努力宣传孙中山奉行的三大政策。

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吓慌了革命的敌人。孙中山的许多政策，关于扣留关余，扣压英国秘劳广州的军械等的做法，触犯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于是英帝国主义麦克唐纳政府派遣九艘军舰开进白鹅潭，炮口直指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大本营。强盗们剑拔弩张，武装干涉一触即发。

然而，枪炮是吓不倒革命人民的，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正义事业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于是一场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

9月5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劳动宫举行大会，洛佐夫斯基发表长篇讲话，声讨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企图。上述两个组织发起成立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并于9月6日发出《致各国工人书》，指出：“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这些劫路的强盗未能把绞索套在苏联的脖子上，就把活动重点转向远东”^①，因此，各国工人应组织起自己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并给予中国人民以物质上的援助。此后，苏联和世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这样的组织。9月6日，《真理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会成员罗特施泰因的谈话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法国共产党人特莱恩的谈话，同声谴责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

9月初，李大钊在列宁格勒参观时，就曾见到该市四十万工人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稿，号召英国工人反对麦克唐纳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②。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大钊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采访。

他在谈话中，光明磊落地指出了孙中山政策中的不足之处，

^① 《真理报》1924年9月6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1924年11月10日，引自《李大钊选集》第513页。

既有婉转中肯的批评，又有热情真诚的决心。

事过六十多年后再读大钊的谈话，人们会更深刻地领悟一个道理：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国革命之所以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因为国共两党的大多数同志都抱有这种彼此以诚相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

（二）关于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前已述及，1924年9月，莫斯科笼罩在一片声援中国革命的风云之中。示威游行几乎天天都有。9月18日，莫斯科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举行了有五百人参加的大会。其中有一名中共中央的同志，曾于当年6月在中国第二次会见过孙中山和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分参与国共合作的伍廷廉在会上做了题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与中国内战》的报告。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他从中国带回的最新消息和孙中山政府的情况。9月22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假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集会。实际上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国际援华反帝大会。在主席团就座的有英法日苏等国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的杰克逊代表该组织及美国黑人和美国共产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拉狄克做了《中国为什么发生内战》的报告，英、法共产党都有代表发言。

李大钊从列宁格勒回莫斯科后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当他登上主席台时，会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会场安静下来以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显然，会场的气氛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高昂热情，强烈感染了李大钊。两天之后，他从莫斯科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社记者写信，介绍当时的情况说：“‘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干

涉中国……前晚在大剧院又有数千人的集合，英国共产党领袖马克曼努斯及中国、法国、美国、日本的共产党代表均出席演讲。”最后，李大钊恳切地表示，希望“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①

（四）关于《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

这是李大钊为红色工会国际的机关刊物写的文章。写作时间也在九、十月份。内容还是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广州政府。但是这篇文章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孙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李大钊在9月13日接受《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时曾说，孙中山一度对“纸老虎”商团军寄以希望，而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但到十月为《红色工会国际》撰文时，已肯定孙中山认识到“在反帝反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策谋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必须依靠农民和工人。”

第二，这种提法的权威性。李大钊对孙中山态度明显的转变给予肯定，一则说明他身在异乡，但时刻关注祖国的革命；二则说明他对孙中山这个对中国政局有影响的人物是如何关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孙中山的看法。伍廷康在1924年6月写的《中国南方的形势和孙中山政府》一文中曾说，孙中山政策的重点在反对陈炯明，因此他依靠借款更主要是依靠募款，所以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和牺牲民众利益。^②。到今年8月，孙中山还对解除商团的反革命武装犹豫不决^③。但事态的迅速发展——英国总领事的威胁性照会，商团的罢市，广州水域英舰的出现，尤其是广东工农运动的崛起，这一

① 《李大钊选集》第513页。

② 《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7期第191页。

③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5—46页。

切打开了孙中山的眼界。这样，孙中山便看清了“商团和英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①

1924年9月伍廷康的小册子《中国当前的政局》初版时，作者已在书中肯定了这一点。

最后还要说明这三篇文章初次刊载的版本。

《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初刊于《工人莫斯科报》（1924年6月13日）。

《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上的讲话》的内容，1924年9月24日《真理报》曾简要报道过，但未刊载全文。该协会于1924年出版的《不许干涉中国》小册子收录了讲话全文。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初版于1924年9—10期合刊的《红色工会国际》。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1965年苏联出版的《李大钊文章言论选集》和1959年我国出版的《李大钊选集》及1984年的《李大钊文集》，都没有收入这三篇文章。而在我国尚未见到初次登载大钊这些文章的报刊。苏《远东问题》在这些文章问世之后的六十余年再次予以刊载，我们才从“第二手”得到这些珍贵的材料，现将其译出，以饷读者。

3. 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中国代表团名单

①有表决权的代表：陈独秀 罗文虎 琴华

②有发言权的代表：刘齐佳（女） 彭述之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19—1928）

^①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6页。

4. 李大钊在哈尔滨（节选）

王 芳 田

1924年6月间的一天中午，我在柜房坐着，见瑞景大哥领着一位陌生人进来，忙站起来迎接。我见来人中等个，圆脸盘，白中带红的面色，浓眉大眼睛闪闪发光，架一副无边的眼镜，头戴一顶八角工人帽，穿一身黑灰色的旧西服，一双半旧皮鞋，提一个灰色帆布手提包，还夹着一床里外都是白色的布被子。瑞景大哥低声问我：“芳田，后屋有客人吗？”我说：“没有。”我接着问：“这位是谁？”瑞景大哥摇头一摆手说：“到后屋！”我急忙把他们领到我住的房子里——柜房后院西厢房屋里。瑞景大哥这才微笑着对我说：“你看这是谁？”我仔细又一端相，还没容我回答，他又紧接着说：“这就是你久已渴望相见的人，我的兄弟李……”没等他说出名字将，我就以猜测的口气说：“莫非是守常先生？！”他说：“对了！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我的兄弟大钊！”我一听，心情十分激动，赶忙向前紧紧抓住他的双手，望着他的脸。李大钊满面笑容，好似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重逢，显得特别亲热，但又很自然，没有一点客情。坐下后，我给他们沏了两碗红茶，泡了几块砂合粒糖。他问我的生意长短，过了一会儿，瑞景大哥对我说：“芳田，你们哥俩唠吧！我替他办事去。”我送他出房外，他又低声嘱咐我：“要注意保护他，不能对外人暴露他的身分。他去俄国开会，在这里住几天办理手续。你这里比我那儿安全。”我想，瑞景大哥的重托，对我这样信赖，我一定要照办。

李大钊在我店里住下了，和我睡在一个屋里，吃在一个桌子上。他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有半点教授的样子。他白天出去办事，曾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会晤。晚上我俩闲谈，由于我的思想觉悟低，到现在大部分都忘记了，在我的记忆里最深刻的也只能回忆出几点。

他谈起当年一月曾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他还对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我是个买卖人，对这些革命理论听过以后未加思索，过后也就忘了。

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从北京出发来哈尔滨时，曾转道昌黎，住在杨扶清开办的兴中罐头公司。杨是乐亭城西南杨冈子村人，青年时期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同学，他与李大钊、周恩来的关系都很密切，是一位爱国人士，他办的兴中公司的罐头商标就是“赤心牌”。

当时我问李大钊出国的经费足不足，他说：“有准备！”临来前，从昌黎兴中公司已汇哈尔滨五百元银币。

他还谈到，孙中山委托他去洛阳和吴佩孚谈判。他到洛阳先找到白坚武，白和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同学好友，在吴佩孚手下当了参谋长，引他见了吴佩孚。当时吴喝的酒气熏人，态度十分傲慢，自以为武力强大可以统一中国，拒绝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接受三民主义，就谈不下去，所以，谈判没有结果。于是就从洛阳回到北京。

李大钊在我柜上住了三天三夜便走了。在登程前，我送给他《阅微草堂笔记》及《诗集》各一部。走时，我要送他到车站，他不让我送，避免引人注目，我就没送他。他到满洲里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不让我挂念，可惜这封信以后丢失了。

大概过了四、五个月，李大钊从苏联回国时，又路过哈尔滨。与他同时回来的还有袁子贞，袁是天津西霸人，是在欧洲做工的华侨。他们都住在我那里。在谈话中我问李大钊：“你到俄国，不会俄文俄语，一定受憋了？”他说：“初到时有些不便，我抓紧学习，后来就粗通俄文俄语了。”我想他仅仅去了几个月，就能粗通俄文俄语，他是一个多么聪明好学的人呀！我从内心里十分钦佩他。

我问他俄国的情况，他说：“好、好，工农当了家，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他用一张大白纸铺在床上给我画了一张图，并详细讲给我听。他还送给我六、七枚带有列宁头像、斧头、镰刀的苏联建国银币，还有一个苏联工艺品——木制烟卷盒，作为纪念，可惜这些珍贵的纪念品，以后全都遗失了。

他们又在我那里住了三天三夜。临行前，我问他到那里去？他说：“回北京！”我一听，就为他的安全担心，急忙劝阻他，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从行李底下拿出了日本人在奉天（沈阳）办的《盛京日报》，递给他看。这张报纸我藏了好久，看过不知多少遍，他刚来时，就打算给他看看，仔细一想，觉得这样做不礼貌。而且这样一来，他也会担心我胆怯，怕受连累，住下来心神也不会平静，只好藏起来没让他看。他决定要回北京，这一下我可沉不住气了，赶紧拿出来给他看。他接过报纸，看到上面登载北京反动军阀卫戍司令王怀庆对他的通缉令，他把报纸往床上一扔，冷笑一声说：“哼！这算个啥，反动家伙与革命者，就是这样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艺儿没什么了不得。”我说：“你暂时不要回去，先躲避一下吧，等风声过后再回去。”他又说：“干革命就是要消灭他们，这些豺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他终于回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以后，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上还告诉我如给他去信，可寄到北京白眉初教授处，由白教授转给他即可。由于当时的形势很紧张，我没有给他写信，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北方群众运动

1. 关于中俄复交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1923年10月)

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兹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极宜联合各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其理论的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委员长 T.S.Chen

秘书 Leo D.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

北大教授欢迎加拉罕

苏俄代表加拉罕氏，自抵京后，颇受各界欢迎。连日各界均设宴招待。顷闻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等五十余人，亦定于明日（星期日）下午，在校内欢迎加氏。藉与交换意见，以团结中俄交谊。并闻教育界方面意见，多以为俄国自纷乱后，中俄关系完全断绝，拳乱赔款，连带停付。政府曾以该款之大部分，抵押借款，小部分尚不明用于何途。今后之趋势，中俄将行恢复交谊，而一切关系，多须旧事重提，但该项赔款，当然可望退回，此后退回之用途，国人须加以注意，用诸于教育实业，庶为适当云。并闻此种意见，将于明日宴集时提及云。

(《晨报》，1923年9月8日)

加拉罕宴请北京学界代表 希望学界促成中俄亲交

双十节下午8时，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该团办公处大厅设宴招待北京大学教授，由该团参赞德夫金及全体团员陪席。被邀者有蒋梦麟、顾孟余、李大钊、张竞生、谭希（熙）鸿、陶孟和等20余人。席间宾主致为融洽，时至夜深始尽欢而散云。

（《京报》，1923年10月12日）

北大教授请恢复中俄国交 致书顾少川、王堂堂表示意见

北大教授致书顾少川，王儒堂，言宜即宣布恢复中俄国交。原文云：少川儒堂先生：顷者俄国革命国体变更，中俄之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趋，国际常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当随复。若夫或有日月之延，蹉跎之虑，所以觐其统治之力，而察其主体之固定与否，诚以玉帛既将，则信誓无更，谨之于前，庶以寡悔，非谓一旦解携，遂无复合者也。俄自革命以还，既有年所，曩者犹有旧党扰攘，可以却虑，比则苏维埃共和国已大联合，其四境已谧，寇捕就除，人情趣一，主体固定，尚复何所审顾。而俄使三至，讫无酬答，所以海内怀疑，或受牵制。抑苏俄以平民革命，推覆帝政，纵其为治方略，未与我同，此其国内之情，无涉邻与，言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况俄之与我，经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宜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嚶鸣。至于迩来外交之术，每于国交回复之际，辄有要求附之条件，揆之法理，难为一谈，违理之行，岂宜率效。况俄之于我，互助之勤，亦屡宣布。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若先以利合，后图未可必也。所以思惟再三，企谓宜绝瞻顾冀望之怀，立遗尺一，复续两国之交。先民有言，当仁不让。梦麟等欲言之，执事者，有日矣，以为执事折冲樽俎见岂不同，而乃声闻久寂，

似畏前驱。今者着吾先鞭者已二国，宁当复使超轶绝尘而甘局促自后于人哉。扬国声而辑与国，惟执事之是图。专此布臆顺从健安。国立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黄节、张煦、王星拱、陈源、陈君哲、沈尹默、丁燮林、杜国庠、张竞生、李四光、胡适、马衡、戴夏、顾孟余、冯祖荀、李宗侗、汤尔和、陶孟和、林玉堂、蒋梦麟、罗惠侨、单不庵、马叙伦、余文灿、李麟玉、李煜瀛、何育杰、李书华、马裕藻、周作人、刘文典、沈士远、石瑛、江绍原、谭熙鸿、皮宗石、樊际昌、李大钊、王世杰、白鹏飞、朱希祖、周览、郑奠、沈兼士、林损、郁达夫。

（《京报》，1924年2月16日）

中俄协定昨日签字 两国邦交已正式恢复矣

晚日上午本社得到中俄协定签字消息，即行发刊号外，报告读者。按中俄交涉，自明令收归外交部直接办理后，表面上虽似停顿，而外交总长顾维钧，与俄代表加拉罕，暗中仍积极进行，继续磋议，均由朱鹤翔、赵泉二人奔走接洽。经双方十四次交换意见，关于中国外交部本年4月2日覆牒中所争持之三要点，均有修正。（其内容已详国务院通电内，兹以略）。因为形式上便利起见，议妥得另以换文行之，其余各案，均按照本年3月14日王正廷与加拉罕所议决之协定原案，不再变更。俄国方面对于中国方面之让步，在承认4月2日所争三点之修正，而中国方面对于俄国方面之让步，则在承认俄国先行通商条件。俄代表因见先行通商于彼有绝对之利益，认为有可协商之余地，遂据以电达莫斯科政府请示。惟双方相约，于未正式决定以前，彼此均不宣布协商内容，以免局外者之破坏，故外间知者甚少。（按此项决定，为一星期以前之事）直至前星期四（29日）下午四时，俄代表因始接到莫斯科政府覆电训令，飭由加拉罕全权办理，即照与中国政府最近协商办法，正式签字，并积极办理中俄通商事宜。加拉

罕接到俄政府训令后，当晚（29日）即持至铁狮子胡同外顾阅看，又行协商一次，认为最后之决定。加拉罕退出后，外顾即由电话通知全体阁员，遂于星期五（30日）下午六时，在大甜水井吴宅，开

特别阁议一次，（因恐在国务院开会，致为外界所察知，故托言挽留孙揆，在吴宅商议）外顾报告交涉情形及修正要点毕，孙揆及全体阁员，均认为满意（是晚孙亦到吴宅）即议决将外交部继续与俄代表磋商大概情形，暨议定修正各节，呈明总统，请迅令派全权代表正式签字，以免中变。特别阁议散席后，由顾外表亲携原呈入府，面呈府曹，曹亦认为适当，当即召开府秘书长王毓芝，亲手草拟特派顾维钧为中俄协定签字全权代表之令稿，并由王秘书长亲手盖印，以免洩漏秘密。此项指令于当晚（30日）时许，由王秘书长亲交外顾，顾奉令后，当晚（30日）通知俄代表团，于翌晨（31日）十一时在外交部：

正式签字 昨晨（31日）九时，外顾即先到外交部，飭令主管司科预备签字手续事项，并将中俄协定全文暨附带换文各件，用英文各缮正两份。十时二刻，俄代表加拉罕，偕同代表团参赞秘书等六人到外交部，顾外长延入招待室，略用烟茶。即请至大厅，举行签字，先由顾加二氏，将协定正文及附带换文各件缮本，交互验阅一过，即互用英文签字其上，时正十时三刻。顾加签字毕，各饮香槟酒一大杯，三呼“中华民国万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万岁”而散。加拉罕等退出后，顾外长即嘱秘书草拟呈报府院呈文，暨通告全国电稿，即晚发出，报告签字情形，并请总统发表明令，直至昨日（三十一日）下午七时，顾外长犹未出部，兹将国务院通电及外长致俄代表之照会，录志于后：（略）

（《晨报》1924年6月1日）

2、 “关税自主” 运动 和 “首都革命”

关税自主与民众政权

著 海

帝国主义者以华盛顿会议政策，来缓和“五卅”以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号召所谓关税会议。帝国主义号召关税会议的用意及其最后目的，不用我们详加分析与说明了。他们帝国主义自己腰包里的什么英美法日的四国银行团，近日在纽约所玩的种种把戏，真是把帝国主义此次以共同宰割的形式所号召的关税会议的作用，维妙维肖地活画出来。四国银行团的秘密会议，决议了六个重要条件。这六个条件，自然都是帝国主义自身的保障，现在我们也用不着逐条提出评判，只看了它第一条规定，就可观其全豹！它第一条略谓：“此次中国关税会议后，中国一切关税的增收，大部分得提作整理外债之用，四国银行团有自由分配之权……”

这一条表示出什么意义呢？可以说帝国主义者此次勾结媚外军阀，开关税会议的用意与目的，在这一条上完全表露出来了。中国的媚外军阀与北京执政府红了眼似的预备在这个会议里讨取些利益，以便巩固其自身的反动势力，来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其实媚外军阀与北京执政府也是梦想了！最高限度你们不过分些帝国主义所剩下的残余，结果还是“狗啃骨头，干咽唾沫”。这是我们根据四国银行团秘密会议处分我国关税增收办法的几句结论，我相信这个有事实根据的结论，是不会有错误的。现在已经把关税会议号召的用意及其最终目的说完了，我们应该再看看民众对这个丧权辱国的关税会议是如何态度？

民众的关税自主运动随着帝国主义关税会议运动，随波逐浪

翻腾涨起了。“五卅”以后，中国民众都卷入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怒潮。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下的主要工作，关税自主运动，不过是全盘主要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关税协定制度完全托庇于不平等条约之保护，不平等条约不废除，欲求关税无条件的自主，是犹缘木而求鱼也。民众的关税自主运动，是在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一部分工作，这是关税自主运动与废约运动，互相关联，互相因果的。我们应该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之下高喊收回关税自主权，更应该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民族革命的口号之下，高喊收回关税自主权。民众必须向这条路上去奋斗，中国才可以收回海关自主权。这次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动的统治阶级，根据华盛顿会议九国条约在中国北京召集所谓关税会议。在帝国主义目中的这个会议的意义，上边已经说过了，中国民众要在这种会议的形势之下，要求关税自主，简直是妄想。在这个会议里中国不但得不到关税的自主，反增加了一重关税自主的束缚，国民经济将来也要遭同样的钳制与阻碍。你看四国银行团没等会议开成功，就急忙狼狈为奸规定好了分赃政策。现在我们可以说，所谓关税会议，与中国民众有百害而无一利，别说关税自主不了，就是在这种反动的政局之下，关税争得自主（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这个自主仍是少数媚外军阀、卖国官僚的自主，仍是换汤不换药由帝国主义手里移到其工具——中国媚外的统治阶级手里，这种自主的方式，与民众本身无毫厘利益之可言。结果给国内统治阶级张目，愈发有了卖国借债黷武穷兵的凭籍。现在我们应该知道，民众的关税自主运动，是民众自身的民主，不是为统治民众、压迫民众的反动政府谋自主。这个意义，就是民众自己要来管理中国的海关权。谈到这里，一定有人问，民众怎么能有管理关税权的权力，要解答这个问题，先要说说民众的政权问题。

民众的政权，是革命的民众，由实际的革命奋斗中由统治阶级手里夺取的。这个政权，不只要直接管理中国的关税权，并且要管理中国一切对外的大权。民众的政权，是民族利益的保障。

民众的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谈不到。政权不在民众手里，什么自主都行不通！所以民众在关税自主运动中，更不要忽略了民众政权的斗争。也可以说关税自主运动是对外的，民众夺取政权运动是对内的，对外的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对内的是反媚外军阀运动；不打倒国内的军阀，民众政权无从取得，打不倒帝国主义，自主利权，俱属空言。目前的关税会议不止不能达到中国民众的自主要求，反更是将来民众关税自主运动的障碍。关税特别会议，是关税自主的堤坝，事实如此，不待论证。反动的国内统治阶级，反更因帝国主义者唾余的惠餽，愈足使其反动势力稳固，民众势力将愈受其摧残，民众政权的夺取，将愈感困难。现在的国内统治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者，正从事于这种狼狈利用骗诈运动的进行。革命的中国民众们，不要受帝国主义与国内统治阶级之愚骗，要努力争回中国的关税自主，夺取民众的政权。帝国主义的代表者，英国张伯伦彰明较著的说：“……要消灭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好是根据华府会议九国条约，到中国开关税会议”。好！帝国主义的政策，果然实现了。革命的民众们，速起来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啊！

（《政治生活》第59期）

昨日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

运动前之秘密 北京各团体各学校，自前关税自主示威运动横被军警击伤后，愤激非常，誓非达到倒段目的不止。故连日以来，均在各处秘密会商倒段办法，截至前日晚8时止，始将计划完全确定。

运动时之组织 昨日（28）下午2时，北京市民在景山北大门前集合，开国民市威大会，决定国民革命澄清政治各项进行办法。到会各学校各团体共约十余万人，推朱家骅为总指挥兼主席，又推刘清扬、杨珊恒、朱伐农、于树德、韦青云等为副主席。民众整队排列门前，由北京大学学生军维持秩序，又组织北京学生

革命敢死队，10人为1团，举团长1人，联合10团为1队，每队队长1人，各队联合组成全队总部，设委员5人，总部为本敢死队最高机关，有指挥本队一切行动之权，各队须服从总部指挥，本队设交通队一队，以善坐脚踏车之若干人组织之，负传递消息责任。此外，可由医大女学生组织看护汽车路，携带担架药品等物，以便临时诊活之用。又有各工厂工人万余各，手缠红布，上书“工人保卫团”。敢死队司令王一飞，副司令蔡希曾、张平江。敢死队队员手持尖头木棍，以拼决死之心。主席台有总司令大旗一面，又有用丈长红布，上书白字，其文为“国民军同胞啊，你们要起来与民众一致奋斗，为国努力，组织国民政府，打倒卖国贼”。各市民手执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民党旗。此外又有打倒卖国贼等等之旗帜，随风招展，秩序极为整肃。

神武门前报告开会宗旨 午后2时在神武门前，即由主席朱家骅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从前的革命，均起于南方，现在的革命已到了北方，已到了北方的北京了，实是我们革命前途最有希望的现象。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权，完全握于一般军人政客之手，故丧权辱国之事，几无年不有，我们要想洗扫过去辱国丧权之耻，与失避去将来丧权辱国之耻，均非打倒军阀的政府不可。今日我们的运动，就是革命运动，就是要将卖国的段政府推翻，实在地建设一个国民政府起来，务望诸位努力努力云。报告毕，即由指挥顾千里报告路线及进行秩序，各团体各校即依次出发。

沿途所呼口号（一）打倒卖国段政府，（二）建设国民政府，（三）驱逐段祺瑞，（四）打死朱深章士钊，（五）召集真正国民代表会议，（六）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至段祺瑞宅之情形 大队由神武门出发，先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继即至吉兆胡同。吉兆胡同东西两头，均有国民军把守，大队到时，即由总指挥朱家骅、指挥王汝璜、邹国高等，前往与国民军交涉，请允大队通过，国民军方面答以未得长官命令，碍

难照准，即日但允通电代问。经时甚久，尚无答复，大队民众，即用力向前推移。国民军亦竭力用手阻拦。卒以大队人多，军队人少，故大队得以挤拥上前，惟国民军第一道防线被大队挤散之后，复布置第二第三两道防线，均被大队用同一方法挤散，得直趋至段宅铁门前。因铁门锁闭，并有军队把守，故大队亦无法冲入，惟死力前拥后移，意在挤散军队，冲破铁门，直入段室，令段交出印信，即日下野出京，卒以铁门过牢，军队过多，未得冲入。后有中国大学及民治主义同志会代表，于大队正向前挤，军队不暇他顾之际，手执旗帜，逾墙而入，大队因之大哗，同时并拼命前拥，终不得入。大队自午后3时直至7时，均在段宅门前拥挤推移，誓死达到目的不走。继由鹿司令前来与大队接洽，民众向鹿钟麟提出三项，鹿至先向民众道歉来迟之意。民众即开露天大会，提出三条件：（甲）29日12时段执政须辞职，（乙）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丙）组织国民委员会执行中央政务。明日（即29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请鹿钟麟答复甲乙两条，并请鹿负责执行。鹿谓本人当以民众之意思，尽力办去。

捣毁章朱等宅 大队遂向魏家胡同章士钊宅。民众一拥而入，一切什物，多被捣毁。章眷属，亦无一在宅者，未伤人。大队又至北池子朱深宅，彼时有人主张火烧朱宅，幸消防队灌救得力，未致成灾。又一部分市民至南兵马司1号李司诰宅，群众直入宅内，捣毁什物甚多。警察将市民工人带走，群众散去，拟于今日开会时，设法救援。市民捣毁各处，至东西牌楼大街，将某要人之汽车1辆捣碎，群众由朱宅出时，有一部分拟至姚震宅，寻姚谈话，因天已过晚，始行散会。又据另一报告，群众于北池子朱宅退出后，即至袁章库曾毓雋宅，将其门壁户窗完全毁去，曾宅早已迁徙，未损及其它物件。又有市民大呼某要人做九六公债殃国害民，吾人应去找他算帐。群众遂一拥而去，光顾其宅云。

（《京报》1925年11月29日）

昨日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

国民大会原定于前日（28日）示威运动后举行，继因游行群众在段宅费时过久，未能成会，故各团体于前晚散归之际，即决定国民大会延期至昨日（29）午后2时在天安门举行。兹将昨日开会经过，记录如下。

各团体预备会 议学馆开预备会议，讨论国民大会，一切事宜，及维持秩序方法，直至12时始散会。

开会之情形 天安门前，于前日已搭高台一座，前悬有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布帜一条，及推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字样。至午后2时，各团体各学校即先后到齐，市民赴会者亦多，约计有五万余人，情形非常拥挤。2时30分即由主席朱家骅报告开会，并报告开会宗旨，略谓昨日之运动，即我等革命运动，今日之国民大会，即是国民共同讨论解决我国之一切问题云。报告毕，即由余某提案，上列7项提案均经到会民众一一通过，提案通过之后，即由陈启修讲演，略谓第一，中国14年之政权均在反革命的军阀政客之手，我们要将此种反革命的势力全盘推翻，革命的国民政府始能实现；第二，我们欲达到推翻反革命势力，及打倒帝国主义者，我们中国国民，均当自动地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决不假借丝毫外力云。复次由马夷初讲演，略谓段祺瑞的罪恶之显露者，惟有二事，或为诸位所不明晓者，即段登位之初，主张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及主张反对金佛郎案者，惨杀无辜，二事甚也。昨日之驱段运动，尚未成功，务希大家始终贯彻初衷，继续驱段，不让段氏多住一日北京云。复次由顾孟余讲演，略谓两日来的运动，均是革命运动，革命就是要将旧有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及祸国殃民的国贼，一齐推翻，一齐打倒云。复次复有某处代表演说，谓武力有二种，一种为军阀之武力，一种为民众之武力，军阀武力坏，民众武力好，国民军亦为军阀之武力，我等与国民军之关系，即国民军若非给我等以自由，则其武力为民众用，不给我等以自由，则国民军亦与其它军阀有同样坏处云。再次复

由蒋希曾、王汝勋及总工会代表，京汉路工人代表，讲演直至5时始毕，又某代表讲演时，忽有台下工人高呼拖共产党下台，“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一时秩序稍乱，幸经主席及指挥竭力维持，即行恢复。讲演毕即由主席重将提案高唱一遍，大呼口号，继并报告依次出发游行秩序为

游行时之景况：（一）指挥团，（二）敢死队，（三）各校学生，（四）各团体，（五）市民。当国民大会散会时，大会群众鱼贯游行。北京总工会千余工人尾随大队之后。离会场不远，突有数十流氓，抢夺总工会旗帜，横殴工人群众。总工会之下的群众，为自卫起见，不能不稍加抵抗。查总工会受重伤之工人有石新铭、李琴春、刘国兴、朱保伦等十余人，遍体鳞伤，脑血涂地。流氓方面，亦有三二人受伤者。所有受伤工人，已送往医院救护。查此种流氓之由来，大有令吾人注意者，流氓手中皆持领款油印纸条，上书“每人持此到神武门前领大洋五毛”。在28日之示威运动中已发现，昨日之天安门大会会场中，此等流氓尤多。最令吾人注意者，此等流氓皆集中在工团联合会，工人自觉社等旗帜之下，查此等团体久已作了军阀阶级的走狗，工人阶级的工贼，打着革命的旗帜，作反革命事业，事实如此，有目共睹。此次的冲突，完全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这是昨日民众在革命的行动中所表演的事实。又大队从天安门出发，出前门，沿途高呼口号，直至香厂始由总指挥宣告散会云。

大会中议决案：（一）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二）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三）在国民政府未成立以前，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四）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议决案；（五）惩办卖国贼，先行查封其所有财产，并追究其卖国脏款；（六）由国民通缉卖国贼，听候国民公判；（七）查办金佛郎案。

警卫严防各路 警卫司令部鹿司令为注重治安见，于昨日上午特派军队两团，全副武装，分扎于东西南北四城各要道，每处

约一排人，预防不良之徒破坏治安。

声讨媚外军阀 自五卅运动以来，全国民众，一致奋起，乃奉系军阀，媚外卖国，外则勾结帝国主义，与之狼狈为奸，内则箝制人民自由，压迫民众运动，罪恶昭彰，早成全国公敌。北京市民，对于奉系军阀之压迫民众运动，封闭民众团体，逮捕民众领袖行为，自始即曾号召全国，一致声讨。最近战争爆发，反奉空气，布满全国。北京市民对此最反动之军阀势力，自不能不一致团结，倾其全力，与全国同胞，共谋扑灭，务使奉军之反动势力，一扫而清，政归吾民。本大会深信民众势力之愈益发展，必足以打倒一切反动势力而有余。而目前奉系军阀之瓦解，益足证明民众反奉潜势力之雄厚，今后民众更当本武装革命之志，与革命之武力结合，扫除一切媚外卖国之反动军阀，打倒安福政府，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政府，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历来压迫民众之□□。时机紧迫，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奠国是，□□□□。北京国民大会即俭。（28日）

致国民军通电 张家口冯焕章先生转国民军一、二、三军全体将士□□，□日段逆祺瑞乘机窃位，舞法乱政以来，外则勾结帝国主义，朋比为奸，内则依附奉系军阀，推残民众，殃民祸国，罪不容诛。本月22日北京国民大会，已对段贼下最后之警告，限其尅日出京。日来奉系内讧，尤为天与人归之会，值此千钧，爰时机，全国革命民众，应与革命武力结合，打倒奉系军阀及其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人民言论、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实行解散关税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再由人民公举委员若干人，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真正国民会议，建设代表民众利益之国民政府，以谋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公等精忠护国，遐迩共闻。尚希一本初衷，为民众之利益而奋斗，以民众之真意为依归，不与任何反动军阀妥协，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利我国家，即为自利，见仁见智，立盼好音。北京国民大会即位（28日）

（《京报》1925年11月30日）

十一 迎接北伐革命高潮

述 要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迎接北伐革命高潮的到来。李大钊十分关注军队和军事斗争问题。自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李大钊为争取国民军就作了大量工作。1924年底至1925年秋，他频繁奔走于北京与张家口、开封之间。为使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倾向革命，李大钊首先帮助他们实行联俄政策。为此，一方面，国民军领导人“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一方面，李大钊又多次与苏方交涉。这样，苏联政府“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也考虑了中国同志的意见”。“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4月，两个苏联顾问团即分别派往张家口和开封。其次，李大钊开创和领导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向这支封闭的旧军队注入了新的革命思想，使部队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党中央这次北京2月特别会议指出：“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和崩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并且，根据这次会议的“目前在北方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的这一精神，李大钊更抓紧了对国民军的工作。

这时，由直、奉、晋、鲁四派军阀组成的“讨赤联军”，向国民军全面进攻。1926年3月19日，由李大钊主持的有苏联顾问参加的北方国民党领导人会议，认为国民军必须退出京、津，将主力撤至南口修筑工事。李大钊在会上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军保存有生力量”。国民军司令部接受了李大钊和苏联

顾向等的意见，于4月15日前将主力撤至南口。从4月15日到8月15日，“讨赤联军”四十余万人，由三面围攻国民军。南口大战持续四个月之久，将直、奉军阀的主力吸引、牵制在华北北部。

为阻止吴佩孚派部南下，并支援国民军南口之战，李大钊派人前往直系军阀田维勤部三十九旅，指示共产党员许权中“相机而动，举行起义”。许权中率部于7月上旬在京郊门头沟起义，将田部近一半人马拉走加入国民军，吴佩孚立即率五个旅围攻起义部队，许权中在妙峰山一带与敌激战三昼夜，歼灭一千多人，迫使敌军溃退。“吴佩孚自田维勤部下发生反戈事实后，已证明其完全不能向国民军作战”。（《中共中央通告第1号——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1926年7月31日）。

与此同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已大举北伐，连取长沙并近逼湖北。待吴佩孚于8月决定率兵南下时，北伐军的胜利之势已不可逆转。南口之战，对北伐的胜利进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北伐开始后，对国民军又做了三项重要工作：委派于右任去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并告知国内政局变化情势及国民军的危险处境。9月，在苏联与我党帮助下，冯玉祥回国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参加北伐战争；李大钊为国民军提出了应采取的正确进军策略；进一步大力加强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一时间，往国民军派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四百人之多。

此外，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区委为配合北伐的进军作了大量工作：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参加革命军队，加强北伐力量；向南方提供北方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情报；对敌军进行多次的策反；同时还领导了北方工农群众开展反对军阀的斗争，如河北磁县党组织，曾组织工人炸毁漳河大桥，发动农会会员三百余人，破坏铁路三、四里，割断沿途电线，将各渡口的船只沉入河底，阻止奉军南下。

总之，这一时期，李大钊的一系列工作，有力地策应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一) 关于北方区军事 工作的方针、策略

1.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

(1926年3月14日)

各级同志们：

最近中央局因下面两个顶严重的问题，在京召集特别会议，这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是：

1. 仲甫同志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

2. 现时的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实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我们应迅速认定什么是我党目前在政治上第一的责任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如何巩固广州国民革命的根据，皆是急待总合南北同志的报告而速决定的问题。

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

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二天，^①会议七次，自二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会议问题遂集中注意于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一案，会前中央及南北负责同志已有数日的非正式讨论，正式开会时反复辩论又经二日方始作最后的结论。

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广东政府不幸而失败，则中国将经过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打击。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护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中国的革命，工人固然占着领导的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须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所以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在“关于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这决案中详细分析：1. “五卅”以后全国各阶级联合反帝运动战线之逐渐分化崩坏，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隔离地位；2. 要引导国民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是取得农民的援助，造成工农势力的大联合；3. 从工作的经验来看，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能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4. 现时是英日张吴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

^① “二天”似四天之误——原编者。

的武力国民军进攻，倘若得胜，必继续推翻广东政府，所以现时在北方应该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抵御这个反(进)攻，才能维持民众运动。在北方比较自由的基础才能为广州北伐的接应；5. 广东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扩大中国的革命运动，能使自己免于孤立，所以这次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革命势力的往北方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

在这个决案内，特别指出广州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北伐关系之重要以及农民问题在现时之特别严重，这两点非常重要。不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然而各地同志在执行这决议案时，须注意勿生出下列之误解：1. 只注意广州工人农民运动工作，而放弃其他工作；2. 以为有了国民党国民军的政权，而后可以发展工农运动。这个决议案的真意义要使同志们对于广州政府农民运动国民党国民军政权之重要格外深切了解，在党分配他的力量时轻重缓急有所选择，但并不是叫我们只注意广州工作，农民运动工作。非有全国各地革命宣传的响应，则广东是孤立的；非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之参加革命，则工农联合战线亦是孤立的。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所在之地方，固易发展工农运动，另一方面，也只有工农运动的发展，更能促进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格外左倾。望各地同志于执行以上之决议案时十分注意。

关于中央地址问题，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会议决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方，而于上海设交通处，广州设临委，如北方政局反动，则移粤与否尚须讨论。

此次会议，又决定于“五一”节日在广东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望各地已有农协组织之地，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线必

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未有农协组织之地，亦用从速着手进行，并努力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一切材料，以供党决。

议事日程共有十一项：1. 现时的政局与党的重要职任；2. 中央地址问题；3. 国民党问题；4. 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5. 广东问题；6. 三特区工作问题；7. 河南问题；8. 铁总问题；9. 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10. 设立长期党校问题；11. 反吴宣传问题。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

2.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1926年2月21—24日)

一、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别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在崩坏的过程，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常表现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奉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郭军——现时之魏益三部。因此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二、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但是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三、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

四、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P. 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并且在北方以往的军事工作都是临时应付，因此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

（《校刊》第六期，1926年5月1日）

3.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

（1926年9月26日）

马二先生^①此时谅已抵包，不知兄已晤见否？伊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自己请求其回去者。于髯^②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党与国军之关系。此间要人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于提者）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民党一二受命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以上三个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望兄特别注意。初步工作，须处处应用此原则，至将来第二步工作之形式怎样，应看将来具体情形而定。冯要此间（孙、东两大^③）为之准备工作人员四、五十名，此间要人及弟意见以为此

① 马二先生即冯玉祥先生。

② 即于右任。

③ 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

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前去。弟意国军工作人才应注意下列来源：（一）在国军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二）择一部分在粤工作过的最好分子。这样才不至踏粤覆辙。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望兄特别注意。桑顾问为人颇小心而客观，望兄与伊（桑）保持一种密切的接头，伯坚常在桑指导下当可不至损事也。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4. 中共北方区对于三特区（即内蒙） 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节录）

（1926年10月18日）

（二）在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西北军现在不但组织上渐次统一，即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尚未有下层的基础，但现在冯之左倾却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按国民军现在的地位看来，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在国军内之工作。在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及与民校关系，我们很同意于和森的意见。至于我们派同志去国军中工作更要慎重。现在冯虽饥不择食，我们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许多的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因国民军的将领思想较广东军中将领更弱，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现在第一军中军友团的同志约有九十余人（该团乃西北军干部学校改组的，共约三百人），该团现正分配给各军中充下级军官或参谋。第三军中同志约有四十余人。此外在陕西井岳秀军中尚有同志三十余人，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但是在组织方面都非常之涣散。现在这些同志都集中于五原，因此

在该方非派得力同志去工作不可。过去我们在这些军中的同志，工作极不好，亟待重新整顿，并且在该方非建立得力指导机关不可。现在除要求中央速派平山及一飞同志去西北军中工作外，北方区现正指定同志，受短时间特别训练，准备去该方工作。

北方区因感觉过去三特别区工作之糟及现在西北军中工作之重要，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沿路巡视各地工作，并至五原与伯坚接头，考察该方实在情形及目前一切的纠纷问题（在军队中同志的）。至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具体详细计划，须俟××同志归来时，才能规定，因这样比较切实些。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1926年11月3日）

5. 守常政治报告（略）

6. 守同志来信（略）

（均见《李大钊文集》下）

（二）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及 策应北伐的经过

1. 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 北伐的经过

马文彦

一、于右任赴苏的缘由

1925年10月，国民军第一、二军在华北、河南失败，唯第一军退至南口后，坚持察绥两省。而奉军大军压境，攻击日急。此时冯玉祥局促塞外，一筹莫展。为打破这个局面，便暂时把军队交给了张之江统率，自己偕李德全赴苏联考察，并寻求军事援助。据说，冯到恰克图（布利亚特蒙古共和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现改为特罗伊），苏联政府派鲍罗廷到边界欢迎。冯表示，他赴苏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救中国，并愿考虑加入国民党，执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鲍表示，苏可按冯的方案，提供援助，他本人也可给冯当顾问，不到那边（指广东政府）去了。

冯、鲍恰克图谈话的内容，由苏联政府通知了驻北京大使馆；大使加拉罕告知了李大钊（党的北方局书记），李大钊便请于右任赴苏做冯的工作。

于右任是国民党中委中的左派，当时正被奉军通缉，潜居北京皇城根一座小寺院内，深居简出。对李大钊之请，他欣然同意，但要求给他找一个俄语翻译。李大钊答应给他找，同时请他自己也找。

这时，我也因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先到北京，住在陕西朝邑会馆。于托同乡刘天章找翻译，我正好碰见刘天章。刘知我在上

海学过俄语，问我是否愿做翻译。我表示愿意，他即告诉了于。于叫我把我领到李大钊住处，叫个苏联人考考再说。刘引我去见李大钊，李大钊和我简单说了几句，就请求一位懂中文的苏使馆职员对我进行测验。测验毕，便向李大钊说：“俄语很好”。李问：“出国担任翻译是否及格？”他说：不仅及格，语音优秀，是个女同志教的。”李大钊就把我留下来，并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到天津英国租界国民饭店去找原春雨。他说：“原先生昨夜赴津，，两人路费，彼已带走。”我遵照李大钊先生的指示，到津找到了原春雨。原来春雨就是于右任。

当时于是奉军重点通缉的同国民军有关系的两要员之一（另一个徐谦），而于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虽深居简出，但活动一直没停。他经过一番曲折到达天津后，便积极准备出国工作。我到天津后，就成了于和李大钊之间的联络员。一次，于要我去北京见李大钊，到了北京，李却要我去涿州见许权中。原来许权中派任警斋向李大钊报告，说他有一个加大营要起义，要李同张家口国民军一军联系，在起义时予以策应。许权中想在吴佩孚达到涿州时带队在车站举行盛大欢迎会，趁机把吴打死。他让我到保定打听吴佩孚北上确期，我到保定通过京汉铁路工会史文彬，打听到吴在保定住下，暂不北上，许的计划落空了。但在这时，许又策动了田维勤（田逸民）部马克斋两个团的起义，把田的部队拉走将近一半。田恼羞成怒，会同奉军截击，由于国民军一军的策应，许部和两个团的起义成功了。我回北京向李先生汇报了这一情况。李让我回天津准备出国。

二、见王若飞同志

李大钊先生在北京为我们办妥了出国手续，但要到上海才能搭乘去海参崴的轮船。到上海后，第二天我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办签证手续，进行得十分顺利，后天就要出发。回到住处（英租界一品香饭店），见于正和国民军二军驻河南时的郑州警备司令

史可轩等人打牌。史听于说后天要去苏联，一定要于带他同去。由于出发在即，补办手续已来不及，而史又坚持非去不可，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领他去见党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同志。王答应让于和我先走一步，随后派张家珍陪他再去，史可轩才不纠缠了。后来，我们从莫斯科回国到达上乌金斯克时，恰好史可轩也到这里。史见我们回来，便决定不再去莫斯科，随于一道回国。

三、李大钊来电

我们从上海出发，搭乘一艘苏联货轮，经日本马关到达海参崴。在海参崴住一夜，第二天乘火车西行，经赤塔、伯力、尼布楚，到达上乌金斯克。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李大钊已与冯玉祥约定在上乌金斯克和我们会见，所以到了上乌金斯克，我们即发电与冯联系。但冯中途改变计划，要我们去莫斯科同他会见。此时，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更趋激烈，国民军一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紧迫危急。张家口驻有庞大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每日战况及时电告苏使馆，苏使馆即转告李大钊。因此，李先生电告于右任，要于尽快催促冯玉祥回国，以收拾部队，撤往西北。接到李先生来电后，我们必须尽快去莫斯科见冯，但随身路费不足，不得已电告李先生。李先生立即给我们汇来路费，我们就立即去莫斯科。

四、于和冯会谈

我们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政府派司法部长到车站欢迎我们，并招待我们住在莫斯科大街一家最大的宾馆里，我们很快与住在距莫斯科几十公里外一座别墅里的冯玉祥取得了联系，于和冯就在冯的住处进行秘密商谈。经过会谈，冯接受了李大钊先生提出的意见，即“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并很快达成了协议。

五、碰到捷尔任斯基

冯和于会谈达成协议后，大家积极准备回国工作，在此期

间，苏联政府给我们安排了一些参观活动。

在参观克里姆林宫时，我们碰到捷尔任斯基。他行走较快，似乎很忙，见到我们后便停下和我们握手，态度和蔼亲切。他只简单地和我们说了几句话，不待翻译，就挥手走开。冯问我：

“他都说了些啥话？”我说：“他说见到我们很高兴。又说，你们二人身体都健壮、高大（冯比捷尔任斯基高出一头）。”想不到就在那天晚上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等斗争时，据说突患脑溢血症死去了。

六、最难忘的会见

在给捷尔任斯基举行国葬的追悼大会上，我们见到了斯大林，并和他握手谈话，接受他良好的祝愿。

追悼大会在红场举行，会场西边站的是外国来宾，东边是各国外交使节，我们站在西边。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也站在会台上。托神情沮丧，面部小而削尖，活象一只猴子；季上衣敞开，歪戴着帽子，简直象个流氓；加衣冠楚楚，面皮白净，象是一个富商。在哀乐声中，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徐徐把捷尔任斯基的棺柩运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小心翼翼地从马车上把棺柩抬到列宁墓旁，致完悼词，就下土安葬，群众开始悼念游行。

这时，斯大林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后跟莫洛托夫和布琼尼，先到西边同外国客人握手道谢，在和冯、于握手时问道：“给你们派的军事顾问和你们见过面了吗？”我翻译后冯、于同声回答：“见过面了。”又问：“你们回国的日期确定了没有？”答：“已经确定了。”斯大林高兴地说“好！祝你们一路顺风。”说罢，便和冯、于握手告别，乘车走了，莫、布也转身到东边去了。斯大林个儿并不大，但仪表大方，举止稳练，谈吐文雅，态度从容安详。他头戴一顶蓝色皮扇工人帽，身着蓝白交织的布衬衫，灯芯绒的马式裤，脚穿长筒马靴，裤子的腿面部已经磨损得见白了，靴尖上已经露出皮纹，似乎很长时间没擦油了。

七、李大钊再次来电

在莫斯科逗留约半个月，回国准备已经就绪，我们决定八月下旬起程。这时，李大钊从北京来电，要于敦促冯早日起程回国，不然察绥战局又会发生问题。于向冯转达了李先生来电，冯认为他的部队还能顶住。为促冯早日回国，于先期起程，从莫斯科乘火车赴上乌金斯克。在上乌金斯克，我们接到冯玉祥来电，要我们等他。为减少冯在途中滞留的时间，我们便去库伦（今乌兰巴托），没有等他。冯到上乌金斯克又来电，要于在库伦等他，于仍未等，径直南下。行前给冯发一电报：“先归收拾残局。”冯始觉问题严重，相信李大钊前电正确。他在上乌金斯克没有停留，一直赶到库伦。

八、李大钊三次来电

在库伦，又接李大钊来电说，冯军已投降了阎锡山，要我们催促冯尽快回去收拾局面。冯因事尚需在库伦停留数日，于先启程，直线南下。到固阳县一带，冯玉祥的车队才赶了上来。

九、五原誓师

到达五原后，冯、于即筹备誓师大会和进军西北的军事部署。誓师大会的誓词，由冯的几位秘书起草。草成后，大家都感到不满意。冯请于修改或另写，于此时文劲方遒，一挥而就，秘书们看后都极敬佩，冯亦啧啧称赞，誉为大手笔。于的文稿首句是“玉祥本工人子。”冯说：“如果我过去看到这句话，一定认为是污辱议，今天看了却感到光荣。这次我到苏联，看到工人阶级很光荣，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的子弟也是很光荣的嘛！”

五原誓师大会会场，就在城东兴隆长车马店东边广场。广场上临时搭起了一座司令台，所有部队全副武装，又把县城和教区居民组织起来，列队参加。冯玉祥在大会上宣读誓词，的确堂堂正正，部队、群众听了都很振奋。誓师之后，冯遵照李大钊提出

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指示，挥军西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于任副总司令兼驻陕总司令。冯把孙良诚、吉鸿昌、孙连仲、方振武、马鸿逵、刘汝明部共二万五千多人（号称十军）拨给于指挥，并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孙、吉率部自甘先行出发，其余各部依次跟进。部署既定，冯便与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东去包头、归绥一带，寻找张之江、李鸣仲、韩复榘、石友三等人的部队去了。

十、杨虎城将军的下落

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队开往韩（城）、郃（阳）一带就食整训，但杨本人却不知去向，冯、于托人到处寻找，均杳无音讯。一天，冯、于要我去三原请惠有光先生回西安主持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工作，临行时于对我说：“有光和虎城关系深，问问惠先生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我在三原向惠打听杨的消息，惠说：“杨已来这里，饭后我陪你去见他。”正吃饭，惠说：“人来了。”我一看，果见杨同曹润华二人身穿滩皮长袍，头戴皮帽，谈笑而入，我们互致问候。在惠处，我们围炉长谈竟夜。原来杨慑于郭坚之鉴，不敢与冯在兵戎之际遽然相见，西安解围后，他就与部下曹润华变装易服，潜去富平村隐蔽。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也是以昔日之冯看冯，不得已而为之。那天夜里，我和杨谈的问题很多。我说“李大钊先生叫我和于右任促冯回国，解除西安之围，来往跑了近四万里路。”杨听后很感动，并表感谢。我问杨坚守西安的经过，杨谈得很多，现在还记得他和李虎臣在守城时的一段对话：

李：“对点子，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

李：“打完了咋办？”

杨：“用城墙上的砖打！”

李：“城墙上的砖打完了咋办？”

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李：“对点子，我和你说老实话，守西安有什么价值？”

杨生气地站起来：“我守西安为的是缩短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线。”

杨讲到这里，我便说：“你有这种思想，了不起！”杨说：“我也是听下的两句口号，其内容我也不知道。”于是，他让我给他讲解这两句口号的内容。我讲完后，他说：“我记下了。”

之后，冯、于委任为杨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杨在西安立即就职。

自李大钊先生派于右任去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冯于1926年9月18日在绥西五原誓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兵出潼关，策应北伐，会师郑州，前后一年时间。在这一年中，国民军联军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和苏联的军事援助，基本上贯彻执行了李大钊的指示，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党史资料通讯》第9期）

李大钊给冯玉祥的密函

奉（张作霖）鲁（张宗昌）孙（孙传芳）三方的兵力如下：

（一）保定一带有兵五万，后方为万福麟。（二）五原之兵，现调北京。有骑兵四旅，步兵一旅，山西接防。包头五原，有两步兵师，一骑兵师。（三）张家口有两旅。（四）北京有兵一万五千。总计奉军关内兵力，约有十万。至直、鲁军在南京浦口者有一万五千人。在泰安徐州者有九万人，尚有两骑兵旅。天津青岛亦有若干。孙（传芳）军分二部，总共三万五千人乃至四万人。安徽有三万人以上。奉军作战计划，将出兵河南。建议（冯）出长安会师郑州。

（《人物》1980年4期）

2. 忆党在冯玉祥部队的工作（节录）

刘贯一 孔广耀 陈天秩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举行的五原誓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在我国北方发生的一件声震中外的历史事件。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北方区委和共产党人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斯马诺夫等同志，帮助冯玉祥和他领导下的国民军在全军建立政治工作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为改造国民军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国民军领袖冯玉祥由一个基督教信徒，逐步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在我党帮助下，接受并在全军推行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使国民军由一支封建军阀式的旧军队，逐步成为有主义、有纲领、反帝、反军阀、支持群众运动的新式军队。五原誓师不仅使首都政变后遭受各系军阀围击濒于瓦解的国民军获得起死回生的新机（故五原誓师又称九·一七新生命），也有力地配合了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五原誓师也唤醒了人民，使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北伐革命虽然是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实行反共和冯玉祥的严重错误导致了最后失败，但五原誓师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冯玉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犯的历史性错误，给予我党和人民群众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现将我们党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忆述如下。

（一）冯玉祥与中山主义（略）

（二）接受共产党的帮助

首都政变之后，根据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党中央指示于1924年底成立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同志总负责（大钊同志陆续辞去了几个大学教授的职务，专搞党的工作），

北方区委的其他负责同志还有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领导了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同时李大钊同志还主持着国民党在北方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这就给发展壮大革命的统一战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方区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正确地分析了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策略。除在京、津等地广泛发动组织群众运动以外，把争取冯玉祥和他领导的国民军作为工作的重点，李大钊同志除派国民党人徐谦、于佑任等与冯玉祥多次交谈外，自己并亲往天台山对冯作了许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劝他不要消极，打消顾虑，振作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斗。又派了一些同志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去，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进行工作。国民二、三军中都派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他职务。这些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造成了与革命很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军驻扎的直隶、河南及热察绥地区，我党在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使他们基本上采取了中立态度。在北京，有时还争取国民军的大刀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对群众的集会、游行加以保护，防止和对付段祺瑞政府军警的干扰破坏。冯玉祥通过和李大钊的往来，结识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谈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变化情况，使冯得到了许多新的认识，觉得国家有伟大的前途。孙中山先生于12月31日抵达北京后，也曾先后派汪兆铭、吴稚晖、孙哲生等人，劝慰冯玉祥不要消极，早日出山。当孙中山先生病重时，冯玉祥由夫人李德全持亲笔信到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轅看望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送给冯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由李德全带回，发给国民军官兵当作教材。由于我党多方劝慰，各方函电交促，使徘徊中的冯玉祥又振作起来，决心奉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年1月13日，段执政下令裁撤了冯玉祥陆军检阅使一

职，陆军部也以种种借口取消了国民军的名称（后冯的部队集中于西北地区故称西北军，但国民军这个名称仍被人沿用）。段政府同时下令专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他的部属张之江、李鸣钟分任察哈尔、绥远都统。西北边防督办已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2月初冯接受了我党李大钊同志和苏联大使加拉罕的建议下天台山，从门头沟乘火车赴张家口就任。

到张家口后，首先料理军事，国民一军由五个旅改编为六个师，分由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张之江、宋哲元、郑金声任师长。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人数约十五万左右，在北方除奉系以外，为最大的一支武装。另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是由石友三带领一旅人修通了句头到宁夏的汽车路，打通了通往大西北的交通要道。再就是由冯治安、张自忠两人负责在张家口土儿沟修筑一个新村（督办公署就驻在这里），盖好一个“诚洁”旅馆，专门接待来访之客。

2月底冯玉祥派他的秘书毛以亨（是秘书名义，不在秘书处工作）赴京接李大钊、徐谦到张家口，北行专门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冯的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会谈的重要内容是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会谈中并征得李大钊的同意，聘请徐谦为冯部的高等顾问。徐谦此后便公开来往于京张之间。根据会谈结果，3月下旬，冯玉祥又派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为代表，到京和苏联大使加拉罕商谈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为把援助项目肯定下来，3月底苏联派驻广东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鲍罗廷专程从广州来到张家口，经过一天的商谈，达成了援助项目的协议。主要为：一、无偿援助武器装备（包括枪支弹药等）；二、派顾问团帮助训练军队，教授军事技术。接着，冯玉祥便派副官长张允荣率张振亚（又名张存实，中共党员）等为驻外蒙代表，组织接运军援的办事处。同时，又通过外交途径，任命毛以亨为驻苏联上乌金斯科领事，以防止反动政府利用驻苏外交侦察苏联援助国民军的情况。

5月初，苏联派以任江（苏联革命战争时期远东区总司令）为首的顾问团三十人到达张家口，协助国民军进行军事训练。

由于冯玉祥接受了共产党的帮助，决心走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当时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主要人物董必武、李烈钧、邵力子、吴稚晖、丁维汾等相继来张家口和冯交谈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前景。特别是李大钊、徐谦频频来张，广泛接触国民军的各级军官，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纲领。在新村旅馆未建成之前，冯玉祥先在土尔沟买到一所西式平房，冯把它命名为图书馆，以后又改称为“爱吾庐”，专门用来招待李大钊，徐谦等。为了在国民军中广泛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党的北方区委派宣侠父、陶梁（新畲）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冯部工作，后来又根据冯的要求，相继派来濂卿、江风、谢甫生、钱清泉（均系共产党员）等十几名同志到国民军中工作。这些同志肩负重任，以充沛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革命精力，为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新军队，作了大量启蒙和组织工作。他们一方面广泛接触国民军上层军官，另一面利用办俱乐部（称玉祥俱乐部、国民军俱乐部，后改称中山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等形式，通过上课、演说、教唱歌曲等向官兵宣传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和基督教牧师徐香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这些同志还在西北地区和国民军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地下组织，这一切都为后来党派到国民军的刘伯坚、邓小平等同志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处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张家口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和京绥路工会的组织发动下，召开了军民大会，进行游行示威。冯玉祥并通电致全世界基督教主持正义，予中国人民以援助。这个正义的呼吁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甚至与他往来多年，一向认为很好的加拿大牧师也公开地对他说：“工人、学生都是乱党，英国人开枪是对的。”冯

玉祥当面骂他是：“冒充的基督教徒，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从此，冯玉祥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基督教牧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顾问才是真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好朋友。于是冯玉祥决心摘掉他著称于世的“基督将军”的美名，取消了在国民军中的基督教教育。以孙中山送给他的几千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作为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课，冯和夫人李德全在军官教导团中亲自担任《三民主义》一课，按时读给学生听，悉心研究。冯还经常规定时间，召集主要的官长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轮流着读。冯曾说：“对中山先生的学说和主义，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层有系统的全部认识 and 了解，大家对整个的政治思想才开始有了体系……此时我自承认为一党外的中山主义信徒，全体官兵也莫不如此。”

“五卅”惨案后，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北方区党委的发动下，全国各地有许多青年学生，特别是北京、天津有不少参加反帝运动的大中学生向往张家口，纷纷投奔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收容这些反帝爱国学生，给国民军吸收新鲜血液，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同志和徐谦的建议，成立了西北军干部学校，委任张之江为参谋，陈琢如为校长，选择学兵团的优秀营长时念新、李士庆、孙长波等为中队长，将投奔来的七百多名学生编为五个中队，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干部学校中许多学员经过培养后来都发展为共产党员。如六名被派到苏联基辅军官学校深造的学员中就有卢匡才、张培泽、庞化儒等四名加入了共产党。后来长期在冯部工作、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主席的王梓木，以及曾任解放军副军长的过家芳，都是当时在张家口干部学校中的共产党员。

为了使国民军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学习苏联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战胜沙皇白军，打退帝国主义围攻的战绩和经验，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曾多次选派优秀军官到苏联参观学习或到军事学校学习深造。1924年底在冯避居天台山时，就通过李大钊、徐谦和加拉罕的协商，由冯玉祥军和胡景翼军各选派了二十五名

青年军官到苏联的军事院校学习。到张家口后，又从学兵团挑选了十五名优秀连排长进入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其中有田德修（后改名几何，是我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王受恒（后改名王云涛，在延安时是抗大军事科长，武汉地区防空司令），还有杨念照、叶茂极、郝鹏举、李连海、胡运泰、杨国体、董悌青、陈念澹、刘汝珍、石友信、史书、李境清等。10月间，冯又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为接待国民军派去的学员和参观团，曾作了大量工作，当时的旅莫支部负责人刘伯坚同志（时为东方劳动大学学生），他一面学习，一面不辞劳苦地做好接待和组织工作。刘伯坚又派了东大的李一特（后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赵秀峰和曾涌泉等到基辅、列宁格勒军事院校作中国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对后来国民军中有更多的人倾向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0月下旬，冯玉祥到平地泉、丰镇等地视察军情和民情，后到包头。此时已在句头东关筹建了营房（称东营盘，冯在西北的督办公署就设在这里）。赴包后，一面加强石友三部的军事训练，一面整饬社会治安，兴办商业和文化教育等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以开发偏僻荒凉的大西北，积蓄革命力量。

为了启发人民的革命精神，传播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通过李大钊同志同中共绥远工委负责人路作霖的联络与配合，在包头创办了《西北日报》，担任社长的蒋听松，是由北方区委派往包头工作的共产党员。当时在报社担任编辑，采访任务的共产党员还有马吉良、胡英初、彭振纲、丁宝钰、刘贯一（又名刘景熙，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等同志。

11月下旬，爆发了东北国民军（冯玉祥有西北军，张作霖在东北，因之称之为东北军）郭松龄倒戈讨奉的战争。11月初，日本举行秋操，张作霖派往参加的将领郭松龄，发现奉系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随派他的参谋长和他的大弟弟郭大鸣带了郭的亲笔条款来到包头和冯玉祥商订了反奉的“密约”。11月

22日战争打响。在郭松龄节节胜利之时，日本兵乔装助奉，并派飞机八十余架，将郭松龄的司令部白旗堡炸为焦土，在千钧一发之际，鲁军李景林违约异动（郭与李亦有反奉密约），劫持河北地盘，引起了对国民二、三军的冲突，掀起了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大规模的混战。郭军失援，功归一篑，郭松龄亦惨遭日军杀害。冯军此时陷于进退两难，不得自拔。特别是国民一二、三军、不仅联系不紧密，指挥不统一，而且内部地盘权力的争执，暗中发展的也很激烈，步调亦难以一致。冯玉祥此时在军事上处境艰难。为了避免攻击的目标，冯玉祥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并非下野）。

电谓：

“值此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俾人民得资休息，玉祥个人应即下野，以卸仔肩。”

时遇熊斌亦从苏联参观回来，冯听了熊的访苏报告后，决定出国，亲自进行考察学习，在一次与李大钊、徐谦的谈话中他曾说：“……这种莫明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不知要打到那天才算局？……一切的痛心难过，都使我归结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的一点上，我必须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李大钊、徐谦劝他现在不要离开部队，过一个时期再去为好。冯一再说明必须去参观学习革命经验，回来才有办法去革命。并说我把军队暂交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指挥不会有问题，李、徐见冯真诚要去苏联，对冯说：“我们回北京同加拉罕商议一下，把要你去苏联的决心转告加拉罕。”

1月6日，苏联大使加拉罕通知冯玉祥的外事处长唐悦良到北京，研究冯去苏联的问题，经过商谈，加拉罕大使表示苏联欢迎冯去参观。并表示为了避免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张作霖的注意，最好通过外交途径，由外交部发给去德国访问，途经苏联的

护照。唐悦良回平地泉（此时冯已由包赴集宁）汇报后，冯感到加拉罕考虑得很周到，即派唐去北京报请外交部长王正廷来张家口商谈。王正廷接受了冯的意见，回京报请段执政批准冯玉祥带六个随员（魏凤楼、陈天秩、张金瑞、尹心田、陈秉钧、丁良俊）赴德国访问途经苏联的护照，送德国大使馆、苏联大使馆签证。当时北京各报均以头条新闻刊登。唐悦良并把北京西服店技师带到张家口，为冯做去德国访问很讲究的西装（实际未穿），大作宣传。段执政也于1月9日发表任免令：

“……特派冯玉祥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实业事宜，准予免去西北边防督办兼督办甘肃军务事宜职。”

以上一切活动，为冯玉祥赴苏，铺平了道路。冯玉祥谢绝了国民军诸将领和蒋介石、汪精卫的通电挽留，决意不再出山，而积极筹划出国的准备。

（三）寻求革命道路

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带随员和卫士乘两部小汽车、一部大桥车由平地泉动身赴苏考察。经过两天行程，抵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受到外蒙人民革命党和部队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冯在库伦住了三十多天，除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外，对蒙古的社会各方面情形作了大略的考察和参观。在一个多月的活动中，使冯玉祥认识到革命政党对领导革命战争成功的重要性。同时与先期到达的徐谦、顾孟余、史可轩和顾问鲍罗廷会晤。在与徐、鲍等研究讨论中国的前途时，鲍对冯说：“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如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使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徐也说：“我们的党决不是您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不

是‘结党营私’的党。”经过一夜的思考，冯始决定正式加入国民党。同时，也由徐谦介绍所有随员加入国民党。并决定徐谦随冯一同赴苏考察。

4月29日冯玉祥一行离开乌兰巴托，30日晚到达苏联布利亚特共和国首府上乌金斯科。

5月3日冯玉祥从上乌金斯科乘火车，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程，于5月9日正午抵达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夫烈夫、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司长米尔尼柯夫率红军乐队、骑兵、步兵热烈欢迎。特别是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约四、五百人，举着大旗和大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国民军领袖——中国工农运动的捍卫者！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冯对这种亲切热情的欢迎大为感动。在事先没有准备发言提纲的情况下，在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而后由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司长米尔尼柯夫陪同到毘罗巴旅馆。

当日，苏联外交委员长齐切林到冯的驻地——毘罗巴旅馆作礼节性的拜访。次日，冯和徐谦一起回拜齐切林，并商谈安排访问苏联党政军有关领导人及参观活动的日程计划。接着中山大学学生、学校共产党负责人朱务善、周达文（曾作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翻译）、共青团负责人陈绍禹、国民党人谷志刚、张镇等，一批接一批到旅馆交谈。由朱务善、周达文安排，征得冯的同意，决定5月11日晚在中山大学礼堂举行欢迎大会。11日晚七时，冯即带领所有随员步行到中山大学（旅馆到学校步行只须十分钟），朱务善、周达文和中国学生都在大门及庭园欢迎到休息室。学生们将冯团团围住，询问国民军与张、吴军阀战争情况。欢迎大会八时开始，除中山大学学生外，东方大学的学生也来参加，由朱务善主持大会，校长拉狄克（第三国际东方部长、中国问题专家）致欢迎词。他特别强调说：“冯玉祥出身于没有土地的农民，他父亲又是个工人，因此，他将成为工农利益的保护

人。现在中国华北的革命运动正需要冯玉祥这样的一位领导者。”周达文译出中文后，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冯玉祥受到他从未受到过的荣誉，十分高兴地讲话，他一开头首先自我介绍他是工人的儿子。接着他说：“我的军队过去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反对军阀互相争夺地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残害中国人民的内战。我将永远和大家一起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而奋斗。……我看过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成名成家到欧美和日本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医学、法律；也看到过军阀官僚资本家的少爷、小姐为了升官发财统治人民大众，到国外留学、镀金。现在我高兴地看到诸位有志救国的知识青年，不为个人名利，到这里学习革命，武装自己，准备为中国革命、为人民幸福而流血奋斗，我在各位面前宣布：我热诚的欢迎你们将来到国民军去工作，我们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冯的讲话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脚踩地板的欢呼声。

5月13日晚，冯玉祥由翻译周达文陪同到克里姆林宫与拉狄克进行了长谈。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述了中国的历史，并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使冯更坚定了国民革命的信心，高兴地接受了中山大学名誉学生的称号。同时决定，把随员张金瑞、尹心田、丁良俊、彭秉钧和汽车司机张国珍送基辅军官学校学习；赵亦云（随从摄影师）送莫斯科艺术专校学习，身边只留陈天秩（解放后曾任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展览处副处长）魏凤楼随从参观活动。又决定将原打算送德国留学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送中山大学学习，二女儿冯弗伐及冯的勤务员张某、王某送莫斯科一个工厂学习做工。冯又发电报给张之江，让他在国民军干部学校中挑选六名优秀学员送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姓名前文已提及）。

5月17日午后，刘伯坚（共产国际代表、东方大学学生）和曾涌泉、武胡景（均系共产党员，东方大学学生），以《前进报》（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党、团组织办的学报）记者的身份到欧罗

巴旅馆拜访了冯玉祥，并赠送了冯一套《前进报》，刘伯坚等向冯玉祥畅谈国内国际形势，并对国内政局的发展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分析，给冯留下极为深刻的影响。此后，刘伯坚和冯玉祥多次接触，并注意在他的部属中发展和加强党的力量。如冯的亲信副官、曾驻外蒙代表的张振亚，就是这一时期由刘伯坚、曾涌泉发展入党的（后来冯玉祥离开革命，张振亚仍带领一个旅潜伏在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率领全旅战士到晋察冀参加了八路军，并担任了晋察冀敌工部部长的职务）。

在欧罗巴旅馆住了十几天后，冯玉祥不习惯城市旅馆的热闹生活及苏联政府的丰厚招待，提出愿到偏静的地方住，并希望请专家学者为他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问题。苏联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于五月底移居到离莫斯科四十公里的察里村，并调乌斯马诺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曾任过加伦将军的参谋长）作为冯的首席顾问，并配备翻译克拉夫。每日由乌讲一点钟的辩证法唯物论。冯说：“这是我研究新兴哲学的开始。”

此后，冯玉祥先后拜访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加里宁、阿里克夫、伏罗希洛夫、卢那卡夫斯基。并参观了许多工厂（铁厂，钢厂、飞机制造厂等）、学校（航空、步兵、陆大等）、图书馆和博物馆（厂史、革命、石像、油画、红军、民族等博物馆和克鲁泡特金图书馆等），以及机关、团体，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集会。当冯玉祥偕同夫人李德全会见苏联文化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时，列宁夫人赠送冯一套《列宁全集》（二十六册）、一座列宁雕像和一支小手枪，当时在场的列宁妹妹也赠送李德全一支小手枪，勉励她拿起武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斗争。

7月间，冯玉祥由乌斯马诺夫陪同到列宁格勒（工农革命发祥地）参观访问。

在列宁格勒参观六日后回到莫斯科，已是7月底。据张家口来的报告称：国民军在南口激战后撤退。阎锡山受吴佩孚指使，

出兵大同截断国民军的后路。得到这个消息后，冯玉祥心情焦急，坐卧不安。这时，李大钊同志又特派于佑任星夜兼程赶赴莫斯科，敦促冯火速回国。冯请乌斯马诺夫报请苏联有关方面给予援助，乌向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冯的要求和决心。经过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也是第三国际负责人之一）季诺维也夫（当时斯大林在黑海休养，苏联党政军领导工作由他负责），约冯到克里姆林宫作了重要会谈。

冯玉祥在苏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很大帮助，当他搬到察里村后，相约中山大学党的负责人朱务善、周达文每周有两个下午给冯讲解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如讲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因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而失败的原因。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蔡和森曾多次向冯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列宁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并在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经验，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指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绝不能生搬硬套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拿到中国去实行。讲到这里，蔡和森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当时高唱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谬论。同时，他还讲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根据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决定的。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冯听了蔡和森的几次讲话，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当面提出请蔡和森做他的老师，同他一起回国，帮助他共同进行革命。蔡因在莫斯科尚有未完的工作，不能离开，随即向冯介绍说：“刘伯坚同志是我在法国的同学，现在东大研究列宁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俄国革命的经验。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可让他继续给你讲马列主义的理论。”冯因与刘伯坚已有多次接触，所以十分高兴。并要求刘一起回国。蔡答应了冯的要求。让刘伯坚同志跟随冯玉祥首批回国。在莫斯科的党组织根据冯的要求又陆续选派了二十多人到国民军工作。多数是在东大

和中山大学学习的留学生，回国前还选派了邓希贤（邓小平、中山大学学生，提前结业）、李连成等三同志打前站，其余同志陆续回国。

冯玉祥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学习，耳闻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伟大变化，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益；在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的帮助下，对革命的理论与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与提高。

（四）五原誓师

从冯玉祥通电下野到苏联进行考察的几个月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军阀之间的变幻离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三月十二日发生日舰闯入大沽口开枪打死打伤国民军事件。数日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卫队开枪打死游行示威群众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三十二人，李大钊同志头部和双手负伤。次日，段执政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雄等人的通缉令。同日，靳云鄂指挥“讨赤联军”三个师十一个旅约十二万人，自河南分三路北上围击国民军。四月间，奉、直、鲁、晋各系军阀联合向国民军总攻，兵分五路进击北京，十五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七月间，各系军阀会攻南口，为了牵制和分散军阀北方兵力，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七月初出师北伐，两周内克长沙直下岳阳，八月底进逼武汉，以待会师中原。此时国民军与各系军阀几方作战，历时已三月有余，有生力量伤亡过半，餉械俱缺。又眼看与陕、甘断绝联络，乃于8月13日下令总退却，撤出南口，向绥远、包头、宁夏一带节节败退，战线延长二千余里，退却时所经道路，不是崎岖山路，就是广漠沙场，村落穷僻，交通不便，命令传达既难准确迅速，行军给养更感筹设困难，生活困苦，军纪松弛，有的已被敌军收编，国民军已处于被瓦解状态。

冯玉祥结束了在苏联历时三个月的考察，于8月17日晚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国，9月3日抵库伦。石敬亭代表国民军将领促

请冯火速回国。9月10日冯同随员李兴中（参谋长，后升至军长）、任右民（英文书记）、何其巩（秘书，后升至北京市长）、赵亦云（摄影师）、李连海（李德全的二弟，毕业于陆大）、史可轩（共产党员）、刘伯坚和顾问乌斯马诺夫以及翻译、卫兵等乘汽车从库伦出发，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昼夜兼程。12日路遇王镇淮（冯的旅长）宋式颜（军官学校学生）、黄中汉（宋哲元部参谋长），谈及南口西撤之惨状，军心涣散，秩序大乱，简直不可收拾，王等打算到上乌金斯科去，经冯激励，邀其共同返回重整旗鼓。又行二百多里，遇于佑任先生（于受李大钊派遣赴莫敦促冯速归国后，提前返国，见国民军失败后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可维持军纪的程度。因之，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道赴广东）。于是一个很富有革命精神的人，经冯劝说，又偕同返回，收拾残局。再前行又遇参加包头国民军会议的张允荣，详谈后，知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部已过五原赴宁夏。鹿钟麟率部在五原等候。冯当时决定先赴五原（此时包头已为晋军所占、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已被商震收编）。9月14日，距大青山约百里之际，遇鹿钟麟、宋哲元、邓哲熙、过之翰等，因得宋明轩（冯派回国的先行）的通知，带一手枪队来迎。相见悲喜交加。9月15日抵阴山要隘乌卜浪口，出口南端便是一个较大的村镇——乌兰脑包（当时属五原管辖，现属乌拉特中旗），驻在这里和附近村落的国民二军、三军、五军、六军的官兵前来迎接。相见极是难过，冯再三安慰，他对官兵们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要大家振作精神，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他的信心和决心，使官兵们顿起灵机，表示跟冯革命到底。16日下午到达五原，冯住在晋泰豫（以经营粮油为主的商号）的大院里（靠旧县政府大院），当晚即召集已到的将领鹿钟麟、宋哲元、方振武、弓富魁、何其巩、石敬亭等开会。交谈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一致公推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毫不推辞，慷慨就任，军机重大刻不容缓。当即向全国发出由刘伯

坚同志起草的通电宣言。

电文如下：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得好，行易知难。我即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的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浩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怎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我是生在工人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翻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韩复渠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已成陆军第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民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

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民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朗案，使国家受到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演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容忍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有看到统治者作的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属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咀闭咀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能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一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

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制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恨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属作这种鬼祟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甚么密约，甚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作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的，他又知道离赤化离的很远，够不上带这帽了，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共同来反对国民军，以泄他的私念。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國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使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制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

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在三万万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官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官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至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促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出于此。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都能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

于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举行隆重的誓师授旗典礼大会。会场设在五原县旧城（俗称北圪梁）旧县政府西侧广场上，临时由士兵筑起一个土台子，台底二丈见方、台顶一丈见方，高六尺，坐北面南，台后有登台甬道。参加典礼大会的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各军官兵约一万多人。主要将领有李鸣钟、孙岳、方振武、鹿钟麟、宋哲元、弓富魁、何其巩、石敬亭、过之翰、邓宝珊、张允荣、宋明轩、刘金忱、席液池、佟麟阁等。刘伯坚、史可轩、乌斯马诺夫、于佑任也参加了大会。绥远省民政厅长邓鉴三、五原县长刘必达、临河设治局长萧振瀛、地方绅士王英，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四周有不少群众围观。台中央竖一根三丈高的旗杆，飘扬着象征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民军旗）。刘伯坚同志手擎大旗威立台前。

西北的初秋，气候已寒，但这日天气晴和，艳阳普照，上午十时许，部队陆续从四面八方拥入会场。到会的官兵服色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带直军的布帽。器械装备更是残缺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也有的没有子弹袋，七零八落。虽然如此，但队列尚为整齐。中午十二时宣布誓师大会开始。冯玉祥满面春风、精神焕发，健步登上土台，进行演讲，他声音宏亮、义愤激昂，用大量事实痛斥和揭露了帝国主义称霸中华和反动军阀卖国求荣、践踏蹂躏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他号召全体官兵进行国民革命，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配合广东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并郑重宣布西北国民军改为国民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马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全场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接着由刘伯坚演讲。他威严庄重，豪情满怀，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国民革命的道理，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与前途。他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到会官兵的士气，掌声不绝于耳。讲演后即由刘伯坚同志带领全体到会人员宣读誓词。誓词谓：

“国民军的目的，以国民党的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

各界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计有：《西北日报》社代表刘贯一，绥远民政厅长邓鉴三、五原县长刘必达。他们表示热烈支持国民联军的行动。刘贯一在讲话中还说：“用马粪蛋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讲演完毕后，举行易旗仪式。于佑任以国民党执行委员的资格，授予国民党党旗。并宣布接受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当即降下五色旗，将青天白日旗高高升起。会后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誓死国民革命！”等口号。并高唱北伐军军歌：“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歌声、口号声激昂嘹亮，响彻云霄。

当日，国民军诸将领二十余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拥护冯玉祥为联军总司令。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次日，国民军诸将领在晋泰豫大院召开会议，组织国民联军司令部，共分两部、两厅、二司、八处。任命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后随参观团赴苏，由刘伯坚负责）、刘伯坚为副部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聘请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同时选派政治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

为了纪念五原誓师，25日五原县政府和国民联军司令部，联合召开了群众性的庆祝大会。会场设在隆兴长（清末一家大商号的名称，后易为地名，即现在五原县所在地）旧水利局的广场上，搭起了彩台，四周墙上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誓死救国”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参加庆祝会的有国民军驻五原附近的官兵和各界群众数千人。县长刘必达主持庆祝会。冯玉祥、刘伯坚到会演讲，阐述五原誓师的目的、意义和国民军与人

民群众的关系，强调军队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军队要保民、爱民、帮助民众。并宣布将五原县改为“义旗县”，（国民军撤离五原，奉军进驻后仍恢复原县名）。永远纪念五原誓师国民军高举义旗进行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讲话毕，由国民军为群众演唱革命歌曲，并演出了以郭松龄遇害全过程为内容的新戏（称文明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启发群众的爱国热情。使五原人民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会后刻石立碑于誓师处，永垂纪念。

在于佑任、刘伯坚、王一飞（共产党员）的倡议下，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国民联军举行国民党全军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选出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钰、王一飞、张兆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佑任、刘骥、史宗法（史可轩、共产党员）五人为监察委员。卢绍亭、张树声、张金宣、何其巩、白龙亭、张海如、李宝铨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刘仁辅、刘廷森、李鸣钟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并发布电令。

电文如下：

国民革命之意义，必须唤起民众，使之均有组织，联合进行，共谋福利，兹有下列数事，应即努力办理：

一、军队须与民众结合，举凡保民、爱民、帮助民众等工作，务须确实力行，使军队成为民众之武力，则民众与军队自成一體，种种工作，悉易进行，凡我同志，须先从此处着手猛进，不可或忽。

二、军中党务训练、政治工作，俱属至要，所有各级党部，须速组织成立，以便指导规划。

三、地方党务，亦须尽力发展，各军所到达地方，务即帮助各地党员迅速组织县党部，在物质上、精神上，均须尽力帮助。如给以印刷物品，办党经费及派人指导等等。

四、农民大率散居，漫无组织，致其知识日益落后，其力量

无从集中，应速设法组织农民协会，施以主义之训练，自可增加我革命武力之后盾。

五、木工、铁工、泥瓦工，各种穷苦同胞之工会，须由驻在军队之各长官，分别帮助成立，并津贴以经费，以资团结。

六、工人工资太低者，务须努力设法增高，必须按当地生活情形，以能赡养四口人之费用为准，务照本部公布之临时劳动法，督促其实行。

以上六项，为刻不容缓之事，务请同志转饬各部，一致努力办理，千万是盼。

会后，在誓师时的广场举行阅兵，冯玉祥代表向各军行授党旗礼。并致词云：此后誓本孙中山先生之主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促成国民革命之完成。

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高举为民讨逆的大旗，一时军威大振，不仅使分崩离析、溃于灭亡的军队枯木逢春、旱苗得雨，又获得了新的生机（因之国民军官兵将五原誓师称为九·一七新生命），而且使叛将离兵又闻风归顺，纷纷来投。原已为晋军收编的石友三、韩复渠、陈希圣等部，又重新归附国民军。为了做好石、韩等部的工作，迅速占领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包头。根据刘伯坚、乌斯马诺夫的建议，冯玉祥于十月八日将国民联军司令部由五原迁往包头。抵达时，石友三、韩德元、韩占元、井岳秀等，率部列队三十里出迎。司令部驻扎在西脑包阎家大院（原许长林旅司令部）。抵包后连日召开军政会议，一面作好石友三、韩复渠等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一面筹积军需粮饷，开展大规模的部队整顿和改造工作，由于冯玉祥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刘伯坚等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国民军迅速走上正规。在包头期间的主要工作是：

一、在刘伯坚同志的指导下，全军建立起政治工作机构，为使国民联军真正成为一支有主义有纲领的革命军队，必须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除政治部设立了组织处、宣传处、总务

处三大机构，做好联军司令部的政治宣传工作外，军、师、旅、团、营各级也分别建立了政治部（处），负责党务、政治、宣传、训练等工作。并以政治部（处）为军队与民众结合的桥梁，这些政治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都是我党派去的或当时即在本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这就保证了我党方针、路线的贯彻和便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当司令部迁到包头不久，党的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即派方廷祯（方仲如，解放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同志，持李大钊的亲笔信面见冯玉祥、刘伯坚同志，方廷祯除了解西北军的情况外，并协助刘伯坚在政治部工作，刘伯坚同志经常书写密件（用药水写在绸子上）向李大钊同志报告工作并及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当时由于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同志曾分别写信给党中央、旅莫支部、北方区委和粤区党委，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国民军。旅莫支部又派一批留学生先后归国到国民军工作。如萧明、王涤亚、朱士恒（逸臣）等同志，都在国民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党中央、北方区委、粤区党委也先后派来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有：刘景桂（志丹）、安子文、王一飞、陈延年、陈乔年、贾一中、马云堃、贾午（丽南）、曾晓渊、李联珍等。方廷祯到包头后，经与绥远工委路作霖和包头地方党组织密切联系，已知冯玉祥在包办的西北干部学校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彭桂林、孔广耀（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李子光、郭伯瑞等等，也分批分期调入各级政治部工作。宣侠父、陶新畲、刘志丹、方廷祯曾分别担任孙良城、孙连仲、马鸿逵、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担任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邓小平同志回国后担任了冯部在三原办的中山军事学院教育长，王一飞、萧明一直随军搞军事政治工作，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曾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刘伯坚同志更是肩负党的重任，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和极大的努力、除做好组织工作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官兵做好政治教育

工作，他提出：“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扶助工农运动”、“打破官僚主义习气”等口号。每逢部队和群众有重大集会，他都去演讲，向广大官兵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他不但广泛接触上层军官，还经常深入连队和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打成一片，没有官架子，和普通士兵一样，同他们散步、谈心、教唱革命歌曲。因此，对部队的思想状况了如指掌。他除给官兵讲授《国家与革命》、《劳工神圣》、《三民主义》等政治理论课外，还密切结合部队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部队驻扎在偏僻的大西北，衣食粮饷都非常困难，生活极度艰苦，他就给官兵大讲革命形势，指出：“困难是暂时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的军队只有暂时挫折，没有永久的失败。”鼓舞大家克服困难，保持旺盛的斗志。当时国民联军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过三个月的饷”。深为广大官兵信仰和敬佩。冯玉祥也称赞刘伯坚同志：“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几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我即无法不钦佩他。”所以政治部工作，冯玉祥都依靠刘伯坚主其事。

二、加强领导，改组《西北日报》社。原西北军有两个机关报，一是在张家口办的《察哈尔国民新闻》，负责人叫李广宏，是个基督教徒。另一个是在包头办的《西北日报》（1925年秋出版），和西北印刷厂在一起，社长蒋听松，是李大钊1925年派到冯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五原誓师，报社随军到了五原，住在王英（大地主）的宅子里。将《西北日报》改名为《中山日报》。社长蒋听松被调到总部任秘书长（原为何其巩）。报社负责人由党的北方区委派来贾午（丽南）担任。又充实了编辑人员和记者郭伯瑞、李子光（原为绥远《实业日报》记者）。这个报社主要登载进步消息，宣传北伐、鼓舞国民军斗志，不但成为我党在国民军的一个喉舌，而且也是我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负责联络任务。

各地党的组织派到国民军的共产党员、关系的转换和接待都在这里办理。此外，还在包头协助地方党组织大办贫民教育。刘伯坚同志派熊味根、田澍、方肇、郭伯瑞等共产党员协助。《中山日报》社还出刊了《九·一七新生命》、《革命精神食粮》两种小册子，发至全军官兵和地方组织，以宣传群众，扩大影响，军、师、旅、团、营各级政治部也都办了自己的小报，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在全军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宣传网。

三、在全军开展大规模的整顿训练工作。总司令部的架子虽搭起来了，可是当时军队很不集中，驻五原的仅有张凌云，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冯治安等部。其余的韩复榘部驻归化附近，石友三部驻包头、陈希圣部驻武川、张万广师驻和林、杨兆麟骑兵师驻固阳、赵守钰骑兵师驻大余太、刘汝明师驻临河、磴口一带、孙连仲师驻平罗、宁夏一带，以上各部均残缺不全，除原驻甘肃的部队外，共计不满五万人。而且南口溃败后，广大官兵精神涣散，军纪松弛，扰民害民事件比比皆是，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之，整饬军风气，已是当务之急。誓师后，当即下令恢复佩戴“真民爱、不扰民、誓死救国”的臂章，不仅要戴在臂上，而且在行动中要认真实行。重申不论官兵一律要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坏赔偿、不得擅入民宅、更不能调戏奸污妇女的规定。并令各级将领、下级军官严加整饬，并亲自带队查街、巡视。凡查有扰民之事，立刻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的处分。冯玉祥、刘伯坚等也自觉执行纪律，从生活衣着都和士兵一样，同甘共苦，不讲特殊。包头县长唐务，为犒劳将领送去一桌酒席，冯令当即把席送回，不准享用。后见唐务，质问道：“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五原县长刘必达，见冯生活太苦，特意给送去两只鸭子，冯当即回敬了他二十军棍，并斥责道：“你只看见我每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们天天吃不饱肚子？”为使官兵念念不忘群众，政治处还编了一首吃饭歌，歌词是：“战士也

是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每饭前由班排长带领朗诵。

一面整饬军纪，一面抓紧练兵，从早到晚，十分紧张，练习射击，劈大刀、学政治、听演讲、教唱歌，早练雄鸡叫，夜练满天星。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编训练，使军队的秩序井然有序，官兵士气十分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此时，已是十月中旬，在西南的刘镇华奉吴佩孚命令，围困西安已历数月之久，杨虎城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在南方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势如破竹地取下武汉，正兵分两路与军阀联军相持于武胜关及江西一带。在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张宗昌等加紧合作，继续向西北进击，以图最后歼灭国民军。时局日渐紧张，已是刻不容缓，而国民联军如果全力沿京绥线向东反攻，则因已转战数月，喘息未定，械弹两缺，难于取胜，一时与北伐大军又衔接不上，而且也难于应援西安；如果向秦陇和包头分道出师，兵力更显得单薄。正在此大计难定之时，党的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派曾晓渊同志送来密函，函中叙述了北京一带奉系张作霖布防情况，并建议出宁夏、援西安、取潼关，而后会师中原。冯玉祥采纳了这个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作战方针。国民军据此作战方针于10月下旬，出兵援陕方振武部自五原出发，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自陇东前进，方振武为副指挥，率兵七路，以方振武、弓富魁、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渠为一至六路司令。陈希圣、刘汝明、孙连仲、韩占元、韩德元、郑大章、张万庆部共为七路。各军由邠州（今陕西彬县）大道向西安进发。其余各部，亦一面训练，一面开拔。11月24日，冯玉祥由包头返五原后，即率部离五西进，五原各界群众夹道欢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王兴和部分较大学生杨林旺、党栋等，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国民军的行列。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

（《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4辑）

3. 李大钊建议苏联政府 援助国民军*

在华北建立的国民军，发表了反帝宣言，这使国内革命力量的联合有了可能。李大钊教授（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派往华北去谈判。为了同北方军队首领谈判，几个知名的国民党人也和他一起出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北方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192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近一年来，中国国民军的诞生，它们和国内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它们内部的反帝情绪，都表明革命运动在促使某些军事力量去发挥新的作用。”

因此，必须直接联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为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来看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全会正确地断定了国民军今后的前途，因而十分重视国内革命总形势和中国北方反帝、反军阀运动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国民军就会倾向于革命运动并跟着它走，如果反动势力暂时得势，国民军的作用就会有所改变。

1925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国民军领导人更加明确地走上了反帝斗争的道路，他们参加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代表团去同加拉罕谈判。

第二军司令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请求援助的。

1924年12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开封他的官邸。此后

* 标题为编者所加

胡景翼又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大使谈判。关于这件事，在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同志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有所陈述。格克尔写道：

“今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他们希望苏联不会拒绝援助反帝的斗争。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部队提供教官。过一段时间，胡景翼没有等到苏联政府的答复，就向大使请求暂时给他派一些军事顾问，因为预料邻近的军阀即将向他的部队发动进攻。”

1925年初，北方军阀果真开始向胡景翼部队进攻了。张作霖的军队集结在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地区。张作霖最忠实的同盟者憨玉崑，从河南西部山区对郑州发动了攻势。大批增援部队，其中包括拥有两个装甲列车的俄国白卫军，从上海火速调往徐州。

这一时期，胡景翼没有在他所控制的一些省份内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例如，在吴佩孚1923年2月对铁路工人实行野蛮的血腥镇压之后，1925年2月10日，铁路员工第一次在郑州能够公开举行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

北京当局得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将在郑州举行，乃下令胡景翼解散代表大会，并逮捕大会的参加者。胡景翼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而且把大会领导人邀来，把电报拿给他们看，并宣称代表大会可以安然地继续进行工作。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也都在他的同意下，在城里建立工会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

在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谈到，铁路工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统一的阶级性的工会，这个工会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决定满足胡景翼提出的向他的部队派遣顾问的请求。2月27日，苏联军事专家从北京去郑州，以便“帮助领导和运用他（胡）所拥有的军事力量”。顾问们帮助胡景翼司令部详细拟订了战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胡景翼的全部主力集结于郑州地区，而在东面对抗张作霖部队、在南面对抗湖北

督军萧耀南，只留下人数不多的掩护部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主要锋芒指向西面，并占领洛阳。占领洛阳也就打开了通往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了第一、二两军汇合起来的可能性。

经过两周的顽强战斗，攻占了洛阳。胡景翼就此亲自拍电报给孙中山。

洛阳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助下，在华北取得的首次胜利。胡景翼及其他参加进攻的将领，兴高采烈地评价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

在3月12日的会议上，根据中国指挥人员的提议，讨论了今后军事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列有建造装甲列车和改进地方兵工厂等援助问题。

遗憾的是，一个月以后，胡景翼突然死于美国陆军医院。这位将军的去世，对于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他的继任者岳维峻，4月27日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对他的军队继续实行以往的政策。他请求派遣顾问，并给予其他军事援助。

继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冯玉祥信件的内容是：请求在莫斯科接见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并对张家口至库伦之间的公路纠纷协助予以调解。

苏联政府细心地研究和讨论了国民军首领们的来信。显然地，这些国民军的社会基础和北方其他集团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些军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坚决，各军的司令都没有革命的经历，而军队本身也没有革命的传统。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应当认识到，由于这些军队牵制了张作霖的兵力，从而促进了华南革命的发展。

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这也就表明了，重要的问题不只是给予某些将军以技术上的援助，而是按照广州的实例建立起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

于是两个军事顾问组（在冯玉祥军队里工作的张家口组〔主要组〕和配合张家口组工作的开封组）立即被派往北方的军队。后来，1926年9月，在华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顾问组。1925年4月底，普里马科夫来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张家口组，当时，普特纳是该组领导人。

开始，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处境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国民军的指挥人员对苏联只有一点初步的了解，加之他们担心苏联人同中国老百姓和士兵直接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普里马科夫在他的工作报告和报导中都曾指出他们的这种情绪。

中国军队的指挥人员很快就认识到了，苏联确实是把有真才实学的、熟悉本身业务的人派到中国来。对待顾问态度的转变，是在顾问们应冯玉祥的请求给他介绍装甲列车和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之后发生的。此后，冯玉祥委托顾问们立即着手对军官进行实际培训工作。在此之前，国民军的战斗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张作霖的部队。

在苏联顾问的领导下，冯玉祥的军队里建立了炮兵、机枪、步兵和骑兵等学校。顾问们编写了学校的教学大纲，从苏联订购或亲手准备教学所必需的一切材料——直观教具、武器，等等。苏联专家们也主持了整个教学进程。

他们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

九月底，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冯玉祥军队接收了二百

五十名骑兵、一百一十五名炮兵。七十人毕业于工兵学校，三十八名高级和中级军官毕业于高等步兵学校，等等。

冯玉祥和军队的指挥人员高度评价了顾问们在培训军官方面的工作。

1926年2月，在同布勃诺夫会谈中，冯玉祥说：“教官们精力充沛地进行了工作，无论是在步兵中的，还是在骑兵和炮兵部队里，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要求高级指挥人员训练班的毕业生写出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对教官工作的评语。除去那些公式化的评语外，其他人都指出，学员们没有预料到教官们对待工作是这样的态度……按他们的说法，不仅任何外国人、甚至连中国人都不能这样细心而认真地督促学员的工作。”

苏联顾问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军队建立生产武器、弹药等等的工厂。过去，这些军队也和中国其他一切军队一样，使用国外的武器。帝国主义列强故意供应口径不同的、而且过时了的武器。1925年9月1日以前，第一军里就有七种型号的步枪、六种型号的机枪、四种型号的火炮，等等。军队大都使用1898年、1901年和1902年出厂的德国步枪，而且已经破烂不堪。武器口径不同，必然给部队造成弹药供应上的困难。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运到的子弹和炮弹不适用于任何一种型号的武器。军队里一半武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只能直接瞄准射击。军队里几乎没有军械修理厂，能够在修理厂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很少。冯玉祥的军队根本不知道装甲列车是什么东西。苏联专家们帮助重新装备了一些修理厂，在厂内安排了弹药的生产，培养了必要数量的技师。按照他们的图纸，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工人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

苏联同意向国民军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药品，从而使国民军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得到了：步枪三万八千八

百二十八支；日本步枪一万七千零二十九支，^①德国子弹约一千二百万发，七点六毫米口径步枪子弹四千六百二十万发，大炮四十八门，山炮十二门，手榴弹一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二百三十挺，迫击炮十八门以及药品等等。

到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了三千五百支步枪、一千一百五十万发子弹、三架飞机、四千把马刀、十支火焰喷射器等等。

（节录〔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

社科出版社1982年）

4. 李大钊重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为了求取必要的建议和指示，我们经普特纳准许之后去了北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Γ·H·维经斯基跟我们谈了话。他对我们帮助很大。在维经斯基协助下，我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我们跟这位极有魅力的人物有过多接触。

第一次谈话时，李大钊对我们说，他不太相信在冯玉祥的军队里我们能把当前的政治工作照我们想象地那样搞起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必将对总的事业有所裨益。他说，“你们到了俱乐部以后，要经常地对那些来听讲话的人介绍红军的政治工作是怎样组织的。你们应该给他们介绍红军政工人员所遵循的纲要，以便使他们获得最大的教益。这也是和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一种有效的、而且是重要的方式”。

李大钊预言，我们的基本听众将是军官，我们将很难指望有士兵来听讲。他说，即使冯玉祥给全军下了命令，师长们也会任意解释命令，他们不会让你们去接近士兵。

^① 原文为：“日本子弹一万七千零二十九发”，显系错误。——译者

* 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大钊的这一预言很快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冯玉祥下了一道相应的命令，而他的参谋长张之江将军[原文如此。——译者]——一个疯狂的反动分子，却就其权力之所及搞了种种名堂，以阻挠我们有效地工作。这一套他很擅长。他只要对任何一个师长说上几句话，后者就会把他的指示贯彻下去。而我们的机会就会大受囿限。

我们就这样工作了将近一个月。

最后，当B·K·普特纳确信我们在第一军的安全有了保障之后，才让我们去了北京。

冯玉祥设宴欢送我们。这是一次普通的中国式的宴会，但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宴会印象很深。宴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在翻译陪同下到了隔壁房间，我们注意到那里出现了一幅政区图，就问为什么突然要把这幅地图弄出来。翻译马上答道：这是中国的耻辱图。

我问道这上面划虚线的地区是什么意思。翻译解释说这是“洋鬼子”从中国人手里占去的土地，而且已经占了不止一年，也不止十年。翻译解释道，“这里划的是被英国人、法国人强占去的土地”。

“那这又是什么呢？”我们指着地图上划了虚线的苏联远东地区。

“这是远东”。

那天晚上我们再也没有更多地谈论这个题目。到北京以后，李大钊很想见见我们。他想知道我们在冯玉祥军队里开展政治工作的尝试有些什么结果。我们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的一个同志，塔尔汉诺夫（他虽然不是政工人员，但对我们的工作一直很有兴趣）向李大钊提出一个问题，问他怎么看待那张“中国耻辱”图。李大钊在书房里踱来踱去说：“要是冯玉祥元帅赞许这样一张地图都会使你们吃惊，那你们就太天真了！你们以为冯玉祥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吗？即使他再活这么多年，他也绝成不了革命家。最多也不过是有激进情绪，这可能反映在他的具体

实践活动上。当然，我不怀疑，冯玉祥元帅可能是孙中山所提倡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热烈的信徒。请不要忘记，中国可能有这样的时代，到那时不仅会涌现出冯玉祥元帅这一类型的人，而且还会涌现出口袋里装着共产党党证，但思想情绪跟他不相上下的人……”

就这样我们离开张家口，到了北京。这已经是1925年的5月了。京城的一部分地区由冯玉祥的部队控制着，另一部分地区则在张作霖部手里。城里可真是泾渭分明。有人提醒我们，哪条街上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动，哪条街上可去不得。我们牢牢记住了。那时候冯玉祥想在北京办一所培养大学生当指挥官的专门学校。这是为他的军队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B·M·普里马科夫已经在那里积极工作了。后来又派了另外几名政工人员去协助他，而他自己就当是全军队的顾问。还按各兵种配备了助手，有炮兵的，有通讯兵的，当时他们都在北京。

我跟巴库林和塔尔汉诺夫受领了去这所学校协助普里马科夫的任务。这是一项军事政治性的紧张工作。这所学校的学员都是大学生，绝大多数人会外语，有的会法语，有的会英语，有的会德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要认真地学习一门外语是办不到的。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李大钊和他周围的人。我们一起讨论在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同学们谈些什么。李大钊对我们说：“我们给你们出些主意，而你们再把你们的经验加上”。这办法十分有效。

在学校里约摸呆了一个半月之后，我们获悉将去开封岳维峻的国民军第二军。

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888—1927)^①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人之一。他在科学上颇感兴趣的是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

^①原文如此——编者。

社会学。

1925—1926年间，在称之为“哥萨克城”的我们的使馆区里（在1950年2月15日的苏中公报中，这里被称为前北京兵营），我们和李大钊的住处相互挨得很近。每逢见面时，他的脸上总是现出和蔼可亲的笑容，我至今仍铭记着他的笑容。似乎他的笑容是在昭告世人：“看，能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来了，他们在自己的俄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李大钊在同我国的军事顾问们单独谈话时，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当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军事政治形势。

（节录《苏联顾问回忆录，在中国土地上》（1925—1945）
社科出版社1981年）

5. 政治会议 北京分会报告书

（附致徐季龙等函）

（一、二略）

北京临时报告书

十六年一月廿二日

三、关于晋阎之报告。此间与晋阎之交通（间接电报）至今未断，当奉军进迫包绥之顷，晋阎又有电来，谓“奉军决取五原，再三交涉毫无效果，何以情形如国军不退五原，则战事不可免，且恐牵及本号，望彼仙诸君（指石曾守常）一商之（大意如此）。接此电后，即与此间军事专家开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结果金谓无论如何不洋退去五原，因如此则在局上不能牵制奉方，军事决定后，即由我方通知晋方。旋接奉方复电，谓此议既经党决定，只得赞成。盖彼固希望国军退出五原，一以冀国军之离晋境日远，一以避免晋军之冲突不因国奉之冲突而暴发也。嗣接宁夏方面来电，所谓固守五原，而孰知奉军抵包后仍继续向西迳迫，国军惨败之后，士气疲靡，不堪一战，一闻奉军之来即闻

风退去，却近依各方报告，国军不战而退五原，系又是事实矣（晋代表亦云确系事实）。晋阎既对我们有间接接洽，于是我便以纪廷梓、王振冀两同志及许多之人在大同被捕之事，托其代表转电晋阎，比即得太原复电，谓已电大同查明开释矣。王纪两同志既被释，而于各人尚不得解其原因者，晋阎释彼等时尚附一条，即放出后仍留晋境，不得他往，所以二人便到太原了。可是王纪虽释而其余二友尚未释，故我仍向晋交涉，结果如何，仍不得知。

在此时顷，晋阎又有电云，太原军官学校决为外者同志开放，望我们选择吾党党员派往该校。我们更复电，问他需要多少学生？他回电说现在营治校址，颇需些政治教官和学生，数目开学再详报告。据太原报告，阎本办有军官传习所，其中学生有数十人，已秘密加入吾党。阎夙知之至此阎遂表示接近他们，并想和他领袖谈话，此班同志很幼稚，以为晋阎对他们无善意，故拟全数退出，嗣知晋阎之态度，遂复留校并派人与晋阎接洽，结果甚好。

晋阎代表孔繁蔚师长来京，托人要与我们相见，时他遂约孔某于温寿泉（晋驻代表）一同到守常处相见，本亦约石曾来，派段子均代表他来，会是孔对我们所谈之要点如下：

（一）晋颇欲造一势，不甘居冯下，现已联络陈调元、靳云鹗、魏益三、米振标、张治公等部，直系之王金标一派，鲁之孙宗先一师，董鸿达一师，李征五两旅，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据闻此议实发自靳云鹗，由晋派人联络，晋阎而以领袖饵之。闻晋颇为动（参观靳之种种）。

（二）晋阎希望党军攻入浦口后，然后由靳皖陈首先发难，占据陇海，截断津浦路，同时党由武胜关，国民军由潼关，向郑州进展，同晋出兵，截断京汉京绥两线，国军亦出五原攻包绥（但以现在形势而论国军恐不能出五原矣）。

（三）晋阎曾商之孔，欲办一军官学校。孔向他说，如果仍

旧贯的军官学校，我不愿办，要办非黄埔的不可。阎颇有此倾向，孔希望在校供给政治教官和学生。

综合孔之来意，系观察党方与国军方面对于晋阎之态度如何？是晚谭本约他们九点钟来，先同我们谭，约定国军方面的人十点钟来，不意孔等来迟了半点钟，所以谭未顷刻而国军人至，孔等告我最好我们谭完后，再请他们来于此。可见吾国间当不无芥蒂。孔说国军士气不振已极，当奉军追追包头之际，国军仓猝逃去，失去炮弹千余枚，子弹好几万发，飞机廿余架。此项飞机晋方曾欲得之（在韩复榘投降之际），国军不与，今竟入奉，殊为惋惜。孔又谓奉方拟将绥远以北的铁路，完全拆毁，经晋再三劝止，暂留我们。当时赞成晋方能在北方另成造一势力参加国民革命战线，惟此北方二字，恐冯发生误会，最好另换一名词，但当时若遽未有所决定，我们谈后，国军人与他们晤见，只谭了些（不打不交）的话，但是他们过二天又在另一地方晤面，所谈较为亲切。孔等说，冯等派赴山西的代表，多不重要，而且在谈话内往往有命令我的口吻，以致阎对冯深资不快，希望冯且善于辞令之人或可挽回许多。

在这个时候郭新涛林勉之胡廷珍等同志一行四人，欲赴西北无路可通。我们乃向晋阎为他们办交涉。晋阎复电云，谓，彼等赴大同经赴镇守使署，彼已派军用汽车到大同迎候他们了，并无有到西安平凉之消息，彼亦可代达，又有电来说，太原兵工厂积弊太深，他想改革一下，如党方及工人方面不予以援助，则改革不易。我们当即复电，告以改善工人生活，许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然后党方可向工人求谅解。晋阎又复电云，太原兵工厂工人待遇甚优，系包工制，一等工月薪三百以上，二等工人月薪在二百以上，三等工在八十以上云云。我们得此电后，不解这是一种什么工，而又没有得到太原方面关于此事的报告，好这时我们正想派人到太原，与阎商量一个通西北消息的办法，故此遴选了王光临同志与郭新涛等同行，往太原实地调查兵工厂事，并与

阎商量此后通西北消息的办法。现王同志尚未来京，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孔留京直到前日才返晋，频行我托人告诉他说，我极赞成晋阎的北方革命军运动，并且知道汉口方面干部中人，亦极赞成，不久必有正式答复，足令百川满意，尚望积极进行助进革命统一，厥功甚伟。至于军事方面，晋军宜急速与革命总部及国民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作一通盘筹划，及如何动作最好听国民政府军事中央部的命令而行。孔对此亦首肯。

顷晋驻京代表来告，近来日本人屡到太原，与阎接洽表示深恶奉张的意思。晋阎以不知日本此种表示，是否真意，抑或为探消息而来，故以山西始终与奉张一致答之，又最近太原民众，曾以当地吾党指导举行盛大的反奉游行示威，奉方闻之即派专人向晋阎质问。晋阎说这都是些青年学生干的，我已警告他们不许再干了。五原自国军去后即归奉军占有，现在奉撤回了三旅，只留二旅守五原，在名义上以五原交付晋军，实际上财政机关仍在奉军手中。

四、关于最近外交团的态度报告

(一) 英国

汉案发生后，唐悦良（国民军外交处长）曾访英使蓝普森氏。蓝氏对他大发牢骚，他说此次来华深望把中英邦交弄好，对于国民政府尊重其地位，并且深致同情。故抵华后，即先赴南方接洽，随即发表对华新提案，其用意完全在促进英国与国民政府间之良好关系，不意其结果适得其反，不能不令我深抱悲观了。我在汉时曾晤陈友仁君六七次，陈君意甚恳挚，如能按照此言办法或有良好结果，亦未可知，但我自始即怀疑陈君是否能如其所说去办，今我离汉不久，即发生汉案前途正未乐观。唐君答称，中国民众及国民政府都认新提案有援助北方的意思，故对英起反感。蓝氏说这是误会，试思广州政府已自行征收二五附加税，而无所阻碍北方军阀焉，有不尤而效之呢！我们已不能阻止南方，

又何能阻止北方呢。新提案之意，亦不过预知此事之必未而先自承认之，以自保其体面而已，非有他意。或者将疑吾承认北方政府，此事南方政府请放心。英国此时决不承认北京政府云云。翌日国闻社记者胡政之访蓝氏。蓝氏所言则视与唐所言更为露骨，蓝氏说英国亦是一个国家，亦是个民族，他的忍耐有一定的限度。现在恐已达到忍无可忍的限度了。胡云君对北京政府的感想如何。蓝氏云毫无希望。胡云对北已无希望，则希望仍在南方，然则非继续忍耐下去不可，民众运动在其性质上容或有过甚的地方，不能因此小小波澜而使邦交有大的变更也。蓝云我觉南办外交真是一种难事，蒋介石唐生智则忙于军事，无暇及此。陈友仁孙科宋子文等，仍皆无大力量可以主持此事，然则操纵民众运动，主持外交方针者鲍罗廷一人耳，今我向谁去办外交呢。蓝氏向人表示虽然如此。但张作霖访他的时候，则又张大盛典礼陈列件件兵于门首以欢迎之，礼食甚隆重，前未曾有，相谈有二时之久。日本甚忌妒之，谓英人甚鄙以迎皇帝之礼迎张作霖。当晚北京警察即干涉北京国民社，不令继续出版了，大约这是蓝张会见后之一端。

（二）日本

自清浦子来北京与石曾寅村等见面后，接着左分利又到南方，临行时亦曾与石曾寅村等见面，直到现在日本外交有关人们和石曾等间接接洽不曾中止，日本人又有大内畅三者，系众议院某大学的教授，中日文化事业协会秘书，他到南方视察后，即回北京与石曾沈尹默等继续商量中日关系的问题，自然在北京芳泽日使板西顾问在□□□□（原文模糊）亦曾参与此事，在东京日本政府当问及政党干部皆有与闻，有一天内请石曾拟出几条纲领来，以便据此非正式的征求国民政府及日政府两方对此政纲的意见。石曾说不便拟，最好由文化事业协会中的中日两国朋友们第三者的地位拟出来，再由日本朋友征求日本政府及朝野的同意，然后交我们转达国民政府，由是由大内沈尹默等拟出方案，

大内说已约日本朝野的同意其条件如下：

一、中国日本两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共同解除国际间对东洋一切束缚并谋两国国民经济的提携，以彼此互惠为根据；

二、关于主权的中国定期收回治外法权按期取消一切租借条约，日本以诚意协助之；

三、关于经济的废除厘金收回关税完全自主，日本以诚意协助其成功；

四、东三省境内日本政府日本国民一切既权利，应俟中国统一后中日两国自动的让步，以好意改善于两国不利益的条约；

五、中日两国通商条约及税则，应以双方最惠的精神订立平等互惠条件，双方尊重而实[行]之；

六、关于中国暂时的政局，日本以友谊的精神促成南北一致，或中国南北首领之双方完全同意南北分治，再根据全国民意以法律统一，如至不得已时，南北作战日本必绝对中立，承认南北为对等交战团体。

此外尚有一条关于防止赤化的，这大概是芳泽的意思，经中国方面的反对，便删去了。大内在这一般人中比较开明，他说赤化在日本虽无可怕的东西，但于中国或适宜亦未可知，可不提，大内本想于一个星期前由京赴汉，持此条文与我政府要人接洽，后接东京来电，政府要他先往东京一行，然后往汉，他在未定前向石曾要求与守常面谈。守常遂约他当晚在俄款委员会相见，是晚九时，大内自带一通译方梦超与他们同来寒暄数语后，守常即告彼日方条[件]已经看过，不过有些点还望先生予以更明晰的说明可乎？大内说可以，下便是守常和大内的问答了。

问 第一条中“共同解决国际间东洋一切的束缚”的意义是否含有本愿以行为行协助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意思？

答（大内）是的含有这个意思，不过日本在国际上因为不能孤立之故，故不能明示其态度。因为日本若在国际上孤立，虽欲助中国而不能。

问 第一条谋国民经济的提携以彼此互惠为根据，是否有具体的提议？

答（方梦超）这是指棉纱一类的商品是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物品。如果中国不与以提携而增加关税以障之，则日本产业界将不堪此重大打击。

答（大内）日本地狭人多。如中国不予经济的提携，则日本民族不能生存。（守常）说我们所主张的革命不是国家主义的革命，而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我们决不主张专为自己民族的利益而至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大内说国家主义的革命是旧式的革命，如今已成过去了。

问 第二条“定期收回治外法权按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否把租界（如天津汉口等）租借地（如大连等）内的领事裁判权，外国行政权都包在内，又所谓“定期”“按期”是何意义？

答（大内）依我解释当然全包在内至如定期按期云者，是指收回治外法权一类的事不是仓猝所能办到的，必须与关系国约达一定的期间即当交还，君曾在日本读书当知日本当年收回法权，税收的维新运动，人民亦曾受多大的牺牲，大隈伯一条腿就系为此断送了。（守常说）我当时读日本史读到此节曾起最昂奋的兴味，就我的所知，日本在大隈伯出任外交以前是当外国是一个外交团来办的，很难得有效果。大隈伯出来便主张采“国际谈判”的政策，把各国分开一个一个的交涉，大隈伯因当时民众不了解，炸去一足而去职，但继他而起的外交家用他的政策究竟成功，还有一个，最值得记忆的便是当时日本最难交涉的国家，便是英国，一旦与英外交办好了，其他各国便迎刃而解，中国今日情形与日本当日有些相同。

问 第三条中“收回关税完全自主”是否含有中国把数十年来，为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完全收回的意思在内？

答（大内）就是这个意思（很郑重的说了二三次这一条很要紧）（守常说上次关税会议的时候，英委员很怕中日提起这个问

題，故赶快借着段政府倒台，就把关会闭会了。大内说就是这次的对华的新案，英国亦想维持其海关行政的系统，故虽承认了南方征收二五附税，却要求仍须由海关征收，正是这个意思。（守常说诚然。但是南方政府征收附税，其目的并不在增多增收入，而在当作一种内地税由中国的自设机关征收，而不经海关的手，用意亦在打破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

问 第四条中“以好意改善于两国不利益之条约”是把那些于日本利益于中国不利益那些条约除外了，但是以我看来关于东省条约大概都是于日本利益于中国不利益的？〔那些包括在内，当时讨论到此条时，因为顾虑到日本人骤见起来反对，从而发生阻力，故用此语以掩饰之〕。

答（方梦超）这当然对于那些包在内，当时讨论到此条时因为顾虑到日本人起来反对而发生阻力，故用此语以掩饰之。

问 第五条的意义是否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等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

答（大内）就是这样。

问 第六条中“日本以友谊的精神促成南北一致”，国民政府方面极欲与奉方谋和平，但是奉方对南是否愿意和平还是问题，日本对奉天有没有把握使之不对南作战？

答（大内）我于南方到有些朋友，于奉方却很〔少〕，是亦有二三相熟者相见即以此劝之。

答（方）大约先生是文人，此次与武商议，此次与坂西商议，坂西颇赞成此议，故武人方面由坂西去办，因为现在的陆军大臣是坂西同学，又是同乡，故好说话。此次大内回东京即是参谋本部和陆军大臣商洽此事。

问 第六条中“如至不得已时南北作战日本必决对中立”，此在内战日本应如此，但有一事我欲请问的如中英发生冲突，日本是否守中立？

答（方）这是涉及第三的问题，故未谈及。

答（大内）（关于此点他答复颇含糊）中国如与他国冲突日本自应中立，为于两国有利。此次回京后，将更往武汉一行便是奔走此事。日本朝野本是方针以处理之同时，亦望中国民众不此方针以避免二国间之冲突。

问答已完，守常乃表示几点意见，不是代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而是个人的。第一，欲中日两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须根据在政治上日本对中国让步，经济上中国对日本让步的原则，即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须予中国以赞助，关于两国国民经济点系，中国须予日本国民以提携。

第二、南北分治只是一个过渡的视线，中国国民党究是要谋中国的统一，可是谋中国的统一，国民党自有其建国的方略的进行，勿助军阀而予以妨碍，因为中国不统一于中日二国经济的提携上，亦甚不利。谈至此，大内以为守常的主张或有国民党将以武力解决奉张的意思，故复加以辩解，说在统一之先南北分治，或不可免，可是南北分治便是统一的必经阶段。我在南方见国民党友人便劝其暂时休息，整理内部，不必急于谋扬子江以北的发展。守常说此言甚是。我们取得的地方不仅在武力的占领，便算了事，我们要把党的基础，深植于民众，在政治上，方能算取得了那个地方，否则徒以武力解决，与军阀的武力统一，何以异之？夫整理内部的忠告，盛意可感。

第三、日本在满州关系吾人早有所谅解。

大内听守常言后颇现欣悦之色，乃悄然告守常，日中两国以外，还有一国当联合，便是苏俄。其理由我今不明言了。守常即答他道，即不便明言，我亦明白了。乃与之寒暄数语而去。

从这次谈话和六个条件，我们可以看见日本注重的几个要点来（一）主张中国暂时南北分治（二）在分治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在东省内的免得权不生动摇（三）愿怱中国收回数十年为英把持之海关行政权（四）日本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别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这是六条的骨干，此外的辞句都为装饰外面的好看

罢了。大内与守常见面后的一日，大内即乘晚车返东了。

(三) 美国

美使馆态度忽变似表同情于英，唐悦良曾与美使及其代办晤谈，言下深不与于国民政府，美使我实为夙表同情于南方之一人，但近南方对外态度深令失望，如何排英至于如此急烈呢，我与蓝普森同船来华，所谈至为详悉。他此次来华，抱着满腔热望，想和国民政府开诚相见，把中英关系弄好，不图发生汉口事件，出乎意料之外，若云承认北方政府，征收二五附税，那末试想有无英使的新案，见南方征收而毫[不]阻止北方军阀焉。有不自行征收之理，听说以群众运动占领了汉口英界之后，而欲以同一手段占领日法租界。这种办法，实在危险的很，以后唐氏又见他的代办，他更说你们收回租界是可也，但是为何又仇视教会呢？这不是仇洋排外是什么，我们教士在闽的已陷于危险状中。美驻闽领事已有数电告急，由西安跑来的教士说西安城被困围数月，困在城中的教士，真是万死一生，好容易祷告上帝，若大旱望雨一般的冯玉祥来了，西安以为这可得救星了，谁知冯到西安后，把教堂占了，求冯玉祥保护而冯不理。这样看来冯已入了布尔什克，你们南北打成一片了，以苏俄为后背主人，我[再]不能与以同情了和辩护了。玛慕瑞令使离京前一月，他的代办又致电乙函，并次申明此意，并云他所谈的玛慕瑞今俱已完全同意，此次回国即将此真相报告于美云云。唐得此函后，立来与守常商议，我们认定美使馆这种态度其用意在于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或许是希望我们对于美教士不加危迫，故严其辞以促成我们注意。于是商请唐君再往美使馆一谭，其措词看下。我们“国民军国民党人”，听到美使馆员人们突变对我态度不胜诧异，因大家都知道首先到广州访国民政府的玛慕公使，对此事实不但中国民众对美起一种好感，即世界的外交界亦曾予以多大的注意，现在美若还定用这种精神办理对中国的外[交]，相信由此事实所生的良好影响，当更发展而况大，俾益二国邦交不少。我们不解美国为什么忽然要踏英国走

狗，民众运动有时过火一点容或不免，而且一般民众在反英的狂潮之下，对于美国教士未便细辨，亦或不免作了殃及美国教士之举，究系一个小小事件焉，能以小小关系而更变二国邦交的大计呢。如有事须我们代达国民政府者，我们可以代达云云。美代办听了这些话以后，声明希望你们以行为证明你们对美的友谊，最近何应钦到福州，美总领事两次访问，何均拒不见，希望转达国民政府转告何将军，能够接见美总领事以便有交涉时可以商量云云。唐答我们可以去电转达，我们当即将美使馆的态度为其希望何应钦接见美领事的事电告国民政府了，不知可曾收到否？以我们所知，美突变其原因有三：最近在国际上东方的离合变迁，似乎是英美互相提携以对日本，而日本为对英美之故，一面联合更有接近苏俄的趋势，此次英美向远东大调海军，借口对于华实行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英美殆欲将海军向太平洋移动集中，颇有对日本示威之形势。英美同种，在剧烈排英怒潮英美实有许多地方利害一致。有人说此次讨英新提案，赞同愿以美政府方针不合，故美政府召还美使，美使以自己由因此事受一打击，而陈友仁同志又迳美政府反对英提案，故玛氏对南殊不快。现在玛氏又被命中止回国，不知是何原故。

（四）法国

法帝国主义者虽与奉鲁有相当关系，但是他对吾党的态度似较他国为和缓。天津法界前次捕拿党人旋即释放便可知道了。最近天津同志廿四人，在法界开会为所捕去，因为是星期日，法领不知此事，翌晨法领闻之，便立令放出。是日委闻讯石曾即向法使交涉释放，至少勿引渡，恰巧晨是早日，法使请石曾晤面（其实或系天津法界捕人事法领请示彼之命释放故，彼作不知先向石曾温一温交情）。以下便是法与石曾的问答。法使先说好久不见了，所以请你来谈一谈。现在各国都有害怕的样子，好像仇洋排外的惨祸近在眼前，我在中国的朋友如你呀、蔡子民呀、褚民谊呀，都是多年好友。我知道中国人最讲和平的，但是人人传说

现在国民党的外交，是俄国指挥着，究竟真相如何，石曾答他说，我们是老友了，不能对你说谎话，国民政府实在有些俄国朋友在那里帮忙，但这并不奇怪。奉天方面有他的日本朋友，他们有他们的朋[友]，我们有我们的朋友，设法国朋友亦愿来帮助我们，亦是一律欢迎的。法使说这一点我明白了，后又说英国总想把各国卷入漩窝，但是法国不肯。但看对英之新提案，表示反对便可明了。此次汉口事件，只须国民党不以对英手段对付法界，法决不与英一致行动，不过有些在法国外交部办事的法国人，思想很旧，他们还想拿廿年前对华的外交来对今日的华人，完全不对的，是办不到的，我们常常有报告到法政府去说现在中国民众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不过我们的力量不够转移他们的旧观念，最好你和蔡子民先生常常打电给穆德一流社会上的领袖，从社会作工夫亦可影响我们的政府，只我一人说他们或以我太过了，至了一步，石曾又去关于法界捕人的事去找他，他说他不知道此事，容他去电告津领事万勿引渡是了（其实此时释放了），务望以后有事先由我们在此商量，以免彼此隔阂的地方。石曾说，那末你可以给电各地领事，凡有关于国民党的事，不可直接与国民党发生冲突，不可轻率的处理，务须电告北京法使馆，以便我们彼此商洽，我亦同样的电国民党各地支部，你以为如何？法使答云，这办法很好，很好，这就是最近对吾党所表示的态度。

附言

日本坂西不久将南下，临行前拟与守常一谈，讨论我军将来到上海时，关于处理租界如何应付英国的问题，详情当候谈话后报告。

政治会议北京分会

烈武励斋

先生均鉴

季龙孟余

兹随吴渊同志赴汉之便，特将所有重要材料汇上，报告阅后

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参考。此间经费困难，阳历年关即由弟及石曾借贷勉强过去，迄今月余，屡电中央而并一字之答复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现在旧债已负约未还，而阴历年间又复迫人，为吾党所补助之机关，将交迫而来索，款究不知从何应付。此外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与美国商人 Fox 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亦因经费茫然不可靠，致生迟滞而不能进行。中央以为北方工作均当停止，即望代请中央明白告知，长此消极对北京分会不合作，不是一个好办法。又中央向来不与我们以任何政治消息，亦是令人起奇异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问题，何[等]重大，听在武昌和南昌的中执同志争持甚烈，而京分会同人并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们了。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如为集中起见，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至于敌党报纸如晨报则讽刺迭出，画一旅行的箱子上书党政府，贴上些广东旅馆、汉口旅馆、九江旅馆的条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真是我们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敌军内部较受吾党之影响，至如详细情形，此时应守严重秘密，故暂不报告，只好事后再请中央追认罢了。胡政之君不久当赴汉口，他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对于吾党表示相当的好意，望兄等与为比较的亲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为人明快干练，将来高培五旅如须派政治委员时，望兄等荐之于。邓演达同志又吴渊同志亦至，老成稳妥亦望予以相当工作。又北京市党部选举，均已商洽就绪，似无偏倚不平之处，故可望无纠纷发生。南中军政消息有须等等，知道的幸兄等时电好音，吾侪企领以盼所

不能得于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贤同志来京助益我等之处实多，数月以来所还至感后于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尽，望于武汉择一最妥当的通信处，便中示知。

弟李大钊一月廿四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1]

十二 坚持斗争，英勇献身

述 要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两艘，掩护奉系军阀军艘数艘，闯入大沽口。蓄意挑衅的日本军舰，不顾国民军的阻止、警告，公然炮击国民军驻地，国民军被迫还击。16日，日本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中国在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并限48小时内答复。

3月17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日示威请愿，要求段祺瑞政府强硬“驳复最后通牒”。但卖国的段政府，却派出军警镇压，当场用刺刀戳伤群众多人。

3月18日，北京二百多个团体、十余万人再次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会后，两千多人到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反动军警有预谋的屠杀。顿时，门前广场“血花飞溅，尸首横陈”，惨不忍睹。这次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大惨案，就是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参加了这次请愿斗争，枪响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指挥群众撤退。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的通缉令。通缉令以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京报》1926年3月20日）在反动军阀政府加紧迫害的形势下，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于3月底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侧的旧兵营内。不久，国民党领导人徐谦、顾孟

余、丁维汾等相继离京南下，我党也有许多同志调离北京。从此，李大钊肩负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坚持战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隐蔽期间，除策应北伐外，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区委壮大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因此，尽管这时“反赤”“讨赤”之声甚嚣尘上，但党团组织都在暗中稳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断扩大。自“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共青团员也有更大发展，除在大学外，在许多中学也建立了团的组织。同时，国民党员也由两千多人增至四千多人。

他还领导北方区委派遣大批革命同志深入农村开展斗争，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使河北、内蒙、山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仅据1926年底乐亭、玉田、清苑、蠡县、围场等十八个县的统计，就有农民协会会员七千二百九十五人。

另外，继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后，他这时又写作发表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探索着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总之，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在隐蔽期间，保持了与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密切工作联系，及时地以“白芳渠”（即北方区的谐音）等代号传递了工作计划，报告和各种信件，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和革命的群众运动。

1927年春，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领导机关的监视，风声更紧。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和关心他的人，托人送信或亲自拜访，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谢绝了。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敌人终于下毒手了。在得到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7年4月6日（清明节），出动三、四百名军警、宪兵和特务，包围、袭击了东交民巷内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逮捕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即对他秘密审讯。李大钊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报纸报道：“李大钊受审问时，

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李无确供！”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同情。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张篁溪：《李大钊殉国记》）国民军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北大、师大等九校校长集会讨论营救办法。北京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安国军”，将此案“移交法庭办理”。学生群众、社会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友好，多方设法营救。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组织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审判，对李大钊及十九位革命者处以绞刑。李大钊象平时一样镇静从容，第一个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莫英、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十九名烈士。

李大钊遇难后，汉口、陕西、河北乐亭等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高度评价李大钊的革命伟绩，对李大钊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怀念，并声讨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的罪行。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1933年4月，党组织通过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师生，为他举行公葬。22日，在妙光阁浙寺举行公祭仪式。23日，举行灵柩出殡仪式，自宣武门浙寺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由于党的组织领导及李大钊的崇高威望，使这次出殡仪式变成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83年2月，北京市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万安公墓傍建

造“李大钊烈士陵园”，并于同年10月隆重举行了落成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人士共五百多人出席了落成典礼。

松柏青翠的陵园中央，停列着李大钊烈士墓和夫人赵纫兰墓。墓后竖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背面镌刻着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见本书卷首）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书写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一) “三一八”运动

1. 关于日舰炮击大沽事件之报道

(1926年3月15日)

本报14日下午五时北京电 此间舆论，对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中日互提严重抗议案。谓此事起因，完全由日舰不照预定时间入港，致启误会，全部责任应由日本负之。

本报14日下午八时北京电 使团对大沽日舰案抗议，昨到外部，外部电津鹿，征求答复意见。

本报14日下午八时北京电 鹿布告，是经过检查之船只，得于规定时间，由领港领路入大沽。

国闻社14日北京电 外部宣称鹿（钟麟）报告，日舰原约文（12日）早十时入口，入口时须缓行，并在某地点稍停，待国军瞭望清楚，免意外误会。日舰迟到文日下午三时方入口，入口后行极速，炮台发号枪令缓行，日舰即还炮，国军仅用步枪略御，未还炮。事后鹿派人至日舰处，告误会情形，日领尚表歉意，谓商洽未尽妥。至晚忽派人面鹿，谓日舰伤人，情形重大。鹿谓既被伤，应上陆诊验，答已回旅顺。鹿现派门致中、高震龙会同日领查勘。外部与日使馆未用公文抗议，不至成大问题。

路透社14日天津电 据此间西北边防督办外交代表称：自驱逐舰一艘首先袭击炮台，炮台乃回击。日领事暑否认此说，指为无稽之谈。据华人言，炮台举号令日舰停驶，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乃列队于炮台，日舰一艘即发炮轰击，伤国民军十三人，于是炮台乃还击。日舰向海开去。鹿钟麟即向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闻日舰共微伤军官及兵各三人，重伤军官两人，领港口人一人，均经送往旅顺医院医治。

东方社14日北京电 国务总理贾德耀，虑大沽炮台射击日本驱逐舰事件将酿成重大交涉，于本日对往返之客，虽依据本国方面之报告，有所辩疏，然希望缩小问题之范围，与竭力谋和平之解决。中日两国新闻报纸及通讯社持慎重之态度。至与日本正式交涉，须待中国所派遣之调查委员前往出事地点调查真相，报告政府之后，方可决定。

路透社13日天津电 星期五日国民军轰击日舰，仅用来福枪，日舰报以机关枪。天津外国领事今晨曾开会议，现各已报告至北京本国公使。各国海军司令亦曾在英舰福克斯格洛夫号开会，英美法意司令均与会，日本因现无军舰泊此，无代表列席，关系讨论对付大沽现局办法。又闻已决议通告奉天军舰队及炮台司令，于星期二日完全退离海口，不得再以武力干涉船舶出入，被轰之日舰，已载受伤者赴旅顺口，内有军需长一员，伤势颇重。

（《民国日报》，1926年3月15日）

2. 反对八国通牒（附“八国通牒”原文）

北京召开国民反日侵略大会并通过决议案

（1926年3月15日）

本京各界因日本兵舰击毁大沽口炮台及助奉军在滦州作战事，特于昨日纪念中山先生大会之便，召集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以共同速筹抵抗方法，兹记其经过如次：

昨日为纪念大会第三日即最后闭幕之一日，又适值星期日，故各界男女老幼益为踊跃，午间已达三十万人。国民反日大会即商请纪念大会礼堂休息一小时，各界停止致祭，于下午二时起在太和殿前开会。当由传声筒宣呼一致参加，殿前广场，密塞无

隙。公推于树德为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天此会，紧要无比，因为日本兵舰击毁大沽口炮台，已是危急万分了。大沽炮台在庚子年被八国联军打毁，乘势侵占北京，我国从此贫弱不振。这是我们第一件奇辱深恨的痛史。现在奉军在北塘被国民军打败，不能登岸，日本却明目张胆帮他，开来兵舰，将大沽口炮台打毁，马上快要入天津。诸位要知道日本并非专心帮助奉军，是要借此来实行他那侵略政策。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他占了天津，便可一鼓直达北京了。这是何等紧急何等危险的事。我们生死存亡，危在旦夕。究竟要如何对付，请大家共筹方法，从速抵抗”云云。言下群众愤激万状，群呼打倒助奉日人，声气壮烈。次由韩麟符演讲云：“诸位来纪念孙中山先生，因为孙中山先生是拯救中国的元勋，不幸逝世才到一年，又值此纪念期间，竟发生此种绝大之事。日人打毁大沽炮台，加在滦州作战，不专是侵略直隶，乃是覆灭中国之开场。我们快要就此运动救国，才是纪念孙先生的真意。他们虽则帮着张作霖、吴佩孚来抵抗与民众同情的国民军，实则他们想进取天津，要把全中国土地在他管领之下，把全中国人民在他生杀之下。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请大家结合起来，赶快作反日运动，筹谋具体办法，抗抵日本。否则不但无以对孙先生在天之灵，恐怕连在此活着也不能了。”在会听众，不问妇孺，皆挥拳痛恨。即由安体诚提出抗议草案七条，皆同声高呼完全通过。兹录原案如左：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对最近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及日陆军参加滦州作战事，将严重抗议如下：（一）立刻撤退津沽一带日本军舰；（二）日本军舰非得中国允许，永不准在中国境内停泊及行驶；（三）立刻撤退在中国境内一切军警，永远不准复设；（四）日本政府须向中国国民政府及人民道歉，并撤换驻华公使；（五）严厉惩办轰击大沽口之军舰官佐士兵，并以后绝对不准扶助奉天胡匪张作霖，扰乱中国，并不准借给军火，并参加奉军作战；（六）赔偿中国大沽此

次所受损失；（七）如不容纳以上最正当之要求，则国民立刻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驱逐日本公使出境，即与宣战，亦所不恤。

继复提出办法五则：（一）提出国民抗议书；（二）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行为，并励行抵制日货；（三）通电国民军，以武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四）通电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军，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五）要求外交当局据照国民抗议书严厉执行。以上，亦已一致决定照办。在场群众即高呼口号，“反对日本炮击大沽”、“反对日本侵略直隶”、“反对日本帮助奉系军阀”、“驱逐日舰出境”、“驱逐日本军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国民革命万岁！”“反帝国主义胜利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至三时余始散会。

（《京报》，1926年3月15日）

“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驳复列强通牒致八国公使函

（1926年3月18日）

公使团领袖，及署名大沽事件最后通牒各国公使鉴：

我们看见了公使团体关于大沽事件最后通牒，异常愤慨！大沽口为我国北方门户，我们有守备防御之绝对权利，况当群盗袭击之时，所以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为绝对侵犯中国主权。贵公使团根据辛丑条约之权利，提出最后通牒，真是无理取闹！我们最后向你们提出抗议。

辛丑条约，在我们中国国民，认定这是满清帝国时代的条约，在民国以来，是绝对否认为有效的，就是在你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也是默认为无效，有三点可以证明：第一点，就辛丑条约说，该约原定在天津三十里之内，中外各国，不得驻兵，但是去年国奉二军作战，李景林用天津做根据地，在天津附近作战许久，毫不听到你们提出什么抗议。第二点，辛丑条约指定不能驻

兵的地点，是包括山海关与秦皇岛在内，现在张作霖正利用那些地方作战，你们帝国主义者也不见提出抗议。第三点，张作霖的海军来攻大沽口，你们许久都不向张作霖提出抗议。有此三点，就是你们帝国主义者自己，认定辛丑条约是无效的，现在你们偏要在这个时候来抗议，这证明你们就是帮助张作霖，延长我国的内乱，侵犯我国的主权！如果你们不能立时撤退各国战舰与最后通牒，则请各国下旗归国，立即出境，否则我们当努力驱逐！此问公安。

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启

1926年3月18日

（《京报》，1926年3月19日）

三月十八日天安门国民大会议决案

（1926年3月18日）

- （一）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
- （二）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一致反对八国政府进攻中国。
- （三）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
- （四）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出境。
- （五）宣布辛丑条约无效。
- （六）驳复八国通牒最后之要求。其条款如下：
 1. 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2. 立刻撤退驻在京津之外兵外舰，及各地之外兵外舰。
 3. 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
 4. 抚恤大沽国民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
 5. 为死亡将士建立纪念碑。
 6. 在被害将士出殡日，八国驻华各机关，均下半旗志哀。
 7. 由各国政府向中国道歉。
- （七）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
- （八）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

（《京报》，1926年3月19日）

附：八国通牒

(1926年3月16日)

为照会事，外交总长阁下：3月10日，本首席公使，曾代表辛丑和约关系国之各使，因天津出入口水雷之敷设，及炮击各事端，有障碍及于同地出入船舶之自由交通，特行通告中国政府，请为除去。同时并曾由本首席公使对中国政府声明前记自由交通。倘未能如请得以确保，各国为拥护辛丑条约起见，应保留其执行权利。且同时并在天津奉天及济南，由各该地领事团提出同一之通告，并已对天津港出入口一切从事于战斗之各军队本部，悉行送达。虽然，和约关系国闻鉴于前记要求，并未获任何效果，遂认必要于再由在津握有海军之代表各国公使，及海军指挥官，以本日（3月16日星期二下午四时）对指挥大沽炮台之军事官宪，暨指挥青岛舰队之海军将校，发如左之通告。

盖为拥护国际通商上一般协约内之权利，以及辛丑和约所定首都与海滨间关于自由交通之特殊权利起见，关系各国特行要求左列之各项也。

(甲) 由大沽砂洲 (Taka Bar) 至天津之航道，须全行停止战斗行为。

(乙) 应除却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碍物。

(丙) 恢复所有航路标识，且须保证将来不再发生任何妨碍行为。

(丁) 一切兵船须停泊于大沽砂洲之外，且须对外国船舶，不加以任何干涉。

(戊) 除海关官吏外，使停止对于外国船舶之一切检查。对上述各项，若于3月18日（星期四）正午止，不得满足的保障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

压迫焉。须至照会者。

首席荷兰公使欧登科

(《顺天时报》，1926年3月17日)

3. “三·一八”惨案经过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 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敬呈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影响及于全国，职部躬与斯役，兹将惨案经过，及职部应付，详陈如左：

(一) 惨案之经过

十六日下午四时，英、美、法、日、意、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八国公使，以最后通牒致段政府，限四十四小时答复。内容系根据辛丑条约，反对国民军在天津、大沽间对奉军设防，如国民军于限期内，不能圆满答复，则各国当自行扫除天津、大沽间障碍。此项消息，由本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得悉最早，当于是日晚七时在职部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该会组织及工作性质详党务报告中恕不另赘），全体计六十余人，到会者有五十人，由顾孟余同志报告八国通牒内幕，及其作用：（一）辛丑条约，为我国国民所不承认。（二）上次李景林在天津附近设防，早将辛丑条约破坏，而各帝国主义默无一言，是已默认该条约无效。（三）辛丑条约订约国，其中美国国会始终并未批准，俄、德、奥三国未参与，则此通牒不过强拉八国署名，情同蒙混欺骗。至于八国通牒之作用，外乘国民军津浦军事已到沧州，山东急有攻下之势。同时在大沽方面军事，亦极顺利，八国不过听日本帝国主义计划，将杀死郭松龄之毒谋重展，此足证明不平等条约不但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已掠夺的权利，同时更为延长中国内乱，为阻碍中国民众运动发展之武器，则不平等条约之必须立即废除，已由八

国对大沽事件之横暴而证明。本党部号召民众，群起反抗，并作废除辛丑条约工作云云，次即讨论运动方法：（一）于十八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滿以前，应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运动纲要既如上决定，职部乃派同志四出活动，当晚即联络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敢死队、国际工人后援会、北京济难会、中山主义实践社、国民新报社等团体，共同签名，登报发启。十七日下午一时即开各团体联席会议，此十六日经过情形也。

十七日上午，职部又派同志四出奔走，召集各团体参加本日下午之联席会，同时京中各报已登出八国通牒全文，人心极为愤慨。职部为浩大声势，也曾派专人与民治主义同志会、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等反动团体接洽，说明此次运动之意义，应各派合作，彼等极为同意，并决定参加此次运动。是日下午一时到会团体，计百五十余，除五十余团体为平常热心民众运动者外，其余皆属不常参加民众运动之团体，如教会学校及各省旅京同乡会之类。当时公推丁维（惟）汾同志主席议决：（一）本会定名为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二）十八日午前十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举行大示威运动。（三）公推徐季龙、李石曾、顾孟余、黄昌谷、丁维（惟）汾、蒋梦麟、陈启修、林森、李大钊、于右任、学总会代表、工总会代表等十三人组织大会主席团。（四）将本日到会代表分两组，赴外交部、国务院包围，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五）两组代表应举出发言代表。当举出赴外交部发言代表三人，安醴（体）诚、王一飞、陈公翊（皆本党同志）；赴国务院发言代表四人，当举出陈毅、陈日新、王布仁（皆本党同志）、辛焕文。两组代表，即于三时半分头出发。

（甲）赴国务院情形。代表六十七人，四时许抵国务院，当被卫队拦阻，不许入内，且气势汹汹，斥各代表站在大门旁边等候门者传达。是时已有小冲突。次由发言代表先入内，由一科长王某出见。四代表即先要求让各代表入内，觅一休息地点，免避

风沙。该科长毫不理会，坚请代表说明来意，谓一切事情彼皆可转达。代表以其不能全权代表，故不愿详说，再三请其办下列两点：（一）速请段、贾来接见代表，容纳人民对外交意见。（二）速将各代表延入或觅一廊下休息，免与卫队发生冲突。该科长再三支吾，随即退去。历半时许始出，谓段执政、贾总理皆不在此，诸位的话，可以转达，诸位可先回去。四代表极为愤慨，声明不见到外交负责人员，誓不空回，并促其将各代表延入。该科长始允偕一代表出，斟酌办理。岂知当时各代表已被卫队用刺刀杀伤。杨伯伦（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受伤极重，现尚未痊愈，其余轻者无算。至四代表入内不一刻，卫队即有一排之谱，上前解散代表队伍，坚令退出国务院大门。代表等坚不退出，遂遭枪杀。四代表即质问该科长，该科长默默而退。至七时许，复有卫队团长武九清出来道歉，并谓当严惩肇事卫队（按此人即翌日屠杀群众之指挥官）。四代表待至夜深十一时半，始由院秘书长邓汉祥来见。代表说明来意，及质问卫队行凶理由。该秘书长答复：人民意见，政府当尽量容纳。卫队行凶，应即惩办。对于受伤者，定派代表前往抚慰。四代表即慎重声明云：段政府如欲自新，不自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为自救于国民好机会，万勿自误与误国害民云云而退。

（乙）赴外交部情形。代表八十三人四时许抵外交部。当时外长颜惠庆尚未就职，次长曾宗鉴亦不在部，乃派代表往国务院及曾宅皆无结果。并闻国务院代表已演流血惨剧，众更愤激。至五时许，国民军外交处长唐悦良至外部，邀发言代表谈话，代表说明来意，并征询国民军对大沽事件之态度。唐表示对民众热情，极表钦敬。且云愿找外次长来部晤谈。代表遂分一部分人回国民大会筹备处办公，一部分坐候外部。至九时许，曾宗鉴偕贾德润（贾德耀之弟）到部。与发言代表接议。曾等含糊其辞，毫不负责。辩论至十二时许，代表要求非见贾德耀不可。贾德润乃通知贾德耀，彼云愿起床接谈，代表遂整队前往，抵贾宅时已一

时有半。曹宗鉴已先在，乃由代表说明民众意旨：（一）驳回八国无理通牒。（二）大沽事件，应由日本方面负责。贾谓八国通牒之驳复已发出。代表索阅原稿，认为过软弱敷衍，且声明北京民众，将于明日（十八日）午前半时，举行国民大会，游行示威，万望政府尊重民意，须根据大会决议，向八国公使提出抗议。贾云，明早阁议当先将诸代表所提出之最底线度三项，付之讨论，俟明日国民大会决议案送交国务院会同研究。代表又将赴国务院代表被府卫枪伤提出质问，贾极诧异，并即道歉，谓明日当惩凶及撤退行凶卫队，而易以国民军。代表遂退，时已四句钟，以上为十七日夜经过之情形也。

十八日上午九时，北京警卫司令李鸣钟派李泰棻（前绥远教育厅厅长）来学总会道歉，谓昨日府卫枪伤代表为不当，今日当加保护。十时天安门国民大会，到会团体异常踊跃，群众约万余人。主席团到会者，有徐季龙、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维（惟）汾、李大钊、学总会代表等八人。总指挥为王一飞、陈资一、陈日新三人。十时余开会，由徐季龙报告开会宗旨，顾孟余演说。次宣读昨日受伤最重之杨伯伦同志致大会群众书，中谓：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台下闻后一致高呼：坚持到底，誓死不屈。次由黄昌谷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原文，当众宣读。由徐季龙将大会提案宣读，一致通过。次又有提议，立即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亦通过。次呼口号，遂出发游行。大队至执政府，已一时半，军士荷枪环立府前，群众大队直入府院大坪中，与军士相对成平行线，相距约二丈余。群众乃推定王乐平、丁维（惟）汾、安醴（体）诚、陈公翊（同志）、谭季斌五人，携带大会决议案入见。卫队不允。群众乃高呼，非派代表入内不可。殊不知此时，忽有兵士十余人在大队后面用力关铁门。幸群众人多，已将门塞满，不能关闭。群众知事不妙，而枪声即于是时大作。卫队开枪约计半小时之久，此时群众四面逃窜。而埋伏卫队四面丛起，刀枪木棍，分途追杀，群

众死伤者甚多。登时毙命死于国务院门前者二十八人，事后死于医院者，计十九人。惟现当有多人，在医院调治，实难料其能否痊愈。伤者计调查所得，有一百八十九人。死者内有同志十四人，伤者内有同志六十五人，此爱国群众被国贼段、章等屠杀之实状。此次牺牲之巨大，全系段贼等承受帝国主义之意旨，预定围杀爱国民众之毒狠计划，计有数要点可为确证：（一）此次纯系对外。（二）参加此次运动群众，纯系徒手。（三）群众并未与卫队冲突。（四）死者多在国务院大门外。枪弹多从背后穿入。（五）卫队环立院中，不是平常守卫状态，系作战形式。（六）事后是夜不许家属领尸，由警厅草草收殓，希图秘密葬埋。（七）群众逃逸时，卫队即乘势打劫银钱、手表、眼镜、围巾等财物。（八）群众逃出，在大街上雇车，皆被拒绝，云奉执政政府令，不许擅拉。（九）死者衣物被劫剥一空。（十）燕大女学生头被砍落。（十一）死者多为剪发女生，及手执旗帜人民，显系预有射击标准。凡此足证明段贼用心之毒狠，及其预定计划，欲痛剿民众，以雪半年来之积恨。

（二）惨案后之段政府

惨案后，北京舆论沸然，虽略有反动言论，不过适足证明反动派进攻革命民众之联合战线。段政府于二十日发通缉徐季龙、李大钊、顾孟余、李石曾、易培基之伪令，谓民众为暴徒，为有意推翻政府种种诬妄邪说。然受舆论攻击，国贼等知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贾内阁复有一度辞职，其后复发表抚恤令。种种矛盾之点，不啻自画招供。北京地检厅致陆军部公文，尤将国贼行凶铁证，暴露无遗，其罪真不胜诛。

（三）惨案后之北京民众

惨案发生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第一院开联席会议，公推职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工会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专办惨案善后事宜，即于三月二十三日，在北大

三院举行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由职部主席，到会群众约近千人。复于四月□日联合北京各校校长及死难烈士家属，组织死难烈士公葬筹备处，现在正在进行中，约计月内可告完成。对于公葬烈士，本党部先捐助一千元，作公葬费用。此外职部于办理丧亡之外，近与各团体组织反日诛段大同盟，以与四月七日由北京学生总会发起组织之北京各界“三·一八”惨案诉讼委员会，同时积极进行，以谋段、贾、章等得伏法受诛。

（四）惨案后之国民军

事前李鸣钟派李泰棻到学总会道歉，并用公函在国民大会上申明：今后尽保护之责。然于惨案发生后，彼复出令禁止人民开会，复列席段卖国政府之国务院会议，同意于国贼之通缉民众领袖之乱命。国民军现已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以自解于民众。民众于惨案后，对于国民军之论调，要求国民军应表明态度，到底是拥护国贼，还是拥护民众，践誓死救国之旨。惜国民军当时甘为安福系所利用，不能有所作为。其后鹿钟麟虽于四月十日解散卫队，驱逐段祺瑞，入东交民巷。然不过履行国直议和条件，以与吴佩孚谋妥协。故使此次北京政变之价值，远不如往日之倒曹。国民军右倾之态度，已极鲜明。惟该军在中国国民革命全部意义上，仍有极大关系，本党无用切责太甚，使之愈右而趋于反对也。

（五）惨案后之反对派

反动派以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代表右派即民治主义同志会之化身）及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二团体为代表，彼等于十七日各团体联席会，毫不参加。而另集十余团体组织一废除辛丑条约大同盟，以与职部所召集之北京国民反对八国通牒大会相对立。十七日下午国务院门前之流血，及外交部深夜辩论之工作，彼等皆未参加。但十八日上午，彼等于各校遍贴广告，谓九时在北大集会，意欲分散群众。十时，各界在天安门集会时，彼等三十余人，去国务院见贾德耀：（一）说明彼等要求废除辛丑条约之

意。（二）申明本日十时在天安门之国民大会，与彼等无关系，纯系共产党人所召集，因此乃促成国贼屠杀群众之决心。该反动派之罪恶，已深为民众所知悉。惨案后，彼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言论，专攻击徐季龙诸同志，谓群众首领，不负责任，遇事逃脱，立意为段贼减轻罪恶。此外，北京九校教职员联席会，亦宣言谓徐季龙等应负道义上之责任。外如《晨报》、《大同晚报》等，尤借此攻击徐季龙等，挑拨群众对于领袖的感情。殊不知是日李大钊、丁维（惟）汾两同志，在惨杀时所受险亦与群众无异，且为群众所共见。反对派之造谣与诬蔑，适足自露与卖国政府勾结之马足。

（六）惨案发生对于职部之影响

惨案发生后，国民军即表示脱离民众而与安福系勾结，即反动势力重降北京。职部为免却牺牲与保存组织起见，乃通知各同志，从事秘密工作，勿公开活动。职部于是夜将一切重要文件运出。十九日晨，即有警察前来监视。二十日后，有警察搜查一遍。职部见国民军的态度已不如前，知其不能代表民众，以扫除反动势力，乃将翠花胡同党部收束，另觅他处工作，然暗探密布，负责同志行动颇感困难。然丧事将告结束，专力于整顿党务，定不难恢复旧观也。

（七）惨案后职部之工作

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关于伤亡善后，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另派专人合同职部负责，一面赴各医院慰问伤者，赠每人以鲜花及零用钱拾元，并担任一切医药费。（二）关于死者方面，参加各校各团体之追悼会，并赠送挽联花圈及辅助追悼会会金。对于本党同志，特赠绸党旗一面，作盖棺之用。（三）关于党务方面，公开活动因环境恶劣而减少，复党内部组织尚欠完善，自应用全力整顿，因此职部最近工作则在内部训练及党之发展。盖在惨案发生之后，党外青年之革命情愤，多被激发，急思为先烈复仇，新党员之增加，不减平日，而党内同志之奋起者尤多。

(八) 职部对惨案所得之教训

此次惨案，既为段卖国贼效忠帝国主义恢复私仇之害狠计划，则其发生为国民革命进程中不可免之一幕，即今不发生于三月十八，亦必发生后日，卖国贼欲杀革命群众之心，无时或忘。革命民众亦不能因恐怖牺牲而停止工作，是惟出以热血与卖国贼奋斗。流血惨剧，不但为革命民众所不恐惧，且适足以促其努力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职部于此，自应统领所有同志奋勇前进。惟本党为国民革命中心，一切民众皆集于本党旗帜之下，本党实负有保育鼓励训练之责。此次北京惨案发生，事前职部不能觉察国贼奸谋，事后应付各方殊欠周到，自疚难支持，详陈如上，以凭钧会核察，详加指导，不胜盼祷之至，并附关于惨案文件数种，合并奉呈

此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北京《党声》杂志第三期。1926年5月1日，
转引自《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216—222页)

执政府门前两次惨剧真相

悟 庵

我在写此文之先，愿向读者先行声明，我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并不是甚么共产党国民党的要人，什么激烈的青年学生。所以我这篇文所说的话，不过就身受目睹的事，据实写出来给大家知道，断无丝毫和两次惨剧的真相违背；我随便加几句按语，自信亦系平实切当，无丝毫过火的。所以我希望读者对我这篇文章，格外的注意注意！

先说第一次惨剧真相：17日下午一[点]钟，各团体在北大三院第三教室，开国民代表筹备会，讨论的事件可分为二：一筹备今日（18日）的国民大会，一由各团体代表包围执政府、外交部，督促其将列国对于大沽口事件的最后通牒严驳。最后决定选

出各团体代表十五人筹办国民大会各种事务；其余各团体代表分为二组，分向执政府、外交部请愿。当时各团体即向操场集合分配，计愿意向外交部请愿团体代表较多，约一百数十人；其余代表约七八十人向执政府请愿，并选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团陈日新、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代表陈毅，尚有某团体代表，计三人，作为在执政府发言代表。随即分途出发，我系加入向执政府请愿者之内，到执政府时，约五[点]钟左右，当由东门鱼贯进入，甫抵门口，卫队兵士当将各代表拦阻，各代表善言开导，说明只要面晤当局，促其驳回通牒，并无他意，又因代表不过数十人，要求引至接待室少候。当有执政府某员（穿军服的）告诉各代表：招待室人多难容，请举代表数人入见，陈日新、陈毅等三代表，当即随同进去，临行并嘱各代表谨守秩序，静候回音，各代表依然在门口站立。不料陈日新等三代表进去未及五分钟，卫队兵士忽要求各代表退出，勿拦住门口；各代表因执政府门口甚宽，出入并无妨碍，遂未退出，穿军服之某员，忽然喝打。各代表见事出意外，仓猝退走。卫队兵士见各代表已退，随即尾追，用枪柄并刺刀，向退走的各代表乱打乱刺。各代表中间有仍用善言，向追赶的兵士婉说。该兵士等置之不理，打刺如旧。我本亦站在门口，及见呼打，当即逃开数步，站立门旁佯若局外之人，故未推打。而各兵士追赶各代表情形，我遂见之极清，至受伤各代表姓名，已见各报，不再赘述。

次说第二次惨剧真相：今早十时，天安门已人山人海，各学校学生众多，女师大一校，已有女生约百人。当有徐谦、顾孟馀、黄昌毅等报告演说后，当即宣布本日群众仍向执政府请愿，并由大会某职员用铁筒向群众大声报告，说昨天执政府伤人之卫队，业经解除武装，由国民军接替守卫，大家此次前去请愿，务须遵守秩序，以免发生误会，贻人口实。群众闻之颇慰，当即排队向执政府出发，计每二人为一列，蜿蜒数里之长，路过东交民巷北界并各处，均高呼驳回八国无理通牒……各种口号，秩序整

齐，毫不凌乱。到执政府时，仍由东门进入，执政府门前，已站立满带武装之兵士数百人，群众遂在其对面站立，当即高呼驳回八国无理通牒，取消辛丑和约，驱逐外国兵舰出口，驱逐致通牒各公使出境，巩固大沽口国防等口号。随又举代表丁惟汾、安体诚等四人入见。丁惟汾等进入不移时，当即出来，报告执政府现在并无负责之人，拟寻到负责之人，再为交涉，请大家静候。同时各指挥员亦用铁筒向群众警告，务须严守秩序，不可向前，群众均静肃鹄立。忽群众中有人提议谓执政府既无人，不如往吉兆胡同寻段祺瑞去，时群众应和者甚多，遂纷纷散开，向执政府门外引退。我系站在群众的正中，当亦随众引退。旋闻指挥员用铁筒向群众声称请大家仍在此静候，不必退去等语。正在游移间，忽然枪声四发，群众闻警，遂向东西狂奔，枪声仍陆续不断，群众互相残踏，凄惨不可名状。我在听枪声时，即窜向执政府照壁后，入西面马号暂隐，但马号中仍有兵士，用枪柄刺刀乱打乱刺，不得已仍走出马号，隐于照壁后一堆石头之后，同时伏于石头堆内的男女学生颇多，各兵士又用枪柄刺刀刺打，不得已遂各冒险奔出。其时枪声极密，我寻思出去必死，遂决意仍坚隐于石头堆内，枪声陆续不断约二十分钟始止，我始由石头堆窜出，见执政府西偏，被枪打倒卧地者三人，均不动弹，内一人鲜血淋漓，染遍衣服；因思东窜，又见东面倒地者五六人，东门口死伤的人堆积成一长方形，横亘门口，逃走者皆超越而过，忽然又发一排枪，似向东门口逃走之人射击。我大惊，只得冒险向西门奔出。由西门口往西南走，直至大学第一院，路上受伤之人，络绎不绝，有两人扶一受伤之人的，有衣服皆红的，有足未穿鞋，或一足有鞋一足无鞋的，伤心惨目如此。尤惨者，当我窜伏照壁后石头堆时，见有一人仆倒在地，一兵士疑其装死，迭用枪柄向之击打，逾见其并不动弹始已。又我窜于西马号时，见李大钊亦在彼处，状极狼狈，李先我而出马号，其时枪声颇密，李如竟向前奔，亦极危险。第二次惨剧真相，我所知者如此，至死伤之数，

以我测之，死者恐不下二十人，伤者则不计其数，只好俟将来确实统计而已。

综上所述而论之，这两回的群众运动，目的在抵抗侵略我国的各帝国主义，且当最后通牒突然发出，形势危急间不容发之时，凡是中国人都要表同情罢！那么，执政府的武装兵士[何]必向此最和平的群众，打之刺之杀之，究竟是何用意？第一次触彼之怒为拦住门口，第二次则连拦住门口的罪名而无之。詎竟演出此等空前惨剧，不知当道何以对此已死的爱国青年啊。

（《京报》，1926年3月20日）

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

（1926年3月18日）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省区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切切此令。

（《京报》，1926年3月20日）

4.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

人民告全国民众

（1926年3月20日）

全国的民众，抑知今日严重时局及其由来否？原来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五卅以至郭松龄反戈攻奉，中国的民众已有胜利的希

望，帝国主义者发了恐慌，不得不亲自出马，援助他们的走狗向中国民众反攻。第一个反攻即是日本出兵满洲，帮助卖国贼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第二个反攻即是英国以大批军械帮助吴佩孚攻打河南，日本以大批军械帮助李景林张宗昌攻打直隶；第三个反攻即是广州英国帝国主义借税务司利用中国海关封锁广州海口，为摧残广州国民政府和饿毙广东人民之计，并隐藏着借此发动炮击广州的阴谋，英报且明白宣布将以十万大兵征服中国的计划；第四个反攻即是日本公然派遣舰队掩护奉军兵舰进攻大沽口，且炮击大沽炮台；最近第五次进攻即是他们反来借大沽事件以最后通牒威吓中国，日指〔使〕段祺瑞屠杀反对此项最后通牒的学生与市民，以形成今日严重的时局，即英日段张吴联合屠杀中国民众的时局！

全国的民众！我们觉得目前时局的急转直下，比之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时，民国八年五月巴黎和约签字时，及去年五卅上海租界政府屠杀爱国同胞时，更严重十倍。五七、五四、五卅——这三时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屠杀同胞因而引起全国民众热烈的反抗运动。经过这三时期，中国民众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才形成了布满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现在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用枪炮军舰大队人马间接以实力扶助卖国军阀，企图根本消灭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全国民众历年牺牲的结晶，甚至稍具民族色彩的势力。消灭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实行屠杀全国民众，使全国民众永无翻身之一日，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目前这一时期是再危险没有的了。

正当全国民众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时，帝国主义者却用最后通牒拥护剥削中国主权最甚之辛丑条约。甚至在天津禁止中国当局检查外轮，超出已有的不平等条约范围之外。英日等帝国主义威吓中国的最后通牒，固然给中国民众以莫大的耻辱。同时亦是援助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等实力压迫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帝国主义者为什么援助张吴？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拥护帝国主

义在华利益的卖国军阀。为什么压迫冯玉祥？因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两派军阀统治中国之障碍，冯玉祥之失败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之胜利，这正是此时中国民众应该对冯军表同情的缘故。民众对冯军表同情之意义，不是拥护一个军阀，乃是督促他们与全国民众共雪帝国主义者所给予中国民族的耻辱。日本军舰在大沽枪杀许多中国兵士，虽然他们是国民军，可是也是中国同胞，亦不好任帝国主义者自由杀戮罢！

全国痛恨的段祺瑞为什么敢于枪杀大批学生市民呢？为谁枪杀他们呢？自然明明白白是老卖国贼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为拥护辛丑条约而屠杀爱国同胞！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如何！？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全国的民众！我们能不为这些死者复仇么？我们能不讨伐这个杀人的卖国凶犯么？

全国的民众！帝国主义者已从各方面用最后手段对付我们了。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等已是显明的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了。他们所要摧残的目的物，自然是全国要求民族自由的民众，他们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首先要扫除达到这个目的障碍物——广州国民的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因此广州国民政府和北方国民军与全国民众发生了生则共生亡则亡共的关系了。此此种时势之下，民众或则坐以待毙，或则急起直追，杀出一条血路，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据我们想象，无论平时有何政见不同，无论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富商大贾，研究系，进步的军阀官僚等等，在此次争斗，即对于讨伐段祺瑞取消辛丑条约和洗最后通牒的耻辱这三件事，都应有所动作，若有人坐视不动，无论平时说得如何爱国，无论是否以反赤为口实，都是中国民众中的败类。

苟安的心理是再不能有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

力，打倒了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的可言。否则苟安就是送死。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

打倒惨杀爱国同胞的段祺瑞！

肃清一切卖国军阀！

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建立人民政府谋全国真正和平！

欲达上列四项目的，真正爱国民众尤应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同时亦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最后的时机到了，我们再不能犹豫了。或存或亡，在此一举！

（《向导》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

(二) 坚持斗争

1. 北方区委文件目录 (节录)

1. 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致天津、太原、绥远、唐山、正定各处支部函30余件，催促进行工作及报告等情况，函后均系李瑞祥署名（李瑞祥即“北方区通信处”代号）。

2. 北委扩大会议议决各种运动扩大方案及煽惑群众各种方法之通告由八十六号至一百二十号（按：北委即北方区政治委员会）。

3. 北方区对于东北以后工作意见之稿件。

4. 白芳渠通告第一号至第十五号，内系指示各种宣传方法（白芳渠即北方区的代名）。

5. 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及鼓动工农群众阶级斗争之各种计划。

6. 讨论发行《瀑布半月刊》以宣传共产主义之底稿一件。

7. 李守常等讲演共产主义之教材目录及其内容之底稿。

8. 工作总则一本，内容为今后如何谋党之发展及注重党员教育等情形。

9. 共产党训练党徒宣传工农兵入党及鼓惑其在社会上奋斗之各种方法。

10. 北京地方1926年9、10、11、12月等月份工作报告一本。

11. 大连共产党支部9月份工作报告。

12. 正定地方1926年11月份工作报告书一本。

13. 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报告在张工作情形。

14. 山东党员泰和、佐治等11、12月份工作报告书一本。

15. 1927年3月河南共产党员工作之状况。
16. 1927年顺直3月份工作报告书一本，附宣传部最近工作计划。
17. 晋泰和等在山西进行各种工作报告书六本。
18. 关于工人运动议案一种。
19. 顺直农民问题报告一本。
20. 北京共产党党部，向农人方面宣传鼓惑一致加入打倒帝国主义运动事。
21. 北方区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纪要一本。
22. 北京市党部筹办妇女职业学校请加指导致守常之函件。
23. “妇女运动”、“小商人运动”、“青年运动”各种提案。
24. “C、Y”北方区工作大纲及通告一本。
25. 中国共产党唤起北京市民起来革命之传单。
26. 我们最近在北方国民党工作中应取的态度一种。
27. 募集北伐捐帐三本。
28. 永泰报告在军队中讲演情形，由宣城致李大钊之函件。
29. 守中询广东能否于最短期间出兵自郑州致李大钊之函件。
30. 署名常者叙述煽惑甘旅、袁旅等部反戈情形致张之江、鹿钟麟之电稿。

（节录《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八、九册）

2. 坚守革命岗位

——李星华《回忆我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节录）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军政府下令通缉

那些领导爱国斗争的所谓“暴徒”。在段政府的通缉令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我的父亲李大钊。从那天以后，父亲便暂时转入地下，住在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他每天还是照旧工作，从早上忙到天黑，没有一会儿闲暇的功夫。

那时正是北伐大革命的前夜。可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反动势力仍然十分嚣张。父亲住进苏联大使馆兵营以后过了三个来月，也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六月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入关进京。张作霖一到北京，首先就对革命力量来了个下马威：他逮捕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把他枪决了；紧接着又处决了另一个进步小报的主编林白水。我记得当时有个画报上有人曾用“萍水相逢百日间”的话来描写张作霖进关后的白色恐怖。一时，整个北方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形势十分险恶。住在苏联大使馆兵营里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工作也更紧张、更繁忙了。为了应付随时都可能突变的形势，在党的安排下，一部分同志从兵营中撤出去，离开了北京。有的去南方参加北伐，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

看到那些去苏联学习的同志，我们都十分羡慕。关于苏联和伟大列宁的故事，我们过去从父亲那儿听到过许多，早就向往着能到那个神话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于是我，还有哥哥，都向父亲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可是为了整个革命利益，父亲没有答应我们，他总是和蔼地回答我们：“不忙，你们现在还小，将来有机会，一定送你们去。”我们坚持要去，父亲就风趣地笑着说：“候候有席，候候有席。”

父亲自己也留在北京坚持斗争，他几乎足不出户地整整工作了一年多。

第二年的初春，风声更紧了。有一天，在父亲那里负责交通工作的阎振山同志一早出去送信，到天黑也没见回来，大家都为他没有回来而焦虑。父亲派人到外面去了解，才知道他被捕了。阎振山一被捕，送信、取报的工作，就由那位帮父亲他们作饭、

打杂的张全印同志担当起来。可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去买菜时也失踪了。这时，作饭全得由父亲和同志们自己动手，有些事情母亲也帮着做。生炉子、烧开水、切菜、作饭这些事情，父亲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但他们并不觉得是负担，倒是干得满有兴头。每到做饭的时候，父亲提着水壶到水管子下面去接水，谭祖尧端起小瓦盆淘米，范鸿劼拿着菜刀切菜。有一次范鸿劼一不小心，用菜刀把食指切破了一层皮，鲜红的血滴到菜叶上，父亲在一旁开玩笑说：

“这倒好，我们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点荤吧！”

父亲这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笑得特别痛快，似乎危险和紧张的局势全都不存在了。

没有多久，不知道什么人推荐了一个打杂的工人来代替张全印的工作。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行动鬼祟，常见他贼头贼脑地四处乱看。父亲觉察不对头，悄悄对母亲说：

“这个人不老实，要注意他！”

母亲说：“咱们豁着自己多忙一些，还是赶快打发他走吧！”

第二天，父亲就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人确实是反动政府派来的暗探。我们曾给这人起了个外号，叫他“老鼠精”。这个“老鼠精”虽然没有窃走什么机密或文件，但他却窃探到父亲仍然没有离开北京。这时候，东交民巷巷口和苏联大使馆周围，假扮作“东洋车夫”的暗探增多了，他们把车子擦得蹭亮，停在使馆左近，窥测来往行人。

那时，父亲常常在黄昏以后沿着使馆兵营的围墙独自散步。有时候，他慢慢踱到兵营的旗杆下，蹬上升旗子的高台，向四外瞭望。谁能想到，这个漫不经心欣赏夕阳的人，正警觉地在那里侦察敌人的行动呢？

有一天，父亲匆匆地回到家里，一句话也没说，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把一支乌黑的手枪放了进去，接着从衣袋里又掏出一支手枪来。

母亲看见父亲拿回来两支手枪，吓了一跳，连忙问父亲说：

“哪儿弄来的？”

“托人买来的，我们正在练习打枪，学会打枪还可以对付一下那些坏东西！”

父亲说到这里，很有信心地瞅了瞅他手里的那支小手枪，两只眼睛亮闪闪的。可是母亲低垂着眼睛里却充满忧虑。于是一种无名的忧愁也从我的心底升起，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加不安宁！

以后，父亲一回来，就喜欢谈起打枪的事，他对我们说：

“瞄准的时候，要把枪握得紧紧的，一不握紧，枪的后座力就会把手腕震痛的。”

母亲在一旁插嘴问：

“好学不好学？”

父亲说：“好学，这没有什么，很好学。现在我已经瞄得很准了。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学会打枪了。”

说着，他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他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早晨不知道几时又离开了房间，有时候他也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一些书籍和文件。

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我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它们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住地飘舞盘旋。

父亲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我问父亲：

“爹！为什么把他们烧掉呢？怪可惜的。”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待了一会儿才说：

“不要它们了，就把它烧掉。你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

父亲对我们永远是慈祥的，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打过

我们。我常常爱向父亲提出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怎样忙，对我的问题也总是很感兴趣，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却不知道为什么回答得这样含糊。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许多情况父亲没有告诉我。我看见他是那样地紧张，那样地忙，也就不再问他了。

局势越来越严重，但是父亲并不因为情形恶化而有发愁的样子。他工作完了，还讲些惹人发笑的话。父亲对艰巨的革命事业从来是乐观的。

几天以来，常有父亲的朋友秘密来看父亲，劝他离开北京。父亲对他们的劝告不很在意。母亲也为他担着心，时时向父亲提出劝告。但这也毫无效果。父亲似乎嫌母亲有些罗嗦，态度坚决地对母亲说：“我不是常对你说过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一直说得母亲闭口无言。我虽然也在发愁，但总脱不掉孩子气，自己玩到高兴的时候，会把什么事情都丢到脑后，绝不象母亲那样整天浸在愁苦里。我们就这样在终日不安中过着日子。

（《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被 捕

1. 被捕经过

军警昨在东路办事处 捕党人六十余名

昨日(六日)军警机关,派员赴俄国使馆间壁之东省铁路办事处内,捕获党人多名。披露于下:

军警事前严密布置

军警机关在数日之前,即据探员报告,东交民巷28号房内,有党人组织秘密机关,军警当局当向张作霖报告。复由当局与交民巷某某等国公使交涉,拟设法排除障碍。同时,某国要人,又向安国军方面报告,俄使馆内有华人图谋不法行动,请注意。迄前昨(五日)当局方面,完全得某某等国公使之消极的谅解,认为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因俄使已不在辛丑条约国之内,除受国际法之待遇外,使馆界内之优越权利,无享受之可能。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云云。昨晨(六日)军警当局奉命派员搜捕东交民巷内之东路办事处,即于昨日(六日)午前六时派出东北陆军手枪队一队,东北宪兵一队,皆携手枪、便衣探员一队、胸系红线为志、警察一队、身着制服,佩刀带枪,共三百余人。由于练官长率领至使馆界内之俄国远东银行与中东路办事处,一部分在墙外梭巡,一部分入内,先将各门监视,时正上午七时三十分。

捕获党人六十余名

军警入大门后,即入东路办事处内之横胡同第二门,搜索院内各院书籍物件,同时至其他各院内,将室内诸人,一一逮捕。

有欲乘机逃脫者，亦被捕获。当将捕获诸人，逐一捆绑，编成号数，分别用汽车送至警厅，交司法处，计六十三号。最后又捕出十余人，其中间有俄籍男人六名、女人一名、中国女生四名，余者系为男子。

搜出名册图记多种

军警将捕获诸人，一一捆绑后，即命人将搜出之什物，分别点清，计有（一）青天白日旗多面。（二）万国旗多面。（三）中国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方印一颗。（四）雪耻大会圆印一颗。（五）共产党财务调查宣传税务文书小长方印一颗。（六）关于其他之印信多件。（七）市党部名册多种。（八）共产党名册多种。（九）衣服被褥多件。（十）开会用之器具多件。（十一）武器多件。（十二）孙中山像片多件。（十三）宣传印刷品多件。于十二点起，用第968号、第14号、第1号多辆汽车，分别运至警察厅，至五时始告竣事。

办公处曾两次起火

当军警四面包围之际，该宅内之第五栋房忽然起火，中国各消防队皆驰往灌救，并由军警维持秩序，暂时扑灭。迄五时，又起火，当即扑灭。事后调查共烧去俄国兵房两间（一说三间）。保安队兵某在此室内拾得手枪一支，子弹一排。其起火原因，闻系为消灭证据，一说为某种不慎所致云云。

顺承王府紧急会议

军警当局将诸事料理后，即将名册及其他重要文件，携至顺承王府谒张作霖。闻其名册内列名人数，约在四万左右。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取宽大主义。又有某要人陈述北京市民，素称善良，册中名单，或系党人伪造，以资号召，故极力主张宽

大政策。奉方各要人亦然其说。又据东北某要人云，顺承王府方面因党羽拿到，于昨日下午即开紧急会议，计列席者有杨宇霆、张学良、陈兴亚、邢开康、吴晋、赵欣伯等，决定分三步办理：

（一）派吴晋、赵欣伯向各使馆说明意义，并声明尽力保护俄大使及俄使馆。（二）酌派军警看守俄使馆。（三）撰拟通电及布告等，通告各方，使社会得明真相，并声明对于捕获各华人，除嫌疑轻者将予释放外，其余一律移送法庭办理。以上决定，即星夜赶办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7日）

莫同荣被捕经过*

复旦社云。官方消息警厅此次搜出共产党名册只注□册中所载任有部长及委员或支給款项之姓名。内有莫同荣一名，系注为农民部部长，担任京西工作事宜。该厅于是即通知西郊派侦辑队特别注意。但莫在四月六日以前，确在东交民巷居住，旋因馆中人满，莫平日不大出风头，社会方面，多不认其面貌。遂于四月某日租定西单察院胡同42号某医生宅居住，雇一女仆□理，终日不出门户。每见有人叫门，即露张惶之状，该女仆甚疑惑。无形中向西直门外某警士（系女仆之戚）吐露其情状。该警士据以报告主管当局。当局转陈警厅，旋密派侦辑队采访。闻自4月15日以后，莫之一举一动，官厅无不知之。至阎日华（一说即袁世桐）之被捕，亦有原因。自莫移居该处后，阎不时到该处闲谈，各方均称阎系莫之未婚妻，情谊最笃。但侦辑队虽见阎时到该处，然不知其姓名。17日早，莫差一女仆送信某处，上署阎日华收启字样。行至胡同口，侦辑向其索阅，即将原信扣留。11时，阎即到彼处。因即会同右二区将莫阎二人捕获，带到太仆寺街第五侦辑队看押，比即送厅。昨日某方面曾托人向警厅刺探，据警厅某当

* 原无题目，现为编者所加。

局表示，莫为广东人，系农民部长，确为重要分子，现既无意中
被捕，当然汇案法办。阎曰华即袁世桐，迭据报告，莫阎感情最
笃，似属未婚夫妇。刻经侦察数日，尚无重大嫌疑，如果再无其
他口供，自当释放，届时通知所住之师大，具函保释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20日)

党案破获经过补志

昨据参预办理破获党案之某君云，官方侦察本案系在四个月
之前。最先因党人行踪秘密，费一月之工夫尚未得其概略。适闻
俄国兵营需用听差车夫，于是以某某四人化装谋事，托人向党部
保荐，但部中限制甚严，非三十连环保不能收用。当经照办，遂
未挑剔。该四人在党服务，经过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无不
知之，各重要分子所住房间号数，俱已调查明晰，并经分析绘图
报告。四月六日破案之时，事前已步步布置妥贴，因恐其销毁证
据，故临时并带消防队同行云。

(《世界日报》1927年5月1日)

2、 各方面的营救活动

校务讨论会议决营救李大

校务讨论会，昨日下午六时在法大第三院开会，列席校长有
余文灿、马君武、林凤眠、张贻惠、毛邦伟、许璇、孙柳溪、白
鹏飞(代屠孝实)等。余文灿主席。某校长提议谓李大钊虽属共产
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
当局略述原情，贷其一死。遂决议由各校长自十日起，分途营救，
于七时半散会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10日)

校务讨论会代表昨谒张学良

……前日下午七时，国立九校校长在校务讨论会开会，议决

营救被捕各人办法如下：

(一) 在押各生，警厅已允释放，急盼照行。(二) 新押各生及原有情形较重各生，应请官方一并移交法厅依法办理。(三) 李大钊之犯罪行为，九校方面虽不敢稍加干预，但李为九校教授，义难坐视，急盼官方移交法庭审讯。(四) 交通司令常荫槐，承认拨交附捐三万，尚欠一万三千，应请敦促交出。(五) 张军团长学良头脑新颖，特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于十日向张陈述，并预先致张一函，说明拜访之意。昨日上午十时，余张二人曾赴文昌胡同8号访张。次因张公出，遂于下午四时复往。余张等到时，适张又外出，由叶秘书代见。余张等提出意见如下：(一) 未放学生请速放。(二) 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 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 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五) 交通附捐欠款，请特别帮忙。叶当即答复如下，前四条，与敝军团长主张相符。第五条自当代陈。敝军团长，关于此事，急需与各位校长一谈，今日归来，或将再请二位过此，亦未可知。余张二人遂于五时退出。

(《世界日报》1927年4月11日)

政治讨论会建议 共产党事件移交法庭

政治讨论委员会前日(九日)开会，委员到者四十余人，由梁士诒主席。席间有提议关于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一案者，经长时间之讨论结果，议决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处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闻该会所执之理由，系因各国所派法权调查委员会曾经发表宣言，其中列举干涉司法之案件多种，此次东交民巷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裁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该会建议理由，既决定如此，遂由全场推举梁士诒、杨度二人为代表，

前往顺承王府陈述意见。又闻昨日（十日）梁杨二人以事关司法，加约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前往，至于梁杨罗三人在顺承王府如何建议，得何结果？昨日尚未探悉，但闻顺承王府对于此项建议，既为政治讨论会提出，甚为重视云。

（《晨报》1927年4月11日）

3. 秘密审讯

李大钊两度被讯说

此次被逮捕之诸人士，据闻李大钊实亦在内，并闻李自押解警厅后，即由司法处长蒲志中亲行预讯。昨日（七日）下午一时三十分，蒲又在司法处对李为第二次讯问。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此外并据复旦社调查，李大钊之妻及两女，亦同时被捕，情形备极可怜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8日）

当局仍主从宽处理

复旦社云。前日下午3时，陈兴亚、邢士康将搜出各项证据，持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请示办法。比约集多人开会，杨宇霆、赵欣伯等均主张取宽大主义，杨赵并以学者眼光，请贷李大钊一死。昨日下午，复开会议，赵等仍谓思想犯与廉耻犯，情形不同，努力为李保全生命，因李本为北方著名学者，又为北大教授，若予以永远监禁，听其研究学问，未尝非北方收拾人心之举。但结果如何，尚难预料。又闻路友于业已讯明，系属本人，官方亦认为重要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8日）

当局对党案仍未决定办法

国闻社云。关于俄馆党案，警厅近正在办理中，据闻官方目下所最注意者，为清查证据，积极整理抄获之文件，惟卷册太多，整理殊费手续。……至被捕各人，仍在赓续审问中。李大钊口供颇多，大致对于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崇信不讳，并关于扰乱治安，谋为不轨等情，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当局将来对该案处理，虽有交法庭及军事裁判之两说，然在警厅办理各项手续未竣及证据未检查完毕之前，暂时似尚难确定。又闻被捕举（学）生，亦拟与此事汇成一案办理，除极重要部分外闻决定从宽，非独对右派党员不主张牵涉，即左倾分子亦拟从宽，不多株连。兹录已审讯确定之共产党员名单于下：

（一）李大钊、李崑、路友于、邓文辉、谭祖尧、杨景山、谢伯俞、姚彦（前案逮捕）、张挹兰（前案逮捕），以上诸人均任有部长职务。

（二）方伯务（艺专学生）、陈晓岚（北大学生）、华少衡（朝大学生）、郭林一（漫云女校学生）、胡宝先（即胡先椿，姚彦之妻，女师大学生）、吴平地（师大学生）、孟祥（民大学生）、葛覃（法大学生）、刘巨泉（中大学生）、于振沅（即于海澄，医大学生）、郑培明（中大学生）。以上十一名，均为前案逮捕之学生，厅中认为与共产党有关系，并认为有重要职务。

（三）韦青云、阎振山、舒启昌、陶寿彭、张伯华。以上五名，均在党部任有委员或其他职务。

（四）李赵氏、李兴华、李艳华。以上三名。赵为李大钊之妻，兴华、艳华为李大钊之女。

（《世界日报》1927年4月17日）

奉方对党案尚未定办法

交付法庭说渐有力

十日京讯 六日军警在东交民巷搜获共产党机关，逮捕党人

三十五名，至今拘押警察厅，尚未决定办法。闻警厅司法处连日审问，因多数尚未肯供出真姓名，故口供亦未呈报当局，大约须俟口供齐全之后，方能请示也。奉方对于处分此案办法，近分两派主张，其一谓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其一谓此次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显属颠覆团体形式，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持并论，密谋及宣传亦与以武力对抗，不能混为一谈。在各国破获共产党机关，亦不过依照普通法律程序办法，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最近如去年日本发觉共产党事件，牵连东京京都各公私立大学教授学生甚多，现在由法庭审理，并未遽尔便宜行事，在君主国尚且如此，则民主国更宜慎重，盖党人可威化而使其觉悟，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此中作用至为微妙。后者主张近益有力，国务院方面亦有此意婉商军事当局，故交付法庭之议或可望真实现，至其中被捕之俄人，俄使馆虽坚称有使馆人员在内，然令其开姓名职务，则皆为办事员，盖使馆职员本应于就职之时通知驻在国外交部，不能临时捏造，故只得以办事员名义塞责，北京当局当然不能承认，唯外交部为慎重起见，已派交际司司长陈思源会同警察厅办理。

（《晨报》，1927年4月18日）

党案仍在继续审讯中

据国闻社云，闻被捕人员中，续经讯明者，有范鸿劼一员，亦为重要分子之一。范之职务，为政务委员，地位仅逊李大钊一筹，至其余各人，尚在线讯中。每次检出要件时，辄令李大钊等说明该事件之缘由，以资参证。李有时加以说明，有时则称不甚详细。又闻前日（十七）警厅续在察院胡同，捕到莫同荣一名。

.....

（《世界日报》1927年4月20日）

党案特别法庭系由四机关合组办理

党案确经预审两次

根官方消息，党案发生以来，关于审判机关与审理手续，各主管官属业经迭次会商，现时当局为谋裁判之公平起见，决定由享有法权之各机关，组织联席会议之审判机关，审理之时，采取证据主义，其无相当之证据者，概将从宽免究，并与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辩护。参与会审之各机关如下：（一）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二）京畿卫戍司令部。（三）京师高等审判厅。（四）京师警察厅。此外，凡无法权之机关，均不参与。外交部派定二员，系充任临时翻译之职，外间所传加入法官，实系误会云。

至党案是否业经审理，据神州正言两社报告，谓确已预审两次，兹照录其消息如下：

神州社云。某方消息，本星期一（即二十五日）上午11时，党案审判长何丰林会同审判委员，在警察厅所组织之军法会审法庭内，将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六人提出预审一次。当时因系第一次预审，故仅询其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入党年月、服务工作、津贴项目等项，略加讯问后，随即仍旧收押。前日（二十六日）上午提出其他十五名，作一度详密之讯问。闻昨日及今日，仍赓续预审，俟预审手续完备后，方能正式开审。闻当局近正在检查各人证据，在预审席上对证，大约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又此次审判委员共13人，除审判长何丰林及颜文海、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王之相、高德善外，其余六人，系警察厅法官，专任检查党案文件，搜查证据，不出庭陪审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28日）

① 原为“如左”，现改为“如下”——编者。

(四) 从容就义

1. 蒋介石密电主张杀害

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 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细审讯之必要。且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曾等均在警厅提讯各重要党人，而各人口供皆与侦辑处所供，毫无差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晨报》1927年4月29日）

2. 张作霖决处绞刑

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采证

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唯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亦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比画行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29日）

3. 遇 难 详 情

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止，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出厅之法官为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厅推事）、周启曾（卫戍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辉增等七人。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①、张挹兰、阎振三、李岷、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

^① 英华应为莫英。同年5月3日《世界日报》载《与李大钊同死之莫英、李岷》一文中，有“莫英前误报为英华”的更正。

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警厅于事前已备就棺木二十具，闻每具价约在六十元上下。棺殓前，先由警厅派人将尸体一一照相，再行人殓。于昨日下午8时俱抬送长椿寺。闻所有照片罪状等，均将于今日同时公布。其余被逮捕之党员，据闻有四人处无期徒刑，三人处三等有期徒刑。均押送第一第二监狱分别执行。其他罪名较轻者，当可一律释放。至所捕俄人十五名如何发落，亦为时人所注意，据关系方面所云，俄人为另一问题，日内亦有分晓云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29日）

又据复旦社云。某方确息，安国军司令部军法会审处，此次审讯党案，纯以证据为主。按照证据，平日工作最多者，应以张伯华、方伯务两人为首。张曾游历各处，并在天津开设机关，有时化装到外办事，所任职务，确为最高侦探。方伯务系调查党人工作，每星期必有一函报告党员工作之勤惰，及应该奖惩或联络方法。审核原书，文笔尚书通顺，书法亦清秀。闻前日安国军方面，决定将李等按律执行死刑，命令到后，即提出验身画供。李大钊首先签字，其余各人，亦均依次画押。当以汽车送入地方看守所时，表面上虽云是移送法庭，实际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其余则均有绳绊，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厅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台。刑事以隔离为原则，彼此不能看见。李就刑时，则呼天字。张挹兰则喊哎哟。其余亦有□微呼声，死后有伸舌者，有鼻中向外流血者。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囑买一上等棺木盛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所用棺木，均由内右一区在西单同顺木厂所购。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但同顺只存有十四具，临时由同顺代购六具。前晚五时，即抬至法部后身看守所旁门之外陈列。每殓一屍，即抬至下斜街长椿寺。屍上粘有布条，上写姓

名，棺外亦然。昨晨四时半始竣事。李之灵柩系十六人抬之，其余则十二人。灵柩列寺，俱搁于最后院之三间南房内。李柩及某某两柩单列，其余则重列。如张艳兰柩底即搁李银连之柩。

昨早有新闻记者数人前往参观，因未商得警厅同意，未能进入。唯据厅中所传，棺木封口，均未上漆，预备亲属查看，现在具呈请领者已有数起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30日）

与李大钊同死之莫英李崑

复旦社云。党案处死罪之二十名中，有莫英（前报误为英华）、李崑二名。外间不知其为何许人？昨据确息，莫为旗人，数年前以拉车为生，上年曾在日本兵营拉车，嗣因与党部某氏相识，即荐在俄国兵房当差，后见其办事机警，即任以侦探之职，旋又升为工会会长，半月以前，忽到某日人宅，身穿洋服，气象焕然，并密劝其车夫入党。李崑亦系粗人，所在职务，系属传递信件，两月以前，曾经警厅逮捕，拘押数日后，厅中当知劝其改悔自新，彼亦签押，遂予释放，不意彼仍返党部服务，四月六日遂又与李大钊等同时被捕云。

（《世界日报》1927年5月3日）

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

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28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28日早十时地方检察厅即下令传执刑吏（在宣外火道口居住）即刻到看守所应差，厅内外即知有行刑之事，惟尚不知究为何种犯人，正午十二时有警察厅司法处

科长吴锡武、科员金某乘汽车直至法部后身看守所，嘱所长严重戒备，凡所内外不许出入，并命荷枪之法警四名，把守厅门，不许外人接近，旋有宪兵乘汽车至，在所内等候，形势益为紧张，同时所谓军法会审在警察厅南院，中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1200）内为李大钊先生等三人，两旁列宪兵警戒，第二辆汽车（号牌512）为路友于同志等四人，第三辆汽车（号牌536）为谭祖尧同志等三人，第四辆汽车为张挹兰邓文辉两同志，第五辆汽车为范鸿劫同志等三人，第六辆为方伯务同志等四人，各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李先生等被拥入所后，即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始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昂首挺身而入，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有价值六七十元者，有价值四五十元，由狱吏用木板将屍身抬出，在看守所边门前殓殓，至晚九时方毕事，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待由家属领取。李先生及各同志被害后，另有十人被判处徒刑（编者按其姓名已志本报兹从略。）李先生死后，北京各报一致表示哀悼，日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亦称颂李为“青年思想家实际运动之先驱”云。

（汉口《民国日报》1927.5.12）

安国军司令部布告

安国军司令部关于处置党案事件，已于前日发出布告，照录

其原文如下：

为布告事，案查前据京师警察厅报告，东交民巷远东银行，及旧俄国兵营内，有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次开会，密谋扰乱，危害政府等情。当经侦明，拿获李大钊等数十名及俄人奥钮夫等，并起出枪弹旗帜印信证据等件。当经该厅将捕获情形布告，一面检察证据，提犯预审，复据录供呈报部，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兹已依法判决，将党魁李大钊、党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英、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洪劫、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崑、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各处死刑。又情节较轻之舒络昌、谢光沛、孟祥、郭林一、各处徒刑十二年。其附和犯李云贵、韩子明、吕玉如、张之旺、赵玉发、张全印，各处徒刑二年。已于二十八日执行在案，除将俄人奥钮夫等另行审判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此布

总司令张作霖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世界日报》1927年4月30日）

① 一说为“莫英”。

(五) 各地悼念

1. 悼李大钊同志

魏 琴

李大钊同志及其他二十余同志在北京被杀了。在军阀的反动中心和帝国主义的在华外交中心被杀了！自从他们被捕以来，固然明显看出他们是无生还希望的，但他们被杀的消息，仍然如晴天霹雳一般，使我们感觉异常的悲痛！李大钊同志及其他二十余同志之死，正当中国革命进展至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正当资产阶级背叛并建立其自己政权的时候，正当帝国主义以公开干涉手段威吓中国革命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及其他二十余同志在北京被杀，恰与四川、广东、福建、江西、安徽、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处革命工农群众被屠杀，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

中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经过他的代理人蒋介石及其党徒开始向革命的战线攻击，于是反动的封建军阀更加无所忌惮地杀戮中国无产阶级及北方革命运动的领袖了。我们的勇敢同志之血从今在革命群众队里永远深刻着蒋介石张作霖二大刽子手的名字！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战线，必定与全国最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必定与民众敌人张作霖等联合起来。资产阶级和这些反动中间的斗争，亦如军阀中间或帝国主义中间的斗争一样，是继续而不断的。但对于革命，对于工人和农民，蒋介石和张作霖都一样是仇敌！

北京同志被杀一事，革命的群众应该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反动军阀政治联合之表示。无疑，这是帝国主义者嗾使胡匪张作霖杀害我们同志！他们假借张作霖兵警之手搜查苏联大使馆，拘捕我们的同志并杀害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怪物面前发抖，

他们在中国革命的高潮中认识了这个怪物。最近一月以来，因为蒋介石之反对国民政府，帝国主义在北京尤其猖狂，这更可以证明，客观上，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了。北京同志被杀一事，足以告诉群众，蒋介石及其党徒究竟往哪条路走去；告诉群众，他们是离开革命而变成帝国主义的佣仆了。

李大钊同志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又是国民党的政治会议一委员。他是最勇敢的战士，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斗争。他的名字早就为全中国革命者所认识了。他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几百万北方的群众所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继起革命运动向前进展。

（《响导》周报第195期）

2. 悼守常同志

孟 冰

“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这是守常同志（即李大钊）在一九二五年将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对我们说的。谁知现在这句话成了□语，我们这么一别竟成永诀！

当奉军围搜北京俄使馆及守常等被捕的消息传来时，我便很为我们的守常同志担心，谁知更凶险的消息，终于接连而来——李大钊四月二十八日在京被绞死，枪毙二十一人，无期徒刑三十余人。这是使我们多么悲伤啊！

守常同志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他是中国革命的领首，他领导中国北方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是最出力的。这恐怕就是他罪该绞死的唯一理由罢！

全中国的民众，我们应该仔细去了解我们的守常同志之死。我们要知道守常同志是在帝国主义者奉鲁军阀及国民政府的叛徒蒋介石三方面协商勾结之下而被害的。没有帝国主义者的主使，张作霖便没有这样大的狗胆去围搜俄使馆，没有蒋介石的反动之

暗示，奉鲁军阀也没有这样的大狗胆去屠杀守常同志。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回答守常同志遇害这一件事。我们在守常同志的遇害中，使我们更坚决的认识，我们目前责任是：

- (1) 打倒帝国主义！
- (2) 打倒奉鲁军阀！
- (3) 打倒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

(《红灯》[周刊]第十二、三期，1927年5月7日)

3. 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

李大钊等烈士

武昌中山大学，二十二日下午一时，在理科讲演厅开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到会者，除该校全体学生千六百余人外，有该校教职员及各团体各机关各学校代表：李合林，邓初民，潘震亚，李季，宋子方，及英国劳工代表某君，合计不下三千余人。由大学委员李汉俊，教职员代表高一涵，学生会代表刘鸿咏三人主席，奏乐行礼后，由主席刘君报告开会意义：近月以来，因革命势力高涨，新旧军阀互相勾结，一致向革命民众进攻，造成南北各地之白色恐怖，且有国际帝国主义者从中主持，其意义至为复杂而重大，我们须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及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向一切敌人进攻，继续诸烈士之精神！

高一涵报告李守常事略：李先生原名寿昌，直隶蓝田人，七岁时即父母俱亡，亲旧亦甚少，孤苦异常，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曾领导全体学生从事立宪运动，与同学白坚武等有该校三杰之称。民二：二次革命失败后，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次革命，彻底革命不可，遂决心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民五：陈独秀先生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先生执笔为文。六年，

办民彝杂志。先生曾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氏，旋又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从事研讨，可见先生之热心政治运动。袁氏死后，先生返国。时汤化龙欲搜罗国外留学生鼓吹革命，创办晨钟报，请先生主其事。后因汤与孙洪伊意见冲突，汤渐与保守派接近，先生乃毅然脱离该报（即现在的晨报）。旋又与章士钊编辑甲寅，因章勾结政学系，不久亦去。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辟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奉直战后，白坚武与吴佩孚勾结，下令通缉先生等，先生乃逃往苏俄，至国民军入京时方返国在京主持北方民众运动。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兵士击倒，幸而逃出。

先生温和浑厚中有侠义气，故朋辈多敬而畏之，至其学术思想，文字散见各报章杂志者，甚多不赘。

北京济难会代表报告：此次搜查俄使馆我等即已闻此消息，但以此事违反国际惯例，大不近情。李先生以身为政治委员，更不欲逃出北京，被捕后，曾受种种非刑，逼其供出共产党种种秘密文件，然张亦尚无必欲置之死地之决心，及见蒋介石到处屠杀，且传蒋有电怂恿奉张杀先生等，故奉张遂决心屠杀。临刑先生从容自若，闻绞刑须经三十余分钟始行气绝，其惨痛当可想像也！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4. 苏浙沪三党部追悼李大钊

苏浙沪三党部，驻汉办事处，为追悼李大钊同志宣言：诚实勇敢的革命战士，无产阶级的先锋，我们的领导者——李大钊同志，在帝国主义，新旧军阀互相勾结之下，牺牲了他的生命，这

不是李大钊同志，及其他被惨杀同志的生死问题，而是中国革命进行中的一个要大损失——

我们应该知道：惨杀李同志等的，不仅是张作霖，帝国主义者及其新走狗蒋介石，都是惨杀李同志等的主谋者。张作霖在北京派军警团搜俄使馆，逮捕李同志时，蒋介石在东南开始屠杀忠实同志与工农群众。北京英美等公使馆中人，见李同志被捕，在旁边手拍欢呼。路透社、东方社，及上海西文报纸，于蒋介石之屠杀工人，赞赏备至。事实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张作霖，蒋介石，事前早有接洽，他们已早联合起来，向革命的势力进攻，希图消灭中国革命势力，恢复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买办地主的统治的局面。

现在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了，从李大钊同志之被惨杀，以及蒋介石的反叛，阶级分化，愈益明显。资产阶级已经脱离了革命战线，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站在一起，来造成白色恐怖。李大钊同志，就在这阶级分化的过程中被牺牲的，从此以后，我们更加确信，只有大多数工农群众，是我们革命的势力。我们今后当绝无犹豫，毫不妥协的踏着李同志的血迹前进，以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最后我们高呼，李大钊同志精神不死！被难同志精神不死！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张作霖！打倒蒋介石！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5. 西安追悼李大钊同志

（秦陇社西安通讯）西安自“四二八”噩耗传来，群众异常激愤，各机关特别之先烈追悼，业志前稿，大规模追悼大会各省党部，昨日（六）为第□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蒞会者，为国民党员，计共万余人，会场极形拥挤，程序列仪，首赵葆华谓李

钊不避难险，深入敌穴，为民族革命之急先锋，组织民众，造成西北革命之高潮，今死于帝国主义及其刽子手与新右派之手，吾人将踏着先烈的血迹，唤醒民众，与帝国主义奋斗，本李先生之精神努力奋斗，定要铲除帝国主义及军阀，定要为我们的死者复仇，李子洲报告惨案之经过，略分四段，一、李守常为北方革命指导者。李守常之经济政治社会学说极深邃，对于农民问题，尤有深刻的研究。三、李守常为中国共产党之发起者，尤为共产党之首先加入国民党者。四、李守常为掀动北方地区革命者。总之，帝国主义者对于革命者，决不分派别，都是要置死，所以我们革命者，也要不分派别，革命就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与敌人奋斗，要不革命，就踏在反革命的战线上去。次特约讲演契尔可夫，略谓吾人勿畏惨案而扫兴，更当以此激励其勇气，李大钊之死，非特是中国革命之损失，实全世界之损失，吾人要继续他的精神，前进，俄列宁死而增加革命的势力，死后五年，革命不能停止，并且增加了党员二百万余人，纪念大钊，应如纪念列宁的方法，继续努力去纪念，张作霖绞死革命的二十余人，以为降压革命势力，实为革命种子既播，将来定要收果，李守常种子既撒遍，将来必收佳果，必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刽子手张作霖。李大钊实为世界自由平等解放而死。次刘舍初等讲演毕，群起高呼口号，于十二时散会。

下午二时继续进行追悼仪式，到会者为中山学院，男女师范，各中学，各小学之教职员学生，约二万人，奏乐开会后，全体向总理遗像三鞠躬，继由赵宝华读遗嘱，主席杨明轩报告开会宗旨，复向李大钊等遗像鞠躬，并静默五分钟致哀，次读祭文，一、教育厅代表胡景儒，二、陕西全省学生联合会代表王霖三，陕西青年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于时全场寂立，哀痛之中，更表严肃，魏野畴报告李等死难之经过，极为详尽，特约讲演首为魏惜□。略谓张作霖之敢绞死李大钊等，系由英日各国际帝国主义之主谋，苟中国能如苏联之独立自由，则此种惨案决无发生之理，

李等之死，不啻死于中国民众之手，民众果能联合团结，共起打倒帝国主义，李大钊等必不会如此而死，吾辈当努力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为死者复仇，为生者谋自由幸福！次为于右任讲演，略谓不仅李大钊等二十人死于（四六）（一三）以后，革命健儿，死于反动军阀之手，及新右派之手者，自南至北，已不知若干人？革命者之血多洗一次，帝国主义之死期更逼近一步。以李大钊之学说，思想，环境，可以说是“李大钊时代”，弃置已久之绞刑，竟以之死李大钊等，每人费十八分钟之久始断气，真残酷之手段，使人痛愤不置！万恶军阀，不仅绞死李等二十人，且欲尽置革命党人于绞首之台。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立劝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中山信之。盖李深望中山之在中国成功革命，由列宁之在苏俄成功革命也。反动派常谣言共产党目中山为克伦斯基，以此证之，可知步实，李又为谓国民党改组后，最短时间可得二百万青年学生，当时左派以为妄。现在革命的青年，恐已不下二千万之数，李之预测，不为无见，黄河流域青年运动发展，皆李所推动，即中国青年运动，亦受李之影响非浅，李大钊以全时间，全精神，献给革命，吾侪时时在念，继李等之志而奋斗，而努力，如此，则李大钊精神不死“李大钊时代”死难者烈士的精神不死，未全体高呼口号而散，时已五点矣。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8日）

6. 冯玉祥追悼李大钊

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奉张绞杀之消息传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哭之甚哀，除在潼关总部开追悼会外，并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录其电文如下：

四月二十四日顺天时报载，张作霖在四月六日捕去之党员中，有李大钊、范鸿劼、谭祖尧、邓文辉、谢伯愈（俞）、姚彦、莫同荣、张挹兰、李崑、方伯务、郑培明、吴平地、杨景山、路

友于、莫华^①、阎振三、陶泉三、谢承常、李银莲、张伯华等二十人，已于四月二十八日被秘密绞杀，噩耗传来，悲愤万状！如此重大之党狱及惨杀，实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壮烈而又惨淡的一页。应即时在各部队、各地各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和其他各种宣传方法，务使全军将士及当地民众，均对于此种事变的真象和意义有明确的认识，增加我们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义愤。在宣传上有下列诸要点，望采用：（一）此重大惨变，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近年来中国革命势力进展，逼使敌人使用最后的凶恶手段，表示恶贯溢盈，末日已到。（二）此种重大惨案，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张作霖一同创造出来的，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主谋的凶手，日使芳泽对其最忠顺之走狗张作霖说：苏联自动取消前俄皇对华条约，不受辛丑条约的保护，围搜苏联大使馆，不致引起国际交涉。并首先征得英国同意，又提交使团会议通过。故有此惨案发生，应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打倒凶杀主谋的日英帝国主义者等口号。（三）李大钊同志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为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李同志之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地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又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但他只是努力国民革命，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敌人欲以共产党三字减轻李同志在革命中的地位，而事实上适得其反，并足以证明李同志更是世界革命中的领袖。李同志因地域的关系，与本军在南口转进以后，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李同志一死，北京革命工作，失了领袖，本军亦受极大的影响。（四）张作霖受其主人的指导，为惟共产党及吾党左派罪在不赦，右派则诸事可商量之说，此乃勾引吾党左派破坏革命的毒计，应向民众解释清楚。（六）此二十位同

^①莫华应为莫英。

志，均系努力革命颇著成绩的人，他们被杀，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损失。他们上了绞杀台了，我们要竟他们革命未完的事业。(七)我们要在一切宣传上不忘记此惨案，在每次宣传此惨案时，不要忘记本军此次出关讨伐张作霖即是实行李大钊等二十个同志未竟的志愿。我们要真能纪念死者，必须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

祥 五月九日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

附：

(一) 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李大钊柩昨发引

李大钊灵柩，于昨晨九时半，由浙寺发引，柩夫32名，抬赴香山万安公墓公葬。记者昨晨赴浙寺参观，昆卢殿上供李之遗像，教育界及文化团体所赠之花圈挽联颇多，计有北平文化总联盟，革命互济会，文学杂志社，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社会科学作家联盟等等。更者日人名山田太郎者，送布幛一轴为日文诔文，兹译之如下：

亲爱的我等无产阶级的导师、同志李大钊，同志尸体，虽埋葬于地下，但同志奋斗之余波，业经昂扬，同志既流之血，已成我辈之力！同志哟！罢目静瞑眠！我辈誓死作殊死战，切断枷锁！获取自由！

还有一朝鲜人以韩文制幛一幅，亦为可纪之事。至上午八时余，陆续到灵前致祭及参加送殓之男女，约五六百人，并有衣服褴褛之工人与军人等参加。李夫人因过于悲恸，面容憔悴，望去几若六十余岁老媪。记者向之致意后，由李夫人谈述自李大钊死后，六年间之苦。况李生前有遗产田地百余亩，因李为人好施济众，将财产完全捐助乡里贫苦之人，或用作地方公益事业，故身后异常萧条。李死后，原有人拟将夫人及子女等送至苏俄，因李夫人身体常病，不欲远离故土，数年来永居故乡，完全由亲友维持生活。李生前之著述颇多，其家属拟将来搜集齐全后，刊印专书行世云云。

九时半启灵，送葬者有教育界及男女学生约七百余人，起灵时，全体肃立，唱国际歌，继即静默志哀悼。殓仪最前列为旗伞执事，次为影亭，中供李大钊遗像，后即罩棺。由李之子女在前

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亲执挽联三十余幅。最前一联，下疑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其余各联，均系平市教育界名人及文化团体所送，中有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一联，文为“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南陈当指陈独秀）此外，清华大学史学教授张崧年所送布幡一幅，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幡中无字。自浙寺发引后，经下斜街、菜市口、进宣武门直奔西直门。沿路观者塞途，车辆拥挤，不能通行。至西单牌楼时路祭，由送葬者推代表读祭文，全体行三鞠躬礼，演说，唱国际歌，停留约半小时，继续前进。至西四牌楼，有李之故旧及乐亭同乡路祭。是时送葬者中有人散放传单，内四区警察及宪兵多人，前往劝阻，发生纷扰。送葬者亦各自行纷散。有男女学生四十余人，为警宪带去。内二十人赴内四区，转送公安局，其余赴宪兵司令部。事后，殡仪由李宅人员照顾，继续前行，出西直门，即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闻清华、燕京两校师生在西郊亦设有路祭。

（《晨报》1933年4月24日）

（2）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人士共500多人，参加了落成典礼。

胡耀邦、彭真、薄一波、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杨尚昆、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胡乔木、秦基伟、邓力群、陈丕显、胡启立、郝建秀等，参加了落成典礼。

李大钊烈士的亲属李葆华等也参加了落成典礼。

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今年2月20日开



2 032 4922 5

始修建的。

松柏青翠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坐落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陵园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园门的上方悬挂着“李大钊烈士陵园”匾额。进入园门内，迎面是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雕像后是李大钊烈士墓和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墓。墓后有一座宽4米、高2米的青花岗石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书写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

上午十时，薄一波宣布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开始，全场向李大钊烈士默哀致敬。

在肃穆的气氛中，彭真宣读李大钊烈士碑文。

落成典礼后，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同志和各界人士一起，参观了设在陵园内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陈列室里的图片、文字材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生平事迹，还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李大钊烈士的题词。

参加落成典礼的还有：王平、王首道、肖克、陈锡联、段君毅、黄火青、程子华、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周谷城、严济慈、黄华、洪学智、郑天翔、杨易辰、杨静仁、康克清、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陈再道、包尔汉、叶圣陶、屈武。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占祥、也参加了落成典礼。

（《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0日）